半部论语治天下

刘余莉教授《论语治要》学习心得

刘余莉·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部论语治天下：刘余莉教授《论语治要》学习心得 / 刘余莉著.
—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126-5340-5

Ⅰ. ①半… Ⅱ. ①刘… Ⅲ. ①儒家②《论语》—研究
Ⅳ. ①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6780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65228880　65244790 （传真）
网址：www.tjpress.com
Email：zb65244790@vip.163.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148×210　1/32
印张：17
字数：250千字
版次：2018年2月 第1版
印次：2018年2月 第1次印刷

书号：978-7-5126-5340-5
定价：48.00元

出版说明

《半部论语治天下》是根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伦理学专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者刘余莉教授的演讲稿整理成书，全书以《群书治要·论语治要》为底本，参照古人注疏，阐发经典大义，以透彻精辟的解读，生动活泼的案例，平实质朴的语言，立体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强大生命力。为解决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心灵困顿、家庭矛盾、社会隐患、世界冲突提出了标本兼治、亘古常新的中国方案，既是党员干部的修身必读书，同时也是广大国学爱好者的重要参考教材。

目录

前面的话 / 1

学而篇 / 17

为政篇 / 163

八佾篇 / 254

里仁篇 / 268

公冶长篇 / 288

雍也篇 / 301

述而篇 / 304

泰伯篇 / 316

子罕篇 / 341

颜渊篇 / 343

子路篇 / 392

宪问篇 / 432

卫灵公篇 / 455

季氏篇 / 472

阳货篇 / 498

微子篇 / 522

子张篇 / 527

尧曰篇 / 532

前面的话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论语》

尊敬的诸位同学，诸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群书治要》中的《论语治要》部分。

我们在现代社会为什么还要学习《论语》？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哪里来？如果我们对自己最基本的经典都不了解，还有很多错误的批判，那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就无从谈起。

我们知道《论语》主要讲的是孔子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他的政治、伦理和教育的理念。孔子出生在公元前551年，去世是公元前479年。很多人就问了，说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几千年前的人所讲的东西，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还有什么帮助呢？

我们说《论语》它所讲的是"道"，这个"道"就是恒常不变的规律。儒家常用"天道"来体现这种恒常不变的、本来如此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用西方人的话来说这个"道"，就是客观性和必然性的宇宙秩序，这个"道"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一样，在古代是如此，在今天它依然适用，是自古至今都适用的，所以我们学习它仍然有帮助。当然，有很多人对传统文化有一些错误的理解。

比如说我自己在上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位同学说他要讲孔子，他要重写一本书给孔老夫子正名。当时我还和他辩论，因为当时看了

很多专家学者的文章，认为都是因为孔子才导致了我们今天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局面，所以我就跟他辩论，当时还辩论得面红耳赤。后来1999年我到英国去读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被问及研究什么，我就说我研究孔子、研究老子等等。结果没想到我说完这句话，西方的学者都肃然起敬，有一种由衷的敬佩，说："真了不起！"一开始我还觉得他们是客套，好像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他们表示一种敬意，是寒暄之语。但是后来我们读了西方人研究儒家文化的一些著作、文章之后才发现，其实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甚至比我们中国的某一些专家、学者更加深入，他们没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批判，他们对《论语》、对孔子思想的理解都是从原著出发，所以读原著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读了《论语》之后，才发现世间人对儒家、对孔子的一些误解是很深的。

比如说有一种思想就认为儒家思想讲的是愚民政策，是统治阶级用来愚昧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实际上我们读《论语》就发现，孔老夫子提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在《论语》中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就是有德行的人；第二就是有地位的人，统治者。意思是统治者的德行像风一样，一般百姓的德行像草一样，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所以他首先重视的是领导者、统治者的德行。而我们翻开"四书"就能更加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我们发现在"四书"上，没有哪一句话是用来要求被统治者的，而几乎全都是要求统治者的。比如《大学》上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意思是说：从最高的领导者，到最底下的老百姓，都应该是以修身作为最根本的。那么首先是谁？首先是统治者，如果统治者不修身，想让下边的百姓修身，效果就达不到，这才是愚民政策。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在实践中我们也是这样去做的。如果我们认为道德教育是要教育一般百姓，而这些领导者都不需要教育。结果会怎么样？结果我们就把道德教育变成了说教，只是用言语去教导，但是所作所为都和自己所教导的不一样，这才使人们对道德教育生不起信心。所以我们读了《论语》原著，我们才发现儒家文化与其说是一种愚民的统治者愚

弄被统治者的武器，不如说它是一种治理方法、治理的理论、治理的智慧。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现在腐败现象很严重，这都是和传统文化有关，为什么？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官本位”，在儒家文化中，确实对于做官的人很尊敬，但是为什么对做官的人很尊敬？这是有原因的。

在古代选拔官员都是要首先看有没有德行，德行高的人才给他爵位；对国家有功劳，有贡献的人才给他俸禄。所以我们通过一个人的官位，拿的俸禄，就知道他德行的高低，这才是中国人对官特别尊敬的原因。

在现代社会，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有好几代人没有讲了。当了官的人、有了钱的人，不懂得拿着这个官位去为百姓服务，相反还想方设法地鱼肉百姓，这就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比如说我们在《论语》上就看到鲁哀公来请教孔子，说怎样才能够让人民信服、心服口服呢？孔老夫子回答他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意思就是你把正直的人、有德行的人举荐出来，放在邪曲不正的人之上，就能够让人民心服口服，心悦诚服地接受你的领导；相反你把那些邪曲不正的人举荐出来，放在正直的、有德行的人之上，人民就会不服气了。现在为什么人民怨声载道，对反腐败的呼声这么强烈？原因是我们违背了孔子的这个教诲。

我们看孔子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阐述，比如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什么叫办政治？办政治这件事很简单，就是要使人们正。做领导者的率领着大家做正确的事、正当的事，那谁还敢做不正当的事？夫子认为，如果领导者能够使自身端正，对于办理政治这件事又有何难处呢？如果领导者不能使自身端正，怎么样能够使别人端正呢？这些话都是告诉我们，夫子讲这个官，对官很尊重，那是因为做官的人都是有德行的人，否则不给他这个官位。

所以，“官本位”并不是传统文化中消极的因素，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学习、借鉴、吸收传统文化，能够做到“爵非德不授”，爵位、官位没有德行不授予；“禄非功不予”，“禄”，就是俸禄，你对国家没有贡献，那

就不给予。这两个制度没有确立，所以才导致了人们的不满。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讲创新。比如我在1999年去参加雅思考试的时候，外国人就在面试的时候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你们最伟大的思想家是谁？”我说是孔子，他说“难道你们几千年来就出了一个孔子吗？没有别的伟大的思想家了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人没有创新的意识，你看在西方社会，特别是在现代以来，每过几十年，十几年就会有一个新的哲学流派出现，取代旧的哲学流派。看起来他们的哲学理论很创新，思潮一个接着一个，那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西方的哲学流派层出不穷，而中国几千年来依然奉行、学习孔子的智慧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西方的这些哲学、流派、思潮，每过十几年，二十几年就会发现，他和新的时代潮流已经不相符了，有一些东西已经被认为是过时的，没有办法满足新的时代发展的要求。也就是说被历史很快证明了，它有一些不合理之处，所以必须要发明新的哲学流派来取代它。

但是中国读书人为什么几千年来都要读《论语》？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论语》已经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验证，是大浪淘沙的结果，没有什么是和时代不相符合的。即使有人认为《论语》中有些思想，已经和时代潮流不符合了，大部分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圣人他站在二十层楼，而我们站在两层楼，我们拿着两层楼的境界去看二十层楼的境界，我们看不到，反而还想把这个圣人拽回来，拽到两层楼说：“你所看到的，就是我看到的境界。”所以我们说“圣人”是对天道有体悟的人，古人也称为“得道”之人。既然是“得道”之人，他所体会出来的这些道理是经得起历史的验证的，所以是恒常不变的。

我们也知道六经之首的《易经》，第一个含义，就是“变易”，变化的意思。它告诉你这个世间的现象，是变化莫测的，变化无穷的。所以你要懂得与时俱进，但是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去谈创新呢？《易经》的第二个含义就是“不易”，不变的意思。也就是说，只有掌握了那个不易的、不变的规律的人，才有资格谈创新。所以创新并不是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做的

那样，打着创新的旗帜去胡作非为，做很多违背规律的事，最后得到教训，还给自己找借口说："既然要创新嘛，就要走一些弯路，就要交一点学费"，这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从一个人的一生来看，我们人的一生也就七八十年，最多一百年。如果我们不负责任地去学习那些经不起历史考验的理论，那就是拿着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我们想一想，哪有那么多的机会再重来一次？所以我们要学什么？一定要学那些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大浪淘沙后的这些精华。

《易经》的第三个含义就是"简易"。中国人讲"大道至简"，真正深刻的道理，一定是以非常简单的方式给大家表述出来。为什么？因为中国古圣先贤做学问的方法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的存心是为了利益在场的每一个听众，所以孔子所体会的"道"是很深奥的，他的境界可以说丝毫不在老子之下。老子对道有一个描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上等的人听到这个道立刻就能够理解、接受，马上就在生活中去力行，去实践。"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中等的人听到了这个道，会发现这个道其实离生活也不是近的，它虽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但是一般的人都没有体会到。圣人把这个道揭示出来后，他会半信半疑，有点相信，又犹豫不决，即"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下等的人听到了这个道，觉得这个道太深奥了，离我们的现实太远了，他就会哈哈大笑。最后一句话说得更好，他说："不笑，不足以为道"，如果你说的这个东西，大家都能够接受，都能够认可，都能够称叹，没有人笑话它，这个东西不足以称为道。

我们从老子的这一段话之中就可以看到，其实圣贤人所体会的"道"，是非常深奥的，并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够理解和认可的。所以，孔子采取了一个平易的方式，他把深奥的道理，变成简单的话来教导弟子。他给你讲道，你听不懂，就给你讲德；讲德，还听不懂，就给你讲仁；讲仁，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给你讲孝、悌、忠、恕。总之是要利益来提问的弟子，他是这样的一种存心，不是谈玄说妙，为了炫耀自己的学问。这也

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做学问的一个最大的不同。西方人恰恰相反，他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本来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他越说越复杂，最后让你听不懂，以此来炫耀自己学识很丰厚，能知道你很多不懂的东西。这个对听众就没有益处了。

所以我们看中国人做学问，都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比如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价值观，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中国人几千年前，就已经用核心价值观在引导人们了：讲五常，叫“仁、义、礼、智、信”，因为它概括得很简单，每一个价值观只有一个字，所以它易记、易懂、易行，很容易在社会上去推行，所以千百年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从《易经》这一名三意来看，中国人并不是不讲创新。他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是变化的，要懂得与时俱进。但必须是那个掌握了“不易”规律的人，才可以谈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不能够不学《论语》，因为不学《论语》，就掌握不了那一个普遍的道，我们自以为是去创新，其实走了很多的弯路，这个是第三种对传统文化的错误的印象。

第四种，就是认为传统文化净搞形式主义，讲繁文缛节。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的批评，都是看到社会现实的一些不良现象，就认为这是传统文化所导致的。其实恰恰相反，这是没有真正深入传统文化所导致的。比如说在各种大赛事的开幕式上，中国人把这个开幕式弄得很豪华、很奢侈、很浪费，很多国人看了之后就不满了，说“你看这都是传统文化导致的，就讲这些繁文缛节、讲排场。”

读《论语》我们就知道了中国人对礼确实是很尊重，但是礼“与其奢也，宁俭”。说礼与其搞得很奢华、很排场，宁愿节俭，只要你表达出对客人的敬意就可以了。还说“丧，与其易也，宁戚。”丧礼也要抓住根本，与其你把客人招待得面面俱到非常合意，不如从内心表现出对死者的哀伤。这都是让我们处处回到根本，不是要形式主义。

像我们现在学《弟子规》，讲“揖深圆，拜恭敬”，很多人看了之后就

不理解，他说："你看还要九十度的鞠躬礼，这不是搞形式主义吗？"其实他不知道"礼"，它是通过这种形式来培养一个人的道德情感、道德品质和仁爱之心。当我们能够把自己最尊贵的头低下去的时候，我们是从内心真正地折服了一个人的傲慢之心；而且两个人如果有什么矛盾，有什么不满，通过这一见面、一鞠躬，这个矛盾也就化解了。什么样的人最难鞠躬呢？就是有钱的人、有权的人、还有有"学问"的人。当然这个"学问"要带引号，不是真正的学问，这里是指有知识的人，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那为什么这些人鞠躬最难呢？因为这些人最容易有傲慢之心，所以他看了这个躬他会很难接受。

我们都知道即使是乞丐都有一种傲慢之心，傲慢之心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乞丐他已经是身无分文沦落到乞丐的地位了，结果他坐在街上看着过往的这些车子，还这样说："哼，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嘛！"连乞丐还有这样的傲慢之心，更何况我们一般人。所以这个躬鞠下去，让我们内心表达出对对方的恭敬，折服了自己的傲慢之心。这个对人性情的培养、人格的培养都是非常有帮助，所以说这个形式很必要。当然我们国人更加重视的是本质，就是这个礼它所包含的对人的尊敬、仁爱、还有同情之心。

在《论语》的另一个地方也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说这个礼，难道就是呈现"玉帛"这样的形式吗？音乐难道就是敲钟打鼓吗？在这里孔老夫子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图在形式上做文章，而是更加重视礼乐的实质。这一句话对于我们今天进行文化建设也是特别地有帮助。我们看自从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后，结果我们的广播电视都把那些地方歌舞、戏剧、音乐搬上了银幕，以为敲锣打鼓、唱唱歌、跳跳舞就是进行文化建设了。

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也就是说这个"文"是文章、文字、礼乐、曲调等等。通过这些方式起到什么作用呢？起到变化人的气质的作用。所以古代的人创作音乐、教导人礼仪，都是要起到培养起一个人平和的性情，培养起一个人的恭敬之心、仁爱之心等等，这才是起到了变化气

质的作用。如果我们把那些摇滚音乐，还有那些非常浮躁的音乐，歌舞都统统搬上了银幕，它确实也起到了变化气质的作用，但是它把人往哪方面去变化？它让人变得更加得心浮气躁，所以现在的孩子，如果男孩子喜欢看奥特曼，他就会有多动症；而现在的游戏都是打打杀杀，暴力色情的内容比较多，如果这个孩子经常喜欢打这些游戏，他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暴力的倾向，即使是女孩子，也有这种倾向。这就是告诉我们，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不能够仅仅重视这些形式，要重视它的本质，所以孔子恰恰是反对形式主义的。

当然，我们对儒家文化，对孔老夫子的误解有很多。这里举了四种最常见的误解，在后边我们学习的过程中还会遇到更多。讲这些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因为有一些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就对《论语》、对孔子、对儒家文化丧失了信心。所以在今天这个社会，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必须回到经典之中，回到经典之中才能够得到圣人原汁原味的思想。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学习《论语》。

《论语》的含义

第二，我们讲一讲《论语》经题的名字，“论语”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三国时期曹魏的何晏，著有一本《论语集解》，这是对《论语》的一个权威的注解，被收集在《十三经注疏》之中。到了宋朝，邢昺为《论语集解》作了一个《注疏》，这本《论语注疏》，就是解释何晏的《集解》。在邢昺的《注疏》中就讲到，“论”有五个含义：“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为什么叫“纶”，“经纶世务”的“纶”。邢昺说“以此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也就是说你读了《论语》，对治理天下、匡济天下有所帮助。

在宋朝有一位学者叫罗大经，他写过一本书叫《鹤林玉露》。在这本书中他就讲到：在宋朝初年，当时的宰相赵普就专读《论语》，结果就有

人说赵普只会读《论语》。结果宋太宗赵光义就问他:“你是不是只懂得《论语》?”赵普回答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也就是说我平生所知道的,确实没有离开《论语》的范围。并且说:“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也就是说当年赵普曾经靠半部《论语》,帮助宋太祖赵匡胤取得了天下,现在再靠半部《论语》帮助太宗赵光义来治理天下。所以古人有句话说:“半部《论语》治天下。”那我们从这一句话中就可以看到,这个《论语》的重要性,它不仅仅是可以打天下,而且也可以治天下。换一句话说,无论是在治世,还是在乱世,都能够用的上,这个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叫“圆转无穷,故曰轮也”,就像这个车轮一样,圆的车轮,轮转无穷。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真理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适用;在中国适用,在外国也同样适用,可以广泛的流通,广泛地流布。

在“五四运动”和十年“文革”之后,因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使我们一度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所以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看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又盲目地向西方学习,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批判地体无完肤,生不起信心。但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英国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叫汤恩比,他专门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历史,也就是说,他专门研究各个国家的文明、文化史,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孔孟儒学和大乘佛法。”

无独有偶,在1988年,有一批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们在巴黎开会,面对当时世界性的环境危机、恐怖主义、道德危机和诚信危机,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吁:“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汲取孔子的智慧。”这些人或者是历史哲学家,或者是科学家,都有科学的精神,他们提出这个论断绝不是偶然的,说明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同。

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他们没有说“能够拯救21世纪社会问题的是西方文化”?

在近现代以来，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就是“自我”，而这种“自我”又是一种占有性的“自我”。什么意思？就是以我所拥有的东西，作为评价个人价值的标准。比如说我的车子、我的位子、我的房子、我的票子，这些都是外在于我的东西，其实说白一点就是自利。怎么样才能获得自我利益的满足？要获得自我利益的满足，就要去和别人竞争，所以竞争向上提升，变成了斗争。这个阶段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问题就出现了，而斗争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获得不了自我利益的满足，这个斗争就会向上提升，变成战争。

在当今社会，我们一打开新闻媒体，就看到局部的冲突不断，这是因为西方的价值观普遍流行所导致的。战争如果再向上提升，比如说一方不理智使用了原子武器，最后的结果就是会导致双方同归于尽，这就是世界末日。所以依靠竞争的方式，来获得自我利益满足的价值观，不会给人一个光明的前程，只会把人类引向穷途末日。但是可惜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中国人所学到的，就是这样一种以竞争的方式获得自我利益满足的价值观，所以我们的社会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一个孩子回到家就跟妹妹说：“今天有一个同学问我一道题，我知道这个题怎么做，也知道答案，但是我就是没有告诉他。”这个妹妹听了就说：“如果换了我，我就会告诉他。”她这样一说这个姐姐就很惭愧，觉得自己年纪比妹妹大，但是德行却没有妹妹好，但是她的惭愧心才刚刚提起，没有想到这个妹妹是这样回答的“我会告诉他，但是会把错误的答案告诉他。”这就是竞争的观念所导致的。

像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这些结果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了互助，没有了关爱，而只有利、只有名，这个社会就很危险了。

孟子曾说过：“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从上面的领导者，到底下的老百姓都在交相争夺利益，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们知道《论语》的核心就是“仁爱”，这个“仁爱”之心必须要有一个根才能长养出来，而中国人的伟大之处，就是找到了“仁爱”之心的根本，那就是对父母的孝和对兄弟的友悌之心。我们把这个心向

上提升，就会关爱来到我们身边的一切人，这就是《论语》上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我们不仅要对别人有关爱的情感，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还要做出实际的行动给予帮助，所以互爱之心再向上提升，就是互助，那就是《孟子》上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这个互爱互助之心再向上提升，那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大同社会，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和谐社会。这个和谐社会就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不仅是把自己的父母当成父母，也要用对自己父母的心关爱像我们父母那般年纪的长辈；不仅仅把自己的孩子当成孩子，也要用关爱儿女的心去关爱像儿女那般年纪的孩子。使老年人都能够得到好的赡养，有人为他们养老送终；使壮年人都能够为社会所用，使年幼的人都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健康成长；使老弱病残幼，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够得到赡养、关爱和帮助，这才是和谐社会，这才是大同世界。

所以我们看，为什么西方人说“唯有中国的孔孟儒学与大乘佛法才能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因为孔孟儒学的核心是“仁爱忠恕”，而大乘佛法的核心是“真诚慈悲”，实际上就是仁爱精神。这才能解决问题，化解冲突。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化敌为友”，怎么样才能化敌为友？他是靠真诚心的感化。就像舜王他的后母、弟弟，三番五次地要置他于死地，他并没有怀恨在心，没有想着我终于有能力可以打击报复他们了，而是想着自己没有尽到人子之道，没有让父母满意，念念是反求诸己，反省自己的不足，最后他的真诚心感化了后母和弟弟。

所以矛盾之所以不能够化解原因就是“德未修，感未至”。我们的德行修养得不够深厚，所以人家还没有被感动，被感化。中国人讲怎么样化解矛盾？化解矛盾是要感化。所以中国人又有一句话说“仁者无敌”。并不是说有仁爱心的人就没有人诽谤他、和他对立，而是有仁爱心的人，他从内心不和任何人起对立，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去帮助他，只有这样的

人才能够化敌为友。所以我们看西方人能够提出这样的论点，确实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也是通过学习《论语》要树立起对古圣先贤的信心，实际上信心的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很多人都没有去读《论语》，但是被一些二手学者的文章，以一种先入为主的意见误导以为儒家思想是什么样的，就不愿意深入学习了，这是第二个含义。

第三个含义叫“蕴含万理，故曰理也”。也就是说《论语》上所讲的道理，是很深，很广的。它既包括宇宙自然的规律，也包括社会人文关系的道理。汉代扬雄，在他的《法言》中对“儒”下了一个定义，什么叫“儒”呢？“通天地人谓儒”，也就是说学习儒家的人，不仅仅通达了宇宙自然的规律；观察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体会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事实；观察到天人合一的这种规律，而且也观察到社会的秩序要保持稳定必须遵守的人伦大道。他对于这些道理很通达，这样的人才称为“儒”。

在《周礼·天官》上也对“儒”下了一个定义，它说“四曰儒，以道得民”。第四种执掌叫“儒”，“儒”是干什么的？它给大家讲的是道，所以它深得民心，受到人们欢欣喜悦地拥护和接受。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儒家所讲的这些道理并不是逼迫着人们，让人们硬着头皮去勉强参与，而是让人们欢欣喜悦地去接受。因为没有一个父母不希望儿女孝顺自己，没有一个兄长不希望弟弟恭敬自己，没有一对夫妻不希望和睦相处，而儒家讲的恰恰就是这些道理。

我们社会现在之所以出现了伦理关系的紊乱。父杀子、子杀父，兄弟因为财产互相争讼，夫妻同床异梦，甚至把对方都给杀掉了，这就是伦理关系的紊乱，就是因为讲儒的人没有受到重视。

在“文革”之后，批林、批孔、批周公，儒家被打倒了。不仅儒家被打倒了，还出现了儿女可以去批斗父母，学生可以去揪斗老师，夫妻被分成了不同的派别的现象，把人伦关系彻底给颠覆了。它的遗毒一直流传到现在，经过“文革”的人，对他们最亲近的人都不能够完全信任！如果儒家没有了，没有人讲这些宇宙自然的规律，人伦关系的道理，我们的社会和

人生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蕴含万理”就说明《论语》上的道理，既可以教人安身立命，过一种幸福美满的人生；也可以经世致用，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很多的建议和启发。

第四个含义是“篇章有序，故曰次也”。《论语》一共20篇，492章，每一篇都是独立的，但是它的思想却是连贯的，一脉相承，这就很难得了。我们再看《论语》中的每一句话，也都是很有逻辑性的，很连贯的。这个叫“篇章有序”。

第五个意思是“群贤集定，故曰撰也”。“群贤”就是指孔子的弟子，他们共同编纂，最后编辑成书，所以称为“撰”，就是撰写的“撰”。这是《论语》的“论”字五个含义。

下面我们看这个“语”，“语”字邢昺引郑玄《周礼注疏》说：“答述曰语”，这说明这个“语”着重在答，也就是孔子回答别人的提问，这些人包括他的弟子，也包括当时的国君、官员，甚至于他的这些弟子之间的这种答问，都被编在这本书中。

郑康成《周礼注疏》里记载：以此书所载皆仲尼应答弟子及时人之辞，故曰“语”。因为这本书所记载的都是孔子应答他的弟子以及当时的一些人的话，所以称为“语”。就是说这个“语”着重在答，别人问他，他来答复。当然你说明一件事，叙述一件事，这也叫“语”。这是对“论语”两个字我们进行了解释。

《论语》是谁来编纂的？汉代的刘向说是群弟子选记，这个“群弟子”，肯定不是所有的弟子，郑玄就认为更少了。他认为《论语》是由仲弓、子夏、子游这几个弟子编纂的。郑玄是汉代的一代大儒，当然他说的话也是有根据的；到了宋朝程子认为，《论语》是孔子的弟子有子和曾子的门人所记，也就是有子和曾子的弟子所记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论语》之中，称有子和曾子的时候，都称“子”，这就说明不是他们的师兄弟来写的，因为古人礼上有规定：朋友、同学之间互称都称字，表示恭敬，称“子”的就是他的弟子。

清朝学者章学诚说：“《论语》是曾子的弟子们所记录的。”他为什

么认为是曾子的弟子所记录的？因为在《论语》中有一章写到曾子过世的情形，而曾子他是孔子弟子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弟子。《论语》中还有关于他过世的记述，说明《论语》是曾子的弟子所记录，至少成书是在战国时期，因为曾子逝世于春秋末年战国初年，这样的推断都是很有道理的。这是对《论语》是谁编纂的，我们给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现在所通用的《论语》读本，是哪一个版本呢？《论语》的版本在历史上有三种：有《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这个《古论语》就是用古文字所写的，是在孔子的屋子里发现的，从墙壁里挖掘出来的。《古论语》一共是二十一篇；而《齐论语》是齐国的学者传下来的，总共有二十二篇；《鲁论语》是鲁国的学者传下来的，总共有二十篇。

在西汉末年，学者张禹将《鲁论语》和《齐论语》汇集在一起，把新的《论语》定为二十篇，这个称为《张侯论》。后来到了东汉末年，经学家郑康成(郑玄)，他以《张侯论》为底本，又参考了《齐论语》和《古论语》，重新编校成了一个新的版本，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通行的《论语》版本，一共有二十篇。郑康成所编订的版本流传之后，《齐论语》和《古论语》也就失传了。

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论语》就是郑康成最后编订而成，一共有二十篇，每一篇都是以这一篇首句的两个字或者三个字为标题，所以它的这个题目，本身没有特别的意义。这是我们讲的《论语》的版本。

《论语》的注解

下面我们再讲一讲《论语》的注解。《论语》的注解自古以来有很多，因为《论语》很重要，所以历代都有很多大家对它进行注解，我们举几个比较重要的注解。第一个就是三国时代，曹魏的何晏，他有一本《论语集解》，后来被收入《十三经注疏》。宋代以前的人读《论语》都是要读何晏的《论语集解》，而到了南北朝，宋齐梁陈的梁代有一位学者名叫皇侃，他有一本《论语集解义疏》，是根据何晏的《集解》作底本，进行了

注疏；到了宋代邢昺，也是依据何晏的《论语集解》作底本又再次进行了注疏，就是《论语注疏》。这部《论语注疏》对于文字的训诂、考证乃至于对义理的开解都更加详尽，到了南宋，朱熹对《论语》也进行了注解，叫《论语集注》。朱熹做学问很扎实，他在《论语》上也是用了毕生的功夫。当然他对《论语》的注解，也有一些偏颇之处，后代的学者考试都是依据《论语集注》，所以他的影响很大，他不仅仅重视文字的考据、考证，而且在这部《集注》中发挥了他的理学思想。到了明朝的时候，明末清初有一位蕅益大师，他也是净土宗的第九代祖师，他对《论语》进行了一个画龙点睛的注解，他这本书叫《论语点睛》，收在《四书蕅益解》之中。他是通过把儒和佛的义理相融通，用佛教的道理来解释《论语》，对《论语》的理解就提升了。

因为蕅益大师是一位开悟的人，在开悟的人那里看到的是理，而不是执着于文字相，所以他的解释也是非常值得参考。到了清代是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也是一部很权威的注解，他在吸收前人的成果基础上，加上了清朝人注释的特点，也就是他更加重视文字的训诂，重视史实的考订，在过去的注解当中水平应该是最高的，但是因为他的考证非常详细，就变得十分繁琐，所以也会让后人望而生畏。

近代对《论语》的注解，有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还有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还有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还有李炳南老先生的《论语讲要》，这些都是很可贵的对《论语》的注解。我们学习《论语》，可以主要参考这里边的一些注解。

当然我们学习《论语》重要的是“悟入”，而不要死在注解之上。我们知道，这些注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注解的水平和作者的修养水平，还有他的功底，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看了何晏的注解，那是何晏的《论语》；看了皇侃的注解，那是皇侃的《论语》；看了邢昺的注解，那是邢昺的《论语》，那不是夫子的论语。所以我们学习《论语》，要明白这个意思，就不会死在古人的注解之上，古今的这些注解在我们面前，只是作参考而已。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要自己去悟入，通过自己的体悟，

然后再去对照这些注解，那么你才能分辨出古人的注解孰优孰劣，也能看出他们层次的高低。

在学习《论语》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些意思讲不通的句子。这些地方让我们在研究、求解的时候遇到困难，不能够解通，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在传承的过程中，这个书本本身出了一些问题。因为《论语》这部书流传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了，尤其在从前是用竹简记录，所以，第一种解不通的地方是因为有错简的，也就是说记录文字的竹子、竹简的绳子断了，导致竹片散掉了，再穿起来的时候把这些竹片穿错了，一穿错导致前后行就颠倒了，这是第一种解不通的现象；第二种还会有重出的现象，也就是一句话在前面已经出现过了，结果在后面又重复出现，这是因为在孔老夫子的弟子记录这些话的时候，不同的弟子都记录了同一句话，结果在编辑的时候把这两个人记的都编在了里边，这样就重复了。

那么除了有错简、有重出的，还有缺文。缺文就是文字不足，有漏掉的。

第四点是有讹字，就是有错字。我们知道，现在印刷一本东西要校对很多遍，校对很多遍还有错别字。在古代的时候，流传了几千多年的东西经过了很多人的手，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这也是我们读古书的一个困难之处。

遇到这些不解、不通的时候怎么办呢？古人说要“取其义，不附会”。就是你要取它的义理，不要牵强附会。有怀疑的地方也不能够随便更改，在旁边加一个批注，说这一个字很可能是哪一个字。而不能说你认为这个字是哪一个字，就把它给改过来。如果这个风气一开，经典改到后来就面目全非了，这也显示了中国古人做学问的严谨。

学而篇

《论语·学而篇》一共是十六章，《群书治要》中选了其中的九章。《学而篇》讲的主要是入道之门，就是说你修道的入门之处、积德之根。也就是你要修德，要积功累德，它的基础是什么？这一篇文章所讲的内容就显得很重要了。我们首先看第一句话。

《治要》上第一句话：

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与！"

有子是孔子的弟子，姓有名若，也就是有若。"其仁之本与"，通行本都多了一个"为"字，"其为仁之本与"。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与！"

"君子"，在古代指在上之人、在位之人。后来成为有德、有位之人的通称，也就是"有德，堪在位者"，这样的人称为"君子"。在《论语》中，这个"君子"，两种意思都有。第一种意思是指在位的人，第二种意思就是指有德行的人。这里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意思是君子在学道的过程中，虽然还没有像圣人那样成为得道之人，但是他在努力地求学，所以他也是一个觉悟的人，不迷惑的人。这个"务"是"专利"的意思，觉醒的关键就在"专一"，佛教讲精进，精一不杂的意思。

一个人做学问能不能成就，关键点就在于能否专一。所以古人成功的关键都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们看在《六祖坛经》上记载，法达法师读《法华经》读了十年，十年专攻《法华经》；而无尽藏比丘尼一生读

《大涅槃经》，所以他一生的功力用在《大涅槃经》上。因为他们专心到一定的程度，后来遇到了六祖，一经点化就开悟了。所以中国古人，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是在求开悟。那么怎么才能悟入呢？那就是要专一，把你的心力、精神集中在一部经上。

我们看在历史上，刘宝楠父子对《论语》作注解，作了《论语正义》。这一部书就是刘宝楠父子两代人，经过了七十多年才完成的一部注解；焦循作《孟子正义》，给《孟子》做注解，也是父子两代人才完成的。这两部注解传承久远，非常权威，成为后代人研究《论语》、《孟子》必读的注释，就是因为他们能够专心。那么在佛教之中，我们知道周止庵居士一生研究《心经》，而江味农居士一生专攻《金刚经》，他给《金刚经》做了一个注解，也是非常权威。后代人如果想要研究这些经典，都不能够不参考。所以这告诉我们，古人之所以能够成就，就是因为他能够“专”。而我们现在人做学问之所以不能成就，毛病就是出在不能够专一上面，希望广学多闻，希望能够知识很广博，这都是习气使然。这种好高骛远的做法，不但不能够达到求学的目的，反而使人偏离了方向。

一般人不能够专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喜欢追求名闻利养，因为你看你讲的东西很多，这个也能讲，那个也能讲，人家提到这一部经你好像知道，提到那一部经你也懂得，这个都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名利，想让别人赞叹自己。所以孔子早就提醒我们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人做学问求学的目的，都是要提升自己的学问、道德，提升自己的修养。而现在人做学问的目的就大相径庭了，都是“为人之学”，讲出来都编成书，一部一部，著作等身。别人一介绍，你看过多少多少著作，说起来很好听，但是自己没有开悟，这个就是我们做学问，追求在名闻利养上了，没有追求真实的学问、真实的修为。

中国古人特别强调实修，特别是儒释道三家，都是心性之学。这个心性之学就是你通过潜移默化地学习熏陶，使你的心性有提升。有提升，心清净，自然就会有悟处。圣贤人的经典都是圣人心性的流露，你的心和圣人之心是相通的，你怎么会看不懂呢？而我们现在的障碍就是要求多，

要求名闻利养，这一下就把悟门给堵住了。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培养不出人才呢？你看我们现在的研究生，叫“硕士研究生”。“研究生”，说明我们在研究，用的心意识，那能研究什么呢？所以古人是离心意识，用的是参究，就是离文字相，不要去研究，研究就落在分别之中，落在意识之中了。

我们现在的博士生，你看“博士”，要求广学多闻，知识很广博，学了很多的知识，但是没有智慧，遇到问题还解决不了，这就叫“博士”。所以中国古人告诉我们，你要有知，就会有所不知。你有知道的，无论你知道的多么的广博，那你总会有不知道的，这就是你有知就会有所不知。那怎么样才能做到无所不知呢？古人教导我们要求“无知”。“无知”起作用才能无所不知，就像在我们面前放着一个镜子，这个镜子上擦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就叫“无知”。无知起作用，是“胡来现胡，汉来现汉”，就是中国人来了，它能够把这个中国人照出来；外国人来了，它能够把这个外国人照出来。为什么它有这个功能呢？就是因为它本身一尘不染。

如果我们有知，就等于我们在这个镜子上画了一幅图画，画了一个像，这个镜子就被蒙蔽了，结果汉人来了照不清楚，胡人来了也照不清楚。所以中国古人做学问的方式，求真理的方式恰恰是先求无知，让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也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著”。用水来比喻，就像这个湖水，它是波澜不兴，一个波纹都没有，非常地平静，这个时候就是把外界的环境、树木、山等等都能够映照得清清楚楚。但是如果水起了波纹，它对外界的映照就歪曲了，而水起了大风大浪，又泥沙俱下，很浑浊，外界的事情，它完全映照不清楚了。

这水面就像人心一样，比如说，人心起了大悲、大怒、大喜的时候就像惊涛骇浪一样，就对外界的人、事、物看不清楚了。比如人在盛怒的时候所说的话，一定是过分的，一定是不能够如实地表达他的真正想法。人心起了一个小小的波纹，比如说我们看谁不顺眼，不满意了，对他有嫉妒之心了，人家即使是做好事，做善事，我们看了也会挑三拣四，这都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平静所导致的。所以，修学的过程就是使我们回归到本性

的一个过程，让我们的心波澜不惊，非常地平稳。

这就是告诉我们，悟要专一，要求悟处。那怎么样求专一，求悟处呢？比如说，我们学《论语》，我们每一天把《论语》读诵两遍，早晨读诵一遍，晚上读诵一遍，坚持十年，十年之后，你看你的心地非常地清净，就在这一部书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个意思自然就出来了。如果我们讲《论语》，还想讲得好，有求好的心，那就不会非常地好了，所以说要保持心地清净，读诵、背诵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很多地方兴起了儿童经典读诵工程，很多人不理解，包括一些知名人士，说孩子也不懂得其中的意思，让他背来背去，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死读书。其实并非如此，中国古人让孩子背诵书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把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所背的之书上，心无旁骛，很专一。如果他不背诵这个书，就会去胡思乱想，小孩也会有很多的妄念，心就很难清净了。所以，读诵是保持心地清净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所读诵的经典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中国古人发明文言文这个工具，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古人发现，“语”和“文”，如果不加区分，我们怎么说就怎么写，那有什么弊端呢？后人在看前人所写的东西，就完全看不懂了。比如说我在国外生活了四年半，结果我一回到中国的时候，看到很多网络上的文字就不认得了。比如说，什么叫“顶”，一开始我以为这个“顶”字就是反对的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顶撞”，但是和朋友交流的时候啊，弄出了笑话。人家说那个不是顶撞的意思，那是非常支持、非常拥护的意思。比如说还有“粉丝”，“PK”，还有现在更加新潮的词儿，如果你不在这个地方学习、生活，你再看到这些词，你就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如果我们怎么说就怎么写，把这些都落实在书面文字上，那么后人再看前人所写的东西就完全看不懂了，就像读天书一样。

那怎样把我们的经验、智慧、文化、思想承传下去呢？古圣先贤看到了“语”和“文”不加区分的弊端，所以才煞费苦心地发明了“文言文”这一标准化的书写工具。也就是说我们的日常用语，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扩展不断地丰富，但是一旦你要传达经验、传达思想的时候，都采

取统一的文言文的格式，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只要后代的人，他们也学习了文言文，掌握了这个标准化的书写工具，就可以回到几千年、几百年前和古圣先贤直接对话，他们的经验教训就可以为后人所承传。

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承传至今，绝非偶然，都有祖先的智慧在其中，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古圣先贤对后代子孙的那种关心、用心，我们再看圣贤教诲，再打开文言文的经典，就感觉到非常地亲切，非常地熟悉，学起来也就非常地容易了。所以做学问不要怕吃苦，还要有耐心，能够十年专学一部经，那么十年之后，你就是这部书的专家，人家要请人讲《论语》，一定会想到你，不会想别人。

我自己在求学、学问的过程中，也深深地感受到我们现在学校制度有很多的弊端。什么弊端呢？你看我们都上了博士了，博士阶段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写博士论文上，一共就三年的时间，如果你专门研究一个问题，把精力集中，那么写出的这篇论文一定是掷地有声，非常有研究、有深度。但是，我们即使到了博士阶段，第一年几乎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应付外语考试，应付政治公共课上，还有很多专业课。你想想这样下来，剩下了多少时间来写论文呢？所以你专一的时间就不够，写出的论文又非常仓促，特别是到了第三年，还要忙于找工作、考公务员，那就几乎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把博士论文写好了。

那么我们古人做学问是怎么样的呢？他一生专攻一部经，所以古代有五经博士，并不是说五本经都讲，当然那些经也学习涉猎，但是他一生的精力专门用在一部经上。比如说他讲《孝经》，他就专门讲《孝经》；他讲《论语》，他就专门讲《论语》；而另一个人讲《易经》，他就专门讲《易经》。那我们想一想，一个人十年学了十部经，另一个人十年学了一部经，我们想一想谁下的功夫深呢？我们要请一个人讲《易经》，当然是请那个十年学习《易经》的人。而且我们刚才讲了，经典都是圣人心性的流露，只要你一部经真正通达了，那所有的经都是圣人心性的流露，“一经通，一切经通”。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务”字，一定要学会专攻专利，这是我们修道、修学的关键。“务”字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再看“本”，“君子务本”，“本”就是根的意思，我们经常说“根本、根本”，对于我们修学来说，这个根既有行门的根，也有解门的根。刚才我们讲了，解门的根要种在“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不要因为外在的名利受影响，在枝末上去用功。我们也看到在民国的时候，净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他到七十岁的时候才出名，而他的出名还不是自己有意地要去宣传，是有一些知识分子，到普陀山去拜山，结果无意中遇到了他，向他请教了一些问题，他都回答得很好，后来他们再遇到问题的时候，都写信给印光大师，印光大师回信一一给他们解答。他们把这些书信发表在当时的报纸刊物上，结果人们才知道有这样一位有智慧的人。

我们看印光大师，三十多年的时间都在藏经楼里，干什么呢？在读书。他没有急于成名，但是他的教化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民国以后很多的高僧所比不上的，他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比深远。这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对象，不要着急去求名，那都是虚名，要学“实至名归”。你不要去求，自然会有机缘，因为你所学的东西能够对国家、对人民有贡献，你不想出名也都会出名。这个是告诉我们，解门的根重在一门深入。

那么行门的根本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孝悌也者，其仁之本与”。“孝悌”是为仁之本，小注中也说，“先能事父兄，然后仁可成”。一个人能够先侍奉父母兄长，然后才能培养起仁德、仁爱之心。那么“本立而道生”，这个“道”是什么道呢？其实就是“仁道”，就是圣贤之道，也就是说我们做人要有资格才行。如果一个人连孝敬父母，尊敬兄长都做不到，他这个人做人都不够资格，更何况成圣成贤。所以成圣成贤，根是在做人，把人做好了才能够成为君子、成为贤人、成为圣人。

“孝悌也者”中的这个“孝”，古人解释为“善事父母为孝”，“悌”就是“善事兄长为悌”。关键就在这一个“善”字，怎么样做才称得上是善呢？那么我们可以体会一下，父母关爱儿女是怎么关爱的？儿女小的时候，不会说话，也不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思，做父母的要非常地用心在孩子身上，才能够体会到他的需要，是饱了，是饿了，还是冷着了，还是不舒服啦？做母亲的全副身心都在婴儿之上，她才能够体会得到。所以善事父

母，首先在心上，要全心全力地关心父母。从事上来看，你看父母关爱儿女，也是做得面面俱到，孩子吃的要好，不能吃多了，也不能饿着了，还不能太冷，也不能太暖，要不然就得病了，感冒了。所以每一件事都是要照顾得很周到。冬天的时候孩子把被子给踢开了，母亲半夜醒来，还要去给儿女盖被子，结果孩子褥子给尿湿了，这个母亲宁愿自己住上湿的地方，也要把儿女放在干的地方睡好，这就是“回干就湿恩”。所以父母关爱儿女，无论在事上还是在心上，都做得十全十美。那我们怎么来善事父母、善事兄长呢？那我们就要学着父母关爱儿女的心去体会父母的需要，所以这个才叫“善”。

这个“仁”字是“从人从二”，是两个人相处之道，想到我自己就要想到对方。也就是说我跟他是两个人，两个人合成做一个人，就不是两个人了。所以我们怎么样爱自己就要怎么样爱别人，这才是仁。所以，推己及人是行仁之方，是为仁的方法，就是《弟子规》上所说的“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我们做任何事之前，都要扪心自问，如果我不希望别人以这样的方式来对我，那我绝对不可以以这样的心来对待别人。当然，“推己及人”是为行仁之方，但是其实说到根本之处，“推己及人”其实还是两个人，和那个“仁”还差了一层。这个“仁”是两个人合成一个人。真正的仁心，它是没有我和他的对立，因为你有我有他，那就是二了，有二法了，就不是真正的仁心了。所以，“推己及人”是接近仁，而真正的“仁”是我和万物是一体的，这才是真正的“仁”。

那么仁爱之心怎么培养呢？那就是要从孝悌培养起，所以我们能够善事父母，善事兄长。在善事父母、善事兄长之中才能够体会到我和他是一体的而不是两个，有两个就有界限了，像我们现在有人说父母和儿女之间有“代沟”，有“代沟”，孝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孝”，古代的人写作上面是一个“老”字的一半，下面是一个“子”，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一体的，而不是两个。如果我们有“两个”这个观念，孝已经不存在了。如果儿女和父母有代沟，什么原因呢？因为做儿女的没有全心全力地去和父母沟通，没有全心全力地去和父母交流。

舜王就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典范，他的后母和他的兄弟，三番五次地要置他于死地，他都没有怀恨在心，没有想着去打击报复，而是反省自己做孝子做得不好，为什么做得不好呢？是没有做到我和父母是一体的，父母和我还是两个，所以他总是反省自己，最后他的德行、孝心终于感化了后母。即使是这样的后母，想三番五次置他于死地的人都能够被他感化，那我们一般的人，很幸运没有遇到这样不可思议的父母，我们还和他们有代沟，什么原因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越来越自私自利，心里已经装不下父母了。自私自利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的妻子、孩子，自己的生活看得很重要，父母的生活，他就没有这种仁爱的表现，也没有一体的感受了，这就离“仁”越来越远了。

孝悌之心为什么是仁爱之心的根本呢？我们知道一个人人生在世，最大的恩德就是父母的养育之恩，结果这么大的养育之恩，这样无私无求的对儿女的奉献，儿女都不能够记在心上，想着念念去回报，那请问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的恩德，会让他想着去报答呢？没有谁的恩德能够超过父母的恩德！你看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付出是不讲条件的，是无私无求的，结果我们还不买账，还爱搭不理，说起话来对父母还有很多的忤逆，还是厉声厉气，不尊重父母。即使如此，父母还是对我们无怨无悔，该怎么样做饭还是怎么样做饭，该怎么样照顾还是怎么样照顾，该怎么样牵挂还是怎么样牵挂，这就是做父母的。

所以怎么样才能叫善事父母呢？善事父母，用《论语》上的话来说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生，事之以礼”，就是《弟子规》上的“入则孝”里面很多具体的要求，“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所以父母叫你的时候，不能爱搭不理，装没听见，顶多不耐烦地回答一句，“干嘛了，你没看见我忙着吗？”这就不是孝了。当然这个“父母呼”，不仅仅有呼出来的，比如呼喊你的名字，还有一些心意是没有说出来的，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们做儿女的要善体亲心，对于没有说出来的呼声，也要能够体会到。父母希望我们做什么呢？希望我们学做君子，学做圣贤；希望我们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希望我们志向远大，学有所成，成为一个对国家人民有所贡献的人，这些都是父母的呼声。我们是不是尽心尽力地来满足了？所以，你能够把学业学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本分尽到，这也都是在回应父母的心声。当然中国古人说善事父母，要从一些具体的小事上表现出来，比如说，“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冬天的时候，要照顾父母，看他是不是冻着了，冷着了；夏天的时候，要知道父母是不是太热了；早晨的时候，起床之后，就要去向父母问安。

关于善事父母，在《群书治要·礼记·内则》上有这样一段话，告诉我们做儿女的怎么样做才叫善事父母。我们把这一段话的大意给大家分享一下：儿女侍奉父母，应该是鸡刚刚啼叫，就要起来洗脸漱口，梳头戴帽，理好事物，系好帽缨，穿上端服，套好蔽膝，系上大带，插上笏板。这个都是古代做官的人正式的官服，叫做端服，还有蔽膝，还有大带，还有觐见的笏板，左右两边佩戴用具，然后去到父母公婆所居住的地方，静气平声询问父母需要什么，然后恭敬地送上什么，和颜悦色地嘘寒问暖；父母如果有过错，要心平气和，低声劝说，如果劝说听不进去，就要更加地恭敬，更加地孝顺，待父母高兴的时候再次劝说，如果父母发怒不高兴，甚至打得自己头破血流，也不能厌恶埋怨，还要更加地恭敬孝顺。

父母去世之后，儿女将要做善事的时候，想到要让父母留下好的名声，就一定要实现它。曾子说，孝子养老，要使老人耳目愉悦，寝室安适，以其饮食习惯尽心地奉养；父母喜欢的，自己也喜欢，父母崇敬的，自己也要崇敬。连犬马都会如此，更何况人呢？所以你看在《礼记·内则》上就记载一个儿女怎么样做才叫善事父母，把这些细节都能够做到了才是善体亲心，关心父母的身体。这个就是说“事之以礼”，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要按照礼的要求，去奉养父母。当然很多人看到这一段话可能觉得太繁琐了，现代人公务繁忙，都要讲速度，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这个上面呢？

有一个朋友他到日本去留学，结果回来的时候，娶了一位日本的媳妇，带着这个媳妇回到家里见公婆。他们家的父母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

候，就发现这个日本媳妇穿着和服，妆化得很好，像去参加正式的宴会一样装扮一新，跪在了公婆的门外，看到公婆打开门，然后马上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说："请问爸爸妈妈，昨天晚上休息得好吗？"结果这一个举动把这老两口吓了一跳，不知道这个儿媳妇出了什么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礼仪之邦的礼仪，自己没有传承，都已经跑到日本人那里去了，都已经跑到韩国人那里去了，在他们的生活中还能够看到中国人的礼。

我们想一想，如果儿女平时都是以这样的礼节来侍奉父母，他还会对着父母大吼大叫，还会对父母吵架、不满、不奉养，脾气很坏吗？所以，这个礼确实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效果。但是这么好的礼仪文化，我们认为是吃人的礼教，把它给废弃了、批判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有的人父子之间的关系，公婆和儿媳妇之间的关系，都处理不好，甚至还要吵上法庭。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中国的文化确实是断层了，特别是我曾到斯里兰卡去访问，他们的导游告诉我，他说：如果这个孩子，在家里是辈分最小的，他就要早晨早起半个小时，为什么呢？要给爷爷奶奶跪拜、问好、告别，然后再给父母，还有这些叔叔伯伯问好，然后再告别，也要跪拜。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传统维系下来了，还一直沿用至今。斯里兰卡的五伦关系处得特别好，是因为他们没有盲目地向西方学习。他们整个国家没有化肥农药，吃的食品也非常安全。这个确实是对比了之后才发现我们的文化确实已经断层了。

现在我们学习《弟子规》，说"揖深圆，拜恭敬"，给别人鞠一个躬，很多人都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接受。这个告诉我们善事父母要从礼上来做到，当然这个礼，它只是一种行为，更重要的是通过礼表示对父母的恭敬、感恩之情，它这个本意还是要用心地体会父母的需要，不仅仅是形式上的鞠躬。所以善事父母，首先要养父母之身，就像《孝经》上讲到庶人之孝的时候就说："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对普通百姓来说，就是要顺着四时的变化，按着自然的规律来生产、生活。"谨身节用，以养父母"，什么叫"谨身"呢？"身不为非"就叫谨身。自己的言行举止都符合法度，不做为非作歹的事。节用，就是即

使是很富裕也不奢汰，不过分地追求奢侈浪费的生活。这样才能够奉养好父母，让父母安心，这个就是普通百姓的尽孝方式。

当然要养父母，让父母衣食无忧，经济上有保障，这仅仅是孝养父母的最起码的要求。在孔子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子来问他什么是孝，孔子就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他说，现在的人认为赡养父母，就尽到了孝道，但是对于养狗养马而言，也同样是养，如果仅仅赡养而不尊敬父母的话，怎么能够把养父母和养狗养马区别开来呢？所以，赡养父母最重要的是从内心表达出对父母的恭敬和感恩之心，还要养父母之心。而养父母之心，除了尊敬父母之外，还要能够做到"父母唯其疾之忧"，也就是说，你的父母仅仅为你的疾病而担忧，完全没必要为你任何其他事情而担忧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孝子。

我们看一个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功课不好，这个父母会担忧，这就是不孝了；上了初中开始上网吧打游戏，不好好学习，耽误了功课，也让父母担忧，这还是不孝；结果到了高中，每一天交际了很多不好的朋友，不务正业，也会让父母担忧，这还是不孝；等走上了工作岗位，不专心工作，不珍惜工作的机会，对领导不尽忠，然后一不高兴就把领导给解雇了，这样的孩子也会让父母担忧，这还是不孝，更何况是那些啃老族，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和父母要钱供养，让父母担忧，让父母有很大的负担，这全是不孝。

所以从这里看，一个真正的孝子，其实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了。所以中国人才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因为这个孝子，几乎在德行上没有欠缺，他的父母对他为人处世、待人接物都非常地放心，这是养父母之心。

孔子还说了一段话，他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侍奉父母，和颜悦色是最难能可贵的了，有事情儿女去代劳，有好东西让父母先吃，你以为这就是孝了吗？意思是说这远远不是孝，那怎么样才是孝呢？

在《礼记》上也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一个对父母有深爱的孝子，他和父母说话的

时候，一定是和颜悦色，而且愉色婉容，面容都是很柔和的，说话声音也是很温柔的，这才是对父母有深爱的孝子，对父母的一种自然的表现，这是养父母之心。还要养父母之志。当然我们知道父母培养儿女，也都是对他有期望的，希望他能够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奉献。《孝经》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个孩子能够立身行道，自己的身修养得很好，处处走在道上，甚至都能够扬名于后世，后世的人提起他，对他都非常地尊敬、佩服，这个才是让父母感到非常地自豪，说起他来，觉得没有白养了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叫"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个孝才尽到了完美。

除了养父母之志，还要养父母的智慧，就是说父母年纪大了，一般年纪大的人，就会对财看得比较重，所以，你要经常地劝导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要那么多的钱有什么意义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而且年纪这么大了，父母也不要再那么操心儿女了，自己能够身心健康，有一个积极的思维，有一个乐观的心态，这个是最重要的了，儿孙自有儿孙福。"要给他讲这些道理，不要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还念念牵挂儿女。

父母有过失的时候，《弟子规》上说："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并不是说父母所作所为就都是正确的，如果父母所作所为，有违大道，我们就要去委婉地劝谏，让他更改，但是劝谏的态度，一定要"怡吾色，柔吾声"，不能因为自己对了而父母做错了，就对他们厉声厉气，很不耐烦，那样就错了。所以要提升父母的智慧，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也学习圣贤教诲，能够求圣求贤，这样的话，这一生才没有白过。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善事父母实际上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个孝很重要，怎么样才能够在全国推行孝道呢？

《大学》上有一句话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悖。"在上位的领导者，他能够尊敬老年人，整个国家的人民，才会兴起孝养之风；"上长长而民兴悌"，在上位的领导者，能够尊敬尊长，国家才能兴起友悌的风气；"上恤孤而民不悖"在上位的领导者，能够体恤孤儿，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人们才不会产生背离之心。

所以这里边就强调，做领导者的要率先垂范，做出孝的榜样。

历史上汉文帝之所以能够开创“文景之治”，能够使社会太平，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孝子。他的生母薄太后生病三年，汉文帝在旁边照顾，目不交睫，衣不解带，因为他时时要侍奉在母亲的身旁，结果困了的时候，只能打一个盹，甚至衣服都没有解开，就去睡觉。每次给母亲来进奉汤药的时候（古代是中药），他一定都要先尝一尝温度合不合适，才敢给母亲去进奉。我们看一看像文帝这样的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下面的奴仆非常多，只要他说一声，哪一个不会尽心尽力地去伺候他的母亲呢？但是他作为一个孝子，能够从内心表达出对母亲的那种关爱，事必躬亲，结果“上行而下效”，整个社会兴起了孝悌之风，实现了天下大治。

所以领导者率先垂范，能够力行孝道，并进而提倡孝道，这才是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根本。

上面我们主要讲了如何孝敬父母，下面再讲一讲如何友爱兄弟。

“悌”的含义是“善事兄长”。在中国古人看来，兄弟姐妹，骨肉一体，是一个身体，谁也离不开谁，所以相互之间要友爱，要做到兄友弟恭，做兄长的要友爱帮助弟弟妹妹，而做弟弟妹妹的对兄长要恭敬，要听从。如果兄弟姐妹不和睦，就会让父母操心，这就是大不孝了。所以，一个能够善事父母、有孝心的人，也一定能够善待兄弟姐妹。

中国古人对于这个“悌”字讲得也非常多，确实也是身体力行能够做到，让“兄弟睦，孝在中”，兄弟之间能和睦相处，孝便自然体现其中了。《弟子规》上有几句话，用来处理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合适。第一句话是“财物轻，怨何生”，兄弟姐妹之间更重视骨肉之情、手足之情，而把财物看得淡一点，轻一点，这样怨恨又怎么会产生呢？“言语忍，忿自泯”，兄弟姐妹在相处的时候，言语互相忍让一下，少说一句，语气委婉一点，那么愤愤不平的心就自然泯灭了。

《朱子治家格言》上也有这样一句话，“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一家的兄弟姐妹在一起过日子，最忌讳的就是起争讼，把彼此送上法庭，打起了官司，即使官司赢了，但是因为你的心量太狭窄，连兄弟姐妹都不能

容纳，那么这一个家道也一定会衰落，所谓“讼则终凶”。

古人看到哪一家因为家产打起了官司，就能够判断出他们的家道一定会衰落，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家和万事兴”。当然，我们对这个“兄”，对这个“家”也要做正确的理解。中国古人把兄弟的友爱推而广之，在《礼记》中说，“十年以长，则以兄礼和之”，比我们长十岁以上的，十岁左右的，我们都要以对兄长的态度和礼节来和他和睦相处。中国人在竖的方面讲对父母的孝，而父母上面还有父母，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上一代和下一代，自始至终都是一体的，过去无始，未来无终；而从横的方面来讲兄弟之间的友悌，而又把这种友悌之心扩而广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来到我们身边的一起共同修学的朋友、同事，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那怎么能够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呢？

《论语》中指出：“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我们现在的年轻一代多数人都是独生子女，是家中的小公主、小皇帝，所有的人都要考虑他的感受，他的需要，想着为他服务，不自觉地就形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那么，当众多的小公主、小皇帝相处到一起的时候，如果不冲突、不吵架，那就不正常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孩子和人家相处一个星期以上，就出现了矛盾，出现了问题。不是自己不喜欢对方了，就是对方不喜欢自己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放下自己，放下“我的想法”、“我的利益”，而是自私自利的想法，都希望别人能够照顾到自己，所以没有做到“敬而无失，恭而有礼”。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君子能够做到事事恭敬别人，为人处世没有任何过失，处处考虑对方的感受、对方的需要，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走到哪里都是彬彬有礼，那么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自己的兄弟姐妹。

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大学生，从小也没有学习《弟子规》，结果到了大学，几个人同住在一间宿舍，不是他关门声大了，就是他晚上睡觉的时间太晚了，不注意别人休息了，也没有做到像《弟子规》上说的很多的要求，所以当人们不能够为对方着想，处处只想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就难免和

人发生冲突。所以我们学了《弟子规》，就要在生活中力行，拿《弟子规》处处来衡量自己，要求自己，而不是去要求别人。当然一个人能够走到哪里，都能处处想到对方的需要（那也是因为他在家里对于自己的兄长就能够恭敬，能够听从的原因）。

历史上有一则“诚感让田”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叫严凤的人，他对兄弟的友爱感动了他同乡的两个兄弟。故事中施佐和施佑是兄弟两个人，他们做官之后都回到家乡，但是这两个人因为田产的问题引起了纷争，而且互不相让，还有了怨仇，亲戚朋友都从中劝说，但是也都劝说无效。在他们同乡之中有一个叫严凤的人，素以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而著称。有一天，施佐见到了严凤，就把自己和哥哥争田产的事情告诉了严凤，严凤听了之后，他就皱眉头长叹道：“可惜我的兄长身体太弱，如果他能像你的哥哥那样强壮有力，可以尽把我的田产夺去，那我还有什么忧虑的呢？”严凤说到这里，想到自己的哥哥身体很瘦弱，不禁哭出声来。施佐看了，非常感叹，也非常感动，所以他就拉着严凤的手来到哥哥的家里，向哥哥道歉，说自己不应该和哥哥争田产。他的哥哥也非常地感动，从此以后，他们各就以田产相让。

这一件事就是告诉我们，严凤自己能够力行孝道、力行悌道，而且能够以真情实感感化自己同乡的人，正是他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对兄长的真挚的友悌之情溢于言表，所以才能够感动乡人，感动施佐、施佑两兄弟，让他们不再因为田产而纷争。

中国古人说，“观德于忍，观福于量”，看一个人有没有福气，就看他有多大的心量。所以我们看兄弟争讼，就能够判断出他们的家道要衰落不是偶然的。因为一个人，他的心量已经狭窄到连自己的兄弟姐妹都不能够宽容，同胞兄弟都要送上法庭，那么可见这一个人的心量狭窄到极处了。因为他心量很狭窄，所以他们的家道一定会衰落。古人对于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非常重视，在这样良好的伦理道德教育之下，人们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田产、一点点财产就会吵上法庭。

法昭禅师曾经写过一首诗，专门描写兄弟姐妹之间的深情厚谊。这首

诗这样写道，“同气连枝各自荣，些些言语莫伤情”。一家的兄弟姐妹就像一棵大树，从一个树根长出的不同枝杈，是“同气连枝”。等他们长大之后，各自有了发展，有了各自的事业，这个就叫“各自荣”。“些些言语莫伤情”，兄弟姐妹在相处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言语的不忍让而伤害了彼此之间的手足之情，骨肉之情，中国人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孔子教导弟子，首重德行，其次就是重视言语，然后才是政事，才是文学。由此可见，如何说话，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能够坚持自己的想法又不伤害别人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一种艺术。

“弟兄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争端”。弟兄姐妹之间相处，只要能够守住一个“忍”字，便相安无事。我们看一看这个“忍”，上面是一个刀刃的“刃”，下面是一个“心”字，这个字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忍呢？当我们的心上有一把刀刃来割，我们都能够处之泰然，不起怨恨之心，这叫“忍”。假如别人说一句不好听的话，说一句比较直接的话，都不能够忍受；别人稍微怠慢一点，稍微不礼貌一点，我们都不高兴，那么我们的忍辱功夫，就是一点都没有了。“弟兄同居忍便安”，对于陌生人的侮辱诽谤，尚且能够容忍，对于弟兄之间的言语，稍微直接一点，稍微过分一点，又怎么会忍让不了呢？“莫因毫末起争端”，不要因为一点点芝麻大的小事，就起了争端，起了争讼，把兄弟送上了法庭。

“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回为弟兄”；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就非常有感触，逢年过节的时候，兄弟姐妹好不容易碰到一起，会突然发现哥哥姐姐的头上多了几根白发，脸上多了几条皱纹，确实是“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我们还有多长时间能够相处在一起，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呢？所以人确实要懂得惜缘。中国古人有句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没有缘分的人是不可能相聚在一起的。那么既然有缘相处在一起，就要珍惜这一个来之不易的缘分，要互相帮助，互相呵护，像兄弟姐妹一样能够好好相处。

最后一句话“眼前生子又兄弟，留与儿孙做样看”；现在长大成家了，下面也有了孩子，而孩子之间也成为兄弟姐妹，如果上一代之间做到了兄

友弟恭，能够互相关心，互相帮助，那么下一代也就从我们身上学到了如何相处，所以要给儿孙做一个好的典范。

虽然传统文化已经有三四代少有人讲了，但是我们从我们的祖辈、父辈身上还可以看到兄友弟恭的榜样。像我的母亲，她在家里是老大，在旧社会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所以她早早地离开家，到外面去工作。但是她从来没有忘记照顾父母，照顾自己的两个弟弟，所以她自己有了好东西舍不得用，全是留给弟弟、弟媳用，让弟弟、弟媳也非常感动，现在她回老家见到弟弟、弟媳，他们都对她尊重有加，走到哪里都像一家人一样，特别受欢迎。上一代人能够这样友爱兄弟姐妹，也为我们下一代兄弟姐妹和睦相处树立了榜样，我们兄妹三人也是同甘共苦，这就是从上一辈那里学来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兄弟姐妹互相关爱的故事，确实也是非常多。像我们知道在唐朝，唐英公李勣虽然贵为仆射（仆射即唐朝的宰相），他在姐姐病重的时候，亲自为她烧火煮粥，以致不小心烧到了自己的胡须。姐姐看到后就劝他："你贵为仆射，下边有很多的奴仆、婢妾等等，他们都可以供你使唤，何必要亲自动手为我煮粥呢？"他听了之后怎么回答的呢？他听了之后回答说："我亲自为您煮粥，并不是因为没有下人可以供我使唤，而是想到姐姐年纪已经很大了，而我自己的年纪也很大了，渐渐衰老，我们的时日都是有限的。虽然想长久地为您煮粥，来尽我的一点心意，又能有多少次呢？"李勣虽然贵为仆射，还亲自为姐姐煮粥，都烧到自己的胡须。评论说："古称孝子爱日，若英公之奉姊亦可谓爱日者矣。"什么叫"爱日"呢？就是古代的孝子都珍惜时日，知道父母年老日衰，在世间不会太长久了，就特别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想方设法地去侍奉双亲。像唐英公李勣这样侍奉姐姐，也可以称得上是爱惜时日，因为他们年纪都很大了，年老力衰。古人的这些行谊就告诉我们，行善不能等，行孝不能等，行悌也不能够等，要趁着父母兄弟还都健在的时候，还有机会的时候，多给予关爱，这就是古人讲的"悌"很重要。

《孝经》上说，"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侍奉兄弟能够友悌，随顺

之心就可移于对待长辈，“顺”是随顺的意思。古人接着评论说：能尽孝道的，其心和；能修悌道的，其心顺。能孝敬父母的人，培养起一种心和的品质；能友爱兄弟的人，培养出一种随顺的品质。所以“和顺”这两个字就把孝悌的精神给说出来了，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中国古人是以礼治天下，以孝治天下。

如今仁爱不兴，或者说五伦关系紊乱，讲仁慈博爱也都没有效果，什么原因呢？像“雷锋精神”三月来四月就走了，我们给很多大学生提供一些资助，他们也没有感恩的话，也不写感恩的信，连一个表示都没有，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在国外对鳏寡孤独废疾者，老弱病残幼需要帮助的人，政府给予特别的优惠，有很多的福利待遇。但是这些人不仅没有感恩之心，反而还做出了很多假的证据，为的是获得政府更多的资助，那么这些现象的原因出在哪里呢？“孝悌也者，其仁之本与”，就把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给指出来了，仁爱不兴，都是由于不孝不悌。现在孝悌不讲求了，不修学了，这个世界才会大乱，所以要挽救世界，一定要从提倡孝道，提倡悌道来做起，这样才能消灾免难。

讲修福、修慧，什么是修福、修慧，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要行孝道，行悌道，然后又要给人家讲孝道，讲悌道。在《孝经》上也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古圣先王有至高的德行、最简要的道理，使上上下下都能够和睦相处，人们之间没有怨言。这个“至德要道”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孝、悌。孟子也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仁爱之心从哪里培养起呢？就是从“亲亲”，亲爱你的父母亲做起，把这种亲爱之心推而广之，来关爱百姓，关爱人民。然后又把这种关爱人民的爱心推而广之，扩大到万事万物之上，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所以“为人必先自孝悌始也”，这个就告诉我们要想宣扬仁慈博爱，让大家都有爱心，必须找到爱的原点，而这个爱的原点，就是孝悌。就像我们现在搞道德建设，要建设一个道德大厦，道德大厦的第五层、第六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雷锋精神。但是，如果我们的基础都没有打牢，对父母不够孝敬，对老师不够尊敬，对兄弟不能

够友爱帮助，那么这一个第五层、第六层也是空中楼阁。这句话实际上也指出了我们现在道德教育不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没有从孝悌这个基础做起。

《孝经》上也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一个人不爱他的父母亲，去爱别的人，这是和德行的要求相背离的；一个人不尊敬他的父母亲，去尊敬别的人，这也是和礼的本质相背离的。为什么是背离的呢？在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之前，我们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比如说我们的领导叫我们去吃饭，问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啊？有一个重要的客人要见，你不要回家吃晚饭了。”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兴高采烈，受宠若惊，跟着领导就去应酬了。但是当我们的母亲说：“你有没有时间啊？家里很久没有去超市买东西了，已经缺这个少那个了，我们下午一起去超市买东西吧。”结果我们怎么回答的呢？我们会说：“我哪里有时间啊？我要忙这个忙那个一大堆的事，你就和你的那些老朋友一起去买好了。”所以你看我们是用什么心在和人交往的呢？一个人连父母这么大的养育之恩，都不去报答，不能让父母欢心，那还有谁的恩德，值得念念不忘，想着去报答呢？所以我们没有形成以恩义、情义、道义的原则来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取而代之的就是以利害、以功利的原则为人处事，待人接物。这件事情对自己有利，就会全力以赴，这个人对自己有好处，就会对他很恭敬；但是当对方从利变成害的时候，没有帮助没有用的时候，就会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来。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孝”为什么是仁爱之心的根本，因为它培养了一个人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事原则。现在有很多的家长抱怨孩子不懂得孝敬父母，小公主、小皇帝的脾气很厉害，处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从来都不会想到父母。这些都是结果，请问原因在哪里呢？有一个幻灯片，它的题目叫《哪一个是我》：

那个一进门就喊“肚子饿了，饭怎么还没做好”的人，是儿女，
那个一进门，衣服都来不及换就下厨房烧菜的人，是父母；

那个一会儿说“粥烫了”，一会儿嫌“菜咸了”的人，是儿女，

那个哪怕就一点青菜、豆腐，也要精心烹饪，力争做出滋味的人，是父母；

那个整天抱怨作业多，实在太累了的人，是儿女，

那个累了一整天却毫无怨言，洗衣打扫卫生后再陪读的人，是父母；

那个动不动就开口要钱，得不到就生气的人，是儿女，

那个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却从不在教育投资上吝啬的人，是父母；

那个记不住家人的生日，可一到自己生日，就早早召集同学、朋友聚会的人，是儿女，

那个很少记自己的生日，却用心为家人准备生日礼物，准备饭菜的人，是父母；

那个早上赖床，还不停抱怨家人叫他早起的人，是儿女，

那个深夜入睡、黎明即起，准备早点的人，是父母；

那个受了一点儿委屈，回家苦水倒个不停，以求得同情和安抚的人，是儿女，

那个在外面就算受了再多气，回家后却强作欢笑的人，是父母；

那个有牢骚就发，有烦恼就怨，把家当作坏情绪“宣泄所”的人，是儿女，

那个把苦埋在心中，生怕让自己不良情绪影响家人的人，是父母；

那个总以学业、工作忙为托词，很少往家里打电话问候的人，是儿女，

那个在电话里嘘寒问暖、总为家人牵肠挂肚的人，是父母；

那个一开口就将家里的积蓄“借”走，然后舒舒服服住大房子的

人，是儿女，

那个劳累了一辈子，到老还住在破旧小屋里的人，是父母；

那个总羡慕人家多么有钱，自己家多么寒酸的人，是儿女，

那个退了休还不“安分”，起早摸黑挣钱的人，是父母；

那个宁愿把大量闲暇时间放在娱乐、和朋友聚会，却不愿回家看看的人，是儿女，

那个只要看到儿女，哪怕一会儿就神清气爽的人，是父母；

那个娶了媳妇忘了娘，嫁了老公忘了爹的人，是儿女，

那个为儿女操了一辈子心，老了还帮儿女带孩子的人，是父母；

那个总以自我为中心，从不把家人太当回事的人，是儿女，

那个从不把自己当回事，却总以子女为荣四处炫耀的人，是父母；

那个总喜欢把爱挂在嘴边，却很少付出行动的人，是儿女，

那个从不把爱说出口，却将爱播撒于生活中的每一块土壤中的人，是父母……

或许，只有等到儿女也成了父母时，只有等到父母慢慢变老时，

我们才会回忆起生活里这些点点滴滴

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爱……

看了这个幻灯片之后，就知道了，现在的孩子处处以我为中心，而且我们看了这个幻灯片会想，如果让我的儿女看一看这篇文章就好了。但是古人有句话说，“教儿教女，先教自己”，为什么孩子以自我为中心，小公主、小皇帝脾气很厉害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没有给他表演一个孝敬父母的榜样，让他去学习。

比如说春节的时候一家人吃饭围坐一起的有孩子，有孩子的父母，也有孩子的爷爷奶奶，我们做父母的夹起菜，首先把它放在了谁的碗里呢？我们带着父母儿女出去旅游，是选择了父母喜欢去的地方，还是选择了儿

女喜欢去的地方呢？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全家人都在考虑孩子的感受，全家人都在为儿女服务。《弟子规》上有一句话，“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无论是吃饭走路，都是长者在先，幼者在后。为什么是这样一个顺序呢？这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爷爷奶奶、父母长辈都忙了一天了，又是刷碗，又是洗衣，又是做饭，他们都还没有先上桌子，那我们做晚辈的，年龄最小，对家庭的贡献最少，我们有什么资格先动筷子呢？很多人说我们家就不兴这一套，我们家就是孩子先吃，那等孩子长大了，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需要他来照顾你，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对不起，你从来都没有教过我。”所以现在的孩子不懂得孝，确实是因为没有人教。

古代的时候到学校，老师第一个科目就是教导孩子如何孝敬父母，而且一家人，父母和祖父母也都生活在一起。现在学校不教孝道了，而基本上都是三口之家，父母带着儿女偶尔周六回去看望一下爷爷奶奶，还给爷爷奶奶留下了一大堆的碗碟要刷。那么，我们想一想孩子从哪里能够学到孝敬父母呢？

在一个学习《弟子规》的班上，有一些孩子学了之后，请他们上台来分享。其中有个孩子就说：“我学了《弟子规》之后，才知道为人要孝敬父母。”另一个孩子也走上台来这样说：“在没有学习《弟子规》之前，我每一天所想的就是如何去谋害父母。”我们听到这样的话，都觉得很惊讶，其实仔细想一想，也没有什么惊讶的，因为孩子被家长逼着去学英语、学奥数、学钢琴，自己学得很苦，而父母还体会不到孩子的心，逢人就讲我的孩子学了钢琴，奥数是全国第几名，好像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所以孩子体会不到父母的关爱，他还以为父母让自己学这些都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脸面，久而久之，就对父母产生了怨恨之心。

所以中国古人要靠老师来讲孝道，所以对老师也非常地尊重，尊师才能重道。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不以孝悌之心和人相处，就会以功利之心与人交往。有句话说“诸事不顺因不孝”，你所有的事情不顺利，归根结底是因为不懂得孝敬父母。很多人问，做事顺不顺利和孝不孝敬父

母有关系吗？刚才我们讲了儿女不孝，那是和我们不孝敬父母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待人接物，经常结交一些忘恩负义的、见利忘义的朋友，是不是也和我们不孝敬父母有关系呢？

古人有句话说，“以利交者，利尽而交疏”。我们彼此是以利益来交往的时候，可以做生意，这个时候有利益的往来，交情就很深厚，我们就是朋友在一起吃吃喝喝，但是一旦利益尽了，交情也就疏远了。“以势交者，势倾而交绝”，很多人做领导的时候有权势，别人来送礼，不送礼，条子就不批，字就不签，结果自己从领导位置上下来了，势力倾覆了，交情也就决裂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就会“门前冷落鞍马稀”。“以色交者，花落而爱渝”，男的喜欢女的美色，女的喜欢男的英俊，是以色相、喜悦来交往，结果久而久之，年纪大了脸上长了皱纹，爱也就终止了。最后，“以道交者，天荒而地老”。就是我们彼此是以道义、情义、恩义来交往，这个交往才经得起考验，才会天长地久。

现在很多人感叹交不到真心的朋友，都是以利害之心与人相处的人多。什么原因呢？“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以利害之心与人交往的，你看我们没有用恩义、情义、道义的心与人交往，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去关爱，反而外边的事显得很忙，都是在追名逐利。那么这样的人，也就结交不到真心的朋友，这就是我们《易经》上所讲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是我们古人所说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这是自然感应的道理。

所以在没有学习《弟子规》之前，自己也是深有感触。因为我们自己经常很吝啬，非常傲慢，还很苛刻，结果我发现，自己结交的朋友即使很有钱，他对我也很吝啬。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还在想，这个人这么有钱，为什么对我这么吝啬呢？你看不知道反省自己，就会怨天尤人，从别人那里寻找原因。结果我们自己非常傲慢，非常苛刻，别人约我们讲课，人家突然有事情了，要调一个时间，就觉得这样对我们太不尊重了，本来都约好了时间，现在我们把这个时间空出来了，他又要调整，明明我们有时间，也不给他调整，心里还很不高兴。我们做事的时候，就发现会有很多人给

我们设置障碍，做事也不是很顺利。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去反省自己，总去找别人的毛病。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呢，这个事明明可以办成，他为什么无缘无故又给我设置障碍呢？”你看不知道从自己身上反省的时候，就会变得怨天尤人。

在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学会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从此就变得比较慷慨。我们有的，别人需要，我们就送给别人，别人请我讲课，也不和人家讲条件了，只要人家有需要，我有时间，就去给别人讲课。后来我就发现，自己的处境变了，经常会受到别人无条件的帮助，别人对于我的照顾无微不至。而我再去办事的时候，也发现莫名其妙地顺利了，不像以前有事没事的给你挑毛病了，所以这些境况的转变，让我对传统文化更加生起信心，确实是“境随心转”。如果我们自己做事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障碍，一定是我们内心深处还有一些秘密的、不为人知的、不符合道德的东西，只要把这些东西找出来，剔除掉，再去做事就会发现很顺利。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孝敬父母，做事不顺利，“诸事不顺因不孝”。一个能够孝敬父母的孩子，他心中必定时时不忘父母，所以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为什么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呢？很多人都说，你们讲孝有什么用啊？某某高官也是一个孝子，但他还是同样贪污受贿、违法乱纪了。

《礼记》上有一则“乐正子春”的故事，子春在下堂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脚伤到了，几个月后，他的脚伤痊愈了，但是脸上还是闷闷不乐。他的弟子们就问：“老师，您的脚伤已经完全恢复了，为什么您还郁郁寡欢，面带忧愁呢？”子春就说：“我听曾子说过，父母生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完完整整的身子，我们要把这个身体完完整整地保养好，这才是一个孝子。所以一个孝子，每走一步路都不敢忘记父母；每说一句话也不敢忘记父母。每走一步路都不敢忘记父母，所以有河可过，有船可乘，就不会涉水过河；有光明大道，就不走邪僻的小路，不敢以父母给的身体去做危险的事；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父母，就不会口出恶言。我们不出恶言骂人，别人也不会以愤愤不平的言语来骂我们。这种不辱没自己的身心，

不让父母蒙羞，才是一真正的孝子。”从这里就知道一个真正的孝子确实做到了每走一步路，不敢忘记父母，每说一句话，不敢忘记父母，那他怎么敢去贪污受贿、违法乱纪呢？所以这就告诉了我们“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原因，因为按这样的标准行事的孝子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了。

《礼记》上讲，“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如果你的生活起居不庄重，人家会说你没有教养，像我们这一代人最怕的就是别人说我们没有教养，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不仅说了自己还说到了我们的父母，让我们的父母蒙羞，所以居处不庄，就不是孝道了。“事君不忠，非孝也”，侍奉君主不尽心尽力，这也不是孝敬，如果不忠心侍奉君主，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最后东窗事发，锒铛入狱，让父母蒙羞，确实是灾及于亲。“莅官不敬，非孝也”，做官没有恭敬心，也就是对自己的事业不恭敬，不尽心尽力，这也不是孝。朋友之间不讲究信义，人家也会骂你，会伤害到父母。“战阵无勇，非孝也”。这五者做不好，都会给父母蒙羞，甚至给父母带来灾难。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一个孝子确实能够做到面面俱到，在生活中会非常地谨慎。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句话，在《四书蒙益解·论语点睛补注》上也有一段注解，我们把这一段注解也学一学：他说“为仁，正是为人；不仁，便不可为人矣。作乱之本，由于好犯上；犯上之本，由于不孝悌”。“为仁”的“为”，是动词，求的意思。“君子求仁，君子行仁”，而学仁、求仁也都是要学做人。所以“不仁，便不可为人矣”，也就说一个人没有仁德之心，就不能称之为人。

“仁”在《说文解字》上解释为“从人从二”，是会意字，“言己与人相亲爱也”，这就是“仁”的含义。所以这个“仁”就是天地同根、万物一体，能够这样去对待他人，把他人和我视为一体的，没有了我和他人的区别，这才是真正的“为仁”，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佛教称为“佛菩萨”，儒家称为“圣贤人”。

“作乱之本，由于好犯上，犯上之本，由于不孝悌，不孝悌，由于甘

心为禽兽”。孝悌是教育的根本，人跟禽兽之所以不同，就是人要接受教育，如果不接受教育就堕落得和禽兽没有区别了。所以《孟子》上说，“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不懂得做人的道理，不能够行孝悌，那么人跟禽兽就没有两样了。“若不肯做衣冠禽兽，必孝悌以为人”，如果不想做禽兽，那就要学习做人，而学做人就要从孝悌开始学起。

下面说“为人，即仁义礼智自皆具足，故孝悌是仁义礼智之本。”仁义礼智，是什么呢？就是人道，做不到仁义礼智，做人的资格就没有了。儒家把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左传》上说，“人弃常，则妖兴”，也就是说人把五常大道都不讲了，如果人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结果就会出现五伦关系的紊乱，社会上的各种道德败坏的现象就出现了。

“盖孝悌，是良知良能，良知良能，是万事万物之本源也。”“孝悌”是人自性本有的性德，也称为良知良能，王阳明讲的“致良知”就是这个意思。“良知”，用俗话来说就是良心。比如人做了坏事，做了恶事，会感到良心不安，受到良心的谴责，说明这个人还有救，如果这个人做了恶事，做了坏事，心安理得，没有觉得良心不安，那么这个人就叫麻木不仁，就堕落得离禽兽不远了。“良知良能是万事万物之本源也”，人有良知、人有仁心，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

“论性则仁为孝悌之本，论修则孝悌为仁之本。天下大乱之原，自不孝不悌始。孝悌则仁慈兴而乱机息矣。”这个是从性修两个方面讲。从性德上来说，仁爱之心是万事万物的本源，它在和父母兄弟的关系上表现为孝和悌，对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上就表现为仁和忠，对朋友的关系上就表现为信，对夫妇的关系上就表现为夫义和妇德。所以从性上来说，仁是孝悌之本；而从修德上来说，“论修则孝悌为仁之本”。要培养一个人的仁爱之心，必须从培养人的孝悌之心开始。孝悌之心才是仁爱之心的原点。

“天下大乱之原，自不孝不悌始。孝悌，则仁慈兴而乱机息矣。”我们想要真正实现社会和谐，人心安定，一定要提倡孝道，提倡仁义礼智信。从哪里做起呢？不要要求别人，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很多人说，别人

都是什么什么样的，别人不讲信用，别人又不讲仁爱，我这样做是不是吃亏呢？别人不讲信用，别人贪得无厌，那是别人甘心堕落，我们如果向他们学习，我们也就随之堕落，所以他们是他们，我们要学做人。做到了仁义礼智信，做人才合格，才有资格。所以说我们要问一问自己，想不想有好的结果？我们将来到哪里？我们如果想自己有好的结果，那就要从自己修起，别人做不做与我们自己无关，而且我们自己身体力行了，也得到了好的结果，才会让别人对仁义礼智信生起信心。人家一看，你做仁义礼智信的事，生活得很好，事事顺利，身心安宁，“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那自己何不这样去做呢？这就是给社会大众做一个榜样。

“然则兴孝悌之道奈何？曰‘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悖。’不孝不悌之人而居上位，天下大乱所由生也；孝悌之人而居上位，天下大治所由生也’。”怎样才能兴起孝悌之道呢？就是在位的领导者能够力行孝悌之道，进而弘扬孝悌之道，社会才能兴起和谐之风。孝悌之人居于领导的位置，这个天下的大治才会有希望。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巧言”就是善于辞令，“令色”就是以容貌悦人。

在《论语讲要》上就讲到，人是由本性而来，《中庸》上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个性是人自然而然的、本有的东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必须要明了这个“性”。但是什么是“性”呢？很抽象，所以就讲要“修道”；但是这个“道”还是很难理解，所以就讲要“修德”；这个“德”说起来还是挺抽象，于是就给人讲“仁”；这个“仁”从“二人”，也就是人与人相处需要讲求厚道。而巧言令色之人，他只注重言辞的美善和外表的巧饰，所以很少有仁德之心。仁厚既少，与这样的人讲道德，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所以学习仁道的人，应该多从这句话来省思，自己是不是巧言令色之人。

“鲜矣仁”，“鲜”就是少的意思，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很少能够达到

仁的境界。孔子在讲到人的言语和容色时说："君子有九思：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他的颜色、容貌是温和的、恭敬的，言语是忠信的，做事要有诚敬之心、竭尽全力。

在《论语》中还记载着"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意思是从远处看君子感觉他非常庄重，等你走近他觉得他很温和，而听他的言语也是很严肃、很严厉的。

在《曲礼》上也说"俨若思，安定辞"，这个人的容貌给人的感觉是很庄重的，他说话是非常地平和、平稳，心平气和。又曰"礼不妄说人，不辞费"。从礼上来讲，凡是符合礼的行为，礼上就会要求人这样去做。"不妄说人"就是，不要随意地去谄媚、巴结、讨人喜欢。"妄"就是没有实际的，"不辞费"就是言语非常地简单。

《论语》上也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个"讷"就是看起来言语很迟钝，说的话也很少，但是句句中肯，都能够说到实处。

从这几句话来看，都是讲一个人的语色，都是诚于中而形于外。他内心有真诚、恭敬之心，所以表现出来的言语和容貌自然而然是如此的。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从言语上不要去学谄媚巴结，在容貌上要有恭敬，而不是装成一个美善的样子。

蒲益大师在《四书蒲益解》上解释："巧言，口为仁者之言也。令色，色取仁也。仁是心上功夫，若向言色处下手，则愈似而愈非。"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巧言"就是口里讲的是为仁者的言语，"令色"就是"色取仁也"，换句话说，他的容貌、言行都做得像一个仁人君子的样子，外表上装成这样。这是做作的，并非真实。所以孔子说"鲜矣仁"，就是很少能够达到"仁"这个境界。下面接着说"仁是心上功夫，若向言色处下手，则愈似而愈非"，也就是说"仁"是靠修行心地而得来的。所以我们前一段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欤"。

仁爱之心从哪里学起呢？就是从对父母的孝敬之心，和对兄弟的友悌之心来长养，所以孝悌之心是仁爱之心的原点。就是因为修仁是修这颗仁爱之心，如果一个人仅仅从语言和容貌处下手，反而会越装越装不

像。这就告诉我们，巧言令色的人是很难体会到“仁”这个境界的。

我们先看“巧言”。“巧言”就是古人所说的“好其言语，口为仁者之言”。“好其言语”就是将世间所说的好话都说尽，好话说尽就是愚弄人，目的无非是恭维别人、谄媚别人，但是其内容无实。“无实”意思很深刻，当然可以浅讲也可以深讲。从浅的层次上来讲，就是言语不诚实，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言语诚实，就应该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表里如一、内外一致。能够做到诚实不妄语，这也算得上是诚实。这是从浅处来讲。而“无实”从深处来讲，什么叫“无实”？什么样的人说的话才是真实的？就是我们在传统文化中经常讲的，如果一个人能够看到“诸法实相”，也就是了解到宇宙人生真相的人，他所说的话才是真实的，才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如果一个人没有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他所说出来的言语都不是真实的，就是巧言。所以这个“实”从哪里来呢？这就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了。

所以孔子想教导学生的，也就是希望人们怎么样去求实。那怎样求这个真实？就是此地所讲的“仁”。前面我们也说到，“仁”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为什么说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呢？比如植物，桃核里有桃仁，杏核里有杏仁，这个“仁”就是生机，它是活的，不是死的。如果是死的，就变成了“麻木不仁”了。所以我们说求真实，就是要求仁。那么这个“仁”是怎么求得的呢？换句话说，这个真实、诸法实相，怎么样修学才能够得到呢？圣人告诉我们要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做起。“格物、致知”也就是我们要格除物欲，这个“格物”有很多种解释，一个可以让人接受的解释就是要“格除物欲”。也就是说你在财色名利的诱惑面前，能够如如不动、把持住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个才叫“格物”，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格物有功夫了，才能达到“致知”，这个“致知”就是你有智慧了，你的心性没有蒙蔽了，那么你就能够判断是非、善恶、美丑，这个就是“致知”。

“诚意”、“正心”都是我们所说的心地上的功夫，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直心、深心。要从心地上下功夫，我们就需要离开巧言，所以凡是圣贤

人，都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要在这上面用功。像司马光先生讲他的修身从哪里入手呢？他就讲从“不妄语”开始入手，不说谎话骗人。后面还说，巧言不仅仅是我们说出的言语，“凡著书立说，不本之躬行心得者皆是”，也就是我们著书立说，但不是自己的躬行心得，那么这些也都属于“巧言”。那什么是“心得”呢？这句话的这两个字很重要。在后面有小注是这样写的：“心得者，悟入实证也。”也就是说所谓的心得，都是圣贤人经过修学后体悟到、亲证到、亲眼看到的境界，这个写出来的报告才是“心得”。

我们看古圣先贤他们几乎都是这样来做的，比如说我们读的“四书”。“四书”除了《论语》和《孟子》之外，还有《中庸》和《大学》。《中庸》是古圣先贤所体悟的、所觉悟的、所观察的宇宙人生的真理，它是真实的道理，所以这个是属于理论。而《大学》是把《中庸》中的理论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讲具体的方法。所以在儒家讲“知行合一”，这个理论是王阳明先生提出来的，他是从佛教中受到了启发。佛教中讲“解行相应”，重视“解”，也重视“行”。他把“解”换成了“知”，把“相应”换成了“合一”，提出了“知行合一”。这就是告诉我们，圣贤之学都是讲理论、讲实行，讲解行相应、讲知行合一。而这部《论语》，就是孔子把《中庸》的理论和《大学》的方法在生活中躬行实践、应用，所得出的一个心得报告。所以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圣贤人的心性和一般凡人的心性都是一样的，圣人和圣人的心性也更是相通的，所以他所体悟到的和古圣先贤所体悟到的道理是一，不是二。没有增加一点，也没有减少一点，所以他没有什么创新。这并不是他的谦虚之词。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通过学习古圣先贤的这些理论、方法，最后也达到了圣贤的境界。所以《论语》就是孔子根据古圣先贤的理论、方法去实践而得出的心得报告。《孟子》是孟子作为贤人，学习古圣先贤的道理后在生活中去应用实行，所作出的心得报告。

从前的读书人，读书志在圣贤，而我们现在人读书是志在赚钱，这个目的和古人就不一样了。我们看古代人做学问，都讲求信、解、行、证，也

就是说我们首先对古圣先贤的理论、方法要相信，因为圣贤人告诉我们要诚信、要不妄语，那么他自己当然也会诚信、也会不妄语，所以首先对他们要生起信心。然后理解他们所说的这些理论方法，在生活中去实行，最后自己也证得了同样的境界，这才是我们做学问要达到的目的。我们著书立说，如果确实是自己躬行心得的报告，那这个是可取的。但是如果著书立说的目的是为了谋取私利、为了自己出名，这个就离圣贤的学问越来越远了，这个也叫自欺欺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话，要反省自己，我们所学的、所讲的是不是躬行之后的心得？如果不是躬行之后的心得，那也属于巧言。

第二段，再看“令色”。“善其颜色，少能有仁也”，这个就是说外表上装出一副慈悲仁厚的面貌，只有外表，但是没有内容，内心却是另外一样，没有仁慈恻隐之心。“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就是外表装成谄媚巴结、迎合别人的一副面孔，但是其目的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样的人就是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如果一个人本性没有迷失，即使是对自己有利益的事，他也不会因此去谄媚巴结别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就是说一个君子人在利益和欲望获得现前的时候，他首先看它是不是符合道义，如果不符合道义，纵然有这个机会，也不肯去获得。小人则无所顾忌，他不顾道义，只顾自己的欲望，这就是小人。而“巧言令色”者，实际上就是麻木不仁的这一类人。他不知道通过巧言令色所获得的利益，实际上通过正常的手段和方法也同样能够获得，没有必要通过谄媚、巴结、伪装去获得。这个就是古人所说的“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

我们看了这一句话，就知道这一句话首先教导我们要能够时时反省自己，这一个巧言令色的人是不是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总是想装出一副仁慈的样子、装出一副很有修养的样子、装出一副很关心人的样子，但是心里并没有这种恻隐的实际，这很可能就成了巧言令色之人。另外我们著书立说，写了很多的东西，但不是自己的心得报告，也就是说自己并没

有亲证到那个境界，很可能都是道听途说，这样的人也属于巧言令色之人。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就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学君子、学圣贤之道，并不是用一个标准去衡量别人，说某人是巧言令色、某人是小人。如果我们这样学，孔子也会掉眼泪了。

“鲜矣仁”，这一个“仁”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仁字“从人从二”。看到这个字，就联想到儒家讲的三达德，“智、仁、勇”。也就是说圣贤人教给我们的修学纲领都非常简单，一点都不复杂。你抓住这个纲领，就很容易契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要想获得三达德，有“智、仁、勇”的品质，要从心地上来下功夫。在下面有几条小注。

“朱子曰：圣学不外求仁”，“圣学”就是指儒家的教学，儒家的教育宗旨就是在“求仁”。当然这个仁“从人从二”，说的是两个人相处之道，要推己及人。实际上这个与仁已差了一层，真正有仁爱之心的人，是视人如己，这两个人是一个人，把别人视作和我是一体的，这才叫“一体之仁”。那怎么样才能够把别人和自己视为是一体的呢？那就要从孝悌来做起。所以圣贤之教，宗旨是求仁，“行先孝悌”，也就是在实行上要以孝悌为基础。所以圣贤求仁从哪里学起呢？就是从孝敬父母、尊敬师长来学起。

“其贼之者，以巧言令色为甚”，“贼”就是贼害的意思，破坏仁道、破坏孝悌，障碍我们求仁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巧言令色。所以一个人不诚实，处处想欺骗别人，在做学问上就很难前进。这个就是讲“巧言令色”和“求仁”是很远的，相差甚远，而且是“贼害”求仁道的。后面还说“但务巧令以媚人者，必非诚实之士”，这个不仁之人心术不正，专门用巧言令色来谄媚巴结人、讨人喜欢，这样的人是假仁假义，不是真正的仁，所以一定不是诚实的人。

“故学，必先诚意正心也”，也就是说一定要从诚意、正心来学起，来提升自己的修行。所以修身前面的四个步骤，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个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问一问自己的存心。存心能够正，这个事情才会有好的结果；存心不正，这个结果也一定不好，这就叫

“因地不真，果招迂曲”。所以这一章主要告诉我们在言语上、容貌上应该保持真诚。

古人知道一个人花言巧语，致力于言语的好听，而装出伪善的面目，很少有仁德之心，所以古人对于言语也就不会过分地重视，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重视。我们现在选拔领导者，像西方选拔总统都要进行演讲，演讲时言语非常巧妙、非常能感染人，但这个人是不是有真才实德呢？很难从他的一两次演讲中就辨别出来。

在《群书治要·中论》上，有一段关于言语的话：“夫利口者，心足以见小数，言足以尽巧辞，给足以应切问，难足以断俗疑。然而好说不倦，谍谍如也。”“夫利口者”，这个利口就是能言善辩的人，他的心智足以看到、洞察到细小的环节；他的言辞非常巧妙、精于修饰；“给”就是敏言、伶牙俐齿，也足以应对急切的追问；他的反驳也足以让世俗人断定疑惑；但是他“好说不倦”，喜欢言谈，不知疲倦，喋喋不休。后面接着讲“夫类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暗不达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类族辨物”就是把事情按类来归纳推理，然后来分辨事物的人，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也就是说在世间，能够按类归纳推理来洞察分辨事物的人是很少的，而愚钝被蒙蔽、不通达的人是多数，那谁知道他说的是不是正确的呢？因为他的口才很好，甚至还很有名，学历也很高，演讲起来滔滔不绝，让人一看就感觉这个人很有才华，对他所说的话就会生起信心。但是他所说的话可能是违背大道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无实”，不是和事实真相相应的。“此其所以无用而不见废也，至贱而不见遗也”，这就是他之所以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却不被废弃，虽然很低贱但是不被遗弃的原因。

“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乱名改作，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者杀之。为其疑众惑民，而溃（溃原作浇）乱至道也。”古圣先王有一个法律，能言善辩、曲解法令的人，因为他们能够混乱礼法的名分，使它们失去了原意，还有行为邪僻却坚持不改的人，言语虚伪而能言善辩的人，对这样的人要处以死刑。像孔子刚出任鲁国的大司寇，没有几天就把“行僻而坚、言伪而辨”的少正卯给处死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少正卯的口才非

常好，致使孔子的很多弟子都被吸引去听讲。这些弟子跟随孔子学习已经很长时间了，但还是不能够辨别究竟哪一个是符合道的，就是因为他口才好、能言善辩。对于这样的人怎么办？只能把他给杀掉。因为他会使民众产生疑惑，而分不清孰是孰非。他讲的话都不符合道，但是又讲得非常好听、很迷惑人，所以就会使治道混乱，这就是巧言。他说的言语是无实的，不符合实际、不符合大道、不符合自然规律，也不符合人性，但是对于一般的世俗之人又分辨不出来。这样的人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只有学了圣贤之道的人才有能力分辨。正是因为“有言者不必有德”，能说会道的人不一定有实德，所以中国古人并不是非常重视一个人的言辞。

在《群书治要·汉书》上记载着一个故事：张释之和汉文帝一起出行，结果汉文帝登上了虎圈（就是饲养虎的地方），向上林苑的主管询问禽兽簿中的各种问题。结果他问了十来个问题，这个上林尉左顾右盼一个也回答不出来。这个时候，旁边一个官职很低的啬夫就代上林尉回答，结果汉文帝问什么问题他都能对答如流，不仅是有问必答，而且回答得非常流利，给皇帝一种这个啬夫不仅对禽兽簿的事项非常地了解，而且口才好、很有能力的感觉，文帝看了果然就很欢喜。这个时候文帝也忘记了孔子的提醒“巧言令色，鲜矣仁”，于是他就下诏要把这个啬夫从普通的啬夫提拔起来，做上林苑的上林令。

这个上林令的位置还在上林尉之上，张释之看到这种情况，就赶紧上来劝谏。他就问文帝：“您觉得这个绛侯周勃是什么样的人呢？”周勃是西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汉朝有名的功臣，文帝就回答：“那当然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了！”张释之就又问：“那您觉得东阳侯张相如是何人也？”这个张相如也是因为有战功才被封为侯，他在西汉143位功臣中名列第118位。文帝就回答说：“他当然也是长者了！”张释之就说：“您看，绛侯、东阳侯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但是这两个人在上书言事的时候，就说不出话来，就像口不能言。现在您越级提拔这个上林令，那不就是想让大家都效仿这个啬夫喋喋不休的口辩之才吗？秦国就是因为任

用了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刀笔之吏，而那些人争相以亟疾苛察相鄙视，他们做事很急迫，督察又非常地严苛，为的就是邀功请赏，而认为这才是尽职尽责。结果是徒有官文的形式，但是却没有实际的德行，也没有恻隐之心。秦始皇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才逐渐地衰败，到了秦二世的时候，天下就土崩瓦解了。现在陛下因为这个啬夫能言善辩，就越级提拔他，那我恐怕天下会随风响应，争相去求能言善辩而不求实德。而且下级顺从上级，这个速度就像响之应声、影之随行一样迅速，所以皇帝的一个政策、一个举动都不能够不审慎明察啊！”汉文帝听了之后，也非常地警醒，称赞他说得好，也就废除了要把啬夫这个人封为上林令的诏书。

这段历史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古人评判一个人才，并不是主要看他的话说得多么漂亮、是不是有口才，不像我们现在有的地方选拔领导者都要面试、还要口试，而口试的时候则主要看他的言辞、表达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的展览时也说了这样一句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际上这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去一味地空谈，去选拔那些巧言令色的人。很多人不多说话，但是埋头苦干，这些人才是非常值得珍惜的。

在《群书治要·傅子》上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德行而不重视人的言辞，“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饰辩”，在上面的领导者如果喜欢人们都修养德行，那么下边的人一定会随之响应，把修身作为是最重要的。如果上面的领导者喜欢空谈、喜欢巧言令色，那么下边的人也一定会在言辞上极尽修饰。

“修行则仁义兴焉，饰辩则大伪起焉，此必然之征也”，如果人们都是重视修养德行，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兴起仁义之风，如果大家都是想着去修饰自己的言辞，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去学演讲、学口才，这个就会怎么样呢？自己没有实际的德行，而学了很多的演讲之术，整个社会就兴起虚伪、伪诈的风气，这是必然的道理。

“德者，难成而难见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悦者也”，这句话说得非常好。美德是很难修成的，也很难显现，古人说“十年寒窗，一举成名”，

十年苦读圣贤书，然后有了修身的基础才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来治国平天下。所以古人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就是因为古代读的书都是圣贤之书，三日不读书，私心就生起来了，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就会面目可憎。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古人十年寒窗，一举成名，是苦读圣贤书，修身有了基础。所以美德很难修成，也很难显现，但是空论却容易撰写，也容易讨人喜欢。特别是很善于察言观色的人，看领导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说出一句话讨得领导喜欢，就被加以重用，如果这样，整个社会就会兴起诡诈之风。

“先王知言之易，而悦之者众，故不尚焉”，就是说古圣先王都知道美言好语多数人都爱听，我们也知道人都有一个习气，就是喜欢听别人赞叹，而不喜欢听别人批评。《弟子规》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喜欢听赞叹的言语，就会有很多谄媚巴结的人来到你面前；如果你喜欢听劝谏的言语，别人看到你有过失就直言相劝，那么敢于犯颜直谏的人就来到你的身边了。

一般的人没有学过圣贤教诲，都是喜欢别人赞叹自己、表扬自己，而不喜欢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而别人投其所好，会专门说你爱听的话。古圣先王知道好听的言语容易说，而且多数人爱听，所以不崇尚。

“不尊贤尚德、举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悦取人，则天下之弃德饰辩，以要其上者不鲜矣”，如果不崇尚美德，倡导善行来进行教化，而是因为使自己高兴的一句话就选拔人，则天下抛弃道德、粉饰巧辩，并以此要求君主封赏的人便不会少见了。“何者”，为什么呢？“德难为而言易饰也”，就是因为提高道德修养很难，但是巧言伪饰却很容易。“夫贪荣重利，常人之性也”，一般的人都会贪求荣誉、看重财利，这是一般人的通性。

“上之所好，荣利存焉”，而上级领导、君主的喜好，其中就有荣誉和财利。“故上好之，下必趣之。趣之不已，虽死不避也”，这句话把上行下效的道理给我们讲得非常好。那么君主的喜好中有荣誉、有财利，所以对于君主喜好的，百姓就会屈从，而且不停地去追求，即使是死也不避开。

“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贪荣而重利，故贵其所尚，而抑其

所贪。”古圣先贤治理国家，都是顺着人的性情来做的。人性之中有“好善尚德之性”，也就是说“人之初，性本善”，都有孝悌之心，都喜欢美好的德行、喜欢善行，即使自己做不了，别人做了善行他也会觉得好。但是同时从情上来说，又“贪荣而重利”，也就是喜欢荣誉、喜欢利益，因此古代圣王治理天下，是怎么做的呢？“贵其所尚，而抑其所贪”，所以他就会重视人们所崇尚的、所看重的，同时又抑制人们所贪求的。“贵其所尚，故礼让兴。抑其所贪，故廉耻存”。因为君主重视人们所崇尚的、看重的，所以就要引导人们向善好德，结果礼让之风就兴起了，又要抑制人们贪荣重利的性情，要抑制他所贪求的，所以这个廉耻之心才能够保全。

“夫荣利者可抑，而不可绝也，故明为显名高位、丰禄厚赏，使天下希而慕之。”也就是说追求荣誉、财利是可以予以抑制的，但是却不能够断绝，因为这是人的性情所在。那么怎么样顺着人的性情来引导、治理国家呢？于是就公开地定出“显名高位，丰禄厚赏”，让天下人追求并且羡慕。那么怎样既让人们追求高名厚利，又能够抑制人的贪心、保持廉耻之心呢？后面就是重点了。“不修行崇德，则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禄，不获此赏，此先王立教之大体也。”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高尚的德行，没有很好的修养，他就不会获得好的名声。就像我们现在要评道德模范，如果一个人没有孝亲的品行，没有诚信的品德，那他就评不上道德模范。那么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去追求德行，因为你不修行自己的德行，你就不能获得这样的名声。“不居此位，不食此禄”，如果你没有居在官位上，你就拿不到这样的俸禄，也获不到这样的赏赐。那么你怎样才能居于这个位置上呢？还是要修行崇德。你没有居在这个位置上，拿不到这样的俸禄。这个就是古圣先王树立教化的大纲。

“夫德修之难，不积其实，不成其名。”修养人的德行，是很艰难的过程，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德行，不积累实际的德行，就成就不了好的名声。“夫言撰之易，合所悦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悦无常，故君子不贵也。”言论的撰述却很容易，符合君主所喜欢的就可重用，但是因为他言论修得不够恒久，而君主所喜欢的也时常有改变，所以君子并不看重它。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到古人教导人们，是顺着人的性情来引导的。人们都喜欢好的名声、高名厚利，那就让人们修养真实的德行才能够获取；如果没有真才实德，就不给他高名厚利。这样的引导就会使人们纷纷去追求德行，而不是看重财富。像我们经常所讲的，我们现在坐飞机，经常听到有一句话，“请头等舱和公务舱的乘客先行登机”，这会给人们怎样的引导呢？会引导人们看重财富、看重金钱，因为谁有钱，谁就事事占先，谁就有特权。但是在中国古人那里可不是这样，而是谁有德行，谁才有特权。

《韩诗外传治要》上讲，古代的圣王治理天下，都有“命民”，就是被皇帝君主下诏书给封立爵位的平民百姓。那这个平民为什么被封为“命民”呢？就是因为他孝敬父母、做事尽职尽责、讲诚信，就是因为他有德行。那被封为“命民”之后，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呢？他就可以坐着两匹马拉着的，装饰得很好的车子出外去游行。一般的人即使你很有钱，但是你没有这样的德行，不是“命民”，也不能够乘坐这样的车子。这样的制度就让那些人们都愿意去追求德行，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财富，把财富看得很重。

这个告诉我们，“仁”是一颗仁心，既然是仁心，就要从心地上用功，而不是在形式上去追求。像我们学传统文化，学《弟子规》也是如此。九十度的鞠躬礼注重的是从内心表达出的对对方的恭敬，如果我们一味地行九十度的鞠躬礼，但是内心没有对人的尊敬，那这个礼也是徒有形式，而没有了内容。

在《傅子》中的下一段接着说，“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也就是告诉我们修仁、修德要从心地上去下功夫。“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也就是说你想使社会和谐、天下太平，首先要从正心开始，正自己的心，如果自己都不能够做到诚意、正心、修身，那怎么样去正别人呢？

古人知道言语很容易巧媚地巴结人，所以都强调领导者要“远离佞人”。一个领导者亲近君子、远离小人，他就能够兴盛；相反，他亲近小

人、远离君子，他就会逐渐地衰亡。那什么样的人是奸臣？什么样的人是小人呢？

在《韩非子》上就说："凡奸臣者，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是奸臣、小人，都是愿意顺着君主的心思去做，以取得君主的宠幸和信任。因此领导者、君主认为好的事，他一定会跟着去赞叹它；相反，领导者、君主认为是不好的事、所憎恶的事，他一定会跟着去诋毁它，这就是奸臣、小人最大的特点。

我们知道了做人不能够巧言令色，这些故事不仅仅是让我们学会如何去观察别人，更重要的也是让我们反省自己，我们每说一句话、每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才实德，我们还说违心的话，这就是"巧言"了。

古人对于臣子的行为也分为几个方面。比如在《说苑》上就给我们指出"六正六邪"，观察臣子有六种邪曲不正的行为，其中有四种都是和人的言语有关系。其中有一种叫"谀臣"，什么叫"谀臣"呢？就是君主所说的话，他都说好，君主所做的他都认可，还暗地里去探求这个君主的喜好，并把他喜好的东西进奉给君主，以愉悦君主的耳目，一味苟且地投合君主的意思，以求荣身，与君主寻欢作乐，也不顾忌他的后患，这样的人就是阿谀奉承的臣子。还讲到"奸臣"，"奸臣"就是外表上谨小慎微、巧言令色，内心险诈邪僻，还嫉贤妒能，对于他要举荐的人就极力宣扬他的美德、隐匿他的过恶，对于他要罢退的人就宣扬他的过恶、隐匿他的美德，使君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能施行，这样的人就被称为"奸臣"。

还有"谗臣"，"谗臣"的特点就是他的智慧足以文过饰非；他的口才足以到处游说；在宫内可以离间君主的骨肉亲情；在宫外因为他的妒忌也使朝廷混乱；这样的人称为"谗臣"。最后"亡国之臣"，也是和臣子的言语有关，就是用邪曲不正的道理谄媚、巴结君主，陷君主于不义，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蒙蔽君主的视线，使君主黑白混淆、是非不分，使君主的恶名传布于国内，闻于四邻，这样的臣子就被称为"亡国之臣"。在《说

苑》里讲到这六种邪曲不正的臣子，其中有四种都是和言语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论述，也要反省对照自己是不是有这些行为，能够这样去学习，我们才能够避免巧言令色，而从心地上去求仁，这才是实学。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孔子认为曾子这个人能够通达孝道，所以就传授他学业，为他作了《孝经》，我们知道《孝经》这本书是孔子专门传给曾子的，曾子后来死在了鲁国。

曾子以"孝"著称，所以孔子才把"至德要道"传给曾子。曾子之所以能够传承老师的"至德要道"，也是因为他非常有恭敬之心。在《孝经》中记载，孔子要给曾子讲话的时候，问他一个问题："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

曾子一听到老师问这个问题，就赶紧恭恭敬敬地站起身来，说："参不敏，何足以知之？""我不够聪敏，不通达，怎么能够知道这样的'至德要道'呢？"所以从"避席曰"就能知道曾子他对老师是非常恭敬的。正是因为他有这样恭敬的态度，所以才能够传得大道。

曾子在孔子的弟子中，也是以孝著称。他关于孝，有两个很著名的典故。

孔子说："参也鲁。"说明这个曾参是很鲁钝的，不是很聪颖，从其中的一个典故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有一次，曾子和父亲在一起除草。应该把草给锄掉，他却把苗给锄掉了。曾子的父亲看了就非常生气，在盛怒之下拿着锄头就打了曾子一下。曾子毫不回避，被父亲这一打就昏倒在地。他醒来之后，也怕父亲因为一时激怒下了重手而后悔，所以为了让父亲

安心，就“援琴而歌”，弹着琴，又唱着歌，意思是说，您看我什么事都没有，您不用担心。曾子的这个行为被孔子听到了，孔子就很生气，对弟子们说：“你们去告诉曾参，他从此以后不是我的学生了，不要再来见我了。”

曾子虽然知道老师很生气，不想见自己了，甚至不要自己当学生了，但是他依然很恭敬，还是要去向老师请教，说：“我这样做认为已经是尽到孝道了，但是为什么老师还不要我呢？”孔子就说：“如果你的父亲在盛怒之下，一不小心下手太重把你打死了，那就会让别人都议论他，说这个父亲连自己的儿子都给打死了，真是太没有仁爱之心了。所以你这样的做法并不是真正地为父亲好，而是会陷父于不义之中。”于是就告诉曾子以后如果再遇到类似的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呢？应该是“大杖则走，小杖则受”，如果父亲拿的是小柳条这样的小东西，不是很重，那你就可以接受；如果拿的是锄头这样很重的东西，那你就赶紧溜走。曾子从这里才知道孝并不是一味地顺从父母，一味地顺从父母还可能会陷父母于不义。

另一个关于曾子孝的故事，我们从中也会深深地受到启发。曾子的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曾子出去了，恰好有朋友来找他。因为古代的交通不是很便利，这个朋友可能是走了很远的路。曾子的母亲也很有仁慈之心，为了让曾子知道家里有人来了，在情急之下，就把自己的一个手指咬破了。曾子是一个孝子，心中时时刻刻惦记着母亲，所以母亲一咬手指，他的心就痛了一下，他马上就知道，母亲在家里有事了。中国人有句话说“母子连心”，他就赶紧往家赶，赶到家里才知道，母亲还安好，只是家里来了客人，母亲想让他知道。

我们现在人，听了这样的故事觉得很难理解、不可思议，那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心目中，并不是常常惦记着父母，而是心里常常惦记着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想着吃喝玩乐啊，想怎么赚更多的钱、获得更高的官位，所以自己的心不够清静，就体会不到父母的需要了。有人说我们现在的人过着一种“忙”、“盲”、“茫”的人生。第一个“忙”字是一个“忄”旁加一个“亡”字，看到这个字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

“忙”，就是我们的心已经不觉悟了，已经不敏锐了，已经观察不到父母、家人、周围人的需要了，于是就变成了第二个“盲”，看不见的“盲”。第三个“茫”就是“茫然”的“茫”。现在很多人事业很成功，而事业成功的标志就是赚了很多的钱。但是我们中国古人很有智慧，即使创造一个字都是教育的符号。所以这个“钱”字在古人那里怎么写的呢？左边是一个“金”，右边是“戈、戈”，“金戈戈”叫钱，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用金不理智，把金看得太重的话，很可能会为了那一个金，拿着两把刀，两把枪去互相残杀。所以你看很多人赚了很多钱，但是在赚钱的过程中，忘了父母的恩义，朋友的道义，夫妻的情义，最后就穷得只剩下钱了。事业获得成功，赚了很多钱，但是发现自己的周围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最后他就茫然了。他说：“我这么样地努力，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为什么大家都不理解我呢？还落得了一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结果。”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被五欲六尘、自私自利所蒙蔽而看不到父母、家人真正的需要，所以虽然很努力也会有结果，但是不一定会有好结果。越努力，越南辕北辙，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远了。从孝子曾参的身上，我们也应该反省自己，我们父母家人的需要是不是用心地去体会了？

我们再看一看这一句话，里边有一些字还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吾”，《说文》上解：“我，自称也。”“吾”就是我的自称。

“日”，古人说：“日行一周天为一昼夜，故一昼夜即名日。”也就是说“日”是指一昼一夜。《周髀算经注》：“从旦至旦为一日也。”从早晨到早晨这样算起来是一日。

“三”在《说文解字》上说：“三，数名。”三是一个数字的名，阮元《数说》说“古人简策繁重”，就是古人书都是写在竹简和木板之上，所以显得很繁重。“以口耳相传者多”，传授这些道业都是口口相传，老师口讲，学生耳记。“以目相传者少”，通过书本阅读而获得道业的情况比较少。“且以数记言，使百官万民易诵易记”，既然是口口相传，以数来记载人的言论，就使百官和百姓都容易记诵也容易传达。

“《论语》以数记文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乐、三戒、三畏、三

愆、三疾、三变、四教、绝四、四恶、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类”，古代经常通过数字来记载别人所传达的意思。在《论语》上，这样的情况就有很多，像我们刚才所举的这些都是出自《论语》。这都是通过口口传授，为了便于人们记忆，才采取这种方法，这就是“三”。

“省”，郑玄的注解上这样说：“思察己之所行也。”反思，观察自己的行为，这就叫“省”，这个注解实际上是出自于《尔雅》。在《说文解字》上对“省”字这样解释：“视也。”它和郑玄所注的意思是相近的，所以“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省察，反省，反观”的意思。

下面讲“为人谋而不忠乎？”“为”是助词，“谋”，在《左传·襄公四年》上说“咨难为谋”，就是向别人咨询很难的事情叫做“谋”；“鲁语，咨事为谋”，在鲁国有一个通常的用语，向别人咨询事情就叫“谋”；《毛诗·四牡》传“咨事之难易为谋”，就是向别人咨询事情的难易，这个就叫“谋”。

“为人谋而不忠乎”，“忠”，《荀子·礼论》注“忠，诚也”。这个“诚”和“实”是一样的意思，“诚心以为人谋，谓之忠”，就是你诚心诚意地为别人去谋事叫忠。在五伦关系中君臣之间，“臣事君以忠”，所以“臣之于君，有诚心事之，亦谓之忠。”是说臣子侍奉君主，被领导者侍奉领导者能够诚心诚意，把领导交给自己的事情办好，这就是尽到了忠心。所以在朱熹的《论语集注》上，把“忠”解释为“尽己之谓忠”，就是竭尽全力地把交给自己的任务完成好，这就是尽到了忠心。

“与朋友交”，“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所谓的“同门”就是指“同处一师门也”，就是一个老师的弟子，像同门的师兄弟就叫“朋”。“同志曰友”，郑玄注：“两人不共学而所志同也。”虽然两个人没有共同在一起学习，但他们是志同道合，他们的志向是一致的，这样的人就称为友，这是讲朋友。

“信”，《说文解字》把“信”解释为：“诚也，从人从言，会意。”“信”就是“诚”，说话诚实不欺。“信”，从人从言，所以“人言为信”，是一个会意字，这个会意字告诉我们，人所讲的话必须守信用，否

则就不是人所说的话了。

下面一句话讲“传不习乎？”。

“传”有两重含义，是一个双关语。一重含义就是老师传给弟子的，传给我的，我是不是在生活中去力行了，这个“习”就是“练习”的“习”。在注解上说：“习，鸟数飞也。”什么意思呢？鸟在学习飞翔的时候，要屡次地拍着翅膀飞，就是要练习。也就是说，老师传授给我的东西，我是不是在生活中去力行了，这是其中的一层含义。另一层含义，我去传授生徒的时候，我传授学生弟子的时候，我是不是把老师教给我的东西温习了，是不是有所心得，然后才去教授学生。这个就是郭翼雪在《履斋笔记》中说的：“曾子三省，皆指施于人者言。传亦我传乎人。传而不习，则是以未著躬试之事而误后学，其害尤甚于不忠不信也。”郭翼雪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曾子所提出的“吾日三省吾身”这三件事都是对施于人而言，这个传是指我传给别人，传给弟子，如果我传授弟子，但是自己事先没有温习，事先没有力行，就是以没有自己亲身试过的事情来误导后学，它的害处比不忠不信更加厉害。

在焦循的《论语补疏》上也说：“己所素习，用以传人，方不妄传，致误学者。所谓‘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焦循在《论语补疏》也是这个意思，他说：“我自己平时所力行的，所温习的用来传授给别人，这样才不导致妄传而贻误后学，这就是所谓的‘温故而知新’，温故而知新的人才可以当别人的老师。”所以“传”有双重意思，第一就是老师传授给我的，我是不是在生活中力行了；第二，我传授给学生的我是不是先有温习，先有心得，然后才去传授生徒，这个就是“传不习乎”。

这三句话的意思，就是曾子每天以三件事来省察自身，第一就是省察自己为人办事是否尽心尽力；第二就是省察自己与朋友相交往是否言而有信；第三就是受老师的传授是不是在生活中力行了，自己传授生徒是不是先自己温习了，做到了忠信传习？这三事都能做得不错了才能安心地睡觉，所以这三句就是讲的曾子为学的功夫。

曾子是一个很好学的人，虽然他很鲁钝，但是他坚持好学，最后也

很有成就。在《中庸》上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曾子是把这一句话好好地力行在生活之中了。虽然很鲁钝，但是还是因为传承了孔子的道业而被称为"宗圣"。

第一句话"为人谋而不忠乎"，这个"为人谋"从广义上说就是做事，也就是服务于大众，这件事情天天都要做。很多人说："也没有人找我去替他办什么事啊。"其实，凡是我们在生活中只要与人相交往，我们就要对别人委托的事尽心尽力。比如说我们在一天当中，无论是从事哪一个职业，都有分内的事，就像我们做老师的，我们是不是尽心尽力地把课上好了，把学生教好了？还是为了拿一点钟点费，稀里糊涂地备了一些课，把学生糊弄一下就得了？那我们是一个公务员，每一天来到办公室，对于自己应尽的本分、应负责的工作是否尽心尽力地加以完成了？如果我们是一个领导者，我们就要想自己是不是起到了"君、亲、师"的作用？既领导下属，又能做他们的亲人关心他们，还能当他们的老师、告诉他们做人的道理？如果我们是一个领导者，同时担负了"君、亲、师"的责任，属下才会对我们心悦诚服，做事也会非常用心。即使我们是一个店员，我们是不是按时上下班，是不是为老板、为顾客尽心尽力地服务，让他们对我们的服务态度很满意？纵然自己没有什么工作，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我们从早到晚是不是把家事做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对家庭中的每一个人是不是尽心尽力地照顾到了？这都是"为人谋"。只有那些不和人接触的人才不需要为人谋，不需要尽心尽力。所以只要有两个人以上共同住在一起，就要"我为他谋"，也就是说要为他服务、为他着想。

第二句话是讲"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这个是讲信用。与朋友相交往，更广义地说，就是和我们平辈的、平等地位的人相交往，我们是不是做到了"言出必行"？孔子说："一个人如果言而无信，就像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大车"就是牛车，"小车"就是马车，"輗"和"軏"，用我们现在的话比喻就是车子的发动机，是车子最关键的环节。一个人如果言而无信，就像车子没有发动机一样，在社会上寸步难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的话别人怀疑，我们做的事别人也怀疑，确实就会在社会上寸步难

行了。

与朋友交都能够做到言而有信，那么与家人交，与父母相交往呢？更要做到言而有信。可是我们现在人，有很多颠倒之处，和外人、领导，和老板、同事相交往的时候，都能够做到言而有信，很守信用；但是对父母说的话、对兄弟姐妹说的话都可以不守信用、不负责任，过两天就忘了，好像没有那一回事了，这个都是颠倒。

“有信”其实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这才是真正地做到了言而有信。所以要达到这一个境界，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没有见到“诸法实相”，没有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你把所见到的虚幻的相认为是真理，就去说，这样很难做到言而有信了。这告诉我们要怎样做呢？要求道，要明心见性，你所见到的才是真实的，你所说的也才不会是妄语。

第三句话讲“传不习乎”，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它是一个双关语。要检点老师教给我的，我有没有做到？还有我教给别人的，自己首先做到了没有？首先温习了没有？如果我教授别人，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到，怎么能够教导别人呢？

这三句话，实际上是教导我们三桩事情：第一，“好学近乎智”，无论是求学、还是求道，都必须好学、喜学、愿意学习，这样才能成就。我们看凡是历史上有成就的人物都不是老师逼出来的，都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都是自主自愿地去学习，不用老师逼，他自己就废寝忘食地用功，这样的人才能成就。曾子就给我们做出“好学近乎智”的榜样。

《群书治要》的《曾子治要·修身篇》就给我们讲了什么叫好学：“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就是君子人能够“攻其恶”，责备自己的不良行为、自己的过恶；“求其过”，求自己的过失而不是去看别人的过失；“强其所不能”，自己还不会做和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要加强，要勉励去做得尽善尽美；“去私欲”，还要克除自己的私欲；“从事于义”，做事情都要依照义的标准来做。古人告诉我们义的标准就是《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我们凡事，

无论是起心动念，还是言语行为，都能够符合这三个标准，才叫“从事于义”，这样做才可以称得上“学”。

“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避，易者弗从，唯义所在。”这一句话讲君子要珍惜时日来学习，像古代的人学习都是非常珍惜时间，废寝忘食、挑灯夜战，“头悬梁，锥刺股”，这样地发奋读书，才能够有所成就。“及时以行”，而且要适时地把所学的付诸行动，在生活中去落实。难做的不回避，容易做的也不盲从，只考虑是不是符合道义。“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以殁其身，亦可谓守业矣。”就是说白天攻治学业，到晚上就自我反省检查，一直到老死，一辈子都这样坚持，这才可谓坚守学业啊。这句话是曾子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我们汇报，我们看他自己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他自己确实是这样去做的，否则他也不会有这样好的教诲。

后面还有一段话也是表现出曾子的好学。“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学了之后，还担心自己学得不够广博，还担心并不真正地理解其中的意思，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这样做。“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已经知道了、理解了，又担忧自己不能付诸行动。这个“行”和上面的“习”还是有一点区分，这个“患其不习也”应该是“温习”的意思。他的知识已经很广博了，又担心自己不能够时时地温习。下边这个“行”，就是在生活中去实行。既能在生活中实行，又担心在行动上做不到谦让，“患其不能以让也”，所以君子之学只是把这五个方面做到就可以了。

孔子也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夫子附近一定有忠信的人，但是他们都没有他好学，所以孔子成为圣人。他是怎么成为圣人的呢？是靠好学而成就的。我们讲“好学近乎知”，“好学”和“知”是接近了，因为知是我们本性中所自有的，通过学习可以达到接近知。

我们在生活中学习不能靠别人逼迫，必须自己知道学习的意义。学

要学圣贤书，要学作圣人。所以学什么最重要呢？学不是我们学知识、学技能，重要的是能够学圣贤教诲，也就是要读“四书五经”。中国古代的皇帝都很好学，我们现在人也很好学，但是学的内容和古人不一样。皇帝要学习的时候，一定是请一个对经典（包括儒释道的经典）很通达的人，给他讲解一段，他带着群臣一起来学习。像在清朝康乾盛世的时候，皇帝都会礼请儒释道三家的大德，把儒家、道家、佛家的教诲讲给自己，他带着文武百官来一起学习。所以全国上下思想高度一致，自私自利的心也就没有生起。但是慈禧太后当政的时候，她每一天也去听讲课，儒释道三家的大德每一天在讲，结果听到大德们所讲的都像是在批评自己，最后她就把宫廷讲经的传统废弃了。结果这一废弃不要紧，“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三日不读圣贤书，都面目全非了。人不学圣贤书，自私自利的习气和欲望就会生起来，结果就导致了清朝政府的急剧腐败，最后才被外族所侵。这个并不是因为讲诵传统文化的原因，而恰恰是因为废弃了传统文化的原因。凡是在历史上稍有成就的皇帝，他们都尊重历史，都熟读圣贤书，以史为鉴，所以我们学才能够“近乎知知”，才能学成圣贤。

很多人学习有障碍，成不了圣贤，这个障碍是什么呢？在《大学》上有一句话，说“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大道必须以忠信的心、诚敬的心来学习，才能够获得。如果自己很傲慢，还看老师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这个骄慢之心一生起来就学不到东西了。所以古人说，一个学生如果观老师的过失，这个人一定不会学有成就。因为有一句话说：“你的眼里全都是菩萨，说明你也是菩萨；你的眼里全是圣贤，说明你也是圣贤；如果你的眼里全都是凡夫俗子，说明你自己也是一个凡夫俗子。”这就叫“境缘无好丑，好丑在于心”。所以古人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那么“千分诚敬，就得千分的利益”，我们没有诚敬，我们就获得不了任何的利益。即使这个人是个凡人，你把他当成圣贤来看待，你从他身上所得到的就是从圣贤那里得到的利益；如果这个人是圣贤人，你把他当成凡夫俗子来看待，即使孔子在你面前，对你也没有帮助。

所以为什么我们同在一个学校学习，同在一个地方修学，有的人修学提升很快，而有的人却没有提高，什么原因呢？就在于我们的心不同，我们的态度不一样。所以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个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忠信。忠信是学习的要点，也是传授生徒的要点。比如《大学》上说"忠信以得之"，《论语》也说"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在《论语·述而》上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些都是讲忠信的态度对于我们求学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学成，有的人却学无所成，主要是态度不一样。

第二就是"力行近乎仁"，这就告诉我们，学不仅是学知识、学道理，还要在生活中去落实，去身体力行。所以《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如果我们仅是学了知识，学了道理，但是在生活中没有去力行就不会体会到这种学习的喜悦。像我们看《论语》，颜回被孔子称为好学的，好学的结果是什么呢？"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的物质条件很简单，吃饭没有饭碗，喝水没有杯子，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都觉得他太艰苦了，都忍受不了，但是颜回却"乐在其中"，颜回乐在何处呢？我们一般人都体会不到颜回乐在何处，还对他妄加批判。因为我们自己从来没有达到过那个境界。就像圣贤人，他是站在二十层楼，我们是站在两层楼，我们体会不到、看不到圣贤的境界，我们还要把他从二十层楼拉回到两层楼，说："你所看到的就是我看到的境界。"颜回乐在道中，他学道并且能够把老夫子的教诲在生活中力行，所以感觉到非常喜悦。

"悦"和"乐"是不一样的，"悦"是从内心里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出的一种喜悦。古人也说"禅悦为食"，坐禅的人有这种体会，他能够体会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喜悦，而这种喜悦不是靠外在的条件获得的。我们现在的人说的"乐"都是靠外在的刺激获得的一时的感官享受。比如说我们去打高尔夫球，和朋友聚一次餐，去唱卡拉OK，还有打打牌什么的，在世间人看来这非常乐。但是一旦外在的条件没有了，你就会觉得很空虚，乐完之后还是空虚的感受。所以这种乐是靠

刺激得来的，一旦刺激的条件没有了，乐就失去了。

而学道的人、坐禅的人得到的喜悦，不需要外在的条件，而是从内心源源不断地涌出来的，一个人学道能够体会到这种喜悦，他几乎就不会再往后退了，因为世间的快乐和这种喜悦难以相提并论。这就告诉我们学了要去力行，你才能够有喜悦。所以我们要提倡“学儒”，而不是搞“儒学”，“学儒”和“儒学”是怎么区分的呢？在《中庸》上有一段话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些全都具备就叫学儒，如果把“笃行之”去掉了，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但是没有在生活中去身体力行，只是把儒家的学问作为写文章的资料、作为评职称的资本、作为讲课的素材，只是为了获得世间的名誉。比如说现在有的博士生（包括我自己以前），写儒家方面的论文，拿这个论文可以获得博士学位，可以评上教授，评上博导，但是和我们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关，没有在生活中去力行孔子的教诲，结果就导致我们没有从中受益，连《弟子规》最基本的要求都不能做到，连如何与人相处、交往都不知道，不知道起码的礼，所以走到哪里处处受到障碍。《论语》中讲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们不仅没有体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人产生了矛盾、产生了冲突，甚至坐飞机的时候和旁边的人都会起对立的心，生怕别人太胖了把我们的座子占多了。我们哪里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受呢？所以我们所学的和我们生活毫不相关，甚至还有很多“学儒”的人经常处于烦恼和痛苦之中。

学儒，首先要把五伦关系维护好。“父子有亲”，我们作父母的是不是尽到了教育儿女的责任？做儿女的是否尽心尽力地孝敬父母了？“君臣有义”，作领导的是不是仁爱关心下属了？而作下属的是不是竭尽全力地完成了领导交给我们的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夫妇有别”，做妻子的、做丈夫的是不是各自尽了本分？做丈夫的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做妻子的能够以美好的德行起到相夫教子的作用？“兄友弟恭”，作兄长的是不是能友爱帮助弟弟妹妹？作弟弟妹妹的是不是对兄长很恭敬？“朋友有信”，与朋友相交往的时候是不是做到了言出必行、诚实守信？我们从

这五伦关系中去反省自己，自己学得怎么样呢？这五伦关系中有哪一伦我们处理得很好、令人满意了呢？如果哪一伦都没有处理好，我们学儒是不是白学了呢？所以我们不要把“学儒”变成“儒学”。

历史上有一个典故，白居易在做杭州太守的时候，他去向鸟窠禅师请教，问佛教最重要的道理是什么？鸟窠禅师就回答了一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也是饱读诗书之人，对儒家的经典很通达，他就觉得这一句话太简单了，因此就说：“三岁小孩都知道！”就是你讲的这些道理，包括《论语》上所讲的这些道理，都是非常浅显易懂的道理，三岁小孩甚至都学过，也能说得出来。鸟窠禅师也看出白居易有些傲慢，所以就回了一句：“八十老翁做不得。”意思是说三岁孩童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八十岁的老翁还不见得把它落实在生活之中。所以“儒学”也被称为“实学”，它是实实在在的学问，不是一味地谈玄说妙，所以“力行才能够近乎仁”，才能够把仁爱之心给引发出来。像我们每一天在讲习，每一天在劝自己，每一天在学《论语》，我们自己就朝着圣贤的方向去努力，所以我们逐渐地达到了仁，都是潜移默化地，不知不觉地。

古人说“读书贵在变化气质”，为什么要读圣贤书？就是要变化自己的气质，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当然，转变的过程也是日积月累的过程，不是像上上根那样“一闻千悟”。曾子在这里给我们示现的也是一个渐学而成贤的过程，因为他自己是很鲁钝的。当然，这个鲁钝相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说已经是上根人了，就像神秀大师一样，他也是属于上根人，他说：“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就像曾子在这里所用的功夫一样，我每一天都要反省自己，有了过失就要给它拂拭掉，不要让心惹上尘埃，被污染了，这是上根人用功的方法。慧能大师是上上根人，他不这样用功，他是一闻千悟，听五祖给他讲《金刚经》，没有听到完，他就能够开悟，他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说我们这个心是一个妄心，它是前念灭后念生，速度特别快，让我们误以为有一个心，其实本来没有这个东西，那怎么能惹得上尘埃呢？但是对一般人讲这个道理也是不能够契入，所以我们要向曾子学习，要“时时勤拂拭”，每一天反省自己的过

失，这是我们学的第二个道理“力行近乎仁”。

第三个道理就是“知耻近乎勇”，为什么要反省呢？反省就是能够知道自己的过失，进而改正自己的过失，这就叫“知耻近乎勇”。勇就是要勇于改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我们都不是生而知之，不是生下来就是圣贤人，哪个人会不犯错误呢，既然犯了错误，那已经是过去式了，也没有必要在这上面纠缠，只要后面能够改过就可以了，不要在一个地方跌倒两次，“不贰过”，这就是成圣成贤的道路。所以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有过失，并改正自己的过失，没有什么善是比这个善更大的了，所以说“善莫大焉”。特别是那些以前做了恶的人，现在能够改过，大家一看都生起信心了，说你看这个人以前是黑社会的老大，那个人以前都是骄奢淫逸，一提起他来就知道他习气特别重，坏毛病特别多，结果他都能够学习传统文化，力行《弟子规》，改过自新，那我们也一定能够改，因为“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自己不要自卑，也不要不自信，不自爱。“人皆可以为尧舜”，为什么我不能呢？

《孟子》说：“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既然舜能够做到，我们通过努力学习也能够做到。这就是《弟子规》上所说的“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首先我们看一下里面的几个字。“导”在通行本中都写作道路的“道”，它的音也念（dǎo），意思是什么呢？马融注解“道，谓为之政教也”；包咸注比较简单，“导，治也”，也就是治理的意思。“千乘之国”，“乘”就是兵车的意思。在古代能够出千辆兵车的国家就是大国了，所以“千乘之国”就是一个大国。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治理一个大国的纲领，有下面具体说出的五条。

“敬事”的“敬”，《说文解字》上的注解是“肃也”，严肃的“肃”；在《释名·释言语》中，“敬”解释为“警也，横自肃警也”；在包咸的注解

中说“为国者举事必敬慎”，“敬慎”就和这里的“肃警”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敬”可以解释为“敬慎、谨慎”。“信”，《说文解字》解释为：“诚也，从人从言，会意。”它是人言为信，是一个会意字，就是诚信的意思。“节用而爱人”，“节”引申为节俭的意思，在《贾子·道术》上有一句话解释这个字，“费弗过适，谓之节”，我们的费用不超过适宜的范围就叫节。“用”就是指财用。“爱人”的“人”其实就是民的意思，它是为了避免和下面的“使民以时”相重复，所以用的是“人”字。

“使民以时”，也就是中国古人运用老百姓的劳力，要进行公共事务的建设，筑城、防守、防御盗贼、用兵等等，都要在农闲的时间，不要妨害农时。特别是在春秋的时候，“兵争之祸亟，日事征调，多违农时，尤治国所宜戒也”。在春秋的时候，兵事很多，每一天都征调兵力，很多都会违背农时，这是治国特别应该警戒的。

这五条纲领可以说是治国的五条基本纲领。虽然说是治理大国的纲领，但是治理一个小的国家、治理一个企业单位、治理一个公司行号，乃至于治理一个家庭，它的道理原则都是适用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哦！这个是讲治大国之道，我们学了没有用。”其实每一个人学了都有利益。我们下面把这几句话一句话一句话地看一下。

“道千乘之国”，治理一个大国是如此，治理一个小国也是如此，这一个道理原则不会改变，所以，这个是讲治理大国的五条纲领。第一条纲领叫“敬事”，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尽忠、尽职、负责”的意思，这也让我们想起了在佛教的寺院中的第一个建筑物天王殿，天王殿供奉四尊天王，第一尊天王叫持国天王，持国天王教导我们“负责、尽职”。这个“持”就是“主持”，“国”是“国家”。如果我们主持一个公司，是总经理、董事长；主持一个国家，就是总统、总理。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好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有一份责任、工作、本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负责尽职地把自己的本分做好，这个社会一定和谐，国家一定能够治理好。所以持国天王手里拿着一把琵琶，琵琶有表法的含义，告诉我们做事要取中道，无过无不及，就像琵琶的弦，如果调得

太松，就会弹不出美妙的声音，如果调得太紧就崩裂了，只有调得适中，这个美妙的声音才出现了。所以儒家讲“中庸”，佛教讲“中道”，都是教我们做事无过无不及，才能够负责尽职地把本分做好。

这也告诉我们佛教的塑像并不是神明，让你去顶礼膜拜，求升官、求发财的，而是传达教育的含义，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教学方式。我们很遗憾看到现在很多地方把佛教变成了宗教，每一天在寺院里搞经忏佛事，为死人服务。更有甚者把宗教变成了迷信，有很多的人带着很多钱，去各大寺院去供养、布施，回来之后仍然违法乱纪，最后被抓起来了，还埋怨说：“佛菩萨都不灵，没有保佑我。”这并不是佛菩萨不灵，而是我们把教育——佛陀的教育变成了宗教，甚至还变成了迷信，没有依教奉行当然不是佛陀的真正弟子。所以佛教是教育，但是我们却把它误解了。持国天王代表负责尽职，用我们古人所说的话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就是“夙夜在公”。

我们看魏征等人编辑《群书治要》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敬事的榜样。他受到唐太宗的命令编辑一部书来供唐太宗施政作参考，他接受命令之后，他们就从一万四千多部的古籍之中精挑细选选出了65部，又从这65部之中精挑细选，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髓都概括出来。最终用了短短50万字的篇幅，50卷的书，65种，就把唐朝以前经史子的精华概括出来了。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从哪里开始呢？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传统文化读历史就要从读《群书治要》开始，因为它是精华中的精华，用力少而得到的效果很好。这本书呈现给唐太宗之后，唐太宗每一天手不释卷地阅读，他就说：“使我遇到事情不迷惑，能够考察借鉴古代的经验，这都是得益于这一部书。使我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卿等力也。全都是你们的功劳。”所以我们看如果魏征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像我们现在的个别学者一样，接受了国家的一个课题，目的就是拿到这一笔奖金，然后稀里糊涂地完成了一部著作，拿着它去交差，反正把钱领来，可以花就行了，但是对于自己的著作并不是很认真负责，所写出的东西，不一定是符合道的，也不一定是对治国平天下有帮助的，这就不是一种“敬事”的态度

了。

“敬事”后边讲的是“信”，就是讲与民要诚信。关于信，古人强调得很多，像《弟子规》上说“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凡是我们说话都要认真负责任，不能够故意说欺骗别人的话。当然有的时候，人做不到诚信并不是因为故意要去说欺骗别人的话，是因为什么呢？“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是因为我们当时没有认真地思考条件成不成熟，就很轻易地答应了别人。结果答应了别人之后，才发现这件事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或者时间不够，或者精力不足，不能够很好地完成，这样就很难实现诺言，也就失信于人了。特别是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喝酒，喝酒喝到高兴的时候，就得意忘形，一拍桌子，说：“这一件事就交给我办了。”结果就这么轻易地承诺，第二天早晨酒一醒才发现原来这件事不是那么好做。如果不做吧，答应了人家，如果去做吧，可能又违反了很多国家的法律制度，这就是进退两难。

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来说，讲求信用也是至关重要的，《群书治要·孙卿子》上就有一段话，讲了为什么必须讲诚信。它说：“齐桓、晋文、楚庄、吴阖庐、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他故焉，信也。”像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勾践，他们都身处僻陋，就是偏僻狭小之地的国君，但是后来能够威震天下，使那些中原诸国都感到受到威胁，这并不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因为什么强大起来的呢？就是因为他们讲信用。“是所谓信立而霸也”，这就是所说的，建立了信用，就会称霸于诸侯。

“不务张其义，济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不务张其义”，就是不致力于伸张他的道义；“济其信”，“济”就是“成”的意思，成就他的诚信；“唯利之求”就是唯利是图；在内不顾一切地、不顾后果地来欺诈人民追求小利，对外不顾一切地欺诈和他结盟的国家，追求大利，这个“与”就是与他结交的国家。“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在内不好好地治理自己已经拥有的，而常常想侵占别人所有的。

“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得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这就是说如果这样做的话，他的臣子和百姓就没有不以欺骗之心来对待君主的，君主欺骗臣民，臣民也欺骗君主，这是上下分崩离析。

“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亡”，这样一来敌国就会轻视他，和他结交的国家也会怀疑他，权术阴谋日渐猖獗，以至国家不可避免地出现危机以至灭亡。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就是他们不遵行礼、义、诚、信，而是专门靠玩弄权术阴谋来治国。这个话就告诉我们对于领导者来说，统治一个国家的人他们能够与民诚信是最重要的。这个“信”字中国古人也是非常地强调，所以说“信立而霸也”。

下面重点讲一讲“节用”，我们中国有很多关于节用的名言，“成由勤俭败由奢”，“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呢？第一代创业的人往往都是白手起家，兢兢业业，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下了事业，奠定了基础。到了第二代条件好了，但是他还能够耳闻目睹父辈创业的艰难，还知道克勤克俭使事业发展壮大，但是到了第三代，一出生就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不仅没有体会到祖辈父辈创业的艰难，不知道克勤克俭，还学会了铺张浪费，骄奢淫逸。这样久而久之，就把祖辈父辈辛辛苦苦所打下的基业给败坏光了。所以我们观察历史，凡是能够承传三代以上的家族，都是要有严格的家规、家教、家训。《曾国藩家书》中就这样教导子弟：“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人败离不开一个逸字，讨人厌离不开一个骄字。”一个国家、家族、政党、企业、单位的破败都是因为里边的每一个人过上了过分奢侈、过分浪费的生活，以至于入不敷出。

《群书治要·汉书》上记载：“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自周成王、周康王的盛世以来，“成康盛世刑措四十年而不用”，刑罚搁置了四十年都没有用，“囹圄空虚”，监狱里都没有犯人，他达到了这样的治理。从那个时候到当时的汉代，将近有一千年了，想使国家得到治理的人很多很多，哪一个当领导的不希望使国家得到治理、社会和谐呢？但是这个太平盛世却没有再出现，这是什

么原因呢？下面给我们回答了，“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就是因为我们废弃了治国的常理、常法，这个法度是古人所讲的礼法，而且是恒常不变的礼法，就是我们所说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不再讲仁义礼智信了，不再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了，也不再讲礼义廉耻了，也不再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了。把这些都舍弃了，而凭着自己的私心、自己的喜好来治理国家，奢侈盛行而仁义被废弃了。因为人的私欲生起来了，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必然会过上奢侈浪费的生活。而一旦一个人奢侈浪费了，他就不惜盘剥人民的血汗，也不可能对百姓有仁爱之心。所以“奢侈行而仁义废”，这就是国家不能够再回复到太平盛世的重要原因。

我们再看在《群书治要》中有一段，讲的是当时魏文侯请教李克，李克也称为李悝，请教他什么呢？就问他刑罚的根源是什么？刑罚是怎么产生的？李克回答说：“刑罚的根源产生于人们邪曲不正的，还有放纵奢侈的行为”，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凡是奸邪之心都是因为人们饥寒交迫才产生的，而过分放纵安逸的人都是把心思耗费在文饰之上，耗费在追求奢侈品之上。

“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有的老百姓饥寒交迫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在这个时候还能不作奸犯科，不做邪曲不正的事情，这是很少有的。而另一方面“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男女都装饰得很精致，并且以此来互相攀比，看谁的用度更奢华、更浪费，如果这样的话，人们不骄奢淫逸也是很难办到的。所以如果上面的领导者不禁止“奇技淫巧”，什么是“奇技淫巧”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智能手机这些东西都是“奇技淫巧”，人们追求奢侈品，你越是追求就越有人加大生产来满足你的欲望，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国贫民侈”，国家越来越贫穷，而人民却越来越奢侈，“国贫民侈，则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而为邪也”。如果这个国家贫穷，但是人民又奢侈浪费，那贫穷的人为了也过上好的生活，就一定会去做奸邪之事。富裕的人也一定会放纵自己的欲望，骄奢淫逸，这不就等于驱使人民去

做邪曲不正的事吗？当人们被驱使上了邪路，再用法律来惩罚他们，这就是等于给人民设置陷阱。所以刑罚的兴起是有根源的，如果君主不从根本上来堵塞而只是在枝节小事上进行督促，这是伤国之道。我们从这一段话中就可以看到，李悝在魏国变法，他是一个法家的代表人物，但是在阐述刑罚产生根源的时候，他深刻地指出，实际上是人们邪曲不正、放荡奢侈的行为才是刑罚产生的根源。所以如果我们过着很奢侈的生活，也促使人们追求奢侈生活的话，就等于驱赶着人们走上邪路。一旦走上邪路，欲望打开，自己都控制不了，然后我们再拿法律来制裁他们，这不就是给人们设置陷阱吗？

明智的君主，知道刑罚产生的根本，不是从枝节上去治理。康熙皇帝颁布了《圣谕十六条》来教导百姓，其中有一条就和我们讲的“节用”有关系。这一条的题目是“尚节俭以惜财用”，就讲到“开其源尤当节其流”，就是我们不仅要知道去生产，聚集财富，还要知道节省、节俭，这样的话财才“不可胜用也”，财富才用也用不完。

《礼记》上有这样一句话，“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孔子谓：‘礼，与其奢也，宁俭。’”意思是如果这个国家奢侈之风盛行，就要教导人们崇尚节俭，示之以俭；如果这个国家太简朴了，就要示之以礼，就要让它懂得礼；也就是说也不要过分地节俭，要符合礼的要求，特别是当客人、外宾来访的时候，我们平时自己可以很节俭，但是招待客人的时候还是要符合礼的规定，这才不失礼。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礼与其搞得太奢华浪费，宁愿节俭。这些都告诉我们节俭是礼的根本，我们现在的国家奢侈之风盛行，人们竞相比着穿名牌，坐高档轿车，住豪华别墅，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坐的是宝马香车。在这种奢侈风气盛行的情况之下，习总书记上任之后，就提出了“八项规定”，这就是示之以俭的表率，这就是从自己身体力行给大家做出一个节俭的榜样，来引导社会不要去尽情地攀比。

“暴殄天物，则必招天谴。好蠹民财，则必招民怨。纵欲败度，殃祸立至”。如果对于自然界所生产的这些物品、物产不是很节俭而是过分地

耗费，结果一定会有灾祸，“殃祸立至”。我们在明代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例子，明代有一个人叫张牧之，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对国家有功勋的人，拥有的资产不计其数，他过着豪华骄纵生活，就是连王侯都比不上。他的婢女都穿着锦衣绣服，奴仆也穿着绮罗，妻妾穿着用度就更加奢华了：拿绫罗绸缎来缠脚；拿帛来做抹布，丝毫都不觉得可惜。他们家有一个聚景园，春天牡丹花一开，用各种奇异的景观构成了一个五亩大的棚子，用彩丝做绳，聚集了姬妾一百余人来歌舞饮酒，还取名为“百花同春会”，每唱一曲歌就赠给绢两匹。有一个客人看了之后就劝告他说：“过去寇莱公身为宰相，让歌姬陪酒，给绫一匹，赏给她绫一匹，有识之士就讥讽他奢侈，为他作了一首诗说：‘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哪知织女机窗下？几度投梭始得成。’有人唱一首歌就赠给她一束绫，被赠的这个人还觉得赠的太轻了，谁知道这一匹绫是织女在织窗下，拨动了多少次梭子才把它织成的。寇莱公听了这首诗之后就很后悔。而明公您爵位还不及寇公，用度不应该太过分了。”结果张牧之听了之后就大笑，他说：“莱公是个穷酸汉，他哪里能和我比呀！”你看他傲慢得根本就不听，到了冬天的时候，他就“剪彩绸为花”，用彩色的绸子剪成花挂在树枝上，旧了之后就把它换下来换成新的，每年的彩绸费用就不可胜计。这样没过几年，张牧之就死去了，而家里又被清算，妻妾都穿破鞋，向人要一尺一寸的布丝儿人家都不给她，这就是“暴殄天物”，最后得到灾殃。所以这个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在历史上有很多。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蔡京在执掌国政的时候，他的饮食用度都非常奢侈，他用人乳喂猪，用芝麻喂鹅鸭，用绿豆喂牛羊。还常用珍珠八宝煎汤做菜，煮沸过几次之后就把它扔掉，另换新的。每一次宴请客人一盘菜就值中等人家一家之产，你看多么奢侈！蔡京还嫌不够美味，他还不满足，觉得没有什么可吃的。结果上行而下效，他的一个家人叫翟谦，士大夫们都称他为云峰先生，也是浪费无度，与蔡京差不多。有一次他在年底宴请朝臣，客人约有五百多人，厨师进上汤来，有一个客人就随便说了一句：“鸭舌做汤既鲜美又补养。”结果翟谦看了看左右，微微示意了一下，

他的下人马上就心领神会了。过了没多久就为每人端上来一碗鸭舌汤，每碗里都有三只鸭舌，客人看了之后都惊叹不止。和翟谦关系比较好的人就戏言说："这还不够，能再添一些吗？"翟谦回答说："既然有心请客，还怕大肚汉吗？"于是就派人快快添上，每人又添了一碗鸭舌汤。这个时候一些有良心、有善心、有同情心的客人就不忍心吃了，就放下了筷子。估计翟谦这一次请客，因为客人随便的一句话，就杀了3000多只生灵。后来蔡京被贬斥流放，翟谦的家产也被充公。金人骚扰汴京之后，翟谦到了贫无立锥之地的地步，最后沿街乞讨，饿死在街头上。

中国古人知道奢侈既对自身不好，给自己招来灾祸，也对国家不好。所以凡是英明的领导者、皇帝都是率先垂范来力行节俭。

宋仁宗有一次对自己身边的近臣说："昨夜因为夜不能寐，睡不着，突然感到饥肠辘辘，非常想吃烧羊肉。"近臣就说："皇帝您既然想吃，为什么不传旨要一个烧羊肉呢？"你看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要一只烧羊肉算得了什么呢？为什么还要强忍着不吃不要呢？宋仁宗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怕我一旦传旨索要烧羊肉，恐怕从此以后就会成为惯例，即使不是每天都要吃烧羊肉，那时常也会有烧羊肉准备好。此例一开就不知道有多少羊被宰杀啊。"所以仁宗说"岂可不忍此一夕之饥，而启日后无穷之杀哉。"我怎么能够不忍受这一晚上的饥饿，而去开启日后无穷无尽的杀戮啊！所以你看皇帝贵为天子，他要烧羊肉，要几只羊都很容易，但是他就是怕这个先例一开，很多人会投其所好，那就不知道要宰杀多少只羊了。宋仁宗平时在私下休闲的时候，常常是穿着那种洗了又洗的衣服，他的帷帐、被子都没有加纹绣，只是用那种一般的布帛。还有一次有人向宋仁宗呈献了蛤蜊28枚，这是一种非常稀有的壳类海产品，而且这个东西很贵，每一枚价值一千。皇上怎么说的呢？他说："我这一下筷子就要花费28千钱，这怎么能够忍受啊？我是不堪忍受啊！这不是我能够忍受的呀！"所以宋仁宗他称为"仁宗"，确实是名副其实。他的仁爱之心不仅仅推及万民，甚至推及动物身上了。这就是古人说的万物和我是一体的。

孟子说："君子远庖厨，所以全吾恻隐之心也。"大意是说，君子都远离厨房，因为厨房里杀鸡、宰羊，经常有这些血淋淋的情景，人经常看到这样杀动物的情景，自己的同情心、恻隐之心就会慢慢地淡了，就会习以为常了。所以要远离这些杀戮的场合，为的是保全自己的恻隐之心。宋仁宗虽然看不到，也没有下厨房看到这些动物被杀戮的情景，但是他都能够想到，能够仁爱动物，这确实是古人所说的"以万物为一体"，把这种仁爱之心推及到百姓身上，百姓怎么会不被感化呢？所以我们看一看古代的皇帝确实是自己身体力行，为了不开启奢侈浪费之风，就自己忍着不去吃这些美味，我们从这里也看到了宋仁宗做事敬慎的态度。自己是皇帝，一个动作、一个旨意不知道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所以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非常地敬慎。

历史上有很多这种节俭的故事，比如司马光。司马光在提及自己的父亲的时候这样说，先父曾经做郡幕的判官，凡是家里有宾客来的时候也会设酒款待，但是他的酒都是有节制的，或者是三巡，或者是五巡，最多也不超过七巡。而这个酒全都不是自己家酿造的，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家里的水果也就是梨子、栗子、枣子、柿子这些很平常的东西；所吃的食物也就是干肉、肉酱、菜羹（就是蔬菜）这些非常简单的食物；所用的器皿也都是用瓷器和漆器做成的。因为当时的士大夫都崇尚节俭，所以他父亲这种简朴的作风，也没有人非议。但是到了司马光的时代奢侈之风就盛行了，所以他就感叹地说，现在的士大夫家就不是这样了，喝酒一定是喝用特别的方法酿制的酒，果品都是从远方运来的珍贵奇味，吃的食物也都是各种各样特别丰富，器皿都很精致，摆满案头，不这样做就不敢去请客。常常是在请客前的几天就要为此准备，然后才敢去发邀请函，如果不是准备得这么丰盛的话，就怕旁人会诽谤、会嘲笑，以为这家人太吝啬了、太穷了。所以到了司马光的时代，不随着当时奢靡浪费的风气的人就很少了。但是司马光就受到他父亲的感化，甚至做得比他父亲更加地节俭。史书上记载了司马光在乡下的时候，聚集学生讲学，师生聚会的时候，饭菜很简单，都不饮酒。他甚至比自己的父亲做得更好，父亲饮酒有

节制，而他都不饮酒了。

司马光按学生的学习成绩排出先后，然后给他们讲解孝悌忠信的道理，娓娓不倦，学生没有不感化的。有几个老乡献上了普通的饭菜，也来请求司马光讲学。司马光不以饭菜的好坏为异，为他们讲解《大学》中的章节，听讲的人都很高兴。司马光每次出门老百姓总是旁立，敬如神明。后来司马光奉诏到朝廷做官，卫士见了司马光，都举手加额以表示恭敬。老百姓都拦在道上欢呼说："司马公做宰相，我们才能过好日子。"天子任命司马光做了宰相，经过青州那地方，村民数千围群，踊跃庆贺。当时辽国听说司马光做了宰相，就纷纷地告诫说："中国以司马光为宰相，不可于此时侵犯宋朝边界。"在司马光过世的时候，皇帝为他"减膳、撤乐，辍朝三日"以示纪念，三天没有上朝。为了纪念他、哀悼他，京城的民众都罢事哭泣，就像祭奠父母一样祭奠他。四面八方来了几万人参加葬礼，把纸箔、香箔、纸钱都买光了，这种情况还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人有德行、爱民、节俭，老百姓对他的回报也是非常丰厚。

我们知道现在搞市场经济，有很多人先富起来，但是先富起来没有学礼，不知道用钱去救济百姓，而把钱用于奢侈浪费上面。特别是中国人一到国外，LV的箱包都是不止一个两个的买。所以看了这个节用，我们确实也觉得现在的人应该好好学如何节俭。士大夫、当领导的人如果能够节俭，也会起到上行下效、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所以说虽然奢侈之风很盛行，但是只要领导者带头力行节俭，这个风气仍然是可以改过来的。

在历史上，杨绾做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他为官清廉，自己非常节俭。他被封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的命令下达之日，郭子仪正要宴客，听到了这件事，马上把座钟的声乐就减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的随从本来很多，当天就减少了；中丞崔宽的房屋建造得非常豪华奢侈，结果马上就把它给拆毁了。所以你看这个感应之速是"影之随行、响之应声"一样。所以想去除奢侈之风也并不是积重难返之事，只要领导者能够坚持节俭。这是我们讲的节用。

下面我们讲"爱人"。"爱人"就是爱民。古代经典之中对于爱民这件

事都特别地强调，比如在《左传》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国家之所以能够兴盛，就是因为君主把人民视为受伤的病人加以体恤、加以关爱。很多人说"视民如伤"，就是把人民的苦难视为自己的病痛，那就更近了一层，把人民视为是自己一体，这样去关爱百姓，这是一个国家的福祉所在。而国家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人民被看作泥土与小草一样得低贱，不值钱，这也是一个国家灾祸产生的原因。

《六韬》中说："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能够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待百姓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就像兄长慈爱弟弟一样，见到他们饥寒交迫就为他们感到哀伤，见到他们劳苦奔波也为他们感到忧愁，是以这样一种心来对待百姓的。古人没有提出人权的概念，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民本思想，领导者、统治者都能做到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并且起到君、亲、师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百姓就不需要拿着人权，去和统治者讨价还价了。所以没有提出人权并不是因为我们落后，而是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把人权保护得很好。中国古代的政治称为圣贤政治，这个制度就是把人教育成圣贤君子，再使圣贤君子居于领导的位置上，这个叫圣贤政治。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圣贤了呢？原因就是没有人教了，缺少教育，不像古圣先贤那样重视经典和伦理道德的教育了，这才是我们现在人权问题很突出的重要原因。

最后一个是"使民以时"。第一层含义，中国古人认为按照自然节律来饮食、起居、生产、生活，这才是符合道的、正确的。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无论是农业、手工业、建筑业都有适宜的时节，顺着适宜的时节来安排工作就叫"使民以时"。不要在这些人很忙碌的时候去役使他们，比如说让他们去建筑宫殿或者去出兵打仗等等。我们对这一句话也要做与现代相适应的理解，农、工、商、民都各有忙时，在他们不忙的时候来使之就叫"使民以时，不违农时"，这个"农"在现代社会不仅仅是农业，工业、商业等等，都不要在他们的忙时去役使他们。

我们再把这一句话扩大范围来讲，现在的老百姓从小到老这一生的过程，在什么样的年龄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教导，比如说在人年幼的时候记忆力最好，就要让他多读诵经典，让他明白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他学习《弟子规》，特别是小孩记忆力最好，这就要充分发挥他记忆力好的特点让他多读诵圣贤经典。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十三经》都倒背如流，什么叫倒背如流呢？就是从《十三经》里任意拿出一句话，他都给你接着背下去，让他停他才会停。古代的孩子，特别是汉代的时候，出了很多神童、圣童，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孩子十二三岁就可以把经书倒背如流。我们认为这样的人很聪明，实际上并不是那个时候才出神童，是因为古代的教育符合儿童心理成长的规律。

其实我们用心教，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神童、圣童。我们现在的教育就违背了儿童心理成长的规律，在他记忆力好的时候没有抓紧时间让他记诵圣贤经典，而逼着他去做有很高的理解力的奥数、物理，这对很多孩子来说都是一件很为难的事。现在的孩子背包越来越沉，但是效果越来越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没有在他小的时候给他以适宜的教育。壮年的时候就要让他有一个好的工作，让他能够为国家效力、为人民服务，到了年老的时候就让他安享晚年，能够生活有保证、得到赡养，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老年生活。所以中国人把养老育幼这些事都看得很重要，把人民的一生都给安排好，按照他的年龄给他以适时的引导，这也叫“使民以时”。所以“使民以时”是按照他的生长规律来教导、来引导，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在蕅益大师的《四书蕅益解》中说到：“以敬事为主，敬事，又从敬止功夫得来。”什么叫“止”呢？“止”就是《大学》里的“知止而后有定”，也就是“止于至善”，我们中国古人经常讲有定力，有一心，也就是说你有专注的能力，这些都是真实的功夫。如果心里没有定，心里就没有主宰，又哪里来的敬呢？所以心里有主宰才谈得上负责尽职。如果我们心里没有目标，不知道做这件事是为什么，心里很乱，还很忧郁，怀疑不定，那么什么都谈不上，什么都做不好，所以静止的功夫是从学问当中来，是从学道、明

理当中来。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我们看到这一章都非常熟悉，因为《弟子规》是以这六句话为纲，然后分了具体的条目。“弟子”，在《论语正义》上说：“弟子者，对兄父之称，谓人幼少为弟子时也。”意思是说，对父称子，对兄称弟。“弟子”主要是指人幼少作弟子的时候，当然“弟子”也是就学生而言。在《论语讲要》上，李炳南老居士就这样写道：“弟子，求学之人，学必有师，故称弟子。”所以弟子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生。

“入则孝”的意思就是在家里必须孝养父母，使父母身心俱安；

“出则弟”，这个“弟”，也作竖心旁加弟，音悌（tì），出外求学或者做其他的事，则行悌道。这个“悌”在皇侃的注释上说“善兄为悌”，善事兄长就是悌；刑昺给它解释为“弟，顺也”。如果一个人在家能够孝敬父母，必然能够敬顺兄长，善事兄长，因为这个是父母所希望的。把这种善事兄长的敬顺之心推而广之，到外出求学的时候，做事的时候，对待比自己年长的人都像对待兄长一样地敬顺，这个就叫做“悌”。

“谨而信”，在《周易》乾文言上有这样一句话“庸言之信，庸行之谨”，这就是告诉我们，言语要讲信，行为要讲谨，所以“谨”是对行为的要求，“信”是对言语的要求。

“泛爱众”，就是博爱众人也。与众人相交往的时候，要注重博爱，这是培养一个人平等之心、宽容众人的德行，只有能够做到广泛地博爱众人，才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亲仁”就是“择仁者而亲近之”。前面泛爱众，没有讲要有所选择，但是要从仁者学习就必须有所选择，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有仁德的人。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行”就是实行上面的孝、悌、谨、信、泛爱

众、亲仁五事，这些就叫做“行”。把这五种事做好之外，就是余力。弟子求学，当以行此五事为本，应该先怎么样学呢？应该先学“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把这五种事作为学习的根本，这就告诉我们“无本之文不可取”，没有学好这几件事，专学了一些古代的经典，这是不可取的。这个“学文”，马融的注解说“文者，古之遗文”，这个“文”是指古代遗留下来的经典。刑昺的《注疏》进一步明确，他说：“注言古之遗文者，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也”，他就把这个“文，古之遗文”具体化为六经，这是这几条基本的含义，我们一句话一句话地来学习一下。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求学之人称为弟子，他所求之学，必须有先有后。孔老夫子以四科来教导学生。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首重“德行”，说明要“先正其心，后为文学，游于艺也”。教学的次序，是不能够颠倒的，我们求学的次序是如此，教育的次序也是如此。

现在的教育之所以出现很多的弊端，其中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教育的次序给搞颠倒了，教育的次序一定是在《三字经》上所说的“首孝悌，次见闻”，也就是先培养起一个人的孝悌之心，从孝敬父母，敬顺长辈，培养起一个人谦恭有礼的处事态度，然后再去学习知识，学习技能等等。如果一个人没有孝敬父母，尊重尊长的这种意识，就让他学了很多的知识和见闻，结果就会学得越多越傲慢。

所以什么叫“教育”呢，我们很多从事教育的工作者并不知道什么是教育。“教”在《礼记》上解释为“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育”在《说文解字》上解释为“养子使作善也”，这就是告诉我们教育的目的要非常明确，是使人，特别是孩子，善良的方面不断地增长，使他的过失得以挽救。仅仅把儿子养大，那个不叫育，必须使他有良好的人格，有高尚的品质，起码有做人的标准，这个才叫育。所以我们看做人的教育，品格的教育都是居于教育体系的核心地位，这是我们中国古人对教育的理解。所以有一位长者曾经说，“你们这一代人很可惜，没有受过教育”，我们听了之后就很不理解，我们都已经硕士毕业、博士毕业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为什么还说我们没有受过教育呢？结果看了对教育的定义，才知道原来教育的目的，是要使人善良增长，过失挽救。那我们想一想从小到大，随着受教育的时间越长，我们的善良是增长了，过失得以挽救了，还是我们的良心越来越少，傲慢心越来越重？结果是过失越来越多，就说明这个教育没有起到长善救失的作用，只是学了一些知识和技能，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儿女不孝敬父母，对父母不尊重，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

比如说，有一个小女孩，英语学得很好，她的母亲就很骄傲，带着她去见姥姥，见了姥姥之后就夸，“我这个孩子可聪明了，记忆力很好，记了很多的单词，不信你考考她”，姥姥听了也很高兴，就问：“这个书本怎么说呢”？小女孩说：“book”，书桌怎么说呀？“desk”，问了她很多，她都对答如流，确实学得不错。结果突然之间，这个孩子就反问姥姥：“姥姥，姥姥，伞怎么说呢？”姥姥从来没有学过英语，当然回答不出来。结果没有想到，小女孩当着众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讽刺她的姥姥说：“姥姥，姥姥，你可真是个白痴啊……”。这样的孩子，对父母长辈没有礼貌的现象，在我们现代社会已经见怪不怪了，什么原因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把孩子送去学奥数、学英语、学电脑、学钢琴，但是没有送孩子去学习《弟子规》，结果孩子学得越多就越傲慢，因为他的父母长辈都没有学习这些，最后就不把父母长辈放在眼里了。所以现在的大学生在没有上大学之前，还知道孝顺恭敬父母，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就不把父母放在眼里了，这都是我们教育没有起到长善救失的作用。这告诉我们教育的次序不能颠倒，所以古代的圣贤人，包括这些皇帝教导百姓，教导学生，一定是依据正确的顺序。比如康熙皇帝曾经颁布了《圣谕十六条》用来教导百姓，第一条就是“敦孝弟，以重人伦”，在前言中就给我们这样写道“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盖父母生我，有罔极之恩；兄长先我而生，有同气之谊”，能够善待父母，叫做“孝”，能够善待兄长，叫做“悌”。为什么要善待父母兄长呢？因为父母生养我们，有罔极之恩，在《诗经》上也说父母的恩德像天一样高，想报答都报答不了，所以有罔极之恩。

在佛教的历史上有一本经书叫做《父母恩重难报经》，这本经专门给

我们讲了父母的恩德。经的开头就记载佛陀带着弟子，到外面去出游，结果路上就遇到了一堆白骨，佛陀就派弟子把白骨分成两堆，然后还冲着白骨进行礼拜，弟子们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冲一堆枯骨礼拜呢？而且还要分成两堆，一堆颜色比较白的，看起来比较重；另一堆颜色比较黑，重量也比较轻。佛陀就说："分量比较轻的，颜色比较黑的骨头，是女子的骨头；而颜色比较白的，分量比较重的是男人的骨头。"弟子们听了就更奇怪了，问到："人在世的时候，女子穿的服装很艳丽，又涂脂抹粉的，从外表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女子，男子和女人穿着打扮都不一样，从他们穿着打扮上能判别出是男是女，难道人过世之后，还能够知道这个人是男人是女人吗？"

佛陀就告诉他们："因为女子有哺乳的义务，要哺乳儿女，就要把自己身体的营养通过乳汁输送给孩子。这样长期地哺乳孩子，所以她的骨头就比较轻，颜色是黑的；而男子的骨头就比较重，颜色是白的。所以凭这一点就能判断出这个骨头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说完之后，佛陀又给弟子讲了父母恩重难报的教诲，他说父母有十个重大的恩德。

第一，怀胎守护恩。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儿女和父母都是有很深的缘分才成为母子。怀胎一个月之后，儿女的五脏才生出来，七七四十九天之后六窍就分开，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母亲怀孕在身，行动非常不便，身体重得就像山一样，走路也非常困难，为了养育儿女，好看的衣服、装扮也顾不上去管了，梳妆镜也都沾上了尘埃。

第二重恩，临产受苦恩。十月怀胎就很辛苦了，一朝分娩却不知道生得是不是很顺利，特别是难产的时候，现在很多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剖腹产，这个时候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每一天都像得了重病似的，昏昏沉沉。这个痛苦只有生过孩子的人才能够有所体会，我们都听说有的母亲在生孩子的时候，就把床上的钢管拧得像麻花一样，可见生儿女的痛苦，用的力量也非常大。

第三恩，生子忘忧恩。母亲生了儿女之后，五脏张开，气也很憋闷，血流得像屠羊一样多，但是听到这个孩子是健康的，她就忘记了自己的痛

苦，非常地欢喜，但是欢喜一过，生儿的痛苦还是痛彻心肠。

第四恩，咽苦吐甘恩。父母恩深重，照顾儿女时宁愿自己挨饿受冻，也要让孩子温饱得到满足。

第五恩，回干就湿恩。像我们听说当过母亲的人，经常半夜里醒来，专门看看孩子的被子是不是踢开了，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经常半夜多次起床照看儿女，如果儿女把褥子给尿湿了，她自己宁愿睡在尿湿的褥子上，把儿女放在干的、温暖的褥子上，为了让孩子睡得安稳。

第六恩，哺乳养育恩。父母养了儿女，不论是男孩是女孩，都会对孩子非常地关爱，每一天都照顾，爱护，叮咛，嘱咐，没完没了。

第七恩，洗濯不净恩。本来母亲是天生丽质，非常美貌，精神也很好，脸色很红润，手也非常细腻，但是要经常给儿女洗濯尿布，照顾孩子，结果自己的好容貌，逐渐地改变了。一天一天地衰老，就是为了让儿女们能够渐渐成长，儿女能够成才，自己不惜劳苦。如果我们有时间和父母在一起，看看父母的双手，就能够感受到长期劳作的人和不怎么干家务的人的手是很有区别的。

第八恩，远行忆念恩。儿女要远行了，父母非常牵挂。临行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看儿女已经走了很远了，父母还不愿意回家，在那遥遥地看着。

第九恩，深加体恤恩。儿女有了苦，父母的心就是去代儿女去受苦，特别是儿女有病的时候，父母非常担心，都希望这个得病的人是自己而不是儿女。父母对儿女的体恤达到了这种程度，可以说是一种忘我的境界。

第十恩，究竟怜愍恩。有一首诗说："母年一百岁，常忧八十儿，欲知恩爱断，命尽始分离"。这就是告诉我们，父母对儿女的牵挂无时无刻不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即使已经活到一百岁的高龄了，还经常放心不下，惦记着她那八十岁的儿子。所以从这十重恩，我们就知道，父母的恩德确实是无以回报，就是这里边所说的"有罔极之恩"。

"兄长先我而生，有同气之谊"，前面我们讲了法昭禅师的这一句

话，“同气连枝各自荣，些许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所以古人把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意看得非常深重，把它称为骨肉之情，手足之情，怎么会因为一点点的财产、一点点言语上的不忍让就起了纷争，吵上了法庭呢？

下面他接着说：“故事父母兄长者，必内近其诚，外将其敬，显而饮食奉养之间，微而意念思虑之际，一一深爱曲体，以求得其欢心。”所以侍奉父母兄长的人，就应该从内心竭力地表达出对父母的诚心。对父母兄长的恭敬，不是伪装出来的，不是要让别人看我们很孝敬，夸赞我们的，而是深深地体会到父母的恩德而从内心发出来的。还有对父母的照顾，要有耐心等等。

“外将其敬”，这个“将”就是又、切的意思。在外表上，容貌言辞之间都要对父母兄长表示出恭敬，明显之处就是表现在对他们的饮食奉养之中，隐微之处，就是在我们的忆念顾虑之际。我们的心里要常常牵挂着父母，要善于体会父母的需要。“深爱曲体”就是深深地关爱父母，然后想方设法地能够体会到父母的需要，看到他们对我们真正希望的是什么。“以求得其欢心”，这是告诉我们赡养父母最重要的是要养父母之心，这个恭敬之心从外表现在对父母的饮食照顾之上。我们看到这一句话，也想到在《礼记》上有一个“文王世子”篇，给我们讲了周文王在做世子的时候，怎么样照顾他的父亲的。

文王在做世子的时候，每一天都要三次去到他父亲这里问安。早晨天刚刚亮，鸡鸣头遍，他就起床了。穿好衣服，到父母的房门之外，问侍奉父母的内侍小臣，说：“父王今天的身体健康吗？没有什么问题吧？没有什么毛病吧？他的起居动栖较之平常何如？”就是他的起居有没有和平常异样的地方，如果这个内侍小臣回答说“安”，就是他的父王一切安好，文王就会很高兴。到了中午的时候，周文王又来了；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又到了父亲这里问安。这种仔细的程度就和早晨是一模一样，没有丝毫地倦怠。如果父亲有身体不适的地方，内侍小臣就会如实地告诉文王，文王听了之后脸上就会显出忧愁的颜色，在走路的时候都“行不正履”，走

路的时候和平时都不一样了。这就是他忧虑父母非常地深切，所以表现出来在走路上，都和往常不同。等到他的父亲王季身体恢复健康了，然后才命令这些小臣，再给父亲进食。文王每一天侍奉父母，侍奉父亲，每上一次饮食的时候，他都会亲自看一看，寒暖程度是怎么样的，因为如果这个食物过冷或者过热，都会伤及到人的身体；每当吃完饭要撤下去这些食物的时候，他一定要问一问吃得多还是少，够不够，是不是太饱等等；还要问一问父亲喜欢吃的是什么，不喜欢吃的是什么；而且告诉厨房的厨师说，凡是已经吃过的剩饭剩菜，就不能够再进奉给父王了。为什么呢？“恐过时味变也”，恐怕时间长了，味道变了，父亲吃了有损健康。“善哉，应诺。”厨师他们答应了，然后他才退下去。

我们看文王做世子的时候，每一天都要三次到父王那里去问安，而且不是走形式，是确实看到父亲到底需要什么，对他的饮食也是发自内心地加以关心。像文王这样的人，虽然他贵为世子，世子是当时的国王、诸侯的嫡子，下面使唤的人有很多很多，他只要吩咐一下，下面的人都会尽心尽力地做好，但是他仍然亲自去侍奉父母，这就可以看到古代的这些圣王，他们都是率先垂范，从身体力行之中给大众做一个孝亲的榜样。这里给我们讲了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告诉我们父母的恩德，实际上是无以回报的。我们再看《母亲一生的八大谎言》这篇文章：

一、儿时家里很穷，饭常常不够吃，母亲就把自己碗里的饭分给孩子吃。母亲说：“孩子们，快吃吧，我不饿！”

二、孩子们吃鱼的时候，母亲不吃，又用筷子把鱼夹回到孩子的碗里，母亲说：“孩子，快吃吧，我不爱吃鱼！”

三、有一个冬天，孩子半夜醒来，看到母亲还躬着身子在油灯下糊火柴盒。孩子说：“母亲，睡了吧，明早您还要上班呢。”母亲笑了笑，说：“孩子，快睡吧，我不困！”

四、高考结束的铃声响了，母亲迎上去递过一杯用罐头瓶泡好的浓茶，叮嘱孩子喝了，望着母亲干裂的嘴唇和满头的汗珠，男孩将手中的罐头瓶反递过来请母亲喝。母亲说：“孩子，快喝吧，我不渴！”

五、父亲病逝之后，母亲又当爹又当娘，苦不堪言。然而母亲多年来却始终不嫁，别人再劝，母亲也断然不听，母亲说："我不爱！"

六、身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常常寄钱回来补贴母亲，母亲坚决不要，并将钱退了回去，母亲说："我有钱。"

七、孩子长大了，有了一份好工作，想把母亲接来享享清福，却被母亲回绝了。母亲说："我不习惯。"

八、晚年，母亲患了重病，住进了医院，孩子千里迢迢赶回来时，术后的母亲已经奄奄一息了。看着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母亲，孩子悲痛欲绝，潸然泪下。母亲却说："孩子，别哭，我不疼。"

我们看了母亲的这几个谎言，确实非常感动，因为这些都是经常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事，而母亲说这些谎言的时候，还说得特别地像，为什么呢？因为不愿意让儿女担心。所以我们很粗心，有的时候也体会不到父母对我们的关爱，说了这些话之后，我们还信以为真，甚至还以这些话为借口，不去尽为人儿女的孝心。父母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对待父母尽心尽力地去孝养，也是应该的。现在的孩子不能够很好地孝敬父母是什么原因呢？在《德育古鉴》上，"孝顺"前面有一段话，给我们总结了"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做不到孝顺父母"。我们把这一段话分享给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孝顺"的导言开头就说，颜光衷曰："天下哪有不孝的人？"颜光衷先生说："天下哪有不孝的人呢？"因为孝是人的天性，这种天性我们在摇篮中，在襁褓中的时候，就能观察到。孩子对父母的微笑、亲爱、依赖是出自于天然，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不是装出来的，所以人天生对父母有一种亲爱，"父子有亲"是天性，所以哪有不孝的人呢？"虽有不孝的人，而称之孝则喜，名之不孝则怒，且愧"，即使有不孝的人，如果你称赞他很孝顺，他就会很高兴，很欢喜，如果你称他不孝顺，他也会非常地怒，生气，而且羞愧。"充此良知便是大孝根苗，只是习性习气不能自化，所以依旧不孝也"，把这个良知良能，本有的这种良心给扩充，这就是大孝的根本。只是人因为习惯了，就不能够改变这个不孝的行为，所以依旧

去做不孝的事情。他说，不孝的人之所以习以成性，那是有原因的，他总结为七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是娇宠。因为儿女受到父母的怜爱太多了，所以常顺着孩子的性子，事事让他占先，做事都要考虑到儿女的需要，首先想到儿女的心，任他安乐。突然之间，你做了不顺他意思的事，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十件事有九件事你都满足了，一件事没有满足他，他就不能够忍受，就要一哭二闹三上吊，这就是因为平日娇宠惯了。我们学了《弟子规》，有一句话“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有一家的小孩，他的父母学了《弟子规》，然后说，从此以后要改变吃饭的先后顺序了。结果父母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就没有再首先夹给孩子，而是首先夹给了父母，结果这个小孩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他就跳起来了，非常不满地说：“为什么是我最后一个？”你看他习惯于大家都照顾他，他是第一个，结果现在让他最后一个，他就忍受不了。一个人在家里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娇宠习惯了，习以为常，但是到别人那去的时候，人家不买他的帐，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娇宠只能是在父母身上实现，这就是娇宠的后果。

第二个是习惯。如果一个人语言粗率惯了，他就敢对父母说一些违逆的话；如果一个人对父母的照顾，行为简慢惯了，他就敢做一些放肆的事。父母对待儿女都习惯于把好东西先留给儿女吃，少吃甚至自己不吃，久而久之习以为常，儿女就不再体会父母吃得是不是习惯了。父母经常拖着重病去做家务事，结果久而久之，儿女也就习以为常，不关心父母的痛痒了，这都是因为习惯。

第三个是因为乐纵。有的人对朋友特别地讲义气，别人说：“你今天有没有时间，陪我们去喝酒吧，招待一个客人。”他一下子为朋友两肋插刀，然后和朋友去吃吃喝喝了，又非常地慷慨大方。但是对待父母，“对双老而味薄”，但是请父母出去吃一顿饭，都觉得囊中羞涩，都不愿意花这么多的钱，觉得浪费。对待自己的妻子，喜欢的人，他很幽默，也想方设法地说一些话，讨她的欢心，但是对待父母的时候，却默默无言，呆若木鸡，无话可说。更有甚者，认为父母兄弟都是俗人，自己学了传统文化，

境界很高了，不愿意和他们相处。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很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历很高，又到国外去留学，结果长了很多的浮华之气，对父母，还有哥哥，姐姐，就不是发自内心的恭敬了，所以经常和学习传统文化的人一起分享，说得眉飞色舞，讲得特别投机，但是面对父母家人的时候，经常说话不顾忌，他们是兄长，是姐姐，却经常指责他们，还给他们挑毛病，所以这样的话，就很难让家人服气，这就是很久也没能让他们走上学传统文化之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四个就是忘恩记怨。恩义、情意，时间长了的话，人就容易忘记。别人对我们有恩，古人说："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相报。"但是人之常情是，人家对我们有恩，时间长了就淡忘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怨仇，积累多了，每每地想起来把自己气一遍，然后就累积起来越结越深，久久地不能忘，因此别人给你做了一顿饭，你反而会对他感恩戴德。

有一个故事，一个女孩在家里和父母吵了架，她一生气就任性地离家出走，结果身上也没有带多少钱，又是大冷的天，到了一个卖包子的铺子面前，看着热腾腾的包子，就越来越感到饥饿。这个老板娘看了之后知道她很饿，就过来说，"你过来吧，我给你煮一碗面，不要你付钱。"结果这个孩子吃了这碗面，顿时觉得暖和了，也不像刚才那样饥饿了，对这个老板娘非常地感恩戴德，老板娘问她，"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她就说："你看看，我的父母待我特别地不好，然后说了几句让我生气的话，所以我就离家出走了，可是您却待我这么好，在我无依无靠的时候，给我一碗饭都不收我的钱。"这个老板娘就很有智慧，她也是为人父母的人，所以她这样说："你从小到大，你的母亲不知道为你端过多少碗饭，帮你洗过多少次衣服，做过多少事，你知不知道对她感恩戴德呀？而我仅仅是给你端了一次饭，你就这样地感恩了，你这样分不出哪一个重哪一个轻！"

这个女孩吃了这碗饭，对老板娘心怀感恩，所以对她所说的话，越想越有理。一个陌生人，人家这样说别无所图，还是为了她好。她很惭愧，赶紧往回跑。结果跑到她们家的巷子里，看到她的母亲在焦急地东张西

望，逢人就问，“你看没看到我的孩子呀？”她看了这样的情景，忍不住也掉下了眼泪。所以，对“一饭之德”，我们都经常能够记在心上，感恩戴德，但是母亲每一天给我们做饭，吃得久了，我们还嫌她给得太多了、给得太少了、味道咸了、味道轻了等等。

一时感恩，人家救济你一次，帮助你一次，你对他感恩戴德，如果人常常地帮助你，你却忘记了感恩戴德，还嫌人家帮助得少了，是不是足够了，比上次是不是不多呀等等。所以这些都是人之常情。陌生人之间见面，朋友介绍说，“这是某某某”，一迎面，就觉得很亲近，对他很礼貌，很热情，但是如果常年累月地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就有了猜疑，更何况父母兄长，从小他们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慢慢地也就习惯了。“以亲爱为故常”，认为父母这样亲爱我照顾我，处处体会我的需要，这是应该的了。所以有的时候，父母为我们担心，我们还嫌他们多事，违背了我们的意愿；常常教诲我们，我们还对他们的用词挑来拣去；甚至在鼓励我们、夸奖我们的时候，还招致我们的讨厌。有的时候，他们辛辛苦苦地庇护儿女，做儿女的不知道报恩，都习以为常，所以对父母勉强自己的事，有的时候还怒目而视，对父母发脾气。对于父母眼前的大恩大德，都认识不到，更何况能够想到父母的胎养之劳，襁哺之苦，那对十月怀胎之苦，还有“三年不免于父母之怀”的哺育之恩，又怎么能够想象得到呢？这就是忘恩记怨所导致的。

第五个原因就是私财，把财产看得太重了。财到了自己的手里就认为是自己所有的了，而在父母的手里，还认为应该是给儿女才对。财钱俱足的时候就忘了父母，财钱匮乏的时候就希望从父母那里得到钱财，求钱财求不到的时候就怨恨父母，父母亲不能够赡养自己，而需要儿女赡养的时候就更加地厌弃父母，所以甚至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父亲孤苦伶仃地把独生子养大了，但是父子为了钱财形同陌路，吵上了法庭。这就应该想一想：我这个身是谁生养的、谁哺育的？既然这个身都是父母给的，父母哺育的，这个财又是谁的财呢？所以不要因为财产和父母起了纷争。

第六个就是因为恋妻子，这个“妻子”，在古人那里指妻子和儿女的意思。自己挣了钱，买了好吃的就用来让妻子高兴，让儿子享受。有了空闲的时间，有能够去休假的假期就带着儿女出去度假。但是这样一来，和父母亲相处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更没有想着去讨父母的欢心，这一句话说得很好，“不思子为我子，而我为谁子？”不考虑儿子是我的儿子，可是我自己又是谁的儿子呢？自己是父母的儿子，应该也去孝养父母才对。“亲子我，而我不顾，则我亦何赖有子哉？”父母亲把我当成儿子，这样地倍加关爱，但是我却不照顾父母，赡养父母，那我又怎么能够依赖儿女来赡养、照顾、回报我呢？

有一个故事讲得很好，有一双父母亲年纪大了，结果儿子非常地不孝，经常打骂父母，这个父亲就非常地不理解，儿子骂他，他也回骂儿子，儿子打他，他也回手打他，结果父子之间经常打架，这样时间久了之后，这个父亲很痛苦，听说一位老人很有智慧，就去向他请教，把这件事如实地跟这位长者汇报了，这位长者就说：“那我问你一件事，你必须如实回答我，我才能帮助你，否则的话，我帮不上你的忙。”这个父亲就同意了，他说，“好，我如实回答你。”这个长者就问，“请问您年轻的时候，是怎么对待你的父母的呢？”长者这一问，这位父亲就非常地惭愧，低下了头，他说，“我当时对待我父母的时候，就像儿女现在对待我一模一样。”这个长者听了之后，他就说：“正是因为你不孝敬父母，所以你所感召的儿子，也不可能孝敬你，这是你不孝敬父母所感来的果报，你以后不要再去和儿女对骂、对打了，你要心甘情愿地承受这一个结果，‘如是因，如是果’，丝毫不爽。”这个父亲听了老者的话就回去了。

从那以后，儿子再打他，再骂他，他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且脸上还露出了羞愧的颜色，这个儿子打了一次两次，再打就打不下去了，他就问，“很奇怪呀，以前我打你，你就跟我对打，我骂你，你就跟我对骂，但是为什么现在我打你，你也不还手，骂你，你也不还口，还觉得很不好意思呢？”这个父亲就说：“因为不久之前，我遇到了一位长者，他告诉我，我之所以有忤逆的儿子，就是因为我以前也忤逆父母，我应该承受这样的

结果，所以我再不好意思和你对骂、对打了。”这个儿子也很有悟性，听了这一番话后，马上就跪在了父亲的面前向父亲忏悔、道歉，从此以后也能够很好地对待父母了。所以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因为你这样施于人，以后就有人这样施于你，这样来回报于你，所以我们希望自己的儿女怎么样对我们，我们就怎样地去对待父母。

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对待妻子，对待孩子，当然是应该好好地照顾，但是也不能够因为妻子、儿女，而忘了养育自己成人的父母。这就是讲父母看着儿子成人，娶妻生子，这是他非常欢喜的事，这也是父母所盼望的事。如果这个儿子还没有成家，父母整天为儿女忧心忡忡，儿子一旦成家了，结果有了妻子，对妻子倍加地关爱，让母亲反而没有了儿子。所以有的人就说，不成家很好，成了家之后，这个儿子给人家养了，这就是因为儿子、儿媳妇不懂得去照顾老人所导致的，这是第六个原因。

第七个原因是争妒。父母生的孩子有很多，父母对于儿女的照顾和爱护，其实都是平等的。父母对于儿女没有私爱，但是儿女对于父母却有顺有逆，所以父母对儿女的爱也是不一样的。顺着父母的，父母就爱他多一些，违逆父母的，父母对他的爱就少一些，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一个人如果失爱于父母，不为父母所宠爱，应该怎么样呢？不要怨恨父母，而应该平心静气。想一想父母为什么对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更好，而对我不是那么好，一般的人都认为父母有重男轻女的意识。像我母亲经常当着我们朋友的面说“我这个儿子怎么怎么孝敬”说起我好像就不是那样地满意，我当时也觉得很不理解，觉得母亲非常地重男轻女，但是仔细思量，哥哥对母亲的照顾，确实能做到养父母之心，他特别地细心，能够看到母亲的需要在哪里。如果母亲想吃什么东西，他可能冒着寒冷和很长的路，都要让母亲吃到，但是我就觉得吃不吃这个东西都无所谓，为什么非要吃这个东西呀？就没有这样的孝心。所以父母对儿子非常偏爱，说起来就眉飞色舞，非常地满意，那也是有原因的，还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不好。如果见到兄弟被父母宠爱就咬牙切齿，生起了怨气，父母知道了，就

会更加地嗔怒。所以因为和兄弟姐妹争妒而不孝父母，也是有的。

以上这几种情况，是为人儿女的应该时时警醒、事事检点、念念克制的。你每时每刻，每一件小事，甚至每一个起心动念，都要从心底里去克除，“勿以亲心之慈，我可自恕”，不要因为父母亲心地很仁慈，不和我们计较，就可以自己宽恕自己，“勿以世道之薄，我犹胜人”，不要因为现在世风日下，很多儿女都不赡养父母了，自己还能够赡养父母，就认为比别人做得还不错，特别是在现代的电视、媒体也起了一种很不好的、消极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经常把那些儿女不孝敬父母，兄弟因为财产争讼这样的事情搬上荧幕，结果久而久之，让听众、观众就会觉得天下的人都已经不赡养父母了，都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去了，我还能够赡养父母，比那些人做得不知强多少倍了。其实我们看一看古人这些侍奉父母的故事，就会觉得非常地惭愧，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古代人说，宣传应该隐恶扬善，应该把善的、好的、孝亲尊师的、友爱兄弟的这样的故事，多给大家讲解出来，而那些不孝养父母的事不要讲，这样才能够提起人的孝敬之心，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我们看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这个“弟子”是学生，谁的学生呢？当然是圣贤人的学生，特别是我们学《论语》，我们学孔子，那我们就是孔子的学生，孔子的学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学得像他那样呢？那我们就要看一看在《淮南子》上有一段对孔子弟子的描述，说：“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淮南子》上说，法律能够把不孝的人通过法律杀掉。古代人说，“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那些不孝父母、打骂父母、打骂祖父母的人，按律当斩。虽然你能够通过法律把不孝敬父母的人给杀掉，但是你培养不出有着像伯夷、孔子、曾子那样高尚行为的人，法律也能够把窃盗的人，偷盗的人给处以刑罚，但是培养不出有着像伯夷、叔齐那样廉洁节操的人，孔子培养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的榜样，这是教育所成就

的。所以我们学《论语》，就要向孔子学习，成为圣贤人的弟子，那我们看一看，孔子的弟子是怎么样孝敬父母的。

我们知道，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子路，子路好勇。有一次子路来见孔子，说了这样一段话，“以前我侍奉父母的时候，自己吃的是豆叶等等，非常简单的食物，而到百里之外为父母背米。”因为他孝敬父母，不能让父母和自己吃得一样地简单，虽然家里很穷，他自己吃的是豆叶做的粮食，但是要到百里之外去给父母背米，不论严寒还是酷暑都是如此。等父母过世之后，他到楚国出游，跟从的车子有上百辆，随从也有很多，享受的俸禄也很多，可以说是至粟万钟，吃的是山珍海味，但是怎么样呢？他说：“思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得也。”虽然吃的山珍海味，跟从的人很多，非常地豪华，但是他还想像以前那样，到百里之外，为父母去背粮背米，但是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父母都已经过世了。

孔子听了之后就说，“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子路这个人侍奉父母，可以做到了生的时候，尽心尽力地供养父母，到父母过世之后，还能够思念父母，还有思亲的这种情意。所以中国古人，一年都有两次祭祀，为什么呢？“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就是你谨慎地办理丧事，追奠亡故的先人，民风就淳厚了，为什么淳厚了呢？我们想一想一个人，连他的祖宗，都能够念念不忘，每年定时地祭祀，对于眼前的父母，哪有不照顾的道理呢？不是说父母过世了，就觉得没有负担，一下子就解放了，古人还时时惦记着父母的恩德，父母过世的三年之中常常思念父母，一想起来还非常地伤心，叫“丧三年，常悲咽”。这是讲子路的孝。

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叫闵子骞，闵子骞的生母很早就过世了，他的父亲又娶了一个妻子，成为他的后母，这个后母也生了两个儿子，但是这个后母比较偏心，对闵子骞非常地苛刻，什么样的活都让他去干，而好的享受、好的食物却轮不到他，把这些好东西都留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冬天天气很寒冷，她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做的衣服是用绵絮做的，很温暖，但是给闵子骞所做的绵衣却是用芦花絮的，一点也不保温。结果有一次，闵子骞和父亲外出，他在外面驾车子，因为天气太寒冷，车子没有驾好，父亲

在盛怒之下拿着鞭子抽在了闵子骞的身上，结果一抽才知道，闵子骞所穿的不是绵衣而是芦花所做的衣服。父亲知道了之后就非常地生气，回到家里要把这个后母给休掉。闵子骞这个时候没有像我们所想的“终于报复的机会来了”，他马上就跪下来给后母求情，说了一句话“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如果母亲在只是我一个人受寒，如果你把母亲给休了，那么这三个儿子都没有人照顾，都要受冻了。所以你看，他就是用这样的宽宏的心胸解除了和后母的怨言，和谐了和后母的关系。

中国古人说“仁者无敌”，从孝敬父母身上，我们就能够培养出一种心，就是和任何人都不对立。你能够这样侍奉父母，不和父母对立，那么待人接物，为人处世，才没有违逆之心。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了，学圣贤的教诲，要像圣贤那样去行为，我们也要从子路、闵子骞的身上学到他们尽心尽力地孝敬父母，而且对父母没有怨言的这一种品质。所以这是我们讲的“入则孝出则悌”。

在《弟子规》“入则孝”里面有四句话，是我们尽孝的重点，这四句话就是：“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我们在对待父母的态度上，逐渐地把“我”给放下，能够不忤逆父母，即使父母对我们不是很好，像闵子骞的后母那样，对他处处刁难，他仍然不与她为敌，就培养了一种不和任何人对立、不与任何人为敌的心。所以这个“仁心”，就是能够体会到我和他是一体的。如果我们认为推己及人是行仁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只是接近于仁，和真正达到仁还是不一样的。真正有仁心的人，他确实是做到了我与他是一体的，能够像闵子骞那样。所以一个有仁心的人，才能够化敌为友，处事才没有不良的效果，没有后遗症。中国古人这种把对父母的孝心扩而广之，对待一切有缘人，就对待动物，进而对待天地等等。所以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人与万物都是一体的”，用这种心去处理事情的时候，就会处理得很圆融。

比如说现代的农业，当农业有病虫害的时候，西方人把这些虫子称为害虫，他们想的方法就是要想方设法给它消灭，于是发明了杀虫剂。但是这种杀虫剂的发明，最终也是让人自身的健康受到了危害。但是中国

古人有这种仁爱之心，他们能够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把这条虫子也当成一条生命，想一想它来吃我的东西，不过是因为可觅食要生存而已，所以古人充分考虑到它们的需要，在菜地旁边给它专门开辟一个菜地，请这些小虫子来吃。结果这种真诚之心，就感化了这些虫子，它们确实很听话也很配合，到这个专门为它开辟的菜地来吃。这种方法是怎么想出来的呢？其实就是因为中国古人有这种仁爱之心，不是对立的心，这种仁爱之心也就是西方人所讲的博爱。我们都希望人人具有，那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来呢？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对父母的孝，这个根本失去了。

在《孝经》上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也就是你把对父母的孝推而广之，在国家必然是一个忠臣，居家能够处理得很好，当官也是一个廉洁的官员。康熙皇帝的《圣谕十六条》上这样写道："人诚能孝弟，则本源之地已裕矣。"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地做到了孝悌，对父母能够孝，对兄弟能够悌，则本源之地已裕矣。这个本源之地就是我们的心地。古人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福田靠心耕"，那么这个本源之地，心地就变得"裕"，富裕的裕，裕的意思就是"包众容物谓之裕"，这个人就能够包容众人，而且宽容万物。

由斯以往，自然和于妻子、信于朋友，尽忠于朝廷。如水之有源，源远则流长，如木之有根，根深则叶茂。这个"孝"字，上面是一个老，下面是一个子，告诉我们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一体的。而上一代还有上一代，下一代还有下一代，这上一代和下一代自始至终都是一体的。能够把孝道尽到了，这个竖的人际关系就都处理好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竖穷三际"。而这个"悌"字是讲兄弟之间的友悌，又把这种悌道扩而广之，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悌道"做好了，这个横的人际关系也就处理好了。前面讲"竖穷三际"，这个讲"横遍十方"。所以只要把孝道和悌道尽到了，无论是竖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人际关系全都处理好了。而我们真正地做到了孝悌，这个人也就达到了仁。所以"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从孝悌可以达到仁这个境界，所以说它是水的源头，是树的根本。

我们现在都在讲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怎么来的呢？和谐社会就是要从孝悌来做起。一个人对父母孝敬，对兄弟友悌，向上提升，把这种孝悌之心扩而广之，那就是互爱，也就是《论语》上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再把这种互爱之心向上提升，就是互助，也就是我们不仅要对别人有关爱的情感，当别人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要切实地用行动帮助他们。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这个互助互爱之心，再向上提升，才是我们古人所说的大同社会。

在《礼记·礼运》上说：“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个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是大家的天下，我们把那些贤德的人，有能力的人选拔出来作为国家的领导者，人们相处讲求信用，睦邻友好，这样人不仅仅把自己的父母亲当成是父母亲，不仅仅把自己的儿女当成儿女，“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使老年人都能够得到赡养，养老送终；使壮年人都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能够为社会所用，能够服务于人民，尽忠于国家；使幼年人都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健康成长；使老弱病残幼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够得到赡养和帮助，这样才是和谐社会的景象。我们现在都提关心弱势群体，还向西方学习怎么关心弱势群体，其实我们打开“四书”，处处都是要求统治者要关心“鳏寡孤独废疾者”，对这些人要特别地加以照顾，这才是一个人仁爱之心的体现。

所以要构建和谐社会并不难，重要的就是要唤起民众的孝悌之心。要唤起民众的孝悌之心，从哪里做起呢？那就是我们最高的这些领导都要做出孝悌的榜样，让大家来学习，并进而在社会上弘扬孝道，这个社会才能最终和谐。就是《尚书》上所说的：“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从这一段论述中我们也知道现在的社会缺少人与人之间的亲爱互助，人与人之间缺少恭敬。什么原因呢？世界到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冲突、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冲突、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冲突不断，根源又在哪里呢？根源就在家庭之间的冲突，是父子之间的冲突、兄弟之间的冲突、夫妻之间的冲突。如果我们在家的时候，夫妻之

间同床异梦，对父母都忤逆，对兄弟姐妹都不能照顾，还因为一点点小小的争吵，把他们送上法庭。

我们从小没有培养出这种和顺恭敬的态度，那我们走上社会的时候怎么可能和陌生人和睦相处呢？所以我们把“父母呼”前面的父母给它变一下，说“老师呼，应勿缓；老师命，行勿懒；老师教，须敬听；老师责，须顺承”，这个师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把它换成老板，说“老板呼，应勿缓；老板命，行勿懒；老板教，须敬听；老板责，须顺承”，这个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也就处理好了。当然我们希望员工像儿女对待父母一样对待老板，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来对待员工呢？这个方法也就出来了，我们应该以父母关爱儿女的心去关爱员工。

当然我看到现在的父母对儿女也很关爱，但是儿女仍然对父母爱搭不理的，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父母没有起到君、亲、师的作用。所以一个好的领导者，包括一家之长，都要同时具备三个职能：君、亲、师。你不仅仅要领导他、管理他、你还要关心他、爱护他。如果做到了这两件，你不去教导他，他仍然会说谎话、做假账来欺骗你，这都是因为没有学习圣贤教诲，不知道为人处事的根本在哪里，所以你还要起到“师”的作用，当然这个“师”首先是身教胜于言教，自己先要做到。

《弟子规》“出则弟”上有两句话是最根本的，“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我们把对兄长那么大年纪的人当成是自己的兄长来对待，把父母那么大年纪的人当成是自己的父母来对待，你就把这个孝悌之心尽到了。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能够把这个心推而广之的人，那就是圣人。这就是告诉我们要解决现在的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根本上来抓起，也就是从培养人的孝悌之心来做起。

下面一段“谨而信”。

“谨而信”，“谨”，行为要严；信，言语要诚信。这一个“谨”，中国古人也是要求得很严格，告诉我们从早晨起床、盥洗、穿衣、吃饭包括饮酒乃至行、立、坐、卧都要有严谨的态度。比如《弟子规》上开篇就说，“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这种严谨的态度，就是让我们从晚睡早

起做起。当然这个“夜眠迟”相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说要做正确的理解。古代的人没有现代的这些科技，也没有电等等，所以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说的这个迟，相对于我们现在很喜欢夜生活的人来说，那其实是很早的了，所以生活起居要按照道来安排。

很多人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弟子规》呢？为什么要按照这些要求来要求自己的行为呢，我们活得不是挺好的吗？因为我们按照道来生活，自然而然表现出来就是这样的。你按照道去做的话你才会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安定。如果你不按照道去做，你身体就会出问题，然后每天烦恼重重、压力不断，还会得忧郁症、焦虑症。所以古人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孟子说：“人生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我们在《论语》上也看到孔老夫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君子坦荡荡”等。我们看到这些描述的时候就知道，其实按照道来生活，内心是一种很喜悦的状态。现在的人之所以压力重重，烦恼不断，根本的原因就是背离了道，也没有学做君子，学做圣贤，还是按照自己的私心来行事，所以身体出了问题，心灵也出了问题。所以很多人说，我们中国人不讲心理健康，不如西方的心理学发达，你看人家有心理医生。实际上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知道中国人有更加高明的方法，让人根本就没有心理问题。为什么呢？你看我们打开“四书”、“五经”，哪一本书不是在告诉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呢？那么修身从哪里修起呢？要从“格物”修起，格物就是“格除物欲”，让你在财色名利的面前，都如如不动，做到“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样的人不为外物所系缚，他的心灵达到了一种超脱，精神获得了一种自由，他还需要心理医生给他来看病吗？

所以我们按照道生活就要“谨”。古人告诉我们行住坐卧都不能够不谨慎，穿衣吃饭要有要求，行住坐卧也有要求。《五种遗规》中有一部叫《养正遗规》，《养正遗规》就教导人应该怎么样穿衣吃饭、行住坐卧。它

有个注本叫《养正遗规译注》，我们看《译注》的前言，这些做译注的人说了一句话，让我们这些做学问的人也很感动，他说："此书注译者放弃版权，愿见者、闻者广为流布"，你看我们中国古人学圣贤教诲的人，心胸就会很宽广，不是像西方人，他说"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个版权是怎么来的呢？版权显然是自私自利的产物，因为这个作者要有知识产权，有这个知识产权就有有专利，还可以拿版税等等，这些都是从利益出发，所以才会有版权。我们打开中国古代的善书，后边都写着一句话，"欢迎流通，功德无量"，这就显示了中国古人的心胸是不一样的。我们学习圣贤教诲，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心胸。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个前言，也感觉到我们现在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应该感到惭愧，因为我们著书立说，不是为了去让好的学说有利于社会和谐、家庭幸福，而想着自己去拿版税。这个存心，就让我们的目光很短浅，福分也就很有限了。古人说"量大福大"，一个人的福分有多大，就看他的心量有多大。

在《养正遗规》的第一篇有朱子的《童蒙须知》，它就对怎么样穿衣服有这些很具体的规定：它说"做人都要从整齐端正身体来做起"，像古人经常说，男子有三紧，就是"头紧、腰紧、还有脚紧"。古代的人都是长发，所以要挽一个髻子，髻子要用头巾给它扎紧；"腰紧"就是要用腰带来束腰；"脚紧"就是说穿鞋袜要紧。这三点如果不紧束，很散乱，就会使身体散漫不端庄，被别人轻视。像如果我们穿着一个拖鞋，很多人看了就会觉得不庄重，好像很散漫。如果久而久之，这样的态度养成了，这个身体就会让人感觉到不端庄，也会被人家轻视。《童蒙须知》讲穿衣是怎么穿的，脱衣是怎么脱的。比如说它讲脱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整齐地折叠好放在箱子里，不要散乱放置，不会被尘土污秽污染，这样还容易找，不至于丢失；衣服穿久了就不免有污垢，一定要勤洗晾干；有破处就缝补，有补丁没有什么，只要完整洁净就好。这就是我们《弟子规》上所说的"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

凡是日内所穿的衣服，夜里睡觉时要更换下来，这样就不会藏虱子跳蚤，不这样做衣服就会损坏。如果能这样，则不但威仪可使人效法，又

能不浪费衣服。像晏子有一席裘衣，穿了三十多年，虽然他的用意是为了以简朴来感化世俗，但也是因为他爱护有道，这是警箝己身的关键，不能够忽视。这是对穿衣服其中的两条要求，它还有很多具体的要求，怎么样穿、怎么样脱、怎么样放、怎么样在洗脸吃饭的时候去爱护它，都讲得非常地具体。

对于行住坐卧，在《养正遗规》上，也有一些很具体的规定。比如在学坐上，古人说“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它有这样几句话：“定身端坐，齐脚敛手；毋得伏框靠背，偃仰倾侧。”这就是告诉我们坐的时候，要稳住上身，端正身子，两脚并拢，两手收敛，不要伏框倚靠，也不能够俯仰、侧伏，这就给人一种严谨的态度，坐有坐相，坐如钟。学立上，有学立的具体要求。它有两句话：“拱手正身，毋得跛倚欹斜。”拱手正身就是古人见面的时候要拱手表示恭敬，两手相合以示敬意。站立的时候，要两手相合、身体正直，不得歪斜不正，这是告诉我们站有站相。还有学行，走路要有走路的样子，也有两句话，“笼袖徐行，毋得掉臂跳足”。我们都知道古代的人衣服袖子很长，走路的时候要两手相对伸入两袖之中，这个叫“笼袖”，“徐行”就是慢慢地走，我们看那些稳重的人，他们走路都非常地缓慢，不是急匆匆地。还不得甩臂跳跃，不能够甩着胳膊大步流星又蹦蹦跳跳地，这样都给人以一种不庄重的感觉，这是学行。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行、住、坐、卧确实要做到《弟子规》上所说的“步从容，立端正”，“勿践阈，勿跛倚；勿箕踞，勿摇髀”。

一个小孩从小都是受到这样的教诲，他的行为就非常谨慎了。当然行为的谨慎还有很多具体的要求，像我们在《弟子规》上讲，“缓揭帘，勿有声”，我们要举一能够反三，“缓揭帘，勿有声”，就是能够照顾到别人的感受。我们在开门的时候也要轻轻地开门、关门，也不要影响到别人的休息或者学习。还说“宽转弯，勿触棱”，有一个学习《弟子规》的人，学了之后就特别地感触，他说：“我以前走路就经常碰到桌角，我不知道为什么？学了《弟子规》之后，我才知道要‘宽转弯，勿触棱’”。还有“执虚器，如执盈”，就是我们拿着一个空的容器，空的碗，也要像拿一个盛满

了水的容器那样小心翼翼，一定要双手捧着。你看小孩从小学到了这样一种谨慎的态度，我们把照相机、摄像机这些贵重的东西交给他保管，也一定会很放心。因为他对一个空的容器都那么谨慎小心，对这些贵重的东西，就更加注意保护了，这些态度都是“谨”的表现。

下面讲“信”，是告诉我们言语要诚信。在《弟子规》上说：“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说话一定要讲诚信，言出必行，不要有意无意地去欺骗别人。有的人不诚信已经习以为常了。比如我们去市场买菜，我们跟人家说“我过一会再来买”，结果过一会，我们买了别人家的菜，就忘了过来再买这个东西了，这就是失信于人了。所以如果我们做人言而有信，那我们在社会上处事就非常地方便，也减少了很多的成本。还有一句话也很重要，就是“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像我自己经常犯这个毛病，就是别人说的时候，这个事情好像非我们去不可，结果我们一下子就发了善心，就答应了，结果最后一看，这个时间实在是排不开，最后就失言了。所以《弟子规》上这一句话，对我们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凡是要承诺别人之前首先要考虑到条件允不允许、有没有可能。这就是告诉我们言语也要谨慎。当然这个言语要守信，除了守信之外，它也还有很多别的要求。

在《养正遗规》上，也有对言语的要求，说：“凡为人子弟，须是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不可高言喧哄，浮言戏笑。父兄长上，有所教督，则当低首听受，不可妄大议论。长上检责，或有过误，不可辩自分解，姑且隐默。”这就是告诉我们，除了言语做到诚信以外，还要做到态度谦恭，说话和缓，不可高声喧闹，玩笑嬉闹。父兄师长的教导应该低头听受，不可妄加议论。师长检查有时有错误了，不可马上辩解，姑且缄默不言。这是为人弟子、做学生应有的态度。因为尊师才能重道，像我们一般老师对学生提出错误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找借口，进行辩解。这里告诉我们，有错误的时候不要马上辩解，过一段时间再慢慢地细心分条陈述说“此事恐怕是如此，先前可能是不小心遗漏了”，或者说“应当是偶然没有考虑到”，这样的话才不会忤逆师长，事理也就自然明了了，甚至

对于朋友也应是如此。

我们看了这些之后，就对古人更加地生起恭敬之心。我们再看《弟子规》的时候，就更加地珍惜了。李毓秀夫子从这么多《童蒙养正》的教诲之中，用这么简单的话，把我们从早到晚行住坐卧、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方方面面的要求，都概括得淋漓尽致。所以我们越学，对古人的这种恭敬心越能够生起来，我们再学的时候，就觉得很亲切，也很容易去力行了，这是“谨而信”。

后面一句话讲“泛爱众，而亲仁”。

“泛爱众”，就是让我们博爱众人，广泛地去博爱众人。这个广泛地博爱众人，也是从对父母的孝生起来的爱，并把这种爱心推而广之的结果。《弟子规》上有两句话说“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这就是“泛爱众”。

“而亲仁”，这个仁，就是有仁德的人。当然，“泛爱众”是我们广泛地博爱一切人，没有选择，“凡是人，皆须爱”。但是，选择向谁学习的时候，就要选择那些有仁德的人；选择和谁交朋友的时候，也要选择那些有仁德的人，这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无友不如己者”。

我们看“亲仁”非常重要，特别是我们在学《群书治要》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地方，都论述到了这一个问题。像在《孙卿子》，也就是在《荀子》上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他说：“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辨智，必求贤师而事之，择贤友而友之。”虽然这个人的本质不错，很美善，他的心智也非常聪慧，但是也一定要求贤师去学习，选择贤友来交往。一个人一生道业、学业、事业能不能成就，关键就是他选择什么样的老师，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这两个都是他道业成就的助缘。“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如果你所得到的是真正贤明的老师并且向他学习，那你每天听到的是什么呢？那都是尧、舜、禹、汤古圣先贤的道理。

我们都知道孔子一生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他所钦佩的人就是文武周公等这些古圣先贤。如果你和一个贤德的人交往，每一天所听到的都是圣贤的教诲，这些圣贤教导我们什么呢？就是教导我们刚才所讲

的以上几件事。“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如果你得到好的朋友和他交往，你所见到的都是忠诚、信实、恭敬、礼让的品行，因为这个朋友言行举止待人接物所表现的就是忠信、敬让。

“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你每一天在仁义方面都有进步，但是你却不知不觉，这个是潜移默化的结果。“今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诈伪也，所见者污漫、淫邪、贪利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如果你现在所结交的都是不善之人；所听的都是欺骗的、巧诈的、虚伪的言行；所看到的都是邪污的、卑下的、放荡的、邪曲不正的、自私自利的行为，致使自己将会被处罚还不知不觉，这也是潜移默化的结果。我们整天在一起学习《论语》，听的是孔子的教诲，然后看的是他的弟子怎么样地奉行。如果我们打开网络，就看到了这里边所说的，很多都是邪污的、卑下的、放荡、邪曲不正的、自私自利的行为，还有欺骗的、巧诈的、虚伪的言行，就看你接触的是哪些人。你接触什么样的人和他们为伍，你就自然而然地，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这就是“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荀子所说的这个蓬草本来就是很软的、弯曲的，但是它生长在笔直向上的麻中，你不用扶它自然也会向上生长。所以古人说：“亲附善友，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和善良的人交朋友，你就像在雾水中、露水中行走一样，虽然打湿不了你的衣服，但是你时时感受到他德风的滋润，这都是潜移默化的结果。

在《吕氏春秋》上有一个典故，说楚国有一个很会看相的人，给很多人看相都说得很准。结果楚庄王知道了这件事，很好奇，就把他请来问，说：“我听说你会看相，而且看得很准，有没有这回事啊？”这个人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并不是会给人看相，我只不过是会观察这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如果我所看的人是一个布衣百姓，他所结交的朋友个个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淳厚善良、行为谨慎、畏惧法律，这样的人他的家庭会一天比一天更兴旺，他做人也会一天比一天更安定，这样的人就被称为吉人；如果我所看的人是一个侍奉君主的大臣，他所结交的朋友都是诚实守信的、喜好品行的、好做善事的，这样的人他侍奉君主会一天比一天

好，他的官职会一天比一天地更提升，这样的人就被称为吉臣；如果我观察的这个人是一个君主，他的朝臣都是贤德之人，左右侍奉的人都是忠诚之人，这个君主一有过失，他的左右都敢犯言直谏，指正他的过失，这样的君主他的国家会一天比一天地更安定，他自己也一天比一天地受人爱戴，天下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地更加心悦诚服，这样的人就被称为吉主，就是吉祥的君主。我并不是会给人看相，我只是会看这个人所结交的朋友而已。”

所以，这个人他只是观察了这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就能够判断出他的前途命运如何了。这就告诉我们亲近仁者，包括亲近有仁德的朋友，对自己的影响是非常深远地。

在《群书治要·孔子家语》上也记载着一个典故。孔子有一次说：“我过世之后，子夏的德行会一天比一天地增进，但是子贡的德行却一天比一天地减损。”曾子就问：“夫子您为什么这么说呢，凭什么判断出来的呢？”孔子就说，“子夏喜欢与比自己贤德的人相处，喜欢和这些比自己更加有学问、有道德的人相处；而子贡却恰恰相反，他喜欢和那些不如自己的人交往，别人称赞他有学问、有道德，可能他就觉得感觉很好”。后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儿子怎么样，你就看一看他的父亲，大概就知道他儿子怎么样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为人如何，你就看一看他所结交的朋友都是哪些人，你大概就能判断出这一个人品行如何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领导是什么样，你看看他所使用的是什么人，你就知道了。

后边得出了结论，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者焉。”这就是告诉我们：与善良的人交往就像进了一个种满了芝兰的房屋，你进来之后，刚进来的时候还觉得很香，但是你在这里呆得时间长了，你就不觉得很香了，你就和它同化了；我们去了一个卖鲍鱼的铺子，你一进去的时候，感觉到腥臭难闻，但是你在那里面呆上一阵之后，你也就没有什么感受了，说明我们也是与之同化了。

这些都告诉我们谨慎地结交朋友非常重要。所以亲近仁德的善友，对我们德行、道业的提升都非常地有帮助。这就是我们《易经》上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也就是说，志同道合的人自然会吸引到一起成为朋友，当然这个能亲仁，更重要的是能选择有仁德的老师，能够选择一个有仁德的老师，自己的一生才会少走很多的弯路。还有“德行”，“德日进，过日少”。

最后一句话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一句话我们前面讲过。我们再看一看蒲益大师的注解，他说：“养蒙莫若学问，学问，不过求放心。”童蒙养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求学问，学问从哪里做起呢？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以这个学问就是要从放心上来做起，那什么是放心呢？我们的心本来是纯净纯善的，但是我们把它放在了五欲六尘之上，追求财色名利的享受，这个心就放逸出去了，就不清净了，也有烦恼了。你把这个放出去的心收回来，这就叫做学问。学问从哪里做起呢？蒲益大师说“求放心，莫若格物致知”，也就是说，学问要从格物致知做起，让我们在面对财色名利的时候都如如不动，最后甚至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著”，这个时候就是克服了自己的妄念和欲望。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呢？达到的结果就是“致知”，这个“知”就是智慧的意思，这个智慧是我们本来自性中有的，只要这个心从五欲六尘上回来，这一个智慧就开了。

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利令智昏、情令智迷”。当一个人在利益的诱惑面前把持不住自己的时候，就昏头昏脑，丧失了理智。而一个人过分地贪著情欲的时候，情令智迷，他的智慧也就昏迷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贪官不是因为财，就是因为色而被拉下了马。这个告诉我们童蒙养正养的是什么呢？养的是“根本智”，告诉我们要求“根本智”。所以这个学习的过程不是一个往上加的过程，而是往下减的过程。老子也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求学，像我们现在的人求知，他的方法是学得越多越好，知识广博，见闻很多，你说什么他都能够知道，头头是道。但是有知就会有所不知，无论你知得多少，知得

再多，你只要有知，那就一定会有所不知。那怎么样做才能做到无所不知呢？那就要回到无知，无知起作用才是无所不知，所以为道的方法和为学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它是一天一天地减损，减损自己的欲望，减损自己的念头，最后达到无为的境界。而无为起作用才是无所不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般若无知”，它才能够无所不知。所以儒家童蒙养正的教育也是要求“根本智”。因此它的方法就和我们现在学校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它是什么样的方法呢？下面就告诉我们。

“直教一切时文行合一而修，不是先行后文”，这就是告诉我们“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不是说从次序上讲的，而是说这个“文行”要同时修学，只不过是一个是主修，一个是助修，它们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也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知行合一。这个“知行合一”是从佛教学来的，佛教讲“解行相应”，王阳明把这个“解”变成了“知”，把这个“行”保留了，“相应”变成了“合一”，最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治学方法。这里边就是讲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不是说先行后文，而是在“一切时文行合一而修”。

“盖‘文’是道统所寄，孝弟忠信等即是文之实处，故曰‘文王即没，文不在兹乎’，若仅作六艺释之，陋矣！”我们所读的经典文献都是“道”的表达，是道统所寄，所以孝悌忠信等都是“文之实处”，也就是说圣贤的行持落实在文字上那就是经典了，我们读诵经典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要更好地来修学孝悌忠信，如果仅把这个“文”作为六艺来解释的话，这就显得浅陋了。它说，“文王即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他已经不在了，这个文就不存在了，就没有了吗？恰恰相反，要从我自己的身上表现出来文的实质，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内容。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这个“修”是同时修，但是在用的时候它有先后次序。先用在孝敬父母，尊敬尊长；到学校尊敬老师，尊敬同学。但是学的时候是同时的，这也是告诉我们，读书目的是为什么？不是去谈玄说妙，助长自己的浮华之心，实际上还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德行，来增进自己的修养。

《颜氏家训》上有一段关于读书的目的，这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它说人之所以要读书学习，为的是什么呢？“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就是为了开发人的心智，利于人德行的提高。对那些不知道如何奉养父母的人，让他们看一看古人如何体察父母的心意，按照父母的意愿办事，如何轻言细语和颜悦色地与父母谈话，如何不怕劳苦为父母弄到美味可口的食品，要让他们感到惶恐惭愧，起而效法古人；对那些不知道如何侍奉国君的人，就让他们看一看古人如何奉公守法，不侵凌犯上，在危急的关头，不惜献出生命，如何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忘自己忠心劝谏的职责，使他们痛心地对照自己，进而想去仿效古人；对于那些平时骄横奢侈的人，让他们看一看古人如何恭谨简朴，节约费用，如何以谦卑自守，以礼让为正教之本，以恭敬为立身之根，让他们感觉到震惊变色，自感若有所失，从而收敛骄横之态，抑制骄奢的心性；对于那些向来浅薄吝啬的人，就让他们看一看古人如何贵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如何体恤救济穷人，让他们脸红，产生懊悔羞耻之心，从而做到既能积财又能散财；对那些平时暴虐凶悍的人，让他们看看古人如何小心恭谨，自我约束，懂得牙齿因为坚硬而早脱，舌头因柔软而得以久存的道理；如何宽仁大度尊重贤士，容纳众人，使他们气焰顿消，显出谦恭退让的样子来；而对那些平时胆小懦弱的人，让他们看看古人如何无牵无碍，顺应天道，如何强义正直，言而有信，如何祈求福运，不违祖道，使他们能奋发振作，无所畏惧。由此类推，各方面的品性都可以通过读书的方法来加以培养。

比如说一个人很好色不知道如何对治，可以看一看《安士全书·欲海回狂》，看一看历代因为贪色感召的不良后果的这些善书，多看一看就自然能够对治自己的坏习气。所以读书是为什么呢？不是谈玄说妙，是为了能够力行“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所以这才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真正的含义，不是在次序上讲的。这是我们对这一句话的学习。

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史记》上记载：“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子夏，姓卜，名商，他比孔老夫子年轻四十四岁。“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孔子过世之后，子夏就到了西河这个地方，教授生徒，他曾经是魏文侯的老师。

“事父母，能竭其力”，“竭”在《说文解字》上注解：“竭，负举也。负举者必尽力，故竭。”也就是说，一个人要举重，背负一个东西就必须要尽力，这个称为竭，也解释为“尽”，就是竭尽全力的尽。

“事君，能致其身”，君，解释为“至尊”，也就是至高无上，至为尊贵的。《郑注》，郑玄注解说：“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换一句话说，在我们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总统、总理，一个地方的省长、市长、县长都称为君，乃至于一个公司团体的领导人也称为君。“能致其身”，这个括号里有注解，“尽忠节，不爱其身也”。侍奉领导，侍奉君主能够不私爱其身，竭尽全力，能够尽心尽力，这个就是“致其身”。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朋”同门曰朋，“同志”曰友。“信”就是诚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谓”，《尔雅训诂》解释为“说也”。这句话就是说侍奉父母能够竭心尽力；侍奉君主领导能够尽忠，不私爱其身；与朋友交往，言行都诚信。虽然他说自己没有学习，我也说他已经学了。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古人求学的目的是什么？学问和知识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广学多闻，很有学历，这个学的是知识，不叫学问。我们也知道历史上禅宗六祖惠能大师，他一个字都不认识，没有知识，但是他很有学问，很有智慧，别人有问题去请教他，他能够回答，能够点拨人。所以古代人求学不是求知识，而是求学问、求智慧。知识解决不了问题，但是智慧却可以解决问题。求学问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学五伦大道开始。所以这一句话讲的是“伦常之意”。“伦”，就是五伦，“常”，就是不变的意思，也就是说时代有变，但是五伦之学不能够变。

《左传》上也说："人弃常，则妖兴。"什么叫"人弃常"呢？就是人不再讲求"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五伦大道不讲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不再讲究了。把这些抛弃的话，"则妖兴"。怪异的现象，违背常理的现象就发生了，像"子杀父"，"儿女把父母送上法庭"，"兄弟因为财产起了纷争"，等等诸如此类的五伦关系的紊乱现象就产生了，这都是因为不讲求五常导致的。

五伦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句话讲的是伦常之意。因为我们这个是《论语治要》，是从《论语》之中节选出来的，主要是讲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所以这一句话前面有四个字没有选进来，就是"贤贤易色"。这四个字主要是讲夫妻之伦，夫妻之间选择配偶的时候要重德不重色，这叫"贤贤易色"。

"事父母，能竭其力"，是讲父子有亲。我们对父母之道讲得也很多了，但是孝道是说不尽的。我们从竭其力可以知道，事父母要尽心尽力。在哪些方面要尽心尽力呢？第一个，养父母之身。养身的方面要尽其力，儿女奉养父母，即使不能够使父母不匮乏、不缺乏，但是要竭尽全力侍奉父母，这才叫"竭其力"。比如，东汉时期有一个江革的故事。当时社会很动乱，出了很多盗贼，为了避难，江革就背着母亲到处逃难。因为他从小父亲过世，和母亲俩人相依为命。在逃难的过程中，多次遇到盗贼，要把江革给劫夺去，每每遇到这种情景，江革就哭泣说："我有老母需要奉养！"盗贼被他的这一片孝心感动，也就不忍心杀害他。

后来江革背着母亲到了"邳下"这个地方，因为一路行走，钱财都用光了，很贫穷。为了奉养老母，他每一天就光着上身、赤着脚，去给人家做苦工，出卖劳力来奉养父母。老母亲所需要的东西，他都给一一地筹备齐全，不让她有任何欠缺。一个人已经贫穷到这样的程度，但是还不惜勤苦地工作，甚至出卖苦力来奉养母亲，不让他的母亲有所缺乏。那我们想一想一般的百姓家庭贫乏、困穷，能比得上江革吗？但是我们对父母的奉养，可能还不能够像江革那样尽心尽力，能够让父母衣食无缺。这个是说养父母之身要尽其力。

第二，养父母德行也要尽其力。像遇到一些父母不够慈爱，特别是遇到那些后母的时候，对待儿女非常地苛刻，甚至虐待，这个时候儿女也应该竭尽全力来养父母之德。怎么样养父母之德？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闵子骞的故事、大舜的故事，他们都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像闵子骞的后母，对他那样不好，他的父亲要把她休掉，结果闵子骞还跪下来，为后母求情，并且说："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大舜就更加难得，他的后母、弟弟，三番五次地要置他于死地，他并没有怀恨在心，想着去打击报复他们，而在登上天子之位后，还仍然想着不能够得父母欢心，结果怎么样呢？他的德行感化了后母和弟弟。我们想一想，他们之所以能够感化父母，靠的是自己的德行，非常有耐心，自己的心非常柔软，不和人对立，最终能够把这样的后母也感化了，让他们回头，也提升了他们的德行。

第三，养父母还要尽心竭力地养父母的智慧，特别是当父母有过失的时候，不能一味地顺从父母，而是要竭尽全力地劝导父母。在《德育古鉴》上，讲到孝顺的时候，就这样说道：有一些人，自己认为是孝子，但是实际上不能够称为孝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只知道"顺亲于情，而不知顺亲于理"，他们只知道从父子亲情上一味地顺从父母亲，但是不知道要让父母有道义，能够顺着理去做，这叫"顺亲于理"。比如说有的人父母亲非常固执，性格很不好，结果导致一家老少不得安宁，儿女还一味地顺从，不知道耐心地劝导，就很难让家庭幸福；有的父母亲脾气暴躁，非常自私，不能够为别人考虑，结果搅得邻里不安，和邻居都搞不好关系，这个时候儿女一味地顺从，也会让邻里对父母产生不满；有的父母亲作恶，做儿女的不去劝告，还一味地顺从，结果导致走上违法犯罪的路。这个都叫顺亲于情，而没有顺亲于理。所以在《孝经》上说：如果一个父亲有能够犯颜直谏的儿子，他就能够使自己不至于披上不义的名声。这就告诉我们要竭尽全力地劝告父母，当他们有过失的时候，不能够任他们的过失去行事。

第四，养父母之心也要竭尽全力。我们都知道有的人对父母的衣食供养非常充足，要什么都给满足什么，但是在养父母之心方面就做得不够

了。在《德育古鉴》上也说，有些人名为孝子，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孝子。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有一些大家的、有钱的人，嫌父母年老多病，就对别人说“父母亲不愿意和我们一起住，就到养老院去了”，把他们安置在那里；有的害怕父母太偏执，就找一个原因，违逆了父母的意思，离父母而去，和父母分家了；有的是厌弃父母耳聋眼花、腿脚不便、反应太慢，所以就不耐烦地，不以和颜悦色的态度来侍奉父母。结果怎么样呢？这几个字说得非常好：“遂至日远日疏，备物鲜情，意色冷淡，尊而不亲。”对父母一天一天地疏远，一天一天地冷淡，虽然物资都不缺乏很完备，但是很少有父子之间的亲情。“备物鲜情，意色冷淡”，在心里既不依恋牵挂，怀念父母，在表情上也是很冷淡，对父母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关爱之情。“尊而不亲”，虽然尊重父母，但是没有亲情，说起来是孝子，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孝子。要尽心竭力地侍奉父母，确实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需要我们去努力。

还有四种父母特别需要我们尽心竭力地去侍奉。第一种就是年老的父母，“一曰老”。在父母半衰的时候，就是五六十岁的时候，他们的饮食起居还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到了老态龙钟的时候，拄着拐杖，走路怕跌倒，还经常得病，衣食不能自理，有病的时候还会时间很长，历月经时，很久都要躺在床上，所以生活起居都要儿女照顾，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尽心尽力地照顾父母。

第二种，“二曰病，缠绵恶疾”。父母亲有病，躺在床上几个月、几年，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一会尿在裤子上，一会便在床上，弄得被子衣服都很肮脏，儿女侍奉父母最难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了。而父母需要儿女照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了，中国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实际上真正的孝子，就是父母亲有病，他也仍然能够一如既往地不嫌弃父母。这几年有一些传统文化的论坛，经常邀请一位老师，大连的孝子王希海老师。他侍奉父亲很长时间，父亲是卧床不起，但是他每一天都给父亲换床单、换衣服，结果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得褥疮。

有一次，他带父亲去看病，这个医生看了父亲的病历，扭头就走了。

说："你父亲病了多长时间了？"他回答，多长多长时间了。医生不相信，觉得在欺骗他，因为卧床这么长时间的老人，还能不得褥疮的人，他是没有见过的，觉得这个孝子是在骗他，所以他扭头就走了。结果，当他再回来的时候，眼里就含着泪水，他知道了王希海孝子照顾父亲数十年如一日，每一天从早到晚，都是认真地给父亲换这些衣服和床单，所以他被感动了。他说，那些在专业护士学校学护理的人都达不到这个照顾护理水平。这位孝子能够照顾病卧在床的父亲数十年如一日，这确实让人很感动。

第三种，父母亲鳏寡。老而无夫叫"寡"，称为寡妇；老而无妇为"鳏"，称为鳏夫。"鳏夫、寡妇"到老的时候丧失了配偶，形影相吊，也没有人在面前问寒问暖，心里有了事也不知道向谁去诉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也非常孤单，虽然儿孙满堂，但是儿女们都在看电视，和自己的妻子丈夫谈笑，和自己的孩子嬉戏，也顾不上去关心父母；孙子即使在面前，也经常在酣睡之中，不知道去关心奶奶、姥姥的心情。所以彻夜难眠，辗转反侧，非常孤独、非常孤单。这个就是鳏寡之人。

最后一种是贫乏。贫乏之人因为抚育儿女，心力都费尽了，又要为儿女置办嫁妆、婚礼，把这个财也用完了，结果年轻的儿女吃饱了，穿暖了，住着好的房子，老父母却在垂首踌躇，看到别人吃美味，禁不住流下口水，一日三餐也是靠行乞为生。这样的儿女也没有想一想，自己的身是从那里来的？还经常埋怨父母："有什么能够遗留给我的？"我们上面说的这四种老人，他们的怨气是非常深的，如果儿女对他们不好，他们的怨言很重，所以对这四种老人要非常竭心尽力地照顾。

历史上有很多名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样尽心尽力地照顾自己的父母的。比如说，历史上有一位德行和道业都很高的道济法师，他常常在城东讲经，我们从这里也看到，古代出家人的本分就是讲经教学，所以他经常担着担子到城外去讲经。去讲经的时候，前面的担子里面担着自己的老母亲，另一个担子里面装的是经书佛像等等。他经常对人讲，如果有母亲能够亲自供养的，他的福分就和供养登地的菩萨所获得的福

分是一样的、平等的。所以家有老母亲可以供养，那是你的福分，也是给自己积福的一个好机会。他父母的衣着、饮食、大小便等等，他都亲自来照管，有人看他讲经很辛苦，想帮助他去照料母亲，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吾母，非尔母也。"这是我的母亲，又不是你的母亲，所以他就坚持亲自来照顾母亲，无论是出家的僧众还是在家的人，听到他的故事都被他感化，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地来侍奉母亲了。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感觉到很惭愧，虽然我们有条件，但是没有像道济法师那样亲自地、竭心尽力地来照顾母亲，这就是第一句"事父母，能竭其力"的意思。

第二句是"事君，能致其身"。侍奉君主，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侍奉领导，能够致其身，能够把自己的身心都奉献出去，竭尽全力，这样的人才称为"致其身"。"致其身"也有几种情况：第一，当君主或者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这一个人奋不顾身地保卫君主、国家，和它同舟共济、同甘共苦，这样称为是"事君，能致其身"。

在《群书治要》上有一个故事，说在晋文公逃亡的时候，陶叔公总是跟从着他，结果晋文公回国之后，三次行赏却没有封陶叔公。陶叔公就跑去见咎犯，说："我跟从君主逃亡已经十三年了，面色都变黑了，手足也长了老茧，可是现在君主返回国家，行赏三次也都没有轮到我，这是为什么呢？是君主把我忘了吗？还是我有什么大的过失呢？"咎犯就把这句话告诉了晋文公，晋文公说："哎！我怎么会忘了这个人呢？"他说："能够用道使我的精神专注，用义来说服我，使我的名声得以显扬，使我成为德才兼备的君主的人，应该受到最高的奖赏；以理来规范我，以义来劝谏我，使我不能够为非作歹的人，应该受到次一级的奖赏；那些勇猛强壮的勇士，有难在前，他们就冲锋在前，有难在后，他们就在后断后，使我免于祸难之中，我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到三等的赏赐。他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吗？能够为人效死的人，不如保全这个人的生命；和人逃亡的人，不如保全这个人的国家。在三次行赏之后，就应该轮到有劳苦功绩的人了，而在有劳苦功绩的人当中，陶叔公应该列在第一位，我怎么敢把他忘了呢？"

在中国古人看来，对于臣子的功劳是认德不认利。虽然他跟着君主

到处逃难，而且奋不顾身地保卫君主，但是比不上那些用道义来劝说君主、为君主出谋划策、而不使君主逃难的人。所以第二种人，就是在君主有过失的时候，能够犯颜直谏、纠正君主过失的人。这种“致其身”，使君主能够防患于未然，不犯这个错误，这是更加值得奖赏的。

历史上犯颜直谏的臣子特别地多，特别是在《群书治要》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在《吕氏春秋》上就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楚文王得到了茹黄狗、宛路箭，这是非常有名的狗和箭。他得到了这样的狗和剑之后，就到云梦泽去打猎，三个月都不回来，后来又从丹地得到了一个美女，每一天和美女在一起，从此一年都没有去上朝。

这个时候太保申就对他说：“先王曾经占卜说，让我做太保是一件很吉祥的事，而现在您的行为应该受到鞭刑。”楚文王就说：“能不能变换一个方法惩罚我呢？”也就是说，能不能不给我施行鞭刑呢？太保申就说：“我继承的是先王的法令，不敢废除，如果你不受鞭刑，我就等于废除了先王的法令，我宁愿获罪于大王您，也不愿意获罪于先王。”楚文王听了之后就说：“那好吧！”于是这个太保申就把席子拉过来，让楚文王趴在上面，然后又把五十根细细的荆条绑在一起，跪着把它放在了楚文王的背上，如此做了两次，楚文王就说：“既然都有鞭笞的名誉了，你不如痛快淋漓地、名副其实地打我一顿好了。”太保申就说：“我听说对于君子，能让他感到羞耻就足够了，对于小人才需要让他感到疼痛，如果让他感到羞耻，他都不改变自己的行为，让他感到疼痛又有什么帮助呢？”太保申说完之后，就站起身出去了，请求楚文王把他处死。楚文王就说：“这都是我的过失，太保您有什么过失呢？”楚文王也被太保这种忠诚、冒死犯颜直谏的心打动了，于是他就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把太保申重新召回来，杀了茹黄狗，折了宛路箭，把丹地的美女也放回去了。从此励精图治，一心一意地治理楚国，最后他兼并了三十九个国家，使楚国的地盘得以扩大。而能够有这样的成就，也都是因为太保申犯颜直谏的结果。

历史上的这些忠臣，确实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劝告君主，不要让他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所以在《易经》上说“王臣謇謇，匪躬之故”，人

臣之所以能够忠厚老实，犯颜直谏，去进谏他的君主，不是为了自身的安危，而是想匡正君主的过失。如果君主有过失，这就是危亡的征兆，而看到君主有过失不去劝谏，那就是轻视君主陷于危亡的境地，忠臣是不忍心这样做的。

这就告诉我们：要做一个“致其身”的忠臣，就要能够犯颜直谏，能够纠正君主的过失。在《政要论》上说：“贤人君子，不忍观上之危，而不爱身之殆。”贤人君子，不忍心看到他们的君主处于危殆的境地，所以他不关心自己的危难。“故蒙危辱之灾，逆人主之鳞，及罪而弗避者，忠也，义也”。所以他们蒙受危难受辱的灾祸，揭开人主的龙鳞，即使有罪也不愿意去避开，全是一片忠义之心。我们看唐朝太宗之所以能够重用魏征，就是因为他每一天读《群书治要》，手不释卷，他明白什么样的臣子对自己对国家是有帮助的，所以犯颜直谏也是尽忠的一种方式、一种表现。

《说苑》上也记载着魏文侯的一个故事。有一次魏文侯和诸位大夫在一起坐着，他就问：“你们看，我是什么样的君主？”群臣都说：“您是仁德的君主。”但是轮到翟黄的时候，他的回答很直接，他说：“您并不是一位仁君。”魏文侯就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呢？”翟黄就直接说：“你去征伐中山国的时候，把这个中山国打下来了，没有把它分给您的弟弟，而把它分给了您的长子。从这件事我就知道，您并不是一个仁德的君主。”结果这一句话把魏文侯给触怒了，就把他逐出了厅堂。轮到任座的时候，魏文侯又问他：“你看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啊？”魏文侯这样一问，任座回答得很巧妙，他说：“您是一个仁德的君主。”魏文侯就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任座回答说：“我听说君主仁慈，他的臣子说话才会很直接，可以犯颜直谏，刚才翟黄的言语，非常直截了当，不惜触怒您的龙颜，所以从这一件事上，我就知道了，您是一个仁德的君主。”他说得多么地巧妙、多么地婉转。魏文侯听了之后觉得有道理，他说：“嗯，说得好！”又把翟黄给召进来了。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魏文侯这个人也很难得，他明理，能够知错就改，接受谏言，只要臣子说得有道理，他都会认真接纳。

《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上也说：“夫佞邪之言，柔顺而有文；忠正之

言，简直而多逆。”邪恶的、巴结的言语都是很温柔的，很好听的，投其所好的，让你听了之后很痛快，很愿意接受；而忠正的言语却是很简洁、很直接的，而且可能和你的心思不相符合。所以一般的人都喜欢听谄媚巴结的言语，而不喜欢听犯颜直谏的言语，所以做一个忠臣确实很不容易。如果你能够说真话，为了国家的安危，为了百姓的福祉去犯颜直谏，很可能自己的禄位就保不住了，还讨领导不喜欢。能够致其身的臣子，确实不是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是给我们讲的这一句话。

“致其身”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和平时期，能够竭尽全力地、全心全意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就是“致其身”。领导交给我们的工作任务，我们能够尽心尽力地，竭尽全力地加以完成，又有效率、又有质量，这也是“致其身”。

当然，中国人讲责任和义务都是相对的，臣子要“致其身”，君主就要对属下有仁慈之心。当然我们学习这句话，不是讲君主应该怎么做？当领导应该怎么做？而是教我们怎么样当被领导的下属，怎么样当臣子的。而且在中国古人看来，一个人尽好自己的本分，不以对方是否尽本分为前提。比如说大舜、闵子骞的孝行，他并没有要求他的父母怎么样对他，他只是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儿子，就应该孝敬父母，父母对自己还不满意，说明做儿子的孝道没有尽到。做臣子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是做属下的，领导交给我们一份工作，我们就要尽心尽力地完成，让他放心，不以领导怎么样对我们为前提。但是中国人强调“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对领导而言，属下对他不够忠心、不能够尽心尽力，他要反省自己。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公司遇到了问题，遇到了瓶颈，员工就去罢工，示威游行。做老板的应该反省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韩国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的员工不仅没有上街游行，还把自己的积蓄拿了出来，交到老板的手上，他们还说：“这些年来，我们之所以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都得益于您对我们的关爱，所以企业遇到瓶颈，我们愿意和您同舟共济、共度难关。”我们看到这样的感人故事，做领导的就应该反省自己：为什么这样感人的一幕没有出现在我的公司呢？为什么我的员工要去罢工、示威游

行呢？一反省才知道，我们没有起到君、亲、师的作用，换一句话说是我们没有按着孔子的教诲去做，没有爱民如子、视民如伤。韩国的员工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举动，因为韩国人把中国文化继承得最好，而且力行在他们的生活中，运用在他们的管理上，所以他们有这样的结局不足为奇。

中国人讲一个领导者应该起到“君、亲、师”的作用，被领导者应该竭尽全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恪守本分，这层关系才能处理好。不要求对方，首先应该要求自己，这就告诉我们“事君，能致其身”。

后面还有一句话：“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个我们讲得也比较多了，在这里我们再举几个例子。汉代的时候有两个人，张劭和范式，是朋友，他们同在太学读书，感情很好，读书完了之后，各自拜别，要回自己的家乡，他们就约定在两年后的今天，范式要去拜访张劭。两年之后，张劭就对母亲说：“今天我有一个朋友范式要来拜访我，要多准备一些饭菜来招待。”这位母亲就说：“那是两年前的约定，而且我们的两家，相隔千里之遥，他会不会来啊？”张劭就说：“我这个朋友，非常诚信，他一定会来的。”母亲看他说得这么肯定，就准备好饭菜，结果到时候范式果然来到了。他们两个朋友之间这样地讲求信用，感情也会越来越深，交情也会越来越好。像我们古人这种诚信的故事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比如春秋战国的季札，季札是吴国的公子，他要去出使鲁国，在途中路过徐国。徐国国君就宴请他，招待他，在吃饭的过程中，徐国国君的眼睛就盯着他身上的配剑看，配剑是出使别国的信物。古人说：“视思明，听思聪。”季札一看，就明白徐国国君的心意了，他心里想：“等我完成了出使任务从鲁国再返回来，路过徐国的途中，我就把这剑赠送给徐国的国君。”他这样想了一下然后就去出使鲁国了，在完成出使任务回来的路上，又路过徐国，才知道徐国的国君已经过世了。但是，季札仍然信守承诺，来到徐国国君的墓前，把剑就挂在他墓前的树上。他随从的人员看了就感觉到很奇怪，说：“公子啊，这句话您没有说出来，又没有答应要把这个剑赠送给徐国的国君，你又何必如此呢？再说，即使你答应过他了，

他现在都已经过世了，你又何必这样做呢？”季札回答：“虽然徐国的国君过世了，但是我心已经许诺了，我不能够违背自己的心意。”于是坚持把这剑挂在了树上，送给徐国的国君。

中国古人的这种诚信确实不仅仅是对自己说出来的言语信守承诺，就是连自己心里许下的诺言，没有说出来的，别人不知道的，他都能够信守承诺。这个信就达到了这种程度。“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与朋友相交往，你言语做事都很守信，才能够受到朋友的信赖，在社会上处事待人接物才会事事顺利。这个就是讲的“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最后一句，“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虽然他说自己没有学过，我也认为他已经学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学问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把五伦关系处理好。能够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夫妻和睦、朋友诚信，能够忠于领导、君主。能够把这五伦关系处理好，才是我们学习的最基本的目的。

中国古人学习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不是学了很多的知识技能，结果自己为人处事、待人接物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就失去了学习的意义。所以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为人着想，看到别人的真正需要，这是最重要的学问。这个学不仅仅是学习书本，生活中待人接物、为人处事的点点滴滴，都是在学习。所以我们前面讲了“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是我们主修的课程。而学习经典文献是助修，原因就在于此。

《颜氏家训》上有一段很好的论述。“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陵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

这一段话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我们学儒的人是一个很好的警惕。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学习，目的是为了求得长进，可是我见到有人读了

十几卷书后，便自高自大，欺侮长者，轻视同辈，这样别人自然像对仇敌一样恨他，像对鸱枭那样讨厌他，像这样求学，其实对自己没有好处，还不如不学。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充实自己，以弥补自身的不足；现在求学的人是为了向别人炫耀，只能夸夸其谈。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利益他人，推行自己的主张，以造福于社会。像孔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仁爱学说，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使自己好的学说，能够为国君所用，造福社会、利益人群，这才是他周游列国真正的目的。现在求学的人是为了自身的需要，增长自己的才干，以求做官。学习就像种果树一样，春天可以赏玩它的花朵，秋天可以摘取它的果实。什么是花朵，什么是果实？讲论文章，就是好比赏玩春花。就像我们讲《论语》，讲道德，学习传统文化，这都是在赏玩春花。真正的学问是什么？看这个人真正有没有修养，就是能够把自己所学的，落实在生活之中，也就是他的德行、为人处事、待人接物都能够有提升，能够把五伦关系做好，尽到本分，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我们现在搞儒学的人，用儒家的学问来写文章、写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硕士学位，评教授、评职称、评博导，能不能评上呢？当然都能够评上。但是与自己的待人处事，没有任何的关联，所以仍然是生活在痛苦和烦恼之中。比如说，为人没有尽到孝敬父母的责任，父母对他抱怨；夫妻不能和睦相处，甚至还吵上法庭；朋友之间没有信义；对领导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这些就不是真正的学问。最后，修身力行，这好比摘取秋果。所以为什么说能够孝敬父母、尽忠职守、忠于领导、能够和朋友相交诚信的人，虽然他说自己没有学习，我们还说他已经学了，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能够把这些运用在生活之中，这才是真正的学问。所以我们从这里也看到了，古人求学的目的和我们现在求学的目的是很不一样的。古人先要学做人，把五伦关系处理好，尽到做人的本分，然后才学一技之长，为国家，为社会谋福利，这个学习的次序才是对的，按照这样来教育，社会才能够和谐。

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这一章有两种讲法，第一种断句是这样的，“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这是一层含义。下一层含义是“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君子不重则不威”，“重”是庄重，“威”是威仪。意思是说君子不庄重则没有威仪。“学则不固”，孔安国注：“固，蔽也。”就是蒙蔽的蔽。焦循《论语补疏》引《曲礼》郑康成注：“固，谓不达于理也。”焦循认为“不达于理，是为蔽塞不通。蔽塞，不达于理，所以不庄重。求学则不蔽塞，故云学则不固。”

“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这一段是讲怎么样学。郑康成注解说“主，亲也”，“主忠信”就是亲近忠信之人，以忠信之人为师。学必须有老师，还需要有同参道友。“无友不如己者”，“如”在古代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取的理解是作“似”字解，像的意思。“不如己”就是在道德修养方面不似我。比如说我讲求孝悌忠信，他不讲求孝悌忠信，和我就志不同、道不合，这样就不能结交为友。“无友”这个“无”，古代的文章文献中写作“勿”。“无友不如己者”，就是勿与我道不同之人为友。一般人有了过失自己不知道，必须要亲师择友，亲近老师，选择朋友，他们能够给自己指正过失，知道自己的过失之后改正过失。“勿惮改”，这个“惮”就是“难”的意思。是说有了过失不要难于改正，这是第一种讲法。

第二种讲法，断句是“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意思是说君子不庄重则无威仪，学则不坚固，这个“固”就不是解释为“蔽”了，而是解释为“坚固”，那么怎么样使这个学坚固呢？必须以忠信为主，这个“主”也不解释为“亲”了，解释为“以……为主”。皇侃《注疏》这样解释的：“忠信为心，百行之主也。”所以学以忠信为主，才能够坚固。学得坚固才能够庄重而有威仪，那么下一句话就是“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这个讲法和前面的讲法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看第一种讲法，我们一句一句解释一下。“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汉代扬雄《法言·修身》提出做人应该取四重，“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言语庄重就可以为人所效法，所以在《弟子规》上告诉我们言语很重要，“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也就是说我们言语中那些黄色的笑话，还有欺骗人的话，不诚信的话，都是要避免的。我们看到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在吃饭的时候，交谈的时候都以讲黄色段子为荣、取乐，让人感受到这个领导就不受人尊重了，所以做人，言语特别重要。

古人还有一句话说“力贱得人敬，口贱得人憎”，一个人很愿意出卖自己的力气帮助别人，他就会受人尊敬，而一个人言语过多，说得又不是很妥当就会遭人厌恶。在《易经》也说：“吉人之辞寡。”吉祥的人，言语都是很少的，因为他的心地很清静。“躁人之辞多”，心情烦躁不安的人，思虑很多的人，表现出来言语也很多。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在言语上要庄重，要谨慎，《弟子规》上还有一句话，对我们现代人也有重要的启示，那就是“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如果我们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去宣传、宣扬，结果别人知道了，对他非常地痛恨，也无形中为自己埋下了祸根，而且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去宣扬揭露，这本身也是一种恶，并不是一个很有德行的人能够做出来的。

所以中国古人告诉我们要厚道，而厚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隐恶扬善。把别人的善事，比如说孝亲的、友爱兄弟的、朋友诚信的、尊敬师长的事例多多地宣传。而对于那些儿女不孝敬父母的，兄弟互相争讼上了法庭的，朋友不相诚信的，夫妻同床异梦的现象不要到处大肆地宣扬。

像现在最近网络上，也有很多通过网络揭露腐败的现象。我们一开始也觉得这是一种打击腐败的很有效的方式，叫网络监督，舆论监督，但是久而久之这样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一个廉洁的人从来不贪污受贿的人看到了，会想：你看现在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是升官就要发财，那我这样清廉，廉洁有守，一分钱都不贪污，我和这个社会的人已经格格不入了，我已经好像不太适应这个社会了；那个贪污了几万块钱，十几万

块钱的人一看，哦！他们都贪污了上百万、上千万、上亿，那么他会怎么想呢？你看我是小巫见大巫，我贪污的还不够，所以这个廉洁的人没有受到鼓励，他还觉得自己和社会不能融入了；而那一个贪污的人、受贿的人，廉耻心还没有提起，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要贪更多的钱。所以中国古人在宣传上讲究“隐恶扬善”，这样从长远上看对社会风气是很好的。同样地，我们把那些不孝父母的，父母没有人照管的事经常搬上电视，结果那个还能赡养父母的人会说：“你看世风日下，这个时代一般的人都不赡养父母了，或者把老人送到养老院了，我还能和老人同住，那我已经是很孝的孝子了。”他的孝心没有被提起来，所以他还认为自己做得不错了。所以这些宣传从长远上看并不利于社会风气的好转，所以一定要多把那些真实的，身边感人的小事多多地搬上银幕，久而久之，才能够把人的向善之心提起来。像山东电视台有一个很好的节目，叫《天下父母》，现在也有一个节目叫《孝行天下》，这些节目都是让人看了很感动，把人的孝心，感恩之心都能够提升起来。这是告诉我们言语很重要，要学会说话，当然在讲话的艺术上也要有所讲究。

有人说，要多说鼓励的话，少说批评的话，因为鼓励激发潜能，批评造成隔阂。特别是我们在现代社会接触传统文化，学习《弟子规》已经很晚了，不是从小就学习。虽然学习了其中的一句话，说：“闻誉恐，闻过欣，直谅士，渐相亲。”就说我们听到别人的赞誉要战战兢兢，为什么呢？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有真才实德配得上别人的夸赞；当听到别人给我们指正过失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欢喜地接受，甚至对人家感恩戴德，这样做久了之后，那些敢于给你说真话的朋友就来到你的身边了，就像我们脸上有一个黑点，别人告诉你，说你脸上有个黑点，快把它擦了，这样的话你会对他很感谢，因为没有让我到大庭广众之下去露丑，但是我们在做人上、德行上、做事的方式上有不足之处，别人给我们指正过来了，希望我们有更好的提升，我们却不能够诚心诚意地接受，还在心里与他起了对立，起了抱怨，这就不是正确的态度了。

虽然我们学习了《弟子规》，但是因为从小养成的习惯是喜欢听夸

奖，所以我们在为人处事的时候要非常讲究说话的艺术，也就说虽然我们是好心好意，确实是利益对方的这种心，但是你说出的话也要让对方容易接受，所以《弟子规》上说当父母有过失的时候，你要劝导他，这是你的责任。但劝导还有劝导的艺术，要等待父母心情好的时候，你去劝谏他们才比较容易接受。本来这个人就很不高兴你又去指正他的过失，那他就更加不耐烦了，而且在指正别人过失之前，还要先美其长，先要赞叹一下他做得好的地方，然后再很委婉地说："如果这件事再怎么样做那就更完美了。"这样的话人家也就比较容易接受了，所以言语很重要。可能我们说了一句不经意的话，虽然是无心的，但是别人听了之后就耿耿于怀，彼此产生了隔阂，所以古人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我们给别人说一句宽慰的话、理解的话、体谅的话，别人在寒冬腊月心里都感觉到温暖，但是我们恶语伤人，特别是在盛怒之下，说了一句过分的话，结果人家就耿耿于怀，久久不忘，把人家的心伤了。虽然你以前帮助了他很多，很无私，很讲义气，但是就因为这一句话，把多年的朋友情义都给伤害了。这是告诉我们"言重则有法"。

下面一句说："行重则有德。"就是我们行为很庄重，就显得很有德行，特别是我们在《论语》上看到孔子教导颜回，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我们的视、听、言、动都要符合于礼的节度，不符合礼的行为，坚决不要去做。如果我们做事不符合礼，像很多领导干部做了违反礼的行为，被人家拍下来，把这些不雅的视频都传到网络上，一日之间就让自己身败名裂，甚至还受到盘查，锒铛入狱。这都是因为自己的行为不谨慎。

"貌重则有威"，也就是我们的容貌庄重，让人看到有威严。在容貌上孔子也教导我们说："色思温，貌思恭。"表情要很温和，虽然很温和但是很恭敬，这样的话让人觉得你很好接近，但是又不敢造次，对你非常地敬畏，他既想亲近你，又不敢造次，因为你有威仪，这样就是恰到好处了。

"好重则有观"，"好"就是嗜好，像古人从小学习的是琴棋书画，这

些嗜好都很高雅，则有可观，这是教导我们在言、行、貌、好，都要学其庄重。古人也告诉我们“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这是告诉我们庄重对人是很重要的，“事勿忙，忙多错”，都是导致出差错的原因。

《礼记·玉藻》也说：“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足容”，就是我们行走的时候一定要稳重，像大象那样四平八稳，非常地缓慢。所以曾国藩教导弟子说要：“走路慢，说话慢，吃饭慢。”这都是教导孩子培养一种稳重的作风。我们在党校里工作，经常看到有很多的领导出来散步，我们看到这些领导散步的时候都是非常地缓慢，踱着方步，四平八稳，这样就让人感觉到很庄重而且值得信赖。所以古人说：“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一个人有定力、有这种稳重，发生了什么样的意外事件，他都能够知道如何去应对，不至于慌里慌张的。“手容恭”，在坐的时候，我们上次讲了要手敛，“起脚敛手”，走路的时候也不能够甩着胳膊，手容要恭敬。

“目容端”，“端”就是端平的意思。平视，我们说一碗水端平，那就是不要向上向下，或者显得很轻视傲慢，或者显得很不屑等等。这都是告诉我们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眼神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里有傲慢，或者有刻薄，这些表现在眼睛上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跟你说话的时候，眼睛就咕噜咕噜地乱转，说明这个人的心思很复杂，心眼也很多，在不停地动。

“口容止”，“止”就是话不要说太多，要适可而止，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个字都不要说。孔子也说言语要该说的一定要说，不该说的一定不要说。

下面讲“声容静”，“声”就是我们说话的声音，不要大声喧哗像噪音一样。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声音很大，比如说坐在飞机上第一排的人的声音都可以让最后一排的人听到。到一个中餐馆彼此交谈的声音是乱嚷嚷的一片，但是我们去西餐馆的时候，就没有发现这一种表现。

很多人出国的时候就是因为失礼，所以不受外国人的尊重，这是我们礼仪之邦的人们特别值得深思的。比如说有人到了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结果发现在圣母院上就有一个用汉字写的标语："请勿大声喧哗。"告诉我们中国人说话声音太大了，所以特意用汉语写了一个标语，专门给中国的游人看的。而我们想一想，能够到巴黎圣母院去参观的人在我们中国是属于哪一个等级的人呢？那都是有钱、有权的人，或者是有学问的人，一般的底层的老百姓还去不了巴黎圣母院参观。但是这样的人出国门之后都受到提醒，说明我们礼仪之邦的礼已经丧失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中国在历史上之所以被誉为"礼仪之邦，华夏之族"，那可不是我们自己封给自己的，是因为我们这些邻邦的人到中国来访问，看到人与人之间相处彬彬有礼，特别地和谐，他们很羡慕，所以回去之后就向自己的国君报告，这些国君就特别喜欢派使臣前来学习。最后就把中国的皇帝尊称为"天可汗"，叫天底下公认的领导者，把中国称为"礼仪之邦，华夏之族"，说明我们特别有礼貌。但是这个礼被批判得体无完肤，说是吃人的礼教，人们对它生不起信心了，结果现在我们行为没有规范，受到外国人的嘲笑，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件事。

"头容直"，"直"就是不要歪斜，要端正。像我们在跟人说话交流的时候，不要把头侧在一边，这就是没有做到头容直。"气容肃"，就是我们喘气的声音不要太重，要给人一种肃静的感受。"立容德"，站立的时候不要倚在一边，一定要端正，这样给人一种有德行的感受。"色容庄"，就是色容要庄重，"色思温，貌思恭"。这些做到了，就会给人一种有威仪的感受，别人就不敢轻慢你。那么这是我们讲"君子不重则不威"。

《群书治要·春秋左传》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有一个大臣叫赵盾，他的君主晋灵公非常不守礼，过着很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且非常地过分，结果赵盾作为臣子非常忠心，屡次犯颜直谏，但是晋灵公都不听，而且他还觉得很烦，结果就生起了一个恶念，想派一个杀手把赵盾给杀了。

杀手在一天凌晨的时候到了赵盾的家里，看到他卧室的门已经打开了，赵盾已经准备好要去上早朝。因为时间还尚早，所以他就穿着朝服，恭恭敬敬地坐在那里闭目养神，结果他这种恭敬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这个杀手。他想：一个大臣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独处的时候，还能对国君表示这样的恭敬，这个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如果我把国家的栋梁给杀了，那我是一个不义之人，但是我又接受了君主的命令要杀这个大臣，如果我不完成自己的使命，我对君主也是不信；如果我真把这个国家的栋梁杀掉了，也是对整个国家人民不义。所以他想来想去最后就自己触槐自杀了。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有恭敬的态度，居然可以起到这样的感化作用，而且也确实保全了生命。所以这些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做人应该从言语、行为、容貌、嗜好等方面都要庄重。

下面一句说："学则不固。"焦循认为"不达于礼，是为蔽塞不通"，因为你对礼不通达，对道理不明了，所以你才会蔽塞不通，不能够融会贯通，所以一定要去求学。为什么呢？因为古人所学的都是圣贤教诲，都是这些圣人，对于天道、自然的规律，社会人伦关系的道理，这些经验教训的体会，写在了经典之中。如果一个人常常学习经典，就会融会贯通，并且理上明了了，心才能够安宁，所以中国古人说"理得心安"，所以特别要重视学习历史经验。

在这一方面《群书治要》给我们做了一个历史经验的总结。唐太宗也给我们做出了一个能够善于借鉴历史经验的、好学的榜样。唐太宗十六岁就开始从军打仗，从军十多年也没有时间去学习圣贤经典，对于如何治国这些道理都不是很明了，所以二十七岁做了皇帝，知道创业很艰难，但是要守业更加艰难，所以他就派魏征、萧德言、褚亮等大臣，把唐朝以前的经、史、子中的治国理念概括出来，编辑了这一本书。唐太宗非常地好学，读《群书治要》手不释卷。他说："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

唐太宗看了魏征《群书治要》之后，认为编得太好了，取材广博，但是道理非常地精要，是他从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些经史子之中的

治国理念，教训方法确实他是没有听说过。这本书呢，使他能够借鉴历史的经验，遇到事情不迷惑，知道应该如何处理。所以他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赞誉，也正是这一本书帮助他奠定了“贞观之治”的理论基础。而这一本书后来到唐玄宗的时候也是受到了重视，它帮助唐玄宗也是创造了一代盛世。后来这本书传到日本，日本两代盛世的创建也是靠这一部书。这就是告诉我们能够学习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而《群书治要》中所记载的这些理论方法都是通用的道理。

在唐太宗对《群书治要》的评论中，他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可见他学习非常有收获，是每一天津津有味地手不释卷地读，都不忍心把这个书放下了，从这本书中他知道了社会风俗教化的根本，也知道了治国理政的源头，知道治国理政到底应该从哪里入手了。换句话说治国理政，构建和谐社会的经验，都被总结在《群书治要》这本书了。所以我们领导者只要把这一本书读透了，经、史、子的智慧经验也就全部了解了。所以好学很重要，可以给我们节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少走了很多的弯路。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领导干部本来可以平步青云、一帆风顺，但是却锒铛入狱，最后官职也丢了，还落得了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没有学习总结历史经验。不好学因而不明礼，不能够通达。比如说现在的贪官出问题都出在两件事上，第一就是贪财，第二就是贪色，而中国古人对这两件事都教导得很清楚，像古代必读的四书之一《大学》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财货是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那将怎么样呢？一定会以不正当的方式给败散掉，这是必然的规律。古人认为财富为五家所共有，并不是赚到你手就是你的了。这五家就是官府、水灾、火灾、盗贼，还有不肖子孙。所以读了圣贤书，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像曾国藩那样做到“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公家的一文钱都不敢挪作私用了，因为知道赚到自己手里，也还会以不好的方式给败散出去。对于这个道理，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写了一本书叫《保富法》，告诉我们如何保持富贵，甚至三代以上都不衰，所以我们看到在历代能够使

家风承传三代以上的人都熟读《论语》，熟读圣贤教诲，有严格的家教、家规、家训。

比如说我们去山西到乔家大院参观，我们感触就非常地深。乔家大院的亭子上都写的是《论语》中的教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们还有一个雕塑，专门讲的是孔子在杏坛讲学的图景，说明他们对孔子的教诲非常地重视，也正是重视这样的教诲才使他们的家业承传三代以上而不衰，而且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子弟。不是像我们现在出了很多的富二代、官二代，做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为社会大众所不齿，所以学是很重要的，因为读书才能明理。

还有人很贪色，“贪色”，在《尚书》上也有这样一句话“天道祸淫最速”，天道就是自然的规律。自然的规律给那些过分的人、贪色的人、淫乱的人带来灾祸是最迅速的。所以中国古人说色字头上一把刀，这一把刀可以把你所有的功名利禄削得平平的，让你一无所有。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些官员因为贪色而事情败露，最后从领导位置上被拉下来，那都是因为没有读圣贤书所导致的。关于这一点，大家如果想深刻地了解，可以看一看《安士全书·欲海回狂》，这本书告诉我们如何去戒色。古人说，“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所以你学了就不会蔽塞了，就会融会贯通，读书明理，理得心安。

下边讲“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我们要学必须要有条件，第一就是有好的老师，“主忠信”，就是我们要亲近忠信之人，以忠信之人为师。“无友不如己者”，不要交结那些和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的人。比如说我们学传统文化，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结果他没有学习，去教你怎么骄奢淫逸、吃喝玩乐，这样的朋友就不能够结交。“不如”就是不似，不像我的人。“过则勿惮改”，有了过失不要紧，就是怕自己不认错，不能够改错。“惮”就是难的意思，畏惧改过。

关于改过，《了凡四训》这本书给我们讲了怎么样改过，为什么要改过，改过有什么效验，这本书对我们帮助很大。《了凡四训》告诉我们改过要发三种心，第一就是羞耻心。这一段话说得非常好，“但改过者，第

一要发耻心。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耻者，莫大乎此。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此改过之要机也。”他说改过，第一就是要发羞耻心。那什么是羞心呢？他说让我们想一想，古代的那些圣贤人比如说孔子、孟子，他们和我们同是丈夫，同是人，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百世的师表，到今天不分种族、不分国家的人，一提起他们还非常地尊敬，愿意向他们学习。而我自己却是一身瓦裂，“瓦裂”指有一种陶制的器皿，一旦破碎就一文不值。

“耽染尘情”就是过分地放纵感官的享受和欲望的满足，“私行不义”，偷偷地做着一些不仁不义的事情，这样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就一天一天地堕落为禽兽，还自以为是，妄自尊大。世上最让人可羞耻的事无过于此了。所以孟子说，“耻”这个字对于一个人而言太重要了。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人有了羞耻心，就可以“知耻近乎勇”，进而改过自新，成为君子、成为贤人、成为圣人。如果把这个“耻”字给忘掉了，最后就一天一天地沦落为禽兽而不知不觉。这个是改过最关键的一点，要有羞耻心。

第二，要发畏心，就是要有畏惧之心。有了畏惧之心，才有诚敬。“畏”就是害怕的意思，当然害怕中也含有恭敬。在过去，弟子对于父母师长都有一种敬畏之心，就是学生对于老师，儿女对于父母都有敬畏之心。敬畏就是既敬爱、又害怕。如果没有了这种畏心，就不知道行为要有选择，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这样的话，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现在这个社会知耻的人少了，有敬畏心的人少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没有人教了，特别是现在的学校教的都是知识、都是技能，做人的教育没有了。而古人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立一个国家，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最重要的，而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地增长，过失得以挽救，德行一天一天地提升。所以如果我们的教育能秉持这样的理念的话，那么人都能够有羞耻心、有畏惧心，才不敢去做违法乱纪

的事。中国古人不仅仅畏惧世间的法律，他也畏惧天理，结果我们现在的人，法律有很多的漏洞，他们不畏惧了，更不相信天理，所以是“无法无天”，五伦关系怎么会不紊乱呢？所以重要的就是教育，教育才能够让人有畏心。当然在我们现代社会中，社会舆论的监督，也越来越严密，所以一个人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经常会被网络曝光，这个也要让人感觉到敬畏。所以言行举止都要小心谨慎，要能够对自己负责，否则确实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到后面才后悔，悔之晚矣。

第三，就是要发勇心，也就是说勇猛精进改过自新。《了凡四训》说：“人不改过，多是因循退缩。”“因循”，就是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没有恒心、没有毅力，更谈不上意志，没有一定要把这个过失改正。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改过，觉得何必活得那么辛苦呢？退缩，就是退转，有的人一开始也下决心，但是遇到了困难，遇到了不好的缘分受到了障碍。有的人发心要戒烟、戒酒，如果没有人去诱惑他，又有好的朋友在旁边经常提醒，他可能还能够戒上半个月、一个月，但是如果遇到了不好的缘分，那些朋友叫他去吃吃喝喝，大家又在一起抽烟，他就很难再把握自己，所以就因循退缩了。

《了凡四训》说：“吾须奋然振作，不用迟疑，不烦等待。”这就是勇猛心的样子，要振作起来绝不怀疑，立刻就改，不要说等到明天，等到明年，或者再给自己规划一个改正的日子。“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如果你等到明日的话，那就永远也改不了，所以应该立刻就改，当下就改，像《了凡四训》上所说的：“小者如芒刺在肉，速与抉剔，大者如毒蛇啮指，速与斩除，无丝毫凝滞。此风雷之所以为‘益’也。”这就告诉我们小的过失就像刺在肉里的刺，赶快把它剔除，大的过失就像毒蛇咬了我们的手指，立刻就要把指头斩断，否则毒扩散了就会导致生命有危险，所以人改过就像这样坚决毫不犹豫，当机立断，这是风雷之所以为益。风雷是《易经》上的卦，取它的相就是风吹雷动。春天的现象是万物生长，所以它有益叫“风雷益”。在此地，它是形容当机立断，勇猛改过的这种象状。如果一个人具备了这三种心：羞耻心、畏惧心、勇猛心，那么有过就会改，

改过之后就会有一些效果。

改过除了发这三种心以外，还有三种方法，在《了凡四训》上也给我们讲了。第一是从事上改，比如说，我们前日喜欢生气，以前喜欢邪淫，喜欢说谎话，从此以后就不邪淫了，不说谎话了，不生气了，这是从事上改。但是从事上改，却不明理的话就比较难了，所以《了凡四训》上说："善改过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在没有禁止这个事的话，首先要明白道理，比如说，你喜欢生气，你就要知道"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别人做错了，我们不高兴，生气了，这不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吗？所以"怒"字，上面是一个奴隶的"奴"，下面是一个"心"字，告诉我们什么叫"怒"？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心变成了奴隶，已经不能掌控自己的情绪了，所以才会发怒。在《黄帝内经》上还说"怒伤肝"，盛怒之下会伤到自己的肝脏，确实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得不偿失，而我们没有一次是因为发怒把问题处理好的，那我们为什么不变得聪明一点，换一个方法呢？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了，每一次都提醒自己，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制止、克服这个爱发怒的毛病，这是从理上改。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心上改。

《了凡四训》上说："过有千端，唯心所造，吾心不动，过安从生。"这就是很大的道理了。所有的过失都是心的一种产物，如果心不动，不产生恶念、邪念，总是一片慈悲，然后善意地对人，这样就不会产生这些过恶了。所以凡是恶念、邪念一产生的时候，当下就能够意识到，能够把它制止，这是最高明的改过的方法。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不怕念起，就怕觉迟。"不怕你念头生起了，邪念恶念生起了，一般的人因为以前的习气而不生这些恶念，确实是很难的，但是这些恶念生起并不怕，怕的是你让它连续不断，你一生起就马上有觉悟，马上能够转念，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种种诸过，不必逐类寻求"，种种的过失，不必要一桩一桩地去想、一桩一桩地去改，凡是有恶念生起的时候，马上就能意识到，当下就能够制止，这是最好的。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一心为善，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一心为善就是念念为了利益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不是为了自私自利，这个就是一心为善。如果你还夹

杂着私利在里边，这个善念就不纯，就有夹杂。“正念现前”，“正念”是相对于邪念而言的。“邪念”当然就是错误的观念、见解、行为，这种错误就会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有伤害。这是告诉我们，从心上改是最高级的改过方式。

如果我们具备了这三种心，又学会了三种改过的方法，认真地去力行，那过失就很容易能够改正了。关于怎么样改过，改过的方法，还有效验，大家可以看一看《了凡四训》这一本书。

蕅益大师对这一句话就解释得更深了。他说什么叫“自重”呢？“期心于大圣大贤，名为自重。”也就是说你不期心于成圣成贤，就谈不上自重，你不发这样成圣成贤的心，就是不尊重自己、不自爱。所以“戒慎恐惧，名为威”，一个人如果自重自爱又希圣希贤，他的行为自自然然地就能够做到“戒慎恐惧”，这个就叫威。他的心行就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事事小心谨慎，这就叫威，他的这个解释就更进了一层。后面他又说：“始觉之功有进无退，名为学固。”就是说你开始觉悟了，知道自己要改过自新，要成圣成贤，保持这种初发心不变，勇猛精进，然后时时检点自己，是不是自重自爱，是不是具足威德，是不是真正觉悟了，这就是学固。

“倘自待稍轻，便不能念念兢业惕厉，而暂觉还迷矣。”“自待稍轻”就是指稍微一不觉悟，稍微一忽视，放逸自己，对自己随便一点，马虎一点，对自己的责备少一点，就“不能够念念兢业惕厉”，也就是说不能够战战兢兢地勉励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就放纵了，必定是“暂觉还迷”，虽然短暂地觉悟了，但是到最后还是迷惑了。所以修行这么难，时间这么长，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觉悟了，有的时候又被迷惑了。

“此直以不重为根本病也”，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这一句话给我们道破了，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重，不知道要以成圣成贤作为自己的目的，这个是我们做学问的大病。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身难得，正法难闻，中土难生。”我们今天已经有机缘闻听了正法，也生在中国，能够了解古圣先贤的教诲，应该特别

地珍惜，应该像古人那样立志要成圣成贤，这才是真正的自重。后面他讲“忠则直心、正念、真如；信则的确知得自己可为圣贤，正是自重之处。既能自重，更须亲师取友，勇于改过，此三皆对症妙药也。故知今之悦不若己，惮于改过者，皆是自轻者耳。又主忠信是良药，友不如、惮改过是药忌”。这一句话就是说他对“主忠信”的理解非常地深。“忠”，他解释为“直心，正念，真如”，也就是说“直”就是要离谄曲之心。“正’则无妄，正念就是不是妄的，不是假的。真心从哪里做起呢？司马光先生教我们从不妄语做起，也就是说我们不欺骗人，真诚到极处，这样久而久之就能够体会到什么是直心。如果以诚心诚意来对待一切人，就是觉、自重、威，所以我们要存成就别人的心，利益别人的心，绝没有丝毫害别人的心，然后就能肯定相信自己在这一生就可以成圣成贤。

当然我们要能够做到自重自爱，还需要有好的老师，选择好的同参道友，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改过，这些如果都具备了，这一生成圣成贤就能够有保证了。但是如果不忠信，还要和那些不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有过还难于改正，这就是不自重了。

下面就说如果有人难于改过，害怕改过，不肯改过，就是自轻之相。这就是告诉我们，“忠信是良药”，而“友不如，惮改过是药忌”，这些都是我们最大的忌讳。如果我们有不似自己的人，又害怕改正过失，即使是忠信，这个忠信也是有限的，成就也是有限的，为什么呢？因为还有这些障碍在。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我们首先看一看《论语讲要》，孔安国注：“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归于厚矣。”这几句话我们一句一句地来看。

“慎终者，丧尽其哀”，这里边的“慎”，是谨慎的意思，“终”是寿终。古人曰：“老死曰终”，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人生半路没有活下去叫夭

折，不叫“终”。《礼记》也说：“君子喻终，小人喻死”，也就是说一个有德行、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过世的时候才称为“终”，这个“终”有功德圆满的意思。小人就是指德学都不具足的人，他们的过世就叫死。

“父母寿终时，须依丧礼，谨慎治理丧事。父母之丧，以哀戚为重。故孔安国云，‘丧尽其哀’。”那么这里就谈到了父母过世、寿终的时候，要谨慎地办理丧事。“谨慎治丧”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就是要以哀戚为本，孔子曾经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礼在古代有很多种，有吉礼、凶礼、军礼、殡礼、嘉礼，那么礼“与其奢也，宁俭”，他把这个“礼”提出来，和后面的“丧”相对应，显然是指丧礼以外的其他礼，就是举办这些礼的时候与其搞得很奢华、很浪费，宁愿节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这个“易”就是和意的意思，和顺而有条理。也就是说在丧礼之时，把事情办得很和顺、很有条理、面面俱到，还不如以哀戚为本，这才是抓到了根本。

在《吕氏春秋》上，对于丧礼的来源有这样一段阐述，它说孝子尊重自己的父母，当然也包括父母疼爱子女，这种情意甚于肌肤之痛，所以当父母过世的时候，也包括儿女过世的时候，自己所敬重的、所疼爱的人死后如果被抛弃于沟壑，按人的感情都是不忍心的，所以才有了安葬死者的礼仪。“葬”就是藏起来的意思，这是孝顺父母的儿女应该慎重的。这是告诉我们，“丧礼”是出自孝子敬爱父母的一片心，并不只是外在的礼仪，所以应该以哀戚为重。历史上有很多孝子，在父母过世的时候，就发自内心地悲伤，非常地感人。比如《群书治要·晋书》就记载着孝子吴隐之的故事。

吴隐之早年父亲过世了，他就和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对母亲，非常地恭敬、谨慎，而且特别注重和颜悦色地孝敬母亲。当他母亲过世的时候，吴隐之非常悲伤，结果哭得几乎丢了命。而他的邻居就是韩康伯家，韩康伯的母亲是一位很贤明的老人，每一次听到吴隐之服丧哭泣的时候，她本来要吃饭，这时就放下筷子和这个孝子一起哭泣；每当自己要织布的时候，听到了吴隐之悲伤的哭声，她也放下梭子和他一同哭泣。她对

自己的儿子韩康伯说："如果你以后做了官，一定要选拔像吴隐之这样孝顺的人。"后来果然韩康伯到吏部去做官，他就依从他母亲的吩咐，把吴隐之提拔起来了。

吴隐之被提拔后，成为清廉的官吏，被封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他去广州赴任的过程中，听说在广州的北边有一个泉水叫"贪泉"，父老乡亲都说如果有人喝了这个泉里的水，即使是清廉的官吏也会变得贪婪。吴隐之到广州赴任的时候，首先就到贪泉舀一口水喝了下去，并且赋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我听说古人说，这里边的水只要喝一口，即使廉洁的人也会改变廉洁的作风，成为贪官。试想让伯夷、叔齐这样廉洁的、有操守的人饮了这贪泉的水，我想他们终究不会改变他们廉洁的节操。从此以后，他更加重视道德、注重操守，非常地廉洁，南方没有受过伦理道德教化的蛮夷之地，也受到了他的感化。当时的皇帝是晋安帝，听说了这件事，就下诏书嘉奖吴隐之。在诏书中这样写道："广州刺史吴隐之孝心过人，处在可以贪得的官位上，却是非常清廉。他把自己的俸禄平均分给九族的亲属，即使家庭很富裕，家人仍然很节俭，穿着粗布的衣服，力戒奢侈、务求俭约。朕觉得这样的作风，应该受到嘉奖，所以可以把他晋号前将军，赐钱五十万，赐谷千斛。"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就可以看到，古代的读书人确实能够做到"慎终"，到母亲过世的时候哀泣得几乎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发自于内心的对母亲的怀念。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谨慎治丧"首先以哀戚为本。另一层含义，"谨慎治丧"就不可以厚葬，为什么不可以厚葬呢？《吕氏春秋》上就给我们讲了这个道理。它说："慎终，就是以生者的心为死者去考虑，而用生者的心为死者考虑，没有比不要让死者不被惊动、坟墓被挖掘更重要的了。"就是说为死者考虑，最重要的是不要让死者的墓被人给挖掘，而要死者不被惊动、坟墓不被挖掘，最重要的就是使掘墓者无利可获。下边它做了这样一个比喻，说如果有人在墓前安放一个石碑，上面写着这样的话："墓中有珠玉、玩物，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挖，挖了一定大富。"人们一定会讥笑他，觉得他很愚蠢。但是世间人实行厚葬，

其实这种做法和这个人的做法是一样的，自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也就没有不被挖掘的坟墓。

从历史上看，灭亡的国家数不胜数，所以古代的大墓没有不被挖掘的，但是世人还争相营造大墓，岂不是很可悲吗？在尧舜禹古圣先贤那里，都以节俭的方式被安葬，并不仅仅是吝惜费用，也不仅仅是厌烦辛劳，更重要的是为死者考虑。古圣先王所憎恶的，就是让死者受辱，而有人挖掘坟墓就必定会使死者受辱。但是如果实行俭葬，他的坟墓就不会被挖掘，所以先王的安葬一定会从俭。口说敬爱、怜惜死者的人很多，但是真懂得敬爱、怜惜死者的人却很少。所以宋国没有灭亡，而宋文公的东冢就已经被挖掘了；齐国没有灭亡，而庄公的庄公冢也被挖掘了。在国家安宁的时候尚且如此，又何况百世之后、国家灭亡了呢？所以孝子、忠臣，不可不明察此理。“爱之反而害之，欲使其安稳，反而使其危及”，不就是说的这种厚葬的行为吗？所以《吕氏春秋》就告诉我们，谨慎治丧就不可厚葬，因为如果实行厚葬，里面埋了很多的金银珠宝，这些很值钱的东西，就会被挖掘，使被葬的人受辱。

但是，为什么世间还有很多人愿意实行厚葬，厚葬之风屡禁不止呢？《吕氏春秋》也给我们说出了原因。它说现在世俗大乱，安葬越来越奢侈，这不是安葬的本意，不是替死者考虑，而是生者以此相互夸耀。它说：“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辱，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也就是说，安葬得越奢侈，家人越以此为荣，而安葬得很节俭，就会以此为羞耻。不以有利于死者为适，而只把他人对生者的诽议和赞誉作为要事，这不是慈亲孝子的心意呀！这就是说葬礼本来应是对过世的人表示哀痛、表示纪念，但是反而因为厚葬侮辱了死者，这就是爱之反而侮辱了他们。

历代那些开明的皇帝、皇后熟读历史，所以在过世的时候都命令或者是立下遗诏要俭葬。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汉文帝，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汉文帝过世的时候，特意颁发了诏书。他在诏书中这样写道：“我听说天下万物出生之后，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的常理，万物的自然规律。

如今世人都喜欢生，而不喜欢死，厚葬以致破产，长期服丧以致伤害身体，我很不赞成这种做法。我很不贤德，没有什么可以帮助百姓的，现在过世了，又让他们长期服丧痛哭，使百姓父子经过几个寒冬酷暑依然哀伤，伤害老幼的心灵，减少了饮食、断截了祭祀，从而更加重了我的不德，怎么对得起天下人呢？我有幸承继帝业，以渺小之躯依托于天下各诸侯王之上，已经二十多年了。依赖于天地的神灵、社稷的福祉，使得四境之内安定、宁静，没有战争。我因为不够聪敏，经常战战兢兢，害怕做错事，而辱没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年长月久之后，害怕不能始终保住地位。现在竟然有幸尽享天年，又得以被供奉在高庙之中，以我的不圣明，这样我已经觉得很好了，还有什么可悲哀的呢？命令天下官吏和百姓，诏令到后只哭到三天，就都除去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等等活动。还要通告天下，使大家都明白我俭葬的心愿。霸陵的山川保持原样，不要有所改变。而后宫的妃嫔从夫人以下直到少史，都遣散回家。”所以我们看汉文帝在世的时候生活就很简朴，做事很恭敬，到过世之后还特地下诏书要实行俭葬，不要劳烦百姓，这都是我们效法的榜样。

我们都知道唐太宗是一代贤君，在一个伟大的男人之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他的皇后长孙皇后就是这样一位很贤德的人，她多次劝谏唐太宗，让他不要重用外戚。在临终的时候，她还这样地请求，也包括要俭葬。她说：“臣妾的本家，有幸因为婚姻而成为外戚，既然不是因为有德行而被选应，就容易走到危险的地步。要想长久地保全，就千万不要授予他们重要权利，只以外戚俸朝请就很庆幸了。妾活着既无益于时事，死后不可厚葬多费，而且埋葬就是隐藏，要让人看不到。自古以来的圣贤，都推崇节俭薄葬，只有无道之士才大建陵墓、劳费天下，被有见识的人所讥笑。只请求能够依靠山势而埋葬，不需要堆起坟头，不需要用棺椁，所必须的器物用具都使用木、瓦的，节俭薄葬送终就是不忘记臣妾。”这是对唐太宗的嘱托。

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这些圣明的君主、皇后，他们也是熟读史书，知道要实行薄葬，不可以奢侈浪费，这也是谨慎治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不要因为面子的问题，把丧事搞得很隆重，结果埋了很多金银珠宝、昂贵的东西，最后导致的是这个坟墓被盗，使亡者不得安宁。这是“慎终”。

下面我们看“追远”。“追远者，祭尽其敬”，也就是说在丧葬之后，需依礼依时追念祭祀。追远的“远”字有两种含义。第一，就是父母过世已经久远。第二，就是祖父母以至历代祖先距今已远，皆需追祭以时，祭祀的时候毕诚毕敬。因此孔安国注云：“祭尽其敬，子子孙孙如是追远祭祀，视为不忘本。”

在《礼记·祭统》上，对祭礼的来源也是做了一段这样的阐述：“夫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中生出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祭祀并不是外在的事物要求人这样做的，而是来源于内在，也就是说由内心发出的对父母祖先的感念之情，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祭礼。所以这个祭礼既然是从内心所产生的，就要有诚敬之心。所以在这里它讲到了“追远”要依礼依时追念祭祀，在《礼记·祭义》上也有明确的要求：“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古人告诉我们，祭祀不能搞得太频繁，如果频频地祭祀，人们就会感觉到厌烦，厌烦了就会失去恭敬之心。同时祭祀也不能太少，如果太少，就会使人感觉到怠慢，怠慢就会使人淡忘。所以中国古人是顺着天时季节的变化来举行祭祀。春天的时候举行“禘祭”，秋天的时候以新下来的谷子举行“尝祭”，所以一年有两次春秋祭祀。在秋天的时候，霜露覆盖了大地，君子踏霜而行，自然有一种悲凉之感。这种悲凉之感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思念着故去的亲人。到春天雨露滋润大地之时，君子踏露而行，自然会有一种惊醒的感觉，思念故去的亲人，似乎他们也像春天一样重新回到了人间。在祭祀的时候，用快乐的心情把亲人迎回来，再用悲伤的心情将他们送走。所以在古代的祭礼中，对如何祭祀、什么时候祭祀，以及祭祀的次数、频繁程度都有明确的记载。

那么除了要依时依礼之外，最重要的也是表示出内心的诚敬之心，那就是毕诚毕敬，孔子在《论语》上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在祭祀的时候如果是祭祀父母祖先，就好像父母祖先在面前一样恭敬；如果祭祀

神明，就像神明在面前一样，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这都是“祭尽其敬”的表现。

在《礼记·祭义》上，对于祭祀之前、之中、之后应该如何做，也都有明确的要求。比如说在祭祀之前，就要进行斋戒，对内要调摄内心，使内心清净，把心从外物上收回来；对外要隔绝一切交际娱乐、房事等等的活动。斋戒时把心思要集中于思念死者生前的起居、住所、音容笑貌、饮食习惯、志趣、爱好，这样专心斋戒三天，就能将要祭祀的先人活现在心中。所以古人看一个人斋戒的时候那种恭敬的程度，就知道他思念亲人的程度如何了。像现在我们见人都行礼、都鞠躬，我们看一个人鞠躬的态度，也能看出一个人内心的恭敬了。虽然同样都是鞠躬，但是从鞠躬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是应付了事，还是有内心的恭敬。古人从一个人斋戒时候的表现，就能知道他思念亲人的程度是如何了。

那么祭祀时，就是祭祀的当天，进入宗庙之后，仿佛会从牌位上看到亲人；在牌位前礼拜之后，行不周旋，敬奉贡品；走出门来心中肃然，亲人的音容笑貌好像就在眼前；出门之后侧耳倾听，仿佛能够听到亲人深深的叹息声。所以对亲人的孝敬之情，是亲人的面容不曾离开过眼前，亲人的声音不曾离开过耳边，亲人的心志爱好不曾离开过心间。也就是说，他所思、所想、所听、所看的，都是先人的音容笑貌、爱好情趣、饮食习惯等等。这样又怎么能有丝毫的不恭敬呢？所以君子对父母在世的时候是恭敬地赡养，去世之后虔敬地祭祀。

“追远”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祭祀祖先、祭祀父母，所以在古代，家家户户都有祠堂，祠堂里供奉的是祖先的牌位。每到春秋祭祀的时候，全家的人召集在一起，除了行这些礼仪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讲述祖先的德行，也就是要念念不忘过去父母祖先的功德。他们对国家民族有什么贡献，要常常地思念、常常地追怀，这样祭祀的时候才更加能够显示出诚敬之心、思慕之心。所以我们对自己家族的历史就不能够不了解，如果对自己家族的历史都不了解，就表示不出恭敬之心，这也是一个人忘本的表现。

除了祭祀之外，追远还有一个的重要方式，就是修家谱。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家谱，而这个家谱每一年都要修，叫修家谱。比如说这一年之中，有哪些人过世了，哪些人出生了，每一年都要整理一次。而一个人一生的行迹，也就是他对国家、民族、人民的贡献，也都以简要的方式记载在家谱之中。所以有了家谱之后，就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远祖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原因到这个地方来定居的，一共传了多少代，历代祖先对这个地方、这个国家有什么贡献、有什么德行。这才称得上是追远。修家谱有什么好处呢？《礼记》上说“不娶同姓”，这个礼要求不娶同姓之人，所以恭修家谱就发现，你的父母就是两个姓，然后再往上去推，他的父母也是不娶同姓，那都是两个姓。这样以此类推，推到上面去之后，你就发现其实所有的姓都是一家人，中华民族确实是一家。而把这个家谱推上去之后，你就发现不是炎帝的子孙，就是黄帝的子孙，所以我们称为炎黄子孙，这个一家人的观念才有了。所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这绝对不是形容，通过修家谱才看到确实是一家人。

除了培养这种一体的观念之外，就是要学习祖宗的德行。在春秋祭祀的时候，家谱之上都记载着祖先的德行，哪朝、哪代、哪一个时候，出了哪一位有德行的祖先，他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贡献。我们作为他的后代子孙，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不能因我们的行为给我们的祖先抹黑。比如在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廉洁的官员叫杨震，他去赴任东莱太守的路上路过昌邑县，这个昌邑县的县令王密就是被杨震举荐出来做秀才的。王密听说自己的恩人路过此地，就趁着夜色带了十斤黄金要送给杨震。杨震就叹了一口气，他说：“唉，我了解你，知道你有德行、有才学，把你推荐出来，但是很可惜呀，你却不了解我。”王密还以为杨震怕这件事有人知道才不愿意接受的，所以他就说：“恩公啊，我这样做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报答您的知遇之恩。这件事没有人知道，您就放心地接受了吧！”结果杨震听了之后怎么回答的呢？他说：“这件事有天知、有神知、有你知、有我知，这是‘四知财’，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所

以他就拒不接受这“四知财”。他的后代子孙都秉持他的廉洁作风，所以他的儿子、孙子、曾孙都非常贤达，都做到了三公的位置。

我们想一想，杨震的子孙在每一年祭祀的时候，都要知道他们家的祖先不收“四知财”，他们还为自己祖先的这个典故写了一个匾额，放在他们家的房屋之上，就把房屋取名为“四知堂”。所以凡是后代子孙从这一个匾额下走过的时候，都知道他们家的祖先不收“四知财”，那他们怎么敢去贪污受贿、违法乱纪呢？所以中国的反腐倡廉教育，从古代家庭之中已经开始了。不仅仅是杨家的祖先有杨震这样廉洁有守的官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历代祖先之中，都有像杨震这样廉洁有守的人，甚至还有比他更加有德行、对民族国家贡献更大的人。那么我们每到祭祀的时候，常常来宣讲祖先的德行，这对后代子孙是一个警醒、一个教育，念念不忘祖先的德行，念念不敢做那些不好的事而给祖先抹黑。这就是讲“追远”非常重要。

在我们的历史上也可以看到，好多的皇帝确实是按照圣贤的教诲去做。比如说在《雍正皇帝圣谕图解》上面，就有一个明仁宗的故事。明仁宗在做太子的时候，有一次明成祖到了南京，退朝之后就召见东宫官杨士奇，问道：“你辅佐太子已经很长时间了，对他了解得也很清楚了，这个太子的为人到底怎么样呢？”杨士奇就回答说：“殿下仁孝恭敬非常人可比。”明成祖听了之后说：“你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些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呢？”杨士奇回答说：“在每逢祭祀的时候，太子一定会把所有的祭器亲自检查，不把这个事委托给别人。比如说去年按照惯例要举行祭祀的时候，正好太子得了痛风病，结果医生告诉他要服药发汗才可以。太子说‘如果要吃药发汗，怎么可以亲自参加祭祀呢？’左右的人就说：‘那可以让别人代替您参加祭祀啊！’殿下就回答说‘皇上把祭祀的使命交付给我了，我又派遣别人来代替，这不是违背君父的命令吗？’所以他就带着病亲自去参加祭祀。祭祀才完毕出了一身的汗，结果这个病就痊愈了。再比如，每每给皇帝进俸食物、其它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太子一定会亲自检查，亲自把这个封条封好，然后才派遣他们去出发，不敢轻易地把这些事

委托给下人去做。”

明成祖听了之后就说：“这些都是为人子应当做的事情。”杨士奇说：“自古以来的大圣大贤，都是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到了极致而已。”也就是说圣贤人也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只是毕恭毕敬地、认真负责地完成自己的本分而已，所以明仁宗“躬阅祭器”的故事，就给了我们很多的教育。皇帝对于祭祀这样地诚敬，也就能够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所以他当了皇帝之后，这个国家也治理得很好。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追远”。

下面一段，“民德归厚矣”，邢昺的书上说：“言君能行此慎终追远二者，民化其德，皆归厚矣。言不偷薄也。”这句话就是说，如果君上能够把慎终、追远这两件事做好了，人民会被他的德行所感化，民风自然归于淳厚而不刻薄。这个“偷薄”，“偷”也是刻薄、不厚道的意思。“偷薄”加起来也是刻薄、不厚道的意思。《论语讲要》上说“圣贤施教，以孝为本。《孝经》，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此章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即是讲孝道”，就是说厚德是由行孝而来，这也是告诉我们，民风之所以不淳厚，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没有教民众孝道，所以要想使民风淳厚，必须从孝道这个根本入手。

《礼记》上也说：“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君子施教，对外教他要尊敬尊长，对内教他要孝敬父母。那怎么样教才能教好呢？《说文解字》上解释教是“上所施，下所效”，所以身教胜于言教，道德教育不同于知识的教化，一定是身教才能够有效果。所以下面它接着讲：“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于上，则不以使下；所恶于下，则不以事上。非诸人，行诸己，非教之道也。”这就是告诉我们，君子侍奉君主，首先要身体力行，对于上级的做法让自己感觉到不安的，就不要用这样的方法来指使下级；厌恶下级的做法，比如说做事不负责任、推卸责任等等，这样的做法是上级所厌恶的，那就不能够以它来侍奉自己的上级。反对别人的做法自己却去做，这不是教化的正确方法。

我们的道德教育为什么不得力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时候我

们把道德教育变成了说教，只用言语去教导，而没有身体力行，把该做的给表演出来，所以下属都会有逆反，我们也经常说，这个学生怎么说都说不听，所以教是正己化人，把自己端正了才能够让别人感化。我们要教属下孝道，教学生尊敬老师，但是自己的父母、老师都已经过世了，怎么样能够身教呢？下边它就讲到重点了，“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君子的教化一定要从根本上来教起，从孝道来教起。那怎么教呢？“顺之至也，祭其是与？”也就是说能够把孝敬之心体现到极致的就是祭礼啊！为什么要实行祭礼呢？就是在上的人能够定时追念他的父母、他的祖先、恭敬他的老师，下面的人才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孝道。这就是说把孝心体现到极致，就是祭礼的作用。

“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所以说祭礼是教化的根本。“祭而不敬，何以为也？”如果举行祭祀而心无恭敬之念，为什么还要去祭祀呢？这就给我们指出了重点，也就是说我们去教导属下、教导学生，自己必须有恭敬之心。这个恭敬之心不是装出来的，不是为了教育而表现的，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诚敬，才能够让人受到感化。

比如说有一个孩子的父亲学了《弟子规》，所以他知道教儿教女，先教自己，自己孩子对自己不恭敬，是因为自己对父母不恭敬所导致的。所以有一次，这位父亲就对孩子的爷爷说：“爸爸，一会儿我带着儿子下来的时候，我要对你行鞠躬礼。”这个爷爷吓了一跳，因为儿子平时对他都不是很恭敬，结果现在还要对他行鞠躬礼，他就说：“不必了、不必了。”这个父亲说：“我是为了教你孙子的。”这个爷爷一听，既然是为了教孙子，那就配合吧。结果这个父亲带着自己的儿子走下来，走到他父亲的面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说：“爸爸您早，我们要去上班了。”然后带着儿子就出去了。结果这个儿子拉开车门刚上车，坐定之后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爸爸、爸爸，你刚才的那一个躬是鞠给我看的。”所以父亲鞠一个躬只是为了教育儿子，但没有内心的诚敬，虽然有这个形式，但是也被自己的儿子给看破了。所以自己是不是有内心的恭敬，都表现在言谈举止之中，是骗不了人的。

这告诉我们，上行而下效，正是通过举行祭祀才教导人民心地的厚道、不忘本。所以要想使国家太平、社会和谐，必须从孝道入手。要使人心厚道，就要提倡慎终追远，恢复祠堂、提倡祭祀，还要修治家谱、绍述祖德，倡导不忘本、知恩报恩、饮水思源。那么在祭祀和修家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讲述祖先的德行，这样人民才会为自己祖先的德行、君主的德行所感化，民风自然归于淳厚了。

这里讲到“圣贤施教”，“圣贤”不仅仅指儒家，也包含了道家和佛家，也就是说儒释道三家的教育都是以孝道为本。在雍正皇帝的《上谕》中，雍正皇帝就说儒释道三家“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说三家都是从一个根本上产生出来的，他们教育人民的方法可以并行而不违背。那么这个“原”是什么呢？那就是孝道。在《观无量寿经》中讲到“净业三福”，就是修学净宗的人必须要有一个基础。三福的第一条就是“孝养父母，奉侍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所以孝亲和尊师是修行净业的第一个条件。印光大师也说学佛的人应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敦伦尽分”就是使你的伦理关系协调，能够把自己在伦理关系中的本分尽到。所以做儿女的，就要孝敬父母；做丈夫的就要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做妻子的要有德行，把儿女教育好；做领导的要担负君、亲、师的责任；做被领导的就要能够竭尽全力地完成自己的本分、工作；朋友之间要讲诚信；长幼之间、兄弟之间要讲友悌，这就叫“敦伦尽分”。

在佛经上也有这样一句话：“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在唐朝以后，小乘的经几乎没有人学了，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却出现了很多有德行的高僧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在中国，小乘经典虽然不学了，但是这些出家人都有儒、道的基础，都是熟读儒家的经典、道家的经典，所以他们已经奠定了小乘的基础，儒家、道家的经典甚至比小乘还高一层。所以虽然不读小乘经，但是因为有学儒、学道的基础，他们再深入大乘佛法才有成就。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人不理解这个道理，好高骛远，就喜欢读那些大乘经典。大乘经典都是枝、叶、花、果非常好看，但是没有根，就像插在花瓶里的花，虽然很好看，但是没过几天就凋萎

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我们忽视了“孝亲”的这个根本。

佛教有四大菩萨，其中有一位菩萨是地藏菩萨，为什么取名叫“地藏菩萨”呢？是因为地藏菩萨教导我们，人的心性、心地是一个宝藏，无限的宝藏，怎么样把这一个心地的宝藏打开呢？这个“地”就是地基、基础的意思，必须靠孝亲尊师才能够打开心地的宝藏，所以地藏菩萨供在那里，我们一看到就提醒自己，要孝亲、尊师，这是供养佛像最重要的道理。观音菩萨就代表了大慈大悲，把对父母、老师的孝敬推而广之，恭敬来到我们身边的一切人，这就是观音菩萨所代表的大慈大悲；文殊菩萨代表的是智慧，也就是说要孝亲尊师、对人慈悲，必须要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的话，本来很慈悲，但是却被人欺骗利用，结果就是“慈悲多祸患，方便出下流”，这样就是没有智慧的表现；普贤菩萨代表了行愿，把你的孝亲、尊师、慈悲、智慧运用在为人处事、待人接物之中，这就是普贤菩萨的意思了。所以我们供奉这些塑像，是为了提醒我们做到孝亲、尊师、慈悲、智慧，还有力行,并不是给他供上一些水果、点心，然后再祈求他们保佑自己升官发财，这样就是把教育变成了宗教、变成了迷信。所以佛教的修学也离不开儒家的基础。学习《论语》也是非常必要的。

在历史上记载着一个杨黻的故事。杨黻要学佛，于是就到四川去拜访无际大师。他在路上遇见一个僧人，问他要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去寻访无际大师，因为听说他很有学问、很有道德，所以要去向他学习。这个僧人就告诉他要寻访无际大师，不如去找佛。杨黻就问，那佛在哪里呢？这个僧人说你往回走吧，如果你看到一个披着被子、倒趿拉鞋的人，那一个人就是佛。于是这个杨黻就往回走，一路上留宿了很多的客栈，总希望碰到一个披着被子、倒趿拉鞋的人，都没有遇到。所以很失望地回到了家里，结果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就敲门，母亲听到儿子回来了，非常地高兴，结果也顾不上穿衣服、顾不上穿好鞋，匆匆忙忙就出来给儿子开门。她打开门，杨黻一看他母亲，披着被子、倒趿拉着鞋，突然恍然大悟，明白了这个僧人的教诲，其实母亲就是佛。从此以后他好好孝敬自己的母亲，母亲活到了八十岁送祭而逝。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佛在心中莫远

求”，“在家孝父母，强胜远烧香”。如果远烧香的目的是为了自私自利、为了自己升官发财，那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在家能够认认真真地孝敬父母，这才是培养自己知恩报恩的仁慈之心。

所以蔼益大师在《四书蔼益解》上说：“厚，是本性之德。复其本性，故似归家。”他就解释这个“厚”，人性本有这种仁厚之德，“人皆可以为尧舜”，“途之人可以为禹”。所以恢复人的本性就像回家一样，所以说“民德归厚”。这一句解释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礼之用，和为贵”，“礼”就是讲规矩，不能乱。但是在讲礼、讲规矩的同时，应该以和为贵。中国古人通常用“体、相、用”来解释一个事情。这个礼的“体”，本体就是敬；礼之“相”是仪，就是它的表现形式；而礼之“用”主要就是和；也就是说这个礼的根本，是从内心表示出的一种恭敬心。内心的恭敬怎么样通过形式来表现出来呢？那就是外在的仪，“礼仪”的“仪”。所以通过各种规矩、仪式，才能够表达出内心的恭敬。

比如说《弟子规》就是最基本的礼。有一句话说，“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这个“长者先，幼者后”，就是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表达出自己对长辈、父母、老师的恭敬。现在我们不讲这个礼了，饮食、坐走都是孩子先吃，孩子先走，这个孩子就成了小公主、小皇帝，没有感恩之心了。不管父母为他付出了多少，他都认为是天经地义。这个孩子教不好，就是因为没有了这种礼仪，表达不出内心的恭敬和感恩。

像我们学《弟子规》，学传统文化的人，见面都要行鞠躬礼。很多的现代人看了之后，就不理解，说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行鞠躬礼。现在都讲平等了，为什么我要给你鞠躬啊！因为人生来都有一种傲慢之心，即使是贫穷得如乞丐的人，他躺在大街上，看到那些豪华的车子走过，都会：

“哼！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我们想一想，即使贫贱到乞丐地位的人，还有一种傲慢之心，更何况我们一般人，更何况有一点学问、有一点官位、有一点财富的人，这个傲慢之心，会很容易表现出来。所以通过这一个鞠躬礼，把自己最尊贵的头给低下去，折服了一个人的傲慢之心。现在的人学西方的平等，觉得这个礼很难接受。实际上他不知道，通过这一个礼，培养了一个人内心的恭敬。日本人把我们中国人的礼，学得淋漓尽致。现在日本人见面，人与人之间问好，都是九十度的鞠躬礼，结果日本的民族被称为世界上形象最好的民族。原因就是他们把我们的礼保持下来，一直运用在生活之中。而我们却把自己的礼给丢掉了。

青岛有一位企业家，给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们企业学习《弟子规》，结果上上下下都是尊敬有加，见面都是九十度的鞠躬礼。有一次外国的企业家来参观他们的企业，一进门的时候，门卫就恭恭敬敬地给这个外国人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这个外国人进来参观之后，就非常地感叹，觉得这个企业治理得这么好，气氛这么和谐。他就问：“你们企业有多少人是日本人呢？”老板很激动，因为他很爱国，他说：“我们企业没有一个人是日本人，我们全都是中国的员工！”那个外国人就不理解了，他说：“那我进门的时候，你们那个门卫所行的礼，可是一个标准的日本人的礼呀！”这下老板更激动了，他就把《弟子规》找出来了，他说：“你看！我们《弟子规》上就有这样的说法，‘揖深圆，拜恭敬’，而这个《弟子规》都是总结古圣先贤的礼，说明我们这个鞠躬礼自古有之！”日本人的礼全是从中国人那学来的，但是遗憾的是在我们中国看不到礼仪之邦的这种景象了。

学礼要到哪里去呢？你要到日本那里，到韩国那里，寻找中国人的礼。所以有人去日本留学，到了一些非常偏僻的乡村，那里的民风特别淳朴，真的是古代人所说的好像有点大同世界的味道。他们卖菜的人，不需要有人在那看着，只是把这个菜写上一个标签，标注菜多少钱，然后把一个装钱的罐放在旁边，谁想买这个菜自己放钱，自己找钱就好了。结果怎么样呢？没有人拿了菜不付钱的。这是靠什么取得的效果呢？这就是靠

礼教化的结果。

我们去斯里兰卡访问，斯里兰卡的总统上台去演说的时候，下面坐着大大小小的官员，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起立表示尊敬，而总统演讲完下台要回到他的座位上，路过这些大臣、这些官员身边的时候，他们也是不约而同地起立，表示尊敬。所以让我们想到了《论语》上的一句话，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就是我们侍奉君主，侍奉领导，很讲究礼，讲究尊敬，但是现在一般人都不讲究这个礼了，如果我们讲究这个礼，就好像是在谄媚，巴结领导者。所以出于这种原因，我们也就不讲究礼了，结果对领导的恭敬心就越来越差，这就导致了"君不君，臣不臣"。所以依靠礼来治理国家，才能够使社会和谐。

历代有增有损是礼的仪式，表达形式，但是它表达的恭敬心是不变的。礼的作用也很多，比如说它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折服人的傲慢心，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最重要的是"以致和"，就是达致和谐为最可贵。有一位讲中医的人，就跟我说，他说："你知不知道最好的锻炼身体的方法是什么呢？你们是学传统文化的。"我说："很遗憾，我们传统文化学得不到位，所以也不知道最好的锻炼身体的方法是什么。"结果这个中医就说："最好的锻炼身体的方法，就是中国古人的拜祖先之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跪九叩首的礼。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当你把这个礼做下去的时候，从头到脚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环节都运动到了。特别是你经常叩头，颈椎要不断地往下低，颈椎就不会得颈椎病；你鞠躬的时候，要以腰作为轴，也不会得腰椎病。"所以我们现代的很多人，病的很多，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不行礼而导致的。所以古人的礼很多，见面就行礼，无形中就是一种锻炼。当然礼的作用有很多，但是它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达致和谐，所以这里边讲"礼之用，和为贵"。比如说我们彼此之间有一点小小的误会、小小的矛盾，结果见面之后，把这个礼一做，把这个躬鞠下去，内心的矛盾也就化解很多了。

《论语讲要》上这样写道："皇、邢二疏皆以'和'作音乐之'乐'讲。"就是皇侃和邢昺的注疏，都把这个"和"解释为音乐的"乐"。但是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说："和是礼中所有，故行礼以和为贵。"就是说这个"和"是礼本身所具有的，礼的作用、礼的目的就是和。所以行礼以达到和最为可贵。"皇、邢疏以和为乐，非也"，就是皇侃和邢昺的注疏，把这个"和"解释为"乐"，有点不妥当，所以我们不采取这种说法。

下面一句话"先王之道，斯为美"，这一句话告诉我们，礼是由谁来制定的，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必须遵循礼？"先王"就是指先代的帝王。"王"就是指圣人，而且还在君主位置上的，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制礼作乐。先王为政之道，就是制礼用和，通过制定礼仪制度，来达到和的目的。所以这个礼是由古圣先王所制定。《礼记》上对于礼是根据什么来制定的，也有一句阐述。它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也就是说古代的圣王是以什么来制定礼的呢，以什么作为依据的呢？就是以自然而然的法则和规律！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古圣先王用礼来承顺天地自然的法则，来调冶人的性情。所以对于治国者而言如果失掉了礼就会灭亡，得到了礼就会生存。而对于个人而言，如果失去了礼，他就不成其为人了。

古代人说"衣冠禽兽"，《礼记》就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你看这个鹦鹉能够学人讲话，虽然能够学人讲话，也不过是一只飞鸟而已；猩猩也很聪明智商很高，也会学人讲话。它虽然能够讲话，也不过是一只禽兽而已。现在的人不懂得用礼来节度人不合适的欲望和行为，虽然能够讲话，不也堕落得离禽兽不远了吗？也就变成了会讲话的禽兽了吗？所以礼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礼，我们就把他称为"衣冠禽兽"。《礼记》把礼的重要的社会作用，还比作水的堤防。如果人们认为水的堤坝没有用，把它废弃掉，一定会导致水灾泛滥。如果认为礼没有用，就像我们批判古礼是吃人的礼教而把它废弃掉，就会导致社会灾祸的产生。

下面它具体讲了一些礼废弃的结果。"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假如婚姻的礼节废除了，夫妇相处之道没有了，痛苦就产生了，而淫乱邪僻的罪行也就跟着多了起来；"乡饮酒之礼废，则长

幼之序失，而斗争之狱繁矣”，如果乡饮酒之礼废除了，长辈和晚辈的次序失去了，争斗的刑事案件就跟着越来越多了；“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矣”，祭礼都被废除了，臣下和子女对于君主，对于父母的恩义就会越来越淡薄，结果背叛死者，忘记生者，这样忘恩负义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背叛侵陵之败起矣”，聘觐之礼废除了，君与臣错位了，结果那些臣子背叛侵凌君主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这个礼确实是很重要。

我们举一个婚姻之礼的例子来说明，“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我们知道中国古人特别讲究婚姻之礼，在进行婚礼的时候，当然有很多的步骤：在将要举行婚礼之前的三天，女方三天不熄灯，男方三天不奏乐。为什么女方家三天不熄灯呢？现在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留下了很多的形式，但是因为内容大家不了解，就误以为它是迷信。

为什么三天不熄灯呢？因为再过三天，这个女儿就要出嫁了。趁着她还在家的时候，抓紧时间给以她做人妻、做人母的教育，教育她怎么样当好一个人的妻子，怎么样当好一个人的母亲。当然平时夫妻之间相处很和睦，表演给儿女看，儿女已经学得很多了。但是在出嫁前的三天要抓紧时间，彻夜不眠、不熄灯地给女儿这样的教育。

这一天，新郎要去娶妻，娶妻之前，他很早就起来祭祀天地，祭祀祖宗。为什么这么做呢？这就是提醒自己，娶妻生子并不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事，它关系到整个家风的承传，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他到了女方的家里，岳父岳母会非常郑重地，亲手把女儿交到新郎的手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提醒新郎官，从此以后我这女儿一生的幸福就托付给你了，你要对她很关爱。新郎就带着新娘跪拜岳父岳母，女儿感恩他们对自己的养育之恩，新郎也感恩岳父岳母给自己培养了一个贤内助。这一个礼节，其实都是能够体会到女方家父母的心情。你看这个女儿从小是爱如掌上明珠，看着她一天天长大的，现在她要出嫁了，要成为人家的妻子，这种心情实际上也是很复杂的。新郎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来感恩岳父岳母，也是让他放心，心中也会很宽慰。

这个女子坐上花轿之后，一定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把自己的香扇，从轿子的窗户口扔出去。什么意思呢？从前女儿在家的时候，是倍受父母珍爱，非常娇气。夏天稍微热一下，要拿扇子扇一扇，说这个天气好热呀！还有很多小姐的坏脾气。这一天要去做人妻、做人母了，就需要把这些娇里娇气的小姐习气随着这一把香扇给抛出去。她到了公公婆婆的家里，公公婆婆本来是在主人的位置上的，他们就从主人的位置退下来，退到了客人的位置上，而把这个儿媳妇，从主人的位置上迎了上来。什么意思呢？从此以后我们这一个家的幸福就托付给她了。要上孝公婆，中和妯娌，辅助丈夫，下教育好子女，这些事情必须有很深厚的德行才能承担好。

《易经》上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说女子的德行，应该效仿大地。有什么特点呢？你看我们把脏的东西扔给它，不干净的东西泼给它，它都毫无怨言，都没有拒绝，平等地接受。所以做女子的要效仿大地能够忍辱负重，厚德载物。所以女子的德行越深厚，她越能够忍辱负重，这个家庭才越幸福。那两个人要喝交杯酒了，这个交杯酒也喝得很有味道，他们拿了一个葫芦瓜切成两半，然后夫妻一人一半。什么意思呢？就是提醒夫妻两个人本来是一体的，不分彼此，不是像我们现在学的很多西方的“先进”的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婚前财产公证。两个人还没有结婚，就想到以后一旦要离婚，不要因为财产起了纷争，所以先进行婚前财产公证。我们看两个人还没有结婚，就已经想到了以后可能会离婚。这个婚姻怎么能够经营得好呢？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心想事成”，一个人经常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样的事情往往就发生在他的生活中。如果我们去深入调查追踪一下那些进行婚前财产公证的夫妻，看一看以后离婚的多不多，就明白了。这个道理真实不虚！所以中国古人的想法不一样，说两个人一旦结合就是一体的了，“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不分彼此。这一杯酒是甜的，葫芦瓜的丝是苦的，喝了这一杯酒之后，就意味着夫妻两个人要同甘共苦，彼此扶持，白头偕老，共度一生。喝完这个酒之后，还要把葫芦瓜拿绳系在一

起，挂在墙上。为什么呢？因为人都很健忘！把这个葫芦瓜挂在墙上，在以后的夫妻生活中，不要因为小小的磕磕碰碰，就忘了两个人结合时的初心，也就说两个人最初结合在一起时的那种发心。什么发心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坐在轿子上是这样想的，说："这下可被我逮着了，我一定搞得他们家鸡犬不宁！"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在结婚的时候是这样的发心。那都是什么样的发心呢？"这一下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终于可以两个人每天生活在一起，互相呵护，互相扶持，彼此关爱，白头偕老了！"所以把葫芦瓜挂在墙上，就是提醒两个人在以后的夫妻生活中，不要因为小小的磕磕绊绊，小小的插曲，影响了夫妻和睦相处的主旋律。

所以你看这个婚礼整个进行下来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都是提起彼此的责任感和爱心。现在我们不讲婚姻之礼了，视婚姻如同儿戏，有的人是上午去结婚，领了结婚证，下午就离婚了！现在更多的人向西方学习，男女根本不结婚了就同居在一起，好就在一起住；不好，就解散！这个夫妻之道相处就痛苦啦！而且邪曲不正的，放荡的行为就越来越多了！我们从这里就知道了古人设置这个礼，是防患于未然！就像水的堤坝一样，我们认为它没有用把它废弃了，结果就是物欲横流，人都活得不像人了！

讲完婚姻之礼，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古代的尊师之礼。我们知道中华文化能够承传，靠的是师道和孝道，所以中国古人对于"尊师重道"特别地重视，这在古礼中也有一些表示。比如说男子二十岁的时候，行冠礼，说明他成人了。同学朋友要送给他一个字，从此以后他的祖父母、叔叔伯伯、同学朋友都要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重，不能再称他的名了。他到皇帝那里去做官，皇帝要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重。只有他的父母可以一生称他的名，此外就是老师，可以一生称他的名。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老师的恩德和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给我们的是身命，而老师给我们的是慧命，所以对于老师特别地恭敬。在丧礼之中，父母过世要守丧三年。守丧三年，是为了报答父母三年的、不免于怀的养育之恩。老师过世呢？也要"守心丧"三年。也就是说你不用穿孝服，但是要从内心表达

出，对老师的感恩之心，常常回忆老师的教诲，不敢忘记老师的恩德。皇帝是一国之尊，他在接见群臣的时候，都是以君臣之礼来接见，但是他在接见老师的时候，就不能够以君臣之礼而是要以主宾之礼来接见。一个站在东面，一个站在西面。这就是提醒皇帝，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是老师永远是老师，他不是臣子。做皇帝的都能够这样尊师重道，所以上行而下效，整个社会才兴起了尊师重道的风气。

可见中国古代的尊师之礼也是非常地隆重。为什么要办得这么隆重呢？这都是教育！通过这些礼仪，表达出内心的恭敬。古人带着孩子去见拜见老师的时候，都是要带一些礼物，表示对老师的恭敬，不是说要去贿赂老师，多照顾照顾我的孩子。到了老师那里，先向孔子像行礼，父亲带着孩子行最重礼，当时的最重礼就是三跪九叩首的礼（现在的最重礼是三鞠躬礼），这个还不算，然后又请老师上座，老师坐下之后，父亲带着孩子对老师行最重礼。我们想一想，老师坐在上面是什么感受啊？那一定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人家的父母对自己这么样地尊重，这么样地信任，把这个孩子就托付给自己。那怎么能够不把这个孩子教好呢？他一定是尽心尽力，负责任地把这个孩子给教育好，生怕自己的德行能力不够。古人通过这一个礼表演给孩子看，就是说这个孩子一生中最尊重的人，就是自己的父母，结果他们对老师都如此地尊敬，他对老师的教诲怎么敢不听从呢？所以老师和家长一配合，这个孩子很容易受教。老师教孩子什么呢？老师教孩子要孝敬父母，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就很容易教好了。

我们现在对老师没有尊重之心，甚至老师把这个孩子多说了几句，说得重一点，父母还不理解，这个孩子回去告家长，家长就去找校长，校长再去找老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孩子在学校犯了错，老师也不敢给他指正过来。为什么不敢呢？

第一，如果学生接受不了，心里会怨恨；第二他还会告诉家长，家长关系又很广，还要去找校长，校长对老师批评指责，甚至还给上新闻曝光，说老师对孩子怎么样不好，谁还会讨这个没趣呢？所以，学生没有办

法教了！学生来到学校是为了混文凭，老师教导学生是为了挣工资，两个都是互相糊弄，所以“师不师”，学生也不学生了。所以这些告诉我们，不要盲目地去学习西方的这些所谓的平等。老师和学生怎么能够平等呢？平等是人格上的平等，但是在具体的事项上，表现是不平等的。这就是告诉我们，古圣先王都是以尊师重道来传承中华文化，孝道如果没有了，师道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吕氏春秋》上说，先王的教诲，没有比尽孝更荣耀的了，没有比尽忠更显扬的了。忠臣孝子是做君主的、做父母特别想要的；显荣就是能够得到好的名声，这是做人臣、做人子特别希望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做君主的、做父母亲的得不到忠臣孝子。而做臣子的，做儿女的也得不到想要的显荣。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不知礼义。《论语》上说“不学礼，无以立”，因为他没有学。没有学礼义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人教，所以才“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所以古圣先王没有不尊师重道的。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说这个人，无论有什么样的毛病缺点都没关系，只要他谦虚受教，这些毛病缺点都很容易改正。最困难的，最难教的一类人，是哪一类人呢？就是这一类特别地自以为是、傲慢、不把人放在眼里的人！认为自己都比别人强了，这样的人就很难受教，想帮助他都帮不上忙。当然这样的人，如果遇到他特别佩服的人，一心地跟着他学习，依教奉行，也是很容易转变，转变得也是很快的。这个就是说，找谁做自己的老师，也是很有学问的！就是找那个你最最佩服的人。所以古代的很多祖师大德都有这样的典故，这个人到这里来求学，两个人就开始聊天了，问了很多的问题，最后这个老师就告诉他了，他说：“你的缘分不在我这里，你到哪里去求学，一定会有成就。”因为这个也是他佩服的老师嘛，他就依教奉行，就去那里求学了。

结果过了几年，果然成就了。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在聊天的时候，这个老师就要问，你都看过谁的东西呀，都看过哪些书啊。在谈话的时候，他就会特别提到一个人，对某某人特别地佩服，这个老师就知道缘分不

在他这里，应该到哪里去求学，一定能够学有所成。因为那个人是他最佩服的人，所说的话他都会依教奉行，这个教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了。这就是告诉我们对谁有恭敬心就跟谁学习，最容易成就！

在《吕氏春秋》后面，还接着讲了一段话。它说现在的人，地位比不上古代的圣王，智慧更是不如古圣先贤，但是还不尊敬老师，还想得到“道”，那是不可能的。这句话说得很有味道！你看我们现在人，学了一点传统文化就非常地傲慢。其实我们想一想，自己有什么可傲慢的呢？我们哪里比得上古圣先贤一点点呢？所以和古代那些成就的人、圣贤人相比，就觉得自己差得太远了，没有任何的傲慢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不尊重师长，不尊师重道，还想学到“道”，那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古人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我们没有诚敬，任何利益也都得不到。所以老师要求恭敬，并不是说对他本人恭敬，而是希望对他所教的这个“道”，对道业有恭敬！对老师没有恭敬，对所学的“道”就不会有恭敬之心，所以获益不大。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尊师重道才能够学到真的东西，学到真的智慧。

我们讲了，礼的作用，就是达到和的目的。所以古人特别重视“以礼治国”，强调“礼主刑辅”。在《汉书》上就有这样一段阐述，它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如果以礼义道德治理国家，积累的就是礼义道德；如果以刑罚来治理国家积累起来的就是刑罚。刑罚积累得多了，人们就会怨声载道，离心离德；礼义积累得多了，人们之间就能够和睦相处，相亲相爱。

下面它又说：“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世间的君主、领导，想使人们向善的目的，是共同的，但是采取的使人们向善的方法却是不一样的。“或导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气乐；或驱之以法令，法令极而民风哀。”有的是通过伦理道德的教育，礼义的教化来引导，有的人是通过法律、法令来驱使。用伦理道德来引导，德教和谐融洽的时候，民风就是一团和气，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风气很好；用法令刑罚来驱使，法令过于严苛的时候，民风就出现了哀怨。

在《汉书》上，我们看到董仲舒向皇帝建议的时候，他说："古代的国土也是今日的国土，既然同样是一片国土，古代能够使天下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没有奸诈邪恶，囹圄空虚，监狱都没有囚犯，恩德润及草木，德泽广被四海。以古观今，为什么相差得这么远呢？是什么地方出现了差错，以致道德风气衰败成这样呢？"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说同样是一片国土，为什么古人治理的时候，像成康盛世，四十年监狱没有死刑犯，而现在道德风气却颓败，出现了这样的不良风气呢？后面他就给予回答了。"想来大概是比之古时，治国之道有所差失，或者是与天理有所违背呀！上天对待万物也是有分别的。比如说给予了很锋利的牙齿的，就去掉它的抵角；让它长翅膀，就让它只长着两只脚。这就是接受了大的好处，而不能同时再获得小的好处。"

同样的道理，古代凡是接受俸禄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官员，不以体力劳动谋生，就不得从事商贸事业。这就是接受了大的好处，就不得再谋取小利。如果已经接受了大的好处，又要谋取小利，连上天都不能够满足，更何况是人呢？这就是人民所以怨恨忧愁、苦其不足的原因。

"自身受宠而居于高位，家人温饱而享受厚禄，凭着富贵的财力和天下人民争利，人民怎么能比得上他们呢？富有的人扩大他们的产业，储藏他们的积累，还致力于此，没完没了，欲望没有止境，并且压迫践踏人民，人民渐渐因此而十分穷困。富有的人奢侈美满，贫穷的人艰难愁苦。因为什么呢？因为居上位的人，就是领导者不给予救助，人民都活不下去了，既然人们都不乐意活着，连死都不逃避，又怎么能逃避犯罪呢？这就是刑罚之所以繁多，但是奸邪却制服不了的原因。所以享受俸禄之家，以俸禄为生就够了，不能够再与民争夺产业，这样利益才可以普遍地分布，而人民才能够家给人足。这是上天的公理，也是古代的治国之道，上古的治国之道！"所以他建议皇帝，应该以这样的方法作为制度，大夫应该遵循它，并成为自己的行为。

古代的贤人君子、身居爵位的人都是这样的。他还举了公仪休的例子做例证。公仪休身居宰相之位，非常地廉洁，要求属下不要与民争利，

自己也是率先垂范。他们家的织女织的布质量上乘，种的菜非常好吃，结果怎么样呢？他就把菜给拔掉，把织机给毁坏，把这些织女都打发走了。他说如果我们家自己种的菜这么好吃，我们自己织的布质量这么好，那谁还去买农夫种的菜，去买织女织的布呢？他不与民争利，严格要求自己，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所以他说古代的贤人君子、身居爵位的人，都能够这样做，所以下面尊敬他们的品行，而听从他们的教诲，人民被他们的廉洁所感化，而不贪婪鄙陋。

由此看来，天子、大夫，也就是我们说的高级领导者，是百姓所效仿的榜样，怎么能够自己居于贤人之位，却像平民那样所作所为呢？后边他说了两句话非常好！他说："皇皇求财利，常恐匮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也就是说经常惶惶不安地谋取财利，并且担心财用匮乏，那是平民的意识，平民所应该想的事；惶惶不安地求取仁义，并且经常担心不能教化百姓，这是大夫的意识，这是领导者应该考虑的事。他还引用《易经》上的一句话，"《易》曰：'负且乘，致寇至。'"就是背着东西又乘着车，就会招致贼寇来到。为什么呢？乘车是君子的位分，但是背负肩挑是平民所干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你身处君子之位，但是所作所为却是平民之事，这样的人就会给自身招致灾祸。

所以我们看了这些论述，再对比一下，我们目前很多官员之所以出现问题，就是没有依据古圣先贤的教诲，也就是当官的人不能够再去经商。用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话来说，就是当公务员的人就不要再想着去发财致富，因为已经选择了公务员这一个职位。这一个职位就要求，应该把怎么样给人民做表率，治理人民作为自己考虑的要务，而不是想方设法地去赚钱，如果想去赚钱的话，那可以去经商。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国家所以治理不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按着礼来治理，这个礼是什么呢？就是接受俸禄的人，就不能再从事商贸事业。把这个礼给违背了，所以社会才出现了苦乐不均，然后还有很多上访的事情，都是和这个相关。所以古代的圣贤人治理国家，他们都是能够明了这些道理，所以把这

个运用到国家的治理之中。

在贞观之治之中，唐太宗就是靠《群书治要》把这个国家治理好的。贞观之治的形成，不仅仅是唐太宗一个人的功劳，他的长孙皇后，也是熟读经典，把以礼治国的理念，运用到她的劝谏之中。在史书上记载，长孙皇后生了一个女儿叫长乐公主，她和皇帝唐太宗都非常喜欢这个女儿。这个女儿出嫁的时候，唐太宗就命令给她备办的嫁妆、陪送，要比长公主高出一倍（长公主就是皇帝的姐妹）。这个时候魏征就觉得不符合礼了，他就来劝谏，说："过去在汉明帝的时候，要赏赐自己的儿子，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的儿子的封赏，怎么能够和先帝的儿子同等待遇呢？'所谓的长公主确实应该比公主的地位尊贵，情分上虽然有差别，但是礼仪上却没有等级之别。假如您让公主的陪嫁待遇超过长公主，这恐怕在道理上讲不通，所以希望陛下能够考虑。"

结果唐太宗回到家里，就把魏征的这一番话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听了之后，很感叹地说："我一直都听说陛下您很器重魏征，却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今天听了他的谏言，真的是能够以大义克制皇帝的感情，劝导皇帝不要感情用事，这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正直的国家栋梁之臣。我和陛下有幸结为结发夫妻，陛下对我以礼相待，情意深重，即便如此，我常常在劝谏的时候，还要看着陛下的脸色行事，要看皇帝心情好的时候，才给以劝谏，不敢轻易地冒犯您的威严，更何况作为臣下？从情谊上来看，情分生疏；从礼上来说，礼义有隔。怎么能和夫妻相比呢？所以韩非说'劝说'是一件难事，东方朔也说'劝说'确实是不容易，但是'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对于治理国家的人极为紧要。采纳忠言，民风就会安宁，拒绝忠言，朝政就会混乱。诚恳希望陛下能明白这一点，天下就太幸运了！"这一番话，就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皇后的贤德，确实是超过一般的妇人，甚至是一般的男人。一般的人都会感情用事，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要听说有人不同意给她厚重的嫁妆，一定是很不高兴。但是长孙皇后深明大义，并派宦官、使者带着五百匹帛到魏征的家中，赏赐给他，就是因为他敢于犯颜直谏。你看这个皇后做得确实是如理如法，按着礼来治

国，所以才成就了贞观之治，被誉为礼义之邦！

下面一句，“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在皇侃和邢昺的注疏中，这个“由”都解释为用，也就是说无论大事小事，皆用礼，而不用和，则于事也有所不行。比如说在《孟子》上有一个故事，有人来向孟子请教，说“‘男女授受不亲’是不是礼呀，男女在接受和给予东西的时候不要碰到手，这是不是礼的要求呢？”孟子说：“那当然是礼的要求了。这一个礼的制定也是为了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这个人就又问了：“如果自己的嫂子落水了，掉到水里了，我要不要伸手去救她呢？因为我伸手救她，男女肌肤相亲，就有接触了，是不是就违背了礼呢？”孟子怎么回答呢？说：“男女授受不亲是礼，而如果你嫂子掉到水里，你不去救她，就是连禽兽都不如了。你见死不救，还有什么仁德之心呢？连自己的嫂子都不去救！”他说嫂溺，援之以手，这是一种权变。所以不能够事事都用礼，有的时候事事用礼也行不通，反而是拘泥于礼的形迹、形式，而达不到真正的和。

最后一句话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既知和为贵然而专门用和，不用礼来节制，这也行不通。”也就是只知道和而不用礼，这也行不通。像我们现在都是一团和气，为了不得罪别人，明知这件事不对，也不敢于去劝谏，这就是不符合礼了，就是为了达到和而忽视了礼。比如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学校，都要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如果我们为了讨好人，人缘好，把这个制度给废弃了，就是为了和而失去了礼，最后也是行不通的。所以马融说：“人知礼贵和，而每事从和，不以礼为节，亦不可行。”像我们刚才讲的，婚姻之礼没有了，尊师之礼没有了，《弟子规》上的“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也不讲了，这些礼都被废弃了，为了方便，最后离婚率也上升了，学生不尊敬老师，儿女也不孝敬父母，儿女都变成小公主、小皇帝。所以纯用“和”还是不行的，以礼来达到“和”，这个“和”才是真实的。

《四书蒙益解》有这样两句话，“由之，由其本和之礼也。不行者废礼而尚和，礼不行而和亦不可行也。”“小大由之”，这个断句也有两种。我们这一句话，就是刚才讲的，是一种断句的方式：“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这是一句话，“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这是一句话，“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另一种断句的方式就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后面“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虽然断句不一样，但是意思大同小异。《四书蒙益解》就是根据这一种断句来解释的。说：“由之，由其本和之礼也。”“由”的是什么呢？“由”的是本和之礼！这个礼我们说了，它的体是人的心性、人的性德，也就是天道，这个道本身是和谐的，古人把它称为“太和”，宇宙自然本身是和谐的。

我们人一出生，内有五脏六腑，外有四肢，也是很和谐的。礼本身就有着和。所以由的是什么呢？由的是本和之礼，“不行者废礼而尚和，礼不行而和亦不可行也”，之所以行不通就是因为把礼废除了，而一味地求和，结果是没有行礼，这个礼没有行得通，和也没有真正地达到。这和我们前面讲的意思是大同小异的。这一段话，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为政篇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一句话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但是它的意义非常深广。它就是用来教导我们如何做到领导的最高境界的。我们现在都是这样说，做领导如何才能有执行力，如何才能得到众人的爱戴和拥护，如何才能做到无为而治。这里的“政”是政治的意思，“德”是道德，“为政者”广义指一切从事政治的领导人，狭义指国家元首。在古注中，“北辰”，有的解释为星宿的名字，比如说北极星；有的认为是北极星，专指地球北极，与天空相对的这个方位。我们采取的是“方位”的说法来解释的。

在天空之处，虚空不动，而众星拱之。这个“共”和“拱”是相通用的，引申之意就是围绕。这个“虚空”譬如人君，“众星”譬如大臣和人民。人君就是指君主，君主能以道治国，以德化民，就能得到百姓的拥护，譬如北辰得众星围绕。原因在哪里呢？

每一个领导者，都希望自己说话有执行力，都希望得到臣民的拥护和爱戴。那怎样做才能达到呢？那就是要“为政以德”。什么是“德”呢？古人认为“德”和“道”是一回事儿。我们经常说“道德”，“道”就是自然规律，本来如此，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德”就是顺着“道”去做，遵循大道而行就是有德之人，而这样的人也就是圣人。可是有很多人却不想成为圣人，不想成为圣人，不想成为一个明理之人，言外之意就是想做一个糊涂人啦。所以成圣成贤是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理想。我们遵道而行，从内而言，就会获得内心的安宁，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达到

“君子坦荡荡”的境界；从外而言，就能得到众人的支持与拥护，所以一个得道之人，是由内到外，内外兼通的人。中国古人经常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什么意思呢？这个“天”就是天道，就是自然规律，顺着自然规律去做就会昌达，违背自然规律，就会灭亡。传统文化教导我们趋吉避凶，就是让我们遵道而行。

这个“道”在古圣先贤的经典中都有所描述。《群书治要》的《尸子治要》中记载说舜任用了禹、后稷、皋陶等五人后，实现了无为而治，但是天下的民众都以舜为父母。尧曾经问舜如何治理天下，舜仅仅回答了两个字——“事天”。什么叫“事天”呢？就是按照自然规律去治理百姓。他举例子说，“平地而注水，水流湿”，就像我们在平地上浇水，水自然而然就会流向潮湿、低洼的地方；“均薪而施火，火从燥”点着柴火，火便会先从干燥的柴火着起。这是为什么呢？这叫“召之类也”，就是感召的道理。他说：“尧为善而众美至焉，桀为非而众恶至焉。”正是因为如此，尧凭借自己的美德感召到贤才；而桀品行败坏，感召到乱臣贼子。这就是《易经》上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所以领导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所感召的属下就会是什么样的人。

因而，一旦我们遇到逆缘或者遭受困苦，就应该自我反省，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为何会感召到不好的境缘呢？这就是古人教导我们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孔子非常赞叹的古圣先贤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圣人都做到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例如，有一次，尧帝出来视察，在路上碰到两个被押往监狱的罪犯，他看到之后，就走上前去，问到：“你们两个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被押往监狱呢？”这两个人就说，“因为上天久旱不雨，我们没有东西吃，不得已偷了别人家的东西，经发现后就被抓了起来。”尧帝听了他们的回答，就对押解犯人的狱卒说：“把他们两个给放了吧，把我抓起来。”狱卒听了感到很惊讶，就问：“怎么能把国君抓起来呢？”尧帝很诚恳地说：“因为我犯了两大过失：第一，我作为一国之君，负责教化百姓，但是我却没尽到职责；第二，我作为一国之君，没有德行，所以才感召上天久旱不雨。”结果尧刚把话说完，天空就

下起了雨。所以，我们看到尧帝就是这样一位“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人。

汤王也是如此。据《群书治要·后汉书》记载，在天遇大旱之时，成汤就曾经用六件事来自责，哪六件事呢？“政不节耶？使民疾耶？宫室荣耶？女谒盛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是我的政事不合法度了吗？是我役使百姓太辛苦了吗？是不是我的宫室建造得太奢华了呢？还是受宠的女人干预朝政，太猖獗了？是收受的贿赂太多了吗？还是进献谗言的人太猖狂了呢？汤王遇到这种境况，马上就自我反省。正是因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圣人他们都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所以才能治理好天下。

同样，我们一个团队、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乃至于一个政党，能不能做好，关键在于领导者是不是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所以领导一旦遇到问题，看到属下做得不好，就应该自我反省，而不是责求于人。实在说，下属的很多过失都在领导者的身上，所以领导是否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至关重要。我们现在都喜欢开会，但是开会往往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是越开越误会。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都在要求别人怎么做，很少有人反省自己应该怎么做。我们已经忘了古圣先贤的教诲，古人言：“各自责天清地宁，各相责天翻地覆。”想一想我们开会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老是去指责别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影响干群关系，这就是“越开越误会”。

从“为政以德”这句话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办政事就是一个成圣成贤的过程。所以《大学》上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只有把身修好了，才能齐家治国；要齐家治国，就得修身。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不断地提升，不断地省察克制。尤其是领导者，更要修身。

在《群书治要》上就曾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楚庄王向詹何请教如何治国，詹何就说：“如果你明白如何修身，就不能明白如何治国吗？”楚庄王很诚恳地说：“因为我得以侍奉宗庙得到整个的国家，所以我希望把这个国家治理好。”詹何说，“我没有听说过，一个君主修身很好，国家却

很混乱的。也没有听说过君主修身不好，而这个国家能够安定的，所以根本的根本，还在于君主自身的修养，所以我不敢用治国这些枝节小事来回答你。”楚庄王听了他的回答，说：“好！你说得太对了！”这就是告诉我们，作为领导，要治理好国家，带好团队，就必须把自己的身修好，做一个有德行的领导者。因为在修身的过程中，就是在治国了。

蕅益大师说，“‘为政以德’，不是‘以德为政’，须深体此语脉，盖自正正他皆名为政”。意指君主自己要按照道去做，成为一个有德的人，只有正己才能化人。

《论语》上记载季康子问政，季康子请教孔子怎样治理国家。孔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施政就是要使人正，怎么样使人正呢？就是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而且孔子还曾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君主如果能端正自身的话，那么施政治国又有什么难处呢？如果君主不能端正自身，怎么能去端正别人呢？

桓范在《政要论》上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故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若君正于上，则吏不敢邪于下；吏正于下，则民不敢僻于野。国无倾君，朝无邪吏，野无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这就是说，君子从政以端正自身为先，以教育和约束为次。如果君主能正身于上，官吏就不敢不正于下；官吏正身于下，庶民便不敢不正于郊野。国家没有不正的君主，朝廷没有不正的官吏，郊野没有不正的庶民，而国政却不好，这是从来没有的事。

《傅子》对这件事解释得更为具体：“立德之本，莫尚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所以想树立道德的根本，首先是正心，怎样正心呢？《大学》上说“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如果你的心偏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物，心就不中正了，就不得其正；“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如果你的心里有了嗔恚，这个时候就不得其正；有所恐惧、有所忧患，也不得其正。为什么你会有恐惧、忧虑呢？还是因为不明理。所以中国古人有句话

说“理得心安”，因为不明理，才会有所顾虑，烦恼恐惧。

《傅子》就在告诉我们，立德的根本，在于端正自己的心。自己的心端正之后，行为自然端正；行为端正，左右的人会跟着端正；左右任命的亲近之人，都端正了，整个朝廷也就端正了；整个朝廷端正了，整个国家也就端正了，最后天下也能端正。反过来说，“故天下不正，修之国家；国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以君主若想治理好天下，必须从修身做起。这就是说，“为政以德”要求君主做一个有德行的人，而且不仅仅君主凡是能端正人身心的事，都属于政治。所以凡是自正正他的行为，都是为政。

比如，我们办企业、办教育，乃至从事各行各业，凡是能做到自正正他，都可称“为政”。有人问孔子，说“你为什么不从事政治啊？”孔子说：“在家做到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把这种孝敬友悌之情推而广之，施及百姓，这就是从事政治了。还有什么算从事政治呢？”所以不要认为，只有从事政治的人才算为政，凡是自正正他的行为，都是“为政”。当然，有的人会问，只要把身修好了，就能管好国家吗？西方人要管人管事、管财管物，而我们中国人却认为把自身管好了，一切事都能管理好。是不是只要身修好了，这些事也能管好呢？

《大学》上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有德此有人”，如果一个领导有德行，受人尊敬，自然就会感召志同道合的人来。

《群书治要·中论》上，也是这样说的，“故人君苟修其道义，昭其德音，慎其威仪，审其教令，刑无颇僻，惠泽播流，百官乐职，万民得所。则贤者仰之如天地，爱之如亲戚，乐之如埙，篪歆之如兰芳，故其归我也，犹决壅导滞，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这句话意指，如果君主能修明自己的道义，彰显自己美好的声誉，谨慎自己的言行威仪，慎重地颁布教化和政令，刑罚没有偏颇邪僻之处，恩泽广泛地流布，百官都能安于自己的本分，以尽职尽责为乐，万民就能各得其所、安居乐业。那么贤德的人敬仰君主，就像敬仰天地一样，爱戴君主就像爱戴自己的父母一样，快乐

得就像听到了埙篪合奏产生的美妙音乐，愉悦得就像闻到兰草的芬芳。所以贤德的人归附，就好像是刚刚开闸了的洪水流向山谷那样的通畅，哪有不来归附的呢？因此关键的问题，还在于领导是否有德行。如果领导有德行，就会感召志同道合的人；如果领导没有德行，即使有德的人也会离他而去，这就是“有德此有人”。

下面说“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这个“土”，在古代是发展农业的基础。现在我们发展任何事业，也都需要有基础条件，比如说需要人力、技术、战斗力等等。如果领导有德行，就能感召有德行的人，有了这些人就能创造价值，获得财利。

在《说苑》上，就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田忌离开齐国来到楚国，楚王就问他：“齐国和楚国经常想互相吞并，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田忌回答说：“如果齐国任命申孺做将军，楚国只要发动五万兵士，派上将军率领他们，就能带着敌军将领的首级而返；但是齐国如果换了眄子做将军，楚国即使发动所有的兵士，大王亲自出征，也仅仅能做到不被擒获而已。”开始的时候齐国确实派申孺做将军，于是楚国派上将军率领五万士兵来应战。果然不出田忌所料，楚国军队就带了敌军将领的首级凯旋而归。后来齐王换眄子做将军，楚王征发所有的士兵，亲自率兵出征，结果也仅仅是没有被敌军擒获而已。

楚王回来就问田忌，他说：“先生您为什么很早就知道这个结果呢？”田忌回答说：“申孺为人，有个特点：他侮慢轻视贤德的人，又瞧不起不贤德的人，所以无论是贤德的人还是不贤德的人，都不能为他所用，都不愿意为他出力；但是眄子却不同，眄子尊重贤德的人，又怜爱那些不贤德的人，所以无论是贤德的人、还是不贤德的人，都能为他卖命，这就是我能事先预料的原因。”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便可以看到，将军有德行，就能感召士兵为他全心全力地付出，士兵竭尽全力去战斗，就能获得胜利。相反，如果将军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就很难获得胜利了。这就告诉我们“有人此有土”，你把有德行的人感召来了，这些人就会竭尽全力地为你付出。

同样，在《说苑》上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对子贱说："你治理单父，大家都很高兴，非常满意。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吗？"宓子贱就回答说："我对待百姓的父亲，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对待百姓的儿子，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子。同时，我还体恤孤儿，扶危济困，百姓有丧事的时候，我都为他们感到哀痛。"孔子听后说："你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只做到这些还不够。"宓子贱就接着说："我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的人有三个，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的人有五个，我结交的朋友有十一个。"孔子听后说："像对待父亲一样恭敬对待的有三个人，可以教导百姓行孝了；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的人有五个，可以教导百姓行悌了；你结交的朋友有十一个人，可以教导百姓好学了，但是这还不够。这是中等的善事，只有中等的人会归附。"宓子贱听了之后又说："在百姓之中，比我贤德的人有五个，我对待他们非常恭敬。他们教导我治理国家。"

孔子听后，就说："想成就大事的人，秘诀就在于此了。以前尧舜都是非常谦恭地对待臣下，这样才召来贤德之士帮助他治理国家，所以能够尊敬贤德、举荐贤德，这才是贤明的关键。可惜啊！你治理的地方太小了，如果你治理的地方大，你所取得的成就就可以遥追尧舜了。"这个故事也在告诉我们，"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德之人来到我们身边，我们能恭敬、关心他们，了解他们的需求，这些人就会发挥自己的能力，为百姓谋求福利。

最后一句话叫"有财此有用"，就是说我们事业成功了，或者赚了很多钱，要把这些钱用在哪里呢。是不是事业成功之后，就去和别人竞奢斗富，看看谁用的东西更奢侈，谁坐的车更高档呢？如果这样去用，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持久，财富也不会持久。虽然事业很成功，但是仍然需要保持谦恭有礼的态度，自己的日常用度，也要有一定的节度。所以要把钱用在哪里呢？要把钱用在提升正能量上。

在《政要论》上有这样一段话，"故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尧舜之居，土

阶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宫室而菲饮食。此数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节俭之至也。”这句话就是说，凡是修身治国的人，关键就在于能否节制自己的欲望。

《礼记》上说：“欲不可纵，傲不可长，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考察过历史的人就会发现，凡是有家有国的人，之所以能获得昌盛，没有不是因为节俭的；而他们失去天下，也没有不是因为过分地奢侈、浪费。节俭的人能节制自己的欲望，奢侈浪费的人一味地放纵自己的欲望，放纵自己欲望的人就危险了，节制自己欲望的人就平安了。尧和舜所居住的地方只有三等土台阶，夏天穿的是粗布编织的衣服，冬日穿的是鹿皮制成的大衣，他们的衣服都非常简陋。大禹的宫室非常简朴，饮食非常粗鄙。这些帝王并不是不想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但是他们这样做，恰恰是因为节俭才能使天下太平啊！当然很多人看了这段话，可能会认为古代生产力不发达，物质不丰富，所以这些帝王才要节制欲望。那我们看一看，在贞观之治时，财富很多，天下很多的国家都来朝拜。唐太宗又是怎么做的呢？在《贞观政要》上记载，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自毙。”为君之道，首先必须心存百姓，如果损害了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身，就像割大腿上的肉来喂饱肚子一样，虽然肚子填饱了，但终究会身亡。如果要想天下安定，就必须先端正自身。“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这句话就提醒我们，能真正伤害人身的，并不是外在的事物，而是嗜欲导致的灾祸。

“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如果君主沉迷于美食滋味，放纵于声乐享受，欲望越来越多，所带来的损害也就越来越大，这样做既妨碍了政事，也会使百姓遭难。

“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dú〕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再说出一个不符合道义的话，老百姓就会分崩离析，就会出现怨言四起，众叛亲离的局面。我每每想到这一点，就不敢过分地安逸。唐太宗在盛世之时，不仅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而且还严格要求自己，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一般而言，人们在贫穷的时候，能甘心于清苦。但是一旦条件好些，就会对奢华的生活生起好要之心、攀比之心，就可能会为了满足欲望而沉迷堕落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历代的明君之所以能治理好天下，就是因为他们能节制自己的欲望，勤俭节约。而只有节制自己的欲望，才能真正地做到爱民。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领君主欲望很重，贪求没有止境，就会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去盘剥百姓，甚至与民争利，那就自然不会去爱民了。就我们现代社会而言，有的人我们拉动内需，就需要高消费，，实际上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为什么会有环境危机、生态危机呢？归其根本，就在于人不断膨胀的欲望和地球有限的资源产生了矛盾。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但人的欲望却无止境，两者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最后不可调和，所以才出现了生态危机。所以在现代社会，物质发达的今天，仍然需要提倡节俭，惩忿窒欲。

《大学》上就告诉我们，领导有德行，就能感召有德行的人，自然会获得事业的成功。而事业成功之后，仍然要勤俭节约，不能因为事业成功，就过上奢侈浪费的生活。所以《大学》上总结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如果为政者有道德，就像树有根本一样，自然能得到臣下百姓的拥护而使事业兴旺发达。

"为政以德"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内涵，那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正己化人"。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有自信地说不用管人、管事、管财、管物，只要把自己管好了，就会获得事业的成功呢？就在于"正己化人"。外界环境都是我们身心的一种反映，也会随着我们身心的改变而改变。在我们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之前，对这个道理不是很了解。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很多朋友，即使很有钱，但是对我们很吝啬，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抱怨说你看这个人这样有钱，为什么对我这么吝啬呢？真是个小气鬼！我们经常去办事，本来这件事应该顺理成章，人家就应该给你办才行，但是他挑这个又拣那个，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非让我们跑来跑去跑好几遍。我们心里就愤愤不平，说这些人素质真差，本来就应该这么做的事，为什么让我跑

来跑去呢？但是学了传统文化之后，我们才知道，凡是不好的境遇都是我们内心的外现，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要从自己的心上找原因，因为我们自己对人很吝啬，经常喜欢贪占别人的便宜，所以即使是很有钱的朋友，对我们也很吝啬。

那为什么我们做事不顺利，有的人经常无缘无故地设置障碍呢？就是因为我们去给别人办事的时候，也是有意无意地去给人设置障碍，自己心地不够厚道，甚至很刻薄。所以我们看古人书，就能很好地进行自我反省。我们发现反省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去掉“刻、傲”这两个字。心地刻薄、傲慢，就会遇到这些不如意的事。学了传统文化之后，懂得常常反省，帮助别人不求回报，不讲条件，别人也会这样对我们。即使以前对我很吝啬的朋友，现在突然对我很大方了。你看很奇怪，同一个朋友，他以前对你很吝啬，现在我们心变了，变得慷慨了，朋友对我们也变得很大方了。所以要变的是谁呢？不是外界，而是变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心变了，这个缘分就会转了。

在《群书治要·后汉书》上也有这样一个故事：鲁恭在做中牟县令的时候，他以德治民。例如，有一个人叫许伯，和别人因为田界的事情产生了纠纷，很多官员拖了很久都不能够把这件事处理好，到了鲁恭这里，鲁恭耐心地教育他们，评论是非曲直，结果双方都退堂自责，而且都暂停耕作而互相推让田界了。还有一位亭长从老百姓那里借了一头牛，却不还给人家。这个老百姓急了，就找鲁恭来处理这件事。于是，鲁恭三令五申地要求亭长把牛还给人家，但是他却不听从，结果鲁恭就叹息道：“这是教化不行的结果呀！”于是他就准备辞官。结果县内的官吏们，都一起哭着挽留他，亭长看了感到惭愧，就把牛还给人家了，而且还主动要求鲁恭判他到狱中服罪。可是，鲁恭赦免了他，不再追究。从此以后无论官吏还是百姓都对他心悦诚服。

建初七年，他们所在的这个郡县发生了螟虫灾害，导致庄稼受灾。中牟县地缘分邻县，却没有蝗虫进入县界内。两个县犬牙相交，但是邻县螟虫灾害很重，而中牟县却没有发生螟虫灾害。河南尹袁安听说此事后，

觉得很奇怪，就派肥亲去打探。鲁恭就带着肥亲来到了田间，他们坐在一个桑树下面，正值有一个野鸡飞过去停在旁边，有些儿童在旁边玩耍，但野鸡不害怕人，也不躲避。肥亲就问："孩子们，你们为什么不去捕捉野鸡呢？"这些孩子说："这个野鸡，还要喂养它们的鸡娃，鸡娃也需要它们的母亲喂养。"所以他们不愿意去捕捉这个野鸡。

肥公听了之后，突然站起身来告辞说："我到此地的目的，就是想视察你的政绩如何。现在螟虫不犯中牟县境，这是第一件让人感到奇异的事；教化施及于鸟兽，这是第二件让人感到惊异的事；即使连小孩都有仁爱之心，这是第三件令人感到奇异的事。我再待在这里，只是白白地打扰贤者，浪费您的时间了！"于是他就告辞，回到府中，把中牟县的情况向袁安禀报。也就是在同一年，中牟县还生产出了双穗的嘉禾，这也是吉祥的景象。袁安上书，把这些情况都汇报给了皇帝，皇帝对此事也感到很惊异。这些事情，在很多人看来好像比较神秘，实际上一点都不神秘，我们觉得神秘，是我们不懂得道理，这就是内心的感召，这就是正己化人，修其身而天下平。

"为政以德"，之所以为政者自己有了德行，一切事都会随心如愿。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能正己化人，能使境随心转。所以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只要反求诸己，发明心性，明于明德，一切的人、事、物都会顺受其正，这就是《大学》上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大学之道，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怎样去治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首先要开显本性。"在亲民"，再去亲近百姓，使民众明于明德，焕然一新，自行化他，达到圆满的程度，这就叫"止于至善"。当你能"止于至善"的时候，本性的功用就能圆圆满满地开发出来了。只要从根本上求，为政以德，就能实现无为而治。这就是"为政以德"。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三百”，“诗”是《诗经》，就是后来由毛亨作传的《毛诗》，古时通常只称为《诗》。《诗经》有三百一十一篇，其中有六篇只有篇目而无诗辞，实际上是三百零五篇。在《史记·孔子世家》上说：“古者，诗有三千余篇，后经孔子删定为三百零五篇。”此处诗三百，也就是取整数而言。

《汉书·艺文志》上也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在古代有专门采集诗的官员，为什么要采集诗呢？因为君王用诗来观察社会风气，知道自己时政的得失，而且来考察纠正自己的过失，这就是诗的意义。

“一言以蔽之”，“一言”就是一句，“蔽”字在古代注解有不同的解释：包咸注说“一言以当之”；郑玄注“一言以塞之”，这个“塞”就是回答的意思；韩李《论语笔解》是讲“一言以断之”；朱熹《论语集注》讲“一言以盖之”。为了容易理解，这一个“蔽”可以作概括讲，就是总括的意思。

三百篇的要义，可以总括在一句诗里，这一句诗就是“思无邪”。“思无邪”是《诗经·鲁颂·駉》篇中的一句诗，孔子引用它总括了三百篇诗的意义。

关于“思无邪”这一句话，也有不同的理解。刘宝楠先生在《论语正义》里，引用的是《说文解字》的解释，他说“思，容也”，思就是容的意思。后面接着解释说：“言心有所念，能容之也”，就是心里有了一个念头，能容纳这个念头，就叫思。接着他又引用顾宪成对诗的定义，解释说“诗者，思也”，诗就是思，思又是什么呢？后面接着解释说“发虑在心，而形之于言”，就是在心里，产生了一个思虑，产生了一个念头，用言语来表达就是诗。“思无邪”，按照这种解释的话，就是你的思想、念头，没有邪曲不正的地方。另一种解释就是李炳南老居士在《论语讲要》中引用的程树德先生在《论语集释》中的一种解释，他认为“思无邪”的“思”，是语气助词，没有实在的意义，什么是无邪呢？他又引用了郑浩《论语集注述要》，考据《诗经·国风·邶国·北风篇》里的一句诗“其虚其邪”，考据结果认为“邪”和“虚”，在古代是一个意思，所以“思无邪”就是无虚

的意思。

因此，“思无邪”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三百篇的本意都是真情流露，无邪就是真情流露，这种讲法也很好。在朱熹的《论语集注》上，这个诗进一步阐发为：“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

凡是《诗经》上的章句，善的能感动触发人的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这个创也就是惩戒的意思。恶的可以惩戒人放纵的心志，使人的性情回归于正，而没有邪曲不正的地方，这就是诗的作用。我们都知道人有七情五欲，喜怒哀乐爱恶惧，很少有人能达到中和的状态，“中和”怎么来解释呢？《中庸》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就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还没有发出来时，就是中的状态，但是一般人都很难理解，也很难做到，说怎么可能没有喜怒哀乐爱恶欲呢？其实这个喜怒哀乐爱恶惧，全都是因为人心不正产生的，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喜怒哀乐之未发的那个状态，很少有人能够理解更难去达到，怎么办呢？那就退而求其次，求那一个和的状态。

什么叫“和”呢？《中庸》上讲：“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喜怒哀乐爱恶惧，这七情都发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过分，都符合礼的要求，这个时候叫中节。用礼来节度它，使它恰到好处，所以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发乎情，止乎礼。”这就是告诉我们，《诗经》中的话可以使人导归到情性之正，不偏离中和的状态。程子就曾说：“思无邪者，诚也。”什么是“诚”呢？对于初学人来讲“诚”就是放下自私自利做到大公无私。为公而不为私，这就叫“诚”，这是对一般初学人来讲的。

曾国藩先生在他的读书笔记中，也曾对“诚”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什么是“诚”呢：“一念不生是谓诚”，就是你心里根本没有动念，连起心动念都没有，这个时候才称为“诚”。很多人可能体会不到这种状态，就是没有妄想、分别、执著的境界，这就是“思无邪”，要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由浅入深，初学者可以改恶从善，进一步再放下自妄想、分别、执著。

所以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如果你因为这个理，执著这个理而伤害了情理，这个理也就不圆满了。所以人学到一定的程度，就要学会放下执著，放下执著才能达到本真天然的境地。

宋儒范祖禹就说："学者必务知要，知要则能守约，守约则足以尽博矣。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学者"，就是学道的人，要想成圣成贤，一定要知道抓住根本，凡事能抓住根本，就能很简便地去实行，一旦做到豁然通达，就能举一反三，施用无穷思。

中国古人做学问都是守约施博，术业专攻。虽然学得很简易，但施用起来却很广大。比如，汉代的五经博士都是专攻一门，一旦一经通达，便会经经通达。如果一部经不能通达，其他经也很难深入。

后面他讲，"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作为经的礼仪有三百，作为具体的礼仪有三千，儒家是"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佛家也同样是如此，佛家是"三千威仪，八万细行"。都是从事上来炼心的，说到底还是修心，修一个恭敬心。"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毋不敬"，就是一切恭敬，这就是礼的本质。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恭近于礼"。只要你心存真诚就和礼很接近了。比如，你到了一个庄严肃穆的场合，自然不然就会轻手轻脚，谨慎戒惧，庄重肃穆了。

所以"诗三百"用一句话说就是"思无邪"。"思无邪"一是指心念没有邪曲不正的地方，一是指真情流露。《毛诗序》中就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都是用来表达人的心志情思的。在心里念想着，还没表达出来时，就称为志。

中国人说，人必须要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所以人有了志向，就像《大学》上所说的"知止而后有定"，知道自己要止于何处，这个心才会有定力。"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归根到底为什么能得呢？就是因为有志向，知道心之所止，才不会被外物所诱惑，也不会跟着社会随波逐流。比如说我们要去登山，山顶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在路上，就一直往山顶上走就好了，

不要再去看哪里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所以人有志，才知道何去何从，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毛诗序》又云："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的作用就是"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这就是告诉我们，古圣先王为什么要采集诗？采集诗的目的就是，使夫妇关系和睦相处，使儿女懂得孝敬父母，使人伦关系都淳厚，使社会教化都淳美，使社会风气得到改善。比如，《诗经·曹风·蜉蝣》篇，就写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蜉蝣又叫"渠略"，是一种朝生暮死，寿命极短的昆虫。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羽翼非常薄，而且很有光泽，在这里象征小人。

《蜉蝣》是一首斥责当时社会奢侈风气的诗，曹昭公的诸侯国很弱小，经常被大国欺压，他不但没有治国之道，而且好奢侈又重用小人，最后落得无所归依。"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这句话是起兴，意思是说：你看一看，那朝生暮死的蜉蝣吧！把羽翼修饰得剔透光亮，如同炫耀那华丽的衣裳。"这也让我们联想到，在现代社会，很多人也喜欢穿得漂亮，生活很奢侈。"心之忧矣，于我归处"，仁者的心中充满了忧愁，为什么呢？"死期将至的人呐！你将归向何方啊！"其实，我们每天忙忙碌碌，也和蜉蝣一样，寿命非常短暂。就像我们看蚂蚁，它早晨还在忙碌，到晚上可能就没了生命，但是还在那儿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看到蜉蝣、蚂蚁这样的生命，也要想想自己短暂的一生。其实，人的生命过得很快，转眼即逝，我们将要归向何方呢？这就是在提醒我们：在短促的有生之年，至少要为自己身边的亲人留下一些有用的东西，做一些有益的事，不要朝生暮死，不知道要归向何方。君王如果不修德用贤，国家危亡的时刻到来，君王将无处可去。这句话既讽刺了当时诸侯国骄奢淫逸的风气，同时也告诫我们：要珍惜时间，把时光用在有益的事上。

我们再看在《诗经·小雅》上，有一首诗叫《伐木》。这首诗主要讲如何交朋友，这里说对故交应该重视，不忘记故交。《伐木》是宴请朋友故

旧之诗，自天子以下到平民百姓，没有说不借助朋友之力，而能成就功业的。君主热爱亲人可以保持和睦，友爱贤者不忘故旧，社会淳化，百姓也会归于淳厚。我们看这一首诗：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意指当年在山里，一起伐木时，患难与共，能听到鸟儿嘤嘤的鸣叫声。小鸟偶尔从深谷中飞出，迁居于山顶高大的树木上。“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高居的小鸟，依旧嘤嘤而鸣，不停地呼唤着幽谷内昔日的友人。“相彼鸟矣，犹求友声”，你看那小鸟也知道不忘故旧；“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矧就”是况且，何况的意思。何况是君子呢，怎么会不寻求旧友呢？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即使小鸟尚且不忘记故交，更何况是人呢？怎么能不求朋友来和自己志同道合，共同成就事业呢？

这也是告诉我们：即使君子身居高位，但是也不能忘记故旧。这就是《诗经》移风易俗的作用。

在《小雅》上，还有一首关于朋友的诗，叫《谷风》。《谷风》是当时讽喻周幽王的诗，因为当时天下风俗变得越来越浇薄，朋友之间的恩义已经荡然无存，所以作者写了这首诗来讽喻周幽王。这句诗是这样写的：

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
习习谷风，维风及颓。将恐将惧，置予于怀。将安将乐，弃予如遗。
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习习古风，维风及雨”用起兴手法，将风雨相互感应滋润，比喻为志同道合，关爱同行的朋友。“习习”就是指微风和煦的样子，和煦的谷风，阵阵吹来，风声中还夹杂着雨声。“将恐将惧，维予与汝”，“将”就是且的意思，“惧”就是恐惧之意。比喻当一个人遭遇厄难，唯有我与你同行。“将安将乐，汝转弃予”，如今你处境安乐，便全然抛弃了故人，所以这叫“将安将乐，汝转弃予。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这就是说“人呐！你怎么能因为一点点小怨，全忘了我当初对你的深情后爱呢？”

什么是大德呢？注解里说“切磋以道，相成之谓也”，就是与朋友研讨、勉励，规以正道，互相成就。这告诉我们：不要因为小怨，就忘记别人对我们的大德，时时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特别是对故旧朋友，更应该如此。

《诗经·小雅》里有一篇叫《青蝇》，也有移风易俗的作用，也是大夫讽刺周幽王的诗，里面写到：

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

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营营青蝇，止于樊”，“樊”同那个藩篱的藩，也就是篱笆的意思。说苍蝇到处飞舞，别让它闯进藩篱。“岂弟君子，无信谗言”，岂弟同“恺悌”，恺悌君子就是指和乐平易的君子，是说和乐平易的君子，莫要听信谗言。后面说：“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棘”就是枣树林的意思。说苍蝇飞来飞去，别让它穿过枣树，“谗人罔极，交乱四国”“罔极”就是指进谗言的人，“交乱”就是共乱的意思。如果谗人之言不止，终会使天下大乱，这就是在告诫君主，不要听信奸佞之人。俗话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个真正有德行的君子，他希望利益别人，团结友爱。而来说是非的人，可能就是是非人。

《诗经·小雅》还有一篇叫《宾之初筵》。这是一首讽刺时政的诗。

当时周幽王荒废国政，亲近小人，饮酒无度，社会风气也由此败坏。君臣上下都沉湎于纵酒作乐，当时的卫武公入朝之后，就作了这一篇诗《宾之初筵》：

宾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仪反反。曰既醉止，威仪幡幡。舍其坐迁，屡舞仙仙。其未醉止，威仪抑抑。曰既醉止，威仪抑抑。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邮。侧弁之俄，屡舞傞傞。

“宾之初筵”就是指宾客刚刚来参加宴席的时候；“温温其恭”，就是温文尔雅，很有风度。“其未醉止，威仪反反”，这个“反反”，郑玄注解为：“言重慎也”，就是说他的言语很谨慎。他在没有喝醉酒之前，非常有威仪，说话也很慎重。“曰既醉止，威仪幡幡”，“幡幡”就是轻率不庄重的样子，等到这些宾客都喝醉之后，就变得轻率而不庄重了。“舍其坐迁，屡舞仙仙”，“仙仙”意指轻举妄动的样子。他们喝醉之后，渐渐地举止轻浮，轻则离席徘徊，重则手舞足蹈。“宾既醉止，载号载呶”，等他大醉的时候，就开始大喊大叫，完全失去了君子的风度。“乱我笾豆，屡舞僛僛”，“僛僛”指醉舞僛鞋貌。这句话是说喝醉之后手舞足蹈，歪歪斜斜，弄乱了筵间的礼器，纷纷步乱身摇。

最后一句说“是曰既醉，不知其郵。侧弁之俄，屡舞傞傞”。“邮”就是罪过的意思；“侧弁”就是古代贵族的一种帽子；“傞傞”指醉舞失态的样子。“人若贪杯至醉，不知过失昭昭，衣帽歪斜不整，由自手舞足蹈。这就告诫我们如果贪杯至醉，就失去了君子的风度。

所以古人戒酒是怎么办的呢？就是在酒醒的时候，看一看那些醉酒人的丑态，就能把饮酒的习气给改正了。这首诗在告诉我们，看到别人的醉酒丑态，息心自醒，就能改变自己不良的风气，放纵的习性。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事，就需要践行人伦大道。如果人伦五常

不能处理好，那就不能搞好人际关系。

这五种伦理关系，第一就是“父子有亲”。比如说，我们作为儿女是不是真正地孝敬父母，是不是让父母安心了；第二就是“君臣有义”，当领导的对下属是不是有仁爱之心，是不是能关心属下的生活，以及他心灵的成长，是不是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够做表率。做下属的，就要想一想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是不是尽心尽力地完成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请一位老师来，教我们怎样叠被子。如果我们用心去做，叠出来的被子，看上去就能让人生欢喜心。这个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尽心尽力地把自己的本分做好，那我们的人生都会活得很出彩。就像我们讲课，要充分地备课才行，如果备课不充分，有的时候就讲得不尽人意。

我有一位博士生就做得很好。比如说，我让他改写文章，他辛辛苦苦地改完之后，我就说：“谢谢你”，而他就引用《论语》上的话说：“‘有事，弟子服其劳’，应该的。”他很用心就能把事做得尽善尽美。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学生时，心里充满了欣慰之感。这样的学生无论走到哪里，做什么事，不用别人督促，他都会做的很好。别的学生都要老师督促，说要写要读哪本书，每一个月给老师写多少读书笔记，虽然老是督促，但到时候他们却还是都忘了，把老师气得火冒三丈。好学生，根本不用劝，他自己每天把时间都抓得很紧，还总是感觉自己做得不够，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学生，还要劝他注意身体。这就告诉我们，成就任何事，都不是靠别人逼出来的，历代的古圣先贤，他们都是自己有利人的心愿，都想把事情做好。所以你用功用到一定程度，事情就自然能做得尽善尽美。

我们做下属呢？就应该经常反省自己做的事。做丈夫的要经常反省自己是不是有恩义、道义、情义。做妻子的也要经常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德行，能不能起到相夫教子的作用，为儿女做表率。

还有“朋友有信”，同门曰朋，同志曰友。人言为信，人所说的话必须守信用。做人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言出必行，一诺千金”。

还有“长幼有序”，在家里，兄长要友爱弟弟妹妹。所以当弟弟妹妹有了困难，哥哥姐姐去帮助弟弟妹妹，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从我们的上一代身上还可以看到兄弟姐妹的友爱之情。比如说我的母亲，她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里，在家里她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我姥姥过世很早，结果我母亲就是两个弟弟一手扶持大，让他们都受到好的教育，弟弟生活有困难，她就当成自己的困难，老是想着弟弟的需要。所以她回到老家的时候，弟弟弟媳对她都非常恭敬，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她对弟妹做到了悌道啊。看到了母亲的行为，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也就自然而然做到了“兄友弟恭”。

比如说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家里很穷，哥哥和我都要读书。我母亲用她自己的退休费来供我们两个读书。有一次我哥哥生病了，要去看病，我就骑着车子带着哥哥去看病，结果别的邻居看到了都非常地感动，说你看这家兄弟姐妹，多么的团结啊。所以也都非常愿意和我们交往。等我长大了要去国外读书时，哥哥虽然只工作了两年，但他却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来资助我。哥哥一直就这样对我，无怨无悔。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得到他们的帮助，我需要买房时，钱不够，就想：“其实这个房子已经不错了，我就不用再换了。”但是母亲却说：“就是要住大一点的，比较宽敞的房子。”结果，姐姐和哥哥知道了，都来资助我。所以这种兄友弟恭的情意，在我们现在人的身上可能很少见了，但是在我们长辈的身上还能看得很清楚。

五伦关系能处理好不是偶然的，全都是重视教育的结果。所以在古代的时候，一个家庭至少都有几十口、上百口、上千口的人，几代同堂都能和睦相处。这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教育的力量，而我们现在的孩子和人家相处，不到一个星期，不是不喜欢别人就是别人不喜欢自己。什么原因呢？因为自己在家都是小公主、小皇帝，每个父母长辈，都要考虑到他的需要，满足他的愿望。所以很多小公主、小皇帝，在一起的时候，不出现矛盾那就是不正常了。比如，看到别人关门的时候声音太大了，看到别人去厕所都没把马桶擦干净。所以总是处处看别人的过失，也很难在一起相处了。

中国古代的好朋友，感情非常深厚，关系好的就像亲兄弟一样。他

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们从五伦关系中反省一下自己，看一看自己哪一伦做得不错了。像我们以前学习五伦关系的时候，都是把它记下来，说五伦是谁提出来的，都有哪些内容，到考试需要考，但是和自己的修身处事毫不相关。不孝敬父母，还是不孝敬父母；不尊敬师长，还是不尊敬师长；不友爱兄弟，还是不友爱兄弟，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就要把传统文化实践下去。要把儒学变成学儒，我自己对这个就感触很深。我从大学开始就接触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到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也是专门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我做博士生时写的论文，也是和儒家伦理思想相关的。这一路走来，都走在儒学的道路上。为什么要学《论语》呢，之前学《论语》就是为了写文章、发表论文，而且还要发表在什么级别的核心刊物上，就是为了评职称、评博导，但是和自己立身处世毫不相关，所以也没有学出味道，更没有学出法喜。多年以来一直搞伦理学研究，就是搞道德教育。当时看了很多文章，写得也很有深度，而现在人是怎么评价文章的呢？评价的标准就是别人都看不懂就叫有深度。我们到这些文章后，也就知道了进行道德教育不会有什么成效。有一年我们去庐江汤池镇学习，上了四天的幸福人生讲座。当时突然恍然大悟，原来道德教育是这样进行的，这是切实有效的，并不像我们那样写很多论文，却从不去实践。

这个教是怎么来教的呢？“教”左面是一个“孝”字，这个“孝”（编者注：“孝”又写作“𡍮”）字是怎么写的呢？而这个“孝”字写得很有意思，上面是一个“×”，下面是一个一模一样的“×”，再下面是一个孩子的“子”，上面的“××”是父母老师画的，而下面一模一样的“××”是孩子画的。这就告诉我们，教是从孝开始的，身教胜于言教，而右边是一个手，拿着一个柳条，这个字就是告诉我们，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长期地拿着柳条，时时在孩子身旁提醒、鞭策，它是一个长期耳提面命的过程。

可见，教育是身教和耐心才能做到的。汤池镇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老师身教胜于言教。有的老师刚到汤池镇的

时候，镇上卫生很差，他们就自己穿上“和谐社会，从我做起，从我家做起，从我镇做起”这样的马甲，然后排着队，到大街上去捡垃圾。结果捡了很久，人的善心就被唤起了，他们就说：“你看人家都在捡垃圾，你们还好意思再往街上扔垃圾吗？”久而久之，就没有人再随意扔垃圾了。而他们的这种举动还感动了一些商店的老板，他们把垃圾箱拿来，让过往的行人把垃圾装在里面，所以身教胜于言教。

而这些老师走到哪里，就把这个捡垃圾的习惯带到了哪里，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去河南参加一个祭祖大会，有一位庐江的义工老师，他当时看到祭祖的人很多，地上有很多烟头、纸屑等等，他就很自然地躬下身来捡这个垃圾，而他这个举动一做出来，立刻就有效果，就感动了身边的一些年轻人，结果他们也就主动地把地上的垃圾捡起来。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虽然这些老师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他们的身教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所以有一位朋友去汤池参观之后，就非常地感动，他说：“在以前我根本不相信，天底下有大公无私的人，我觉得这都是做宣传、都是说教，就是为了教育大众才树立了一个榜样。现在都是争权夺利、争名夺利，人人都是为自己活着，根本不存在这样大公无私的人。”而他到汤池学习之后，就感到非常震撼，他才相信，原来人真的可以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所以现在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学习传统文化的老师，最初都是到汤池参加幸福人生讲座受到了感动。现在能登上讲台的这些老师，也都是得益于汤池的精神感化。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非常感谢这些老师，把道德教育实践给我们看。他们让我们真正看到了道德教育是有效果的，人是可以教得好的，社会风气是可以改变的。否则的话，我相信大家还只是停留在只写文章上。如果不是汤池精神，我们至今为止还不一定能找到良好的道德教育模式呢。

“思无邪”很重要。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网络媒体都应该秉持孔子的这一理念。我们为人处事不要引起人们邪曲不正的思想和行为。说起道德教育，不要以为我们在这里上一堂课，就是在进行道德教育了，其

实我们每天所接触的电影、电视、网络、新闻都是在进行道德教育。

古人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人生境界；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理想。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接受的社会教育不一样，古人做官，都要读《论语》，《论语》就告诉我们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一个读书有志于求道的人，还以自己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为耻，这就不足一提了。

所以古代的读书人，在经典的熏习之下，自然会有气节、有抱负、有理想、有志向，但是我们现在看电影、电视剧，如果电影、电视剧没有一个第三者插足，没有一段情人小秘，再来一个床上戏，这个电影、电视剧都演不下去了。现在的媒体、网络、电影、电视的内容，就是“暴力+色情’。我们看这样的书，在这样的熏陶之下，成长的人格自然会和古人不一样了。

所以有位老教授就说：“能够拯救这个世界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国家领导者，他发布一个好的命令，能够惠及整个国家的百姓；另一种人就是媒体工作者，因为现在大家几乎都在上网，都要看电视。这些媒体工作者，向大众传播消息到底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教化人心？那对社会的影响可就大了。”

所以，文化的目的是以文化人，用正能量的节目起到变化人气质的作用，使人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这才是我们文化建设的目的。所以我们搞文化建设，不能偏离文化的本质。所以，孔子的这句话，对我们非常有启发、有深意。

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导”在皇侃的《疏》中解释为“诱引也”，就是引导、诱导的意思。刘宝楠先生的《论语正义》依《礼记·缁衣》篇，把“导”解释为“教”。

“政”，孔安国说“政”谓法教也；皇侃《疏》说“政”谓法制也。“导之以政”就是用政治领导人们，为政者制定施政条文，让人民来遵行，民众如果有不遵守的，“则齐之以刑”。这个“齐”就是“整”的意思，也就是用刑罚来整饬，这样的结果就是“民免而无耻”，这个“免”，孔安国注解为“苟免”；《广雅·释诂》“免”解释作“脱”，民众为苟免刑罚才服从政令，但并不是心服，所以当刑罚稍有松弛人民就会犯法，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为“无耻”。在《管子》的“牧民篇”上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就是把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最重要的四个纲常。“国民无耻，亡国之日不问可知。”如果国民都没有了羞耻之心，这个国家灭亡之日不用问也自然知道了。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包咸注解，“德”就是“道德”的意思，以道德来引导民众。如果人民不服从政令就用礼来整饬之，这样所得的结果就是人民“有耻且格”，这个“格”郑玄注解为“来”。什么意思呢？有两种解法，第一就是民心来归。就是人民以犯罪为耻，而且诚心来归，拥护政府；第二种解释就是何晏的注解“说格，正也”，人民有羞耻心而且归于正。这种说法也很好。

这个“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对我们现在政府、企业的管理都非常有意义。因为现在社会出现了很多的腐败现象：食品安全问题、国有资产流失等等。很多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呼吁必须借鉴西方民主法制，才能维护公平正义。但是，他们却忽视了民主法制得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也就是说“从西方历史看西方的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有所不同，西方的文化传统是一种宗教文化的传统”。

比方说我们到西方旅游，西方人带我们去看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教堂，他们的历史古迹似乎除了教堂还是教堂，由此可见宗教文化在西方历史上占着主导的位置，对社会风气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所以他们治理社会靠的是“两手”：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只不过这个道德教育的主体是教会而已，所以他们并没有忽视道

德教育，只不过他们的道德教育是由教会来教导的。所以有一句话说：热热闹闹的市场，安安静静的教堂。每到星期天父母都要带孩子去教堂礼拜，接受宗教教育，而它的核心就是“诚实守信、仁慈博爱”。但是我们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民主法制的一面，误以为只要把西方的民主法制搬到中国来，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我们确实把西方的制度搬来了，但是却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也就是说这些制度在西方用得很好，但是一到中国就会水土不服，而水土不服的原因就是我们忽视了道德教育。

在中国历史上道德教育是靠儒释道三家来进行的，我们把它称为圣贤教育。但是自“五四运动”和“十年文革”以后，因为我们对圣贤教育的过度批判，使我们谈虎色变一样，那个时候不敢讲孔子，更不敢讲儒释道，经过了文革的人现在对宣扬传统文化仍然是持有怀疑的态度。所以经历了“五四”、“文革”，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使我们一度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圣贤教育沦落了，因果教育不见了，而西方的宗教教育又不适合我们的国情，这个时候人的道德素质没有办法提升，再好的制度来到中国都会变形，都会走样。

比如说安利公司刚刚到中国发展，他们有一个全球通行的无偿退款制度，也就是说这个产品你用光了，还剩了个空瓶子，你对它不满意，还可以拿着这个空瓶子到公司去退款，而公司会把所有的款项都退还给你。它制定这个政策，显然是为了向用户表明自己的产品质量很好，不会有人对它不满意。这个制度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推行的时候，都没有发生问题，但是唯有来到了中国，这个自古以来被誉为“礼仪之邦、华夏之族”的文明古国却出现了弊端。什么问题呢？我们中国人很聪明，但是聪明有的时候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有的人把产品用光了剩了一个空瓶子，就拿着空瓶子，到公司去退款。甚至有的人不是把这个产品用光了，是把这个产品倒光了，然后拿着空瓶子去退款，这样的人还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每天都有，排着长龙的人到安利公司要求退款。这一下可让安利公司开了眼界，因为他们是一家跨国公司，走过了很多国家和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那怎么办呢？最后迫使安利公司在短短的时间内，在中

国改变了全球通行的无偿退款制度。

这一案例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忽视道德素质的提高，即使看起来再合理的制度，到中国的时候也仍然会出现弊端。而我们也知道安利公司的分配制度，曾经被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学院誉为：最合理的无懈可击的分配制度。但是即使这样一个看似很合理的制度，到中国来推行的时候，仍然是遇到了种种挑战。

同样的道理，我们把西方的民主选举引入到乡镇干部的选举之中、村干部的选举之中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村干部拿着大量的钱去拉选票，结果民众看谁给他的钱多，谁送的礼物投他的心意，他就选谁，最后就出现了大量的贿拉选票、营私舞弊的现象。而据说在某一些地方，黑社会的老大都被选为村支书了。这些案例表明“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句话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依然适用。像我们现在在反腐败的过程中都在讲“到底是制度建设是根本的，还是人是最根本的呢？

我们读《群书治要》，在《群书治要·傅子》上说“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明智的君主一定会顺着好的制度才能够达到天下大治，但这并不是说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达到社会和谐，天下大治。必须怎么样呢？必须有良佐，就是有好的辅佐大臣，也就是说，要有圣贤君子来推行这个好的制度。要有好的制度重不重要呢？当然很重要。但是并不是说有了好的制度，就能达到社会大治，还必须培养圣贤君子来推行好的制度。因为如果制定法制规章的人，不是一个有公心的人，是一个有私心的人，只知道为自己和小部门的利益着想，他不可能设计出真正公平合理的制度。而即使公平合理的制度设计出来，要去推行的时候也必须得有公正美德的人，才能把它推行好。所以我们社会出现了大量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归根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执行法律的人没有公正的美德，如果我们忽视了道德教育，只重视法制建设，那就会有三个问题是不可解决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难以防患于未然。古人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

者，禁于已然之后”。“礼”就是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可以防患于未然，让人根本就不去做坏事。而法律只是在事后给以补救，可以把犯罪的人关进监狱，给他判以罪行，但是这个消极结果却是不可避免的。关于礼和法这种防患于未然和禁于已然之后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中医和西医的对比，最容易得以说明。

扁鹊有两个兄弟，他是三个兄弟之中医术最差的，但是他的名声却传得最远。当国君问他什么原因的时候，他回答说：“我的大哥医术最高明，他可以在病隐伏未发的时候就开始对治，所以他的名声不出这个病人的家里；我的二哥医术其次，他在这个病稍微有点儿小的征兆的时候就能给以对治，所以他的名声不出这个病人的巷子里；我的医术最差，但是我的名声却传遍了整个诸侯国。为什么呢？因为我都是等这个人病入膏肓，不得不采取一些大的手段，比如说先把他的血脉钳开给他进行针灸，服一些有副作用的汤药，最后三下五除二，把他从死亡线上拽回来。大家一看都赞叹得不得了，说这个扁鹊可以妙手回春啊。实际上我们是中医世家，我知道我的医术是三个兄弟中最差的。”中医现在的影响之所以远远比不上西医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西医都是从症状上解决问题，它很迅速，但是怎么样呢？都是在人病入膏肓之后给以对治，不能防患于未然，而中医最讲究养生之道，你按照这个养生之道去修养自己的身心，那你根本就不得病。

中国古人说“人按着天道来生活是最健康的”。什么是天道呢？天有黑天、有白天，大自然要睡的时候你也要睡觉，大自然醒的时候你也要起来工作，这就是顺应天道，就会活得很轻松、很健康。所以古人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天补”。就是你吃药，是药三分毒不如靠食物来进补，靠食物来进补不如按照天道来生活更加健康。所以古人把一天也分为四个季节，古代说一年有四个季节，一天也有四个季节叫春夏秋冬。一天的春天是从早晨三点钟开始的，春主生发，也就是说三点钟是立春，春天来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起床来读书、活动、工作了。古代的人上早朝都是天蒙蒙亮，他们已经去上朝办理政事了，是鸡鸣即起、勤政

爱民。三点钟是立春，五点钟是惊蛰，惊蛰就是小动物经过冬眠要起身活动的时候，这个时候打打太极拳，练练八段锦，使一天血脉畅通，有非常好的精神，所以中医强调的是内补，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练肌肉，它强壮的是内在的五脏六腑，我们看太极拳，还有八段锦，动作很缓慢，但是强壮的是五脏六腑。有一位中医专门研究这些养生之道，他说："你知道，最好的运动方式是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最好的运动方式，就是古人的拜祖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跪九叩首的礼。"因为这个礼一做下去从头到脚，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环节都能得到锻炼。他学中医对这个有专门的研究，所以他说这是最好的运动。六点钟是一天的春分，就是春天的一半要过去了，这个时候如果还不起床，就等于没有起早赶上春天的生发，所以最迟也不能超过六点起床。比如说我们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熬夜很晚，第二天早晨九点以后才起床，即使睡了再多的觉，精神也补不过来，因为春天生得不好就会影响到夏天的生长。下午的三点钟到九点钟，是一天的秋季，秋有收获，也有收藏的意思。这个时候不要做激烈的运动，否则影响晚上的睡眠，而最好的休息时间，就是晚上的九点钟到早晨的三点钟。特别是一天的子时，也就是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候被称为寒冬。如果这个时候还很精神，还在工作、学习，就等于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出现在寒冬腊月，久而久之是很容易得病的。

中国人讲养生之道都是让防患于未然。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体力很好，精神很旺盛，可能不在意这些，结果到了年老的时候，疾病来了，那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后悔、后悔，都是到后面才悔，这个就叫按天道来饮食起居。

而在《中庸》上讲什么是道呢？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不是说今天工作很累很忙就可以晚一点睡，等明天轻松了，再按着道生活，"不可须臾离也"，这个才叫道。所以按照自然节律，来饮食起居，久而久之这个身体就不得病，红光满面、精神饱满，这种防患于未然的道理，西医懂得就很少。西医有两百年的历史，中医有五千年的历史，你说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呢？但是我们现在社会，都急功近利，都是从症状上解决

问题，所以怎么样呢？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都去看西医，西医的副作用确实也很大。这就是告诉我们伦理道德的教育相对于法制而言，有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第二就是如果我们忽视了道德教育，只是进行法制建设，还会出现很多反社会的行为。什么叫反社会行为呢？就是孔子在这里讲的“免而无耻”，苟免于法律的制裁，但是没有羞耻心。

比如说在西方，因为近代以来有人宣称“上帝死了”，很多人就不再相信宗教了，但是它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虽然如此，还是出现了很多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还有青少年以强凌弱的现象，而这些现象非常普遍。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有一天看他们的新闻，他们把这些现象称为“大不列颠不为人知的耻辱”，所以这些问题靠法制建设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群书治要·盐铁论》上就这样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法律有没有作用呢？它当然有作用，能给犯罪的人处以刑罚，但是培养不出具有廉洁节操的人；它能把犯罪的人杀掉，但是培养不出一个具有仁爱之心的人。

《群书治要·淮南子》上讲得就更加具体了，它说“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律能够把不孝敬父母的人给杀掉，中国人讲“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那个不孝的人，特别是打骂父母，打骂祖父母的人，像在《唐律》中，都是处以斩首的，虽然能够把不孝的人给杀掉，但是怎么样呢？培养不出像孔子、曾子那样具备高尚德行的人。“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法律也可以把偷盗的人，处以刑罚，但是培养不出像伯夷、叔齐那样廉洁的人。“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孔子培养的弟子有三千多人，他们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成为社会大众的表率，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教育所成就的啊，它不是靠法律、刑罚能够办得到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忽视了道德教育，只专注于法制建设，还会

出现监狱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的现状。有一次，我们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在会议上有一位西方学者，她还是一位女士，就站起来用非常讽刺的口吻说："你们中国人，千万不要盲目地向西方人学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西方并不像你们想象得那样美好，恰恰相反还出现了你们几千年前老子所描述的情形。"当时她就引用了这样一句话"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你看我们的法令条文一天比一天地更具体、更全面，更详细，越来越多，但是社会因此安定和谐了吗？并没有因此安定和谐，反而盗贼多有，出现这个现状，就是因为我们忽视了道德教育所导致的。现在很多人都不以进监狱为耻，而是以进监狱次数多为荣。刚刚进来监狱的人，互相问说你这是第几次进监狱了，他说我这是第一次，那个人说你才第一次啊，我都二进宫了，旁边的人听了之后说你才两次啊，我这都是第三次了。都以此为骄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

所以依靠严格的法律，严密的监督机制，只要这个人一犯罪，就可以把他关进监狱，但是如果缺少道德教育的话，他们在监狱里互相学习、彼此切磋，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回到社会仍然会危害人群，所以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上也这样说到："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这句话说得很好，它说不能制止人民作奸犯科的心、作恶的心，只是以刑罚禁止他们的行为，就是每天都在市场上执行死刑，惩罚犯人，都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

《汉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专注于制度的建设，法令的严苛，而忽视了伦理道德的教育，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它说："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愈甚亡益也。"法律一出台，奸诈的行为就会产生，人们就会想方设法逃避这个法律的制裁。命令一下达，欺诈的行为就兴起，就像以汤止沸，以薪救火一样，只能使这个局势愈演愈烈而于事无补。这些就在告诉我们，在重视制度建设的同时，更应该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因果教育。人们都明理，才不会再去作奸犯科，这些也都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根本的根本就是

要治理人心，使人心归于正。要使人心归于正，就要培养人的仁爱之心。

在《论语》上记载着孔子的弟子樊迟来问仁的故事，孔子怎么回答呢？他说“仁者，爱人”。能以自己的所学来造福社会，利益民众，有仁慈博爱的心，这就是仁者。这个仁爱之心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呢？仁爱之心根本还在于孝悌。所以在《论语》的“学而篇”，有子说了这样一句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君子都重视根本，根本树立了，道自然产生。仁爱之心的根本在哪里呢？怎么培养起爱人之心而不是害人之心与人对立的心呢？根本就是在孝悌之心。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才能培养出仁爱之心，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慈悲之心。慈悲心从哪里培养呢？就是从孝悌之心培养的。很多人觉得这个孝已经是古老的传统了，在我们现代社会可能不适用了？现在谁还讲孝道呢？

在意大利有一本《机会》杂志，他们想请一个有名的人采访来提升这个杂志的影响力。他们想到了谁呢？他们就想到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那就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为了去采访比尔盖茨，他们就围绕“机会”这个话题设计了几个问题让他回答，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大写文章了。他们设计了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您认为最不能等待的事是什么？他们认为比尔盖茨会回答“机会”；

第二、您认为谁不会第二次前来敲门？他们想还是“机会”；

第三、您认为现在最需要抓住的是什么？他们想比尔盖茨还会回答“机会”，他们就会大写文章，对这个《机会》杂志，就会非常地有影响，有正面的效果。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怎么回答的呢？他说：

第一、我认为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是孝顺；

第二、不会第二次前来敲门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初恋；

第三、最需要抓住的是“恕我直言，是行善。”

所以你看他三个问题没有哪一个回答在机会上，反而认为天下最不能等待的是孝顺。孝不能等，行善最重要，最需要抓住。所以他成为世界

首富，是有原因的。因此我们不要只羡慕他是世界首富。《大学》上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学植物（学）的人都知道，植物的根能够延伸到哪里，它的枝叶花果才能延伸到哪里。后来这件事写出来之后，美国的《生活周刊》在卷首语就发表了这样一个感慨，它说：在现实社会里，人们总认为最不能等待的事就是机会；最不可能第二次前来敲门的是机会，最需要抓住的是机会。其实这种来自战场和商海里的观念并不适合于生活。

早在2008年6月21日，比尔盖茨夫妇在接受英国BBC电视台《Newsnight》访问的时候，就表示要把自己五百八十亿美元的财产全数捐给名下的慈善基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会留给自己的子女。他说：“我们决定不会把财产分给我们的子女，我们希望以最能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所以盖茨成为世界首富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他的德行深厚，虽然他可能没学习传统文化，但是他知道最不能等待的事是孝顺，这个善心也成就了他世界首富的地位和名声。所以我们说孝不仅仅是古人的观念，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观念，而且也是现代人的观念，也是西方成功人士的观念。这个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有一个幻灯片我也经常给大家引用，其实每一次也都是提醒自己。这个幻灯片的题目就是《哪一个是我》，写得非常感人。

那个一进门就喊“肚子饿了，饭怎么还没做好”的人，是儿女，

那个一进门，衣服都来不及换就下厨房烧菜的人，是父母；

那个一会儿说“粥烫了”一会儿嫌“菜咸了”的人，是儿女，

那个哪怕就一点青菜、豆腐，也要精心烹饪，力争做出滋味的人，是父母；

那个动不动就开口要钱，不给就生气的人，是儿女；

那个累了一整天毫无怨言，洗衣打扫卫生后再陪读的人，是父母；

那个记不住家人的生日，可一到自己生日，就是早早召集同学、朋

友聚会的人，是儿女，

那个很少记自己生日，却用心为家人准备生日礼物的人，是父母；

那个早上赖床，还不停抱怨家人叫他的人，是儿女，

那个深夜入睡、黎明即起，准备早点的人，是父母；

那个受了一点儿委屈回家苦水倒个不停，以求得同情和安抚的人，是儿女，

那个在外面受了再多气，回家后却强作欢笑的人，是父母；

那个有牢骚就发，有烦恼就怨，把家当作坏情绪“宣泄所”的人，是儿女，

那个把苦埋在心中，生怕让自己不良情绪影响家人的人，是父母；

那个总以学业、工作忙为托词，很少往家里打电话问候的人，是儿女，

那个在电话里嘘寒问暖、总为家人牵肠挂肚的人，是父母；

那个一开口就将家里的积蓄“借”走，然后舒舒服服住大房子的人，是儿女，

那个劳累了一辈子，到老还住在破旧小屋里的人，是父母；

那个总羡慕人家多么有钱，自己家多么寒酸的人，是儿女，

那个退了休还不“安分”，起早摸黑挣钱的人，是父母；

那个宁愿把大量闲暇时间放在娱乐、和朋友聚会、却不愿回家看看的人，是儿女，

那个只要看到儿女，哪怕就一会儿，都神清气爽的人，是父母；

那个娶了媳妇忘了娘，嫁了老公忘了爹的人，是儿女，

那个为儿女操了一辈子心，老了还帮儿女带小孩的人，是父母；

那个总以自我为中心，从不把家人太当回事的人，是儿女，

那个从不把自己当回事，却总以子女为荣四处炫耀的人，是父母；

那个总喜欢把爱挂在嘴边，却很少付出行动的人，是儿女，

那个从不把爱说出口，却将爱播撒于生活每一块土壤中的人，是父母……

或许，只有等到儿女也成了父母时，父母慢慢变老时

我们才会回忆起，生活里这些点点滴滴

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爱……

我们看了这个幻灯片就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爱，就在生活的点点滴滴，比如说每天最早起床做饭的人是谁呢？而最晚休息的那个人又是谁呢？比如，我们说好久都没吃什么东西了，结果回家的时候，自己爱吃的东西就会摆到桌子上。但是我们对父母的关爱，父母对我们的期望却是不能体会到。所以人如果没有孝心，父母的养育之恩都不能记在心上，不想着去报答的话，请问还有谁的恩德值得你念念不忘呢？

所以一个人不孝敬父母，没有树立起恩义、情义、道义，就会以利害之心与人相处。这件事对我有利，这个人对我有好处，我就会全力以赴，那另一个人呢？由利变成了害，对不起，我就会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来，所以这个社会风气越来越薄。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孝敬父母了。所以有子认为孝悌之心是仁爱之心的根本。我们为什么会有仁爱之心呢？我们能看到父母培养自己的良苦用心，才能可怜天下父母心。所以仁慈之心，才能提升，否则的话，你会想这关我什么事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有很多的事就不会去做，不会去做就没有仁慈之心。所以真正的仁慈之心也就是提升孝敬父母的这颗心，能够感受到父母的需要，进而能感受到天下父母的需要，才会愿意去做利益大众的事。这个仁慈之心确实是从孝悌之心生发出来的。

《论语》“为政篇”讲了“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之后，后面连续有几段都是在讲孝。很多人觉得这个孝和为政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为政以德”，怎样培养人的道德呢？那就是要推行孝道，所以他的

弟子子游来问孝，孔子怎么回答呢？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句话也有两种解法，说现在所谓的孝子，认为能赡养父母就是尽到了孝道，但是对于养狗、养马而言也同样是养，如果仅仅赡养而不尊重父母的话，怎么能把养父母和养狗、养马区别开来呢？另一种说法就是对犬马而言它们也能养主人，以自己的劳力来奉养主人，如果我们养父母没有恭敬之心，我们和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两种说法都很好，总之就是告诉我们不仅仅要能赡养父母之身，还要赡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恭敬父母。

养父母之心，还有一个表现。子夏来问孝，孔子说“色难”，就是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能可贵的，后面接着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就是有事情，儿女去代劳；有好吃的，让父母先吃。你以为这就是孝了吗？你看我们从这里就能体会到古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现在的孩子可能有好东西，自己先吃不顾父母；有事情都是父母给他去服务、代劳，哪里有服侍父母的心呢？即使做到了这些，那还不是孝道，还要怎么样呢？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在任何情况下都很有耐心，这才是真正的孝子。养父母之心不仅仅要尊敬父母，还要做到一句话，那就是孟武伯来问什么是孝的时候，孔子所回答的：“父母唯其疾之忧！”就是说父母仅仅为你的疾病而担忧，也就是说他们仅仅为你的疾病而担忧，完全没有必要为你任何其他事情而担忧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孝子。

比如说我们小学上学功课不好，喜欢贪玩，影响了学习成绩父母会担忧，这就是不孝；我们上了中学，经常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影响了功课，让父母不放心，这也是不孝；等到上了高中，学会了上网吧、打游戏，看一些不良的视频荒废了学业，整天无所事事，让父母担忧，这也是不孝；自己没有一个远大的志向，整天浑浑噩噩地混日子，父母看了也会担忧，那也是不孝；等我们走上了工作岗位，贪污受贿、违法乱纪，让父母战战兢兢，不知道哪一天东窗事发被关进监狱，这还是不孝。所以我们从这里观察，真正做到一个孝子谈何容易，那就是一个完人了。

所以我们想一想，现在很多年轻人，你说他不孝，他还给你争辩。他说谁说我不孝，我很孝敬，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很孝敬呢？因为他没有读圣贤书，不知道孝的内容这样的全面。在孟懿子来问孝的时候，孔子回答了两个字“无违”。樊迟正好给孔子驾车，孔子就对他说：孟孙来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就问：什么意思呢？孔子进一步解释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说这个“无违”，就是不违背礼的含义。

父母在世的时候要以礼来侍奉父母，到父母过世之后呢？还要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我们经常听上一代人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没有恭敬心，我们听了之后总觉得不能理解，觉得自己很恭敬了，怎么还说我们没有恭敬心呢？结果我们读《礼记》有一段专门讲孝子怎样侍奉父母的，就突然感到自己确实没有恭敬心。在《礼记治要》上讲了这样一段话，说儿子侍奉父母，应该鸡刚刚啼叫就起来洗脸、漱口、梳头、戴帽、理好饰物、系好帽缨、穿上端服、套好蔽膝、系上大带、插上笏板，这些都是古代朝廷当官的人去面见皇帝时穿的礼服，左右两边佩戴用具，然后到父母公婆所居住的地方，静气平声，询问父母需要什么，就恭敬地送上什么，和颜悦色以问寒问暖，父母如果有过错，要心平气和地劝说，如果劝说听不进去，就要更加恭敬孝顺，待父母高兴时再次劝说，如果父母发怒不高兴，甚至打得自己头破血流，也不能厌恶埋怨，还要更加恭敬孝顺。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的时候，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上一代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恭敬心，因为我们确实做不到这些。而且甚至很多年轻人认为这是封建礼教束缚人的，工作这么忙，时间这么紧，哪有时间这样问候父母呢？但是这个礼禁于将然之前，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做儿女的从小都这样恭敬地侍奉父母，哪里会有儿女打骂父母、不孝敬父母、不赡养父母的现象呢？哪里会有儿媳和婆婆不能相处的现象呢？

我们觉得很多人这是繁文缛节，但是有位日本留学回来的朋友，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娶了一日本媳妇，第一次带她回东北老家探望父母的时候，他们睡醒后的第二天大清早，公公婆婆打开房门一看：哇，这个儿媳妇穿着和服，脸上画着妆，好像去参加宴会一样，然后恭恭敬敬地跪在

门外，看到公公婆婆出来了，马上就鞠躬，说请问爸爸妈妈昨天晚上休息得好吗？这一举动把这老两口吓了一跳，不知道这个儿媳妇是怎么了？实际上我们看了之后，才知道原来日本人所承传的是中国人的礼仪。

现在很多人看到人与人鞠躬，觉得很奇怪，但是你看日本人鞠躬，就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所以我们这么好的礼仪文化都失传了，被日本人、韩国人继承了下来，日本被誉为世界上形象最好的民族。这让我们感到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没有恭敬心、感恩心。还坐在大树下面好乘凉，还拿着斧子要把这颗大树砍倒，还对它批判、讽刺、挖苦，所以现在中国人走到哪里都不受人尊敬。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丧失了礼仪之邦的传统不再有礼貌了，即使很有钱也仍然不受人尊敬，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所以我们要承传这个道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从哪里做起呢？就是要从孝敬父母、培养自己的孝悌之心、感恩之心做起，进而把这种孝悌之心推而广之，关爱来到我们身边的一切人。如果对父母都不恭敬，那对别人的恭敬一定是假的，一定是有利可图，这就是我们讲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社会的安定靠的是人心正。人的善心从哪里培养呢？它不是靠一两个法律规章制度就可以解决的，要改变人心，就是要培养人的孝心，孝心一培养起来，你才有仁慈之心，才有感恩之心，这个社会风气才能变得淳厚。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古音念“bì”。这一章所说的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在《论语》中，君子与小人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就品德而言。也就是说，君子是有德之人，而小人是无德之人；另一种是就“位”而言。君子是在位之人，而小人是没有位的平民百姓。这一章所说的君子与小人，是就品德而言的。怎么样判定一个人是有德还是无德呢？这一章给了我们具体的区别标准，它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关键就是在“周”和“比”。

什么是“周”，什么是“比”呢？在古注之中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比如说有的讲，“周”就是公，“比”就是私，这是就公私而言；有的讲，“公”（周）就是义，比（私）就是利，像《论语》上也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就义利而言；有的讲，“公”就是普遍，比就是偏党，这是就普遍和偏党而言。

在李炳南老先生《论语讲要》中，取的是公、私的说法。也就是说，周就是公，比就是私。君子办事是为公而不为私，而小人恰恰相反，小人办事是为私而不为公。君子平时的修养是去其私心，存其公心，这就是“周而不比”，而小人平时心里所思所想都是自私自利，这就是君子和小人最大的区别。

我们看这个“周而不比”，从有无私心上来区分君子与小人，也是来分辨善行与恶行的一个标准。我们读《了凡四训》就看到，有一群学儒的读书人，向中峰禅师请教，说佛家常讲“善恶报应，如影随形”，这个说法靠不住。因为有人作善，他的子孙并不发达；而有人作恶，他的家道却非常的兴盛：所以佛家所讲的善恶报应是靠不住的。

听了这句问话，我们就知道这些儒生，既没有把佛家的书读好，也没有把儒家经典学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善恶报应并不是佛家的专有，在《四书》、《五经》之中，也就是在儒家的经典之中，也有很多关于因果报应的论述。比如说在《大学》上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告诉我们，人人都喜欢追求富贵、财富等等，怎么样才能有财富呢？它告诉我们要培养自己深厚的德行。所以德行是根本，财富、权势、名声都是枝叶花果，都是外在的显现。

又比如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说财货是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结果怎么样呢？一定也会以不正当的方式给败散掉。所以财富并不是赚到手、贪到手就是你的了。它实际上为五家所共有：比如说我们这个钱是贪污受贿而来，最后东窗事发锒铛入狱，这个是为官府所没收；还有水灾、火灾这种自然灾害，也会把不义之财给焚烧掉、给剽夺走；盗贼也专门敲诈、勒索、偷盗不义之财；最后还有不孝的子孙、败家子，也会把

不义之财给败散掉。所以我们现代社会出了很多的败家子、富二代、官二代、啃老族，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种事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他们父辈的钱来路不正。所以需要有这些败家子、啃老族给败散掉。所以这个“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规律，其实讲的也是因果。

在《中庸》上，当孔子称赞舜王的德行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真正有德行的人，一定是福、禄、寿、名都是齐全的。当我们福禄寿名都不齐全的时候，就要反省自己了。自己是不是一个大德之人，厚德之人？这也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即使能做到一个小小的官位的人，都有一般人不具备的德行。比如说他或者能够顾全大局，或者能心胸开阔。总之，他有一般人不具备的德行。而我们再观察一下那些很贫穷下贱的人，就是说地位没有、财富没有、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往往也缺德。比如说他喜欢占便宜，喜欢想方设法偷别人、骗别人，正是因为他有这种不良的作风、不良的品德，才导致了这种贫贱的地位。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贫贱的原因，还去四处乞讨，不靠自己的勤劳致富，结果是越来越贫贱，再过十年二十年之后，他们仍然向人伸手要钱。而那些有财的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在用钱的时候，也非常大方。他们知道别人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就非常慷慨地去资助，所以他们是越施越多。古人所说，“千金散去还复来”，左手把这个钱给花出去了，右手又把这个钱给赚回来了，这也同样是因果。

《易经》上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果我们翻开一部《二十四史》，读一读这些历史故事，讲的是什么道理呢？其实都是给我们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现在许多人很喜欢学《易经》，学《易经》有什么好处呢？真正能够通达《易经》的人，看到一个人目前的所作所为，就能判断出以后的荣辱祸福、兴衰成败。所以我们读历史，确实看到了很多有道德学问的读书人，他们看一个人目前的所作所为，就能够推断出他以后的发展如何、前途

如何；看到一个军队现在的作风，就能推断出两军作战结果如何，最后结果和他们所预测的一模一样。那为什么这些人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呢？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神通，而是因为他们常读圣贤书，能够知道兴衰成败的规律。

一个省部级以上的官员突然锒铛入狱的时候，很多人就在议论纷纷。其实古圣先贤在经典之中早都告诉了我们原因，只是我们没有虚心地去学习。《易经》上就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所以为什么今天会有锒铛入狱的结果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所导致的，那是恶贯满盈的结果。所以古人看一个人，不是看他现实享受很好，一掷千金，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就对他很羡慕。再过十年二十年，甚至看一看他的子孙后代，就知道这样的人不值得羡慕了。

所以我们贪污腐败之风屡禁不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读圣贤书。像曾国藩能够做到“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公家的一文钱都不敢挪作私用，没有这个贪心。什么原因呢？大家都在贪财，都在捞钱，为什么他却能做到不取军中的一文钱挪作私用呢？并不是他比我们傻，比我们愚钝，而是他和我们所读的书是不一样的，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他从小熟读“四书五经”，那我相信，他对这些“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道理，还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都非常通达，而且深信不疑，所以他的外孙聂云台先生写了一个《保富法》的书。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就是因为他是曾国藩的外孙，又是上海商会的会长，耳闻目睹了当时满清末年的那些权贵的后代子孙兴衰成败的形态情况，最后很感慨，就把这些案例给一一地记载下来。他就是用自己身边耳闻目睹的案例，给我们证明了“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道理。

在《尚书》上也有关于因果的教诲。比如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逭”就是逃避的意思。就是说有天灾人祸，人还可以通过忏悔，通过改过修善积德来逃避，但是人作恶不知回头，那灾祸就是不可逃避的了；还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还说“惟天福善

祸淫”，天道自然的规律都是给善良的人带来福分，而给过分的人招致灾祸。《尚书》上这样的论述是很多的。

在《孟子》上也有关于因果的论述。比如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说明因果。你能够关爱别人，无私无求地帮助别人，换得的是社会大众对你无私无求的关爱。

当然在《论语》之中，也有一句是讲因果的，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因为你不想让别人怎样对待你，那就不要那样对待别人。因为如果这样对待别人，换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也一定会感召别人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这也是物理学上所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这都是因果。所以因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规律，并不是迷信，更不是古圣先贤为了教化人心而设置出来威吓百姓的工具。

在《春秋左传》上也有这样一句话，当然它前面讲了一个故事，后面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最后确实如它所预料的。

《了凡四训》上记载，中峰禅师对“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善恶报应，如影随形’这个说法不可靠”的回答是非常深刻。他并没有指出来，这些读书人没有念好儒家的书，儒家就有很多讲因果报应的句子呀。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是凡夫，情染还没有洗涤干净，慧眼法眼都没有开，所以往往把事情给看错了，是非颠倒，还自以为是。把善的看成了恶的，把恶的看成了善的，自己不深自惭愧，反而责怪老天的报应不公平，这是罪上加罪。

古人都相信天理，天理就是自然的规律。而我们现在的人是无法无天，不相信世间的法律，因为世间的法律执法的人不够公平，如果我们给他行贿，送给他很多的金钱财物，他就可以网开一面，所以世间的法律就可以逃避；也不相信天理，不相信因果，这个时候就叫无法无天。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什么坏事都敢做。你看食品安全问题出来了，贪污腐败的问题出来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出来了……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因果而胆大妄为所导致的。

所以西方人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一直有一个问题大惑不解。说你看中国的历史上，没有西方所谓的天主、基督、安拉等等这样的神主管着人的荣辱祸福，没有这样的宗教。传统文化也不是一种宗教文化的传统，但是为什么能把人心教育得这么好，社会保持安定和谐的局面呢？他们好像一直在研究。原因就在于中国人讲因果，而且因果的教育深入人心。比如说道家的劝善书《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等，都是历代状元、宰相的必读之书，也就是他们要考状元、去当宰相，能当好，就必须要读这一部书。所以古代的读书人都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对因果的道理是非常相信的。这就是中国古人没讲宗教教育、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是能把人心教育好的重要原因。所以恢复因果的教育也是迫在眉睫。否则的话，人们无法无天，确实什么坏事都敢做。

当然听了中峰禅师说读书人把善恶给看颠倒的这个说法，这些儒生就不服气了，他说我们为什么会把善恶给看颠倒呢？中峰禅师确实是很有智慧，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他们自己说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结果有个儒生说骂人打人是恶，恭敬人、礼敬人是善。中峰禅师说，未必然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另一个儒生就说贪财妄取是恶，廉洁有守是善。中峰禅师也说未必然也，不一定是这样的。结果这些儒生说了很多关于善恶的看法，中峰禅师都说未必然也。这些学生就开始疑惑了，就问他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中峰禅师怎么回答的呢？中峰禅师这句回答非常有意思，他也是让我们去反省自己是经常作恶还是经常作善。

中峰禅师告诉他们说，起心动念言语利益别人、利益社会、利益大众这就是善，如果起心动念是自私自利那就是恶。比如说，对这个人有利益的，你打他骂他斥责他这也是善。

再比如说，广钦老和尚有一个典故。广钦老和尚有一个弟子向他请教，他说："我这个人我执很严重，请师父帮助我破一下我执。"广钦老和尚看他很诚恳，就笑了笑，说好吧，然后这个学生就出去了。过了几天，有很多有名声的人来拜访广钦老和尚，这个弟子就在旁边服侍，结果他做什么广钦老和尚都斥责他，说他做得不对，想方设法地挑剔他、斥责他、

指责他，最后这个学生实在忍无可忍，就向广钦老和尚请教。他说："老师啊，为什么你当着多人的面来指责我呢？我也没有做什么不对的啊。"这个广钦老和尚就笑了，说："你前几天才告诉我，让我来帮你破我执，结果我刚刚想帮你，你就受不了了。"这个学生恍然大悟，原来老师是来帮助他的。

所以你利益一个人，即使是打他、骂他、斥责他，只要有利于他，那也是善，但是你恭敬别人、礼敬别人，甚至去给人家送礼，但那是为了巴结人家，让人家给你办事，贿赂别人，那也同样是恶。所以我们世间的人分不清善恶，所以往往指恶为善，指善为恶，自己还不知不觉。

在《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上就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孟孙特别厌恶臧孙，但是季孙却很喜欢臧孙这个人。当孟孙死的时候，臧孙就进入灵堂，哭声非常哀恸，流了很多的眼泪。出来之后他的车夫就对他说："孟孙生前厌恶您，您却悲哀至此，如果季孙死了的话，您又将会如何的悲恸呢？"臧孙怎么回答的呢？臧孙的回答很有意思。

他说季孙喜欢我，犹如给我增添了疾病，因为他一味地宠爱我，看好我，就原谅、姑息了我。所以他虽然喜欢我，犹如给我增添了疾病；孟孙厌恶我，犹如给了我治病的药石。虽然他厌恶我，但是他看到我的问题就及时地指正，那不就是给了我治病的药石吗？他又做了一个比喻：你看人发热的时候脸会很红，这个脸色很红的热症，外表显得很好看，但是不如那个外表显得不美的石针，因为这个石针能使我活命，而这个热症，似乎使脸色很美，但是危害却很大。如今孟孙死了，我的死期便为时不远了。为什么呢？因为孟孙死了，没有人再厌恶他，没有人会看到他的过失，斥责他了、纠正他了。而且身边总是有很多人在赞叹他，在称扬他，久而久之就自以为圣明，自以为修养得很好了。

我们看古人，确实做到了《弟子规》上所说的"闻誉恐，闻过欣"，所以我们学习，确实要把它落实在生活之中。听到别人批评我们、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给人家鞠躬表示感谢。像有一位学生学了《弟子规》之后，有一次洗碗没有洗很干净，这个老师就告诉他，怎样才能把碗洗得干净，

不能这样应付了事。结果他听完了之后，非常恭敬地给老师鞠了一个躬说："谢谢老师指正我的过失。"你看这个孩子学习，比我们成年人还能力行。

什么叫善，什么是恶呢？不要从形迹上看，而要看一个人的存心，否则的话我们往往把善看成了恶，把恶看成了善。后边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则为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把真善和假善区别清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没有私心，都是利益他人、利益团体、利益大众、利益社会，这个公就是真的，是大公无私，这个善才是真的。利己是私心，这个私心是假的，所以这个善是假善。

后面他还说，"又根心者真，袭迹者假"，就是做善事、利益大众是出于自己的真诚之心，这是真善。如果模仿别人，别人做了我们也跟着去做，这就是假善。比如说我们给人家鞠躬，为什么要给人家鞠躬啊？是因为我们发自内心的真诚、恭敬和感恩，所以我们才给人家鞠躬。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恭敬之心、感恩之心，只是看到别人在给对方鞠躬，那我们也模仿他们鞠躬，这就是假善。

后面还说，"又无为而为者真，有为而为者假"，就是说我们做善事没有什么企图和目的，这叫"无为而为"，这是真善。如果我们虽然做了善事，但是目的是求名闻利养，这个善就是假善。

所以古人特别强调阴德，什么是阴德呢？就是做了好事不要到处去宣传自己，为什么要宣传自己呢？为了获得别人的恭敬、赞叹、肯定、出名，你看这都是为了名闻利养，这个心很微妙。虽然我们同样是作善，但是还求得别人的肯定、恭敬、供养，这个善是假善。如果你做事就是为了利益大众，没有什么目的，也不想让人知道，还不露痕迹，这个善才叫真善。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要认真地考察自己的行为是真善还是假善，自己是一个君子还是一个小人。

在《群书治要·后汉书》上就记载着一个第五伦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让我们对照省察自己，我们的心到底是公心还是私心，当然我们看了这

个故事，也会觉得很惭愧的。

东汉时候，有一个人叫第五伦，他是京兆人，在建武年间被举孝廉。当时的皇帝是光武帝，以政事向他询问，两个人谈得很投机，一直谈到了晚上。光武帝对他说："听说你在做小官吏的时候，曾经用竹板打过你的岳父，而且还不到你的堂兄处吃饭，难道真有这些事吗？"你看一个人非常忠正廉洁，难免会有一些人要毁谤他，说一些他的坏话，甚至造谣中伤。而有德行的人又不愿意去辩护，所以谣言四起，没有智慧的人可能就会信以为真。

第五伦怎么回答的呢？他说，臣娶过三房妻子，都没有父母，可见说他曾经拿竹板打过岳父的事情是谣言。他还说，臣年轻时曾遭遇饥荒，确实不敢随便到别人家去吃饭。所以你看他回答得很巧妙，也很有趣味、很幽默。皇帝一听大笑，就把他任为太守。在任太守期间，第五伦奉公尽节，说话做事从来不受私情，有人问他，你也有私心吗？他回答说："过去有一个人，曾经送给我一匹千里马，虽然我没有接受，但是每到三公选拔举荐官员的时候，我心中总是对这个人念念不忘，到底也没有任用他。还有一件事说明我是有私心的，就是我哥哥的孩子曾经生病了，我一个晚上去探望了十次，但是我回来之后就安稳地睡觉了，睡得很安心，而我自己的儿子得病了，我一次都没有去探望，但是我整夜都睡不着觉。你看我都有这样的行为，难道说我没有私心吗？"

你看古人反省自己反省得多么认真而深刻，自己有一点点的私心、不平等的心，都能反省得出来。按理说，人爱自己的孩子，看自己的孩子比别人的孩子好，关爱自己的孩子比别人的孩子多，这是人之常情，但这是凡人的人之常情。对于那些想成圣成贤的君子人来说，他认为这就是自己私心的表现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古人对自己的要求，对自己的公心和私心的要求，确实是非常严格。我们看了这些，也确实感到非常惭愧。

关于这个"比、周"的注解，西汉的经学家孔安国说"忠信为周，阿党为比"，什么意思呢？"忠"上面是一个中，中间的中字，下面是一个心字，告诉我们就是把心放得中正就叫忠心。为什么会不忠信呢？就是因为心中

有私，有私了这个心就不忠，言语就不信实。所以君子内心公正正直，说起话来才会诚信、信实，说得是如实的话。我们看古代很多做官的人，确实做到了公正无私，做到了这个忠心。

明朝有一个读书人叫郑濂，全家有几代人同堂，甚至有上千口人都能够和睦相处。当时的皇帝是朱元璋，就问他，你是根据什么样的办法，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全家这么多的人治理得如此和睦呢？郑濂回答了四个字，他说“不听妇言”。

当然我们现在学习传统文化都要学到根本，不要在形迹上做文章，说你看既然他都告诉我们不听妇言，那老师您的话我们都不用听了。“不听妇言”，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妇女很少读圣贤书，所以她的理智没有提起，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往往就用私心，从感情出发，容易感情用事。所以对自己的孩子、自己喜欢的人就会很偏爱，对别人的孩子和自己关系远的人，可能就会很疏忽。如果用这个方式来处理事情，有私就会引起不平，不平之心积累多了，就会产生怨气。怨气再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仇恨，对立、冲突就因此而产生了。所以不听妇言，就是不听自私自利的、感情用事的、有私心的言语。

皇帝也想知道，他怎么样做到不听自私自利的言语，没有私心，为人处事很公正，所以就赐了他两个大水梨，还派人跟在后面，看看他究竟怎么样来分配这两颗大水梨。结果郑濂看到了皇帝的赏赐，不慌不忙，派人找来两个大水缸，然后吩咐人把这两只梨给挤碎，让梨的汁流在水缸里，然后把全家族的人都召集过来，说这是皇帝的赏赐，每个人一人一碗。你看他这个事就做得很公正，没有因为这个人是他的孩子，就把这个水梨分给他，不是因为偏爱某个人就把这个水梨赐给他。皇帝的赏赐要让大家均沾，一人一碗，所以大家都喝得很欢喜。

古代的读书人，确实能把心放得很中正，所以为人处事让人很信服，信服才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小人却恰恰相反，“阿党为比”，这个“阿”就是曲媚的意思，阿谀奉承、攀援巴结、结党营私，这才是小人的行径。

皇侃的《注疏》解释说，“周是博遍之法，故谓为忠信；比是亲狎之

法，故谓为阿党”。这句话实际上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君子能做到忠信，就是因为他的心量大，心量广博周遍，起心动念不是为一身，不是为一家，甚至不是为一国而考虑，起心动念都是为天下人着想。所以圣人的心量是“尽虚空，遍法界”，“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这就是周到了极处。所以君子能做到公正，就是因为他的心量很大，很广博。而小人喜欢讨好、巴结，见到达官贵人，立刻就起阿谀奉承之心，跟他亲近。这个亲狎的“狎”字也是亲近的意思，但是这种亲近，外表没有庄重，内心没有公正，言语没有诚实，完全是为了依附权贵，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私心。这种人，孔子所不齿，谓之为小人。

那我们进一步要问了，为什么君子心量很大，广博周遍，念念为天下，而小人为什么心量小，念念为一己之私而结党攀缘呢？原因很简单，皇侃再引古注，进一步解释这个周和比，就告诉我们原因了。他说“理备故称周，无私故不比”。这个“理备”就是得到了天理，心量就大了，就能够广博周遍了，这个天理就是自然的道理。也就是说这个人明理了，就能做到广博周遍，心量很大，心包太虚，量周沙界。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实的真相、真理是天下和我本来是一体的，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既然是一体，所以谈私就没有意义了。我们现在的人都是迷惑颠倒，我们经常比喻，就像海里起了一个小水泡，大家都认为这个水泡是我，其他的水泡是他，所以就有了我和他的区别，而执著我的利益，所以才会有私心，我和他才有了对立。而圣人就是一个明理之人，他明白自己和其他天地万物都是一体的，没有区别，就没有自我与他人的对立，所以他心量很大，广博周遍。

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宇宙本来就是一体，分不出自我和他人，本来就应该是心地无私，只是现在我们迷惑颠倒了，产生了一个妄想，把这个一体分为二，产生了分别，产生了分别之后再执著，说为了自己、要满足自己的利益，这个自私自利就产生了，这就是我执。你既然执着我，也就肯定会执著人，没有了我也就没有了人。

所以学习圣贤教诲首先就要去掉我执，去掉了我执之后，才知道人

我本来不二，真正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自然而然地做到大公无私。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经常所说的大公无私并不是勉强而为之，不是硬着头皮去做的，而是在明理的基础上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行为。圣贤人觉悟了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帮助众生、教化众生、无私无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自我和众生是一体，既然是一体的，就像我们的左手有了问题，右手去帮助它一样，这是自然而然的，不会讲什么条件。

我们看觉者的生活，君子的生活，他们的公心表现出来就和小人有天壤之别。比如说在《论语》上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个君子明了自我和众生是一体的，和宇宙万物是一体的，所以他助人为乐，成人之美。看到别人做好事，全心全力地去帮助，无私无求不讲条件，没有得失的念头，也就不会患得患失。而“小人长戚戚”，小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心考虑自我的利益，为了我的利益，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想方设法去谋害别人，这样的人整天活在郁郁寡欢的忧戚状态。

还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做事首先考虑的是这个事应不应当做，符不符合道义，而小人起心动念是为了自私自利，为了自己欲望的满足，所以就可能会做损人利己的事。其实，真正明白了人与众生、人与宇宙万物是一体的这个真理之后，就明白了损人绝对不会利己，损人就是损害自己；利益别人，帮助别人，那就是帮助自己。

还有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讲究“和”，“和”就是和谐，“同”就是等同。君子人强调“和而不同”，就像我们生活在一个集体之中，承担的责任是不同的，工作任务是不同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把这个事情做好，利益社会大众。虽然我们承担的任务不同，但是可以互相配合，互相感恩，为的是能把这件事成全。小人是“同而不和”，他可能怕得罪别人、影响人际关系，明明知道这件事不对，但是他要和你保持苟同的意见，也不愿意给你指出来，最后可能因为这件事做错了，产生了流弊，影响了整个团队的利益和长远的发展，这就是小人“同而不和”。

我们就知道了什么是和，什么是同，就知道中国文化为什么这么有

包容性。像几大宗教传到中国，中国人都没有去排斥，因为打开他们的经典，核心内容都是仁慈博爱。虽然他们有一些内容和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一样，那是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地理环境和我们不同，但是根本上都是仁慈博爱，所以欢迎他们来传教。因此不同形式的宗教，以不同的方式来教育和他们自己有缘的众生，共同配合，才有了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和而不同、大一统的局面。而如果我们求同，那就是大家都是清一色，比如说我们这个大花园有五颜六色的花，五彩缤纷、互相配合才觉得美不胜收。如果求同的话，就像这个大花园只能有一种颜色的花，这就显得非常单调了。所以中国在历史上能把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国家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就是因为它保持了和而不同。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能为公而不为私，他在生活中也有不同的表现，他在行为方式上也会有不同的表现，那么我们要注意去观察。

在《论语点睛》上，蔼益大师又把这句话的境界给提升了。他说“生缘、法缘、无缘，三慈皆是周，爱见之慈即是比”。在《大智度论》中提出了三种慈悲，那就是众生缘慈、法缘慈和无缘慈。

什么是众生缘慈呢？众生缘慈就是缘众生的相而生起的慈悲。比如说《弟子规》上所说的“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在《孟子·梁惠王》上所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他人看成我们的父母、看成我们的兄弟姐妹，甚至看成我们的儿女，这个是有相的，是缘众生的相而生起的慈悲，这叫众生缘慈。世间的慈悲，世间圣贤的慈悲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慈悲。比如说我们讲的《弟子规》上所说的，“泛爱众”、“凡是人，皆须爱”，这就是世间圣贤能够做到泛爱众，这也是周。

第二种慈悲叫法缘慈。这个法就是真理，也就是你认识了真理，知道了一切相本空，众生是五阴假合而成的假相，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当体即空，了不可得，但是众生不觉悟，在这里产生了虚妄的分别执著，迷惑了就造业，造业了就受苦，苦不堪言。圣人看到了，怜悯众生，要让他们离苦得乐。这是基于法缘慈，依法而起的慈念，称为法缘慈。

无缘慈，这个“缘”就是有条件的意思，无缘就是没有条件的慈悲。我们知道圣人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无住生心，不住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也不住过去现在未来，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这些法都不住，就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心无所缘。在无住的心中生起怜悯众生的心，这个慈悲心就是无住生心，这就叫无缘大慈。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众生都不知道诸法实相，不知道“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才虚妄造业。有了恶业，就会有恶的苦果，圣者慈悯众生，就来救度众生，令他们离苦得乐，明了诸法实相。众生缘和法缘慈悲还有无缘的大慈都是周。

下面讲，“爱见之慈即是比”，爱见之慈就是我们像一般世间人所有的这种有情爱的慈悲。比如说父母爱儿女，丈夫爱妻子，他们是因为爱而产生了慈悲，因为他是你的儿女你就爱他，他不是你的儿女你就不爱他，或者因为他是你的儿女你就爱他多一点，他不是你的儿女你就爱他少一点，这叫做什么呢？这是产生于爱见当中的慈悲，这个称为“比”，爱见之慈，这就称为“比”。

这是把我们的境界再向上去提升，让我们拓开心量，不能有爱憎之心、分别之心，一切众生我们都应该爱，至少我们要做到众生缘慈，这就是说凡是人，皆须爱。而当我们有了般若智慧，视一切法皆空，这就是做到了法缘慈，再向上提升，就是心无所住而生大悲之心，那我们就有了无缘大慈，真正成了大圣人。所以我们看，这一句话经过满益大师讲解，就把它的境界更加地提升了。

那我们学了这句话就知道，这个学圣、学贤的路非常遥远，不可得少为足，不能自己稍微有了一些修养、有了些进步就沾沾自喜。我们和圣贤人相比，确实差的非常远。这样的话，这个人的谦虚之心才会真正地生起。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

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这是讲鲁国的国君鲁哀公来向孔子请教，问怎样做才能让人民信服国君，拥戴国君。哀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在当时的鲁国长期以来都是由三家执政，三家大夫就是孟孙氏、季孙氏、叔孙氏，三家大夫把持朝政，鲁国的国君实际上是名存实亡。在这个时候鲁哀公很不得意，所以向孔子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孔子讲的是举错之道。

“举直错诸枉”有两种解法：第一种东汉包咸的注解，“错，置也。举正直之人用之，废置邪枉之人，则民服其上”。也就是说，要举荐正直之人并且任用他，而舍置邪枉自私之人，人民都会受到利益，所以才会心悦诚服来拥戴国君。如果相反，举用的都是邪曲不正之人、自私自利之人，而舍置了正直之人，人民就会受到其害，人民就不会服气，这是一般的讲法。这个讲法就是告诉我们要举用正直之人，而不能用这个自私自利的邪曲不正的人，这就是彻底把邪曲不正的人给废置不用了，这是第一种讲法。

另外一种讲法，这个“错诸”的“诸”字，是“之于”二字的合音字，意思就是“之于”的意思。比如我们说“反求诸己”，就是反之于自己的意思，“错诸”就是“放置在”。在这句话中“举直错诸枉”就是把正直之人举荐出来，放置在邪曲不正的人之上。这个意思就是说，仍然用邪曲不正的小人，但是要把他放在君子之下，由君子人来控制他，来引导他，这样的话他才不会对百姓造成大的伤害。

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中他认为“举直者而置之于枉者之上，民所以服”。他认为就把这个正直的人，放置在邪曲不正的自私自利的人之上，这个时候人民仍然还是心悦诚服的；如果相反把邪曲不正的人举荐出来，放在了正直的人之上，人民就不会服气。这个意思就是说，仍然要用小人把他放置在君子人之下，这样的话他受制于在上的君子，不能随意地作恶，人民也不会受到他的伤害，这个时候人民也会心悦诚服的。

在《论语讲要》上，李炳南老居士他认为这种讲法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讲法和孔子所提出的“尊贤容众”这个意义相合。我们知道要尊敬推崇贤德的人，但是对于小人也不能完全舍弃，还应该去教导他、

引导他。

在《论语·颜渊》上，有樊迟来问孔子什么是仁？什么是智？那我们把这一章和这一段合起来参看，就更加明了，后一种意义更好。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来请教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了两个字，就是"爱人"。爱什么人呢？当然是爱一切人。即使是小人、邪曲不正的人也包括在其中。当然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要引导他、教育他，也要放置在正人君子之下。"问知（同智）"，就是问什么是智呢？孔子也回答两个字"知人"。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自知者明，知人者智"。"樊迟未达"樊迟没有明了孔子的这个意思，孔子就进一步解释，他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如果你能把正人君子、正直、公正之人举荐出来放置在小人之上，使这个小人受制于君子，这个时候他就会受到君子的教导和影响，就会潜移默化地变成君子，这个就叫"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所以这告诉我们小人也不能完全舍弃不用，只要把他放在君子之下受到君子的教诲和引导，仍然可以教得好。所以中国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所以君子和小人最大区别就是：一个是受了圣贤教诲的人，而另一个没有受到良好的圣贤教诲的熏陶，而受到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久而久之，把自己的本性本善给蒙蔽了。所以孟子也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就是我们做学问提高自己的修养，其实没什么奥妙，只是把自己放逸的心或者说是丢失了的良心给找回来罢了。正是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人是可以教得好的，要有这种信心。

之所以要"举直错诸枉"，这个意义很大。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人的德行像风一样，一般的小人，在下位的人，他的德行就像草一样，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确实，历史的实践经验都证明上行则下效。"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所以"举直"就是把那个正直的、公正的人举荐出来做领导，这个是能够使这个国家治理得好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在我们现代社会，引导着国家走向的，不仅仅是从政的领导者，而且

也包括了各种媒体的领导者，像现在特别是网络、电视、媒体非常地发达，那如果我们的导演、制片人、记者，包括主持人全都是正人君子，都是正直之人，他们播放的内容都是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大众就会自然而然地受到好的影响。这个社会风气就会正，相反如果这些导演、制片人、主持人、记者都是唯利是图，他做不做这个节目，都是以收视率的高低为标准，以能获得多少的财富为标准，那很可能就会把那些暴力、色情的内容都搬上屏幕。这个时候，整个社会风气也就变得乌烟瘴气了。所以有人说，决定着现代社会道德风气的，还有前途命运的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国家的领导者，另一种就是媒体的工作者。这个媒体的工作者特别应该选用那些公正无私的人，这样才能够使社会走向正路。

“直”的标准是什么呢？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上是“正直之人”呢？

第一，就是孝廉之人。我们看在《论语》上记载着这样一句话：叶公来对孔子说：“在我们乡里有一个叫躬的直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并不是主动去偷，而是别人家的羊跑到他们家来了，他顺便就获取了、占有了。他作为儿子就去证明他（父亲）盗了人家的羊。”叶公认为这个儿子是一个直人，但是孔子听了之后，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乡里的直人与此不同，为什么不同呢？他说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就在这父子互为隐瞒之中了，所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件事就是告诉我们，证明父亲“攘羊”这个事情看起来是正直的事，但是它违背了人伦、天理，因为父子有亲这是一个人之常情，父子之伦也被称为天伦。仁爱之心从哪里培养起来呢？仁爱之心就是，从对父母的孝培养起来的。所以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他去证明父亲偷了人家的羊，这个事情虽然看起来是正直的，但是却违背了天伦之理，所以其中有诈，实在是不可取。父子互相隐瞒，出于天然、出于父子的天伦：父子有亲。事虽看起来是不正直的，但是它的理是非常直的，所以孔子说“直在其中矣”。

在古代的时候，认为父子天性它是天然有亲，顺着这种天然之亲去教导人，这个人才能教导好，这才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中国古人判断任何

一件事情，不仅仅是要合法，而是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那就是合情、合理、合法。这件事不仅仅要符合法律的规定，还要符合天理，符合人情，让人接受起来才好接受。而且这个法背后的精神也是人伦之道，也就是说这个法律设立、制裁，都应该以帮助人们达到父子有亲为目的，不能够引导人们去争讼。像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儿女去揪斗父母，学生去批斗老师，这个时候父子之间无亲，不仅无亲，还反目成仇。它的遗毒是什么呢？它的遗毒就是一直到今天。经过文革的人，对他们最亲近的儿女都不能完全信任，都是有所保留。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刚刚经历过的，我们最亲近的人，最可以信任的人，都可以把我们送上批斗台。请问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值得真正的信任呢？所以这个“直”是以孝为前提的。

“若父子不相隐讳，则伤教破义，长不孝之风，焉以为直哉。”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正直也是以孝为前提，当然并不是说父亲做这个事，儿子就可以去怂恿他、包庇他，而是说父亲做这件事虽然错了，儿子有劝谏的义务，但是去揭发他、指证他的那个人不应该是儿子，因为这有损父子之亲。这就告诉我们孝是直的一个前提。

“廉”是指“廉政”，刚直不阿，这也是直的一种表现。比如说在《后汉书》上记载着祭遵的故事。祭遵曾经追随汉光武帝去出征黄河以北，而且被任为军市令，他执法严明，不畏权贵，当时汉光武帝的族中，一个小儿犯了法，结果就被他严明执法，依法处死。这件事被汉光武帝知道了后就非常生气，要把祭遵收监。当时的主簿叫陈副，来劝谏了。他说：“您一直想让军法严明，而现在祭遵执法不避权贵，就是使军令严明，能够使这个法律施行得好。”光武帝也很难得，就听了陈副的劝谏，不仅没有治他（祭遵）的罪，把他赦免了，反而把他任为刺奸将军。他经常这样告诫祭遵手下的将领，他说祭遵这个人执法严明，我们族中的小儿犯了法他尚能依法处置，不加包庇。更不会包庇你们这些将军，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祭遵过世之后，汉光武帝非常痛心，看到他的车马还经常痛哭流涕，还经常说上哪里再找到像祭遵这样忠直之人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古代的这

些皇帝也非常难得，他懂得任用这种刚直不阿的人，才能使法律严明，才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我们现在社会有很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有权有势的人犯了罪，他可以通过行贿受贿的手段使这个人免于惩罚，这个时候法律的尊严就受到了破坏。

还有一种直叫“忠直”，也就是犯言直谏的人。这样的人被称为“直”，在《群书治要·新序》上说了这样一句话，“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说一个位高权重的大臣，他重视自己的俸禄，所以不会极力地劝谏，这个君主身边的近臣又畏罪，不敢犯言直谏，下面的民情不能通达到国君那里，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

在《吕氏春秋》上也说，“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直言也”。贤明的君主最看重的是什么呢？不是金银财富、土地等等，最看重的是贤士、贤德的人才。为什么要看重这些贤德的人才呢？因为他们能犯言直谏。他看到国家有问题了，这个团队有问题了，他能及时地纠正，向领导者通报。这样的话就能使下情上达。

在《孔子家语》上记载着“史鱼尸谏”的故事：史鱼他是卫灵公的一个臣子，当时的蘧伯玉很贤德，但是卫灵公却不任用他，而弥子瑕这个人很不贤德，无德无才，却得到了重用。史鱼这个人多次向国君劝谏，但是卫灵公都没有听，最后史鱼死了，在他死之前就对他的儿子说：“我身为国家大臣，在位的时候不能奉劝国君晋见贤德之人，罢黜不贤德之人，这是我作为臣子没有尽忠职守。我死后也不能用正常的礼仪去安葬了，把我的尸体放在窗户之下就足够了。”他的儿子很听话，就依照他父亲的指示，把尸体放在了窗户之下。卫灵公来吊唁，看到了这个现象就很惊愕，问：“为什么要把尸体放在窗户之下呢？”史鱼的儿子就把他父亲说的这番话向卫灵公说了，卫灵公听了之后惊慌失措，就说这是我的过失啊，于是就命令这些人按着正常的礼仪安葬了史鱼，并且接受了他的劝谏，晋用了蘧伯玉，把他举荐出来做官，罢退了弥子瑕，而且疏远了他。

孔子听到了这一件事，他说：“古代的那些犯言直谏的人，到死的时

候也就终止了，没有像史鱼这样死了之后，还以他的尸体来劝谏他的国君。他的忠直感动了他的君主。”这就是古代忠直之人，他是不顾惜自己的利益，不顾惜自己的生命，那都要去劝谏君主的过，这是忠直的一种表现。

在《汉书》中也有一个直谏君主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周昌。周昌是沛县人，和汉高祖是同乡。当时他任御史大夫，为人坚忍而有毅力，敢于直言。就是像萧何、曹参这样的人，都在这方面比不上他。有一次，周昌在汉高祖休息的时候，来进宫禀报事情。这个时候，皇帝正在搂抱着戚夫人，周昌看了之后转身就跑，汉高祖就追上去把他抓住，骑在周昌的脖子上问：“说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呀？”周昌就昂着头说：“陛下是像桀纣一样的君主。”高祖就笑了，但是从此以后更加畏惧周昌。高帝想要废掉太子的时候，这些群臣都来劝谏，但是汉高祖都没有听从，这个周昌在朝堂上争辩得最厉害，汉高祖就问他不能废掉太子的原因，这个周昌本来有口吃的毛病，又在盛怒之下，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嘴上说不出来，可是我心里知道这不行，陛下要废掉太子，臣肯定是不能听从命令的。”所以这个故事称为“周昌期期敢直言”。他的这个表现让高祖欣然而笑，太子的地位也得以稳固了。所以你看古代的大臣，他能把实情告诉给皇帝，而且皇帝做错事的时候，他不惜自己的生命还要劝阻皇帝，这就是忠直之人。

还有一种直就是正直。怎样才能做到正呢？只有学道才能做到正。在《吕氏春秋》上说：古代的这些君主，都希望有忠臣；当父亲的，都希望有孝子；作为臣子的，都希望能得到高官厚禄；但是往往人们得不到他们所希望的。也就是说“国君得不到忠臣，父亲得不到孝子，而臣子也得不到高官厚禄，甚至可能半途而废、锒铛入狱。”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不知理义。不知理义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人教他们。没有人教他们所以才导致不知理义，所以中国古人对那些讲道之人特别地尊崇，尊师才能重道。所以对于这些讲道德的人，就特别地重视。

在《尸子》上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比喻，说如果你们家的房屋着火

了，有人帮你把火给扑灭，你会怎么样呢？你一定会对他们感恩戴德。但是那个上了年纪的人，有经验的人很早就提醒你，要把这个烟囱做得弯曲一点，把这个柴火从灶旁给移开，把这个墙的缝隙给涂好，如果你这样做了，你终生都没有失火之患。但是你听起来就像耳旁风一样，觉得这个人真唠叨、真烦，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入了监狱，有人能想方设法地使他免于牢狱之灾。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人被关进了监狱，如果有人能托关系、走后门想方设法地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他们家三族的人都会对他感恩戴德。为什么呢？因为他出来之后能孝敬父母，能照顾妻子，还能教育儿女，所以他们全家人，都会对能解除他牢狱之灾的人感恩戴德。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在于，有人教导你仁义慈悌的道理，让你做人要有仁爱精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够去贪不义之财，仁义慈悌要怎么样呢？慈爱众人、要友爱兄弟等等。你按着这个教诲去做，终生都没有被关进监狱的这种忧患，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感恩戴德。

我们听一堂传统文化的课，还是给别人面子来的，是因为不好拂人家的面子，人家邀请我了。但是如果你听了这样的道理，你潜移默化地按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标准去做，终生不会被关进监狱。但是我们知道不知道对这样的人感恩戴德呢？我们不知道。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对那些讲道德、行道德的人不尊重，我们反而尊重有钱的人，那大家会怎么样呢？争相地去赚取财富。所以你看现在的大学生，都以能找到一个薪水很高的工作为荣。古代的人读书志在圣贤，读书是为了成圣成贤而读书。现在的人读书是为了什么呢？读书志在赚钱。都以看一个人能赚钱多少，作为评价他的社会地位，他的人生成功与否的标志。这会促使人们争先恐后地去为了赚钱甚至不择手段，还甚至会出现“笑贫不笑娼”的现象。所以这个社会为什么道德沦丧？为什么五伦关系都紊乱？原因就在于我们不重视这些正直之人，来教导百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所以它的风气败坏是有原因的。而我们对金钱的崇拜渗透到各个角落，比如说我们去坐飞机的时候，经常听到在机场有这样的

招呼，“请头等舱和公务舱的人先行登机”，你看为什么他有优先权呀？因为他有钱，所以有钱的人有优先权受到尊重，就促使整个社会的人都争相地去赚钱。

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从上面的领导者到底下的老百姓都是争相地谋取利益，这个国家就危险了。为什么危险了呢？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出现了腐败问题，屡禁不止；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出现了医德、师德的问题。你看古代的时候，这个医生，还有老师，是最受尊敬的。这两种人可能没有多少钱，甚至是穷秀才，但是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为什么呢？因为古代的人重德不重财，因为这个医生和老师为社会的付出是无私无求的。

比如说老师，他看这个学生家境很贫寒，但是他刻苦好学，宁愿自己掏学费帮他出生活费，都劝他来读书。那最后他读书成名了，当然是为国家能够做贡献了，他也念念记着老师的恩德，所以老师是最受社会大众的尊重，医生也是。他听到门外有人敲门，他也不问这个人家庭贫富贵贱，能不能支付起医药费。他背起药箱就去给人治病，把人的病先治好再说。结果这个家很穷，拿不起医药费，他把这个药，都免费地送给人家了。所以这两种人，最受社会大众的尊重。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重视金钱，结果导致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金钱而不择手段，所以能教导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人，这样的人应该受到国家的尊重。如果国家能把这样的人聘为国师，而且请他们在电视台、网络上，面向大众来宣讲传统文化。领导者带着各级干部都来学习。这个时候“上行而下效”，整个社会才能兴起道德教化之风。所以我们看到历代的开明皇帝，都把儒释道三家的大德聘为国师，对他非常地礼敬。这些人给他们讲的全都是圣贤教诲，如何做君子。这样的风气一开，这个社会三五年的时间就能恢复正常。所以并不是说道德教育不得力，而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地重视。

历史上朝廷的更替、朝代的更迭，也只不过是三五年的时间就恢复正常了，它从乱到治也就需要三五年的时间，而在我们现代社会、媒体、

网络等传播工具都非常发达，比如说我们用电视、网络把那个不好的内容都摒弃，让大家都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学习传统文化，那可能一年两年的时间社会就归于大治。这是讲要用正直之人。这几个标准就是告诉我们，领导者在选人的时候要怎样去选人，任用哪些人？下一个问题就是谁能真正地举贤呢？

我们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谁能担当起举直的责任呢？现在我们社会都流行民主选举，中国古人为什么不提倡民主选举呢？我们看在《论语》上孔子说了这样一句话“乡愿，德之贼也”，什么是“乡愿”呢？就是一乡的人都称他是善人。那一乡的人都称他是善人，为什么孔子还认为他是贼害道德的人呢？孟子对这句话做了这样的回答，他说：乡愿这种人最能掩蔽他的罪恶，以致令人没有办法举出事实来诽谤他，也找不到缺点来讥刺他，然而他实在是同流合污，因为他善于掩蔽，表现得就像忠信廉洁之人，所以才赢得大众的称赞。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忠信廉洁的人，也不能学圣贤之道，这个人是无德而伪装有德，所以孔子唯恐这种人乱德祸众，所以指明这个人是道德的贼害者。从这里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不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选拔贤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百姓，第一就是理智不够，他可能分不清谁是真正贤德的人，很多人说怎么可能呢？你也太不相信人民群众了吧！

在《春秋左氏传》上记载着一个子产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子产任郑国的宰相，把郑国治理地非常好，但是刚开始子皮把国政交付给子产的时候，他也遇到了挑战。子产以礼法来治国，使国都和边邑的车马服装各有区别，上下尊卑各有制度，田地也划有疆界，而且还修建了田间的沟渠，使五家相保编为一伍，卿大夫之中，有那些忠贞俭朴的就给以适当的奖赏，骄纵奢侈的就依法予以惩办，结果子产执政一年，众人都唱道“把我的衣帽储藏起来”，为什么把他的衣帽储藏起来呢？因为这个富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奢侈会受到制裁，所以不得不把自己那些好的、奢华的服饰都藏起来了。“还丈量我的耕地、征收田税，谁去杀了子产，我愿意帮忙。”你看子产在郑国执政一年之后，很多人都非常痛恨他，如果你要

用民主选举的方法，这个子产肯定是落选了。但是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众人这个想法改变了。他们说："我有子弟，子产来教诲；我有田地，子产使之增产；就是子产能让这个田地增殖，子产如果死了，谁能继承他的事业呢？"这个时候大家都担心子产过世，因为他这么好的教诲没有人再推行了。他们的利益也受到了影响。所以你看这个能识别真正贤明的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的百姓可能没有这个智慧。

所以孔子在《论语》上也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就是很多人都厌恶他说他不好，你也要认真地去考察，他真的像大众所说的那么不好吗？就像郑板桥为什么写难得糊涂呢？很多人不理解，说这是消极的人生观。其实恰恰相反，这反映了他不愿意和那些人同流合污的一种高洁的志向，因为大家都是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而他自己一个非常清正人，这些人就会排挤他，他一个人孤掌难鸣，怎么办呢？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难得糊涂"。所以很多人厌恶他，可能是因为他很清正而且不愿意和人同流合污，所以很多人都排挤他。"众好之，必察焉"，就是很多人都说他好称叹他，你也要去认真地考察他真的像大众所说的那么好吗？可能这些人都是他的同党，他当了官都给他们利益，结党营私，所以你要去考察。

在《群书治要·晏子》上就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晏子开始奉命到阿城去当地方官，结果治理了三年，毁谤的声音就传到了齐景公的耳朵里，齐景公听了很不满意，就把晏子召回来要罢免他。晏子很有智慧，他没有去辩解，因为知道辩解也没有用。他说："君主啊，我知道自己错了，请再给我三年的时间，让我重新去治理阿邑，我一定会让赞誉的声音，都传到您的耳朵里。"于是他又回去治理阿邑。

果然三年之后赞誉的声音全传到了齐景公的耳朵里，这个时候齐景公就很开心了，要给晏子以封赏，但是晏子却推辞不受。他说："三年之前，我刚刚治理阿城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呢？我注意修理小路，注意家家户户的防卫，结果使那些邪曲不正的人都不得其便。比如说他想去别人家偷东西，但是因为他提倡了家家户户的防卫，这个邪曲不正的人就

不得其便，所以邪恶之人就厌恶我；我还提倡节俭，兴起了孝悌的教育，教导人要孝敬父母、尊重兄长，还要惩罚那些偷懒的苟且之人，结果懒惰的人就不高兴，就厌恶我；在判断诉讼的时候，对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也不偏向，结果这些权贵就厌恶我；对于身边的人，他们有什么要求，合理的就给予，不合理的就不给予，结果身边的人也就不高兴了，也厌恶我；那些权贵之人来考察，我就按着礼仪的规定给以接待，也不给以他们过分的招待，结果这些权贵之人就厌恶我。所以有三种邪恶之人毁谤于外，有两种谗曲之人毁谤于内，所以不到三年的时间，这个毁谤之声就传到您的耳朵里，被您听到了。而当我重新回去治理阿邑的时候，我改变了以前的做法，不再修整小路，也不加强家家户户的防卫了，邪恶的人就高兴了；我也不提倡节俭了，对那个懒惰的人也不给予惩罚；也不再教导他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了，苟且偷懒的人也就高兴了；我断案的时候，偏向那些有权有势有财富的人，结果这些豪强权贵也就高兴了；对于我周边的人，只要他们有什么要求，也不管他合理不合理我就满足他们，结果我身边的人也就高兴了；那些权贵来访的时候，也不管他是不是符合法度，我就超越礼仪地好好地招待他们，结果这个权贵之人也就高兴了；结果不出三年，赞誉之声就传到您的耳朵里了。其实三年之前我所做的事情是应该给以奖赏的，而三年之后我所做的事情，是应该给予惩罚的，但是您却要给我奖赏，这个奖赏我不应该接受，所以我也不敢接受。”齐景公听到这里，若有所思，他也明白了晏子的一番苦心，最后他终于还是任用了晏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贤德之人要去做事的时候，一般的百姓可能不理解。特别是当百姓的理智、道德没有提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反而还对他诽谤攻击,所以怎么样呢？这个贤德之人也很难施展。我们如果通过民主的方式来选举，那很多的人就看到眼前的小利，他看不到全局，那谁投其所好他就会选谁，谁给他的钱多，谁给他的贿赂、投他心意，他就去选谁，那就会出现大量徇私舞弊的现象，所以我们把民主选举引入到村干部的选举之中，据说有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黑社会的老大被选为村支

书的情形。

中国古人，有这些历史的经验，他是不会盲从的，他知道应该谁来举荐贤德之人，只有贤德的人，才能够举荐贤德之人。所以不提倡民主，那也是有原因的。再下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一个道理不难理解，因为“上行下效”。那么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举直”却这么难呢？为什么举荐正直的人，正直的人不被用呢？难在何处？

第一，就是举荐的人，任用人才的人他没有知人之明。没有知人之明，他可能就被那些看似善良的人，看似有德的人，看似忠正的人给蒙蔽了。因为很多人说得很好，但是做起来都和他说的不一致。所以孔子告诉我们“巧言令色，鲜矣仁”！而且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不能只看他怎么说，其实很多人特别能干事，但是却不怎么能说，表白也不怎么有口才。实际上在一个团队中，最能干事的往往是这些人。所以第一就是说，领导者缺乏知人之明。

第二，就是领导者自己不是一个贤德之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私心很重、贪欲很重，小人就会利用他的贪欲，满足他的私心，结果这些人就受宠了。在《韩非子》上就告诉我们“任用君子之人，远离小人”，就会使这个事业兴盛发达；如果我们任用的是小人，远离了君子之人，这个事业就会衰败。我们怎么判定身边的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呢？《韩非子》上说了这样一句话，它说这个奸佞的小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能顺着领导者的心思去说、去做，来取得领导者的宠爱和信任，所以领导者认为什么是好的，他一定跟着赞叹；领导者认为什么是不好的，他一定跟着去毁谤。当然，说明这个领导者他说的不一定是真正的好，但是这个小人为了投领导所好，他一定跟着去谄媚巴结、阿谀奉承。这样的话，这个事业就很难兴盛发达了。

之所以不能够任贤，不能够举直，就是因为领导者自己有私心，而小人利用了他的私欲，来满足他的私心，不能把真正正直的人举荐出来。

在蒲益大师的《论语点睛》中，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惟格物诚意之仁人，方能举直错枉。可见民之服与不服，全由己之公私，不可求之于

民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真正做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仁人，他才能够做到“举直错诸枉”。也就是说民众服与不服，在于自己有没有公心，是自己公正无私还是充满了私欲。“不可以求之于民”，不可以一味地去让人民服从你，要求人民服从你，这个服一定是心服而不是口服。“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你怎么让人心服口服呢？那就是领导者一定能够公正无私，不要举荐那些和自己关系亲密的人，不能举荐那些给我送礼的人，满足我私欲的人，不能因为这个私心而放弃了公义。

所以《群书治要》上说：“仁者在位，而仁人来；义者在朝，而义士至。”这个“仁者”，有仁爱心的人在领导的位置上，他自然会感召有仁爱心的人从远方慕名而来；“义者在朝”，讲道义的人都在朝中为官，自然会感召义士都从远方而来，也来和你一同把这个事情办好。这就是告诉我们“举直错诸枉”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难在领导者自己有私心，不能克服。

在《孔子家语》上也记载着鲁哀公向孔子来请教：“大礼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你一谈起礼就这么样地尊崇呢？”孔子说：“人之所以能够正常生活，这个礼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礼，就无法按着一个合适的标准，来祭祀天地鬼神；如果没有礼，就无法区别君臣上下长幼的位置；如果没有礼，就没有办法来辨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远近、亲疏的交往。因此古代治理国政的人，对礼特别地尊重，而且把他们自己所能做到的来引导百姓。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所住的房屋很简陋，他们的服饰非常地俭朴，车子上没有特别的雕饰，所使用的器具也不是精刻细雕的，饮食不讲究美味，心里没有特别的贪求，和天下的百姓共享利益。古代圣明的君王是这样来行礼的。”哀公听了之后，也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为什么现在的君主不能这样去做了呢？为什么不能推行礼了呢？既然礼这么好，一用礼这个国家就能得到治理，但是为什么现在的国君，却不能这样去做了呢？”孔子回答得也很有味道，他说：“现在的君子追求利益，现在的国君追求利益，贪得无厌、荒淫奢侈无度，懒惰怠慢，游手好闲，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钱财来满足自己的贪心，使百姓抱怨朝政，违背

众人的意愿去征讨政治清明的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不是依据正常的法度，而是任意地使用暴虐、严酷的刑罚来诛杀百姓。从前的君主治理和役用百姓，都是按着前述的方法去做，而今天的君主官吏，役用治理百姓都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去做，这就是今天的君主，不能修明礼教的原因了。”

这一论述，也就是告诉我们，国家的礼教不能推行，不能真正地把正直之人举荐出来，就是因为领导者、为官的人，不能够率先垂范，克服自己的私心和私欲。所以难就难在这个习气难以克服，已经习惯于骄奢淫逸的生活了，你让他过俭朴的生活，很多人看不到它的意义，也就会去抱怨。就像我们现在国家提倡“反对奢侈、厉行节约”，这个号召提出来了，很多领导干部还想方设法地去蒙蔽领导，把那个消费的场所，从高级的酒店挪到了乡村，挪到了私人会所。自己的私欲克服不了，这是不能“举直错诸枉”真正的原因，所以还是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自己的身修才能够家齐，家齐才能国治，国治才能天下平，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

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季康子是鲁大夫季孙氏，名肥，谥康，所以称为季康子。当时鲁国的三家，就是仲孙、叔孙、季孙把持国政。当时民心不服，所以康子就来向孔子请教，怎么样才能够使民对上恭敬尽忠，以及劝勉为善。这个“以劝”的“以”字，就“与”字的意思。孔子怎么回答的呢？孔子说：“君以庄严面临民众，则能使民敬君；君以孝道教民并能以慈待民，则能使民尽忠；君能举用善人而又教化不能之人，则民自能相劝而善。”这在邢昺的注疏上说：“当时季氏专执国政，他的位置就犹如国君，所以孔子的回答都以人君之事来回答的。”当然这个“君”，我们可以作广义的理解，也就是领导的意思。这里边讲的三件事，是每一个当领导者的都希望的。就是怎么样让民众对自己恭敬、尽心竭力地负责工作，而且还能够互相劝

勉为善。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临之以庄则敬”，这个“临”就是在上对在下，或少数对多数，叫“临”。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临山临水。对大多数百姓，与他们相见的时候必须庄重，当然这个庄重，就是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临之以庄”、“敬人者，人恒敬之”，对方也自然对你恭敬。在《论语·颜渊》上，孔子也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就是你走出门去与人相晤的时候，就犹如接见大宾，就是犹如接见国宾一样；使用民力就犹如承奉大祭，见大宾的时候，必须敬，承大祭的时候，必须诚，这个诚敬之心体现在外就是守礼。所以使自己的视听言动都符合于礼的要求，自然就有威仪、受人尊敬。

而现在很多人教人学笑，殊不知“胁肩谄笑”是阿媚小人的行为。更有一些领导者，以讲黄色笑话为荣，以为不如此就不幽默，甚至形成了一种风气，这更是轻浮之举！这个“庄”，它的内涵是仁德。也就是说有仁德心的人，他的外表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庄重。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言为心声，诚于中而形于外”，这个庄重是由衷的，而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如果你装、故意在表演，一次两次还能够瞒得过人，但是久而久之，也就会被人识破了。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能够做到庄重，必须内心有仁德。《孝经》上告诉了我们“临之以庄”的具体要求。《孝经》上说：“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就是作为领导的人，他言行上都是符合于经典的，不是随便乱说话，这样的话，才能够给人以引导，朝着道的方向去行进。

所以孔子教导学生，有四个科目，叫“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德行摆在第一位，其次就是怎么说话。这个告诉我们，说话要非常地小心谨慎，要考虑它是不是符合圣贤教诲，给人以怎样的影响和引导，不可以随便乱说话。“行思可乐”就是我们的行为，要考虑到是不是使人民欢乐喜悦。要做的事一定是有利于人民的事，而不是自私自利的、骄奢淫逸的行为。“德义可尊”就是他的德行和道义都可以受到人民的尊敬，他的品

德无可挑剔，做事都符合道义。“作事可法”就是他做事情都可以让人效法。“容止可观”，他的容貌举止都有可观之处，就是相观为善，就是他的容貌举止都是非常得庄重。“进退可度”，古人有一句话说：“进则兼善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如果有机会为国家出力的时候，国家重用我的时候，我就用自己的才能来为国家做事，兼善天下。如果没有机会为国家服务，“退则独善其身”，无论是进是退，都是自然而然的。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出来做事，当国家不需要的时候，就让贤于人，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这样的话，是一个君子的行持。一个人做到了这些，就让人们自然感觉到恭敬，对他产生恭敬之心。

第二，就是“孝慈则忠”。前一句话是教导百姓如何敬，“恭敬”，这一句话是教百姓如何“忠”。怎么样做，人民才会对自己尽忠呢？那就是要首先教人民“孝”。“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因为如果一个人对父母不孝，他对领导很尽忠，是不可能的，那肯定是有利可图，他是有功利之心在为人处世的。一个人对父母孝敬，才有知恩报恩的心，他做事的原则是恩义、道义和德义。这种处事的原则是一以贯之的，他对领导自然会忠心。所以《孝经》上说：“夫孝，始于孝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也就是说以孝教导人民，始于孝父母，中于孝君。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教百姓孝亲，首先是教孝养父母。一个人能够孝养父母，对父母很恭敬，他到社会上办事的时候，自然能够忠君。这个“君”就是领导，对于领导很忠心。那我们发现，一个人对领导的态度，对老师的态度，其实往往反映了他对父母的态度。如果他对父母很不恭敬，说话都有逆反之心，经常顶嘴，那他对老师也是如此，对领导也是如此。因为他这个处事原则已经形成了，没有恭敬之心。

所以这个恭敬之心，从哪里做起，从哪里学起呢？就是从孝敬父母来学起。在《礼记》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人是怎么样孝敬父母的呢？“鸡鸣”就是刚天亮，就要起来洗头、漱口、刷牙、洗脸，然后穿戴整齐，就像去见皇帝那样，像去见天子，像去见国君那样庄重。穿上这些朝服、帽子，带子系好，还要带上父母可能要的东西，然后到了父母所居住的地方，非常

温和地、很柔和地问父母需要什么，然后就敬奉上什么。如果父母对自己不满意，把自己甚至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敢有怨恨之心，而且还更加地恭敬、更加地孝顺。等待父母和颜悦色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再去劝谏父母。这样的对父母的态度，如果我们学会了，这个恭敬之心就会形成。一以贯之，对待父母是这样的，对待老师、对待领导也是如此。所以忠君其实也就是孝君，好比儿子孝顺他自己的父亲一样。在上者是人民的父母，所以我们中国古人经常把官员形容为父母官，把人民形容为子民，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要怎么样呢？以慈来对待人民，视民如子，必须拿出当父母的态度来对待百姓。

在《六韬》上记载，周文王向姜太公请教怎么样治理国家，当时姜太公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我们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就要反省自己对属下的态度，是不是做到了像父母慈爱儿女一样，像兄长慈爱弟弟一样。那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慈爱自己的儿女呢？这个儿女挨饿了，自己家里不够富裕，自己宁愿挨饿，也要想方设法地让儿女吃饱。穿不暖了，冬天的时候要挨冻，宁愿自己挨冻，也要让儿女穿暖。这是一种对待属下的态度。所以是"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看到百姓很辛苦奔波，就非常地为他们感到悲伤；看到他们饥寒交迫，也为他们感觉到哀愁。这才是一个领导对待属下正确的态度。国君就像父母亲慈护孩子一样对待他的臣民，所以说"孝慈则忠"。也就是说你想希望属下对你尽忠，你就要首先教他们孝，还要慈护这些属下，否则就像《孟子》所说的，它说："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这个领导者把被领导者雇佣来了，说我已经给你出钱了，你给我出力就好了。就把他当牛作马地去使唤。结果这个被领导者下了班了，在路上碰到了领导都是装没看见，一低头就过去了。这个是现代西方的企业管理中所常见的，特别是跨国企业，这个员工连他们的老板是谁都不知道，一天就是上八个小时的工作，然后拿了钱就走人。即使在路上碰到了老板都不认识，就像陌生人、国人一样，没有太多的亲密。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更有甚者，这个领导对被领导者像对待泥土和小草一样，认为他们低贱不值钱，把他们生命视为如此的低贱，就像我们有一些山西的矿难的矿主一样，把矿工雇佣来了，连最起码的生命安全都不能够保证，这个员工说起老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说：“我们那个老板啊，简直都是吸血鬼！甚至连吸血鬼都不如！”说起来像仇敌一样加以痛恨，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就应该怎么做呢？就应该起到“君、亲、师”的作用。你不仅仅是他的领导，要管理他，而且是他的父母亲人，像关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去关爱他。这还不够，如果你仅仅做到了这两点，他可能还做假账来蒙骗你，来说谎等等。所以你还要当他的老师，教导他做人的道理。所以一个好的领导者同时具备了“君亲师”的责任，那会什么效果呢？《孟子》也说了，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这个领导者把被领导者当成是自己的手足一样加以关爱，那你发现，这个被领导者对领导者会加倍地回馈，是更加关爱，把他当成自己的心腹一样加以关爱。所以我们看到被领导者，对自己的态度，我们就要反省自己对他们的态度是如何了。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当面临金融危机了，老板拿不出工资来了，西方人讲人权，怎么样呢？跳槽是非常正常的了，还有的就罢工，去上街示威游行，纷纷地要向老板讲条件。这种不理智的举动使企业雪上加霜，结果很多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就纷纷倒闭了。但是在这个时候，韩国的工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不仅没有上街去示威游行，反而把自己平时的积蓄都拿了出来交给了老板，他说：“老板啊，这几十年来我们之所以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全得益于您对我们的关爱。现在企业遇到了瓶颈，我们愿意和您同舟共济，共度难关。这些钱请您先拿去用，等这个企业经营状况好转之后再说。”那我们看到了这样感人的一幕，我们就要想一想，为什么这样感人的一幕没有发生在儒家的发源地中国呢？再不要问别人，再问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团队、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单位遇到了这样的困难，我们能不能保证我们自己的员工属下做出这样感人的举动呢？那为什么不会做出这样感人的举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

我们做领导的，平时也没有像关爱亲人一样、关爱儿女一样去关爱属下，对他们的需要也忽视了。所以这个就是说，传统文化它很有效果，有效果呢，它确实是需要我们做出来，只有把这些效果演示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变成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行为，它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在日本，有一位企业家叫稻盛和夫，他创下了两个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并且在短短的七十多天，拯救了濒临破产的日航。在中央电视台采访他的时候，他说："很多人认为孔子、孟子这些古圣先贤的思想已经过时了，在这个新的时代已经不需要了。但是其实恰恰相反，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这些圣人的教诲越管用，正是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读了这些圣贤人的教诲，所以才成就了我今天。"他就是把《孟子》中的一句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之中，所以获得了这样的瞩目成就。

在《孟子》上有一句话，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民"，对我们企业来说，就是员工是最重要的。"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他有收益的时候，他首先回馈的是员工，然后想到的是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最后才想到自己。所以这样的一种德行才能够让人们非常地尊敬他信任他，最后在短短的时间使濒临破产的日航，成为所有航空公司中利润最高的一个企业。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爱民如子的领导者、国君。在战国时候有一个邹穆公，就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典范。邹穆公对百姓很宽厚，但是对自己的供奉却很刻薄。结果他在过世的时候，全国的百姓都非常地哀痛，甚至连邻国的百姓也都表示哀痛，朝着邹国的方向表示哀思。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都听不到有人弹琴瑟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心底哀伤，失去了这样一个好的国君。所以在《贾子》上就这样评价说："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来。"也就是说一个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的人，百姓也一定以仁爱之心对待他。给人们以福利的人，他也就是一个有福之人。

邹穆公他是怎么做的呢？有一个故事就讲到，邹穆公传达了一个旨意，下令喂养野鸭大雁一定要用秕谷，而不能够用粟米（粟米脱了壳就是小米）。结果呢？这个粮仓里的秕谷全都用光了，但是因为他规定不能用

粟米去喂野鸭大雁，所以这些官吏就不得不拿着粟米去市场上换秕谷，结果两石的小米换一石的秕谷，很多的官吏就说："这样太浪费了吧，我们不如直接用这个粟米来喂养野鸭大雁就好了，何必去换呢？"邹穆公说："他说你说的不对，你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你知道吗，百姓光着脊背来辛勤地劳作不敢懈怠，难道就是要喂养这些鸟兽吗？这个粟米是人的上等食物，怎么能够用来养鸟呢？而且你只知道算小账，而不懂得算大帐。周朝曾经有一句谚语说'囊漏储中'这个口袋漏了，东西又储藏在另一个地方了。意思是说我们把粮仓里的小米转到百姓的家里，难道就不是我的小米了吗？"为什么呢？因为君主和百姓是一体的，君主也是百姓的父母。百姓有了粮食，其实也就等于国君有了粮食。所以他："说让鸟吃这些秕谷，就是为了不伤害我们国家的粟米。粟米在我们的仓库里还是在人民那里，对我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就是说，这些小米在我们自己的仓库和转移到人们的手上，对我来说是一样的。人们听到这里就知道，他们自己私积的粮食，其实和公家是一体的。邹穆公是以这样一种爱民如子的心、和百姓一体的心来对待百姓，这个就是为什么邹穆公受到百姓爱戴的原因。他过世的时候，百姓都对他礼拜，表示如此的哀思。

我们现在的管理，大部分所学的都是西方式的管理。一谈到最先进最高明的管理，都以到美国西方学习为荣。结果有一群企业家，万里迢迢地坐了飞机来到了美国，要向通用公司学管理。结果通用公司的人就说了，他说："我们这一套管理，全都是从日本丰田公司那里学来的，你们不如直接到日本去学，学得更加彻底。"结果这群企业家呢，又坐了飞机万里迢迢地飞到了日本，他们下了飞机，来到了丰田公司的大门口。结果就看到赫然写着几个大字，他们都认得，写的是什么呢？写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说你不希望别人怎么对我，我就不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去对别人。领导者呢，也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属下，这个企业也才能够管理好。

有一些企业家，来到了一个企业参观，结果他们是中午到的，先到食堂去吃饭，一看这个饭呢，就很不满意了。他说："给员工吃这样的饭，

员工都不应该给老板干活。”结果下午的时候，他们开始参观厂房了，结果参观了厂房之后，他们就更不满意了。为什么呢？看到工人很懈怠很懒散，结果这些人就又说了，他说：“以这样的态度给老板干活都不应该给他们饭吃！”你看看这个员工和老板之间没有互相体谅互相、为对方着想，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是“各相责，天翻地覆”，如果大家都是反省自己，你看这个员工每一天很辛苦，我们做饭起码得给大家做好一点啊！那个员工想：“你看我在这里吃得好、住得好，然后老板对我们还这么体恤关爱，那我们应该对得起这一碗饭，这样互相体谅，才是‘各自责，天清地宁。’如果学会换位思考，很多事情就解决了。所以《弟子规》上说：“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任何事情我们要做给别人之前，首先就要扪心自问：“我希不希望别人以这样的态度方式来对待我。如果我不希望别人这样对我，我就不能够以这样的态度和方式去对待别人。”所以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取舍，我们就知道标准了。

第三点就是“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这句是讲的是如何使人们互相劝勉为善。就要举用那些善者，那个人好品德好就举他出来，让百姓看了有所效法。“教不善者”，也不是说不善者不好，就不去管他了。其实只要去教导他，也就是说一边举用善人，一边又去教不善之人，人民自然相观而劝。这个是不劝而劝，所以我们注意在这里并没有说对于不能的人，要把他抛弃，要把他开除，这个就起不到长善救失的作用了。

教是“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我们看到很多的大学，这个学生一有问题，就把他开除了。把他开除了，他走上社会，谁来教导他呢？学校都起不到长善救失的作用，请问谁来教他们呢？所以这个教就是对于那些做得还不够好的人，也不能够嫌弃，更不能够放弃，还要有耐心去教导他。中国古人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治国、平天下也是以教育为首要。所以一切的机构设施都是为教育来服务的，都是以把人教好为中心的。

怎么样去教呢？《说文解字》上对“教”下了一个定义，说：“上所施下所效也。”也就是说上面的人怎么做，下面的人看了就怎么效仿，这才是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途径。所以有的人说为什么教的效果不佳呢？我

们从教育的“教”这个字就可以看出来了。左边是一个“孝”字，而这个（孝）字（编者注：“孝”又写作“孝”），上面是一个“×”，下面是个一模一样的“×”，再下面是一个“孩子”的“子”。这就告诉我们这个“教”，是身教重于言教，就是我们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我们要求别人不能做的，就自己首先不能够做。我们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能做得恰恰相反，对自己要求很宽松，对别人要求很严格。那这个“教”一定教不好，一定有逆反。在右边，是一只手拿着一个柳条，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教育要有耐心，它是需要我们时时拿着柳条在孩子身边耳提面命，他做错了就要给他提醒、给以开导。所以我们教不好，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两个原因！第一是身教做得不够；第二就是缺少耐心。从这两点上找原因也就一定能够找到。

这个里面告诉我们“举善而教不能”，说明举用善人是教育成功的先决条件。要举善，我们首先要得知道善的标准是什么。善的标准，我们经常念《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这些都是善的标准。很多人说你觉得我不好，但我觉得自己挺好的呀，那是因为我们以自己的标准来评判自己。我们打开经典一对照，我们究竟够不够一个善人的标准，我们自己就明白了，因为经典就是一面镜子。当然我们对善人要举用他来出来教导人们，要强调有几点重点。

“善”首先是公正无私。我们中国人，处事、管理都很有智慧。你看在故宫有三座大殿，第一座大殿取名叫太和殿，告诉我们其实宇宙本身是和谐的。人一生出来本身就是和谐的，外有五官内有五脏六腑，它本来是和谐的。怎么样维持这种和谐呢？就是要用“中”，取中道，这个“中”就是不偏不斜、公正无私的意思。所以你做人公正无私，没有私心、不偏不倚，这个才能够达到和。怎么样把这种和谐世世代代地保持下去呢？这个答案就是第三个大殿的名字，叫保和殿。这个就是封太子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希望这个能够公正无私的处世态度世代相传，这个和谐才能维系。所以做一个领导者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公正无私，对于属下一视同仁、不偏不倚。

第二点就是不嫉贤妒能。在《孔子家语》上记载着，子贡来问孔子，他说："现在的人臣，现在的臣子之中，谁可以称为是最贤德的呢？"孔子就说了："齐国有鲍叔牙，郑国有子皮。"子贡听了就很奇怪，因为当时这个齐国有管仲做宰相，使齐桓公成为霸主，在郑国有子产做宰相使郑国很强盛，所以他认为这个管仲和子产才是贤臣。所以他就问："难道齐国没有管仲，郑国没有子产吗？"孔子就说："子贡啊，你觉得是出力的人是贤德的人呢，还是能够进举贤才的人是贤人呢？"这个子贡就回答说："那当然是能进荐贤才的人才是贤德之人。"孔子说："对呀！我听说这个鲍叔牙举荐了管仲，让管仲显达。这个子皮举荐了子产，让子产显达。但是却没有听说管仲和子产举荐比他们更贤德的人。"所以他认为谁是贤才啊？是鲍叔牙和子皮！你看这个鲍叔牙，他不嫉贤妒能，而且让位于贤人、举荐贤人，结果他家世代子孙在齐国都非常得显达，这个也是他的德行所给累积的阴德。

第三，就是隐恶扬善之人。《群书治要·体论》上说："君子掩人之过以长善，小人毁人之善以为功。"这个君子往往掩盖别人的过恶，长养自己的厚道善良。而这个小人呢，经常毁谤别人而自以为功，标榜自己的功劳。所以我们看君子还是看小人呢，我们就观察一个人的言语。《格言联璧》上有一句话说："德薄者，其心刻傲，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弃者众。"这个德行浅薄的人呢，见到每一个人都有可憎恶的地方、可挑剔的地方、不如我的地方，所以他眼睛中所瞧不起的人、所鄙视的人就有很多很多。

"德盛者，其心和平，见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许可者多。"德行很高的人呢，见到每一个人都有可取之处，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他口里所赞叹的人、所认可的人就有很多很多。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隐恶扬善才能长养人的厚道。而且古人说"激之，可以使君子为小人"，就是你把人激怒了，本来人家是个君子，也被你弄成小人了。"愧之，可以使小人为君子"，你让人生起惭愧心，他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和问题，他觉得我都这样做了，人家还这么宽容我，一次一次地给我机会。"愧之，可以使小人

为君子”，我们是使用的是“愧之”的方法，还是“激之”的方法呢？这个就是隐恶扬善之人。

还有就是《论语》上说的，这个君子一般都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这个君子说话很少，做事很多，做事很敏捷，但是也不会去到处标榜。相反，“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个言语也是言为心声，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德行浅深。

第五点，就是这个人能够容人之过。能够容人之过，这也是善的一个标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被人辱骂，说她是一个妓女。大家知道后都拿起石头要向骂人的人投，结果教育者就说了，他说：“请那一个从来没有犯过过失的人先拿起石头吧。”结果这些人都不好意思地把石头扔在地上了。所以你看人呢，并不是说自己是一个完人，自己如果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过失，就不能挑剔别人的过失，应该学会容纳别人的过失。所以人的厚道怎么看呢？就是看在这些方面。所以要长养自己的厚德，量大才福大。

《论语》上说：“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这个君子人尊重贤德的人，对那个贤德的人、善人非常地尊重，但是又宽容不能之人。“尊贤而容众”，大众的、一般人，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修学很好的人。大众是多数，所以要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对那个善行要嘉奖、要表彰、要鼓励、要宣扬。但是对于不能之人呢，要怀有同情之心，这个也是能够容人之过，也是厚德的一种表现。

一个人最起码的做人的标准，就是心口如一，就是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和你所说的应该是一致的，这个也叫“诚”。所以古人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为什么君子会坦荡荡呢？因为他想的是怎么样帮助别人、成就别人，自己内心无私，所以他能坦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之所以他郁郁寡欢呢，很忧戚、很烦恼，为什么呢？因为还是关注于自己的利益，甚至生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所以还想方设法地去勾心斗角、谋算别人，这样的人才会郁郁寡欢。所以我们要学做君子，要胸怀坦荡，这些都是善人的具体表现。

“举善”，首先是举善人为官，让他当领导。比如说我们从汉代开始，就实行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要把那个有“孝”和“廉”的品质的人举荐出来国家培养，作为官吏的候补。因为这个人孝，就能对国家忠、对领导忠，他廉洁没有贪心。这个两点具备了，做官就不会出大格。在《孟子》上也说，它说不仁、没有仁德心的人，居于领导的位置，就等于把他的过恶播撒到广大的民众。所以古人对于选官是非常非常地重视。古人在选官上，也有一个原则：“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这个爵位、这个领导的位置，没有德行就不授予；他的俸禄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工资、奖金，没有功劳、没有贡献就不给与。所以大家想着去做什么呢？想着去培养自己的德行，想着去建功立业，我们根据这两点来举荐人才。

前面我们讲到了“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你把那个正直的人举荐出来，放置在邪曲不正的人之上，就能够使那个邪曲不正的人也变得正直。比如说在历史上，舜拥有天下的时候，从众人之中选取了皋陶为士，掌管司法，结果不仁的人就远离了恶行。汤有天下的时候，从众人之中选了伊尹为相，结果他当了相之后，不仁的人也就远离了恶行。这个就是说举善人为官是有很好的效果，能够起到教不能的作用。

第二就是举善人为师，就是把那个有德有能的人、有德行的人、能够言传身教的人，举荐出来作为国师，他能够教导百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这个才能够起到“长善救失”的作用。《尸子》上就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举善人为师的重要性。它说如果你们家着火了，有人赶过来把房屋这个火给扑灭，你会怎么样呢？一定会对这样的人感恩戴德。但是那个年纪老的人、有经验的人很早就提醒你了，说你要把这个墙的缝隙涂好，把这个烟囱变弯曲一点，这样做了呢，你会终身没有失火之患，但是你会觉得这是耳旁风，对他觉得很唠叨、真烦，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同样的道理，假设一个人现在被关进了监狱，有人使他免于牢狱之灾，想方设法地托关系、走后门，把他从监狱里捞出来了，他们全家的人

都会对他感恩戴德，因为他出来了可以孝敬父母，可以照顾妻子，还能够教育儿女。所以全家人都对这个人特别地感恩。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那些教导人仁义慈悌道理的人，你按照这个道理去做，终身不会被关进监狱，不会有牢狱之灾的这种祸患。但是对于这样的人，却没有人知道对他感恩戴德。这一个形容、这一个故事说得非常好，它其实告诉了我们为什么社会五伦关系紊乱，社会风气不善。就是因为我们对那些有德，能言传身教的人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

那我们看在历史上“儒释道”三家的大德，都是被皇帝选为国师。这个皇帝是以敬师之礼来敬重这个国师，让他来兴起“儒释道”的教育，所以社会风气才变好了。比如说在康乾盛世的时候，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盛世出现呢？就是因为在清朝的历史上一直延续着延请“儒释道”三家的大德到宫廷讲经的传统。这个皇帝带着群臣都来一起接受教诲，结果上下都一心、志同道合、团结一致、见和同解。所以才出现了盛世，大家为公而不为私。但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了，她每一天也去参加听经，但是好像这些“儒释道”的大德每一天都在讲她，后来她一生气呀，就把这个宫廷讲经的传统给废弃了。结果这一废弃，没有人教导忠孝仁爱，自私自利的心都生起来了，结果怎么样呢？“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一个人一定是先自己侮辱了自己，才会使别人侮辱他。“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一个家庭一定是内部不和谐了，先有了纷争，第三者才有机可乘把这个家给毁掉了。“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个国家是君臣上下不和谐了、不统一了，结果别的国家才看到有机可乘，所以外国人入侵、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才打了败仗。所以这些就是告诉我们，清朝的没落并不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原因，而是丢失了传统文化所导致的，把这个教育给忽视了。

要想使社会风气变善，必须有能够讲“儒释道”的这些有德行、能够力行的老师出来讲座，必须在电视台、网路上、广播上广泛地传播，国家领导人带头来学习，把这些学习的镜头放在电视上大为宣扬，“上行而下效”，相信不出三年，这个社会的风气也能够转善。

第三就是“举善人为范”，就是举善人作为模范作为榜样，给这个道

德模范以特别地尊重和奖励。让人都看到原来做有德的人它是受到鼓励的，而不是有钱的人受到尊重，这样也才能够起到教化的作用，这个是“举善”。后面说“而教不能”，“而教不能”就是告诉我们对不能之人要教导、要有耐心，而不是要舍弃。在《格言联璧》上有这样一句话说：“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诚心未至。”天下没有不可教化的人，就担心的是我们自己的诚心没有达到，自己心诚，至诚感通，像我们经常说这个舜王的故事。舜王的后母、弟弟三番五次地要置他于死地，他都没有怀恨在心，想着去打击报复，还是一心反省自己的孝道没有做好，最后怎么样呢？感化了他的后母，感化了他的兄弟，感化了天下的百姓。这一个故事，让我们深刻地反省，我们身边有没有像舜的后母那样想方设法地置我们于死地的人呢？我们身边没有这样的人，我们身边都是学习传统文化的人，都是一心向善的人，结果我们连他们都不能够感化，什么原因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自己的德未修、感未至。我们德行的修养不够，所以没有能够至诚感通。所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我们一定要相信圣贤教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既然“人之初，性本善”，本性本善，这是每一个人的性德本具的，所以也应该能够教好，这个只是我们的诚心和耐心是否足够的问题。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首先我们看前半句，“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句话告诉我们为人必须讲信用，什么是“信”呢？在《说文解字》上，把“信”解释为“诚也”，什么是“诚”呢？“诚，信也。”可见，这两个字是相通的。这一句话就是告诉人要诚信不欺。这个“信”，就是说言语要信实，为人要讲信用。信在“八德”中间特别的重要。《论语》上有“主忠信”、“曾子三省”、有“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这都告诉我们“信”非常的重要。但是人

们轻视了“信”字，很多人也都患了不信的病。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学佛，受菩萨戒。但是最难实行的是哪一条呢？就是不妄语戒。但是不妄语极为重要，一般人都没有看重。孔子以为这个“信”字不可看轻，“人而无信，可乎？不知其可也”！我们看一看这个口气，就是说他除了信以外，还有哪一条不错呢？如果连信都做不到，其余的就都无可取之处了。这一句话呢，也是在社会上办了很多事，碰过很多钉子，有很多经验阅历的人才能够领略的。

在说完这句话之后，下面说的是比喻，“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这个“车”有两个读音。当它当牙床的时候呢，它就读车（jū），所以叫辅车相依；当它当车子讲的时候，还读车（chē）字，包咸注说大车就是牛车，就是用牛拉的车子，很能够载重的，就是大车；小车是驷马车，就是用马拉的车子。大、小车都有辕，以为牛马引车之用。

在辕端与横木相接之处，都凿一个与辕孔相对，以金属物来贯穿。这个金属物可以使辕端与横木活动自如，而这一个金属物在大车就称为“輗”，在小车就称为“軏”，是大、小车行动之关键。在《说文解字注》上，戴东原说：“辕所以引车，必施輗軏然后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关键。故孔子以輗軏喻信。无輗无軏，必不能行。”人而无信，在社会上也必不能行。这个輗軏，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像这个车子没有汽油，或者没有发动机一样，它是行不通的。无信之人，妄言妄行，不知其可，就是一事无成，更谈不上学道了。所以孔子喻以“无輗无軏”之后，便问“何以行之”？人如果容易失信，容易妄语，心则不直。所以我们要谨慎地守住这个“信”字，要好好学这个“信”字，才是希圣希贤。司马光先生曾经说修身从不妄语开始，他从不妄语开始修身，最后达到的境界，就是平生所为之事，没有一件不可与人言。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句话最基本的意思。

信很重要，那什么是信，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究竟重要在何处呢？在社会上，人与人交往，首先要求就是人要语言信实，这也是人际交往的基本要求。所以《弟子规》上说“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因为人与人之间交流意见、传达感情全靠言语，所以我们的言语要正确、

要诚实。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如果我们的言语不正确、不诚实，就不能担负起传达感情、交流意见的任务。这就像在两岸之间，这个桥梁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络也就被破坏了。从个人的方面讲，一个人的成败根源，就源于我们内心的诚与敬。如果连应有的信用都没有了，在社会上做事就很难得到人家的信任，那就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成的。这个就是《中庸》上说的“不诚无物”。如果缺乏真诚的心，表现在外面呢，就是言语不信实，任何事情也就很难成就了。而从社会方面说，如果人人都互相欺骗，就会造成人群互相猜疑，导致社会秩序紊乱。所以这说明了言语很重要。无论是佛教、基督教、儒家等等，都是把不妄语作为基本的戒律。不妄语的效果是什么呢？不妄语的效果就是“发言成证”。就是你说的话呢，别人不需要考虑，非常的信任你。

为什么要讲信呢？再具体一点讲，第一点，信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行道的根本。在《论语》上记载着孔子的弟子子张的故事。子张来问孔子：“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在社会上行得通？”孔子就回答了一句：“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如果你言语信实，行为笃厚，就是很厚道、很有德行，即使是到了蛮夷之地、到了外国你也都能够行得通，也能够和人家相处，人家也欢迎你。但是如果自己言语不信实，行为不厚道，即使是在自己的邻居、邻里相处之中也都会出现摩擦、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在社会上行走、立身行道，必须首先要讲信。

第二点，要处理好人伦关系呢，也必须要守住这一个“信”字。在《群书治要》中选取了很多关于这个信的重要性的一些语句。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它说：“君以信训其臣，则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诲其子，则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其妇，则妇以信顺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而应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要处理好人伦关系，这个信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君主做领导的能够用信义训导臣属，臣属就会用信义、忠心来辅佐君主；如果做父亲的用信义来教诲儿子，儿

子就会用信义来孝顺父亲；丈夫用信义来带领妻子，妻子就会用信义顺承丈夫。在上位者秉持常道来教化下位者，下位者就会遵守常道而顺应上位者。如此上行下效，还有不被教化的，那是百例中都不会有一例的。所以这个告诉了我们上行下效的效果。如果我们看到儿女不诚实，我们就要反省一下自己的言行。

比如说很多的父母打电话的时候，一拿起电话就是妄语，对方问说你丈夫在不在家，要找他出去喝酒。结果她不愿意丈夫出去喝酒，明明她的丈夫就坐在茶几面前喝茶，她随口就说他不在家，他出去干什么去了。结果这一个行为，恰好不巧被她的儿女给看到了，所以这个孩子从父母身上就学到了不诚实，学会了说谎话。所以上行下效，这个身教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做领导的、做父母的、做老师的不可以不言语谨慎。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想要把伦理关系处理好，这个信字很重要。

特别是在君臣关系之中，《论语》中就这样说："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子夏说："君子在位时先要取得民众的信任，然后才能劳役民众。如果还没有取得民众的信任，民众就认为这是在虐待他们。君子若处于臣位时应该先取得君主的信任，然后才能规谏。如果还没有取得君主的信任，你就去劝谏君主，君主会以为你在毁谤他。"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无论君子使民，还是事君，都应该以信为先。没有信任的话，这个关系就很难处理好，还会造成种种的误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信对于人伦关系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信对于国家的建立也是至关重要的。孔子就说："民无信不立。"一个国家，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这个国家就无所建立，所以取信于民是很重要的。像商鞅变法的时候，通过立木取信，只有人们信任他，才愿意配合他。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政府说的他不拥护、不支持，很多的政策都很难实行。像我们看孔子的弟子子贱去治理单父的时候，之所以能够做到无为而治，能够达到不忍欺的境界，就是因为人们信任他。你看巫马期，他去微服私访，趁着夜色来到了单父，结果看到一个老人家在

捕鱼。这位老人家在捕鱼的时候，捕上了很多鱼，但是他看了一看又把这些鱼给放回到河里了。巫马期看了之后就觉得奇怪，就走上前去问，他说："我看您捕上了很多鱼，但是为什么又把它给放回到河里去了？"这个人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的长官子贱告诉我们，不要去捕捞那些还在成长中的小鱼。"

因为中国古人自古以来都有生态保护的观念，都有可持续生产的观念，所以正在成长中的小鱼是不能够去捕捞的。而这一个人之所以愿意配合他的长官，即使是在夜色之下、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鱼，也看到小鱼把它放回到河里。就是因为他相信他们的长官这一个政策是为人民着想的、是有利于整个人民的利益的、不是自私自利的。因为这一种信任，所以他推行一个政策，大家都会愿意全力配合。所以我们看到，孔子就说，即使是足食、足兵，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了，就先要去兵，然后要去食，但是不可以缺少信任、不可以缺少信用。

最后一点，信很重要，还是因为信也是道义建立的根本。所以在《群书治要》上有一句话说"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如果你的信用不能够得到彰显，这个道义也无法建立。怎么样才能做到有信呢，怎么样让别人信任自己呢？这个在《中论》上有一句话，它说："欲人之信己，则微言而笃行之；笃行之，则日用久；日用久，则事著明；事著明，则有目者莫不见也，有耳者莫不闻也，其可诬乎。"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想让人信任自己，那应该怎么做呢？就是你说了一个小小的承诺，也都要尽力地去把它实行。如果你每一个小小的承诺都能够尽力实行，久而久之，人们就能够看到你的行为、你的道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要让别人信任自己，应该少说话而切实履行，就是说要少说而多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真正落实去做，效果才会越来越长久，效果日益长久，事情会更加清晰。事情清晰则有目共睹、有耳皆闻，谁还能够歪曲事实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要让别人信任自己不是光靠自己去说、自己去表白，而是要靠自己的行为去证明。所以我们观察一个人，也不能光看他怎么说。孔子说："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个是很重要的。

要想不轻易失信于人，还要做到《弟子规》上所说的“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就是你要看看这个事情符不符合道义，应不应该去答应。如果这个事情不应该去答应他，就不要轻易地去承诺。比如说很多人在喝醉酒的时候，喝的很高兴，大家一称赞他、肯定他，他就很兴奋，一拍桌子说：“好！这件事你放心，我给你办。”结果没过两天，酒醒了，发觉这件事不是容易办的，这个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说“苟轻诺，进退错”。如果你轻易地答应别人做什么事，但是又做不到的时候，无论是进是退，都是不合适的。所以要做到不失信于人，还是要在答应的时候，就要非常地谨慎，看看这件事应不应该答应。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失信，什么时候可以不讲信用。因为孟子告诉过我们，他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你不说让人都要讲诚信吗？但是为什么孟子又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学习圣贤教诲都是有境界、有层次的。《论语》上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做学问，有四个不同层次的境界。第一个境界，“可与共学”。比如说我们来到这里，一起学习传统文化圣贤教诲，这是第一个境界。但是“未可与适道”，比如说我们学了“各自责天清地宁，各相责天翻地覆”，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还是处处看别人这不顺眼、那不够好，处处挑剔别人。这就是“未可与适道”，没有按照道去做。比如说我们学习了夫妻相处之道，讲“夫妇有别”，懂得了夫妻之间要互相欣赏、互相赞叹。但是一进门就忘了，又嫌弃对方这没有做好、那没有做对，这也是没有适道，这是第一个境界。第二个境界，“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就是当我们真正去做了，但是还没有达到第三个境界，就是“未可与立”。这个“立”就是屹立不摇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在事事顺利的时候，大家都能做到孝顺忠诚。我们讲“君仁臣忠”，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做到。但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做不到这个孝顺忠诚了，在危难的时候就变节了。在纷乱的社会中，还能坚持孝心的，那是真正的孝子。在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还能忠诚的，那才是真正的忠臣。

所以《道德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讲得特别好，它说："国家昏乱有忠臣，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在争乱的时候，你才能看出谁是屹立不摇的忠臣。当很多家庭的兄弟都不和睦的时候，你才能看出谁才是真正懂得兄友弟恭、懂得孝顺的人。这个屹立不摇就是第三个境界。但是这还不是学问的最高境界。学问的最高境界就是"可与立，未可与权"。这个"权"，就是通权达变的意思。如果我们没有通权达变的能力，有的时候会死守原则，本来做错了，可能还自以为是。比如说中国人有句话说"上天有好生之德"，这告诉我们都不要杀生，要有仁慈之心。但是同时呢，圣贤人也教导我们做人要守信用、不能够欺骗别人。你看到一个猎人在追一个兔子，走到了十字路口，这个兔子往东边去了，他问你："这个兔子往哪边跑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往西边去了。为什么？这个就叫通权达变。因为你这样一说，虽然你说了妄语，但是你救了一个生命，也让这个猎人免造杀生之业，对两方都有好处。这个时候虽然你不守信用，也是符合道义的。

像孔子有一次经过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卫国封给一个臣子的，而这个臣子正在造兵器，准备叛乱，要推翻卫国。孔子最反对的、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乱臣贼子，所以他打算马上就离开，然后到卫国把这件事情给揭发。但是被这个臣子给知道了，马上派大军把孔子团团地包围住，然后跟孔子说："你对天发誓，绝对不要把我的事情讲出去。"在这种危机之下，孔子没有办法了，他就对天发誓，结果说完之后这个军队就撤走了。这个军队撤走之后，夫子马上就去卫国了。弟子子路听了，就很不高兴了。他说："夫子，你怎么可以不守信义，怎么可以言而无信呢？"夫子就跟子路说："一个人，在被要挟之下的信，可以不用遵守。"

当然这只是一种情况了，重要的是这个信要和义配合在一起。这个信如果不符合道义了，你还守信，那就是"未可与权"，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通权达变了。所以"信义信义"，对于正义的事情，你要守信。对于不正义的事情，那就不必守信，所以你要懂得灵活运用。正如孔子说："假如我不去揭发，会让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灾难。我一个人背信没有关系，但

是我不能让人民受难。”这个就叫“两害相权取其轻”。一个人失信于人重要呢，还是让整个国家的人民受难重要呢？所以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如何去取舍才是真正正确的。有的人是感情用事，说为朋友两肋插刀，讲哥们儿义气，那首先你要看这个人值不值得你为他两肋插刀。如果他要去做错误的事情，你还为他两肋插刀，你就等于助纣为虐了。所以我们经常听有一句话说：“依法不依人。”要衡量所做之事符不符合道义，他做的事情正不正确，而不是忠于某一个人。我们要“不以人情做佛事”。如果我们处处考虑到人情，而耽误了弘法利生的大事，这个因果的责任就更重大了。所以这个学问的更高境界就是“为可与权”，要懂得通权达变。

什么时候可以权变呢？如果这件事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大众，这件事符合不符合道义，根据这两点来选择。很多人死守原则，其实不是出于为大众着想，这个就是学问还是做的太死板所导致的。

在蕅益大师的《论语点睛》上说到：“不信自己可为圣贤，如何进德修业？”他把这个“信”理解为相信。这个“信”。就是西方人讲信他、信上帝、信真主。我们中国人呢，讲得是首先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可以成圣成贤，“人之初，性本善”，“涂之人可以为禹”，“人皆可以为尧舜”。如果你不相信自己可为圣贤，怎么样才能够进德修业呢？

在蕅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上，把这个“信”讲了六个方面，那就是“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信自”。要相信自己是圣贤，我们本身就具有圣贤的品质，这样的话才不会有自卑之心。“人之初，性本善。”人在性上都是平等的，为什么会有贤愚不同呢？那就是因为“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因为后天的环境，所受的熏习教育，把这个本性本善蒙蔽了。那如果我们知道人性本善的话，这个自信心树立了，才会进而进德修业、成圣成贤，这个是信自己。“信他”呢，就是相信古圣先贤的话。比如说“儒释道”三家的圣贤人，都是觉悟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这个人，在佛家称为佛，在儒家称为圣人，在道家称为真人。这些都是已经成就的圣贤，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已经清清楚楚、明

明白白，我们向他们学习才没有学错。

在英国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能够真正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孔孟儒学和大乘佛法。"这一句话呢？就是给了我们相信圣贤的信心。你看一个外国的历史哲学家，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了各个国家的历史，最后谨慎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能够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的唯有孔孟儒学和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孔孟儒学，都在中国，那我们有幸闻听了孔孟儒学，闻听了这个"儒释道"的教育，我们就有责任把这一个事情承担起来，起到传承正法的作用。所以做人不可以不立志，这个"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我们立志要做什么呢？读书志在圣贤！所以我们读书、做学问，就是为了成圣成贤，不是为了求取功名利禄、升官发财。你把这个心树立起来了，无论前面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挫折，你都能够坦然面对。因为这一条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并不是像想像的好走的。这个志向立定之后，还要切实地去力行，怎么样去力行呢？就是要勤学、要好学。

人一生，短短数十寒暑，可以说是眨眼就过，我们每一天如果都浑浑噩噩，都在轻松之间度过，这个日子很快过去了，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后，你仍然没有太多的长进。如果我们抓紧时间，珍惜光阴，每一天都战兢惕励来反省自己，来学习圣贤教诲，再过十年，可能你就是一个真正能担负起传播正法的老师。所以我们的志向很远大，但是"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每一天都不要懈怠，不要错过。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要好学。向谁学呢？要向圣贤教诲来学习。学习的方法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为什么要选择一门呢，因为你选择太多，就太多太杂，而这个一门呢，每一门都是圣贤人心性的流露，你如果真正把这一门给学进去了、搞通了，你的心和圣贤人的心是一体的，不是两个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就能达到"一经通，一切经通"。

这同时也告诉我们，古人做学问，他求的是智慧，而不是知识。这个是和西方人做学问的方法大相径庭，而我们应该对谁做学问的方法生起信心呢？我们应该对古圣先贤的方法生起信心，去身体力行，做出一个榜

样、做出一个效果，证明给世人看。这个是我们要定的方向。所以学习要勤学，但是方法一定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长时熏修的力量非常的重要。古人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三日讲得是什么情况呢？古代的人呢，几乎家家都有圣贤经典，人人听的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教诲，每一天接触的戏剧小说、歌舞表演，这些文艺都是宣讲怎么样做人的。在这种情况下，三日不读书，尚且面目可憎。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呢？现在我们睁开眼睛所接触的几乎就是电影、电视、网络媒体，这里面宣扬的都是“杀盗淫妄”的内容比较多。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一日不读书，就面目可憎；一日不听圣贤教诲，就面目可憎。所以修学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说我们达到了一个高度就可以不退转了，需要我们长时熏修。每一天听经，听这个“儒释道”的教育，都不中断。这样的话，才能在这一个面临五花八门诱惑的社会中立足。

第三是要“信因”，第四就是信“果”。这个因和果是相对的，有因必有果，有果也必有因。那如果我们想求成圣成贤，这个是结果，因在哪里呢？《大学》告诉我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成圣成贤，就要首先从格物来做起。“格物”并不是朱熹所讲的“格尽万物之理”，而是“格除物欲”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财色名利”的面前，能否把持住自己，如如不动。所以这个“格”，就是格斗。“财色名利”这个欲望，要和它们格斗。当然，除此之外，还要和我们不好的习性格斗。比如说我们很懒散，每天起床都喜欢晚起，不精进，这也是一种不好的习性。如果一个人想成就的话，没有“勤”字，不能够吃苦，这个是不可能办到的。所以要勤奋好学、要精进，能够以苦为师，这样学问才能够有成就。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要放下十六个字，也就是最粗重的物欲烦恼，那就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把这十六个字都放下，这个才是最初的入手处。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修学了这么多年了，我们真的把这几个字给放下了吗？其实人这个自私之心，是生而有之的烦恼。

人的起心动念，第一个念头就是为了自己。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蚊

子，我们想把它赶出去，因为怕它影响了我，怕他伤害了我。其实它在这里很温暖，它想在这里也听圣贤教诲，我们为什么要把它赶出去呢？我们这个起心动念，我们觉得是自然的、是无可挑剔的、是顺理成章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我在，因为它影响了我的利益，它让我感到不方便。所以我们把这些人、把这些蚊虫称为害虫，这不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得出的结论吗？所以人这个私心，可以说渗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每一个起心动念，如果不去细微体会的话，你自己自私自利了，都很难发现。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修身应从格物做起，格物然后才能够致知，致知才能够诚意，就是你的智慧现前了。什么叫诚意呢？最起码就是意识上没有自私自利。说得更圆满一点，就是没有念头。所以曾国藩说："一念不生谓之诚。"这才是诚意最高的境界，那什么是心正呢？没有烦恼才能够做到心正，有烦恼这个心就不能够摆正。所以《大学》上的几句教诲特别好，"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一定心里没有喜欢的，没有偏爱的，没有憎恶的，没有让你生气的，没有恐惧的，没有忧虑的，这个心才能够摆正。这个"好乐"，就是贪，我满意的我就高兴，不满意的就嗔恨。"忿懥"就是嗔，忧患恐惧就是"痴"，这个贪嗔痴在心里叫"三毒烦恼"。

这个心怎么能正呢？就要"信因、信果"。这个因果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像影必随形，响必应声。我们的身子走到哪儿，这个影子就跟到哪儿，就像我们在山谷里叫了一声，必定会有回响一样，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和规律。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信，我们反思一下我们说话别人总是怀疑，总是不信任我们，什么原因呢？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说话经常有妄语，所以被人家不信任。任何事都是有缘故的，有结果必有其原因。所以我们要想让别人信任我们，要学这个"信"，就是说话诚信。即使一点小事，不能够欺骗人。比如说我们上街去买菜，看看这个菜挺好，但是还想看看有没有更便宜的，然后你就说过一会儿再来买吧，但是过一会儿你又没有回来买，这就是妄语，这就是欺骗人、不诚实。这个言语要做到信确实很难。所以别人经常怀疑我们的说法，怀疑我们的做法，那也是

有原因的。我们要把这个信做到了，这个信任才能树立起来。

第五和第六，就是“信事、信理”。什么是“事”呢？《大学》里讲的家、国、天下，这些都是事。事是无穷无尽的，朱子讲“要穷尽万物之理”，这个万事万物的事理无有穷尽，如果我们心要向外攀援，永远也不可能把这些事理搞明白。就像我们现在的科学一样，对外到了宇宙太空，对内到了分子、原子、电子，但是能够把万事万物之理都搞通吗？你要去求“有知”，那就一定会有“无知”，你有知道的东西，就有不知道的东西，这个肯定的。有知就会有不知，你怎么样才能够穷尽万事万物之理，达到无所不知呢？那只有求“无知”，“无知”才能“无所不知”。所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这个就是我们“儒释道”求学问的方法。首先让心空灵，反求诸己。它不是让你去求外太空，去求原子电子，而是反求于你自己的本心，当你把这个心搞明白了，万事万物之理也都在其中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宇宙万物都不过是我的“心所现、识所变”的。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回光返照，不向外攀求，回归自性，万物之理就豁然通达。

这个事和理是相对的，有事必有理。事上是林林总总，这个理，就是全都是我这一念心中所现之物，这个就是理，也就是家国天下，都没有出我这“一念介尔之心”。藕益大师用了这个“介尔之心”，这个“介尔”，就是比喻极其微小。一个念头、这些境界、万事万物呢，其实都没有离开我的念头，都是我的心所变现。离开了这个念头，就没有事了。这个念是依真心而起，它离不开真心，而这个真心呢，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个念头是什么呢？念头是依真心而起，这个真心是念的体，而这个念是跟真心合在一起，所以它被称为妄念。为什么称为妄念呢？因为它不长久，它是转瞬即逝的。就是你前念灭，后念又生起，刹那都不停留。这个真心是不生不灭的，生灭的是念头。

我们现在要格物，这个“格”也有正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心给正过来，也就把物正过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心外无法，心外无境”。这个“境”既然都是我们心的呈现，我们心变了，这个外界的境，也就随之转变了。所以“境随心转，相由心生”。和我们的心最切近的环境，就是我们

的身体。如果我们的心有“贪嗔痴慢”，表现在身体上就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和合，这样或者那样的疼痛和疾病。所以当你把心变了的时候，“贪嗔痴”去掉了，那你这个身也就自然健康了。

一个人的相貌，也是由心生。比如说小偷都长得是贼眉鼠眼相，那这个好色之人，我们说酒色之徒，你看他的眼睛都带着好色的表现。而那个杀人犯、抢劫犯脸上也都有一种凶相。这个就是你长期日久的状态表现在脸上所导致的一种相貌。同样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是由我们的心所产生。我们看了江本胜博士的水结晶的实验，对这个道理体会得就更深刻了。当实验用的水贴上爱和感恩的标签的时候，它的呈现结晶是很美的，像盛开的鲜花一样很好看，让人看了很喜悦。但是当这个水被贴上了“我恨你、讨厌你、丑死了”的标签时，它对你的呈现就是不能形成完美的结晶，很丑恶，还浑浊一片。所以你看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就知道我们对人家的心是怎么样的。如果别人对我们不好，一定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隐隐地对别人产生了不好的想法，而当你把这个想法转变过来的时候，你发现突然他对你的态度也就转变了。所以我们学习圣贤教诲，对这些道理要相信，所以你需不需要去转变别人呢？不需要去转变别人。只要转变你的心，你对他的心一转变，他对你的态度也就马上转变，这个就叫“心外无境，境外无心”。

有一个影片叫《天下无贼》，剧情很有意思。电影讲的是在一个火车上有一个叫傻根的农民，他在大城市挣了钱，准备想回家去娶媳妇盖房子。这个傻根的心地很厚道、很老实，他不相信天下会有贼。他带着很多钱在身上，结果就遇到了两伙贼都想偷他的钱包，但是他不知道。其中一对贼是一对男女，他们想欺骗傻根，但是傻根非常厚道，被他们骗也不知道，反而还想去帮助他们，结果把他们给打动了。他们觉得他太淳朴了，不忍心再去偷他的钱。这说明这个盗亦有道，这个盗贼也有道义，“人之初，性本善”，他也有良心。这个人这么淳朴，就把他们的良心给唤起来了，他们感动了之后，看他这么淳朴，怕他上当受骗，怕他的钱被人偷走，所以就决定去保护他，圆他一个天下无贼的梦想。

另一伙偷窃的这个团体，也想偷傻根的钱，结果就跟这对男女明争暗斗。在火车上还有便衣警察，也卷入了这场斗争，因为警察们要捉贼。后来傻根的钱被掉包了，他也不知道，一直坐在火车上，哪里知道火车有这么热闹呢。这几伙人一直在打斗，打到最后钱又回到了傻根那里，傻根还是不知道，然后他下了火车，带着钱回家了。这个影片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傻根他的心里没有贼，他的天下就没有贼。所以我们心里总是有贼，觉得天下都有贼，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好像个个都是贼。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自己有贼心，自己心里如果没有贼心，天下就无贼。心里有贼，天下就有贼，“一切法从心想生”。

在这个影片中有一句很著名的台词，就是傻根对这台下的那些贼人讲的，“喂，你们谁是贼，站出来给老乡看看。”叫了两声也没有人站出来，然后他就对老乡们说：“你看看怎么样，没贼吧。”他就不相信有贼，他心里真没有贼，他傻不傻呢？其实他不傻，他活在一个纯净纯善的世界里，他的天下没有恶人，也没有贼人，他的天下全是好人。所以他看到的是“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他的天下，不就是太平的天下吗？所以这个世界怎么和谐呢，其实很容易，就是把我们自己内心里的“贪嗔痴慢”，比如说贪婪、猜疑、妒忌、嗔恚，对人的不信任、怨恨，这诸多的烦恼都去掉，我们的心和谐了，世界也就和谐了，宇宙也就和谐了。所以我们不要去关注别人怎么样，而把这个关注的重点拉回来关住自己的修身，是不是自己太多疑了，自己是不是太嫉妒了，自己是不是德行还有待提高。所以当你事事关注自己的心的时候，你就没有烦恼，你的心变好了，这个环境、人际关系就都变得和谐了。如果我们看别人不顺眼，说别人的是非，还批评人、毁骂人，看人都是贼，自己就比傻根还傻。因为我们把自己的心变成了承载别人过失的垃圾桶，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充满恶贼的世界里，你说这是不是最傻的呢？

所以真正的圣人，是看一切人都是圣贤人。当你看一切人都是佛的时候，你就是佛；当你看一切人都是菩萨的时候，你就是菩萨；当你看一切人都是凡夫的时候，说明我们自己也是凡夫。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人

性本善，通过进德修业，回归到本性本善，那就可以成圣成贤。明白了这一点呢，我们这个自信心才能够真正树立起来。

八佾篇

林放问礼之本。

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问礼之本”，根据郑康成的注解，林放是鲁国人。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中认为，林放是孔子的弟子，他来向孔子问礼的根本。子曰，“大哉问！”孔子认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问的非常重要。为什么问得好呢？因为一般人只是重视枝叶花果，而林放却问根本，所以用“大哉问”来称赞他。

中国的学问都重视根本，比如说我们这个酒是由水造的，所以在祭祀的时候贡酒只供白水，因为这个水是酒之本。又比如百川归海，这个河是海之本，所以祭海神的时候，先祭河神。孔子称赞了林放能够问礼之根本，以“大哉问”来称赞他之后，就列举出“礼”和“丧”这两个方面来给林放解答。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礼，与其奢侈，宁愿节俭；丧礼，与其和易，宁愿哀戚。孔子讲礼要注重根本。前面讲的这个“礼”，与后面的“丧”是相对称的。应该理解为是丧礼之外的其他礼，拿奢侈与节俭这两者相比较的话，宁愿取节俭不要奢侈。为什么不如节俭好？因为如果奢侈就往往变成了务虚、形式化，而那份诚敬心就失掉了。

中国人讲礼很重视形式，但是绝对不是讲形式主义。形式和形式主义的区别就在于形式是来表示根本的，表示内心的恭敬和仁爱的，如果

只是有这个形式，而没有内心的诚敬和仁爱，这就是形式主义，就失去了根本。再比如在祭礼中“祭神如神在”，全在心诚，如果奢华便少了诚心，如果有了诚心才是得到了礼的根本。所以如果心诚的话即使你用白水、水草祭祀也可以。

学佛的人经常讲一句话叫“庄严佛净土”。用什么来庄严？佛并不稀罕好东西。“心净则佛土净”，心庄严才是真庄严，所以供佛念佛重在诚心。比如我们看《了凡四训》上讲善有半有满：有一个女子在年轻的时候很贫穷，她到寺院里去拜佛，心地非常的真诚。身上只有两文钱，她恭恭敬敬地把这全部的财富两文钱都拿出来供佛，这个主持和尚看了之后就亲自出来为她回向祈福。结果这个女子后来入宫富贵，当了皇妃。之后带着上千斤的黄金来到寺里布施，但是因为这次身份变了有了傲慢之心，这个老和尚一看就只让他的徒弟来给她回向而已。这位女子不理解，她就问：“几年之前我仅仅供养了两文钱，您亲自给我回向，而我现在供养了上千金的财富，而你只是让你的徒弟来回向，这是什么原因？”这个老和尚就告诉她，说：“这个供养布施重在诚心，虽然前几年你只有两文钱，但是你布施的心地很真诚，所以我不亲自回向，不足以报答你这个恩德。但是现在你虽然布施了上千金的财富，但心里有了傲慢，所以让我的徒弟来为你回向就足够了。”从这里，我们知道供佛、布施并不是供奉的越多财富越有福，而是看你的心地是不是真诚恭敬，这个就是“二文为满，千金为半”的道理。

再比如古人把修学的地方称为“道场”，什么叫“道场”？有学道、传道、修道的人才叫“道场”。道场并不在于外表的富丽堂皇。如果这个地方装饰得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但是没有修道之人，不能够称为是道场。当然我们在这个时代也是随顺这个时代的机缘，看一个道场的庄严与否，主要看这一个道场里是否有修道、学道、传道之人。就是要看这里边的人他的心是否在道上，还是在五欲六尘的享受上，这个是区分这个地方是不是道场的关键因素。所以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无论是贫贱还是富贵只要心在道上，而不是在五欲

六尘的享受上，这个才叫道场。

世间有一句话叫“少年得志大不幸”，如果孩子年纪轻轻的就家里很富裕、很奢华、很有权势，吃的也好，住的也好，用的也很奢侈，他就不知道这个钱来之不易，所以自己的享受没有限制，既然没有勤苦的生活，也就不知道这些钱来之不易，就不懂得去珍惜，不懂得去节俭，这样大手大脚的习惯一旦养成，想让他过勤俭的生活就不太容易了。拿着这个钱就是去无谓的浪费，最后“成由勤俭破由奢”。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藏富教子”，即使家里很富裕也不能够让孩子知道，还要让他有刻苦节俭的精神。对于修道人来说也同样是如此，特别是年纪轻轻的修行人，这个根基都没有扎好，结果有很多的供养、有很多的财富，谁看了钱会不动心？所以如果这个道场修学的人根基还没有扎牢，就有很多的人来供奉，这个人就很难做到“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可能修着修着心就不在道上了，就去抓钱了。所以我们生活清苦一点、生活节俭一点，对于修道人是一件大好事。不要有太多的供养，也不要去追求太多的财富，生活能够满足维持我们正当的工作和生活就可以了，这个就是讲的礼。

下面一句，“丧，与其易也，宁戚。”这个丧事与其讲“易”宁愿取其“戚”。这个“戚”就是哀戚的意思。而这个“易”字，有不同的理解。俞琬在《书斋夜话》里，看这个文讲不下去了，他就怀疑应该把这个“易”字改为“具”字。就是“具备”的“具”。他还引证说在《礼记·檀弓篇》上说“丧具，君子耻具”。“丧”，就是做丧事的时候，“具”，就是具备。在丧礼的时候应该按照哪些礼节做的很完备的，君子以此为耻，这个就叫君子耻具。什么叫具呢？古时候父母过世的时候，要举办丧礼。丧礼都有一些具体的规定，比如说入殓时，有哪些礼节，出殡时有哪些礼节，祭品有哪些要求，都有一定的规矩。而做孝子的人，把这一切都按照规矩办好，一样也不缺少。甚至连祭文，写得也很好，念得也很好，丧事一切具备，这个就叫具。而君子对这些是什么态度？“君子耻之”。为什么以此为羞耻？因为从前的孝子如果丧失了父母亲，会语无伦次，因为他的心思全在父母身上，若备妥了这些丧具，便去掉了哀伤的心，把一切准备的井井有条，这

是注重形式，把实质的意思给忽略了，这就叫“具”，“君子耻具”。

在《群经评议》上，对这一句话，还有一种不同的理解，它认为这个“戚”，应该读做蹙，就是上面是一个戚，下面是一个足字，“蹙”就是“蹙破’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居丧，或失之和易，或失之破蹙”。“易”包咸的注解解释为“和易也”，这个是出自《礼记·郊特牲》，“示易以敬也”。“示”就是表示，“易”是和易。比如说有客人来奏乐、和和顺顺，有礼而又恭敬。根据这个，这句话的整个意思就是：丧与其礼乐和顺，不如哀而有余。在李炳南老师的案语之中他这样说到，他说“《书斋夜话》及《群经评议》这两种说法意思可以从顺”。就是说可以按照他的意思讲，可以把这句话讲得通顺。但是可惜“失于已改”，改了经文是不可以的。你认为经文这样讲不通顺，就把这个经文的文字给改了，这个不可取。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改的话，其他注解的人，其他讲解的人，看到这一句话讲不通，他也把这个字一改，一改再改的话，改到最后啊，这个经文就不称其为经文了。所以古人做学问很严谨，绝对不可以改经，你有怀疑的话，可以在旁边标一个小注。凡是有所疑问，解释不通的地方可以存疑。这是因为文献不足，参考资料不够，等到后来有文献，有参考资料，找到依据了再做研究。包咸注解的这个“易”，解释为“和易已境”。这个意思是比较恰当的。

所谓的“和易”，就是一个孝子遇到父母之丧的时候，他如果还是那样的和易。“和”在《中庸》上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喜怒哀乐发出来还有一定的节制，这个时候就叫和。一个孝子在丧失父母亲的时候，他的喜怒哀乐不能够节制，这个就不能算是和。而这个讲到的“丧与其易也”，“与其”是和易，就是告诉我们古时候父母之丧的时候，孝子他哀痛到自己不能节制，甚至于好几天都不吃饭。所以《礼记》里面就限制：三日之后要吃粥，然后再吃饭，三日之前你要喝喝水，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到后来，现代人讲他说古人的制礼叫孝子不要吃饭，只喝喝水了。这个就是把问题给误解了，没有看明白。这是我们不能够体会古时孝子丧亲的时候，那种哀痛之情。是古时候的孝子自己

哀痛的不能吃饭不能喝水，所以圣人制礼就勉强他说：你再不吃饭，你这个身体就坏了，坏了就不是尽孝了。所以规定你非吃不可。现代人把它反过来了，这是曲解经意。

一个孝子在父母之丧的时候，有客来就奏乐，和和顺顺，待客有礼又恭敬，他的哀痛也不至于过分，这个叫和。像这种和的时候，孔子讲这个不能尽其哀，你这样和易，还不能够尽其哀。对于孝子来说“宁戚”，“戚”就是哀戚的意思。这里是比较你那样和易还不如哀戚，那是尽到孝子，对于父母的哀伤的本意了。所以在李炳南老先生的案语里边，认为这个易采取和易这样的理解比较好，“哀戚”对着“和易”就显得出这一句话的意思：丧与其礼和庄严，不如哀而有余。

蔼益大师《论语点睛》中说“俭非礼之本，而近于本。故就此指点，庶可悟本”。林放来问孔子礼之本，结果孔子没有直接回答他，礼之本是什么？而是回答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那为什么他不直接回答他，而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回答呢？这个就是孔子注重弟子的悟门，如果你直接回答他“礼的根本是仁”。因为孔子曾经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这不就直接告诉我们，礼的根本是仁了吗？但是他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通过比较让林放自己去体悟。因为如果你直接告诉他，那就是学而不思则罔。他学到了一个概念，学到了一个知识，离自己体悟还很远，就把他的悟门给堵住了。这也是圣人他教学的善巧方便，注重学生悟入，这个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孔安国注“祭如在，言视死如视生也。祭神，谓祭百神也”。在古代的祭祀有两种：一个是祭鬼，一个是祭神。“鬼”就是自己的父母死了被称为鬼，父母还有父母，也就是祖父母，祖父母还有父母，曾祖父母，历代的祖宗不在人世了，但是他们的精神还在。在中国古书上说：人死为鬼。除了自己家族里过世的，还有外面的。比如说一个人在世的时候，他很公正

贤明，对百姓做了很多有利益的事，他死了之后人们说他是神。比如说在福建台湾那一带都祭妈祖，妈祖就是她在世的时候，在海上救了很多人。她过世之后人们为了纪念她的功德，所以有妈祖庙。

中国历代也有很多在世间替人类社会办福利，建功立业的人，死后人们都把他尊称为神，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岳王庙、关公庙，那是纪念岳飞、纪念关公的。所以这个庙和寺严格来说是有区分的："庙"就是祭祀神明的地方，而"寺"是教育的机构，就像我们现在学校、学院一样。在一般祭祀的时候，照例人只祭自己的祖先，这是不忘本。我这个人身体是怎么来的？是从父母来的。父母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祖父母来的，人都有根本。你祭祀家里死去的人，那叫先人，这就是不忘本。就因为不忘本这个道德，就要追本。对于人自己的根源，从自己的父母追到祖父母曾祖父母，最后一直往上追上去，追到了三皇五帝，其实都是炎黄子孙，所以这个追本越追到后边，代表你这个人越有道德，德行越深厚。你这个人人格很健全，为什么健全？因为你从家谱上往上推，推到最后都是三皇五帝的子孙。一想到自己的祖先是三皇五帝、都是圣人，那我们也要效仿圣贤，而且古代的礼上说，不娶同姓。你按照家谱去往上一推，这个父母是两个姓，父亲的父母是两个姓，母亲的父母是两个姓，再往上一推，这个百家姓全都是一家人。

所以我们说炎黄子孙，这个不是形容，确实我和他人，甚至和众生和万物都是一体的。你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你就不会自私自利了。把我和他给区别开来了，所以我们修道，就是要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就是认识你自己。这个身体不是我。我是谁？你溯本追源，追到最原始的，突然恍然大悟：原来我和众生，和万物都是一不是二，你就见到自己的真我了。所以我们一般人迷惑颠倒，就像一个大海的水泡，我是我，你是你，我还和他起了对立，而当你真正明了事实真相的时候，这个水泡就回归大海了，才知道整个大海，才是真正的自己。所以禅宗说：要寻找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你把本来面目找到了，就把自己的真心给发现出来了。我与他人与万物是一体的，所以为什么菩萨能够做到无缘大

慈，同体大悲？他帮助众生是无欲无求的，就是因为他明了了这个真相，因为众生的苦就是我的苦，众生的乐才是我的乐，那个才叫真乐。所以中国的学问妙就妙在这里。你无论从孔子所讲的哪一句话来研究，都能够用到修道这一个方面。所以祭鬼，是祭自己的祖宗，这个是根本。祭神，祭神就是祭祀生前在社会上有功于人的，这个也是报答他们的功德，这也是报恩、报本。

所以祭祀是教育，教导人知恩报恩，饮水思源。但是在“五四”运动，十年“文革”的时候，很多人不明了祠堂的教育意义，误以为它是迷信给毁掉了，实际上这个祠堂被毁掉了，人的责任感也就不见了，因为在春秋祭祀的时候，除了举办这些礼仪，祭祀祖先之后更重要的是宣讲祖先的德行，因为在祠堂之中，供奉的是祖先的牌位。说你们家历代祖先有哪一位人对国家做了哪些有利的事。那么你作为他的后代子孙，言行举止都非常得小心谨慎，生怕因为自己的言行给祖先抹黑。结果这个祠堂被毁了，现在的年轻人做事不仅不会想到祖宗，能够想到父母就已经不错了，很可能两个人都要结婚了，才把对方领过来，给家长看一看，说我们要结婚了，你要给我们准备房子准备钱，所以不负责任就体现在这里。

“祭”也有祭的道理。祭什么？行什么礼？也都是有一定的规矩的。而且祭的时候，必须全神贯注。所以孔子说他“我战则克,祭则受福”。无论是祭鬼祭神要恭敬，这是报恩，也是本分中应做的事，祭要得福，参加祭礼要想得降百福，必须斋戒。什么叫斋戒，并不是你吃素叫斋戒，斋戒是斋心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心中唯有这一件事，没有其他的念头。“祭如在”，这个如在就是观想，不论在哪，祭祀观想，祭时鬼神如在目前，比如说如果你去拜关公，祭关公，关公像在这里，就如同你面对关公。如果祭家里的先人，比如说祭父母或者祖父母，先人就在眼前。如果没有这个心理，祭不如在，还在想那个祖宗死了好久了，祭他不过是有这么一个礼教，我不得不祭。怀着这样的心理去祭，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个“如”很重要。孔子在祭祀的时候，他就做到了祭神如神在。无论他是祭祖宗，还是祭神明，都是身临其境，如同鬼神就在

面前，他如果不在，由别人代祭的话，就没有这样的身临其境，没有这样的心理，就不能够得到感应。要得到感应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至诚感通，像学佛的人烧香，就如同是打电报给佛菩萨，拜佛就如同佛在面前，用真诚恭敬的心来礼拜，才能够得感应。不要觉得，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佛像，那如果你这样去拜的话，感应就难了。

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孔子的境界非同一般，可以说是真正的大菩萨。我们在今日有很多学佛的人，说孔子讲的是世间法，他们学佛学的是佛法，学的是出世间法。但是我们要明白虽然说讲出世间法，我们的境界还是凡夫。我们不仅比不上孔子，连孔子那些大弟子的境界都比不上。所以我们明白自己的境界到底在哪，不能够好高骛远，要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能够学得越多，连圣人都不放在眼里了。看孔子还说“孔子还不吃素”。这个就不是学道了。所以我们学的越多应该越谦虚，学的越多应该越恭敬，不能说我们读了几本经，连孔子、连圣人都不放在眼里了，这个是不可以的。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据《史记·鲁世家》说：“定公姓姬，名宋，是鲁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这个“定”是他的谥号。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鲁定公问孔子：君主应该怎么样来使臣？就是怎么样来用臣子领导臣子？“臣事君”，臣子应该怎么样来替国君办事？“如之何”就是怎么样做。定公他问这一个问题必定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孔安国注“时臣失礼，定公患之，故问之”。当时鲁国三家专权，也就是孟孙、叔孙和季孙这三家专权，国君没有权力，处处都被三家挟制，心里很不痛快。当时的国君是鲁定公，他的哥哥是昭公，鲁昭公即位之后三家专权。有一次闹了很大的冲突，鲁昭公也被迫离开鲁国流亡到齐国，在齐国呆了七年，后来就死在了齐国。三家就把昭公的弟弟定公立为国君。当然，鲁定公就更加没有实权

了，而鲁国三家大夫权力更加扩张，更加肆无忌惮了，所以鲁定公有点忍受不了了。

当时孔子在鲁国做官，他就拿这个问题来问孔子：君主对待臣子，臣子对待君主，有一个规矩吧。在这个意思当中，就是希望怎么样把这种状态给改过来。如果当时一切按照孔子所教导的这么做，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可惜到了后来，齐国用计送给鲁国的国君一些女乐，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歌舞团，结果这个鲁君就接受了，从此不理朝政了。孔子一看，在鲁国做事情做不下去了，所以他就辞了官位，周游列国去了。

鲁定公提了这个问题，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对以君礼臣忠。这个君臣是相对待的，君主要臣子来办事，首先要以礼来对待他，国君在上，应该以礼使臣，凡事应该按照国家所规定的规矩办，不能够乱指挥。比如说在年岁好的时候，用百姓一年可以用三日，不好的时候一年只用二日，年头再不好的时候，就只能用一日。再比如对待老年人，要像对待年轻人一样，甚至还要更加超过，要尊重老人，用人的时候，老人不能做粗工，这个是处处要替百姓着想。

君主对于朝廷的臣子，《中庸》里面讲"敬大臣"，对大臣要尊敬。因为朝廷里的这些大小官员，都是来替国君办事的，他来替你办事，你用他，就要尊敬他。"君使臣以礼"更重要的就是要听从大臣的意见。"臣事君以忠"这个是就臣子一方面来讲，臣应当以忠来事君。这个"忠"，古人解释为"尽己之谓忠"，就是竭尽全力地完成君主交给你的责任，要尽其应尽的职责。你既然是到朝廷来替国家办事，规定办什么事，你就要把这个事办得彻底，这就叫忠。以忠待君主之道，不是指君这个人，君主他只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头、一个代表，君主办事，也是替百姓办事，你替君主尽忠，办的事情，也是替老百姓办事，也是对老百姓尽忠，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当公务员，迟到早退，喝着茶水看报纸，开着电灯领薪水，这就不能是尽忠了。"君使臣，臣事君"这个是讲两方面：若君使臣不以礼，臣必不会真心办事；若是臣不能尽忠，则如何对得起自己的国君。

君臣相遇是一种缘分，应该各尽其道。黄侃《注疏》说"言臣之从君，

如草之从风”，他认为孔子讲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臣顺从君主，就如同那个草顺从风一样，这个风从哪边吹，草就顺着风向哪边倒下去，这就叫风行草偃。“故君能使臣得礼”，所以这个君主能使臣得礼，就是君完全以礼来对待臣子。“则臣事君必忠也”，这个臣子事君必然要尽忠。反过来说君若无礼，这个君失了礼了，“则臣亦必不忠也”，他认为孔子讲的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人讲“故君能使臣得礼，则臣事君必忠也”，加上了这个“则”字，好像这是有条件的。“君若无礼，则臣亦不忠也”，这个也是有条件的，换句话说，这个臣子是看你君主怎么样对待我，你怎么样对待我，我才怎么样对待你，这个是有条件的，有人批注不赞同这种讲法。为什么？因为孔子没有加这个则字，孔子所说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圣人所讲的话，是没有条件的，就像儿子对父亲孝，不以父亲对儿子慈为前提，只是讲做儿子的应该尽到的就是孝。做臣子的应该做到的就是忠，没有条件就是说，他不袒护任何一方，不偏重君主也不偏重臣子。君主既然用臣子，就得以礼来待臣；臣子既然是臣子，侍奉国君就要尽到忠。所以你不能说，假使你国君没有礼待我，我就不尽忠。这个就不是孔子的本意了。

那么臣子应该怎么做？真正是一个臣子的话，看到君主失礼的时候，他就要谏劝，劝谏三次而不听从的时候。他就不干了，不管这个君主，把你的待遇提得多高，对于你怎么样得优厚，只要不拿你当大臣来对待，什么叫不拿大臣来对待，自古以来这个做大臣的，不是做太监的，太监是完全侍候君主，君主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但是大臣并非如此，大臣的着眼点是办政治，他的着眼点，是为天下的老百姓来着想，为天下老百姓的利益来着想。如果国君违背这个的时候，自己赶快就走，这个是臣子应尽的本分。也就是君失礼则辞。那如果你要干，你拿了国家给你的俸禄，你还在那里和稀泥，不尽忠，得过且过。佛家有一句话叫“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还”。这一句话对于拿了国家俸禄的人，也同样地适用。为什么？因为你做大臣，拿了国家的俸禄，这个施主是老百姓纳税来的钱，你这个俸禄是这么来的。如果你拿了老百姓纳税

的钱，自己享受，不替老百姓着想，这个果报依然很严重。

这一个君臣关系，虽然是孔子针对鲁定公所讲的，但是在我们现在社会，也依然适用。因为在一个学校，在一个企业、在一个单位、仍然有君臣关系、就是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员工对于老板要尽忠。什么叫尽忠，就是把自己负责的部门尽心尽力的做好，这就是尽忠了。我们不管在哪里工作，如果照孔子的教导去做，我们会做得很平稳，后来也不会有很多的麻烦，这样就是修道。所以修道在哪里修，不是到深山老林里与世隔绝，而是在自己的工作上面一举一动都合乎礼，这就是道。不这么做而是随顺世间人，争名夺利，结果有了名也有了利，但是本分没有尽到，不仅没尽到，还结了很多的恶缘，造了很多的恶业，到了寿命终了的时候，那是“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这个名利、财富都是空空的，带也带不走。平生所造的损人利己的恶业，是随着自己的业力牵引而堕落了，这个就是苦。我们要觉悟到这一点，照这样去做，一个人在有生之年就平安无事。这个平安就是福报，所以修道在哪里修？就是在日常生活、工作、待人处事中去修。如果我们待人处事不能够尽忠职守，还不能够尽到自己本分，这个道就没有办法去修了，做人都做不好，还怎么能够成佛。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一句话。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根据古人的批注，孔子这几句话，大概是对孟武伯讲的，不能确定。不管他对谁讲，这一句话对任何人都有用处。

“居上不宽”，“居上”就是居上位的，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的位置，在家中、外出、在单位都有上下的差别。现在西方人讲所谓的平等，这个“平等”不能像我们现在人所理解的平等，现在人所讲的平等，是“视父如兄”，称呼为大哥，父亲称呼儿子为老弟，现在的人以为这是父子平等，这是邪说。“日有盈昃，月有圆缺”天然就是如此，居上不必一定是做官，在一家之中，一个团体中，都有分上下，上下这是一个自然现象。

只要位居上位，在高位，对下面的人都必须从宽。郑康成注“宽”，度量宽宏。居上位者不宽则不得众。在上位的人如何宽？那就是要理解人都有过失，人不是圣贤，谁能无过？小过装聋就过去了，大过才要纠正，如果大小过都要管，管的太严，那就不胜其多了。

我们看汉朝的刘宽，他一生不生气，脾气特别得好。他的夫人就想知道这个刘宽到底会不会发脾气，结果有一次，这个刘宽身穿朝服，戴好了官帽，端端正正地坐在这里，正准备要去上朝。结果这个夫人就让奴婢给刘宽端上一碗热腾腾的肉羹，而在递给他的时候故意失手，好像把这个汤没注意全都洒在了刘宽的朝服上。这件事出现之后刘宽是怎么做的？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烫到你的手没有？你看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很生气，甚至勃然大怒。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弄坏了我的朝服。他反而是很关切地问：“烫到你的手没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都觉得很惭愧，为什么？因为我们待人太过严厉、结果没有这种宽宏大量，大事小事都是很严厉啊，就有失宽宏。

下面讲“为礼不敬”，这个“为礼”就是指在下位的人对于在上的人，讲敬礼不能恭敬，这个就有失礼的根本了。《曲礼》开头就说“毋不敬”！告诉我们一切恭敬。所以礼的根本就是在于尊敬人。没有恭敬心，还算行礼吗？现在很多人的鞠躬，李炳南老居士说，大都是鞠项，只鞠脖子，怎么才算恭敬？在一个机关里面当公务员，要怎么样做才叫恭敬，并不是每一天上班的时候，对于机关的首长跟他鞠一躬，或者说些恭维他的话。在单位里边你担任什么职务，把你的职务不折不扣地尽心尽力地办好，把事情做得很完美，这就是恭敬；对人、对自己担任的事情，实实在在地办，一点都不敷衍，这就是恭敬。所以讲礼而没有敬，这个礼就没有讲到实处，对人恭敬，对事也要敬，而且对人的恭敬是发自于内心的，向人家敬礼，或者是对一切人都要谦虚一点，尊重人家，这是对人敬；对事情，事情要办的很妥当，一点也不马虎，没有百分之百做到的话，做到一半，或者做的差不多了就放弃了，那就是对事不敬，办事情没有办彻底。讲到礼而没有敬，表面上很恭维人家，但是心里没有恭敬之心，这没有

用，不算恭敬。对事，没有把事办好，敷衍，专门讲外表都是不敬。这样的态度不能够办事情。

“临丧不哀”，《礼记》上说“临丧则必有哀色”，这是讲孝子在父母死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哀痛，没有这个哀痛之心，就是临丧不哀。不但是父母过世的时候，就是一般人看见别人家有丧事，邻居朋友有丧事的话，不会到丧家有说有笑的，那就是失了礼。别人有丧事，要有同情哀痛之心，更何况是自己的父母死了，那更是大事，要哀痛。所以临丧要哀。孔子讲：居上要是不宽，为礼要是不敬，临丧要是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圣人讲话都很温和。这三条是应该办的事，他却办不到。那些不应该办的事，他也必定不会办好，所以孔子说“我不愿意再看其他的了”。

孔子作为圣人他讲话很含蓄，不看就是不足以观，讲到这种程度就算了。如果讲到实际的话，“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这就不足以为人，做人做到这种程度的话，做一个人的儿子，父母死了之后，他一点哀痛的心里都没有，这还能算是一个人吗？

“礼”表现出一片虚情假意，表面上对人毕恭毕敬的，内心根本就是藐视对方，瞧不起对方，这就不敬，这还能成为人吗？居在上面，对于下面的人不宽恕，这个都是不足以为人。中国固有的学问都是对自己要求严格，责备自己，对人要宽恕，人有什么不对的话，总是要找出很多的理由来，他为什么没有做对，他肯定有他的原因，都要饶恕人家，这个就叫宽。不能遇到人家有什么不对，就尽量说这个人不好，他对不起我，这个宽恕体现在哪里？普通人只是关系处不好，居在上位的人，你用这样的态度来待人。以后人家就没有一个人给你办事，要求得太严了，这个就是居上位要宽。

孔子讲这个话意思是说凡是在上位的人，都要宽恕待人。天子以宽恕待天下，国君以宽恕待一国的人，卿大夫对他这一家也要宽恕，普通的平民在机关对下属，在家对家人都要宽恕，这个宽恕是没有限制的。要了解到人没有到圣人的地位，都有过失。人可能有意无意之中都会犯过，有了过失，对于公家没有什么大影响的，就可以饶恕；对于国家有影响的

话，那就要秉公处理。秉公办的时候，还要给他教导、教化，上对下要教导，免得他再犯这些过失，这就是宽。

里仁篇

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我们知道孔子教育最高的境界是成就圣人，孔子他本身就是圣人，其次就是贤人，再次就是君子，像孔子的大弟子有七十二位贤人，君子就是一切都规规矩矩地守着做人之道，我们所说的“正人君子”。君子有很多的标准，有很多的要求才能够做到君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句话就讲“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这个“终食”就是吃一顿饭的时间，表示时间很短。“违仁”就是“去仁”。君子吃一餐饭这么短的时间都不会离开“仁”。比如说孟子讲“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我们到人家做客或者到餐馆里去吃饭，看到活生生的一头猪、一只鸡、还有一条鱼活活泼泼的，人家要宰杀给你吃，你不忍心吃，为什么？那也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所以当人宰杀鸡、猪、鱼的时候，它们都会非常地恐怖，而且会发出哀嚎。君子听到这种声音就不忍心了。所以他说“君子远庖厨也”。君子不忍心看到庖厨里宰杀这些活生生的动物，所以要远离厨房。有人吃肉也是吃“三净肉”，就是“见杀不食、闻杀不食、自养者不食”，这都是为了培养一个人的仁慈之心。君子既然不可去仁，就必须经常保持这种仁心。虽然在一食之间也不能够离开仁。

下面讲“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造次”马融的注解是“急遽”；郑玄说是“仓卒”，他说“造次”就是“仓卒”二字的转音；邢昺的《论语注疏》说“急遽、仓卒”都是“迫簇不暇”的意思。“颠沛”马融注解为“偃仆”，也就是遭遇到危险的时候。“造次必于是”，意思就是说，

在急遽时迫促不暇之际，他的心也一定在仁。“颠沛必于是”就是在遭遇危险之际，甚至面临死亡的时候，他的心也一定在仁。就像曾子在临终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席子是大夫所用的席子，不符合礼，于是他不能用，叫人换掉。这个席子一换掉他才断了气，这个就是给我们证明“君子须臾不可离仁”。

作为君子，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违背仁，即使是在非常忙碌的时候也必须不违背仁。我们看到很多人在一忙碌的时候，就不按正规来做了。有的人是在面临危险的时候，或者是临命终时就忘记了这个仁字。而在这里告诉我们，不管再忙，行动再急迫“必于是”，必定是在仁上不违背仁。进一步讲君子学仁，不仅时时在仁上，而且念念不违背仁，就是你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起心动念，都不能够离开仁。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时时要保持着正念，时时都在定中。所以我们学习，修学重要的就是要转念，把“熟处转生、生处转熟”。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一般的人，起心动念第一个念头都是自私自利，甚至是损人利己，这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把这个熟悉的念头转变为处处为人着想，考虑到对方的需要，能够自他两利，甚至损己利人，这个就叫作把生处转熟。把利人的思想，变得熟悉起来，而处处自私自利的想法给断掉，这个才叫转念。

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伦理学史》中说：“孔子以君子代表实行道德之人格。孟子则又别以大丈夫代表之。”也就是说孟子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大丈夫，和孔子所推崇的君子他们有共同之处，有共同的特点。我们通过看大丈夫的人格、品质，也更好地理解这个“君子不违仁”的特点。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大丈夫？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男子汉。

在《孟子·滕文公下》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孟子和纵横策士景春，进行了一场关于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大丈夫的辩论。景春认为像当时的纵横家公孙衍、张仪等人，他们一旦发怒天下诸侯都会战战兢兢，如果他们安静下来，天下也因此平安无事，这样的人才是堂堂的大丈夫。孟子不同意景春的意见，他认为公孙衍和张仪，不过是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于诸侯之间，是利用权势作威作福的政客，根本不是什么

大丈夫。所以他问景春说："你没有学过礼吗？"男子长大成人行冠礼的时候，由父亲讲述教导做人的道理；女儿出嫁的时候，母亲将她送到门口并且告诫说：去到婆家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可违逆丈夫，以婉顺为准则，这是妇人女子之道。大丈夫之道是什么样的？

孟子接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可称得上是大丈夫。就是富贵的时候，他能不受淫惑。就像宋弘，虽然皇帝要把姐姐嫁给他，但是他是有妇之夫，他讲道义、讲情义、讲恩义，这个富贵的地位对他来说也是无动于衷。就像《论语》上所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所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即使一个人身处贫贱的时候，人穷志不短，仍然有他的气节和志气。像古人有一句话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有志气的人，即使是接受人的食物，如果别人对他不礼貌、不恭敬，他也都不愿意接受。"威武不能屈"就像我们知道文天祥，他即使是面临着富贵的诱惑，别人武力的逼迫都不能够让他屈服，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大丈夫。

这告诉我们，在平时无事的时候谈不上"不违仁"，必须是遇到事情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谁是真正的君子。平常人在富贵时就被诱惑了。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富贵学道难"，富贵的时候，面对着这些财色名利的诱惑，开始学会了骄奢淫逸，不思进取、玩物丧志。所以富贵的时候也是容易堕落的时候，而贫贱的时候就开始怨天尤人。他不想一想，今天的处境都是自作自受的结果，而把这个责任都推卸给外人、推卸给客观条件，这个告诉我们君子无论是在贫贱、富贵、造次、颠沛时，都要不违仁。所以必得遇到富贵、贫贱等的情况之后，才能看出谁是真正的君子。

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为什么说"六亲不和，有孝慈"？舜为什么被列为二十四孝之首，就是因为他的后母三番五次地要置他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怀恨在心，和后母起了逆反之心。再想着一旦得势就打击报复他的后母，反而总是反省自己做得不好，不能够让后母欢心。最后他感化了他的后母、感化了他的家人、感化了天下的百姓、感化了尧帝，把王位让给他。所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后

母，才成就了大舜的孝。所以平时的时候，父母对我们很慈爱的时候，很呵护的时候，看不出这一个“孝”。就是父母不理解我们的时候，甚至还要想方设法置人于死地的时候，他都没有逆反之心，没有对立之心，这个时候才显出一个真正的“孝”字。所以这个叫“六亲不和，有孝慈”。

“国家昏乱有忠臣”，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看不出谁是忠臣，必得是国家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混乱的时候才显出谁是忠臣。比如说曹操就是治世的忠臣，乱世的奸雄。这个是给我们讲的君子在任何时候，念念都不违背仁。无论是在遇到急遽的时候，还是遇到危险的时候，无论是富贵的时候，还是贫贱的时候，都不违背仁，这才称得上君子。

子曰：“民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这个“过”就是过失，“党”一种解释作党类讲，一种解释作朋党讲。我们先看作党类的讲法，孔安国注：“党，党类。小人不能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过，当恕而勿责之。观过，使贤愚各当其所，则为仁矣。”孔安国注解的意思就是说，人的过失各有其类，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君子是一类，小人是一类，有学问的是一类，没有学问的是一类，推而百工技艺，类别也各不相同。比如说农夫不能耕田，这是他的过失；如果他不能写文书，那就不是他的过失了。观人之过能够随类而责，不求备于一人，那就知道这个观过之人是有仁心之人。如果不依类而责，比如说责备农夫不能够写公文，不能够写文章；或者责备这个知识分子不能够种田，这个都不是随类而责，都有求全责备的意味。如果这样责备的话，就知道这个观过之人就没有仁心，是不仁之人，因此说“观过，斯知仁矣”。

作“朋党”讲，这个“朋党”的范围很广泛，比如说君臣关系，这是“党”，家庭父子关系也可以作“朋党”解释；至于朋友更不必说了都是“朋党”。通过这种讲法，人的过失是由于偏护其亲友，故云：人之过也，各于其党。偏护亲友出于私情，以私害公，因此被称为过失。但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比如说舜为天子，假使他的父亲瞽瞍杀人，孟子认为

应该怎么办？孟子认为舜应该从监狱中，背负他的父亲逃跑，逃到海边去。这种私情顺乎人伦常情，因为父子有亲，这种过失也是顺乎父子的天伦。这种过失合乎仁心，也为圣贤所许可。“观其过，即知其仁。故云，观过斯知仁矣”。又比如在《论语·述而篇》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陈司败问孔子说：“鲁昭公知礼吗？”孔子回答说：“知礼。”那陈司败为什么问孔子鲁昭公知礼不知礼呢？因为按照《周礼》，周公之礼同姓不能结婚，就是结婚不娶同姓。鲁君的祖先是周公，而周公是文王的儿子同姓姬。后来鲁昭公又娶了一个姓姬的女子，这就是同姓结婚了，因此陈司败就问孔子鲁昭公知礼不知礼？孔子回答说：知礼！后来陈司败就说，谁说君子不党？谁说君子是不讲朋党的？现在我问他鲁君知礼不知礼，鲁君明明不知礼，他偏偏说鲁君知礼，这就是维护他的朋党。孔子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孔子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他说我太幸运了，一旦有过失，别人都能够知道，这很好。可见这个过，是从什么地方来讲的？就是从维护朋党的角度来讲的。但是维护朋党，如果一视同仁，以公心出发的话，也就是说没有自私自利，是为了国家、为了公利，这就是合乎仁心。如果维护朋党有私情在的话，为了自私自利就不符合仁心，所以“观过，斯知仁矣”。观察他所犯的过失你就知道他有没有仁心在，为什么从他的过失里面，能够看他有没有仁？古人讲“过”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是不能避免的，孔子也是一样。明明知道鲁昭公不知礼，他说他知礼。为什么？因为他要是直话直说，说鲁昭公娶同姓女子那就是不知礼。虽是直话，但是根据礼，礼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臣子应该替君子掩恶，这也是礼。如果你说不知礼，那你又犯了礼了。遇到这种两难选择的时候，孔子只好承担自己的过失，而就从这个过失当中，我们来观察他的用心如何，所以说“观过，斯知仁矣”。他宁愿自己担当这个过失也不愿意扬君之过。从这个过失观察他的动机是出于公心。所以出于这样的动机，我们就知道了，虽然他犯了这个过失，但是即使犯了这个过失也是有仁心在的，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一句。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朝”字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当“旦”字讲。“旦”上面是“日”字，下面是一横代表地，这表示太阳刚刚从地上冒出来，这是早晨；“夕”《说文解字》当“暮”字讲，“暮”是傍晚的时候。“夕”这个字本来是一个月字，月字里面是两个点。而这个“夕”字里面是一点。也就是说“月半见”，月亮只见了一半，另一半看不见，意思是在傍晚的时候，太阳下去月亮刚刚出来，还没有完全出来。朝夕之间表示还不到一天的功夫，这个时间很短。孔子说“早晨闻到道了，到傍晚的时候死掉也值得了”，这一句话是强调闻道太重要了。这个道究竟是什么道，朝闻道又是说谁在闻？是孔子讲自己朝闻道夕死可矣，还是就一般人而言？这个“道”简单地讲就是“仁道”。这个“闻道”，并不是说孔子自闻，而是就一般人而言。这个“道”，有浅讲有深讲。孔子的教育最高的境界是“道”，其次是“德”，再次一等是“仁”，“仁”以下讲的是“艺”。虽然最高的境界是“道”，“道”就是人的本性。孔子也不是对他所有的学生都讲“道”。为什么？因为不是每一位学生都有同样的根器。

比如说在《论语》里，子贡讲，“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又有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仁”都不容易讲，“道”更不容易讲了。那怎么学？他这个“道”，开始要学的时候就要讲“仁道”，“仁”能听到之后，你在这个世间办事、办政治是仁政，你不办政治，你办其他任何事业，比如说你做企业家，这个事业也不会害人，都是有利于人也有利于自己，自他两利。所以孔子注重的是叫人闻“仁道”。所以人在世间必须知道为仁之道，才能利己利人。如果没有了这个仁道，一定就会害人害己。“仁道”学起来很难，听起来也很难，所以纵然朝闻夕死，也不虚此一生。否则，即使长寿百年亦枉为人。

所以一旦闻到这个仁道，就不冤枉到世间做一个人。就算是早上闻到“道”，闻到“道”还没有成就，还没有完全学到，像在孔门之中，人家问孔子你的学生哪一个是仁哪？孔子都不随便说“某某人已经是仁了”，可

见这个仁是不容易学成功的。他的大弟子颜回，孔子也说："其心三月不违仁"。还是这样讲。其他的弟子都没有明白的说某某人，哪个弟子已经成为仁了，可见这个仁不容易学好。你朝闻这个道，虽然闻道还没有成就，就是傍晚死也是可以了，也是值得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多少人到世间来，他闻道都没有闻到，懂得什么是仁吗？他不知道，不知道死就是冤枉死，知道这个"道"的话他死也值得了、可以了，这个浅讲是"仁道"。

那为什么学"仁道"这么重要？"仁"，你首先闻到仁道，然后一步一步地学，学成仁的时候，仁学好了就到了"德"了。因为这个仁从人从二，讲得是人我之间的关系，处处以仁慈之心待人。仁学到圆满之后，那你一起心动念，都是为人着想考虑到他人的需要，那就是德了。这个德是从本性里边来的，本性是如如不动的，一动就起了作用。起了作用这个动就是德，在动的时候那个德还是明德，还没有变化。但是普通人不动则已，一动就起了变化了，一动就牵涉到自私自利的心，那个明德就失掉了，明德就是被这种虚妄的私心障碍起来，这叫烦恼障。这个"仁"学好的时候，就是处处为别人着想。长期这么做就是"仁者安仁"，做得非常自然了。不动念则已，一动念就是利益他人。由本性起的德，自然就出现了，烦恼障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仁"修圆满了就是"德"。

《大学》上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个"明德"是修德的。这个修德怎么修？就从仁开始修，仁修圆满了，明德就自然出现，明德出现就跟本有的本性一致了。这个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圣人就能够达到这个境界。所以孔子讲这个仁道这么重要，它是明德是成道的基础。儒家的学问，孔子的教育它不是从最高处讲，而是从基础这一方面讲，为什么？因为他这一讲出来，人人都可以做到。如果一开始跟每一个都讲最高的境界，人家问你，从哪里开始学？这个道是不可言说了，人家就不知道该怎么学法了。所以相对而言学仁比较容易。如果学仁还不容易的话，那就先学恕道，那就是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一听就明白了，比仁还要更好学。所以孔子的教育是有步骤、有次第的，它是由浅入深，人人都能学，都会学得好，只要你肯这样学，就

由恕道到仁，再到德，再到道，这是一以贯之的。所以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是一贯的。因此“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讲的是人人可以懂的话，就是仁道。但是讲到深处，这个道就是孔子他的教育所达到的境界，志于道。这个“道”，就是《中庸》里面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开发本性的修养性德的道，能够闻到这个道那就更难了。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一句话。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乎？如礼何？”

“道”人都不懂，“德”则是似明不白，模模糊糊。“仁”二人，“放于利而行多怨”，因为没有这个仁字，为什么招致了人家的怨恨？就是因为没有把“仁”字学好。“义”，比较好讲但不好懂，所以再接下来就有礼。从前朝廷都设有礼部，礼部就是专管教育。中国的教育，从汉代开始到清朝都是以礼来治国。

这一句话首先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孔子的教育非常注重礼，比如说做天子、做诸侯，治国平天下，都要以礼治国、治天下。比如周公制礼作乐，就是以礼来治天下。在讲到对一般人的教育，无论是个人的修道或者是做一些对社会有利益的事业，都要讲究礼。礼是什么？“礼”就是一种规矩。就像作文章一样，文章有文章的章法，要懂得章法，文章才能写得好；礼就办事而言，有办事的一种规矩。做人就要学礼，这就是做人的章法，这个不能乱，一乱的话人格就没有了。所以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再说“修道”，“修道”也是要从做人开始，以做人为基础。而做人以礼，礼是人之为人的规矩。它也就是相当于佛教的戒律，所以有人说这个戒没有了，佛就没有了。这个礼没有了，儒也就没有了。

修道从哪里修起呢？《大学》上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在这里面也是讲，要从“知止”来做起，要从培养自己的定力来做起。你从哪里才能够入定呢？入定当然是心里入定，心里做什么事情都不乱，心要定在一处，心要能够定的话我们平常跟人家

来办事，就要遵循章法。事事都是守着规矩，那我们心里自自然然就不会乱。再一用功夫的时候，你这个心就能定得下来。

礼，对我们修道就像戒一样，很重要。如果我们平常从事上面，事事讲礼的话，我们的行为都有一定规范不会乱，那我们的心也就不会乱。所以孔子讲“修道”，讲在世间做人办事情也都很注重礼。礼的一个重要的内涵是什么？“礼主敬”，像《礼记·曲礼》曰，“毋不敬”！而何谓敬？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让”字，这个让字跟古时候的“让”，现在已经换过来用了。本来这个言字边这个“让”字是“责让”，互相用言语责让的意思，就是我责备你、你责备我。而真正在古时候，礼让的这个让字左边不是言字边而是提手边，叫“推攘”。什么叫“推攘”呢？这是个好东西，我推攘给你，你再推攘给我，这叫互相推攘。互相推攘，用提手边，手字做一个表示。这个礼就是要求我们遇到名利、权利，一些好的事情，都推让给人家，自己不要争取这叫礼让。这对于治理一个国家的人来说，包括国君、大臣治国，这个“为国”就是治国的意思；“为国以礼”这个“以”，就是用的意思，你能够用礼让来治国。“乎”是一个语助词。这一句中间用了一个“乎”字，一则表示活动的语气，二则表示这一句话到这里略微停顿一下。接下来“何有”这两个字接上，“何有”就是何难之有，那有什么困难？意思就是说治理国家的人能够用礼让来治国，这有什么困难？所以人要学让，大小事一切都是让。

像在历史上尧让舜、舜让禹，让之有余争之不足。连国家尚且可以让，何况其它的小事呢？能礼让，治国有什么困难？反过来讲“不能以礼让为国”，如果治理国家的人不能够用礼让来治国，“如礼何？”这个礼有什么用，你为什么要制定礼？“如礼何？”这三个字说得很含蓄，从这里讲，你不能以礼让治国，那你这个国家治不好，必然是把国家越治越乱。怎么会越治越乱？因为你表面是制定了礼，你是在位的人，自己制礼自己不守礼、不讲礼让，朝廷里的大臣、国家的百姓，也看得清清楚楚，你本身没有礼让，你叫人家礼让，谁会礼让？这样的国家必定是越治越乱。

所以在位的人自己想把国家真正治理好，要自己做出一个表率。不

能以礼让为国，要礼什么用？国家为什么必须要安设礼部？而今天讲究竞选，何须让？这个是讲治国。用礼让治国，当然古人讲这一条有一体用万。既要用礼来办政治，同时也用礼让来办教育，也教育一般民众礼让。政治、教育一切都要用礼让来实行的。这样的话，治国就是这么的容易。同样修道也是从这上面学，也要学礼让。

中国道家的老子也讲："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人家抛弃不要的，他不要我要；人家争取的，那我给他。那就是现在人讲，人现在就是争权夺利。现在的人，从西方的这个价值观学习来的，西方人从小就学竞争，竞争上升就是斗争，这个时候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问题就出现了。斗争还是不能满足自己的利益，斗争向上提升，就变成了战争。所以我们打开新闻媒体，每一天必不可少的内容就是局部的冲突。什么原因？这是因为以竞争获得自我利益的价值观，在世界上普遍流行所导致的，如果战争还是不能满足自己的利益，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情况下，如果一方不理智使用了核武器，结果就会导致同归于尽。

靠竞争的方式获得自我利益满足的价值观，没有给人带来一个光荣的前程，只能把人引上穷途末路。所以中国古人从小就讲礼让、谦让、退让，别人要争权，我给你权；你要争利，我给你利；这就是"人取我予"。你想争取的我就给予。"人弃我取"，你现在让人做公益的事业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做了。这个要付出很多，包括自己的体力精神、还有财力，很多人就不愿意了、抛弃了。"你弃我取"，你们不愿意做的我就来做。你看道家的思想也是如此，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才能破除我们的贪嗔痴中的贪心。修道贪求心不能破除，这个道什么时候才能修成功？所以讲礼让，修道也必须从礼让来奠定基础。果然我们处处能礼让，无论是名也好、利也好，我们不跟人家计较，就像老子说的：你要我就给，你们不要的话，我做我实际上有利于社会大众的事，这就是修道。如果你真能这样做的话，成就就会很快。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其实都讲不要和人家去争。像佛教讲修菩萨道，不管是哪一个宗派，即是行菩萨道的话，共同的科目就是六度。六度法门的第一度就是布施，什么是布

施？就是要把好处布施给人家，讲慈悲喜舍，这就是让。

中国过去人都学礼，都讲礼让，所以中国被誉为“礼仪之邦”。社会安定和谐，外国的人来参观考察之后，都非常地羡慕，非常地向往，愿意向中国人来学习。因为中国人通过礼让，把国家治理得如此之好。但是现在？人都向西方学习，学竞争，好像不竞争就满足不了自己的利益。结果竞争就很难和谐了，这个就是孔子所说的：“放于利而行多怨。”为什么？因为没有考虑到对方的需要，缺少这个仁了。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贤者，以孔子的教育，就是次于圣人的贤人。他又比君子高，贤人学圆满了就是学做圣人，这里边的这个贤，是指贤能的人。见贤，见不贤，这个“见”字很重要，怎么样你才能区分出这个人贤与不贤？那就是你必须先懂义，你先学了《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你才能知道这个人，是符合义还是不符合义，是贤还是不贤，不能依靠自己想当然的标准。知道何者是好人，何者不是好人；知道何人是贤，何人不贤；必须有学问、眼力。见贤，这个“贤”我们说了，比君子还高。但是你见了，不是白白看，看了要思齐。思考、想想与他一样吗？这就是“闻思修”。见了也须思修，并不是白看。他是贤人，那我和他一样贤能吗？简单地说，道德品性也就是存心，学问也就是包括一切技能，还有行动也就是在实行上。从这三条上看，如果一条站不住就不算贤人，特别是在行动方面。有道德要实行出来，不能不管别人，因为贤人耻独为君子，如果别人都是小人，这是君子的大羞耻。唯独自己是君子，大家都是坏人，只有你是清白人，这是无同情心的焦芽败种。

“见贤思齐焉”，与某人看齐。他是什么样，我就学他什么样，我们要跟上他，这很重要。“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不贤这句话就说得很和平了，“不贤”古人注解把不贤当作恶来讲，见到那个恶人。但是这个经文上说的是不贤，并不是说恶人。不贤与恶，不能够相提并论。不贤的人，

就是比贤人次一等的人，他可能是君子、也可能是普通人，只是尚未达到贤人而已。比贤人差，不是很坏的，却也是下等了。从这一句话中就看到，要求进步。见不贤的人，不进步的人而内自省，思考反省自己，我是否和他一样，我有这种情形吗？只许往前进不能够往后退，所以见“不贤”这两个字就有进步的意味。如果你把这个“不贤”当小人，把贤人当成君子，这个味道就没有了。

这两句话是孔子教修学的人，要会学才能步步往高处走。《论语》上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个人”是哪三个人？一个就是善人，一个就是不善人。从善人身上学他的善，从恶人身上避免他的恶。这样无论是善人，还是不善的人，都是我的老师。

我们求学，要亲师择友：亲近老师、选择朋友，也就是古人所谓的亲近善知识。但是自古以来，直到现在，善知识总是少，不善知识总是多，我们遇到善知识，那要跟他学，遇到不善知识，如果不善于学的话，就会退心了。比如说有人看到某人学习传统文化已经很长时间了，还是那个样子，那学传统文化对我有什么好处？他自己也丧失了学传统文化的兴趣和信心，这就是你不善于学了。善于学的时候，孔子这样讲法：他是善知识我要亲近他、向他学。他是不善知识、是恶知识，我要拿他作为自己的一个警惕，我不能像他这样，学了这么久还是老样子，没有一点进步。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人怎么样？作为自己修学的警惕，千万不能学成他这个样子，这才是善学。这样讲有什么根据？当然有根据。古人有句话叫“依法不依人”。我们来求的是法，他那个不善知识，他所表现的不如法，你就不要跟他学。你只拿他做你修学的一个警惕。你不要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不如法，你就迁怒到传统文化上面，要了解依法不依人，这就是善于学的。不善于学的，看见某人做得不如法，我也不想学了，我也丧失了学习传统文化的信心了。你不想学，那是你自己吃亏，和别人没有关系。所以孔子讲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要善于学习。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约”，就是俭约。何晏《论语集解》里孔安国注解：“奢与俭约，俱不得中也”。这个“中”就是中道，所谓的中道，就是恰到好处。奢侈与俭约，这两者都不得中道。但是“奢则骄溢招祸”。“溢”，是像水泛滥出来了。奢侈使人骄满，必然招致很多祸患。“俭约无忧患”，俭约则没有忧患。孔子的意思是最好按照中道做，如果把握不住中道，就会有所偏。既然有所偏失，“与其奢侈，不如节俭”，奢侈当然有失，俭约也有失，但是俭约的失与奢侈相比较而言，俭约的失更少。所以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

为什么俭约相对于奢侈而言它的偏失相对轻微呢？在唐朝有一位著名的诗人李商隐，他总结历史兴衰成败的经验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我们观察一个国家、一个家族之所以能够成就兴盛，无一例外都是勤俭持家。那后来为什么由盛转衰，又败落呢？无一例外都是因为过分奢侈、过分浪费所导致的。所以一个人，家里的孩子如果特别奢侈，穿的很好，要名牌；吃的很讲究，经常出入高级饭店；坐的是豪华轿车，住的是别墅，这样的生活习惯一旦养成的话，有一句话叫“由奢返俭难”，再让他过上勤俭的生活，就不太容易了。“由奢返俭难”，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就要和人去竞争，如果每一天不勤奋地工作，去和人竞争，就不能满足不断膨胀的欲望。所以西方人的生活轨迹是这样的：童年是天堂，中年是战场，老年是坟墓。

在童年时，孩子要什么父母就满足什么。特别是在圣诞节，孩子平时所喜欢的衣服、喜欢的玩具都是一应俱全、应有尽有。童年还无忧无虑，但是人的欲望打开了。古人把人的欲望比作深渊，自己一旦打开了，很难控制住自己。所以中国人特别讲究礼，“礼”就是为了让人把自己的欲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古人说“礼”像河水的堤坝，如果河水没有了堤坝，洪水泛滥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如果我们认为礼无用而废弃它，它所招致的灾祸比堤坝被去除还要严重得多。所以礼非常重要，可以防止

人欲泛滥，也可以防患于未然。然而西方人童年生活的奢侈把欲望打开了，使他们沉迷于奢华放纵的生活。西方很多年轻人还没有走上社会，信用卡已经透支好几张。他明明知道这么做会丧失自己的社会信用，为什么还要继续过度消费呢？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奢侈的生活习惯，不这样他也受不了。到老年的时候，西方人没有中国人的孝悌观念，老年人基本上被送进了养老院。在养老院里的老人虽然物质生活不错，但是精神生活却非常匮乏。大部分老人与电视为伍，整天过着坐吃等死的生活。

所以中国人非常重视奢侈这个问题。有一句话叫“少年得志大不幸”，一个人年轻的时候生活很富裕很奢侈，养成了骄奢放纵的习惯，往往一生还没有过完就已经把家业给败坏了。

《礼记·表记》上也有一句类似的话叫“俭近仁”，这三个字我们要注意。我们以前经常听说“力行近乎仁”，而这里为什么讲“俭近仁”。什么是仁？“力行近乎仁”，我们好理解。仁，是两个人的相处之道，从人从二，告诉我们要考虑到对方，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才能做到仁。所以如果你能够处处关心对方的需要，为对方着想，助人为乐，经常这样做就近于仁了。

为什么《礼记》又讲“俭近仁”呢？“俭”，是俭约，做事一切从俭，不要劳烦很多人。比如一个领导刚刚上任，奢侈地举办就任典礼，就会劳烦很多人为典礼花费时间、精力、财力、物力。你劳烦别人时候，没有为他们着想。因为你劳烦他们这件事，他们可能就要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放弃教育儿女的时间，来把这件事办好。那你完全不为对方着想，只考虑到自己的面子，而劳烦这么多人，就没有仁爱之心了，就与仁心离得很远了。所以一个人办事俭约，处处不麻烦别人，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就是在力行。也叫做“力行近乎仁”。

学仁，要从恕道做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你经常以这样的态度来处事，做着做着“仁”就离得不远了。此外，俭约不只是节省的意思。凡是奢侈的人，如生活、说话、办事啰嗦，就与仁道不太接近。因为凡啰嗦都有对象，会对对方造成麻烦。所以说话办事啰嗦的人很少为对方

着想，和仁道也离得越来越远，因为他必定会有妨害的对象，这就是“俭近仁”。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我们注意这个“欲”字，“欲”，固然不能不说，但是要做到“欲讷于言”。“讷”，就是说话迟钝、不抢着说，似乎说不出话来，这是指君子。凡是君子，说话都慎重，怕驷不及舌，所以五经讲的都是慎言。为什么呢？古人讲口为祸福之门，所以话要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再说。虽然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也很容易理解，但是在生活中却很难做到。“口是祸福之门”，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大半都决定在口。《易经》说“躁人之辞多”，如果一个人说话太多，他的前途就不会太乐观，寿命也不会太长。我们观察一下，凡是遇到一个人，都能滔滔不绝讲个没完，这样的人一定是烦躁之人。烦躁之人多半前途不平，会遭遇很多挫折，想长寿也是不容易的事。

中国古人说“话多伤气”，对人的身体有影响。这不是纯粹的理论，而是积累经验得出的经验总结。中国人特别讲养生之道，道家说我们人身体有精、气、神三种要素，也就是精神、真气，还有无形的神这三种。同样的人为什么有人寿命长，有的人却寿命短呢？那是因为有的人注重养生，有的人却不注重养生。这就像我们买了一辆同样的车子，用的时间应该一样长。为什么有的人用了很长时间车子还是很好，而有的人用了不长时间，车子就坏了呢？这是因为不同的人对车的保养程度不同，爱护程度不同。

因此道家讲养生之道，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讲求“收敛”，收敛自己的精、气、神，这三种要素。这种“收敛”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以用功，比如在夜间睡眠的时候不要仰着睡，要右卧如弓；不要张开口，吐气要均匀，不要吐得那么大，这也是不卫生。在白天也是这样，不必要的时候要闭着嘴，用鼻子呼吸。呼吸得均匀、很调和、很柔和。如果我们一个人心理不平和、很急促，或是如运动后地呼吸，对一个人身体里细胞伤

害和损失会很多。所以白天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多说话，把呼吸调的很均匀。在做事的时候，心里也要很定，心里不要浮躁。有些人一面做事一面心里着急；有些人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心里越不高兴，越逼着自己做，对身心两方面都不利。另外，如果我们为了发泄心里的闷气而到处宣扬恶事，受到的损失会更大。一个人要是真修，一定要做到心平气和。心理很柔和，在生理方面也不会伤气，所以话说得越少越好。

《易经》上还说“吉人之辞寡”，吉祥的人往往话少。一般人说话的内容无非是要表达自己的心理，或者是讲人、讲事。但是说话凡是牵涉到人与事，就关系到人的利害、关系事情的成败，所以在说话之前我们要想一想，这些话说出来对人到底是有好处还是有害处。有修养的人脑子一转就知道了，修养不够的人如果一时没有注意，说话冲口而出，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把别人给伤害了，自己也不考虑。当然，言不仅仅是说话，也包括写文章、发表各种言论都是如此。有的人往往把人家伤害了自己还不明白，对方知道后会报复我们，有时候即使对方不知道他受了损失，但是因为我们的一句话损害了人家的名誉、权利，让人受到了损失，我们还是要负因果的责任。

如果我们讲话时很小心，就有“福”了。福是怎么来的？比如说话，看到别人有忧虑，我们去开导他一下；看到别人有恐怖，我们去宽慰他一下；看到别人受了委屈、诽谤，我们说一句公道的话，仗义执言，给人家解围壮一壮胆子。这就是说话的功德。所以就看我们用口来做什么，用得好就能替人造福，自己也积了功德；用得不好就造了口业，妨害了人家也妨害了自己。

有一句话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句话的典故就出在《论语·颜渊》篇。这一篇里讲到：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这句话表面看，好像对人影响不大，君子讲本质就好了，何必要讲那么多的文饰和礼貌呢？但是子贡却说：“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可惜啊！老夫子你这话说君子，说错了，因为君子并非如此。君子文质彬彬，不仅本质好，注意外在的形式和礼貌，也讲文。当然只讲文而不讲质不行，就像有人

鞠九十度的标准躬，在心里却对对方不恭敬，只有文而没有质，是不正确的。只讲质不讲文，也是不正确的。就像很多农民，心地善良、为人淳朴，但是乘坐公共汽车时连上衣都不穿，虽然他们有很好的本质，但是缺少外在的形式，也不会让人有好的观感。所以子贡就说，君子应该“文质彬彬”，既讲外在的形式礼貌，也讲本质。君子话说出去，错了以后“驷马难追”。所以子贡说：“驷不及舌”，意思是用四匹马拉着车子也追不上。所以一般就据此成为两句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告诉我们，话一说出去，是非善恶就决定了，你想再后悔也来不及。

在《论语·子张篇》也有相关记载，子贡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不可不慎也。”君子的一句话说出来，说得好，人家觉得你有智慧；一句话说得不好，人家就认为你没有智慧，所以你看言语重不重要呢？言语代表一个人的心理，修养、学问都在话里面包含着，所以说话不可以不谨慎。

《论语》里颜渊问仁于孔子，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能够克除自己的欲望返回到礼的要求就是仁了。颜回很好学，他说“请问其目”，请给我详细的讲一讲怎样把这个要求落实呢？孔子就说了四句话，“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思是视听言动都要符合于礼的要求。其中有一条重要的就是“非礼勿言”，就是指说话要合乎礼。礼的内容包含很多，恭敬人家、不损害人家，说的全是礼。凡是不符合礼的话就不能说。

在《孔子家语》中也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孔子到周都去观礼，结果来到了周家的始祖后稷庙的庙口，发现在这个庙里有一个金人。金人的塑像三缄其口，也就是神像的口被东西给蒙了起来。在金人背后的铭文上说：“古之慎言人也。”所以后来形容一个人说话要谨慎，就是“缄口”。从这里可以看出周家很早就在研究讲话的艺术、说话的学问。古人讲礼，对于口非常注意，教人要“守口如瓶”。所以我们平时无论说话做事都要注意口，不要说错话。诽谤某一个人固然是不可以的，但是你说了一句普通的话，虽然没有针对一个特定的人，但是话说出来伤风败俗也

会影响社会大众的心理，这个罪过就更大。因此现在做大众传播事业的人要特别小心，想做社会大众传播事业，最好要学习传统文化。

现在的广播、电视、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都不太了解因果，喜欢把那些伤风败俗的事、绯闻、小道消息到处去宣扬。人们看了之后会有什么后果？比如说我们看新闻，今天看到一个人贪污了上千万，明天看到一个官员贪污了上百万，我们经常报道这样的新闻后，那一个贪污了两万块钱的人会想，我这是小巫见大巫啊，人家都贪污了上百万、上千万，我才贪污了两万，我贪污得很少了。那一心廉洁有守、不自私自利的人会怎么想呢？他想，看！天下的乌鸦一般黑。现在做官不贪不占都是少见的。我这样一心为公，一块钱都不贪是不是不太正常了。这样的宣传不仅没有把人善良的一面给引发出来，反而助长了人的恶，引不起一个人的羞耻之心。

所以古人告诉我们要隐恶扬善，要把那些善良的东西，好的方面处处让大家知道。如果我们的电视今天让观众看到一个孩子不孝敬父母，把他的父母送到了火车站；另一天又看到兄弟因为一点点的财产就起了纷争，吵上了法庭；那么那一个还在孝养父母的人会怎么想呢？他会想，人家的儿女对父母如此过分，我能够赡养父母、供父母吃穿已经很不错了。他的孝心没有被提起，反而认为自己是不错的了。那个不孝的人呢？他也想，你看天下人都是这样做的，我不孝父母也没有什么不正常。所以这些做广播电视媒体的人特别要懂得要传播什么，特别是那些公众人物说话更加要谨慎。比如一个明星，当一个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问到他和一个女子不正当的婚外关系，这个男子为了遮掩自己的丑事就说了一句“这是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会犯下的错误”。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影响很大，给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大家会认为，我们这么崇拜的人，都说这是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会犯下的过失，那我犯这样的过失也很正常了。这样就会引导大众做不仁不义不道德的事情。“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特别是那些公众人物说话更是要谨慎。

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人对男子的道义、恩义、情义特别的重视，讲“糟糠之妻不下堂”。这才是我们社会需要宣扬的主旋律。像《诗经》开篇就

讲《关雎》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什么这一句话以关雎作为开篇呢?因为雎鸠鸟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被称为义鸟,一生忠实于自己的配偶。所以诗人说,你看一看在河洲上停着的雎鸠鸟吧,它们一生都能忠实自己的配偶,忠实自己的伴侣,难道我们做人的还不如雎鸠鸟吗?我们做人的还不如禽兽吗?这才是正确的引导。所以凡是放在书开篇的一句话,都是对人生最重要的教诲,这反映了我们古人对后人教育的重视。只要你虚心打开一部经典,就能马上学习到人生最重要的教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的好伴侣是贤淑明德的女子,这也告诉我们夫妻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只有把夫妻关系调节好,社会的和谐才能真正达到。

很多人不能够“讷于言”的原因,就是喜欢夸夸其谈,即喜欢自夸。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有好东西,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自夸实际一是由于怯懦,在别人面前感觉到有压力,因此要在别人面前展示现实中自己没有的,但是比自己实际拥有的要好得多的东西,往往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压力。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高声叫卖的人卖的东西往往是比较差的。如果有人向我们炫耀他的优越性,我们就要懂得,这恰恰是证明他并不具备这种优越性。无论这种优越性是学识、勇气,还是财富或社会地位方面的成功,我们都可以从他的夸耀里推断出他在这方面是一无所有的失败者。一个真正具有能力并且实现了人生成功的人,是不会想到大肆渲染自己的成功的,因为他满足于自己实实在在拥有的一切。我们还发现,如果我们在别人面前炫耀我们自己已经拥有的,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失去自己将拥有的,或者已经拥有的东西,并且会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挫折。

中国有一句古话:“虚言折尽平生福。”如果我们喜欢自我夸耀或者提前说谎,就会使得那些本来应该在我们命运中实现的实实在在的美好,就会在我们自己的虚言之中实现了,可能就不会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了。或者在生活中,我们要获得它就会倍加艰辛。有很多人喜欢说谎,把自己

想象中将会拥有的东西提前挪到今天拿来吹牛。没有得到什么就说自己已经得到了什么，自己租的房子说是自己买的房子，这都会折损自己的福气，一定要改正过来。自夸很难维持长久，总有一天会被人识破，给自己带来巨大的不安。所以我们如果明白“口为祸福之门”的道理，就会慎重言语，言语才不会有太多的过失。

《易经》里面也讲“括囊”。什么是括囊呢？“囊”是布袋。把布袋的口结扎起来就代表我们人的口。你的口不乱讲话就等于布袋的口被绳子扎起来了，里面东西就自然出不来了。所以话不能够乱说，言多必失。

下面一句讲“敏于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敏捷。只要这件事情经过认真思考并决定这么做了，就应该赶快去行动。“敏于行”事情才能够成功，不能够像现在的一些人，只说不做，话说得再好却不去做，最终肯定一事无成。这就像一个人一直在研究地图，说北京到纽约可以怎么走，是坐轮船好还是飞机好，还是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好，怎么走最节省时间，最节省能源和金钱。他总是在研究，把方案研究得非常透彻。但是他就是没有去走，永远也到不了纽约。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做事最好是先实行再说，决不可说了不做。君子讲究实践诺言，“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研究孔子的这句话，并按照它这么去努力，就感觉圣人的话与我们生活、学习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

公冶长篇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

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孔文子是卫国的大夫，家庭混乱，但是死后却得了一个“文”的谥号。谥号，就是古代的天子诸侯卿大夫或者是一般的读书人过世之后，人家送给他一个谥号。这个称号把他一生所做的事，有哪些功过，用一个字给概括出来。天爵高的人则有私谥。在古代有《谥法考》和《谥法解》的书。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贡很聪明，看到孔文子家庭混乱，却得了“文”这一个褒扬的谥号，心里不免疑惑，就向孔子提出了这个问题。孔子如何回答？他说：“敏而好学。”“敏”就是聪明，来得快。这句话有两种句读的方法。一种读法是“敏，而好学”。这种读法是指聪敏是一件事，好学是另一件事。另一种读法就是“敏而好学”。聪敏的人差不多都不好学，自以为比别人高。但是孔文子这个人又聪敏又好学，“不耻下问”，这就更难做到。“下”， 有天爵人爵的不同。以人爵来说，部长去向司长请教便张不开口；再说天爵，博士不好意思问没有学历头衔的人，老年人也不愿意向青年人去请教。“是以谓之文也。”孔文子虽然家庭混乱，但是他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三条好处不能抹杀。这是国家所定的谥法，先从好处讲，坏事不提。比如说你为人作墓志铭，要铭其德，颂扬德行。如在历史上的“桀纣”，之所以被给予这样的谥号，那是因为他一生没有做好事。如果他是有三分善，七分不好，那也就从三分

善来说。中国人讲厚道，隐恶扬善。只要这个人有好的一面，就从好的这一面来称许他。这是给人一个改恶向善的机会，圣人的用心在于此。不像后代人，不管别人一生做了多少好事，只要他犯了一些罪恶的事就把他所有的功都掩盖起来，否定了，这是后来人的事。在圣人看来，应该引导一个人向善，引导一个人往好的方面发展，多给人以启发和鼓励。而一旦一个人善的方面受到了鼓励，那么他罪恶的一方面自然就逐渐放弃了，这也是讲做人的一种厚道。

所以《弟子规》上也说："扬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你把别人好的事在背后去宣扬，这个人知道了会觉得自己刚做了这么一点小小的善事就被到处夸奖，他做善的心就受到了鼓励。而且他知道你在背后说他的善事善行，他对你的印象也会特别的好。相反，你在背后把别人的恶行恶事到处去宣扬，结果被人家知道了，他对你非常痛恨，这在无形之中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所以厚道是需要慢慢培养的。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子谓子产"，"谓"就是孔子跟他的弟子或者跟别人谈话的时候，谈到子产。子产是谁呢？根据《论语集解》孔安国的注解"郑大夫公孙侨"，子产是郑国的一个大夫。从前的人都有名有字，郑大夫公孙侨，字子产。古人的字与名必须有一定的关系。钱大昕在《后汉书考异》上面说："产者，生也，木高曰'乔'，有生长之义，故名乔字子产。"后人增加人字旁成为"侨"。原来这个乔是没有人字边的，而后边公孙侨是带着人字旁的。这是为什么呢？《后汉书考异》给我们解释了。子产是有四种符合君子之道的，所以说"有君子之道四焉"。是哪四种呢？"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行己"是自己修持的时候，他是恭。

蔡清的《四书蒙引》上说："恭敬分言，则恭主容，敬主事。"也就是

“恭”和“敬”两个字分开来说的时候，“恭”主要是指外在的容貌，就像夫子的“温良恭俭让”，这个“恭”就是讲的容貌。“敬”则说事情。凡是做事一丝不苟而且百分之百做好，这就是“敬其事”，若草草率率便是不敬。现在的人办事，于公事不敬，于私事也不敬，公私都不敬。但是做事能办到十分，把事情办得很圆满的人又常常贡高我慢，傲慢心很重，便是无恭，这也是没有恭敬心。简单说“恭”，则含敬，反之也是如此，敬中即含恭。当你只说恭或者只说敬的时候已经包含了恭敬两个方面的意思，既指容貌上的恭，也指做事上的敬。“事上”就是侍候君主。在朝廷做官的臣子怎么样才称得上是“敬”呢？“敬”并不光是见到君主怎么样行跪拜礼，怎么样鞠躬，怎么样趋走。这只是形式，除了这个以外，对于治国、治天下，都有他自己的理想，并能用自己的理想去建议君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才是大“敬”。

中国人讲“选贤与能”。所谓的贤人政治，这个贤人出来办事搞政治，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像这样去建议君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才是敬之大者。对于向君主怎么样鞠躬、行礼的那个“敬”，是敬之小者。

下面再讲“养民”。即使是做一个大夫，帮助君主治国，那就负有养民的责任。养民要做到一个“惠”字。“惠”就是恩惠，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也不管是百姓有没有知识，他们所知所见的只是一部分，不能够见到全体。在古时候更是如此。即使是在现代，资讯非常的发达，你想知道的什么信息就能够知道。但是作为个人，如果没有国家政府集中大量的人才、专家进行分析、归纳、综合，再经过很多的幕僚研究，提出一个政策，那么他提出的政策一定是有缺失的。所以个人的学问没有办法了解全面。从这个角度讲，孔子说的是实话。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负责治理国家的人，对于百姓是真的有恩惠，还是假的有恩惠，只有他自己的良心才知道，老百姓并不能够完全了解。因此你对于老百姓真正有恩惠，就要靠自己的良心。而子产，是真正做到了“养民也惠”，帮助君主养民，做到了一个“惠”字。这是孔子所了解的。

下面一句，“其使民也义”。国家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动员老百姓办事。这个“义”字是什么意思呢？“义”就是合宜。意思就是叫百姓办事的时候，孔子讲“不违农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以农为本，特别重视“春耕，夏耘，秋收”。春天要耕种，夏天要耘草，秋天要收获，这都是在农忙的时期。在农忙的时候就不能够“使民”。到了秋收之后农民务闲的时候，国家就可以动员老百姓来办事。但是即使是在农闲的时候，替国家办事也应该是兴办水利，修桥铺路这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而不是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所以，为国家办事也就是替老百姓着想。古人办政事特别强调不随便扰民，要满足百姓安居乐业的愿望，动用百姓办事要在适当的时候，这个就叫“义”。

子产有这几种品德，就是恭、敬、惠、义。恭，是子产对自己的修养很严格很高。为什么呢？因为正己才能化人。事君，就是一个敬字，做事非常恭敬不苟且，而且不可有骄傲的容色。“敬”，不单是在形式上的敬，还要求实质上的敬。

对于老百姓，一个是养民，一个是使民。“养民”就是要加恩惠于人民，制定的政策要使百姓得到好处；“使民”就是要在适当的时候，不要使百姓过度劳苦，这些都是君子之道。这四种，前两句是自行，后两句是化他，要学儒，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必须学习。这四种都做到的话，你对中国文化所讲的“修己安人”才真正能够落实。这也就是说只有自己修持好，然后能够平治天下，办安定天下的事。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巧言”，就是言语说得很巧妙，前面我们讲过“巧言令色，鲜矣仁”。“令色”就是好的容色。“足恭”，唐朝以前认为足恭，“足”就是两足；“恭”，就是恭敬。但是后来宋儒把这个“足恭”解释为过分的恭敬。其实这三句话讲的是三件事：一口一色一足。“巧言”是口；“令色”是容；

“ 足恭”是脚。“足恭”，足就是脚 ；“恭”，就是恭敬。比如一个人见了某种权威的人，或者是与他利害关系很密切的人，或者是求职时见到主考官或机关的领导了，就会“足恭”了。什么是足恭呢？脚要往前走却又不敢往前走，非常的小心。

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李愿归盘古序》，上面有一句话 “足将进而趑趄”，“趑趄”就是想进又不敢往前进，这就叫足恭。凡是一个对你有利害关系或是一个有权威的人时，你去见他的时候就会有这么一种状况。就像以前给人当差的人，主人只要一叫“来”，便一呼百诺，鞠躬如也，口、言、表情都是如此，随说随答“是”，随往后退，那种恭敬看起来令人肉麻。所以“巧言”，言是言语；“令色”是自己的态度表情；“足恭”就代表了自己的身体。这三者表现出来的状态不能够欺骗读书人。所以下面说 “左丘明耻之”。左丘明，古人对他的考据很多。李炳南老先生认为左丘明是孔子的弟子，这有很多考据，不必疑惑。《左传》也是左丘明所作。孔子作《春秋》寓褒贬，别善恶，左丘明在一旁受到孔子很多的指点。左丘明对于巧言令色足恭的人感觉很羞耻，自己决定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不符合正当的礼。用这种额外的、特殊的礼貌来对待人，左丘明感觉很羞耻。不但左丘明耻之，孔子说：“我丘也是感觉到很羞耻。”巧言令色足恭，这种人不直。孔子是“以直报怨”，如果外表装作直，往往是大奸慝之人。

后边讲，“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就是与人有怨仇却把怨隐藏在心里。不但隐藏起来 “而友其人”，表面上还跟他做朋友，脸上装出真心要好的样子。这显然不是真心，他必定是存着希望你对他有好处的心，这也是错的。“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告诉人要学直道，要“以直报怨”。他有好处不嫉妒，他遭到灾殃愿意帮助他，即使你不愿帮助他，也不可以幸灾乐祸，如果幸灾乐祸，落井下石，都是不直。要报怨也要在他好的时候，为什么要落井下石呢？

上面那句“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比较好懂。比如说陶渊明，他看见当时官场上的那种现象，心里接受不了，宁愿自己退出

官场。当县长是有俸禄的，但是按照当时的官场，上级随便来一个人，县长就要把他当成太上皇一样恭敬。陶渊明受不了，宁愿不做，回家种田，自食其力，这是他的书生本色。像李白也写过这样的诗："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不会"巧言、令色、足恭"来对待人，这样谄媚跟谦虚、礼貌、谦让待人是不同的。为什么不同？"巧言、令色、足恭"是有求于人，并非依靠正当的途径来求于人，而是用这种谄媚巴结的方式有求于人。我们平常时候待一切人，自己要谦虚，要恭敬人家，那是没有利害关系在其中的。对待一切人都谦虚、都恭敬，这是做人应有的态度。所以这种谦虚待人和巧言令色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不要用"巧言、令色、足恭"，我们做人才保得住人格。不然人家随便拿一份好处给你，你就顺着人家意思去做。好处是得到了，但是人格却没有了。丧失人格，连普通人都感觉到羞耻，更何况是学道的君子。

"匿怨而友其人"有什么不对呢？《论语》里讲，"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根本不把冤家放在心上，在心里就把他取消掉了，这个境界是非常高的。而"匿怨而友其人"是不能和这个境界相提并论的。"匿怨"是把怨恨藏在心里，隐藏得让对方看不出来，在表面上跟对方结交朋友，让对方以为这个人对他没有恶意反过来跟他交朋友。跟他交朋友是做什么呢？是预备将来找到报复的机会的时候来报仇。这是千万不可的。

孔子教育，儒家的学术，教人"以直报怨"。像在《论语》上面有人问："以德报怨，如何？"如果有人伤害你，你反过来待人家特别好可以么？孔子说不可以。如果"以德报怨"，那么"何以报德"？意思是，如果以德报怨，那你用什么来报答别人对你的恩德呢？如果你仍然是以德报德，那就不公平了。所以他告诉大家要"以直报怨"。孔子不讲"以怨报怨"，也不赞成"以德报怨"，而是讲"以直报怨"。比如说你当了法官，这个人犯了罪，正好你来审这个案子，不能因为他是你的仇人就给他加重判刑。你作为法官，虽然这是你的仇人，但是你仍然按照通常的量刑来处理，甚至还站在犯人的角度考虑为他着想，能轻判就轻判。这个就是"以直报怨"。"匿怨而友其人"，就是以怨报怨了。不但以怨报怨，还运用了阴谋。

有些人，表面上做得很好，让人不设提防，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一下子就让对方翻不过身来。左丘明感觉这是很羞耻的事，孔子也认为这是羞耻的事情。孔子讲这一段话就是叫人不要学这个，要学一个“直”字。在世间做人要直，直心才能感动人，没有直心怎么能够感动人呢？

在《列子》上讲了一个故事，海鸥在海滩上，小孩很有童心，对这个鸟没有陷害之心，每天到沙滩上跟海鸥在一起玩，海鸥也不害怕他。一天他的父亲说，你明天抓几只鸟回来给我看看。到第二天，小孩存着这样的心想抓几只鸟带回去给父亲看看。结果他一到海滩上，所有的海鸥都飞走了。

我们从这件事去体会，真正的直心一显现，不仅是人，连动物都能感动。相反，如果你对别人有不好的心思，人能感觉出来，动物也能感觉出来。所以学道、修道更要直，学得直，修行的心才能净化。学道并不是你把“四书五经”都研究明了。如果不按照经典来修心，心不转变的话，"四书五经"背熟了也没有用。心一定要改变，所以古人说：“如读《论语》前是何等人，读了《论语》仍是何等人，《论语》就是未曾读。”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已矣乎”，算了吧，罢了吧。包咸注：“讼，犹责也，言人有过，莫能自责也。”意思是说“讼”就是责备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有了过失没有能够自己责备自己的。”孔子说：“罢了吧，我未见过有人能见自己的过失，而在内心责备自己。”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平常人很少能见到自己的过失，即使见到自己的过失也不能改进。这是因为我们内心做不到责备自己，批判自己。圣人讲这一句话是告诉求学的人要懂得反省自己。人在世间，即使如圣人孔子，也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过失。

在《论语》上，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尚且只敢求没有大过，至于小过，也不敢说没有，而我们比不上圣人，即使是连贤人也比不上，差的很远，所以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都有过失。

用《了凡四训》上一句话说就是，“过恶猬集”。我们普通人从早到晚所犯的过失，就像刺猬身上的刺那样多。但是普通且不好学的人看不清自己的过失，即使别人指出来，也会不断给自己找理由。他会反驳，我犯了什么过失，哪里对不起人？一般人都是这样，要求别人很严格，但对自己却宽松的很。那么人为什么看不到自己的过失呢？在《了凡四训》上说因为“心粗而眼翳”，它的意思是指人们心思粗疏，眼睛被蒙蔽。为什么眼睛会被蒙蔽？因为我们太喜欢看别人的过失。所以有人说，在我们的人生之路上背着两个包袱，一个包袱上写着自己的过失，另一个写着他人的过失。但是我们在走人生之路的时候，往往把写着他人过失的包袱放在了胸前，而把写着自己过失的这个包袱放在了背后，所以我们一走路，一低头，很容易看见别人的过失，但是却很少能看到自己的过失。要怎么样才能发现并改正自己的过失呢？就要把这两个包袱换一换，把写着自己过失的这一个包袱放在胸前，而把写着他人过失的这一个包袱放在背后。这样我们走路的时候，才容易看到自己的过失，所以要把看别人的眼光收回来反省自己，即所谓“内自讼”，“自我反省”。孔子和他的弟子都很重视。

《论语》中曾子就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每一天都多次的从三个方面反省自己：我与人谋事是不是尽心尽力？与朋友交往是不是诚实守信？老师传授我的东西或者我将要传授给学生的东西是不是已经温习，并在生活中实践了？曾子每天都真诚地进行自我反省，所以很容易发现过失并进行改正。

在历史上，明朝的袁了凡先生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能够反省改过的好榜样。了凡先生在年轻的时候，仕途不是很顺利，后来他遇到一位高人指点，让他反省是什么样的过失导致仕途不顺。难得的是，了凡先生一经提醒就很认真的反省了自己的过失，当他反省自己有哪些过失，导致仕途不顺利的时候，他这样说，“余福薄，又不能积功累行，以基厚福”，就是说我自己的福分很浅薄，又没有做好事积阴德，为我享受大的福分奠定基础。“兼不耐烦剧，不能容人”，加上我做事没有耐心，待人没有耐

心。“不能容人”，不能宽容别人的过失，“时或以才智盖人，直心直行，轻言妄谈”，有时候还恃才傲物，掩盖别人的才华，让别人的才华发挥不出来。说话也不经思考，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能做到谨言慎行，不知道说出这一句话，对别人产生了怎样的伤害和影响，常常轻言妄谈，还包括经常批评他人的过失，经常批评时政的得失等等。经过他的反省，把这些过失一一记录下来，一一改正过来，后来他的仕途果然越走越顺利了。

古人为什么这么重视“内自讼”呢？因为古人求学是为了学道。这和我们现在的学生学知识技能不同。《老子》上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这句话告诉我们求道的方法，就是要减损，减损自己的烦恼习气乃至于自己的念头，把这些不良的习气，念头减损到没有了，就达到了无为的境界。无为起作用，才是无所不为。如果你有为，就会有所不为，有知就会有所不知。现在的学生做学问求学，求的是知识，求的是广学多闻。但是你即使读了再多的书，你有知，就会有所不知。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无所不知？只有达到了“无知”，才能够无所不知。古人求的“无知”，是求道。所以所谓的修行，就是要修正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行为包括身体上，言语上，乃至于思想念头上的。把这些错误的言行思想都改正过来，就叫修行。这些毛病不改，学道就学不成。

学道，就是要把自己的恶习气改掉。在儒家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有成圣成贤的品质和成贤成圣的本能。但是一般的人，本性被蒙蔽了，所以本性的智慧不能够发挥。本性的智慧是被什么蒙蔽了？是被自己的习气给蒙蔽了。这就像一个水晶球，原本晶莹剔透，光芒四射。但是我们不小心把水晶球掉到了污泥里沾上了泥巴，又掉到了油里边沾上了油垢。结果经过层层的污染，把水晶球的光亮蒙蔽了，有光也发射不出来。修行的过程，也是一样，就是把这些外在的污染一层一层地剥掉，使本性的光明智慧得以显露。儒家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之初，性本善”。这里的善，不是善恶的善，有善恶，就有对立了。这个善是对人的本性的一种赞美，就是他的纯净纯善，太完美了、太圆满了，是这

个意思。

人本性本具，所以人有痛苦，其实不是别人加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找的，是我们自己有烦恼没有去除。比如说发怒，很多人都说，都是谁谁谁让我生气。其实这一句话是很不负责任的。因为从逻辑上说，没有一个人能走进你的内心。所以那个让你生气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自己。以此类推，我们所有的烦恼，不是别人加给我们的，都是我们自找的。所以“内自讼”，就是向自己的内心挑战，不必让别人来指责，时时刻刻自我反省。然而反省，要有依据。对于初学的人来说，反省的依据是《弟子规》，这是为人子弟的标准；《太上感应篇》，这是善恶的标准；《十善业道经》，这是做人最起码的标准。很多人说我是善人，我是好人，这不能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们如果打开《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就会发现很多标准自己都违背，都没有做到，根本称不上善人。那如果你每一天都能够用这一个标准来反省自己，那你在道业上会进步很快，你和人共事，相处也会越来越融洽。

古人通常采取功过格，写修学日记的方法看清自己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按照功过格去做，每一天写修学日记，把自己一天做过的、思想上的善恶之事记下来，对照反省认真改过，认认真真地去做，三个月就有很好的效果。具体有怎样的效果呢？《了凡四训》告诉我们，“或觉心神恬旷；或觉智慧顿开；或处冗沓而触念皆通。或遇怨仇而回嗔作喜；或梦吐黑物；或梦往圣先贤；提携接引；或梦飞步太虚；或梦幢幡宝盖，种种胜事，皆过消罪灭之象也。”也就是一个人认真地反省改过，做了一段时间就有效果，比如说，忽然觉得自己心神恬旷、心胸开阔；或突有法喜；或忽有智慧顿开之感；或虽身处纷繁复杂的事务之中，却知其处理之道、不至心生烦恼；还有就是遇到冤仇，遇到你以前的仇人，对你有过节的人，你不恨他了，他也不恨你了，两个人成为朋友了，等等这些，全都是改过的效验。所以，修行好的标准是什么呢？有的人说某某人修行很好，这个标准就是烦恼轻，智慧长。在一般人处理不了的问题，到你这里能处理；一般人想不开的事，到你这里能想开。如古人所说，得法喜，得轻安。修行的人大多

能得到轻安，也能够做到古人所说的“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也就是一般世人的烦恼和压力，在你身上都找不到了，至少可以做到“乐天知命”，保持“君子坦荡荡”的境界。这就是我们改过的一个效果，“内自讼”的好处。

我们现在的人，都向西方学习，注重竞争。在《论语》中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也就是中国古人从来不讲竞争。如果一定要说君子有所争的场合，就是比赛射箭的时候。古人在比赛射箭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揖让而升”，两个人先互相作揖，然后升堂去比赛射箭。“下而饮”，当射箭结果出来了，赢了的人要给输了的人敬酒，并谦让道，“承让承让”。输了的人则“反求诸己而已矣，不怨胜己者”，不埋怨、嫉妒赢者，而是回过头马上反省自己是不是在技艺上不够精湛，有不如人的地方。所以说，“其争也君子”。他们是争着去做什么呢，他们是争着去做君子。所以中国人讲的“竞争”，不是和别人竞争，而是和自己的坏毛病、坏习气来竞争。

什么是大英雄呢？我们在寺院里看到的大雄宝殿，里边供奉着的大英雄。在中国古人看来，这些大英雄并不是战胜千军万马的人，而是能够战胜自己的烦恼习气的人。这些英雄之所以分佛、菩萨、罗汉，是因为他们断烦恼的轻重程度不同。把所有的见思、尘沙、无明烦恼都断掉的人，称为佛；断得不够的人，为菩萨，为罗汉。所以大英雄都是能够断自己的烦恼，和自己的烦恼习气作斗争的人。人之所以不能够无过，不能够内自讼，清代理学家陆陇其在《松阳讲义》中给我们讲了三个原因：“一是为气质做主而不能变化；一是为物欲牵引而不能割断；一是为习俗陷溺而不能跳脱。”也就是人之所以不能够无过，不能够内自讼，就是因为有三个原因。

第一，就是“气质做主而不能够变化”。比如一个人喜欢发怒，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于用发怒的方式解决问题。习惯成自然，动不动就发火，这就是因为气质作主而不能变化。那怎么办呢？中国古人说，读书贵在变化气质。当然古人读的书，都是圣贤之书。圣贤之书告诉你如何去忍，如何

去止怒，惩忿窒欲。经常读这样的圣贤书，就会明白发怒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仅不会把问题处理好，还伤害自己的身体。这一类人只有经常反省，长时熏修，才能明白道理，慢慢把发怒的习惯改变了。

“一是为物欲牵引而不能割断”，就是贪物欲。比如说喜欢饮酒，贪吃，好色，都是为物欲牵引而不能隔断。有的人好色，并且好色之心很浓重。藕断丝连，就是为物欲牵引而不能隔断。只有明了因果，知道贪欲的害处与可怕性，才能够断除贪恋物欲的习性。

最后一个原因是“为习俗陷溺而不能跳脱”。习俗就是社会的风俗习惯。在社会大众普遍如此的环境中生活，也自然会沾染上坏毛病，比如抽烟、饮酒等等。很多人知道抽烟喝酒对身体不好，也想戒掉，但是为什么三番五次戒不掉？因为我们一出去应酬，同事朋友就会递烟劝酒。我们处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就很难戒掉。这就是因为习俗陷溺而不能跳脱。我们该如何应对呢？修学之人，既然知道自己的控制能力很差，便要远离恶缘，对于不好的环境污染诱惑要懂得去躲避。所以孔子教导颜回的时候说，“非礼勿视，非礼无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视听言动，都要符合于礼的要求。《弟子规》上也说：“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这些做法都有助于保持自己，保持自己的清净心。相反，你远离恶的缘分、人际关系，亲近那些良师益友，会有什么好处呢？古人说：“亲附善友，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你和善良的人相交往，就像在雾水中，露水中行走一样，虽然打湿不了你的衣服，但是他的德风给你以滋润，你可以时时感受到他的熏陶。这就是告诉我们要远离恶缘，亲附善友。

我们还要注意，“内自讼”虽然很好，但是也不要长留心胸之中成为悔。在《朱子语类》上记载，问程子曰：“罪己责躬不可无，然亦不当长留在心胸为悔。今有学者幸知自讼矣，心胸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曰，改之便无悔。”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深刻。问程子说“罪己责躬不可无”，你反省自己，责备自己是不可缺少的，但也不应该把这种罪己的念头保留在心里成为悔。为什么要这样？“悔”纵使是善也是不空。“不思善，不思恶”才是真空。学道之人，知道自己责备自己了，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去除留在

心胸的悔恨，不长久留在心里呢？程子回答说：“改之，便无悔。”对于我们常谈论的忏悔，只有后不再造，改过自新，才是所谓的“真忏悔”。所以我们能够改正过失，使心归于静，大可不必把罪己的心念保留在心里，更不必一想起来就痛哭流涕，这个也是一种烦恼，对修学也有障碍。所以所谓的“真忏悔”就是后不再造，这就是真忏悔了。

雍也篇

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

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

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弟子，谁是最好学的呢？”孔子对鲁哀公说：“有名叫颜回的人好学。”下边孔子解释原因：不迁怒，不贰过。接着文章出现了转折。写文章就像江河海，有波浪起伏；也像山脉，有高有低，表示曲折变化。因此孔子说，“颜渊好学，但是不幸短命而死，之后再也没有发现好学的人了。”但我们转念一想，就会发现孔门中好学的弟子很多。他的七十二个贤人，哪一个不是好学勤奋的人？孔子为什么只称许颜回好学呢？原因就是“不迁怒，不贰过”这两句话。

“不迁怒”，朱子在《论语集注》中这样解释：“迁，移也。”这句话的解释没有问题。“迁”，就是迁移。但是他再往下解释“不迁怒”时就出现问题了。他说：“怒于甲者，不移于乙。”某人正在对甲发脾气，结果乙来了，他不会把对甲的脾气迁移到乙的身上，这叫“不迁怒”。如果这样讲的话，有修养的人都能够做到。一般人的毛病是：他正在发脾气，你去之后他对你也发脾气，这是一般的人。用这样的境界来解释颜子就过于浅薄了。因为稍微有点修养的人正在发怒，这时你去找他，他也不太可能把怒气迁移到你的身上。这是一般有修养的人都能够办到的。在孔门之中不但颜回，曾子、子贡、子路他们都办得到。所以这样的解释，没有把颜回的境界表达出来。

再看《论语集解》何晏的批注，他说：“迁者，移也。”“移”有移易延

长之意。从这里迁移到那里，叫做“迁移”。孔子讲颜回“不迁怒”，怒气一发作的时候，不再延续了，延续也叫移。《说文解字》上也解释，“迁，登也”。“登”，是升高的意思。怒是一种烦恼，普通人发怒之后，他的怒气会延续升高不能制止，这就是“迁怒”。而颜回“好学”，这个“好学”是学道而言。任何烦恼都是学道的障碍。颜回动怒的时候，马上就知道怒是一种烦恼，能以忍辱的工夫来制止它，把怒气克服下去，不使怒气续发，这就叫“不迁怒”。

这样讲有什么依据呢？孔子在《周易·系辞传》上讲：“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殆”，就是“达到”。“颜氏之子”就是指颜回。“庶几”的这个“几”就是动机，动机就是念头动的时候。“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这是孔子形容颜回的境界。他一动念，如果有不善的，他马上就能辨别，不会再去行动。“有不善”，什么是不善呢？凡是烦恼，就是不善。怒就是烦恼，喜怒哀乐爱恶惧，都是烦恼。这些情绪一起来，就是不善。而颜回“未尝不知”，一知道之后，念头就不再继续。这叫“不迁怒”。这是《易经》里面讲的。《易经》把这个功夫叫“庶几”。颜回虽然能做到“庶几”，但还没有达到“知几”的功夫。有“庶几”功夫，才能够做到“不迁怒”。“知几”是圣人的境界。所以这是有经典的依据，并非胡乱杜撰的。

“不贰过”，“过”是指无心所犯的过失。像《弟子规》上讲：“有心非，名为恶。无心非，名为过。”所以“过”为此意。颜回如果犯下了某种过失，一经发觉就不再犯。这就是“有不善，未尝复行也”。做错事情要懂得忏悔。什么是忏悔？如果现在忏悔，明天又犯；明天犯了，后天忏悔，大后天又犯。那样的忏悔毫无作用。一忏之后，永不再犯，这才管用。学得“不贰过”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忏悔的功德。同样的过，后不再犯，就是“不贰过”。

《论语》在这一章中着重讲的是好学。鲁哀公问：“你的弟子谁为好学？”孔子答：“颜回不迁怒，不贰过。”哀公问的是好学，而孔子答的却是好学的结果。孔子为什么会如此回答？在古代的注解中有很多种解

说。如果就本章的经文来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不迁怒，不贰过”是由好学而来。好学是“不迁怒，不贰过”的前因；“不迁怒，不贰过”是好学的成果。好学而有结果，首先就是不发脾气。儒家讲：“惩忿窒欲”。佛家讲：“熄灭贪嗔痴”。“贪嗔痴”被称作三毒烦恼。古人说：“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如果一个人不能克制自己的脾气，修道绝对不会成功。好学完全是在修持。对于用功而言，唯有像颜子这样做到“不迁怒，不贰过”，才是真正的好学。唯有好学，才能够希圣希贤。所以这一章孔子专门讲颜回好学。

述而篇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德之不修”，要明了什么是“德”，首先得知道什么是“道”。道，就是本心，也就是真心。“寂照湛然，寂者不动。”这是说它的定力。“照者光明”是说它的智能。这两句话说明了“道”的特点：“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定智湛然，有定有慧。”《礼记·中庸篇》上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天命”是天然而有的意思。性，人人本有，在圣不增，在凡不减。故云“天命之谓性”，这是讲人的本性。“率性之谓道”的“率”就是“循着”的意思。循性不变，即曰道。就循性不变而言，道就是性，性就是道。

什么是德？《六书精蕴》讲：“直心为德”。还讲：“行道而得于心为德。”古代的“德”字，上边是一个“直”字，下边是一个“心”字。“不动谓之性，动则谓之心，此心正直，故曰德。”也就是说真心初动之时，“动”指动念头。真心起念头之时，如果初动就能够觉察，就没有失其明。这就是明德。如果你不能觉察，就会妄动，“则昧矣”，“昧”则转为凶德，所以必须修。“省察修治，使复其明”，这就是《礼记·大学》上所说的“明明德”。“德之不修”，意思是教给你“德”你却不去修治，不知从何学起。

“学之不讲”，“学”是学术，必须讲究。学术，如诗书礼乐，必须讲解讲习才能明了，所以教学尤为重要。古人说：“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现代社会五伦关系之所以紊乱，就是因为在十年文革

期间，儒家被打倒了，没有人再讲解五伦大道。于是父子之间的亲情消失了，父母被儿女去揪斗；学生不尊敬老师反而去批斗老师；夫妻也被分成不同的派别，同床异梦。儒家被打倒，没人讲五伦关系该如何处理，文革遗毒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最亲近的人都可以背叛自己，那在这世上还有谁可以信任？所以儒家讲五伦大道，深得人心。但是即使是现在，儒家也时常被批判，儒家文化不能良好的传承下来。结果出现了以下这些问题。

有一个孩子参加了《弟子规》的学习班，一段时间后大家来分享学习的体会。这个孩子上台告诉大家，他说："学习《弟子规》之后，才明白为人要孝敬父母。"我们经常说："你不知道做人要孝敬父母么？"这个孩子很无辜，反问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学过做人要孝敬父母。古人从小同父母、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从父母身上明白了要如何去孝敬父母。上学之后，古人学"四书五经"，每一篇都在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但是我们现在的孩子，从小学读到博士，没有一堂课教他如何孝敬父母。所以这个孩子的话看起来很奇怪，听起来很意外，却是一个事实。另一个孩子在分享的时候说，"没有学习《弟子规》之前，我每一天所想的就是如何去谋害父母。"我们现在打开网络，儿子杀害父母，儿媳妇不孝敬公婆，兄弟因为财产吵上法庭，夫妻为了财产同床异梦的事例数不胜数。

五伦关系紊乱的原因何在？就是因为没有人学习人伦大道。所以教学很重要，教学的老师也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和尊重。因此古人写的"儒"字，很有味道，是一个"人"字边加一个"需"字。这告诉我们，学儒是人之所需，社会所需。如果学儒的人不受尊重，老师不受尊重，道就弘传不下去。

《淮南子》上说："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孔子培养的徒弟有三千多人。他们的言语行为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这是如何成就的？这是教育所成就的。所以讲学很重要，讲学的人也应该特别受到国家的尊重。

《尸子》上有这样一个比喻，如果你家的房屋着火了，有人过来帮你把火扑灭，你一定会对他感恩戴德。但是上了年纪有经验的人，很早就提醒你把烟囱做好，把墙的缝隙涂好。如果你这样做了，终身都不会有失火之患。但是你却把它当成了耳旁风。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被关进监狱，有人能够使他免于牢狱之灾，他们全家族的人都会对他感恩戴德。但问题是你按照教导人们仁、义、慈、悌的道理的老师所说的去做，你根本就不会去犯罪，也不会被关进监狱。但遗憾的是，却没有人对这些人感恩戴德。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告诉我们那些讲解仁、义、慈、悌道理的人应该受到特别的尊重、特别的重视，这样才能兴起教化之风，树立伦理道德的风气。这说明了讲学的重要性。

下面又提到："闻义不能徙。""徙"，迁移过来。"闻悉奥义，当迁徙之，如义而行。"是指我们听到了正确的符合道义的事情，应该把自己错误的行为改正过来，按照道义来行动。听了讲解，做的对的要保持，不对的要赶快迁到义。有一种注解说："徙"作"从"。这个"从"就是"跟从"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跟着学"。

为什么我们"闻义不能徙"？是因为我们的习气太重了。习惯成自然，所以长时熏修很重要。学习传统文化并不是听一两次课，知道道理即可。重要的是按照道理去做，时时的提醒自己"如义而行"，不能够忽视熏修的力量。就像衣柜里，衣服本身没有香味，但如果你放了一些麝香长时熏修。久而久之衣服上也渐渐染上了香气。一个人修学修正自己的行为，道理也是如此。我们经常听圣贤教诲，听仁义礼智信的道理，然后去修行，慢慢的自己也就变成了谦谦君子。

"不善不能改也"，这句话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学孔子之道，不读《论语》，就不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美丑，不知道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不善就是过。昨天有过，今天改正过来，当时就成好人。这不仅是善，而且是"莫大焉"，是大善，这个善是就是改过。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告诉我们，既然我们还没有成圣成贤，那就免不了犯过失。但重要的是，学了传统文化，闻听圣贤教诲，把自己的过

失勇猛地改正过来，这才是最大的善。

“是吾忧也”，这说明孔子对教学心怀忧患。孔子教人成圣成贤，若这四条都做不到，教不出人才，这是孔子为师的忧虑。这一句话也告诉我们，孔子所担忧的事和一般人所担忧的不同。一般人所担忧的离不开四个字：财、色、名、利，而不注重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灵性修养。

蔼益大师的《论语点睛》上有这样一句话：“真实可忧，世人都不知忧，所以毫无真乐；惟圣人念念忧，方能时时乐。”真实值得可忧虑的事，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见义、见善却不能改，是令人真正忧虑的事。但是世人所忧并不在此，因此就没有真乐可言。求，就有求不得的痛苦，求不得的烦恼，哪有乐可言？颜回之所以能做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因为他真正学到了圣人的品质。他知道真正可忧虑的是什么，不为财色名利所动摇，所以没有求不得的烦恼。

圣人念念忧虑以上这四个方面，在这些方面十分注意，所以才能获得真乐。真乐就是内心的喜悦源源不断地涌出来，不靠外在的刺激获得。学道和修学的人，如果能够体验到发自内心的，如泉水涌出般的喜悦，那么就不会受世间五欲六尘的诱惑。可惜的是一般人很难得到这种乐，所以只能追求外界刺激所带来的快乐。

子之所慎：斋、战、疾。

“慎”就是谨慎。“斋”就是斋戒。

《礼记·祭统》说：“及时将祭，君子乃斋。”在祭祀之前，君子需要斋戒。为什么呢？文中小注说：“慎斋，尊祖考。”就是提醒我们一定要尊重过世的祖先。过去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祠堂供奉祖先的牌位。每到春秋祭祀的时候家族就把全家族人召集在一起，宣讲祖先的德行。祠堂具有教育的功能。若一个人对祖先都念念不忘，定时祭祀，对于眼前的父母也一定会照顾得十分妥帖。所以祭祀也是一个机会教育的场合。因

此孔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谨慎地办理丧事追奠亡故的先人，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深厚的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意识，所以祭祀不能够不谨慎。自古以来，祭祀的对象除了祖先还有神明，神明即在世时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人。

在《礼记·祭法》告诉我们制定祭祀的原则："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这句话告诉我们，古代圣王制定祭祀的原则是这样的：曾将各种有益的方法传授给民众的人应该祭祀；操劳国事殉职的人应该祭祀；有安邦定国勋劳的人应当祭祀；能抗御大灾大害的人应当祭祀；能保卫民众，抵御重大外患的人应该祭祀。后边还说，"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至于日月星辰，是人们所仰仗的；山林、川谷、丘陵是人民用度的来源，不属于这一类的，不在祭祀之列。这段话的主要大意是祭祀的对象都是有功于社会百姓的人。同时，定时祭祀也可以表达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诚意，所以祭祀的时候必须有诚敬之心。为了表示对祖先神明的诚敬之心，人们在祭祀之前必须要斋戒。《乡党篇》说："齐必变食。"斋戒时，我们不仅不能吃肉，而且也不能吃美味的食物。因为在斋时是为了敬神，不能让自己的心贪恋美味，所以戒斋必须谨慎。因此，孔子说："我祭则得福。"

"战"在《说文解字》上解释："战，斗也。王道不侵人，但御人之入侵，故不免于战。"由此可得，"战"是为了保护国家而不是侵略国家。小注说："慎战，重民命。"因为一旦作战动武就免不了刀枪相见，残害民命。所以古人即使作战也讲道义。《礼记》上说："敌人打败逃走时，就近而射三箭，过了之后就不再射。"敌我都是人，射三箭已经尽了自己对国家的义务，三箭不中就不必追击。所以即使是作为兵书的《孙子兵法》开篇也讲："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也就是说"百战百胜"并非是用兵策略中最好的，不交战而使敌兵屈服才是用兵策略中最好的。所以善于作战的主将，不动刀兵就能战胜敌人。例如

齐桓公讨伐楚国，不战而为盟主。

从文字上看“武”，止戈为“武”。《春秋左氏传》上说武有七德，即“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意思是说所谓的“武”，是用来禁止暴乱，止息战争，保持太平，建立功业，安定百姓，和睦万邦，丰富资财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于战争非常慎重。慎战不仅表明古人重视民众的生命，同时又能秉持武的七德，必然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所以孔子说：“我战则克”，意思是只要他作战就一定能打胜仗。

“疾”，是疾病的意思。我们最惧的是误于庸医，乱投药石。《曲礼》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郑玄的注解：“三世，自祖至孙。”“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意思是作为医生的，如果没有三代传承，不可轻易服他所开具的方药。所以生病吃药，必须谨慎，尽量少吃药。古代善于医治的大夫“一药而愈”，“愈”是治愈的“愈”。而现今的医生是“一药而狱”，“狱”为地狱的“狱”。所以不宜乱投医，随便吃药。从这里我们体会到圣人的存心都是爱人，利人之心；凡是害人，伤人之心都与圣人之心背道而驰。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在一般的通行本上，这句话讲的是“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这个《群书治要》里面是讲“我三人行 ，必得我师焉，”我三人，就是三个人包括本人我在内，除了本人我之外，另外还有二人；行，有的注解，解释为言行的行，有的解释为行走的行。“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普通的说法，除我之外还有二个人，一个是善人 ，一个是不善的人，这两个人都是我的老师。从善人身上我们学他的善，从恶人身上我们避免他的恶，所以无论是善人和恶人，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老师。这种讲法也很有味道，也就是说我们从早到晚，会遇到很多的人，有的人是善人，有的人

是恶人。我们如果是善学的话，无论是善人恶人，都是我们可以提升的地方，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老师。所以在我们的前边也学到“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则内自省也”。看到贤德的人就向他学习，向他看齐，看到不够贤德的人，不是轻视它瞧不起他嘲笑他，而是反过来反省自己，看我自己是不是有类似的过失。

我们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去参访很多善知识，其中有的人，是贪嗔痴非常严重的人，比如说贪心很重的，还有嗔恚心很重的，这些人都是他的老师，他向他们学习，是为了避免他们的恶，不受他们的污染，这个才是善学。所以一个善学的人，每天从早到晚遇到的一切人、事、物都是他可以提升的地方。

第二种说法就是《论语集解》何晏注：“然我三人行，本无贤愚，择善从之，不善改之，故无常师。”说我们三个人，本来没有贤愚之分，为什么没有贤愚之分呢，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纯净纯善的，所以没有贤愚之分，这个贤愚是从后天的习性来讲的，因为后天的环境不同，熏染不同，所以有的人，看起来贤德，有的人显得愚钝，这个都是后天所受的熏染不同所导致的。

“择善从之，不善改之，故无常师”。刘宝楠先生在《论语正义》上对这一句话做了这样的一句解释，他说：“何注，似以‘行’为‘言行’之行，三人之言行本无贤愚，其有善不善者则随事可见，则善而从之、改之，非为一人善而一人不善也。”这一句解释，就更加的圆融。他把这个行，好像解释为言行之行，他认为何晏的注解，好像把这个“行”，不是解释为行走的行，而是解释为言行的行，也就是说三人的言行没有贤愚之分。所谓的善和不善，都是随事所见，有的时候他做善，有的时候他也作恶，这是就一个人的善与不善而言。所以实际没有绝对的善人和恶人，所以每一个人都可能有善行，有的时候也有恶念，所以他这个说法就更好了，就是论事不论人。我们看到他善的行为就学习他，向他效仿，不善的行为，就反省自己，避免这样恶的行为。这就不是一个人善、一个人恶来讲了，而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有善和不善的行为，我们都可以从每一个

人身上学他的善，而避免他的恶，所以没有固定的老师。这个讲法是最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人不会是全好，也不会全不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有善行就学他的善，赞叹他的善，人有恶行，就要反省自己，避免他的恶。最后一种讲法，是说在两个人之中，对于善者我们随着他学，对于不善的人，我们要去改正人，这种说法不可采取。为什么呢？ 因为朋友够得上交情，才能去改正，交浅不可以言深。

像《论语》上就说：“信而后谏，不信则以为谤己也。”朋友之间要建立了信任的关系，然后再看到他的过失才劝告他，如果两个人的信任关系还没有建立，你就去劝谏他，他还认为你是诽谤，他不能够接受，还和他结下了怨仇。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改正人的说法不可取。而且中国人修学，做学问重要的是强调“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真正的修行人，他不是看不到世间的过失，不明白世间的过失，而是即使看到了也不把这些放在心上，污染了自己的清净心。所以真正的修学人是把功力、心思放在改正自己的过失上。所以看到别人过失会怎么样呢？马上反省自己我是不是有类似的过失，因为别人的过失是自己过失的一面镜子，特别是我们现在人，都看不到自己的过失，为什么看不到自己的过失呢？就是因为，眼睛盯到了别人的过失，口里讲的是别人的过失，哪里还有时间精力反省自己呢？我们人生的精力时间就是那么多，所以总是去看别人的过失，讲别人的过失，就没有时间去反省自己了。所以凡圣区分就在于，会不会学，善不善于学。所以有人说，在我们的人生中，背着两个包袱，一个包袱上写着他人的过失，另一个包袱上写着自己的过失，但是我们在走自己的人生之路的时候，往往把写着他人的过失，这个包袱放在了胸前，而把写着自己的过失，这个包袱放在了背后，所以怎么看，都看不到自己的过失，可是一低头，就很容易的看到了他人的过失。正确的做法是把这两个包袱交换一下，这样才能更多的看到自己的过失，而不去观察别人的过失。

蕅益大师在《论语点睛》上对这一句话做了一句点睛的解释：“师心之人哪知此意。”什么是师心之人？就是以自心为师的人，自以为是的人，

处处都觉得自己对的人，这种人是最难教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他可能懒惰，他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些都不是最难教的，最难教的一种人是哪种人呢？就是满益大师这里所说的，师心之人，就是自以为是，以自心为师的人，这样的人就很难教导。在《尚书》上也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为什么骄满给自己招来损失呢？就是骄满的人他认为自己都是对的，自己做的比别人强，比别人聪明智慧，他就不会再有好学的心。就像这个桌子上有一杯水，但是这杯水已经是满的了，你再想往里面倒东西是倒不进去的，他就会溢出来了，骄满的人在修学上很难成就，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以自心为师的人哪里知道这一章、这一句话所说的意境呢？不知道从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这一句话也很有味道。"仁远乎哉"，"仁"不在远，你想着学仁，仁就来了，就这么近，也就这么快。《论语集释》："发明焦竑，焦氏《笔乘》云，此孔氏顿门也。欲即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即是智，非欲外更有智；当体而空，处世成觉，非顿门而合。"在明朝有一位文学家，也是大学问家，叫焦竑，他写了一份笔记叫《焦氏笔乘》，在这里对这一句话做了一个注解，说这一句话讲的是"孔氏顿门"，说明这个焦竑也是一个对佛教很通达的人，因为佛法讲顿渐，他认为在儒家之中也讲顿渐。这一句话讲的就是儒家的顿门，学道有顿修 、有渐修，聪明顿悟的人一下子就学到，渐悟就是一步步的修。像《中庸》上所说的，"人一能知己百知，人十能知己千知"，这就是讲的渐。而一下子就学会，这叫顿。像颜回听了孔子的话，不违如愚，孔子说过的话，颜回都能够通达，都能够体悟，一句话都不违背，像一个很愚笨的人。大家看他也不说话 ，也不发表议论，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明白孔子的意思，他是不违如愚。对孔子的每一句话都不违背，像一个很愚钝的人，那样去例行。但是"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下来之后，他往往能够通达孔子的这个教诲，并且都是落实在生活

之中，说明什么，说明颜回根本就不是愚钝的人，为什么他没有提问呢？因为他对孔子所讲的话，一讲就明白，一讲就通达，没有必要再提问多余的问题了。所以子贡是闻一知二，而颜回是闻一知十，可见一般人都是渐修。而“顿”是指悟道而言，“渐”是指修道而言，顿悟之后必须渐修，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悟后起修”。顿悟如眼，这个眼睛一张开了，就能看到远处；渐修如足，要一步一步的走到。所以要先悟，“悟”之后才不会走错路。

“欲即是仁，欲即是智”，“欲”就是来了，你欲仁，这个仁就来了，你懂得了这个道理，当体就是空，这个就是处世成觉，这个欲就是欲望的欲，人人都懂，但是你学这个“欲”学到可以成功。

欲字，古时写成一个“谷”字跟一个“欠字”。《说文解字》说：“贪也，从欠谷生。”看到这个字，就是山谷缺欠，缺欠什么呢？所缺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填不平。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欲壑难填”。有饭吃又嫌衣服不好，甚至还想当官，当了官之后还想当大官。每一天都为这些事来寻思。必须是有道的君子才知道这个欲，要适可而止，不能够贪而无厌。所以这个“欲”，是贪欲，是贪的源头，这个字坏透了。后来这个“欲”也写作这个欲望的欲下面加一个心字，贪欲由何而生？是由心发生，所以在《集韵》上说：“欲，情所好也。”有情才有所贪、才有所好。这个情就是我们所说的喜怒哀乐爱恶惧等等的七情，而这个爱是七情的根本。爱就是乐，爱就是喜，爱到手便快乐，有人来分就恐惧，失去了就哀，若夺去你所得的，便发怒，不爱就是厌恶，所以这个爱是七情的根本。而《大学》上说心里有这些，就不得其正了。

《大学》上说：“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如果你心里头有发怒的、愤愤不平的念头，你这个心就不正了；有所恐惧的事情，产生了恐惧的心，这个心也就不得其正了；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有厌恶的，这个心也就不得其正了；有担忧的事情，这个心也就不得其正了。像我们经常所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呢？因为他太喜欢这个人了，看他做什么都好，甚至把那个坏的都看成好的了，丑的也变成美的了。说

明什么呢？说明你的心有好乐、有喜欢、有厌恶、就失去了忠贞，看事就看的不是很分明了。

所以《大学》上就说了，人对自己亲爱的人往往会产生偏爱；对自己所厌恶的人往往会产生偏恶；对自己所敬畏的人往往会产生偏敬；对自己所同情的人往往会产生偏护；对自己对轻视的人往往会产生偏轻，因此你喜欢一个人而知道他的缺点，讨厌一个人而了解他的长处，这是天下所少有的。所以说“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为什么一般的人都看不到自己儿子的过恶呢？因为太喜爱自己的儿子了，每一天和他相处在一起，他有一些其他人显而易见的毛病，这个父母也看不见了。这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人都是带着一个有色眼镜来看人的，只要你的心，没有达到中正的程度，有这些好乐、恐惧、忧患，那就等于是戴上了各种各样的有色眼镜，你再看别人的时候，就失去了公正，看的偏了。比如说你戴了一个黄色的镜片，你看的每一个景色都是黄色的；你看你戴了一个绿色的墨镜，你看谁都是绿色的。所以在这个世间为什么做善事这么难呢，就是因为做善事的人他无私无求的去付出了，但是别人看起来，他都是有利可图、别有用心，所以往往以自己去怀疑去揣度，不相信有人能这样无私无求的为社会大众做贡献、做好事，这就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所以现在社会有信任危机，对人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这个信任危机的根源何在？你看中国人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一句话就把怀疑不信任的根源找出来了。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我们不相信自己能做出这种高尚的、无私无求的行为。所以你看别人做了，也会充满怀疑。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心有这些喜怒哀乐爱恶惧，就不得其正了。佛教也讲十二因缘，一下生开头就是爱、种恶因，后来因为爱就有了取、有，因此就有了因果报应，有了生老病死，永久不断。

《唯识论》上对这个“欲”字解释的很好。《唯识论》上说，“欲”希望为性，还没有来的，想着它，想到了又嫌少，永远都嫌少，欲壑难填，无有止境；贪，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这就是它的本性。所以讲“欲”是希望是为性，那欲有什么作用呢？下面讲“情依为业”，“依”，就是依靠，情离

不开欲望。特别是我们人在欲界，所爱好的是色声香味触法等等，并没有来找你而是你主动去找它，找到它就依靠它而离不开，如果你当时就离开了，就可以解脱，所以修行最要在“离”这一个字。

五欲就是我们所说的“财、色、名、食、睡”都污染真性，上等人不味著，就是不贪味，而一般的人都贪味，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离不开五欲。而财色名食睡五欲，污染真如本性，变成了五欲六尘。然而这个欲就像刀子一样，就像利器一样，它用在何处取决于使用它的人，所以后面讲“欲极，我欲仁，斯仁至矣，”欲就像这个刀子，你会用就有好处，不会用就会拿来杀人。所以会用的人拿刀子来切菜，来利益人，来砍柴，但是不会用的人却拿着这个刀子去杀人了。那这个欲也就如同刀子一样。“欲仁则仁至，欲色则色至，色至则无道，仁至则有道”。所以我们欲仁是可以的，就看我们欲的是什么，而欲仁的人，就是有仁爱心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凡事都不妨害人，做什么事情都能够为对方着想，一举一动都不妨害人，这个欲就变成了仁。

《华严经》上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是你的本性，佛也是如这个本性，也是这个心，众生也是这个心，但是众生的心，却染浊五欲六尘，这个灵性就堕落了，所以欲学圣人必须去净情欲、贪欲，所欲的事情可以选择，完全由自己做，主不必由乎人，观察自己平时所欲的是什么，情依的是什么，就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你愿为众生就欲众生的事，愿成圣人就成圣人，全在欲上。所以我们观察一个人，平时欲的是什么，我们就知道，他以后会走到哪里。现在的一般人不仅不是欲望做人的事，做人还要讲仁义理智信，这个五常不失，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人。现在很多社会大众，不仅不是欲望人的事，而是欲望的都是畜生的事。为什么呢？被自己的欲望所牵引，贪财、贪色、争名、夺利，而无有止尽，结果怎么样了呢？欲望众生的事、畜生的事，就会成为畜生，这个灵性就堕落了。所以这个堕落不是形容，是真正的堕落。所以我们想知道，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就看我们平时所欲的是什么，这个不用问别人，自己最清楚。

泰伯篇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恭敬而不懂礼，就会劳苦而又贻笑大方，而且被人所讨厌。比如说聚餐的时候，不劝酒不行，但是劝的太频繁也不行；又如对长辈行礼，长辈说一礼，就必须一礼而止，而你非得要拜三拜，这个就是有违长辈的命令，行礼反致失礼，就是劳而无功。所以真正的尊敬就是遵从长者的命令，即“恭而无礼则劳”。

“慎而无礼则葸”，这个“葸”就是畏惧不前的意思。小心谨慎，但是若不懂礼，便会畏惧。就像韩愈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所写的“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脚想往前走，但是好像又不敢往前走，口想说话欲言又止，这个就是葸的意思，畏之不前，特别是我们想去拜访一个很重要的人，比如说是你的领导，你很尊敬的人，到了门口想进门又不敢进，想说话又不敢说，这个就是葸的意思。

“勇而无礼则乱”，这个勇敢也要有一定的限度，勇敢而无礼，凡事做得太过分，过犹不及也会扰乱社会上下左右的秩序。

“直而无礼则绞”，马融注：“绞，刺也。”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上说：“绞者两绳相交之名，故引申为乖刺之义。”郑注云：“‘绞’，急也。与马义不异。”就是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上，把郑玄的注解，和马融的注解中和在了一起，认为他们两个的意思相似，这个直，直率，不装模作样，有什么做什么不虚伪，很好，但是直率而无礼，就像绞绳一样，越绞越紧

终必绞断。不知礼数自己直爽待人，往往责人急切，令人不堪忍受，所以这个办事太缓不对，太急也不对，犹如两条绳子绞在一起，比如说有人口渴了，想饮用我桌上的酒，这种行为固然没有虚伪，但是却是失礼的。所以恭敬、谨慎、勇敢、直率都是很好的行为，但是若是违背礼节那就有弊端，这是孔子说明礼的最要性。虽然做好事也要以礼来节制，才没有流弊。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在古代的注解上通常把这四句和前四句都合为一章，但是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在宋代的吴棫，在《论语续解》中就认为，这一段是曾子之言，应当独立为一章。后来也有不少的注者，比如说陈天祥的《四书辨疑》，认为君子笃于亲这四句话，无论是文式还是事理，都与前面的四句不相连贯不属于一类。吴棫的说法很恰当，因为他认为应该独立为一章，但是他认为是曾子的话却不可从。《群书治要》仍然是把他和上一句并列为一章。

“君子笃于亲”，这里面的“君子”专是指居在上位的人，“笃”是厚；“亲”是亲属，主要是指父母兄弟。在位的君子以身作则，便能感化国民，所以君子厚待他的父母兄弟，这个国民就会兴起为仁。

《论语》在古代是自天子至庶人都要学习的，所以举例先从高位来说，为什么呢，这是上行下效，做样子给世人看，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怎么能够学好呢？孔子为什么特别赞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呢？他们为什么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就是他们认为，“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如果是自己领导不好，自己有罪，不要怪罪万方，与大家没有关系都是能够“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所以这里面讲在位的君子对自己的父母兄弟非常的厚待，整个国家社会的风俗自然也会兴起醇厚之风。

孔子的道是以仁为核心，而仁爱的根本就是孝悌，所以君子笃于亲，这个民众就会行仁。在上的人要想让百姓学仁，就是都有仁慈博爱的心，就要从自己身上做起，对自己的父母仁。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如果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在家孝敬父母，把他孝敬父母的照片广为传

播，在电视网络广播电台都给大家放出来，大家看了之后自然会起而效仿，百姓也就会做仁德的事。所以在上位的人要以身作则，先在自己身上做，不必劝人。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深，很多人对传统文化已经丧失了信心，他并不认为经典上的境界是实实在在可以达到的，只是讲传统文化，并不能让人真正生起信心。所以必须自己能够切实的做到，能够力行传统文化的人，才是圣贤再来，才对这个世间真正的有帮助，才能够让人从你身上看到信心，这叫“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满足于当“国师”，还要进一步向“国宝”迈进。什么是“国师”呢？古人说你能讲不能行，你讲的都是圣贤的道理，确实没有讲错，这个叫做“国之师也”。但是在这个时代国师都已经不可挽救传统文化了，你只是把传统文化讲出来，但是做不到，并不能让人树立起信心。所以这个时代想树立传统文化的信心必须有“国宝”出现，这个“国宝”是什么呢？能说又能行，这个才是重要的。

“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故旧”就是老朋友，“偷 ”，就是刻薄。君子不遗弃他的老朋友，则国民风俗就不会淡薄，若要人都能厚道，就应该“故旧不遗”，也就是对你的亲戚朋友不能忘。比如说在《礼记·檀弓》上记载原壤原来是孔子的老朋友，他是学另一派的人。原壤的母亲死了，孔子就送了他一具棺椁，结果原壤却跳到椁上唱歌赞叹。丧母唱歌，这是严重的违礼的行为，孔子的弟子就劝孔子，同他绝交不要再和他做朋友了。但是孔子说：“亲者不失为亲，故者不失其为故。”这两句话第一句是说原壤和他母亲的关系，原壤虽然讲的是世间法以外的学问，但却不是大逆不道，他仍然对他的母亲有孝心，只是他表达的方式不同，他如此唱歌是表示他对他母亲的死有另外的用意，并没有断除对父母的孝心。

第二句“故者不失其为故”，就是说孔子与原壤的关系，他既然没有断除孝心，所以我也不能割断与他的故旧友谊，仍与原壤全交，老朋友依旧是老朋友。学者，特别是学圣贤之道的人，必须学圣人那样不遗故旧，才能够让社会风气变得醇厚，特别是当领袖的能够对故旧不忘，百姓就渐渐的厚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子以为做士人不可以不弘毅，因为士人责任重大，而且所行之道遥远。如何重大呢？他以行仁为自己的重任，如何遥远呢？这种大责任要一直负下去到死为止。那我们先看这个"士"，不是普通的人民，在古时候，把人分为四类，就是士、农 、工、商。农、工、商都是生产者和盈利者，而这个"士"则不生产、不盈利，那他干什么呢？他是尽全力来学道。"士"专求学、专讲道，讲做人的道理，而这个人道要讲好，你必须得懂天道。

古人讲："天道敏时，地道敏树，人道敏政。"但是天道一般的人都很难体悟，所以从哪里学起呢？士专门要学"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当然这一句话士农工商都要学，但是士必须通达，其余的农工商不需要通达，但是也都需要学。就像子由到武城去做地方官，孔子听到弦歌之声，就说："割鸡焉用牛刀。"子由回答说："从前我听说夫子说过这样的话，'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无道的人不能够下命令，又不能听命令。只有君子学了道，在位的人学了道，他有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被领导的百姓学了道，他也会听命于在位的君子，而不学道的人他既不能够下命令，也不能够听命令。所以这个士，就是全神贯注的、专一的学道、悟道、体道、讲道、行道，纯粹分利不生利，商人纯生利，他们各有专责。

这个"道"有体有用，这个用就是行仁。"士"也有通达的时候，也有困穷的时候，通达的时候古人说"进则兼善天下"，就是需要用仁来治国平天下；困穷的时候"退则独善其身"，也要把自身修养好，尽力的宣扬仁道。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要按照这个仁道去做，这本身就是在影响别人，本身就是在弘扬仁道。宣扬仁道是一日不死一日不休，所以必须"弘毅"。这个"弘"，是广大，也就是说他的见识学问一切都要广大。像我们

读书必须要能够举一反三，为什么呢？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你把《诗经》三百篇背诵的都滚瓜烂熟，但是让你去办理政事，你不够通达，不知道如何处理，不能够学以致用，你背的多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这个"弘"就是需要广大，学问需要广大见识也需要广大。

现在有很多的硕士博士，对国家的政策没有见识，这个就不能是"士"。古人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毅"，弘毅的这个毅字，根据包咸的注解，是强而能决断。"强"不是暴的意思，而是如《易经》上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应该效法天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比如说每一天太阳从东方升起，然后又从西方落下，寒来暑往，每一天没有休息。所以一个人要进步修学，也要像天那样没有休息的时候，这个才叫强。这个"毅"，是强而能决断，所以他还有决断的意思。而这个决断必须要有智慧，所以这个"毅"就是有智慧决断。

"任重而道远"，如何才算弘毅呢？前面那句是讲的纲，以下讲的是条目。"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这个身上的责任很重大，担任什么大责任呢？"任重"就人的位置来说，我们今天的地球很乱，能平天下便是你的责任，小能治国，再小能齐家、能修身，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

很多人志向很远大，要想成就大事从哪里做起呢？在《大学》上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要担当大任必须从修身开始做起，自己能够做到自强不息，做到厚德载物，然后你才谈得上去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修身是担当大任的基础。"道远"就是担当起大道来不可须臾离，到临死还是如此。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把仁加在自己的身上，这个"仁"是一时都不能去除的，须臾不可离开的。"不亦重乎"，这才是任重。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至死而后停止，就像曾子一生力行孝道，临终的时候还把弟子叫过来，打开他的被子看一看他的手足，看一看他的身体都保持完好，才说自此以后，我可以免去担忧没有尽到孝道了。因为什么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到临死的时候才说，

“而今而后，吾知免乎”。又如曾子在生死的关头仍然不忘更换床席，叫“曾子易箦”。《礼记·檀弓》上记载着孔子得意的门生曾子，有一次鲁国的大夫季孙子，为了表达对曾子的敬意，特意送了一个大夫专门用的竹席给曾子，后来曾子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他的学生乐正子春前去探望老师时，听见他的侍童指着曾子的睡席好奇地问：“这是大夫用的席子吧，多么光泽华美呀。”子春赶紧示意，让侍童不要再说了，怕他的老师听到。曾子听完后非常的吃惊，就说这是季孙子赐予我的，我现在坐不起来，无力换去这张席子，于是他就让他的儿子把这张席子去换下去，但是他的儿子却说：“您病情这样重，身子又不便移动，还是等天亮之后再换吧。”结果曾子对儿子说：“你爱我还不如侍童。”为什么呢？下面这一句话说的很有味道。他说：“君子爱人是用德，小人爱人只顾眼前的舒服，我还要这块席子干什么？我能守礼而终也就足够了。”听了他的话，他的儿子只好扶起他的父亲换去床席，可是没有等身子躺稳，曾子就去世了。

所以“死而后已”曾子做到了，所以他说这一句话也能够感动后人，流传千古。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贤人的言论，都是出自于他们力行的功夫。曾子自己就是任重而道远，所以他才能讲出这样的话。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这一章虽然只有三句话，但是对他的议论注疏却有很多。比如说“才”与“美”应该如何理解，“骄”和“吝”要如何讲，这两句是什么关系等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如有”，就是假如有一个人，周公就是孔子特别敬仰的圣人，他制礼作乐。“才”是才艺，“美”是办事完美。“才”与“美”是两回事，这是雪公的《论语讲要》上特意提醒我们的。其他的注解都不是这样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像周公那样的才艺与办事完美，假使他因此又骄傲又吝啬，其余的虽有小善，也就不值得一观了。

“使骄且吝”就是假若他骄傲而且吝，“吝”就是一毛不拔，这个“骄”和“吝”也是两回事，像晋代的石崇与王恺竞争比富，他骄傲过分但是并不吝啬，这就不属于吝而不骄。又如王戎他属于“竹林七贤”之一，家里有好的李树，但是害怕别人得了李子的核种，结果就把李子核钻洞，然后再卖出去，但是他见人也都说好话；还有一位和桥，他有钱癖，一毛不拔，但是他见人也是恭敬赞叹，所以普通人大概都是骄而不吝或者是吝而不骄。这一章则说“骄且吝，兼而有之，兼而有之其余不足观也已”，“其余”指的是什么呢？程子的注解说：“周公之德”，这个注解是有错误的，因为这一章是指之才之美，不是说德，周公的德行非常高，孔子不拿德来做比喻，因为有周公之德的人，就不会骄而且吝，有了这个骄就损了美，办事就不完美了。孔子的学问，是教人学道德仁义，道德为首，这一章并没有说周公之德 。骄吝而有才就会成为坏才，像曹操、王莽都是坏才，因为有骄那美就不完美了，何况且吝。“骄”且“吝”的人，不能进德修业，虽有小善，不足观也已，也抵不住大恶。

蔼益大师的《论语点睛》上对这一句话进行了一个点睛的注解，他说：“无周公之才美而骄吝者，岂不愧死。”如果没有像周公这样的才艺和办事完美的人，反而还骄傲还吝啬，那还不是让人惭愧死，惭愧得无地自容，这个也是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要克服骄慢之心，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艺，办事完美的人，假使又骄傲又吝啬，其余的小善都不足观也已，更何况没有那样的才艺，没有那样的学识和办事完美的人。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这句话的意思，简单说就是不在这个地位就不要管这个地位上的事情，免得侵犯他人的职权，比如说公安局不能管法院的事，反过来也是如此。虽然公安局法院都管老百姓犯法的事，但是性质不一样，这是大的例子。小的例子比如说在一个机关办事，一个人办财政，一个人办司法，如果办财政到办司法的办公处，两眼不可以看他的公事，以免日后公务

外泄招致嫌疑。假使他人来请教，只能在理论上提出意见供他参考，不能说详实的办法。比如说鲁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孔子只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他只是给哀公讲了为政的原则，并没有在政治事务上给他出主意。俗话说"亲戚远来香，邻居高搭墙。"他人的事不来找我们，不可多管闲事。例如：别人家吵架，你不要找上去，所以邻里乡党来找只为他说原则，因为办好了没有功德，办坏了却是你的事，这就是人情世故。

《论语集解》孔安国注，"欲各专一于其职"，程子的注引发议论的地方就与经文不相和，集注上说"若君大夫问而告者，则有矣"。这不是注解的惯例，因为这一章没有说君、也没有说大夫，这是解经而不是发挥讲义了。张南轩说："若有从无谋者，则亦有时而可以告知已。"这也与经文不相和。《易经》上说"君子思不出其位"，何况是谋政呢？这个就说明宋儒既是注经又是改经，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我们学习这一章主要是学习，不要枉加替人出主意，人家来问只说原则，答应人的事就要为人办好。如果是注疏，不要妄加翻译经，改变经，要知道注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可轻率行事。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朱子在《四书集注》中把这两句话解释成了一句，而李炳南老居士在《论语讲要》中说这是两句话，不能作一句讲，如果作一句，便很难讲通。求学如不及，像刚开始求学，好像学不到一样；想追赶上人好像赶不上，不能成功。"不及"就是赶不上，赶不上如何能说是失呢？所以应该在"学如不及"处断句。"学如不及"是说一个人刚开始求学，还没有学得好像追人而有追不及的感觉，这是努力求取学业进步的意思。那我们现在学《论语》，也是学做君子，学做圣贤，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要有这种追圣贤而追不及的紧迫感。很多人就问了，说我们为什么要做圣贤呢？这个圣贤，就是对道有深刻的理解和洞察的人。所以在《论语》上说"志于

道”，“志”就是心之所之的意思，也就是他的心时时向往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道！所以古人说“读书志在圣贤”。

圣人是得道之人，他的言行举止都不违背道，能够顺道而为，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吉祥如意。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目的就是为了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趋吉避凶”。所以古人说：得道之人就是圣人。孟子也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就是天道自然的规律，你顺着这个自然的规律去做，才能够昌盛发达，如果违逆了规律，那就必然会灭亡。所以不学圣贤实际上就是在糊里糊涂地生活。

在《国语》中，孔子讲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行善就好比爬山一样，在爬的过程中要一步一步地登上去，非常的艰难。那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人在爬山的时候，要克服地心的引力，要加一把劲。对于我们修学人而言，地心的引力就是指我们的坏毛病坏习气。比如说有一个人想在修学上有成就，学圣人学贤人，但是克服不了自己的懒惰，不够精进，还克服不了自己的享乐，整天喜欢轻松自在的生活，这些都不能够让自己很精进。还有的人喜欢放纵的生活、安逸的生活，这些也都是求道的障碍。当然，诸如傲慢等等，那更是学道中的障碍了。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要努力，才能够登上去，克服自己的习性。但是，“从恶如崩”，就好像一个人在爬山的过程中一脚没有踏好，突然踏空了，踏空了会怎么样呢？那就是会掉进山崖，甚至摔得粉身碎骨。当然这样的悲惨结果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应该怎么办呢？一个人在往下坠的时候，绝对不会是任凭身体坠落下去，会怎么样呢？人求生的本能让他会使劲地想双手抓住一些树叶树枝，然后挡住自己的身体，不再继续坠落。

那么，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一个人的念头不对，就像一步踏空一样，在踏空的过程中，要堕落的过程中，也要想到不怕念起，就怕觉迟。不怕我们恶的念头、坏的念头提起来，生起来，就怕一个人觉悟太迟缓，要赶紧提起正念，找出圣贤经典，读上一遍。比如说，我们要生气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弟子规》上说，“言语忍，忿自泯”；“将加人，先问己”；“怡吾色，柔吾声”；“同是人，皆须爱”。所以好几个树枝都抓住了，就不

会再继续掉了。而当一个人修学懈怠的时候，沉溺于电视网路的时候，也就要想起《弟子规》上的“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还有“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所以，面对这些习气、坏毛病，马上能够对照经典，提起正念，这就是修学人要有自知之明，懂得能够提起观照。

古人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不是在往前走，其实就是在走下坡路。当一个人嫉妒心生起来的时候，马上想到《弟子规》上说“见人善，即思齐”；想到《太上感应篇》说“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论语》上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人做得好，做得很成功，不要去嫉妒、去障碍，心里不舒服，而是马上想到向他学习，向他看齐，甚至还帮助人家，把他的成就弘扬出来。别人做善事，就如同是自己做善事一样，非常欢喜地去成就。

下一句，“犹恐失之”，就是讲已经学有所得了，就像得了一物害怕遗失，所以说“犹恐失之”。在勤学有所获得以后，必须要温习，学东西不温习的话，很容易忘掉。古人说“十年秀才如白丁”，十年不温习，这个书就像没有念过一般。像我对这一点也很有感触，大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喜欢记笔记，老师讲得每一句话都把它认真地记下来，笔记做了一本一本的。但是我们现在打开这些笔记一看，感觉到非常的陌生，就好像没有学过一样，甚至有的时候都怀疑，是不是自己记的。这说明在学新的东西的时候，恐怕来不及，追不上，特别是学圣贤，要“德比于上”，德行要和比自己更高的人、比自己做得更好的人相比，才能常常看到自己的不足，犹恐追不上圣贤人。既学有所得以后，还怕不温习再失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

“巍巍乎”，就是伟大到极处了，“舜禹之有天下”为什么伟大呢？因为舜原来没有天下，他的天下是尧禅让给他的，禹原来也没有天下，他的天下是舜给他的，所以说他有天下也很伟大。“而不与焉”的“与”，

在《论语集解》上，何晏是这样说的，“言己不与求天下而得之”。把这个“与”解释为“不与求”。这个解释得很好，因为舜禹二人他们接受天下，并没有存得天下的心，也没有参与得天下的计划，心中根本没有这些事。所以，他们得了天下并不在意，因为他们的心并不在此，并不是以这个位置为荣，甚至是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那样，升官是为了发财、为了自私自利。他们得天下完全是人送来的，是看到他们的崇高的德行和他们建功立业有利于天下的百姓，愿意让他们来做国君。从这里我们看到，舜和禹都是大公无私的圣人。他们可以不为名利所牵绊，他和一般世俗的人是不同的。

一般世俗的人每一天朝九晚五地去工作，目的无非是财、色、名、利。如果没有这四个字，很多人恐怕没有那么努力地去工作了。既然为财色名利去工作，这个心就达不到自由自在。为什么呢？因为你把财看得很重要。这个财就是一个束缚，就是一个牵绊，就是一个缰绳，把你捆了一道。所以，现在有钱的人，并没有比没钱的人活得更加自由自在。有了钱，就害怕失去，不知道应该把钱到哪个地方去投资更加保值而患得患失。有的人是为色所迷，结果男的女的相亲相爱卿卿我我，一旦失去就痛不欲生。所以太喜欢男女之情，也是为情欲所牵绊。有的人是被名所牵绊，想方设法地出名，甚至到处宣传自己，做一些不实的宣传。《了凡四训》上说：“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那么，这样的人，我们看，被舆论揭穿了，知道他这个学历是假的，经验是假的，论文是假的，最后身败名裂。利，当然不仅仅是财富。凡是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和环境，都是想去贪占。古人说“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看到利益和获得现前的时候，首先想到符不符合道义，如果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我们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就产生了，毒奶粉、彩色馒头等等问题都出现了。

圣人之所以可赞可佩，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忍人之所不能忍，能够成人之所不能成，能够忍住对财色名利不去贪占，所以他们才成为大英雄。在中国人看来，大英雄并不是能够战胜千军万马的人，这个不叫大英雄。真正的大英雄，就是能够战胜自己的烦恼习气的人。能够战胜自己的烦恼

的人，那才是无所不胜的。所以，我们说的竞争，并不是去和别人争，而是和自己的烦恼习气、坏毛病去作斗争。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舜和禹之所以受赞叹，就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大公无私。他们得到天下并不是自己去求得的，而是由自己的道德与事功，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天下。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焕乎！其有文章！"

"大哉"是孔子总赞尧帝的为君之辞，"巍巍乎"，唯有天是如此高大，"巍巍乎"也是称赞伟大。天是最高大的，只有尧能够效法天的伟大。一般人对天有什么好处都说不出来，只有尧懂得，而且能够效法天道。所以他治理国家、治理天下才获得了成功。在《书经》上记载着尧分配官职，任何事情都办的有条有理，都上轨道，事情上了轨道，才能办得成功。"荡荡乎"是指尧的德行广远无际，人们都说不出他的伟大。"民所能名者，惟在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也。""焕"，《说文解字》上没有这个字，而是没有火字边的"奂"。这个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光明、明显的意思。"文"就是指各种教化事业，"章"就是指规章、章法。一事都有一事的规矩，有章法而不乱，这个就叫章。所以文章就是指尧的各种事业典章，崇高焕明得可以看得出来。任何事业都有规矩，比如说，我们在观看祭礼的时候，有歌、有舞、有音乐，好处说不出来，这就是"焕乎其有文章"。但是，观看祭礼的时候，心不会乱，条条有理。

尧治理天下的时候，太平无事，民众安然受其恩泽而不知，百姓作了一个击壤歌这样说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太阳初起来就出来劳作，太阳落山了就休息，凿了井就有水喝，耕了田就有粮食吃，尧帝对我有什么恩惠呢？这个并不是说百姓不知道感恩，而是赞叹尧治理天下，对百姓有恩德而不让百姓感觉到施恩于他。所以在尧的时候，那些百姓活得自由自在，但是尧王有什么好处却说不上来。尧帝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治理，天下大治，就是因为尧帝他

是一个圣王，他做到了凡事“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他在治理天下的时候，如果有一个百姓挨冻，他就说这是我让他们挨冻的，如果有一个百姓挨饿，他就自责地说这是我让他们挨饿的，如果有一个百姓犯罪，他就说这是我导致他们犯罪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君主都要起到君、亲、师的作用，不仅仅当领导，还要当他的父母亲人，关爱百姓。除此之外，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教导百姓人伦大道，让他们知道自己做人的本分和责任。那么老百姓犯了罪，显然是自己的责任没有尽到，所以他反躬自责，说这是我导致他们犯罪的。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了，之所以有这样的圣治，就是因为有圣王出现。有圣王出现，他自己有德行，处处反躬自责，还能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就是感召了天下有德行的人来做他的大臣。那么，这样才能够实现天下大治的结果。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

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据《论语集解》孔安国的注解说，“五人”是禹、稷、契、皋陶、伯益。禹我们都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的父亲是鲧，也曾奉命去治理洪水，但是，他采用了壅堵的方式，没有把水治好。禹接着去治水，改变了做法，采取了疏通的方式，结果治理黄河水患有功，所以受禅让继承了帝位。他也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他最卓著的功绩，除了治理黄河的滔天洪水之外，就是把中国的国土划为九州。后人尊称为“大禹”，那就是伟大的禹的意思。

“稷”是周家的始祖，他教民稼穑，让人民有东西吃，也是有德于民。所以，为什么周朝可以享年八百多载呢？都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积了厚德，庇荫子孙。所以凡事都有它的因果，必须相信，凡事都是自作自受。这里讲的是正作用，也有副作用，对子孙都有关系。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一有不如意的事现前的时候，就不能够去怨天尤人。现

在我们社会无论是贫富贵贱，都是怨声载道，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不明理所导致的。遇到事情，不知道反省自己，而是推卸责任，埋怨别人。如果大家都学了因果，都知道一切都是自作自受，一有不如意事现前的时候，就马上反省自己，德行上有哪些欠缺，比如说，当我们儿女不孝的时候，家里出了啃老族的时候，就要反省自己了，自己的钱财是不是不义之财？是不是因为“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所导致的？古人说钱财，不义之财，也会以不义的、不好的方式给败散掉，儿女也是败散钱财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当你夫妻不和睦的时候，你要反省自己有哪些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兄弟不睦的时候，你要反省自己兄友弟恭做得够不够。凡事都能够反省自己，有一个帮助别人，成就别人，感恩别人的心，才能够化解矛盾，才能够把问题真正解决。所以遇到事情去找别人的错，从别人那里找原因，这个问题无解，是解决不了的。而且有对立的心，还容易造成更深的矛盾。人就是因为不明理，才会有这些不如意的事情现前。

《易经》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我们从历史上也能看到，凡是家业、家风能够承传三代以上的家族，都是祖上有厚德。比如说在历史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孔子。孔子一生，奉行了温、良、恭、俭、让的德行，而且以传承文化为己任。虽然他当时很不得志，但是他的德行庇荫了他的子孙，两千多年八十多代而不衰，而且代代还有贤人出现。另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范仲淹，范仲淹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家境贫寒，知道了求学的辛苦，后来当上官，甚至做了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仍然不忘拿自己的俸禄去帮助那些穷苦的读书人，兴办义学，兴办义田。范仲淹的一生，供养了三百多家的人口，而且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子弟，特别是贫寒的子弟，成为国家栋梁。他一生自己生活贫穷，结果到老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很多人都说范仲淹这样做太傻了，太不替他的子孙后代着想了。但是，他的四个儿子都做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代代都有贤人出现。到清朝的时候，有人做了一个统计，说，范家出了七十多位做到部长以上的官员，而且一直到现在，他所兴办的义田数目不断地增长，他后代子孙一直承传了他的家风，承传了他的道义。所以，孔子留

的是风范，范仲淹为后人留下的是道义。这样的圣贤人，都能够使家风代代承传。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稷是周家的始祖，因为他有德行，才庇荫了周家享年八百多载。

下面一个人叫“契”，他是“子”姓，名“契”，是帝喾之子，尧的异母兄弟，他也是商汤的祖先。在公元前十六世纪，他的第十四代孙商汤起兵灭夏，建立了商朝。商汤传位十七世，三十个君王历时五百多年，最后在商纣王的手里灭亡。那么契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当时任舜的司徒。“司徒”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教育部长，教导人五伦大道。在《孟子》上有所记载，五伦大道从契的时候就开始教导了。

“皋陶”是舜禹时期的大理官，也就是司法长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法官。据说他长着青脸鸟嘴，铁面无私，断案公正。所以，作为法官，不能够以权谋私，凡是以权谋私的法官，下场都不会太好。当然，不仅仅是做法官不能够以权谋私，凡是我们做事情，担任一个职位，都不可以以权谋私。为什么呢？刚才我们也讲了《大学》上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凡是以权谋私所来的财富，那都是“悖而入”，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结果会怎么样呢？也是以不正当的方式败散掉，而且还失去了人家对你的信任。这讲的是皋陶。伯益是与大禹同朝为官，因为他善于狩猎与畜牧，被推为九官之一的虞官，就是负责当时的山泽畜牧业等等。因为他长期在狩猎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很熟悉鸟兽的语言和习性，鸟兽多被他驯服，所以在畜牧方面也是卓有成就。

得到这五个人，才能够使天下大治。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舜再有能力再有德行，也不能够一手包办。所以，“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像巫马期那样的办法会累死人。孔子有两个弟子，一个是子贱，一个是巫马期。巫马期治理单父，是天上挂满星星的时候就出门，等天上又出现星星了才回家休息。这样，非常的劳苦，把单父治理得很好。但是，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贱，是弹着琴，悠然自在，很少走出公堂，但是也把单父治理得很好。巫马期看了就很羡慕，就问他到底是怎么样把单父治理

好的，子贱就说："我的办法是凭借众人的力量，而你的办法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力量的当然劳苦，依靠众人力量的人当然安逸。所以，当领导的人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会用人，这样才可以无为而治。并不是说他为了享福而不管事，而是一个事业需要众多的人参与帮他办，他只是看一看分配一下就可以了。所以，领导者必须会善于用人，才能达到无为而治。

那么，领导者该用什么样的人呢？在《群书治要》中，对用人讲得很多，因为如果用错了人，事业就不能够成就。

用人首先要用孝廉之人。一个人孝，才能对领导、国家忠心，一个人廉洁，才没有贪心。所以，从汉代我们就实行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这是一个很好的选人标准。

第二就是要用进贤之人，也就是能够举荐贤才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没有私心。古代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宰相呢？并不是最有能力、最会做事，这样的人当宰相。而是他没有嫉贤妒能之心，最能够举荐贤才，而且心胸非常的宽宏大度。

宋代有一个宰相叫王旦，他当宰相当了很多年，结果寇准经常到皇帝那里说他的不是。有一次，皇帝就把王旦找来了，他说："寇准经常在背后打你的小报告，说你很多事做得不好。"你看，一个人当宰相，必然是非常的辛苦，结果，他辛辛苦苦地办事，别人不赞叹他，不感恩他，反而还挑剔他，指责他，这样的人心里会怎么想呢？但是王旦怎么说呢？王旦说："皇帝啊，我当宰相当了这么多年，一定有一些事做得不够圆满，不够完美，寇准他这样说是为了国家着想啊！"你看，我们想一想，皇帝听了这样的话，一定是深受感动，而且这话要是传到朝廷官员那里，也会为王旦的心量所感动。当然最感动的就是寇准，因为他去说人家坏话，人家不仅没有记恨他，反而还非常的感谢他。其实寇准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有一次，他去找王旦，他说："你推荐我做宰相怎么样啊？"王旦说："哪有自己要求别人推荐做宰相的？"寇准觉得很没面子，就回去了。后来，王旦要告老还乡了，皇帝就问他，应该请谁做宰相呢？这时王旦就说："让寇

准去做吧。”后来皇帝果然就让寇准当了宰相，当寇准来谢恩的时候，皇帝说：“不是我让你当宰相的，是王旦推荐你做宰相的。”我们想一想，寇准一定特别感佩王旦的心量和德行。所以，古人选官不是为了结党营私，让别人感恩于我，而是为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人民去着想。所以，进荐贤德的人没有私心，不嫉贤妒能是很难得的。因为人嫉贤妒能，说明他是有私心的，想从这个事业中获得私利，所以才排挤别的贤才。

第三种人是扬善之人，也就是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做领导的人要特别有这种判断。《格言别录》上说：“德薄者，其心刻傲，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弃者众。”德行浅薄的人看到每一个人，都有可挑剔的地方，不如我的地方，可指责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地刻薄傲慢。相反，“德盛者，其心和平，见人皆可取，故口中称叹者多。”这句话就是说，德行很高的人，他心平气和，看到每一个人都有可学习的地方，可肯定的地方，所以他口里所赞叹的人就有很多。我们自己是一个德薄者还是一个德盛者呢？我们观察一下自己的言行就明白了。我们是肯定人的多？还是毁谤人的多？还是挑剔人的多？

我们经常讲苏轼还有佛印禅师的故事，这个故事确实给我们很深的启发。佛印禅师和苏轼是好朋友，他们俩一天在打坐，结果坐着坐着苏轼就问了：“你看一看我这个样子像什么？”佛印禅师一看就说：“你这个样子很慈悲，就像一尊佛一样。”苏轼听了很高兴，洋洋自得。过了一会儿，佛印禅师就问苏轼说：“你看一看，我这个样子像什么呀？”苏轼一看，佛印禅师脸上笑嘻嘻地，于是他就说：“我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就像一堆牛粪。”听了他的话，佛印禅师就微笑了一下，没有做声。结果经过这件事，苏轼很高兴，回到家迫不及待地对他的妹妹苏小妹说：“妹妹，每一次我和佛印禅师在一起，我都说不过他，都让他占便宜，结果今天我赢了，占了便宜。”苏小妹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她说：“哥哥，佛印禅师那么样地有智慧，你赢在哪里，占了什么便宜，给我说说看。”苏轼就说：“你看，我们两个人在打坐，我问他我像什么，结果他告诉我，我很庄严像一尊佛。而他问我他像什么，我告诉他说简直就像一堆牛粪，这不是我庄严而

他不庄严么？”苏小妹听了笑了一笑，她说：“哥哥，你这一次又输了，因为佛印禅师的心地慈悲善良，他看谁都是一尊佛。而你心地刻薄傲慢，把那么清净的禅师都看成是一堆牛粪了，这正说明了你自己心地肮脏，所以你又输了。”苏轼听了之后，觉得很惭愧。我们每个人看别人的时候，其实都是戴着一个有色眼镜去看人的。有的人说，我看人很准，他看人准，也是依照自己的眼睛去看的，没有真正达到客观公正。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公正呢？你的心水平如镜的时候，微澜不兴，微波不起，它对外界的映照才是真正如实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往往犯这样的过失。所以，没有达到圣人的境地，我们不能够说我看人就是很准的，就是客观公正的，这是自以为是。所以，我们往往通过怎么看别人，其实能够看到自己的心是厚道还是刻薄。为什么我对这一句话有深刻的印象呢？就是因为我自己以前就属于这样德薄者。别人做事辛辛苦苦费尽心力，但是我们还说这没有做好那没有做好，还有哪些可待提高的地方。其实，如果换上我去做这个事，可能还没有人家做的好。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要隐恶扬善。第四种人就是贤德之人。什么是贤德之人？就是古代人所说的又有德行、又有能力还能够教化百姓的人。古人对老师非常的尊重，为什么呢？因为他承担着教化百姓的职责。为什么社会有很多不道德的现象呢？原因就是没有人教了，老师自己没有德行，不能够言传身教，所以整个社会才兴起了功利之心。所以贤德的人，国家应该特别重视，把这样贤德的人推荐出来教导百姓，社会风气就会为之一变。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就知道，每一个圣王的出现，盛世的出现，都是因为任用贤德之人的结果。比如，周文王任用了姜太公，齐桓公任用了管仲，唐太宗任用了魏征，这些盛德之人，他们协助君主能够把天下治理好，他们起到教化世人的作用。

第五种就是直谏之人，也就是犯言直谏的人。对于这种人，领导者要特别的重视。《群书治要》上特别指出“国之将兴，贵在谏臣”。一个国家之所以兴盛，就是有那些能够犯言直谏的臣子，可以当面指正君主的过

失。如果做君主的、做领导的都是喜欢谄媚巴结的人，就是任用小人，这个事业就有衰败的危险。

所以，当领导的人要掌握用人的原则，这个领导才会当好。舜很有才能，还要用这五个人，而这五个人也很特别，都有德行、有能力，说明要成就一个事业，并不是一个人就能够成就的，一个人有德行、有能力还不够，他自己所任用的人也必须是和他志同道合的人，也就是他也得有德行，也得有能力，也要无私无求。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个事业，都是要任用贤德之人。贤德之人的标准就是没有私心，为了这个事业能够尽心尽力。如果有私心的话，即使领导者很贤德，但是任用的人都不贤德，有私心，见利忘义，那么这个事业也很难兴盛。舜之所以能够把天下治好，就是因为任用的这些人也都是贤德之人。当然，强将手下无弱兵，之所以能够感召这些贤德的人，也是因为舜自己是一个有德行的人。

在《尚书·泰誓》上记载，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这是周武王在伐纣的时候誓众之辞。"予"代表周家，"乱"是"理"的意思，有条理，音乐的乱就是音乐最后的合奏乐章，"乱"在这里当"治理"讲。在《论语集解》马融注："十人"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其余一人是文母。

第一位是周公旦，姓姬，名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周公。周公制礼作乐，对国家的贡献很大。周公封地在鲁国，当他的儿子要去鲁国的时候，他再三地叮咛，他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我的位置，在天下可以说，不算是很低贱的了，是很尊贵的了，但是，我还不敢以自己的权势骄慢人。"周公做到了"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贤德的大臣确实待人很谦虚，因为他主掌朝政，如果自己很傲慢无礼，就会把很多人才拒之门外。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古人头发都很长，结果突然有贤才给他来提建议了，他不能让贤才等着，马上把头发盘起来，就去接见贤才了。结果，在洗一次头发的过程中，多次被打断。吃饭的时候也是一样。古人吃饭的时候，有肉干都比较硬，很难嚼，在吃着饭的时候，突然有人又来提建议了，他不能让贤才在外边等候，就把肉干先吐出来放在一边，

马上又去接见贤才了。所以吃一顿饭的时候，也多次被打断。可见周公他勤政爱民，而且对贤才非常的礼遇，所以天下的贤才都愿意到周来任职，这是周公。

第二位，召公奭，姓姬，名奭，武王周公同父异母的弟弟，曾辅佐周武王灭掉了商朝。在《诗经》里面，有一篇叫《周南》，有一篇叫《召南》，《周南》就是记录周公在南方治理国家时的业绩，以及当时那些地区的诗歌，而《召南》就是记录召公治理地区的诗歌。

第三位，太公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他也是我们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辅佐文王、武王平定了天下，后来他的封地在齐。

第四位叫毕公，姬姓，毕氏，名高，是周文王的庶子，周武王同父异母的弟弟，也是一位贤者。在周成王的时候，他是天子三公之一，所以称毕公。所以毕公高的，并不是爵位，而是三公的公。

第五位，荣公，也是周武王的臣子，也是三公之一。

第六位到第九位，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括，被称为“文王四友”，也就是周文王四位最亲信的大臣。闳夭与散宜生、太颠共同辅佐西伯姬昌，就是周文王在做西伯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辅佐他了。西伯被商纣王囚禁的时候，闳夭和众人设计，献了一些美女和宝物给商纣王，就把西伯给营救出来了，后来又辅佐周武王灭了商朝。

“南宫适”曾经大力帮助周文王兴国，周文王过世之后他又帮助周武王打天下，立了很大的功劳。在周武王建立西周王朝之后，就是任命南宫适把商纣王搜刮百姓财物而建立的鹿台给拆了，并把鹿台上的财物分给了贫苦的百姓，又让他去把商纣王的粮仓都打开，将粮食分给受饥的庶民们。

第十位，文母。古代的注解有的认为是武王的母亲太姒，有的认为是武王的妻子邑姜，但是根据武王说的这句话，“余有乱臣十人”，说明文母也是他的臣子之一，所以不应该是他的母亲，认为是邑姜更符合君臣之义。在《大戴礼记·保傅》篇中就记载着“周后妃任成王于身”。“周后

妃”就是指邑姜，“任”就是指怀孕的时候，她在怀孕成王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立而不跂”，“跂”就是抬起脚后跟站着，她站着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端正端庄，不会抬起脚后跟站着。“坐而不差”，“差”就是参差的差，坐的时候不会两脚岔开，也不会歪歪斜斜。“独处而不倨”，就是即使她一个人独居的时候，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也不会伸开脚坐着。“虽怒而不詈”，即使她生气了，但是也不会骂人说脏话，这个就是胎教。

接着孔子说：“才难，不其然乎？”这是孔子下的断语，如此大的天下，舜办得天下大治。选了出类拔萃的五人，周朝也不过是十人，这说明并不是各处都有人才。孔子的目的是国家的领导要用人才、把握人才、栽培人才，但是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人才呢？以人格为主的，才是人才。所以有人把人才分为四种类型，“有才有德是正品”，这个人又有才能又有德行，这是我们社会所急需的，这叫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这个人有德行但是才能不够，培养一下还可以用，不至于对我们的团队、国家、社会造成灾难；“有才无德是毒品”，这个人很有才能，但是没有德行，这个会造成潜在的危害，这个叫毒品；就像我们的毒奶粉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都是那些有才无德的人做出来的。最后一点，就是“无才无德的是废品”。像历史上的曹操，那是乱才，有不如无。在宋朝也有不少名臣，但是因为秦桧的出现，使得人才不被重用。那么做一个机关团体的领导者也是如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不能任人，团体必糟，治家也治不好。要懂人才，必须首先把自己培养成人才。

在古人那里认为圣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圣人就是首先能够做到然后再说的人，这样的人被称为圣人。贤人是先说到然后再做到，那么现在很多人是说到做不到，这个叫骗人，骗人肯定是不能够长久的。我们看了这句话也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成为骗人的人。民国期间的大善人王凤仪先生说到：世间有一种人是最恶的人，就是讲道而不行道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不讲道做了恶事，别人还能够理解能够原谅，说因为他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学习，他怪也会怪你一个人或者你的家人。但是你讲道，说道，但是却不行道，他就不会怪罪你一个人了，就会怪罪你所说的道。说他讲

的这个东西都是伪道学，所以才把他培养成了伪君子。所以为什么传统文化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没落了呢？原因就是那些学习传统经典的人并没有依教奉行，把经典上的教诲表演出来，所以让人们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所以才有文言文被废弃的结果，这都是和读书人讲道而不能行道有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做这种最恶的人，一定要把自己所说的例行在生活之中，即使不能够做到十全十美，也要努力去践行，不能够骗人。所以我也非常感谢那些听众，为什么呢？因为走到哪里，听众都是对我们抱着期望，非常的欢迎，这也是鼓励我们把自己所说的落实在生活之中。如果有的地方做的不够完美，也会非常的自责，想到辜负了听众的期望，所以不能够挂着羊头卖狗肉，不可以去骗人。当然这并不难，即使你昨日是坏人，是恶人，做的不好，但是你今天一改心，你就能转恶为善了。

“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这是讲到国家的人才兴盛，在唐虞时期是最盛的了，“唐虞之际”的“际”是后的意思。到尧舜两位圣人之后，就是到了周朝人才最兴盛了。但是在十个人中还有一个是妇人，所以才有九人而已。

下面说“三分天下有其二，已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包咸的注解说：“殷纣因淫乱，文王为西伯而有圣德，天下归周者三分有二，而犹以服事殷，故谓之至德。”

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引用《左传》襄公四年，说：“文王帅殷之畔国以事纣。”这两句话就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周之德称为是圣德，因为他在做殷朝的诸侯的时候，有三分之二的诸侯都归周了。但是周依然率领诸侯事奉殷家而不变，这就是周的厚德。周为诸侯，天下都归心于你，而你却不要，这才说明周家的德已经到了极处了。起初是让，为什么后来不让了呢？因为商纣王日益残暴，就像孟子所说的“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因为商纣王丧失了做国君的资格，所以伐纣之举是吊民伐罪，是为了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也无损于至德。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孔子说到禹，“吾无间然矣”，“间”是非议的非字讲，“无间然”就是无可非议的意思，有间就是还不完美。如果是无间，就是说他办的十分完美了，没有不圆满的了，孔子对于禹没有话讲，因为禹极为圆满。为什么说他十分圆满呢？“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饮食是人生最大的事，其次为衣服。禹一生“菲饮食”，“菲”就是薄的意思，他的饮食很节约。禹王自己的饮食菲薄，但是祭祀的祭品却十分丰富，尽上全力一点也不苟且，能致上最诚的孝心。

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这里的“祭”是祭天，祭祖等等。古人无论是祭天地还是祭祖先，其实都是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表示。在古代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祠堂，祠堂里供奉者祖先的牌位，到春秋祭祀的时候，把全家族的人召集在祠堂之中，宣讲祖先德行。说你们家在哪朝哪代，有哪一位有德行的人，他对国家有什么贡献，他有什么德行，我们可以学习和效仿。那你作为他的后代子孙，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不要因为自己的言行，给祖先抹黑。所以在《论语》上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谨慎地办理丧事，追奠亡故的先人，民风就自然归于醇厚了。

“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黻冕”，古代天子临朝或祭祀所穿的礼服为黻，所戴的礼帽称为冕。在《尚书·益稷》篇记载礼服的上衣下裳。礼服的上面称为衣，下面称为裳。上面都绣着日月，星辰，黼黻等十二种文采。“黼黻”就是泛指礼服上所绣的华美的花纹，“黻”字是用两个己字相背而成，一个己字绣成青色，一个己字绣成黑色，黑与青相次而成黻文，黻在十二章的最后，因此就以黻字代表礼服。禹穿衣服的时候，是恶衣服，是指平常所穿的衣服。平常他只穿粗恶的衣服，比如说他治水的时候，衣服就像工人那样破烂不堪，然而禹一上朝，公家的事一点也不随便，朝衣则讲究华美，为什么呢？这是恭敬群臣，就像我们平时在家的时

候，可以穿的很随便很朴素，但是一到讲课的时候，一定要穿着很正式，这是尊重观众。

“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对于衣、食、住，禹王是吃了一辈子的苦，住的也很简单，是卑矮的宫室，但是“尽力乎沟洫”，“沟”是指小的沟，“洫”指大的沟。古代实行井田制，井间有很多灌溉的水沟，所以这个沟洫代表的是农田水利。大禹对于人们的田地，百姓所干的事，非常讲究，尽力都把钱用在田地之上。他不注重自己所住的宫室，自己住的很卑矮，但是尽力为农民来办理沟洫水利，这是厚爱百姓。所以孔子赞美禹王的功德，表示对禹最感满意。所以说：“禹，吾无间然矣。”我对禹是没有话可说了，接着便举了事实。孔子说了这些事实之后，再加重其词的强调了一句，“禹，吾无间然矣”。如果不是大公无私，也达不到禹这种境界。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地方政府，政府大楼越建越高，越建越豪华，这都是没有学习传统文化的结果，尧、舜、禹、汤之所以能使天下大治，都是自己住的房子只有三等的土台阶，车不雕几，器不刻镂，车子都没有什么装饰很朴素，所用的器具也很简朴，也没有雕刻花纹，因为他们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所以才能够把天下治理好。

在皇侃的《论语义疏》上，引了东晋著名的文学家李充的话这样说：“季世僻王，肆情纵欲，穷奢极侈丽。”“季世僻王”是末代的邪僻君王，“肆情纵欲”就是放纵自己的情欲；“穷奢极侈丽”，用度非常的奢侈华丽，极尽骄奢淫逸之事。“厚珍膳而简伪乎享祀”，自己吃的是山珍海味，但是在祭祀的时候却简简单单，一点也没有恭敬心。“盛纤靡而阙慢乎祭服”，穿着的衣服非常的华丽讲究，但是在祭祀祖先，或祭天时所穿的礼服却很怠慢。“崇台榭而不恤乎农政”，非常喜欢住建筑高大华丽的台榭，亭台楼阁，但是却不体恤农业水利工程等等，对农民不是很关爱。“是以亡国丧身，莫不由乎此矣。”正是由于这样的做法，才导致了亡国，身败名裂都是因为这些原因。

“于有国有家者，观夫禹之所以兴也，览三季之所以亡，可以不慎与？”对于有国有家的君主，领导，家长等等，看一看禹之所以兴盛的原

因，再看一看三季就是夏商周的末代帝王之所以衰亡的原因，怎么能够不谨慎呢？像夏桀王、商纣王、周幽王都是骄奢淫逸而且非常的暴戾，最后导致了灭亡，这对我们现代人也非常的有启发。特别是现在党中央提出群众路线，教育反对四风，还提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号召，这都是总结历史经验，给予领导干部的引导，是非常必要的。

子罕篇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篑”是盛土的器具，“山”也是土石的集合体。用《金刚经》的话说就是一合相，万事万物都有体有相，都是相有体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的形象是有的，但是他的本性是空寂的，什么叫相有体空呢？比如说一本书是由一页一页的纸经过浆糊、钉子，装订在一起，所以才有书的形象。但是我们把一页一页纸撕下来，书就不称其为书了，所以性是空的。空并不是无的意思，纸也可以再分下去，把纸撕为碎片，纸也就不存在了。万事万物分析到最后其实都是相有体空，这叫一合相。都是众缘和合而成，是当体即空。我们人身也是由四大假合而成，四大就是指地、水、火、风，地比如说我们的骨头肌肉，叫地大；水比如说我们的血液唾液等等，叫水大；火比如说我们人体有温度，叫火大；风比如说我们的呼吸，叫风大；人体也是四大假合而成，所以它也是本性空。空不是无，相上是有，像山一样是由土石凑合在一起堆积而成，我们把它称为山，把土和石分散开来，山也就不成其为山了。这里以堆山作为一个比喻，比如说堆积一座山还没有完成，比如说我们要堆积一个十米的山，只差最后一篑土了，如果从此止住，便不能成功，那不能埋怨别人，只怨自己停止，自己没有信心，或者没有意志，不能坚持，功亏一篑。

“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又譬如在平地上覆下一篑土，倒下一篑土就比原地高，再倒一篑，就更高。最后成功了，也和别人不相

干，也是自己肯努力的结果。竹添光鸿把“平地”解释为“填平洼地”，和为山相对举，可以做参考。孔子说的这个比喻，可以泛指很多事情，但不论做什么事，全在自己干，不论大事小事，都要能够坚持，才能够有所收益。就像你卖水果一样，一日赚二元钱你也要去赚，如果不去卖，连二元钱也赚不上。现在就求学这件事来说，就像我们做学问，没有学问的时候就像平地，念了一本书就比平地高，再念一本书，就又比原来高了，又增长了一本书的学问。像我们听《论语》听了一集，就增长了一集的学问，提高了一些道德，再听一集，又增长了一集的学问，直到听完，《论语治要》就掌握了。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了，所以古人修学特别强调长时熏修。为什么要长时熏修？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环境不是很好，受时间五欲六尘的熏染很多，受圣贤人的熏染很少，所以经常熏，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这个衣服放在衣箱里衣柜里，它身上本来没有味道，但是在衣柜里放了一些麝香，久而久之衣服上也有了香味。同样，如果受到不好的熏染，我们身上也会沾染上不好的习气。所以学无止境，不到圣人的地步不能停止，纵使距离圣人只有一步之遥，仍须要迈进这一步，才能够成功。

颜渊篇

颜渊问仁。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曰：“请问其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一章讲颜渊来问“仁”，孔子引用古时成语克己复礼来回答。在《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可见克己复礼为仁，是古代的成语，孔子引用它来回答颜子的提问。这一章问答，被学者称为“孔颜传授切要之言”，就是最重要的对话。“克己复礼”，有两种读法：第一种读法是“克，己复礼”，“克”当“能”字讲，“克，己复礼”，就是能自己复礼的意思。孔安国把它注为，“身能反礼”，“克”，解释为能字讲，自己能够复礼就名为仁。另一种读法就是四字连续，“克己复礼”，“克己”就是克制自己，就是马融所说的“约身”，“约身”就是约束自己，制服自己。“复礼”的“复”字，有的解释为“反”，有的解释为“归”，都是相合的的意思。凡事能约束自己，不责备别人便能合礼。为什么呢？因为约束自己，就是礼让他人、宽恕他人，如此就得到了礼的根本，所以就是仁。大家都在学克己，克己有什么办法呢？《论语》上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克己要从礼上学，我们为什么要学《弟子规》、《常礼举要》呢？就是先在礼上渐渐地学成功。第一步先克己，先

“三省吾身”，改自己。一改，行为就合礼。像《了凡四训》中讲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蘧伯玉从二十岁的时候就知道每天反省改过，结果每一年都认真地反省，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才知道四十九岁的时候犯下了很多的过失。

只要能做到克己复礼，就是“仁”。凡事不责怪人，先自己改，对得起人，这就是仁。这里的人是指一切人，对一切人都要有礼貌，我们一般的人对于富贵之人，对于和自己有利益关系的人都能够有礼貌，甚至还尽谄媚巴结之事，但是对自己没有利益相关的人或者是贫贱之人，就失去了礼貌，那么这恭敬不是出于真诚心。为什么呢？因为真诚心是不会变的，对人都是如此的。这个心是出于功利之心，有利才会有礼，没利就没礼了。

我们看圣贤人，他的第一反应都是仁爱之心。比如说孔子下朝，看到自己家的马厩着火了，马上就问：“伤到人没有？”而没有问马伤到了没有。看到圣贤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关爱他人，而不是想到自己的财产。像韩琦，我们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宰相确实是量大福大。韩琦的心量很大，他有一次看到一个人挖出了一对玉杯，这个人非常的贫穷，所以他就花重金把这对玉杯买回来了。他自己也很喜欢这对玉杯，每到宴客的时候都会用这对玉杯招待客人。结果有一次他在招待客人的时候，这对玉杯被一个下属给摔碎了，他周围的人都大惊失色，因为他们都知道，这对玉杯是韩琦花了重金买回来的，而且非常的喜欢。下属也被吓得哆哆嗦嗦，结果韩琦看了之后说：“是东西就有坏的时候，今天玉杯的寿命到了，正是它应该坏的时候。来，没关系不要紧，咱们继续喝。”

所以你看这样的宰相，有这样的心量，所以他特别的受人尊敬，他的这种仁爱之心是对人一视同仁，不因为这人是下属，就不客气失去礼貌。

因为，圣贤人的第一个念头都是关爱他人，都是一片仁慈，这种仁爱之心，处处都是要求自己，不责怪别人。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马融注：“一日犹见归，况终身

乎？”如果一日做到了克己复礼，天下都归心于你，更何况终身做到呢？自上而下说，国家领袖如果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天下都跟着学仁。比如说周文王的风度，就度化了芮虞二国的国君。在周文王还是西伯昌的时候，虞芮二国的国君因为田产起了争执，于是就到周文王那里请他裁决，但是他们一进入周文王所治理的国境看到全国相让，从上到下相处都是非常的谦让，彬彬有礼。结果虞芮两国的国君非常惭愧，就不再争执了。天下的诸侯听到这一件事，归周的有四十多个诸侯国。这都是克己复礼的力量，“使天下归仁”。

现在有人在社会上扰乱治安，我们也不能够完全埋怨他们，为什么呢？所谓“不教而杀，谓之虐”。如果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必定会如此，教育和学历没有关系，有的人可能是学士，硕士，博士毕业，但是却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高等教育变成了高等知识技能的传习所，我们古人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教育，已经看不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教，古人解释为：“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育的目的是使人善良不断地增长，过失得以挽救；“育，养子使作善也。”仅仅把这个孩子养大，不叫育，必须顺着善良的方面去发展，才叫育。所以，做人的教育、品德的教育是教育的核心和根本。但是现在的大学，品德教育不受重视，学生的知识技能非常的丰富，但是做人没有根本，不知道怎么为人，做事不知道怎么样诚信，不知道怎样认真负责，说话也不算数。这样的人就是没有受过教育。

在《三字经》上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人之所以会做错事做坏事，那是因为没有人教，或说所受的教育都是反面的。禹王在路上看到罪人，他是怎么做的呢？他走下车，哭的非常的伤心，旁边的人看了之后就说：“这都是罪人不顺着道去行为所导致的，自作自受，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禹王就说：“尧舜的时候没有罪人，为什么到我领导的时候就有罪人了呢？在尧舜的时候，天下的人都以尧舜之心为心，到我领导的时候他们的私心就生起来了。”所以他“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知道这个道理就必须克己，这是就人君而言。如果是普通人能够做

到克己复礼，也是无往而不为仁者，足以感化人。只要有一天克己复礼就不得了，我们想一想如果一天，从早到晚能够克己复礼，那都很难得了，普通人是一天都做不到。当人没有去求学问时，心中都没有主见，不得其正，无法做到“素富贵，安于富贵；素贫贱，安于贫贱”。都在那妄求，所以时常感到身为物役，思想观念，行为举止，都会受到外界人事的牵制，而难以安定自由。求学以后，就要力图改变此种状况，怎么学呢？要学曾子，曾子为什么能成功呢？曾子每日三省吾身，天天认真地省察自己，所以孔子之道，除了颜子能体悟之外，就是曾子能获得。

古人常用功过格或是写修学日记的方式每一天专门拿出一段时间，反省自己一天的得失。这对于修学人是很好的帮助。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功”，能够反省自己的过失，下次不再犯，这是很必要的。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说求仁、行仁全在自己，都是自己的事情，和别人无关，要想行仁，这个德行不在别人身上，仁和不仁全在自己，仁是每个人性之中本具的性德，可以说是“在圣不增，在凡不减”。这就是蕅益大师所说的“不信自己可为圣贤，如何进德修业”？而凡圣的区别就在于自己求还是不求，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能求则能得到仁，不求，可能就自甘堕落了。所以在求仁的路上，要具有不为外物所夺的坚定信念，不要因为他人的好恶毁誉，或者自己暂时的得失，而动摇自己的求仁、归仁之心。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事，就是提升自己的灵性，让自己的心性有所提高，所以古人说，“读书志在圣贤”。我们有一位传统文化老师就说，他在二十五岁之前，也是被一些错误的知见引导，认为成功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个很帅的男人，有一辆非常高档的轿车，后边有一套非常豪华的别墅，旁边还亭亭玉立地站着一个身材很好的女人，那是他的太太，他认为这样才算是成功。结果忙忙碌碌地去追求这些，可是，有许多人得到这些并没有快乐，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因为自己纵欲，他的妻子离开了他，孩子也离他而去，有一天喝醉了酒，倒在大街上，警察就问，你怎么不回家啊？他说：“哪里是我的家啊？”这个小区最豪华的那栋别

墅不就是你的家么？那哪里是家啊，那只是一栋房子而已。所以一个人虽然很有钱，却活的很空虚，金钱并没有给他带来预想的幸福。现在很多人忙忙碌碌都去追求幸福，但是到头来幸福却离自己越来越远了，幸福指数却越来越低了，为什么呢？原因就是我们的方向错了，没有智慧所导致的。

那么，人生的价值在哪里呢？中国人有两句话，一句话叫“助人为乐”，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快乐喜悦呢？帮助别人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如果你去求，那就有求之不得的痛苦。还有一句话叫“知足常乐”，如果你不知足，那你永远都快乐不起来。你的攀比心一生起来，本来你住的房子还不错，结果你一看别人家，装修的更豪华更加的体面，你这好的房子也不能够成为喜悦的原因了。所以人生要懂得知足常乐，德行上要跟更有德行的人相比，但是在欲望享受上却要和那些不如自己的人相比，这才是知足常乐。

《大学》上的第一句话，就把人生的目的给我们指出来了，什么是“大学之道”呢？学做大人、学做圣人之道，在哪里呢？“在明明德”，要把自己的自性性德开发出来，提升自己的道德智慧，“在亲民”，在去帮助别人，开发他们的智慧德行。“在止于至善”，自己成就又帮助别人成就，自助助人，自利利他。这两件事都达到圆满的境界，这叫“止于至善”。这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追求的有味道的人生，所以求仁全在自己。灵性能不能提升，性德能不能开发，也全在自己。所以人生要活的明白，不要追求那些带不走的东西，而要追求那些带得走，生生世世都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还有人说，想行仁却没有对象，没有其他人，如何行仁？《大学》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这就是告诉我们要不愧衾影，何必一定要有人，才能行仁呢？

《礼记·中庸》说：“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君子，别人都比不上他的地方，就是在别人都看不见的地方。屋漏是指室内西北角，安藏神主之处，无人可见，在无人之处尚且不愧，更何况是有人之处呢？之所以能够做到慎独，就是在无

人看得见的地方，也能够谨慎的修身，要求自己。就是因为行仁全由自己，而不由人，所以和别人看见看不见，赞叹不赞叹，理解不理解没有关系。

下面，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前边四句是总纲，颜子一听就能领会，于是接着问克己复礼的条目，"目"有人解释为条目。蔼益大师在《论语点睛》上说："目者眼目，譬如画龙须点睛尔。"这就是颜子请夫子直示下手功夫，就是颜子向孔子请教从哪里下手，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合礼的现象不要看，不合礼的声音不要听，不合礼的言辞不要说。第四句，凡遇到不合礼的事情皆不要动。勿动的"动"字，古人解释不一。如果解释为动容貌，或者是行动，都不妥当，为什么呢？因为古人把人的行为分为身、口、意三种，眼视耳听都是"身"，言出于口，动则应该属于心意，心为身口之主，即能不动心，则身口自然也能不为所动，所以李炳南老居士认为，勿动的"动"应指不动心而言。

这四句话，视必须在前面，听是其次，次序不能颠倒，就是我们接触一个事物，都是视先，听次。佛经云，六根，六尘，六识。眼耳鼻舌身意，都是眼耳在前，《三字经》上讲"首孝悌，次见闻"，先见，然后听人讲，在思修。这个次序是一定的。首先我们看"非礼勿视"，不合礼的别看。看电视看报纸就看看新闻，看看大标题，关乎国家大事的看一看，杀盗淫妄的新闻一定不要看，潜移默化地对自己会有影响，有熏染。

"非礼勿听"，耳不听，心不烦。像我们现在流行的音乐，大部分都不是德音雅乐。在《吕氏春秋》讲乱世的音乐，"乱世之乐，为木革之声，则若雷"，如果演奏木质革质的乐器，声音就像雷霆震怒；"为金石之声，则若霆"，如果演奏铜制石质乐器的声音，就像霹雳；"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如果演奏丝竹之类的歌舞音乐，就像大嚷大叫，就像噪音一样，"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性则可矣"，用这样的噪音，来惊骇人们的精神，震动人们的耳目，动摇放荡人的性情，倒是可以办到的，"以此为乐，则不乐"。以此作为音乐来演奏，绝对不可能给人带来快乐；"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因此音乐越是奢靡华

丽，人们越是抑郁，而国家愈是混乱，君主的地位越是卑微，这也就失去了音乐本来的意义了。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现在流行的大部分歌曲都是靡靡之音，都是乱世之乐，为什么呢？因为听了这些音乐，并没有让人心平气和，生起喜悦，反而听的就像大嚷大叫，雷霆震怒，无形之中伤害了自己的性情。

古人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孔子每到一个地方，还没有问这个地方的政事办的如何，首先听一听流行什么音乐。他就知道这一个地方的民风是怎么样的了。所以我们的社会，家庭也应该注重用德音雅乐来教导孩子。像用古代的古筝、古琴都是非常的平和。本来你心烦气躁，听一听这个古典音乐，弹上一只舒缓的乐曲，一下子心就抚平了。现在很多人很重视养生之道，健康节目很受欢迎，但是养心、养性比养生更为重要。五欲六尘都会污染心性，都不要去看，不要去听，必须懂得藏护六根。像《弟子规》上也说："非圣书，摒勿视。"为什么古人不让去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原因就是"蔽聪明，坏心智"。本来你是耳聪目明的，心性非常好的，善良的，结果看了不是圣贤的东西，最后把自己的聪明给蒙蔽了，也把自己好的心性给败坏了。

孔子所指示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有"闲邪存诚"的意义。闲邪防非和主敬存诚，看起来是两回事，也是一回事，二者相辅相成。程子说："闲邪则诚自存矣。"程子特别作了《四箴》，也就是《视箴》、《听箴》、《言箴》、《动箴》。来说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对于闲邪存诚的重要性。

在序言中他这样说，"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程子认为，四勿主要侧重的是，"制于外所以养其中"这种闲邪的功夫。也就是借外在的举止仪容的节养，来帮助心性道德的成就。比如在《视箴》上说，"心兮本虚，应物无迹，操之有要，视为之则，蔽交于前，其中则迁，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复礼，久而诚矣。"这一段的大意就是说，人心虽为一身之主，生而虚静，但是它在接触外物的时候，必须借助于目见耳闻，这样就被外物诱化，而随物迁流的危险，如果邪蔽交于目前，淫

声荡于耳际，引发内心的欲念萌动，那么本心也会随而迁化，丧失本有的中和状态，什么是“中和”状态呢？《中庸》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就是你的喜怒哀乐爱恶惧，七情都没有发出来的状态，被称为“中”的状态，一般人很难体会。“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你喜怒哀乐爱恶惧都发出来了，但是都不过分，恰到好处的这种状态，叫和的状态。那么怎么样叫不过分呢，那就是要受到礼的约束，符合于礼，所以操存本心，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戒慎视听”，所看的，所听的，都要符合礼，不与邪蔽相交。明白这个道理的人，知道物化迁流的危险，用礼来要求自己，目的是使心定止下来，而定止的关键就是约束视听为先，要主动远离污染和诱惑。使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这样才能保有天生的善性。

下面讲“非礼勿言”，不诚信的话，粗鲁骂人的话，勾引诱惑的话，搬弄是非的话绝对不能说，还包括黄色笑话，很多人以为说黄色笑话为幽默，这都是不适宜的，还有惹人起烦恼的话一概不说，所以说话要符合礼。

“非礼勿动”，“动”，指心意的起动，一见不合礼的事，要八风吹不动，动就是指不动心，因为视听是身，言是口，动是意。所以这个动是指心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应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方面，在消极的层次上，有遮遣外物，防非止过的意思，让你远离不善的污染，防止不合礼的欲望随之萌动，再受到强化而付诸行为。现在的犯罪率为什么会节节攀升呢，就是因为人都被教坏了，电视，网络内容充满了杀盗淫妄，所以人被教坏了，犯罪率才会攀升。另一方面，在积极意义上有不动心的意思，也就是说要从心上用功，虚心净虑，而不是一味地闭目塞听，摒绝外物对耳目感官的干扰。因为我们生活在五浊恶世，世风很浊恶，所处的环境也不善，又往往受到各种条件的束缚，难以抽身远离的境况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学人对自己的要求，就需要更进一步，以积极振奋的态度做到主敬存诚，不离本心，继而在守礼的基础上发展扩充仁心，提高学问境界。

最后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这是结语，意思是遵照孔子的话去奉行，依此照办，自己合礼，在社会上就是君子，做事都能吉祥如意。

仲弓问仁。

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仲弓问仁"，仲弓也是德行科的大贤。为什么颜渊篇最初先列颜子、仲弓问仁？因为这个仁很不好讲。古往今来很多人学了很多年但是仍然说错。比如韩愈就曾经说"博爱之谓仁"，这个"爱"是七情，而"仁"不是七情。仲弓问仁，孔子答了六句话，一共三件事。孔子答"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这是一件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另一件事；"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又是另外一件事。

首先我们看"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这里孔子也是用古代的成语来回答仲弓的问题。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臼季说："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古人编这个言语，就是给大家说的，给大众说的，谁来学就说给谁，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都要学习。这句话的大意就是说：出门与人相见犹如接见大宾，使用民力犹如承奉大祭。

什么是大宾大祭？在皇侃的《论语义疏》中引注说："大宾，君臣嘉会也；大祭，国祭也。""大宾"是朝会或会同；"大祭"就是祭太庙、祭天。这两件事情格外严肃。所以宾、祭都说"大"。见大宾必须"敬"，承大祭必须"诚"，"诚"与"敬"即可为仁。这是对在位的领导者而言的。因为在孔子那时候君不君、臣不臣，所以先说在上位的人，上行而下效。像尧、舜率天下以仁，百姓从之为仁；桀、纣率天下以暴，人民也从之为暴。如果在上位者懂得大宾、大祭，百姓出门做客就知道有礼貌，在自己家里懂得祭祀。"见大宾、承大祭"，是国君的事，所以这里说"如"。我

们必须学这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走出自己家的大门，或者是你去见客或者作客，就如会大宾，必须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出外作客必须讲礼貌。像我们平时在家的时候，穿得很随便，甚至穿得很破烂，但是我们讲课的时候，要穿得很正式、很正规，这是为恭敬听众。虽然提襟见肘也要有规矩。“使民”是说在上者出来做事一切恭恭敬敬，毫不苟且。祭祀时必须有恭敬之心，这就是告诉我们领导者，用人、使民要做到一切恭敬。当然，不是领导者的人也要学习这一句话，只要做事就像祭祀一样尽心尽力地去干，即使钱少也必须尽力，不要责怪他人，只能要求自己。外国人他们不懂得这一个道理，所谓“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因为他们没有听闻君子的大道。

下面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管子》小问篇引语说：“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这个“施”当“加”字讲，就是你自己不愿接受的事，觉得这一事对自己没有好处，就不要把这一件事加于他人的身上。这也就是我们《弟子规》上经常所说的“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这一句话看似简单也很容易理解，但如果我们时时处处按照这一句话来衡量自己的行为，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是该做还是不该做了，应该怎样去做。

《孔子家语》中也提出“君子有三恕”。“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亲弗能孝，有子而求其报，非恕也；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顺，非恕也。”如果有领导、有君主，不能够侍奉、不能够竭忠尽智，那么有属下、有臣子，而求他能为自己使用，能够竭心尽力地侍奉自己，这就不是恕道了；有父母亲不能够孝敬，有儿女求他们能够有知恩报恩之心，而报答自己的父母养育之恩，这也不是恕道了；有兄长不能恭敬，而有弟弟希望他能顺从自己，这也就不是恕道了。

现在很多人对于自己的儿女关心得无微不至，有求必应，但是对父母却不能够尽心尽力，结果儿女被养成了小公主、小皇帝。没有孝亲感恩的心，做家长的，却不能够反求自己，而责怪孩子没有良好的道德。那么这个孩子为什么没有道德？实际上都是没有良好的教育。教育，并不是我们

现在所说的高等学校这种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而是做人的教育。

《礼记·学记》上说："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的善良不断地增长，过失得以挽救；而这个"育"，在《说文解字》上解释为"养子使做善也"！仅仅把儿子养大，那个不叫"育"，他必须顺着善良的方向去发展，知道孝敬父母，忠于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知道友爱兄弟团结同学，还要培养社会公德，这个才叫"育"。所以现在的孩子没有看到父母长辈的身教，没有从他们身上学会孝敬父母、知恩报恩，那么他们成为小公主、小皇帝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现在很多家长崇洋媚外，孩子也送到西方去求学，以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为荣。这个仔细反省一下都是做父母的身教所影响的。所以《孔子家语》上说，"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把父母亲、老年人都放弃不去照顾，而把所有的关爱放在了儿女的身上，这样的结果就是家庭不吉祥了，败象已露。在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老人备受尊敬？因为中国人是以恩义、道义、情义作为处事的标准。老年人实际上是对社会国家贡献最多的人，下一代之所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都得益于上一代的贡献。人们知恩报恩，所以对老年人特别的尊重。

但是现代为什么老年人越来越不受到重视了？因为我们现在学习西方文化，把功利主义作为处事待人的标准，凡事是以利害的原则进行处理。这件事对我有利有好处，我就会对它全力以赴；这个人对我有利益、有帮助，我就听他的话，甚至极尽谄媚巴结。但是，这个人由利变成害了，那对不起，我可能就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所以老年人虽然对社会国家有过贡献，但是因为他们现在体力智力都衰退了，在很多年轻人看来都成为他们的包袱了，所以对老年人就不尊重了。这是因为我们做人做事的原则改变了。所以我们希望儿女能够孝敬我们，那么我们就应该用心地去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对待老年人，这个才是"恕道"。举这一条，就可以类推一切，能行"恕道"，即"可为仁"。比如我们为人处事，对着人居高临下两眼望青天，眼睛里还露出不屑和轻视，这虽然是小事，但是如果我们被这样对待，就会心生不悦。那么我们从这里就知道，也不

能够去对待别人，不能够以这样轻视傲慢的态度去对待别人。所以《曲礼》开篇就说："毋不敬"。就是告诉我们要有恭敬心，一切恭敬。

下面说"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包咸的注解说，"在邦"为诸侯，"在家"为卿大夫。"在邦"就是仕于诸侯之邦，在诸侯国里做官；"在家"是指士大夫家，也是如此，必须无怨。"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就是无论在哪里做事，都不使人抱怨。这一点也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没有仁德便办不到，即使我们在一个商店里做卖货员，也要尽心尽力把顾客的需要给照顾好，才不至于顾客抱怨我们。总之，要尽到自己的本分，才不会使人抱怨。像我对四川人印象就很好，为什么？四川人即使给别人做小时工也是要尽心尽力，即使要辞职了，在找别的小时工期间，他还是尽心尽力地帮你把这个工作做好，这个社会风俗就是如此。应该说这也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孔子所说的"出门如见大宾"，这两句是引用古时候的成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句也是引用古时候的成语；至于"在邦无怨"这两句是否是古语，则不得而知。但是就前二条而论，可见孔子说话还是以古训为依据，更何况一般的普通学者？言论不能够不谨慎。

子张问明。

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

"子张问明"，这个"明"很不容易，"明"的反义就是迷惑颠倒。如何能"明"？孔子回答说："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愬"和"诉"是同义字，"谮"也是诉的意思；"谮"和"愬"都有谗言的意思，而区别就在"浸润"和"肤受"上。"谮"就犹如"浸润"，"愬"犹如"肤受"。那么什么是"浸润"？什么是"肤受"？我们看郑康成的注解。

他说："谮人之言，如水之浸润，渐以成之。"意思是说，谮言如水，

是渐渐滋润，令人接受而不自知，想说某人坏话不明说，就是“谮”，比如有人问你“某甲如何呀”？你不回答，但是有表情，这个表情就是“谮”。那什么是“肤受”？马融的注解说，“肤受之愬，皮肤外语，非其内实。”“肤受”就是说“愬”者言语不实，没有实际的依据。皇侃的《论语义疏》对“愬者”是这样解释：“愬者，相诉讼谗也，拙相诉者，亦易觉也，若巧相诉害者，亦日日积渐稍进，为如人皮肤之受尘垢，当时不觉，久久方睹不净，故谓能诉害人者，为肤受之诉也。”他认为“肤受”就像皮肤受尘垢一样，当时你没有感觉，但是时间久了，才发现皮肤受尘土多了，受得多了就会往心里走。一开始，是用很轻微的办法说人坏话，比如说有人问你“某甲如何啊”？你不直接说他到底怎么样，只说他不甚可靠，也不说他的坏话，这个就是“愬”。久而久之就往听者心里走了。说好人、坏人都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必须多读书、多办事，经验久了遇事才不会疑惑，而是与别人不一样，一接触就明了。当别人来说“浸润之谮，肤受之愬”的时候，在我们这里就行不通了。

作为领导者必须自己能做主，不能轻易听信谗言。有一首听馋诗，把谗言的危害给我们说得很清楚。这首诗是这样说的，“谗言慎莫听，听之祸殃结”，一定要非常谨慎不可听取谗言，如果你听了谗言，就会与人无端的结下祸殃。“君听臣当诛，父听子当决”，如果当君主的听了谗言，即使是忠臣，也会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就像赵构听了秦桧的谗言，结果把精忠报国的岳飞给诛杀了。当然，凡事都有因果，秦桧害岳飞，他联系当时的御史罗汝楫，制造了这一个历史冤狱。罗汝楫怕得罪秦桧，就和他联起手来陷害岳飞，没有多久他的父母病重，他回去奔丧。结果他父母过世没多久他也死了，他儿子罗愿知道父亲犯了大罪，他做官的时候就非常的谨慎，也做的很不错，做了多年之后，觉得自己为官很清正，这个罪过应该也还得差不多了，他才敢去岳飞的庙里去拜祭，结果在拜祭岳飞的时候，就猝死在当场。这个在正史中都有记载。所以说凡事都有因果，不能够无端的陷害别人，也不能够帮助别人陷害人，说别人的谗言。

“父听子当决”，做父亲的听信了谗言，就是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会

受到诛杀，父子的关系都会决裂；“夫妻听之离，兄弟听之别”，夫妻之间本来很恩爱，结果听信了别人的谗言，结果对对方生起了怀疑之心，本来好好的夫妻也要离婚了；兄弟之间本来是手足关系，骨肉之情，但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也会分家，甚至吵上法庭；“朋友听之疏，骨肉听之绝”，本来朋友两个人关系很好，但是听了别人说朋友的坏话，下一次再看见朋友的时候，就觉得他怪怪的，心里就有不好的想法；骨肉至亲，听了谗言也会决裂；“堂堂八尺躯，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龙泉是古代的宝剑，非常的锋利，古人把谗言比作锋利的宝剑，杀人都不见血。那么作为一个领导者，就要知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自己要有主见。

“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如果有人一遇谮愬就能觉知，使谮愬行不通，这人就是明白人，而且还有远见。作为一个明智的君主，能够分清忠奸、是非、善恶、美丑，这个是很重要的。在《群书治要·刘廙政论》上就说道：“自古以来，当君主的人没有不想得到忠贤之士，而任用他们的。但是得到这些忠贤之后，却又免不了去向众人调查，问问这些忠贤之士究竟如何？但是忠于君主的人，哪里能够事事都有利于他人？如果有一件事得罪了人，没有给人带来利益，那怎么能够让众人都赞叹他？在众人中怎么能够都得到好的名声？”所以做君主的如果自己不贤明，他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忠贤之士。即使得了忠贤之士，忠贤之士来到他的身边辅佐他，他也会怀着一种猜疑之心向众人去调查，结果这些人又不一定都是贤德的人。那么他们对这个忠贤的人，就会有一些偏颇的言论，如果君主听之任之，就可能对忠贤之人产生怀疑，从而不予重用。所以在《体论》上有这样一句话：“使贤者为之，与不肖者议之；使智者虑之，与愚者断之；使修士履之，与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任命了贤德的人去做事，却又让那些不肖之人，不贤德的人去议论他；让有智慧的人来谋划，却又让愚钝的人来决断；让有修为的人去执行某一件事情，却又让邪曲不正的人去怀疑他，这也是君主经常犯的毛病。正是因为这些君主和当领导的人，对于贤德之

人不能用而不疑，经常产生猜虑之心，结果使得贤人的才能不能够得以施展。

在《新序》上也说贤明的人不被重用，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他说："不肖嫉贤，愚者妒智，是贤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岁不合者也。"不贤德的人会嫉妒贤德的人，愚钝的人会妒忌有智慧的人，所以贤明的人就被阻隔，而不能够被君主所重用，所以君主千载也难以碰到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有的是不肯用贤德之士，有的是用了贤德之士，但是不能够持久。有的是用得很久，但是不能够善始善终，还有的是不肖的儿子，把父亲的贤明忠臣给废弃了，这样所导致的灾祸和败亡，难以一一地记录。但是要点在于什么？要点就在于君主自己不够明智，分不清什么是贤德之人，什么是不贤德之人，所以就会一味地听从大家的评论。群臣认为一个人好，他就认为一个人好；群臣对一个人有诽谤，他就认为他不行。所以最后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故譖愬不行，斯为明矣。"如果谗言和毁谤都不能够通行，君主自己能够判断，什么样的人是忠臣，什么样的人是奸臣，这才叫明智。

这段论述也是告诉我们，贤者之所以不被使用，或者用着用着就被废弃了，不能善始善终，终归还是因为君主自己不贤明，分不清是非、善恶、美丑，所以听取了那些邪曲不正的言辞。结果使得谗言、诽谤盛行，使贤德之人被弃不用。

在《桓子新论》上也为我们阐述了，求得了贤能之臣以后，在发挥他们的作用中，还存在着三大难题和两种不能够始终信任贤臣的情况。这三个难题是这样的，在世间做事的人，中等平庸的人才比较多，而有很高才能的人比较少，少不能胜众，一个人不能够和一国之人来辩论，贤能之人虽然有着独特的言论，但是还不敢去冒犯那些众口一词的言论。让他和君主疏远，及低贱的身份去悖逆那些和君主亲近的权贵之士，这是万万不能的，这是第一个难处。

一个人想建立一些殊胜卓越的事业，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但是，这是世俗之人不能够理解、也不能接受的。因此如果领导者使那些明智

的人，去帮他谋划事情，但是又让那些平庸之辈来议论他，那么贤人的这些见解和主张，一定不能够被这些平庸之人所理解，这是第二种难处。

领导者听取了贤才的进谏，按照他的谏言来施行，但是事情还没有做完，谗毁的人就随着来诽谤他、厌恶他，结果领导者在中途就怀疑贤德之人，对他有了猜疑之心，进献善言的人反而受到怪罪，这是第三种难处。

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不能始终信任贤才的情况。有智慧的人竭心尽力的向国君进言，想为国家造福，但是众人离间他，结果他就被国君所怀疑。如果他有一番言论，不符合君主的意思或者不恰当，那就会被这些人谗毁诽谤，即使他有十件善事，就因为有一个小小的过恶，最终被罢免了，这是第一种使贤佐不能够善始善终的原因。

有才能的人，都被世间的人所嫉妒，只有他遇到了明智的君主，才能够被提拔重用，做一番大事。结果君主有幸得到了贤能的人才，又和众人去商议，不让他参与、不让他知晓，即使是孔子这样贤德的人，也会离去，这是第二种使贤佐难以善始善终的原因。你看，古人对于贤才不能够始终被君主所信任的原因，都分析的很清楚，很透彻，也值得我们现代人所借鉴。

《说苑》上记载着齐桓公，向管仲请教的故事。桓公说："我想把我的酒放在酒杯里放到腐烂，把肉放在砧板上也放到腐烂，这样的事会不会对我的称霸有妨碍？"管仲说："这些事固然不是什么高贵的值得崇尚的行为，但是并不妨碍你称霸。"什么事才妨碍称霸？他说："不知贤，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也。"他说了五种妨害称霸天下的事情，都是和任用贤德有关系。

第一是不知贤，"不知"就是不知道天下有贤才之士，不知道天下有哪些人是属于贤德的人。像《孔子家语》上说，在古代，圣明的君主都尽知天下贤德之士的姓名，而且发现他们如果真正是有真才实德的人，一定会委以重任，会不遗漏贤才。不能够分辨天下的贤德之士，这是妨害称

霸的；知道了这个人是贤德之士，但是你不重用他，这也是妨害称霸的；你重用了他，但是不给他任命一个适当的官职，没有给他名正言顺的位置，这也是妨害称霸的；你任用了他，也委以重任了，但是你还不相信他，这是妨害称霸的；信任了他之后让他去做事，但是还用小人来干预他，这也是妨害称霸的事。这五种妨害称霸的事，都和不能够知人善任，用而不疑有关系。

《刘廙政论》上有一段话说："君主或者说领导者，之所以尊敬人臣、尊重属下，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任用了臣子并且对他信任，然后把重要的事都托付他，他能够把这些事一一处理好，就能够帮助自己治理国家获得太平。如果领导者很多疑，自己亲自去做事，结果他的臣子就不再思考怎么样可以治国，而去思考什么了呢？而去思虑怎么样可以得到君主的欢心，臣子们一心一意就在谋划这些事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们都在琢磨人，而不是在琢磨事。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君主对于他任用的臣子有所怀疑，他想事必躬亲，不想真正让臣子放手去做，反而给予了过多的干预。结果臣子也都比较聪明，他就不想怎么把事做好，因为做得太好，君主、领导还会嫉妒他、担心他。所以他们就想方设法地去投君主所好，君主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君主爱好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样领导者就对他没有什么疑虑和防范了。"

在《傅子》上也这样说："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难，故虚心而下听，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从前，人们都知道身居高位，比如说君主，他要想了解世间的人就特别地困难。那怎么办？他就要去虚心听取众人的意见。"知在下相接之易"，知道下面的人，相互交往比较容易，也比较频繁，所以凭借着下属来招致更多的贤人，后来他还举了两个例子："舜举荐皋陶难，得皋陶致天下之士易；汤之举伊尹难，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比如说舜举荐皋陶的时候，能够发现他，把他举荐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得到了皋陶之后，再通过皋陶来招致天下的贤德之士，就比较容易了。商汤举荐了伊尹，想让他出来做官也很难，但是得到伊尹之后，通过伊尹再来招致天下的贤士也就很容易了。所以后面他接着说：

“故举一人而听之者，王道也；举二人而听之者，霸道也；举三人而听之者，仅存之道也。”你举荐一个人，对他非常的信任，对他言听计从，这是称王天下之道。当然这个贤人确实是像伊尹、像管仲、像皋陶这样又有德行又有才能的人，你举荐出来这样的人，对他很信任，这是称王天下之道；如果你举荐了两个人，分别听从他们两个人的建议，这是因为对他们不能够完全信任，还有所怀疑，这只是称霸天下之道；“举三人而听之者，仅存之道也”，举荐了三个人，来听他们各自的意见，最后可能就是在三岔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那是仅仅保持自己不灭亡之道。

这一句话也是告诉我们用人不疑，能够对人委以重任，用而不疑，才是取得最好成就的途径。那么这个和我们学习要一门深入，也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处。像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古代的人都讲求师承，只是跟着一个老师学，如果你对这个老师特别地信任、特别的认可，那么你跟着他学就是一条路。如果你对他半信半疑，还去想和别的老师再学习，两个老师就是十字路口，三个老师就是三岔路口，你不知道该听谁的对了，所以这个师承很重要。坚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才是有效的方法。

《典语》上把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关系，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夫君称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与人主一体者也。”古代的君臣关系是什么样的呢？和现在企业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完全不一样，古代的人把君主，称为“大脑”，把臣子称为腿和胳膊，也就是四肢，这就表明大臣和君主是一体的关系，像一个身体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互相配合、互相信任。

“尧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强四支而辅体也。其为己用，岂细也哉。”尧帝能明了辨别德才兼备的人，并且让德才兼备的人去担任官位。他强健了四肢，也就能够辅助他的身体，对自己的帮助，怎么会小？

“苟非其选，器不虚假；苟得其人，委之无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击身；安则共乐，痛则同忧。”如果一个人不符合选拔的标准，不是合适的人才，就不要白白地授予他官位，如果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德才兼备的人才，那就任用他没有怀疑。君主任用臣子，就像身体信任自己的手一样，臣子侍奉他的君主，也就像这个手触摸他的

身体一般。什么样的？“安则共乐，痛则同忧。”他们是同甘苦，共患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才是一体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所以怎么能够互相怀疑？这就表明了君主和大臣的关系，应该是像头脑和四肢的关系一样，应该互相信任，而且没有任何的疑虑之心。所以《孟子》上也说：“左右皆曰可用，国人皆曰可用，然后察之。”那么要杀人要判人罪也是要如此，大家都说他有罪都说他该杀，你就要认真去调查，是不是事实如此。那么这句话就是讲“不听谗言”，才是明智、才是有远见。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来问政治，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也是讲了三件事：孔子答复粮食要充足，兵力要充足，要取信于民。“兵”原来是指武器而言，“兵”并不是指人，打仗的是士，士执兵。我们说士兵，士是指执武器的人，兵是指兵器，后来持用武器的人也叫做兵了，这里边所说的“兵”含有国防的意思。首先国家必须有吃的，食要紧，“民以食为天”。《礼记·王制》上就说：“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意思是说，国家如果没有九年的积蓄，就是能够使百姓吃九年的粮食，这称为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没有够百姓吃六年的粮食，这个被称为急；如果没有足够供养百姓吃三年的粮食，这个国就不称其为国家了。

在《荀子·富国篇》上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也就是说“足食”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国家能够节俭用度，有了多的就积蓄起来，这样储藏粮食以备凶荒。食足之后还必须预备好兵器，预备好武器，那怎么会没有执兵的士？足食之后百姓才能足，百姓就是士。而在古代社会老百姓都要去服兵役，老百姓能够吃足、用足，那自然也就不缺少作战的士了。“民信之矣”，国家必须首先让百姓生起信心，办政治才能

够成功。

我们今天虽然是“足食”，但吃的就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饮苦食毒”，也不能称为足食。特别是现代转基因的技术被应用到食品上，也给人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现在还可以说是足兵，但是对于“信”却很缺乏。像我们看子贱去治理单父，巫马期去调查 ，结果趁着夜色来到了单父，一个百姓在夜色下捕鱼，捕到了很多鱼看了一看，又把它放回到河里去了。巫马期很奇怪，就上去问，说：“我看您捕鱼，为什么捕了一些鱼，又把它们给放回去了？”这个百姓就说了：“我所捕到的鱼，是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而我们的长官子贱提醒过我们，不要去捕杀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巫马期听了很感慨，回来向孔子禀告。孔子就说：“子贱曾经说过，用至诚之心对待身边的人和事，这种影响自然会波及到远方。”子贱就是把这种至诚之心，运用到管理之中了。所以正是因为子贱“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所以他赢得了百姓的信任，他每发布一个政令，每制定一个制度，老百姓都愿意支持、愿意拥护。他做到了即使在无人监管的时候，也像严刑峻法就在身边一样，他达到了不忍欺的最高管理境界。他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因为人民信任他们的父母官。如果百姓不信任政府，很大的程度是有一些为官者鱼肉百姓，没有把这个官位作为为百姓谋福利的工具，而是把它成为自私自利的资本。那么所制定的制度政策，可能是为了自己个人利益，或者是小集团的利益而着想，老百姓也不愿意去配合。所以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那么怎么样改变这种状况？办政治就必须用读书人。用读什么书的人？读圣贤书的人。他们能够身体力行圣贤教诲，而且能够大力弘扬宣传传统文化、传统美德，整个社会兴起仁义、道义、恩义的处事方式，这样才能够避免政府失信于人的现象。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贡说，若到不得已处可去一条，三者要先去除哪一条？孔子说去“兵”。三条都不能去，但是不得已时去“兵”，没武器还行，揭竿而起，拿石头木棍也能拼命。就像抗日战争的时候，虽然我们的武器不如日本人先进，但是小米加步枪，也能够取

得胜利。这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民能够团结起来，一致抗敌，是真正的道义之师。“得人心者，得天下”。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子贡又说，其余两条，遇到有办不到时，两条中再去哪一条？孔子说去食。为什么去食，去食不是饿死了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所以孔子不必等子贡去问，自己就先为他说了：因为自古皆有死，不足为患。有食物吃也得死；打仗时有食物吃也得死；太平的时候，父不父，子不子，人伦关系紊乱了，虽然有粮食，不得而食之，有钱有势也得死。但是“民信”不能去。百姓对国家的信仰不能去，去了就亡国。只要人民信赖政府，虽无足食，仍可与国家共患难；如果去了民信，纵无外患，也有内乱，则国家不能安立，所以说民无信不立。就像一个家即使家中有钱，有足够的粮食吃，如果家中的兄弟姐妹都不和，也会败家，这是一个道理。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对曰：“盍彻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年饥就是谷物收成不好，鲁哀公因为年成不好，费用不足，便问有若，应该怎么办？他是鲁国的国君，又有封地，为什么还这么说？因为当时鲁君的封地，都被三家给取走了。有若对曰：“盍彻乎？”依据郑康成的解释，“彻”是周朝的税法，规定农民缴十分之一的税，这也是天下的通法。皇侃的《论语义疏》引《孟子·滕文公篇》说：夏朝用贡法，殷朝用助法，周朝用彻法，其实都是十分之一的税法，但是法久则弊。

在井田之中，好的土地大家都要，不好的才留给国家，所以除井田外，另外再加一分的税，这个就是“二”。鲁国自宣公十五年改变了税制，征税十分之二，所以孔子作《春秋》，把这一段就记了下来，认为不合礼。

这种税制直到哀公的时候也没有改变。有若怎么回答的？他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有若建议鲁哀公恢复彻法，所以哀公说"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意思是征十分之二的税，犹感觉到费用不足，怎么能恢复到十分之一的税制？又去一半，就更不足了。有若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姚鼐《惜抱轩经》说："与，犹谓也。"古人语多如此。"君孰与不足"就是君孰谓不足的意思。有若言百姓足，即当谓之君足，君用小乏，亦不害其可谓足也，改变税法，税收反而减少，有若何尝不知？但是鲁君税收大部分，是由季氏等三家大夫中饱私囊。鲁君，也就是当时的哀公，因为政权被三家把持，有一肚子的牢骚，所以求享受，活一天就享受一天，这是糊涂。他不懂道，没有办法给他讲。其实人的福都是有一定的，福享尽了享完了就受苦，寿与禄也都是一定的，但是鲁哀公他不懂得这个道理，也没有办法给他讲得太明白。当时的这种积弊不除，纵然向农民征收再多的税，鲁哀公的收入也增加不多，还是不够用，徒使民众更加贫困而已。与其说两无实益，不如减税。所以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皇侃的《论语义疏》引江熙说："为家者，与一家俱足，乃可谓足。岂可足一己而谓之足也。"就是说能够统领一家的人，要和一家的人都富足，才可称得上是足。如果只是满足一己之私欲，怎么能称得上是足？像中国古人，有这种家族的观念，他去奋斗、去努力、去工作，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这个家庭，老的时候有家庭来养老，所以他感觉到很安心，老的时候也无后顾之忧。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为家庭做贡献，富裕的就可以去救济贫穷的，贫穷的不用担心自己的收入不够、孩子上不了学、吃穿都不够用，所以人人都身心安稳，这是一个家庭式的方式。现代这种血缘家族没有了，现在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公司、单位、集体之中。只要我们把这种道义推而广之，来经营我们的公司、单位和集体。实际上我们就把这一个集体、企业、单位变成了一个和睦的大家族，人人都是为了单位而奋斗，单位负责养老育幼，这样，传统的文化精神仍然可以传承。以古代

的家族之所以能够传承，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道义的集合。如果没有了教育，兄弟之间也会起纷争，所以关键并不是在于血缘，而是在于教育。人们接受教育都以道义相处，这个事情才能够办得好。

子张问崇德辨惑。

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即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吴嘉宾说：“克己复礼，崇德辨惑，皆古之言也。”从这里可以看到“崇德辨惑”也是古时的成语，“崇”当“高”字讲，“崇德”就是崇高其德行，“辨惑”就是辨别疑惑。如果遇事迷惑颠倒，拿不定主意，就要辨别的清清楚楚。子张问这两条，孔子分别答复，先说崇德。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一要以忠信为主；“忠”，就是忠诚；“信”，就是信实，不弄虚作假，不欺骗人，不说瞎话，这就是忠信。如果口犯妄语、恶口、两舌、绮语，这就是不忠信了。懂忠信才是有德。在郑康成《学而篇》的注云：“主，亲也。”这个“主”有两种解法：前面是以忠信为主。郑康成的注解：“是亲”的意思，意思是对于忠信之人，应该亲近，这是讲主忠信。另一条就是要“徙义”，“徙”是迁徙的意思；“义”当“宜”字讲，和适宜的宜是相通的。合理者、合宜者为“义”，不合理者、不合宜者就是不义。如果你所办的事情不合理，马上改过来照合理的办，这就是徙义。照合理的办，这就是有德了。

再说“辨惑”，孔子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惑起于人心之谜，难以解释。孔子在这里举了一个事例加以说明，比如喜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即欲其生”；后来对他厌恶的时候，对他恨的不得了，甚至希望他死；对于一个人“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这是单凭爱恶而没有一定的主意，这就是惑，就是迷惑颠倒。说明一个人没有辨明决断的智慧。

子曰：“听讼，吾犹人。必也，使无讼乎！”

“吾犹人也”，在通行本上，有这个“也”，在《群书治要》本上，就是“听讼，吾犹人”。孔子听讼和别人没有什么差别，也就是听取双方所讼之辞，来判定谁是谁非，谁曲谁直。但是他和别人不同，就是使人无讼。“必也”这两个字很重要，就是一定要使人不再起争讼，不去诉讼，就是叫有争讼的人，官司也不打了。

在舜的时候皋陶制定五刑，《书经》上记载说“刑期无刑”，就是他制定刑罚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去惩罚人，而是希望人们有戒慎恐惧之心，而不再去触犯刑罚。所以在尧舜的时候没有犯人，狱中长草，囹圄空虚。到周文王的时候，他在做西伯时，有虞、芮两国的国君，因为田产来争执，到了周家请他去评理。但是到了周文王治理的地方，看到无论是农人、行人、还是士大夫，无不是谦逊礼让，看到这种情景，虞芮两国的国君就惭愧地回去了。把所争之田让为闲田，这就是以德化人使其无讼的历史证明。

孔子为什么能使人们无讼？使人无讼，就是以德化人。比如说《为政篇》所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能无讼的人就是国家在足食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实行教化，进行道德教育，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教育，百姓犯法就给予处罚，这就叫不教而杀。孔子把这称为“虐政”。

我们可能疑惑：西方人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强调道德教育，他们仅仅就靠制度不就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了吗？也没有出现像我们国家所出现的贪污腐败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等等，所以我们只要把西方的制度搬过来，这些社会问题就能得以解决了。这个观点在现在社会普遍流行，实际上这个观点，也有偏颇之处，偏颇之处就在于他忽视了西方的民主法治得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从西方的历史上看，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的传统，比如说我们到国外去旅游，西方人带我们去看最多的地方，那就是教堂。这是他们的历史遗迹。这说明宗教文化在西方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们的制度之所以能够得

力，是因为长期的宗教教育培养了人内心的自律，如果没有这种内心的自律，这个制度仍然不会起作用。

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我们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制度建设的一面，误以为只要把西方的政治制度搬过来，那我们这些社会问题就得以解决了，但是实际上却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什么叫异体移植？就是这个制度在西方国家，能够实行的很好很有效果。但是一搬到中国来，就会出现水土不服，原因就在于公民的道德素质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也就是我们没有像西方历史上的宗教教育。

在中国的历史上，道德教育是靠儒释道三家来共同推行的。儒释道三家讲的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因果教育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皆报”，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所以他取代了宗教教育，使人们不敢去做恶。西方的很多人也在研究，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像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样的宗教教育。但是中国人却很有伦理道德的底线，为人谦恭有礼，就是因为因果教育取代了宗教教育。因为上帝是一个真正公正的人。在人临终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根据这个人一生中所做的善恶之事，判定他去天堂还是地狱。中国人直接讲因果，就直接告诉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更直接、更彻底。“五四运动”和“十年文革”之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使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断层了，甚至被认为是迷信，结果这种观念，这种教育缺失了，最后导致的是无法无天。既不相信世间的法律，也不相信天理。因为世间的法律法治监督机制不健全，人们通过行贿受贿就可以逃过法网法律的处罚。

“无天”就是不相信天理，这个天理之一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结果，人就无恶不作了。所以，在西方有一个著名的美德伦理学家叫麦金太尔，他写了两本书非常的著名：第一本书叫《追寻美德》，在这本书中他说道：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意思是无论美德与法律之间在其他方面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他仅仅对那些拥有

正义和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公平正义的制度必须得有公平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如果这个人自私自利，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小部门小集体的利益，他不可能制定出公平正义的制度，即使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出来了，在推行的过程中，也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把他实施到位。这一点，其实早在《荀子》上就有类似的说法。他说："礼法制度不能孤立的存在，有了圣明的君主，礼法制度才会存在。失去了圣明的君主，礼法制度也就随之消亡。"这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道理。道、礼法制度虽然很好，能够对你的人生、对社会的和谐有所帮助，但是你不去学习，也不信任，把它束之高阁，甚至还批判它是迷信、是封建、是落后，那它对你的幸福人生，和谐社会的建设也起不了任何的作用。所以这个法，是治理国家的凭依。而古人所说的圣贤君子，就是法治的本源，他们才是制定法律制度的人，所以有了贤人君子，法律即使简略，也能够使国家得到普遍的治理。

如果没有圣贤君子，法律即使很完备，也会使国家混乱。所以圣明的君王迫切想得到的是治国的贤才君子，得到了这样的人，自身就可以很安逸，而国家也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理，功绩伟大而名声美好。如果不能得到治国的人才，就会自身劳苦而国家混乱，功业败坏而声名狼藉。无论是对一个国家而言，还是对一个单位集体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够得到德才兼备、责任感强的人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道德教育培养具有道德素质的人，特别是领导者，才是社会治乱的根本。

在《群书治要·傅子》上也有一句类似的话，这句话对于我们看清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制度建设和人，也就是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有启发和帮助。因为反腐倡廉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到底制度是重要的，还是人更重要，哪个是根本。这古语说："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意思是说，贤明的领导者必须通过推行好的制度才能达到社会安定。换一句话说：好的制度当然很重要。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各个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制度上的改革，这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但是古人同时也看到，并不

是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够实现大治。还必须有贤德的人去推行好的制度。正如在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曲阜的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后这样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从这一段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重视人的道德教育，如果仅仅关注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而忽视了对人的道德教育，就会有三个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

第一、是难以防患于未然。在《大戴礼记·礼察篇》上有这样一段话：“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一般人的智慧，能够看到已经产生的，已经出现的现象或者结果，但是不能够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礼恰恰是能够防患于未然；而法是等消极结果已经产生了，才给以事后的补救，事后的制裁。所以法的作用容易被发现，容易被理解，容易被看见。但是礼，它所起到的作用却不是一般人所能洞察的。

关于礼和法防患于未然的效果，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效果和西医的效果，来加以对比说明。

在历史上有著名的神医叫扁鹊，他有两个哥哥也都是医生。有一次魏文侯就把他们请来问：“我听说你的三个兄弟都是医生，究竟哪一个人医术最高明？”扁鹊回答说：“是我的大哥医术最高明。因为他给人讲养身之道，按照自然节律去饮食起居，所以这个人基本上可以不得病，但是他的名声出不了这个人的家里；我的二哥医术其次，他在病人有小小征兆的时候，就可以发现给以对治，所以这个人也不会得什么大病，但是他的名声出不了病人所居住的这一条街；我医术最差，但是我的名声却传遍了整个的诸侯国。因为我是等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不得不采取一些大

的手段、大的动作，比如说钳开他的血脉，给他进行针灸，再喝上一些有副作用的汤药，结果三下五除二把他从死亡线上拽回来了。大家一看都佩服得不得了，说扁鹊可以妙手回春，起死复生，所以我的医术最差，但是我的名声却传遍了整个诸侯国”。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现在西医的影响超过了中医，为什么西方管理方式、管理理念的影响超过了中国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因为一般人的智慧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已经产生的影响，而看不到防范于未然的效果，是礼的第一个作用。

第二就是如果我们忽视了道德教育，而只是重视制度建设，就会导致民免而无耻。孔子在《论语》上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我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政令条款，人们只要触犯了这些政令条款，就给他以刑罚的处罚。结果是人们因为惧怕处罚，不敢去做坏事，或者他仍然想方设法的做坏事，躲过法律的制裁，但是却没有羞耻心，甚至还认为这是自己聪明智慧的结果而沾沾自喜。在西方社会这些现象就很普遍，比如说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这个反社会行为，在西方被称为“Antisocial behavior”。也就是没有触犯法律的、不道德的行为。比如说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青少年以强凌弱等等。青少年犯罪的年龄越来越小，青少年犯罪率也是不断攀升，成人离婚率也不断攀升，这些问题也都是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我们中国，这几年也经常听说这样的现象：说这个孩子才十三四岁，但是都已经有堕胎的行为了，影响了自己的健康，也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这些现象只靠法律监督机制是无能为力的。

第三个问题，如果我们只是专注于制度的建设，而忽视了人的道德教育，就会导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现象。有一次我们去开国际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有一个西方的学者，她还是一位女士，就站起身来用非常讽刺的口吻说：你们中国人千万不要盲目地向西方人学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西方国家，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理想。恰恰相反，还出现了你们几千年前，老子所描述的情形，就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也就

是我们的法令条款一天天更具体、更细致、更严密，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食品安全有问题了，就有食品安全法。各种各样的现象出现了，就有相应的法规来惩罚、来防范，但是违法乱纪的人钻法律空子的人，并没有减少。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现代以来很多人宣称上帝死了，很多人认为宗教是迷信，不再信仰上帝了。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越来越排斥宗教信仰，但是他们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公平正义为核心，来进行制度安排的，所以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所以法律监督机制很严密，人一犯罪确实可以把他关进监狱，但是如果缺少了道德教育，人们在监狱里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他们一旦被放回到社会，仍然会为害人群，所以并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在我们现代社会还出现了人们不以进监狱为耻，反以为荣的现象。据说人们到监狱之后，都在交流什么问题，他们就这样问？你第几次进监狱了，这人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是第一次。结果对方一听就说你才是第一次，我已经是第三次了。说起来就很骄傲很得意，还以进监狱多沾沾自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现在的警察还执法犯法，帮助犯人来做一些事情，来以此受贿、得好处，所以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政府不得不拿着大量纳税者的钱去建设监狱，因为旧的监狱已经住满了。所以有人说如果我们不好好地把学校办好，把教育办好，那我们就要拿着大量的钱去建设监狱。这些问题确实是触目惊心。所以从这里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到底什么是本，什么是末？

《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上也说："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就是说你不能制止人们作恶的心，只是以刀锯刑罚制止人的行为，就是每一天都在执行惩罚，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屡屡发生。在麦金太尔的另一部重要的著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他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是谁之正义呢？缺少主体性，所以他说伦理学的任务，不应该是制定正义的制度和规则，而应该是回复到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把对人的美德培养，恢复到核心的地位。由此可见社会

和谐与否，国家能否治理好，反腐倡廉能不能起到效果，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也就是总书记所说的“国无德不立”，要有德，必须进行道德教育。现在我们很重视对领导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但是好的领导不是一下子就能够产生的，必须有一个长期教育的熏陶过程，才能使人成为有道德的人。所以，必须靠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配合，才能培养出好的有德行的领导干部。

在《群书治要·淮南子》上说到：“不知礼义，不可以刑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这段话就是说明：靠法律和制度建设可以把不孝的人判处死刑。古代的人说，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如果一个人打骂父母，打骂祖父母，按照法律都应该是被斩首的。虽然法律能把不孝的人判处死刑，但是培养不出像孔子、曾子那样高尚的德行。曾子对父母很孝敬，所以他外出，家里来了人，他的母亲灵机一动，怎么能让曾子知道？她就把自己的手指头咬破了，结果曾子心里就感到一阵疼痛。母子连心，他知道母亲有事了，赶紧往家跑。结果回到家里一看没有什么事，只是因为家里来了朋友，母亲希望他知道让他回来。所以你看曾子，他有这种至诚的孝心，所以能够感到他母亲身体的变化。那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感受不到了？听起来，这样的故事像天方夜谭了，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和父母在一起，没有在心里处处挂念着父母，所以即使我们的父母手指头都咬破了，他可能还是无动于衷，什么原因，心思不在父母身上了。心思在财色名利上面了，这颗心就不真诚、不觉悟、不敏锐了。所以古人把这个“忙”字写得很有味道，是一个竖心旁加一个亡字，告诉我们什么叫忙，就是我们的心已经不觉悟了、不敏锐了，观察不到周围人的需要了，甚至连父母亲的感受需要都感觉不到了。

在母亲节的时候，有一些记者就去采访了很多成功人士，企业家、领导干部等等。就问说，“你认为孝敬母亲最好的方式是什么？”结果这些

人就开始夸夸其谈：我要让我的父母过上好的生活，住上大房子，坐上豪华轿车。结果这些记者又去采访了这些儿子的母亲，“您认为儿子孝敬您最好的方式是什么？”结果这些母亲都无一例外地这样说：“唉！我也不希望住什么大房子，坐什么豪华轿车，我只希望我的儿子有时间多回家看看，陪我聊聊天、唠唠家常就够了。”所以你看我们因为自己的私利而奔忙，为了名利而朝九晚五地去工作，对于父母的感受已经体察不到了。当然，如果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去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为国尽忠，这是他父母所期望的，这是更高层次的孝，这是大孝。但是一个人有时间和朋友去应酬，但是却没有时间去看望父母，这就是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而奔忙了，这不是为国家尽忠。

法律可以把不孝的人给杀掉，但是培养不出孔子、曾子那样高尚的德行；法律也可以把偷盗的人给以刑罚的处分，但是培养不出像伯夷那样廉洁的节操。伯夷是商朝人，后来周朝灭了商朝，他不愿意吃周朝的粮食，最后饿死在山里。他这样廉洁的节操，也不是靠刑罚、惩罚得出来的。再比如孔子培养的徒弟有三千多人，其中有贤达的七十二个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这就是靠教育所成就的。

前几年在安徽省庐江县汤池镇，举办了庐江文化教育中心，用传统文化来教育村民，结果短短的时间，就使民风大为改善，影响了很多来参观学习的人。凡是在庐江学习过的人，都能够因那里面的老师身体力行传统美德的作风，而深深地感动。这里边的每一位老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感染着，教育着来学习的人。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这一点？这不是靠法律，不是靠监督机制、惩罚机制、激励机制，而是靠教育所成就的。

什么教育？就是圣贤教育，是我们千百年来的中华文化，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所以他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成为社会大众的表率，现在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各个地方兴办传统文化的公益论坛，带动这一方学习传统文化。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就做出好的示范和榜样，这就是告诉我们，教育确实能够培养出圣贤君子。

在《群书治要·盐铁论》中也说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这就是给我们讲到了法律的局限性。他能够给人以刑罚的处分，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廉洁的节操；能够杀人，培养不出一个仁慈博爱的人。在《群书治要·史记》上也有这样的记载：汉朝兴起之后，去掉了“棱角”而力求“婉转”。什么叫“棱角”？就是秦朝的严刑峻法。我们从历史上也知道，秦朝虽然得了天下，但是因为他靠着严刑峻法来治国，积累的是民怨，结果二世而亡。力求“婉转”是兴起了伦理道德的教育，免去了繁文缛节而提倡质朴，法网宽疏得可以漏掉能吞噬船只的大鱼。这就是说当时的法网很疏忽，很粗疏，甚至有很多的漏洞。即便如此，但是因为他们兴起了伦理道德的教育，结果吏治蒸蒸日上，谁也不敢为非作歹，百姓和美安乐。所以得出结论说：治理国家重要的是道德的引导，而不在于刑罚的严酷。

在《论语》上，孔子也强调“不教而杀，谓之虐”。也就是说在位者如果没有教导人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人们因为缺少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不知道做人的本分和责任，而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就被处以死刑。这种政治，就被称为虐政。

在《群书治要·汉书》上也说，用礼义治国者，积累的就是礼义；用刑罚治理国家的人，积累的就是刑罚。刑罚用得多了人民就会怨恨背叛；礼义用得多了人民就和睦亲爱。各个朝代的君主都想让人们德行美好，这个愿望是相同的。但是他们用来使人们德行美好的方法和手段却不相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来引导，有的是用法令来驱使。用道德教化引导的，德教和谐时人民的精神状态就表现出欢乐；而用法令来驱使的，法令严酷而民风就呈现出哀怨。这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一味地用严刑峻法，来惩治贪官污吏，忽视了道德教育，结果可能是人心的背离和民风的哀怨。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西方的文化传统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一种宗教文化，而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圣贤文化。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等的形式，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作为官

吏的候补。并且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都落实了“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也就是谁能为国家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这样的人就受到最高的奖赏；如果嫉贤妒能，他手下有人才都被埋没了，受到国家最高的惩罚。这样的制度一实施，就保证了人们愿意把德才兼备的人推荐出来作为官吏。有德有才的人居于领导的地位，这样社会想不和谐都很难。这种政治制度在设计的时候，既关注了公平正义同时，也注重了仁慈博爱的道德情感的培养。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不是民主政治。他理想的政治制度是高于民主制度的圣贤政治。在这种政治制度中，所有的制度建设和改革都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为一个好人，如何把好人选拔在领导位置上来设计的。这样政治制度的结果是什么？

在《六韬》上这样表述圣贤政治制度的结果：“政令宽和公平，官吏不苛刻；节制赋税，减轻人民负担；领导者个人生活俭朴不奢华，不以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法律；赏赐不会加于无功之人，刑罚不会施加给无罪之人；危害人民的人有罪，对国家荐举贤才的人，有利人民的人，会受到奖赏。后宫不乱政，不听妇人之言；上面的领导者不会做见不得人的事，下面没有阴谋加害之人；不供应宫室额外开支，不过多游玩而影响民众安乐，不追求珍玩佚乐；做官者没有腐败蛀虫之类的人隐藏，国家没有流离饥饿的人民。”这就是圣贤政治所达到的状态，是能够达到“高于不敢欺和不能欺”的“不忍欺”的理想状态。

子贱治理单父就达到了“不忍欺”。人们即使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也能够做到就像严刑峻法就在身边监督一样。因为他起到了君亲师的作用，既领导管理百姓，又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更重要的是他还给人们以伦理道德的教育，把孔子仁爱忠恕的理念，都运用到管理之中了，最后老百姓不忍心欺骗他们的长官。所以中国古人的观念，是一种宇宙一体的观念，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人与自然、都是一体的，而不是对立的观念。在对立的观念之下，所设计的制度是如何管人、惩罚人、压制人、监督人，但是在一体的观念之下，制度的设计是如何去帮助人、关爱人、

提升人。人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动物，也是感性的动物，感化才能够真正的解决矛盾、化解冲突。

废弃圣贤政治不用的结果，在《群书治要·六韬》上也有所说明。这段话很有味道："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世俗、社会大众所称道的人当作是贤德的人，把世俗社会大众所诋毁的人当作是不贤德的人。结果就会使党羽多的人被提拔，不结党的人被排挤，这样奸邪势力就会结党营私，而把真正贤德的人给埋没了。忠臣无罪却被置于死地，邪臣用虚名取得爵位，所以社会更加混乱，国家也就难免陷于危亡的局势了。这段话其实也是给我们说了，民主选举所可能导致的弊端。因为如果社会大众的道德素质，理性能力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就像我们在村干部的基层选举中，谁送给我的礼多我就去选谁，谁送给我的礼物投我所好，我就去投谁的票。最终选出的结果，很可能是不好的结果。所以在某些地方，黑社会的老大也都被选为村支书了。所以这一段话也就提醒我们，如果社会大众的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采取民主政治的后果看，可能更加不堪设想。

所以说无论是圣贤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是以一定的公民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为基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果忽视了人的道德素质的提高，而仅仅关注民主制度的推行，甚至想把西方的民主制搬到中国，那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由于人的良心泯灭，而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这一段阐述就是给我们讲孔子"必也使无讼乎"。为什么使人无讼，重要的是要兴起伦理道德的教育，如果仅仅关注法律监督机制的严苛，而忽视了道德教育，会有很多社会问题难以解决的。《礼记·学记》上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立一个国家、领导一国的老百姓，什么是最重要的？教育是最重要的。所以古人治理国家，把道德教育看得很重要。而今日我们看到在网络上电视上，经常爆出很多的新闻，伦理关系紊乱，矛盾冲突

不断，人心惶惶无依。整个社会无论是贫富贵贱，都是在积极地妄求。什么原因？根本原因就是西方忽视了宗教教育，而东方忽视了圣贤教育，这才是社会问题所产生的根本。所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弘扬中华文化，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可以在全国挑选一些真正通达中华传统伦理道德而且品行兼优的老师，在电视台、网络广播等各类媒体上，宣讲中华伦理道德的精神，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五伦八德。教导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任何一个人，只要是作一个好人，都必须把五伦关系处理好。这五伦关系处理好，社会上很多乱象就不存在了，人伦关系就理顺了。八德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朱熹所概括的。另一种是孙中山先生所概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把这两种八德的说法归纳一下，重复的去掉，得出十二个字。那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我们用这些伦理道德来教育人们，当然首先是领导者和教育者要受教育，人们有了这些伦理道德观念，知道了是非善恶美丑标准，就会羞于作恶，耻于作恶，同时配以因果教育，使“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深入人心，让人不敢作恶。

第二，要真正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选拔标准。无论是党员入党还是领导干部的的选拔，首要的的条件就是孝廉。因为一个人孝，才有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意识，会以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事原则来处事，不会忘恩负义、见利忘义。所以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廉”就是廉洁不贪，这样才能把德才兼备的领导者选拔出来，脱颖而出。

第三，国民教育和党校课程，当以五伦八德的道德教育作为主修课或必修课，也就是起到长善救失的作用。古人说“教”是使人的善良不断增长，过失得以挽救，所以学校教育必须承担起长善救失的责任。随着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德行越提高、善良越增长、过失越挽救，这样才不

至于出现大学生的道德素质还不如小学生的现状。还要以《国学治要》、《群书治要》作为治学、治国的必读课本。《国学治要》作为治学的课本很好,《群书治要》奠定了贞观之治的理论基础,这本书所总结的治国理念具有普遍的意义。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依然适用,这是恒常不变的规律。“上行而下效”,国家领导人要率先参加并且身体力行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为社会大众做出榜样示范,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习总书记做得特别好。像今天的新闻还说习总书记在元旦前夕,专门去养老院关爱老人,尊老敬老这是我们传统美德。总书记他就能够身体力行,为全国形成尊老敬老的传统做了一个表率,所以上行下效的力量是很强的。国家领导人必须首先学习传统伦理道德,身体力行传统美德。

第四,办试验点、办特区是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方面也可以选择一个小镇、社区、学校、企业等等,作为落实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试验区,将它的试验成果向全国乃至全球普遍宣扬。像我们刚才所讲安徽省庐江县的汤池镇,他们的办班教学就取得了成功的效果。他们的教学经验还引起了国际瞩目,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大使都曾纷纷想来参观学习。此外,像海南省监狱管理局、吉林市松花江中学、北京汇通汇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等等,还有在河北高碑店的新华新锅炉制造有限公司,都在加强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来自学校、企业乃至监狱的成功案例,让我们更加坚信:唯有恢复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古注引《春秋谷梁》隐公元年传《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助人成就善事,不助人成就恶事,谁办好事就帮助他。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随喜功德”,随喜功德很大,就像以烛火相施,你用自己的蜡烛点燃了别人的蜡烛,这样,越多人点这个烛火就越亮。谁有好事、谁做好

事，必须帮助他、成就他，让他成为好人，这是成就君子。君子才能够成就君子，小人只能帮助小人。“观友而知其人”，也就是观看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就知道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了。“不成人之恶”，必须设法帮人解决问题，劝化人不去做恶事，如果不劝也不帮助，用佛教的话来说那是小乘。当然还有比这更坏的，那就是成人之恶。挑拨人们感情变坏，挑拨离间，这就是小人。谁办恶事反而去帮助他。比如说，别人去偷东西而你去给他看风，给他取个梯子；谁去钓鱼，你去给他找钓鱼钩，或者给他找诱饵等等，这都是成人之恶事，不可为。

小人与君子相反，见人做善事便妒忌，即使人家做善事，他也生怕别人的影响超过了自己，看人做恶事就和他志同道合，帮助他成就恶事。虽然世间的法律不能够治小人之罪，但是因果不饶人。中国人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因果是如影随形，所以我们不怕世间的法律制裁，也要畏惧因果，不要去成人恶事。

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上引《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说：“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君子自己做善事也希望别人做善事，也看别人做善事欢喜赞叹、随喜功德。“己能亦乐人之能也”，自己有能力，也希望别人有能力，不嫉贤妒能。在佛教里讲“布施”。什么布施？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比如说这个数学题你会做，别人来向你请教，你不愿意去教他，这叫“吝法”。吝法得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愚痴。相反，别人向你来请教，你很高兴给他讲解一遍，结果你在讲解的过程中，有很多东西豁然开朗，越讲越明白，自己也越聪明智慧。所以，明白了因果，我们就愿意去帮助人做好事，成就善事，因为他做的善事中，你也有一分功德在其中，特别是我们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很多老师。他们讲课讲的很好，非常的摄受人心，因为那都是他们身体力行的体会。我们帮助他去传播、赞叹他，他所做的善事，就是我们所做的善事。所以你看他要费心费力的去讲，但是我们只是去给他宣传一下、介绍一下，我们的功德就和他一样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看别人做善事做好事，要想方设法的去帮他，成就他做的善事，我也有一份喜悦在其中。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而正，孰敢不正？”

在通行本上，“子帅而正”作“子帅以正”。季康子是鲁国三家大夫之一，他把持朝政，把持政治又治不好，因此问孔子怎么样把政治办好。对于季康子问政，孔子的回答也很有用意。“你季氏三家对鲁君不好，怎么样？你的属下百姓对你也就不好。”这也是因果。孔子说：“政者，正也。”他把“政治”的“政”解释为“正”，“正”就公正无私，办政治就要守得住“正”字，这一句足以解答季康子的问题。但是恐怕季康子还不能够完全理解。于是他又加以解释：“子帅而正，孰敢不正？”子就是称呼季康子，“帅”是表率，做样子给人看。意思是说，你是鲁国的上卿，下有大夫、有士，只要你自己行得正，处处以身作则，谁敢不正？

在《后汉书·第五伦传》上说：“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如果我们是用言语去教导他，结果自己做不到，别人就给你起争讼了，有逆反了，说你自己都做不到，有什么资格说我。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听人说，这个孩子怎么说都不听，因为我们把教育变成了说教，而没有把正确的给表演出来，所以孩子会有逆反心理。在小的时候他做错事，你说他，他不听你就打他一顿，他很弱小迫于你身体的强大，他只能忍气吞声，只能把它忍下来。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身体越来越强壮，他看你没有做对，你还说他，他就不服气了。他就跟你起争执、起争讼，所以逆反心理是这样出现的。所以做家长的、做老师的、做领导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符合《弟子规》的要求，那你就不用要求你的儿女、你的学生、你的属下，他们自然都能够做的很好。

“以身教者从”，这就是身教胜于言教的道理。很多人对道德教育，一说起来就很反感。什么原因？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把道德教育变成了说教。其实中国古人的道德教育主要是给领导者讲的。“圣人治吏不治民”，季康子是鲁国人，他主要抓的是那些官吏，而不是去对老百姓实

行道德教育。当官吏的当领导的做到了，老百姓自然会跟着做道德的事。《大学》上也说："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就是自己做到了，才教别人这样做，如果自己没有过错，才可以说别人的过错。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身体力行自己做的正，如果对鲁君处处合法、合规矩，以身教导人，谁敢不正？"政者，正也。"这句话虽然是孔子对季康子所说的，但是后世的为政者、领导者，都应该把它当成至理名言。当领导的人都要反求诸己，要责备自己不要责备别人。

季康子患盗，问孔子。

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是鲁国三家大夫之一，分去了鲁君的主权。但是凡事都有因果、都有变化，好坏也是无常，因为他分去了鲁君的主权，所以三家也受制于家臣。这一章就是季康子家患盗，请教于孔子怎么办？这个"盗"并不是当小贼大盗，"盗"是什么意思？《说文解字》上说："盗，私利物也。"凡是有私欲、贪利的心就是盗，"盗"是会意字，从水从欠从皿，见皿就是器皿，就有了欲求的心，就是已经起盗心了，这和佛教讲的不偷盗的含义是相当的。这个东西是有主的物，别人也没有给予你，结果你就把他据为己有，甚至有了贪得的心，就已经是盗心了。三点水一个欠字就是"涎"字，有垂涎欲滴的"欲"字的意义。所以《说文》解释"欲皿为盗"，这也说明儒家也是说起了贪欲之心，希望要得到，就是盗。宋儒经常讲"惩忿窒欲"，有私欲就要杜绝它，不能让它发展下去。当然，这句话容易说，但是难以做到，一般人只是把它当成了记问之学，没有用它来要求自己，这种学问没有用，要注重在实行上。

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孔子认为人有了欲求之心才有盗心，有盗心才会做盗贼。所以答复季康子说："假使你自己不贪求，没有贪求之心，'虽赏之不窃'，即使你奖赏别人去偷盗，别人也不会去。凡是争执、争物品都是源于私心滔滔，如果你没有私欲之心，就没有盗了。"

在《礼记·缁衣篇》上也说："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就是下级侍奉上级，并不是服从他的命令，而是服从他的行为。所以上级、居上位的人，喜好某一个东西，下面的百姓或者下属一定会有比他更加喜欢的。领导者如果没有私欲，上行而下效，他的下属就会以欲为耻，所以纵然有赏，即使你奖赏他，他都不愿意去做盗贼，因为人人都有廉耻之心。

管仲是协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人，他主张用"礼义廉耻"四个字来治国，虽然他是法家的代表，但是他还强调用礼义廉耻治理国家。如果没有"耻"这个字，国家必定会灭亡。无耻，大家就会无所不为。那我们想一想今天是什么局面？天天有盗贼，而且这个盗贼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以进监狱为羞耻，还以自己能够坑蒙拐骗，能够达到目的沾沾自喜。这就是因为"耻"字丧失了。

前面我们讲到周文王治理国家的时候，虞、芮两国的国君到了文王所治理的地界，结果看到全国整齐，彬彬有礼，两个国君就惭愧回去了。什么原因？这除了文王的德行以外，也是因为虞、芮两国的国君有羞耻心，否则也没用。

季康子问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果杀无道以成就有道何如？"这个"无道"指的就是恶人；"有道"指的就是善人。这个"杀"除了杀死之外，还有废黜的意思。把坏的恶的杀掉或者废黜，以成就好的，使修道者有成，这个说法很对。今天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已经是很不错了，很合公理了。但是孔子是以道德感化人民，他不主张用杀人的行政来治民，所以他答复季康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是称呼季康子，"焉"当"何"字讲。因为杀人，虽是杀恶人，也不是好办法，未必有好的效果。如果要使民

众向善，那就必须从季康子自身开始，所以说“子欲善，而民善矣。”这个“欲”就是贪欲，如果您像是满足贪欲那样，要求自己为善，人民自然就善了。你要真正办好政治，使政治上轨道，百姓都好了，何必用杀？现在的人经常说，孔子不主张杀，这必须要明白是什么时候，什么环境。

在今天这种环境，即使是杀，还不改。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杀也是必要的了。杀一是为了儆百，该杀的时候也得用杀。但是在孔子那时候，不必如此。所以孔子认为季康子无需用杀。孔子说了理论之后又做了一个比喻，在上的君子办事有成就叫做德，君子之德如风；在下的小人办事有成就，也叫做德，但“小人之德如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安国注“上”这个字，当“加”字讲；“偃”字当“扑”字讲。意思是说“草加之以风，必然扑倒”。

在《说苑》上也有这样一句话：“夫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风自东边吹来，草必然向西倒，风自西边吹来，草必然向东倒。这是比喻在上位的人，一定能够感化一般的人民。当一位领袖，无论是国家的领导人，还是单位的领导人，还是家庭的长辈，都很不容易。为什么？必须凡事先责备自己，不求于人。如果你凡事都推卸责任，都责备别人，上行而下效，整个社会也会相互指责、相互挑剔、相互抱怨，这个就是“各相责，天翻地覆”。相反，遇到问题领导者能够反求诸己，责备自己，同样也是上行下效，整个社会就会“各自责，天清地宁”，遇到事情都是反省自己，这件事我哪儿没有做好，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我下次怎么样把这件事做的更好。所以这一句话孔子的意思是：季康子你若想杀无道，就必须先办自己。

樊迟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

子曰：“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毋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论语》原文有一句，“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群书治要》删掉

了。樊迟跟着孔子到舞雩之下去游览。孔子出游，弟子也一同跟着出游。孔子带着门人到了舞雩坛，出游饮食起居也没有离开求学，虽然是在游览的过程中，仍然不忘求学问道。于是樊迟就问孔子：崇德、修慝、辨惑是什么意思。从这里我们看，古人好学体现在方方面面，即使是在游览参观的过程中也是在求学。

樊迟提出疑问，前面子张已经问过这两条了，现在又加了一条，为什么樊迟还要再问？因为这三句，都是古代的谚语，也是圣言。既是古谚语，就会有很多人说，说法各不相同。

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上以为：崇德、修慝、辨惑是求雨之词，在这里边的“德”、“慝”、“惑”三字是押韵的韵文，很好记忆。古代的小孩没有上学就先学念诗。因为这个诗都押运，很容易记。“先事后得，非崇德与？”先做事后来才想到所得的报偿，这不就是崇德吗？“先事后得”，就是先要把事情做好，才想到所得的报酬。“崇德”就是增进自己的德行。办事是为了什么？我们做事就是为了使自己的德日进，过日少。所以无论从事哪一种工作，都要能够做到自利利他，给别人带来真实的利益。

第一就是能够满足于人的衣、食、物质利益，让人衣食无缺，解决温饱问题；第二就是能够促进人的健康。像现在很多人提倡素食，素食馆那就是促进健康的事业，这也是很好的正业。还有就是提高人的德行，可使人过上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事业”。那我们做这样自利利他能够给人带来真实利益的工作，就会使我们的德日进，过日少。我们现在很多人，把文化都做成了赚钱的产业，文化成为产业是不错的，但重要的是你传播的什么内容？不能是杀盗淫妄、唯利是图，因为这个有市场，能够赚钱，我们就去做，但是你不知道传播这些东西，蒙蔽心性，引起物欲，增长人的贪心，这种结果是很不好的。凡是这样的事业，这样的恶业，都不能够去做。

我们各人有各人的事，家有家事，国家社会各有其事，都得符合道。办事开始就是种因，后来就是结果。不可刚干了一半就想结果，这样是干不出事来的。比如说烧开水，不可能烧到一半就取来喝，古人办大事者叫

大器晚成，就像我们种菜一样，和种桃种李子种苹果是不一样的，必须先受辛苦，受多少辛苦得多少结果。所以古人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去耕耘了，你去做好事了必然会有结果出来。

《大学》上也告诉我们："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一个人，有多大的事业，有多少财富，多高的名声，都是和他的心量有关系。所以重要的是培养我们的厚德，拓宽我们的心量，把我们的心改过来，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厚德载物。你明白了这个，自己的前途在哪里不用问别人，要问自己。因为一切福田，不离方寸，福田都是由我们方寸之心所导致的，这个后人说"先事后得"这个言语语气都非常的缓和、含蓄。

"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这个"攻"就是改正的意思，"其"就是指自己。自己有了过失，立即改正，就像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这就是攻其恶。一个认真改恶的人，只能看到自己的过恶太多，自己改正自己还来不及，哪有时间去改正别人？所以说"无攻人之恶"，不要去改正别人的过恶，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修慝。这个"慝"字，从"匿"从"心"。"匿"就是隐藏的意思，"修慝"就是修去心中之恶，在心里藏着的，不可告人的话语、意愿，既不是好事又不是好话，所以必须修，修理修改的意思。如何将藏心昧己的毛病改正去除，这个是我们必须学的。像我们现在受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即使是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学儒的人，也都有自私自利的心。有这样的心，将来不会有大的成就。为什么？

在《大学》开篇就说"明明德"，然后才能"亲民、止于至善"，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而修身从哪里做起，前面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以你想治国平天下，必须从修身开始，修身从格物做起，就是格除自己的物欲，不能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和贪求。财、色、名、利都要看的淡一点，不为它们所左右，这样才不会"欲令智迷、利令智昏、情令智迷"，你这个智慧才能够生起，这样才能够做到诚意、正心。当然不经过一番长期的修养、克制的功夫，是很难达到的。

一般的人都是容易批评别人的过错，而原谅自己的过错。读书人、学

儒的人必须改正这个毛病，就是凡事要找自己的毛病，改毛病是每一天都要如此。如果你天天能够像曾子那样“吾日三省吾身”，一周之后你的样子就变了，你的言行举止让人看起来都不同了，再过上三个月，这个变化气质就更加明显了。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这个惑的种类有很多，“忿”就是其中之一。“忿者”，《广雅·释诂》云：“怒也。”“忿”就是怒的意思。一时忿起不能自制，忘记了自己，忘记了父母，这就是惑。所谓的辨惑，就是在怒气初起之时，要考虑它的后患而不能冲动，以免给自己和父母带来灾祸。像我们看到社会有很多人犯罪，都属于激情犯罪，不能够在那一瞬间克制自己的怒气，结果盛怒之下，做出了令人后悔的事。

其次说这个辨惑，这个辨惑为什么单单讲出忿这一点，因为忿是非常难克制的，也是很容易犯的，像很多人改毛病，改自己爱发怒的脾气，改了十年了，觉得自己修养已经很好了，遇到什么人都不着急不上火了，但是如果遇到那些能牵动你神经的问题，你还是不能够克制自己的怒气，可能还是会火冒三丈，做出像以前一样愤怒的事情。所以从这里看，这个愤怒是不容易克制的，要克制习气也是一个长期修养的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做好的。这个一朝就是短短的时间，现在很多人看见不如意的事，天天发牢骚、怨天尤人，而且不仅中国是这样，天下各国都是如此。

这是什么原因？这个就是天下无道久矣，只有那个君子学道的人，能够做到坦荡荡，素位而行，“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一生周游列国，结果也不得志，没有国君要重用他，但是孔子从来没有表现出怨天尤人的情绪。在《论语》的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就是圣人和一般人的不同之处。一愤怒起来连自己也忘了，这就是“一朝之忿忘其身”，不仅仅忘了自身，还忘记了父母。由于你忘记了自身跟人家拼命，如果自己死了，是无所谓的事，但是对于生者，就很困难了，父母看到儿女去世那都是悲痛欲绝。

在古代，即使是盗贼，对自己父母也都有孝心。现在有的年轻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没有想到父母，所以才会走上轻生。这一朝之忿就起惑，起惑就要造业，造业就要受苦。所以佛家把“贪、嗔、痴”称为三毒，“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这个就是惑。

你看你以前对人家特别的好，特别的义气，甚至是为朋友两肋插刀，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辞。但是在盛怒之下，说了几句让人伤心的话，结果别人就记住这几句伤心的话，把你以前对他的好全都忘记了。从这个世间上来看，也是“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所以经常喜欢生气，控制不了自己脾气的人，他的人际关系很难和谐，很难交到长久的朋友。

樊迟问知。曰：“知人。”樊迟未达。

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樊迟退，见子夏曰：“何谓也？”

子夏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问知。子曰：“知人。”

孔子的弟子来“问仁”，孔子回答因材施教，一人一个回答方法。要看这个人的根性，要看当时的环境，所谓“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虽然这个人要求仁，这个人的目的是一，所走的路有所不同。就像我们都要去北京，但是有人乘船来的，有人乘飞机来的，有的人是坐公交车来的，但是来到北京的目的都能够达到。

问知，这个“知”就是智慧的智。孔子解为“知人”，有智慧的人必然有知人之明，所以古人说“知人者智”。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在人群社会要想办事，办成功、办好，就必须知人，办事要共同办事。没有哪一件事业是一个人自己办成的，所以要寻求合作伙伴，就要知道怎么样去观

人、识人、用人。古人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孔子在《中庸》上讲:所有事情办好办坏全在于人。遇到好人就办好事,遇到恶人就办坏事,好人能够把坏事也办好,但是坏人把好事都能办坏。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在世间最好的事就是教育,但是如果要让有私心的人从事教育当老师,这个好事也变成了坏事了。他不是去教书育人,自利利人,帮助自己也提升他人。他把教育变成了谋取财利的工具了,所以把好事也变成了坏事。在世间不好的职业就是去当法官,因为你作法官就要给人判刑,甚至判死刑。孔子去做司法官,他就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他要使人没有争讼,不是因为自己当法官,就是很严苛地能够让大家都去争讼,而且给人家判的刑很重、很严苛。

“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句话是说樊迟没有理解,不懂什么是智,所以孔子在给他解释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个是专门解释“知人”的问题,就是解释智。这个“直”就是正直的人,“枉”就是不正直,撷取不正的人,“错”就是放置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正直的人选拔出来,如果这个人是正直之人,你要把这样的人选举出来,而代替那个撷取不正的人。这个“置”不是放置不用,而是把正直的人,放在不正直的人之上,这样就能够使不正直的人,也学着成为正直的人。现在社会上不正的人,是相当的多的,如果都废置不用的话,也是不可能的,但怎么办?要有正直的人在他之上,让他学会做正直的事,当他变得正直了,仍然可以用他,不舍弃他。现在的基层选举,民主选举村干部,选出来的人有很多都不是好人,这是谁的过失?这是因为大家举枉的结果。也就是说大家都把那个不正直的人给举荐出来,都愿意给那个不正直的人投票,结果还是因为有私心,图私利所导致的。

《论语》上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般的君子,他看这件事都是看他合不合宜,符不符合道义,如果不符合道义、恩义、情义,你给他多少钱收买他,给他高官厚禄,他都坚决不做。像我们以前所讲的宋

弘的例子，即使能够跟皇帝攀上亲戚，成为皇帝的姐夫，但他都不愿意违背道义，这是君子。但是小人看到利益在前，他就忘记了道义，忘记了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所以谁给他的钱多他就去选谁，谁能够投其所好他就去投谁的票，结果就是选出来的人不一定是好人。中国是如此，外国也是如此。

像外国的总统选举，大家主要是看他的演讲，候选人在演讲的时候，承诺了很多，说了很多的漂亮话，但是他上台之后不一定能把这些承诺一一兑现，而且为了投民众所好，民众喜欢什么，喜欢生活富裕，不喜欢勤俭节约，那为了投其所好怎么办？他们有福利，但是福利要有来源，来源从哪儿来？要借债。而且还要花后代子孙的钱，所以很多的福利国家都是花后代一代两代的钱，这样的事中国人是不会去做的。所以选举也是有弊端的，之所以选出的人不是正直之人，就是因为人的私心所导致的。

“樊迟退，见子夏曰：‘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谁是“直”者，谁是“枉”者，樊迟仍然是不了解。但是又不好意思再问孔子，于是退出。见到了子夏就把刚才孔子所说的“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两句话问子夏是什么意义。我们都知道求学，除了有老师之外还必须有朋友，所以要寻师访友，子夏就是樊迟的朋友。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子夏答复樊迟“富哉言乎”，意思是孔子说的这一句话包括的意义很丰富。这是赞叹的话，以下再举事实加以证明。

舜有天下的时候，在众人之中选举了皋陶为士，“不仁之人由此远矣”。在尧舜的时候，都是垂拱而治。到了周公的时候，是“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就已经比不上尧舜了。“选于众”，尧舜用人，都是在众人之中选择人才，在人才之中，皋陶为第一。舜老了之后，皋陶就先逃走了，不受舜的禅让，后来舜才推举了禹。禹做了舜王之后，皋陶又返回朝廷，他又协助禹来治理天下，说明皋陶这个人正直无私，他没有私心，甚至连天下都可以让。如果有私心的话，就做不出这样让天下的举动了。不像现

在很多人，升官是为了发财，这就和古人相差的很远了。

只要有一位公正的人，他就可以垂拱而治，事情自然办理得好。如果这个正直的人不在了，那结果就完全不同，这里边道理很微妙，不可思议。其实就是《周易》上所讲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如果这个人是正直之人，他必然感召正直的人来帮助他，如果自己是有私心的人，邪曲不正之人，同样的道理，自然感召和他同样的人来到身边。所以为什么古人说君主要反求诸己，不要去责人，要责己。因为你自己德行很完善，你感召的人，来帮助你的人，他们也是和你志同道合的人，有相同气质的人，有相同志趣的人，这才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我们周围的人做得还不够好，做得不够完善。我们就要该反省自己的存心，自己的德行，自己的心量是不是有欠缺之处。

当我们把自己的心量拓开了，德行提升了，你就发现来到自己周围的人也都变化了，或者是不好的人离开了，或者是原来的人德行提升了，这个是外国人很难理解的。他们看了《群书治要》会感觉到很惊讶，他说原来你们的皇帝、君主是这样治国的，遇到事情先反求诸己，先反省自己，而不是去推卸责任。

后面子夏又举汤的故事：汤有天下时，在众人之中选举伊尹为相，不仁之人由此远矣。伊尹也是一个贤相，汤能够重用他，所以把天下治理得很好，刘宝楠《刘氏正义》中引宋翔凤《论语发微》，大意是说孔子的意思：必须让尧舜禹汤这样的人当君主，才能够尽用人之道，因此这是讲的选举的事情，但是到了春秋的时候，由于卿大夫世袭，也就是在封建世袭制建立起来之后，在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益处、好处。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就有弊端了。在朝做官的士大夫，世代相袭，到了东周的时候，这个制度就有了问题，所以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这就是赞成选举，打破封建制度，要立贤无方，就是推举贤人不拘一格。

陶与伊尹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有德行、有才能，仍然可以出来做官。现在的选举不是选于众，而是选于钱。这种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有很大的弊病，如果孔子在现代，肯定也没有人去选他，即使是圣人也不被

选上，也不被重用，这个是给我们讲“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选举人才，一定是看他的德行和才能，而且要不拘一格的任用人才。

子路篇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毋倦。”

子路问为政之道，怎样办政治。办政治的事情很多，孔子只回答了“先之劳之”四个字，这个回答非常的简略扼要。因为孔子对于来问的学生的情形非常的熟悉，学生有什么疑惑和问题，孔子实际心里都有数。“先之”就是为政者自己先行，以身作则。在《礼记·月令篇》中说到“以道教民，必躬亲之”，也就是说为政者想以道来教导民众，必须先能够身体力行。所以能说不能行，不是真学问，古人也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现在很多人有知识没有文化，文化和知识不同在哪里呢？知识就是一个人能够把内容背下来，考试的时候能够写下来，甚至也能够讲出来，但是在生活中不能够身体力行。比如说大家从小就背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把这首诗倒背如流，到考试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默写出来得满分，但是在生活之中还会随便浪费粮食，这个就叫有知识没有文化。所以学习圣贤经典重在以文化人，这个“文”就是文章、文学、文艺、礼乐等等。学了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生活中变化气质。

所以古人说你没有读《论语》前是什么样的人，读了《论语》之后还是什么样的人，这个《论语》就是未曾读。《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篇》上也说，“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这句话告诉我们要想迅速地推行政教，没有比自己先身

体力行更好的办法了。如果想使民众很迅速地服从，没有比以道来教导民众更好的了。这些都是讲在位的人、领导者要身体力行，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用习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一句话用非常通俗的语言把为政之要概括出来了。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看到，凡是推行传统文化成就卓著的地方，无论是社区、单位、企业、学校还是中心，之所以能够有效果，都是因为教授传统文化的老师能够身体力行圣贤的教诲，上行下效，速度非常的明显。比如在前几年庐江文化教育中心搬到了安徽省的汤池镇，想要通过推行《弟子规》，使那里的人们学习传统文化，构建和谐汤池。这些老师初来到这个小镇的时候，这个小镇民众不是很讲卫生，不知道保护环境，垃圾随地乱扔，影响了市容也影响了交通。看到这种情景这些老师穿上了有“和谐社会、从我做起、从我心做起、从我家做起、从我镇做起、从我县做起”等字样的衣服，然后就排着队到街上去捡垃圾。结果捡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就不好意思再往地上扔垃圾了。还有一些商家看到了，就主动地提供了一些垃圾桶，使过往的行人能够把垃圾扔在里面。所以这个中心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几个月就使民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到联合国去汇报成就，引起了来自192个国家的驻联合国教科文大使的关注，原因就在于自己能够身体力行。所以推行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并不只是靠讲。如果讲的很好，但是做不到，这个没有用处，必须能够身体力行。

“劳之”就是教民勤劳，政治就是要办事情，就得劳苦。比如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是以身作则。他跋山涉水，水里来泥里去，百姓都很信服他。虽然劳苦也没有怨言，我们经常说功劳，功是由劳而来的。所以一个人想成就大事，建功立业，不努力是不行的。中国人常讲“梅花香自苦寒来”，还讲“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刻苦学习才能够取得的成就。我们知道在学习传统文化的团队中，有一位陈大惠老师，他招募义工的时候，要求的十分苛刻，十分严格，说这个义工

要一个人能干三个人的事，还没有节假日，甚至还几年都不能回家。但是想来报名参加这个团队的人却越来越多，没有怨言，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陈老师自己能够身体力行，无私无求的去做一个义工，放弃了很高的工资、很好待遇的工作，来做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的义工。他原来对自己的专业要求很严格，为了当好主持人，每一天晚上，穿上正装然后对着镜子练习口型。言语上的能力不像德行那么难提高，可仍需要一段艰苦的训练，更何况推行传统文化还需要有德行呢？因为陈老师无论是在专业素质还是在德行上，都对自己严格要求，所以他做出来的片子非常感人，让很多人学习传统文化生起了信心，像我们看到的《和谐拯救危机》、《圣贤教育改变命运》都出自于陈老师之手。他凡事都是亲力亲为，对作品的质量毫不马虎，非常的认真，所以任何一个人有成就，那都不是偶然的。我们不要只看一个人成名后受人尊敬的外表，而要探究他的原因，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在学习《曾国藩家书》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分享一句话，“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人败离不开一个逸字，讨人厌离不开一个骄字”。我们观察一个人之所以由盛转衰，是什么原因呢？什么时候他认为自己的奋斗已经差不多了，该享受一下人生了，过着玩物丧志、过分安逸、不思进取的生活，他人生的转折点就出现了。有的人是上了大学，有的人是找到了一份好工作，有的人是获得了一官半职，觉得自己的奋斗够了，可该有时间、有财力享乐人生了，一旦一个人有了这种想法的时候，他的人生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我知道有的博士生非常的用功，晚上十二点钟还没有入睡，第二天早晨四五点钟已经起床了。在干什么呢？在读书，读《群书治要》！看到这样的学生，我们就知道这是在走上坡路。没有这样一番刻苦用功的经验，怎么能够有以后的成就？这就是告诉我们“劳”是“功”的前提，要种因才能够有结果。有的人幻想成功，但是不肯去付出。这就如同我们知道从北京到上海怎么走，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但是坐了车之后就朝相反的方向走了，永远达不到目的！

有道的人办政治必定教民勤劳，所以古代的圣王都提倡节俭。尧的房

舍是只有三级的土台，阶茅茨而不翦，都是讲“惩忿窒欲”，不发展物欲。“儒释道”三家都教人要控制欲望。比如老子就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意思就是贪恋色彩的绮丽会使人眼目如盲，不能看清事情的真相；追求奢华的娱乐使人耳朵如聋，不能听到声音的真意；讲究美食的享受，使人口舌就失去了辨别的能力，不能够尝到食物的真味；沉迷骑马打猎的快意，使人心神狂妄暴躁，不能回归平和清宁；羡慕喜爱稀有难得的物品，使人的贪心增长，行为举止都出现偏差。为什么古人要教人控制物欲，因为人的本性本来是虚明洞彻的，人心本来也是平和的，正是因为贪着物欲，就使人本来清净的心性受到了染污，也就失去了本有的智慧光明。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利令智昏，情令智迷”。我们经常用一个水晶球来比喻人本有的本性，水晶球光明剔透，光芒四射，但是掉进了污泥里沾上了泥巴，经过污染就使它本有的光明被蒙蔽了，有光也散发不出来。修身的目的无非是去除外在的染污，回复到心性的光明，这就是《大学》上所说的“明明德”。

在《群书治要·文子》上也这样说：“水之性欲清，沙石秽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水的本性都是清净的，但是沙石却使它变得混浊了；人的本性都是平和安静的，但是欲望却来扰乱它。“唯圣人能遗物反己，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倾也。”只有圣人能够抛弃物欲而回归自己的本性。圣人不被物欲所控制，淡然平和的心态不被欲望扰乱，这样才能身处高位而不危险，保持安稳而不倾覆。

世间政治最紧要的在安人心。就像孔子所说的“劳者安之”，要使人身心安宁，否则的话，即使吃的山珍海味也不甘甜，也体会不到滋味。凡是有道的人都应该戒奢侈而讲勤劳，在《礼记·礼运篇》上说“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个就是戒奢勤劳的理论根据。意思是说剩余的东西要拿出来给大家用，不要随意的奢侈浪费，否则导致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苦乐不均。贫富分化严重，人心就会不平，不平的久了就会有怨气，怨气再

积累深了就会产生恨意，这个社会矛盾重重动荡不安。这就是告诉我们过多的东西不能够随意的浪费，要拿出来分给需要的人和贫穷的人。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并不是说为了满足自己才去干，也不是因为你要赚钱才去干，只要社会上有需要就必须去干，不能做寄生虫。社会上有很多人需要我们帮助，古人讲助人为乐，帮助别人才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才能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快乐。儒家的政治是出自仁义，儒家文化的教育为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也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现在的贫富分化很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学习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如果富有的人受到了伦理道德的教育，就懂得拿出钱来去做慈善事业，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这样贫穷的人对富人也不会加以仇视了。

“子路请益”，就是希望孔子再加以详细的说明解释。孔子答曰：“无倦。”“无倦”就是“先之，劳之”，要永不懈怠地一直干下去。人要效仿天道，《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运行没有一天是休息的，每一天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一年四季寒来暑往，没有哪一天是休息的。作为君子，要效法天道，自行化他，自强不息，不疲不厌地一直干下去，没有一天休息，这才是效法天道。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

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曰：“焉知贤才而举之？”

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仲弓也是德行科的人，他在季氏家里做邑宰，做宰臣必须办事条条有理百姓才能够安定得下，因此他来问为政之道。孔子答复仲弓“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这是办政治很重要的三件事。去做宰官，要求有人才，“有司”就是宰邑之下各司其事的属下。办政治必须先分配有司的职务，使他们都职掌分明，办事有序。

在《吕氏春秋·审分览》上面这样说：“凡为善难，任善易，奚以知

之。”凡是人想自己做善事，亲力亲为就比较难，但是如果任用了人才去做善事就比较容易了。为什么这样说，他下面举了一个例子。“人与骥俱走，则人不胜骥矣。”如果人和千里马一起跑，这个人肯定是跑不过千里马的。但是“居于车上而任骥，则骥不胜人矣”。如果人坐在车上来赶千里马，这个千里马就胜不了人了。“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则是与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如果当君主的人好去管属下该做的事，总是过问具体的事情，就等于是和千里马一起在奔跑，所以一定是比不上千里马的。

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凡是为政的人、当领导的人，都应该先任用“有司”，就是各种办事的人员来治理，不独当宰邑。凡是当领导者都须得有人才，才能够把事情办好。“赦小过”是指小民有过失可以饶恕。很多注解都认为“赦小过”是赦有司的小过，这恐怕不是本义，办政治都有规矩，这个“过”并不是罪。过有大小，大过，你如果不知道，那是粗心，不可赦免；小过是不留心，可以赦免。贤才是有德有能的人，要特别地举用他，才能够把政治办理得好。

仲弓又问：“焉知贤才而举之？”孔子就回答说：“举尔所知。”像舜举皋陶、汤举伊尹都是“举尔所知”，把这些贤才举荐出来以后仁者就都被举尽了，不仁的人都远离了。“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你所不知道的人才，他人知道后也会把他推荐给你，只要你真正有求贤之心，你不知道的别人也会举荐。如果自己没有想治理国家的心，有贤才也不能够被重用。所以能否举荐贤才的关键就是在于领导者自己的存心，是想着把国家治理好还是想着自己的私利。如果做事出于私心，想着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即使有贤才也一定会嫉贤妒能而不予举荐，如果他还想满足自己的享受，像夏桀王、商纣王等等，即使有贤才也不会重用，这一句话就是讲为政在人。所以仲弓问政的意义归结在举贤才，举贤才必须以知人为要，以知人为关键。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

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

在孔子的时代，鲁国的南边就是卫国，也就是现在山东河南一带。鲁卫两国来往便利，所以孔子的很多弟子也都在卫国做官。卫灵公有两个儿子，一位叫蒯聩，一位是郢，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据《左传》记载，蒯聩在鲁定公十四年，因为羞耻他的母亲南子淫乱，涉嫌谋杀南子，后来出逃奔往宋国。到了鲁哀公二年春，卫灵公病重的时候，就想立公子郢为太子，但是郢拒绝接受，因为家有长子。当时的蒯聩虽然出外，但是还活着，所以郢就不愿意被立为太子。在这一年的夏天卫灵公过世了，南子就再次命公子郢继位，郢又坚决推辞，为什么？因为当时还有蒯聩的儿子辄在，于是辄就被立为卫君。同年六月，蒯聩在晋国赵鞅的帮助下返回卫国的戚邑，从此以后蒯聩一直居住在戚邑。到了鲁哀公十五年冬，蒯聩与浑良夫等人潜入卫家，挟持孔悝强迫与他结盟，这样蒯聩取得君位，被立为庄公。鲁哀公十六年春，蒯聩的儿子辄出奔，因此也被称为出公辄。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鲁哀公六年从楚国返回到卫国，卫君辄就是这个出公辄四年，当时孔子的弟子高柴、子路等等都在卫国做官。《孔子世家》里记载，在孔子返回卫国的第二年，“卫君欲得孔子为政”，这个发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子路问孔子：“卫君要您去辅助治国，您若上卫国为政，现今的卫国政治混乱，人民也不服。您要去办理政治，应该先办什么事呢？”孔子答：“必也正名乎。”孔子去还是不去，还不一定。“我是有条件去才去。”“正名”的意思，马融注为“正，百事之名”。万物都要名实相符。孔子说先把卫国的名分定住，从在上的领袖开头，究竟谁应该为国君，一定要梳理清楚。下面就是孔子为子路解释“正名”的道理。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不正”，就是名与事实不相符，言语错误不能顺理成章。“名”要是不正办不了政治，因为办政治就必须要下命令，如果说出来的言语都不能按规矩道理，说出来的话

也不符合礼，那么事就办不成了，这个“事”是指普通的事。言不顺则办事不能成功，就是办普通的事都不能成功，更何况推行礼乐教化之事？

下面讲，“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治国必须以礼乐来教化，所以中国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清朝都是以礼治天下。

《孝经》上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个礼乐都是国家的大事，关乎全民的安危国家的安稳。如果礼乐教育办得好，不需要司法刑罚、监狱警察，都可以路不拾遗。像孔子在做中都宰的时候，他刚接手中都的时候，中都是一幅破败的景象。游民多、乞丐多、盗贼多，社会风气也很败坏。富人骄奢，女人失节。孔子担任中都宰之后，推行礼乐教化，让大家都学礼，凡事饮食起居丧葬都要符合礼的要求；他还制定了很多养生送死的礼节规矩，让大家每一天的生活言行都有礼的要求；对原有的书吏差役进行教育，还以仁德教民改良地方的风气；还设立乡校从少年开始就进行礼的教化，让他们入乡校读书；此外还提倡节俭革除奢侈的恶习。礼并不是像一般人所认为的它是讲等级，其实礼从根本上提起一个人的感恩心、同情心和恭敬心。所以如果大家都能够符合礼，恭敬心、感恩心、同情心都生起来了，这个社会自然会井井有条，所以礼乐的教化是不可思议的，它不仅仅规范了一个人的行为，而且引导人的道德情感。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的一句话，“礼不下庶人”，为什么“礼不下庶人”？因为一般的老百姓平日劳苦，要从事生产，所以对于礼就不能够非常的完备，非常认真的遵守，所以礼主要是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来要求的。在古代有这样一条规定“入国不驰，奔驰不冲”。古代有钱有势的人和现在有钱有势的人一样，坐的都是和别人与众不同的车子，虽然现在人坐的是宝马奔驰，古代人坐高头大马拉的马车，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有钱有势的人。在古代的时候礼就规定了，驾车进入一个国家的时候，人口很密集，就不能够把车开得很快，一定要把这个车速放缓，要照顾到过往的行人，不能够横冲直撞。要是把礼做出来了，别人就赞叹你，说你这个人不仅有钱有势还懂得礼，同时，把礼一做出来，同情心也就升起来了。

比如说大热天或大冷天，别人还要背着担子艰苦的前行，而你坐在马车里非常的悠然自在，你给人家让路这不是应该的吗？你这个动作一做出来你的同情心、谦恭心也同时提起来了。现在有钱有势的人是开着宝马奔驰，如果遇到骑自行车的人、步行的人，都能主动停下来给他们让路，别人就会赞叹，说你看这个有钱人，他不仅仅有钱有势还懂得礼，这是贵族的表现，谁不愿意被称为贵族呢？谁愿意被人称为暴发户呢？你看现在很多有钱的人没有上过学，没有受过教育，生怕别人嘲笑他没有读过书，还特意看了一些圣贤经典，在说话的时候要咬文嚼字，引用一些圣贤的名言，生怕别人说他没文化。其实有没有文化并不在于能引用多少经典，而在于生活中能否真正落实圣贤的教诲。所以这个“礼不下庶人”不是说要维护等级制度，而恰恰是对有钱有势的人的要求。所以礼乐教化是不可思议的，它是潜移默化的培养了人的感恩心、恭敬心、同情心，所以中国古人是治人心而不是专注于治人的行为。

孔子治理中都不到一年，结果中都大治，百姓安居乐业，后人赞叹说到：“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器不雕伪，行之一年，四方则焉。”孔子治理中都一年之后，“长幼异食”，年长的和年幼的不是在同一桌吃饭，都有不同的位次；“强弱异任”身体强壮的还有身体弱的，他们的任务是不同的，不同才显出了平等。如果这个人身体强壮，那个人身体有病，让他们去担任同样的执事，这反而就不公平了，所以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关心弱势群体；“男女别途”，中国人特别讲究防微杜渐，男女走路的时候都是男的走一边女的走一边，不能有过多接触的机会，很多人说这是封建礼教，是“男女授受不亲”。确实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很多人对这个礼不明白，把它称为封建礼教，实际上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定呢？就是因为人的欲望很容易被引发出来。中国古人对人的欲望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要防微杜渐，不要给男女过多的太容易接触的机会，所以男女在接递东西的时候都不要碰到手，这就是防微杜渐。

改革开放之后，大家都流行跳交谊舞，结果怎么样？男女接触的机会

非常的容易，非常的多，结果离婚率就上升了，婚外情就越来越多了，这个都是不懂得防微杜渐所导致的。更有甚者，现在不良的视频在网上随处可见，这都是引导人们去犯错误，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器不雕伪。”晚上的时候不用关门，睡觉也很安全；路上丢的东西没有人去捡起来，因为他知道这个人丢了东西会很着急，还会回来再找；“器不雕伪”，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没有假冒伪劣的器皿，全都是真材实料。一年之后这个中都的治理都成为各个地方效仿的榜样，都来学习。鲁定公把孔子调回国都升任司寇，孔子准备离开中都的时候，老百姓倾城相送，东门外十里人巷，人们排着队恋恋不舍含着泪和孔子道别。这说明圣人讲的这些东西，确实是可以把国家治理好的。

下面讲，“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就是刑罚用的不当，不当就是不公正。就是指执行法律的人没有公正的美德，用刑的时候喜欢判重就判重，喜欢判轻就判轻，都是随着自己的喜好。“不中”的另一种含义就是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淮南子》上说人不知道礼义就不能够刑罚，法可以杀不孝者，不能使人成为孔子曾子那样有德行的人；法也能够给窃贼以刑罚的制裁，但是不能使人成为伯夷那样廉洁的人，孔子培养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成为世间的表率，这是靠教育所成就的，也是靠礼乐的教化所成就的。所以没有礼乐教化，仅靠刑罚治理民众，就会出现“民免而无耻”的现象。“民免而无耻”是指刑罚法律很严苛，人们惧怕法律刑罚的制裁不敢去做坏事，甚至想方设法的做坏事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是没有羞耻心。像我们现在社会所出现的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青少年倚强凌弱等等，都是“免而无耻”的表现。在中国我们近几年也越来越发现，有很多孩子才十三四岁，结果就已经堕胎了，这就是“民免而无耻”所导致的，没有礼乐的教化所导致的。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刑罚用之不当，人民感觉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这就天下大乱了。最后这一句是结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所以君子用一个名

词，必得恰如事实能顺理的说出来，能够顺理地说出来必能行得通，所以君子说话不能随便。“苟”就是随便说的意思，像我们现在到处都兴盛演说，这也是一个很可哀的事，因为演说者的口才很好，知识面很丰富，但是所说的话不一定是符合道的，结果都会误导人心。这个在古代被看成严重的使社会不能够得到治理的行为，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这句话是樊迟来向孔子请学稼、圃时孔子回答的。孔子的时候，各国都是逞干戈，崇尚游说，礼乐不能够推行，于是樊迟就向孔子来问怎么样种庄稼、种菜，意思是讽劝孔子如今礼乐都推行不通，教民稼穑就可以了，这样对百姓也有益处。但孔子不以为然，还是以办政治为重要，所以就讲了这一段话。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请求学庄稼，孔子说要学种粮食他比不上老农；又请学种菜，种菜比种庄稼容易，但是孔子说他比不上那些经常种菜的老圃。孔子谦和不答，就是他不懂的东西他不强以为知，现在的人却是什么都逞能，没有读过经典也可以讲传统文化，随便批评经典，评判圣人。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樊迟出去后，孔子说樊迟是小人。君子小人的说法有很多种，普通是指在位的是君子，不在位的是小人，并没有褒贬的意思。有褒贬的是指有学问道德的是君子，反之是小人。这一章称樊迟是小人，是指他不在位的说法，也就是说不办政治的百姓就是小人，它并没有褒贬的含义。

中国古人以农业立国，民以食为天，提倡耕读传家。像《汉书》上就说：“孝悌力田。”古代的国君在立春的时候都必须外出推三犁，是给大家示范，要重视农业，要重视农耕。像上古时代的神农氏教民务农，周朝的祖先后稷教民稼穑，他们对人民有功，所以后世人还仍然纪念他们。孔

子志在礼乐，知道唯有推行礼乐教化，才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所以尽管时局不好，仍然不遗余力地积极提倡，等待机会。这几句话也是给我们讲了上行下效的效果“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在上位的人好礼，民众就不敢不敬。

在中国古代皇帝都尊重老师，见老师的时候都不能够以君臣之礼来接见，平时皇帝是面南背北的，但是接见老师的时候都要降阶，以主宾之礼来接见，一个站在东面一个站在西面，结果上行而下效，整个社会才兴起了尊师重教的风气。所以《孝经》上说：“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君子在位的人所说的话，就要想到能够为世人所称道，所作所为都要能够给民众带来欢乐，立德行义可使人们尊重，做事都能够为人们所效法，容貌行为举止都有可观之处，为人所仰望，一言一行、如何处事待人，进退都符合法度，是这样来统领民众的。所以民众对他又恭敬又爱戴，学习效仿他，这样才能够推行德教，而使政治行得通，这就是上好礼，则在下的百姓都知道恭敬。

“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在上位的人好义民众就不敢不服从。“义者，宜也。”在上位处处按着轨道走，没有人敢不服气。政治主要是在上位的人怎么做。像尧舜行仁义，百姓也跟从着他行仁义；桀纣行暴，结果百姓也从而行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在上位的人好信，民众就不敢不用情。这个“情”是情实，用情就是以诚实相待，上面的为政者喜好诚信就没有人敢不用真情，没有人敢不去尽忠。“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在上位的为政者真的能够做到这些，四方之民自然襁负其子而来投奔。“襁负其子”就是用布将小孩束负在背上来投奔，那么还用为政者自己去耕稼吗？所以在上位的人要依礼义治国，国家才能够治理得井井有条，大家都会到这个国家来，国家就不愁没有民众。像历史上舜在历山耕田的时候，就是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过了一年之后，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小村落；过了两年之后人就投奔的更多了，就成了一个小城市小城镇；过了三年，舜所在的地方就成了一

个大城市。

从这里也启发我们文化如何走出去，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个文化怎么样才能走出去呢？《大学》上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也就是说想要把文化推广到天下，首先要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人们安居乐业，社会呈现出祥和的状态，大家自然愿意来学习，所以"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原因就是他们以德义治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令人羡慕愿意学习。所以要想真正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首先就要我们培养起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首先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同时，大力弘扬中华文化，推动道德教育，重塑礼仪之邦。就如习总书记在考察曲阜后的讲话中所强调的，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试想一个充满希望生机祥和之气的民族，当然会吸引众多的目光，吸引世界各国的人们前来学习她的文化，并把这样一种追求和谐、爱好和平的文化带回到自己的国家。

这种意义上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才真正能够影响到世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体现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如果上位者不好礼乐，人们既使来了，但是政治混乱也无法生活下去。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虽有粟，谁得而食诸"？就像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社会动荡不安，谁还敢来投资，本来是想投资做企业的，但是结果连命都保不住，谁还愿意来呢？所以要想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重要的是先把自己的国家用自己的文化治理好，让大家前来学习。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其"指的是当政的人，办政治、办任何事情必须得有领导。当领导的人最辛苦，因为颁布任何的政策法令都必须自己先遵行，如果领导者本身行得正，办一切事都合规矩，自然能得民众的拥护，不用下命令，大

家也去实行，所以说“不令而行”。但如果领导者本身行得不正，虽然屡次下命令，民众也不会服从，大家会问为什么你不先干呢？所谓“言教者讼，身教者从”。这一句话也是给我们指出了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把道德教育变成了说教，认为老百姓需要教育，但是做领导的人可以不听。

《汉书·公孙弘传》上有这样一句话，“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上古尧舜那个时候，没有尊贵的官爵和丰厚的奖赏，但是百姓却相互鼓励劝善，相互勉励行善，不重刑罚但是百姓却不犯法，这就是因为君主为臣民做出了正直的表率，而且对待民众都很讲信用。到了后代有尊贵的官爵和丰厚的赏赐，但是百姓却不能够勉励行善；设立了严酷的刑罚，却不能够禁止作奸犯科的事发生。这就是因为当时的君主本身不正，对待百姓又不讲信用。这些论述都是告诫我们领导者自身要首先做到，然后再说，这样才能够让民众信服，愿意跟随他的政策教令去执行。

在《淮南子·缪称训》上也说了一句类似的话，“无诸己，求诸人，古今未之闻也！”意思是说自己都没有做到希望别人能够做到，这自古至今是闻所未闻的。“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诚在令外也。”百姓赞同为政者的言论并且信任为政者，是由于在对百姓做说教之前一向说话诚实；百姓服从执行命令而且能够被教化好，是由于在发号施令的时候也同样是出于真诚。“圣人在上，民迁而化情，以先之也。”圣人处在上位，百姓归顺并且被感化，同样是由于圣人对百姓动之以真情实意。“动于上不应于下者，情与令殊也。”反过来说君王处在高位发布政令，而下面的百姓不响应，就是因为君王的真情与政令不一致，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在《新序·杂事》上也说到：“唱而不和，动而不随，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就是说领导者倡导了但是没有人应和，行动了但是没有人去追随，这其中一定是有做的不完善不圆满的地

方。能够不走下坐席就能够匡正天下的人，都是反求诸己的人，不是从别人身上找原因，都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在《论语·颜渊》中孔子也曾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论语·子路》中除了这一章以外，后面还说："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这些都表明政治领袖以本身守正为重要。

在《群书治要》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楚庄王去向詹何请教怎么样治国，詹何回答说："为什么您知道怎么样修身，却不知道如何治国呢？"楚庄王就很诚恳地说："因为我得以祭祀宗庙得到整个的国家，我希望得到好的治国之法把国家治理得安定，把这个国家守护得好。"詹何说："我没有听说过一个君主修身很好，而国家却混乱的。也没有听说过君主修身不好，而这个国家能够安定的。所以治国根本的根本就在于自身的修养，所以我不敢用治国这些枝节小事来回答您。"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君主领导者要把国家治理好，要把一个团队带好，首先自己是一个有德行的君主，否则的话，就不要去谈论治国、带团队了。楚庄王听了他的回答之后很赞同，称赞他回答得很好，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所在。

《群书治要·汉书》记载着另一个故事，在汉武帝的时候曾下诏书求取治国方略，董仲舒在对答中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现代人思考。他说：古代的国土也是今日的国土，同是一片国土而古代能够使国家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没有奸诈邪恶、囹圄空虚，恩德润及草木，福泽广被四海，以古观今，为什么相差如此之远呢？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错乱，以至于道德风气衰败成这样呢？这个问题提的很好，因为我们现在社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也需要得到答案。提了这个问题之后，董仲舒自己回答说到，大概是现今的治国之道比之古时有所差失，或者说是与天理有所违背。天理是什么呢？上天对待万物是有所分配的，比如说给予了这个动物锋利的牙齿，就要去掉它的犄角，让它长着翅膀，就让它只长着两只脚。这就是接受了大的好处就不能再获得小的好处，同样的道理古代凡是接受俸禄的人，不以体力劳动谋生，也就不得从事商贸事业，这也是接受了大的好处，就不得再谋取小利。如

果已经接受了大的好处又要谋取小利，连上天都不能使其满足，更何况是人呢？这就是人们所以怨恨忧愁，苦其不足的原因了。自身受宠而居于高位，家人温饱而享受厚禄，于是凭着富贵的财力和天下人民争利，人民怎么能比得上他们呢？因此富有的人扩大他们的产业，贮藏他们的积蓄，致力于此而没完没了，不知满足，而且压迫践踏人民，人民渐渐因此而十分穷困。富有的人奢侈美满，贫穷的人艰难愁苦，而居在上位者却不予救助，那么人民就无法安乐地生存下去了。人民不乐意生存下去，连死都不躲避，又怎么会去避免犯罪呢？这就是刑罚之所以繁多，但奸邪仍然制服不了的原因啊！

所以享受俸禄之家，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当官的、当领导的、当公务员的，以俸禄为生就行了，不能再与人民争占产业，这样利益就可以普遍分布，而人民也可以家给人足，这是上天的公理，也是上古的治国之道，天子应该取法此道作为制度，大夫也应该遵循它并且成为自己的行为。古代的贤人君子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下属崇敬他们的品行而听从他们的教导，人民被他们的廉洁所感化而不贪婪鄙陋，由此看来天子大夫是百姓所效仿的榜样，怎能已居贤人之位却像平民的所作所为呢？惶惶不安地谋取财利，并经常担心财用匮乏，那是平民的意识；惶惶不安地求取仁义，并经常担心不能教化百姓，那是大夫应该考虑的事。

《易经》上说“负且乘，致寇至”，意思是说背着东西乘坐在车上，那就会招致贼寇来到。乘车是君子的位分，但是背负肩挑是平民百姓的事情，这话说的就是身处君子之位身处官位，而又去干平民之事的人，必然会招致祸患临头。这一句话实际上就给我们解释了习近平总书记以前就提到的，一个人不能既想当领导干部又想发财，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这不是上天的公理！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在上位者要能够以身作则，不与民争利，再去推行道德教化，才能够让人心服口服，人们才会信任，心甘情愿的接受教化。

子适卫，冉子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到卫国，冉有替孔子驾车，在古代给老师驾车的都是学生。孔子一看卫国有很多人民便说"庶矣哉"，这个"庶"就是众多的意思。人民众多对于办政治而言是好事，因为如果国家缺少人才就不能成为国家，国家必须得有土地、人民、主权，其中人民第一，民惟邦本，特别是在古代的时候人更为要紧。因为在那个时候，到哪一国去都有职业，所以如果本国的政治好就待在本国，如果本国的政治不好那就会迁到邻邦。本国的人才减少了，不能办事，所以国家对人民特别重视。如何聚集人民，在《大学》上说"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如果当政者想要钱，就没有人，有人就没有钱。如果统治者奢侈浪费，过分盘剥百姓，那百姓在这个国家就呆不下去了。《礼记》上也记载"苛政猛于虎"，孔子带着弟子从泰山旁边路过，看到一个老妇人哭得非常伤心，孔子就派学生去问她为什么哭的如此伤心，这老妇人就回答说前年她的公公被老虎给吃掉了，去年她的丈夫被老虎给吃掉了，今年她的儿子又被老虎给吃掉了。孔子就问既然这个地方老虎出没这样的厉害，为什么不换一个地方住呢？结果这个老妇人回答说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苛政。孔子听了之后，非常的感叹，对这些学生说要记住"苛政猛于虎"，苛虐的政治比老虎伤人还要厉害。

《朱子治家格言》上也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告诉我们要珍惜物力，不能够奢侈浪费，特别是当领导的，不能够自己有钱有权就可以随意的挥霍。贪图欲望享受的人绝不可能办好事，为什么呢？因为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就会想方设法的聚敛钱财，怎么聚敛钱财呢？只有对老百姓很苛刻，甚至想到去贪污受贿，用不法的欺骗的手段来谋取利益，所以贪图物欲的人绝对不可能把事情办好。《群书治要·汉书》上也记载说："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古代人说一个农夫不耕种有的百姓就会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有

的百姓就会受冻，万物的生长是有时节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但是使用却没有节制，这样一来财物一定会用尽。终日向百姓要钱让百姓受难，老百姓就不欢迎了。古代的政治制度和今天的政治制度虽然有所差异，向百姓要钱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比如说古代可以征徭役，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要钱，现在主要是纳税，但是原则是相同的，所以为政者要讲究节俭有很多的好处。在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个对治国理政、改善社会风气都至关重要。

我们接着上一句学习，冉有一听孔子称卫国人多，便想了解为政之道，如何好上加好，所以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就是要使人民富足，人多了而且能够不饥不寒，这个才可以再教以伦理道德。在《孟子·梁惠王》篇上也这样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制礼义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所规定的田产制度，比如说分配制度等等，让人上不足以侍奉父母，下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年头好的时候终日奔波辛苦，一旦遇到了年头不好的时候就不免于饿死冻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死里逃生还恐怕来不及，谁还有功夫给你讲道德明理义呢？所以民以食为天，百姓都要吃饭，必须有盈余。除此之外还有婚丧嫁娶等等必要的应酬，还有天灾人祸，生病花钱就更不一定了，所以一定要解决民生问题，让老百姓富足。

冉有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以为人民富了就要受教育，所以说“教之”。富了之后就“饱暖思淫欲”，“小人闲居为不善”，饿也不行饱也不行，所以必得受良好的伦理道德的教育。如果没有伦理道德教育，生活奢侈浪费，欲望没有满足，不懂得节约，就是一个月赚十万美金也一样的穷，为什么呢？因为吃喝浪费，还要有赌博好色等等开销。有的人一天花十块钱也同样的富，除一日三餐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花销，月收入三千块钱，已经是很富裕的了。那些喜欢唱歌跳舞，赌博好色的人，虽然有十万美金还是要举债。所以孟子说“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又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

地方其实只有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人把它保留下来了，而禽兽把它丢掉了，这一点点是什么呢？这一点点就是人懂得礼，懂得义，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所以教民怎么教法呢？要以五伦八德的教育为根本。

孔子祖述尧舜，尧教民就是教以人伦。《孟子·滕文公篇》记载，在尧的时候以契为司徒，用现在的话讲契就是教育部长，教导人民五伦关系，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教民首先教人做一个好人，把人做好了才再向上提升，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做一个纯粹的人。无论生在哪一个国家，都必须接受那一国的根本教育，因为各国有各国的风俗，各国有各国的文化，根本教育就是风俗文化。民族是血统，但是文化更重要。有人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被称为“黄香蕉”，什么叫“黄香蕉”呢？就是他的皮肤是黄色的，但是里边所受的教化都是西式的教化，是白人的教化，所以被誉为“黄香蕉”。中国自古以来重视五伦大道，比如说夫妻的结合有一定的规矩，不能乱来，所以在古代婚礼非常的讲究，夫妻双方对夫妻结合这件事看的很重要，所以也非常的认真对待。如果没有文化教育，即使是同胞兄弟也会为财产而争，就像我们现在出现了很多兄弟之间把彼此送上法庭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为在五四运动、十年文革以后，传统文化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人们一度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五伦关系没有人再讲了，人们不再接受五伦八德的教育了。所以不知道做儿子的应该怎么样孝敬父母，兄弟应该如何相处，夫妻应该如何恩爱，做领导的应该怎么样仁爱下属，做被领导的应该如何负责尽职，做朋友的应该如何诚实守信了。这些没有人讲了，所以即使是一奶同胞都会因为一点点的财产吵上法庭。如果有文化那就不同了，像在传统社会大家都信仰孔子，学五伦，重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不是说外国的东西不能学，必须是自己的根本学问先要守住，才知道应该学什么，不应该学什么，否则你所学来的不是好的东西，不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是恰恰相反，可能是把别人那个糟粕都学来了。中国传统文化都主张“志于道”，而外国的东西是“游于艺”，中西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学习的时候必须明辨而加以区分。

恢复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弘扬中华文化是迫在眉睫的一件事。在2013年的11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曲阜的时候，特别拿起了两本书回家要好好看一看，这两本书一本是关于《论语》的解读，另一本书就是关于《孔子家语》的解读，都是圣贤人的著作，富有深意呀！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升起温情和敬意。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亡过国，但是不曾亡过民族，亡过文化。在晋朝的时候五胡乱华，五胡十六国占领了中国的土地，但是他们仍然学中国的言语政治。晋怀帝、晋愍帝被掳，为胡人行酒，当时大臣引以为耻而自杀的很多，都是为文化的衰亡而痛心疾首啊！到了元朝蒙古族入驻中原，清朝满族人统治中国，但是都是学习中国的文化。在改革开放之后盲目的崇洋媚外，不加选择的“拿来主义”甚嚣尘上，导致的结果是一批年轻人不认同中华五千年的养生文化，却以吃西方的垃圾快餐而沾沾自喜；看不懂祖宗的文言文，却以看英文的美国大片为乐；不能欣赏礼仪之邦的礼乐文化，却以传唱外文的通俗歌曲为流行。这些现象让人深刻地感受到，一个没有高尚文化熏陶的民族，就犹如一个没有高尚精神支撑的躯壳。

可喜的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如今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首先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所强调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在11月26日考察了孔府之后，他又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在2013年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之后，习近平又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这一系列的论述，都是让我们要正确地对待和评价自己的历史文化，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和民族生起自豪和自信。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善人治国一百年可以"胜残去杀"，这两句是古代的成语。"诚哉是言"，是孔子称赞的话。治理国家，孔子是三年有成。善人虽然达不到圣人的程度，但是也非常难得，他出来治理国家，治理一百年就可以"胜残去杀"。"胜残"就是胜残暴之人，使残暴之人不为恶，"去杀"就是不用刑杀。在孔子的时代各国大都很乱，弑父弑君或者出兵攻伐都是残暴杀戮，积非成是，恶习难除，最好是有圣人出来能够转恶为善。不得圣人，但是有善人出来治理一个国家，逐渐改善也是好事。"善人为邦百年"这两句成语，可以说切中时弊，所以孔子说"诚哉是言"。我们看历史就可以知道，自古至今"天下太平"这四个字是很难实现的。像在历史上王安石将安定的北宋弄得乱七八糟，后来司马光要改变王安石的乱政，就有正人君子劝告他说改革弊端，不可以太匆忙，因为要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治病一样虽然是切中病的药，下的太重也不行，不能将几次的分量并为一次服下去。欲速则不达，所以必须得用上一百年，百姓才能渐渐的习惯。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孔安国的注解："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三十年为一世，如果有王者接受天命，施行仁政，也必须三十年而后有成。所以称王不容易，必须自己本身做的很正当，才能够值得百姓依靠。王者受命治理衰世，第一必须是解决民生问题，像我们前面讲的首先要"富之"。第二就是必须实施道德教育，前面讲的"教之"。必须办仁义

道德的事使人民身心皆安，而这两者都不是短期就能奏效的，必须三十年及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也讲到，“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在现代社会推行道德教化，相对于古代而言有了更多的便利，因为我们科技发达，网络电视广播可以渗透到家家户户。所以我们要依靠这些现代的媒体，传播正能量，宣讲道德故事，把那些身边孝亲感恩的事迹都给大家宣讲出来，每一天让人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相信会在很短的时间就会有很好的效果。

像在广东省的博罗县有一批领导干部，学习了传统文化，接受了因果教育，结果再也不敢贪污受贿了，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这七天的学习他们明白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以这个博罗县所有的领导干部，现在也都在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效果也很好。一些省市和县的电视台也专门设立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专业频道，专门播讲伦理道德和因果教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像在广东省的一个县，在每一天的黄金时间都播讲蔡老师所讲的《弟子规》，结果有一次因为有别的活动，这一天就没有按时播出，结果很多老百姓纷纷打电话到电视台，说今天还在等着看《弟子规》细讲、幸福人生讲座呢，怎么今天把节目给换了呢？这说明伦理道德的教育确实能够深入人心，是人们迫切想要学得的。

特别是传统文化的教育是以五伦为核心，试问哪一个父母不希望把儿女教导好，不希望儿女孝敬自己的呢？而哪一个儿女不希望父母慈爱引导自己成才的呢？哪一对夫妻不希望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白头偕老的呢？哪一些兄弟不希望和睦相处，能够珍惜骨肉之情的呢？那么伦理道德的教育恰恰是在讲这些问题，都是大家在生活中迫切需要面对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深得民心，受到人们欢欣喜悦的接受。所以这个传统文化的讲座，之所以这么深得人心，确实是“以道得民”，它讲的是道，所以能够深入民心。

子曰：“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这句话的意思和我们前面讲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意思是一样的。这里边的“苟”，皇侃《论语义疏》说：“苟，诚也。诚能正其本身，则从事政治何难之有？”如果本身都不正，如何去正别人呢？在《孔子家语》上记载着孔子和鲁哀公关于当时的国君为什么不能修明礼教的一段对话。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国君之所以不能顺利成功地推行礼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己不能再像古圣先贤那样率先垂范，反而过着荒淫无道的生活。

鲁哀公问孔子说：“请问什么是大礼？为什么你一谈到礼就那样的尊崇呢？”孔子回答说：“百姓之所以能够正常的生活，礼是最重要的保障。没有礼，就无法按照一个合适的标准来祭祀天地神灵；没有礼，就无法区别君臣、上下、长幼的秩序；没有礼，就无法区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的远近亲疏关系。所以君王对此非常的重视，带头恭敬奉行，然后以自己率先所做出来的样子来教化百姓，使他们顺礼而行。他们居住的是简易低矮的房屋，穿戴的是节俭的衣服饰物，乘坐的马车不加雕饰，使用的器物也不是精雕细刻的，饮食不讲求美味，心里也没有过分的奢望，使自己与万民百姓有福同享，古代圣明的君王是这样恭敬的行礼的。”

鲁哀公听了之后就问：“当今的君主为什么不能这样去做呢？当今的君主为什么不能行礼了呢？”孔子的回答对我们很有启发，孔子回答说：“当今的君主追求利益，贪得无厌，荒淫无道，奢侈无度，懒惰怠慢，游手好闲，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钱财来满足自己的贪心，使百姓抱怨朝廷，违背众人的意愿去征讨政治清明的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任意的使用暴虐严酷的刑罚诛杀人民，而不依据正常的法度。从前君王治理和役使百姓，都是按照前述的做法去做，而现在的君王则是按照后面的做法去做，可见当今的君王不懂得修明礼教了。”

这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得力就是因为在位者、领导干部不能够率先接受道德教育，并且身体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要求。但是却要求百姓去积极参加伦理道德的教育实践，这样就把道德教育变成了愚昧百姓的工具。所以什么是“愚民政策”呢？就是自己提出来了，但

是自己可以不做，要求百姓去做。很多人认为儒家文化是愚民的工具，麻醉人们的精神鸦片，但是实际上我们读经典就明白了，这种批判毫无理由。为什么呢？因为在《大学》上就说："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首先讲天子、领导者必须以修身为本，这样的话上行而下效，整个社会才兴起了道德的风尚。

所以我们看历史那些卓有成就的人，其实都是有他的成功原因。比如曹操他为了爱民，就下紧急命令说马不可踏到麦田，结果突然一只乌鸦飞过来，曹操自己的马受惊结果冲入麦田，曹操就想自刎受罚，在大众的恳求之下曹操不得自刎，便以割发来代罚。结果这个举动一做出来，全军悚然，纪律严明，曹操也是明白了上行则下效的道理啊！所以如果领导者自己不能力行《弟子规》的教诲，自己做事杂乱无章，你想要求下属做事很规范，很有规律，很有秩序，那是不可能的。如果领导者自己贪财好利，你希望下属都很清廉，不贪污受贿，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希望自己的属下怎么样，自己就要给他做出一个好的榜样。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鲁定公来问孔子："一言而可以兴邦。"说一句话国家就可以兴盛起来，有没有这回事呢？鲁定公怀疑一句话就有这么大的功用吗，所以他问孔子：有之欤？孔子对鲁定公说："言不可以若是。"一句话就把国家兴盛起来大概不会如此。但是"其几也"，"几"就是近的意思，虽然不能说一言兴邦，但是说一句有道理的话可以与兴邦接近。后面就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人曾说“为君难为臣不易”，为君为臣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办理大事，所以难为。如果为君者深知为君之难，就能够慎重其事，那么这样一句话虽然不能立即使国家兴盛，但是也接近于能够使国家兴盛了。

我们听了这一句话也要反省，在现代社会很多人之所以喜欢考公务员，喜欢当官，为什么呢？做官是为了荣耀，即使做小官也比做平民好，官愈大愈好，当总统更好。这个都是为了光耀门庭，这是个大错误！做官并不是为了光耀门楣，必须使人民安居乐业。那么怎么样使人民安居乐业呢？那就是必须把政治办得好，政治没有好过一个“安”字，如果政治办不好，即使一天赚一百万，但是做奸盗等等，这个社会能安吗？所以叫百姓安了，领导人办事也可以少操心，大家都安心。我们看在古代社会做官的人相当的清闲，很多的诗词歌赋都是当官的人闲暇之余做出来的，说明古代的时候政治办得好，而办得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伦理道德的教育，有儒释道三家的教学。现在当领导的非常难做，因为教育没有办好，人心坏了，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都不顾别人的死活，在这种情况下作奸犯科的事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整个社会很难安定。做好国君不容易，所以做国君不是让国君享福，《孝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在《六韬》上记载古代的圣王做国君时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周武王主动地向姜太公来请教，“五帝时期是如何戒惧自己，给自己以警戒的，可以给我说说吗？”姜太公就回答说黄帝的时候，他是这样警戒自己的：“我处在民众之上，经常是身心不安，恐夕不至朝。”尧帝处在民众之上，他警戒谨慎小心翼翼；舜处在民众之上，他是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禹处在民众之上，战战栗栗，恐怕自己的统治到不了明天；汤处在民众之上，颤颤抖抖，生怕自己的治理达不到第二天早晨。武王听了也很受教，就说：“现在我刚刚兼并了殷国，处在民众之上，应该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不敢怠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古代当领导者的当君王的，是希望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都做到了“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不能够随意的役使民众，甚至残害损伤民众，所以

这就是讲的“为君难”。

“为臣不易”就是当官的办事者，虽然不是最高的领导，但是错了也不行，因此说“为臣不易”。现在当官的几乎没有不挨骂的，整个社会是怨声载道，为什么呢？因为当官的人在现代社会，很难接受得住糖衣炮弹的考验，在财色名利的诱惑面前很难把持好自己，这也体现了现代为官的不容易。“为君难，为臣不易。”这两句话是古人说的，告诉我们当不好国君，当不好臣子，办不好政治，社会就很难安定。如果把这句话听到心里而照办，即使当时不能够兴国也不会亡国，这句话就和兴国很接近了。

接着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诸？”“一言丧邦”也是成语，孔子回答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举的例子有所区别。他说：“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例如有人曾说我当国君唯一的乐趣，就是我所说的话没有人敢违背。孔子举了这个例子之后就加以辨别，说国君说的话如果是善的、有道理的，没有人敢违背那当然是好。如果他所说的话不善而没有人敢违背，那么这样虽然不会马上就亡国，但是也接近亡国了。“言为心声”，孔子解答鲁定公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指明为政者要有知难敬事之心，要有去奢纳谏之心。

在《韩非子·外储说》上记载，五霸之一的晋文公的后代晋平公的时候，晋平公闲暇的时候和群臣喝酒取乐，喝到高兴的时候，晋平公说到为君的乐趣是什么呢？那就是他所说的言语没有人反对的都照办，这就是当君主的乐。现在如果有人说我过错，说我不对我就不乐，而对人说的恭维话就很高兴，这属于小人的心理。师旷是当时的乐师，他是个音乐家，在古代的时候祭太庙都有乐师，而师旷为了学音乐就把自己的双眼刺瞎，以便专心而少分心，所以师旷一听晋平公说这句话，就抱着自己平时常用的琴，撞晋平公这个无道的昏君。师旷说：“你说出来的话对国家好，大家不违背那固然是好。如果国君说的话不好而大家不违背，那不就是要亡国了吗？”晋平公听到就认错了。所以在尧舜禹汤的时候，做君王是战战兢兢。范仲淹是“后天下之乐而乐”，大家都乐了当领导的人才乐，这

是与民同乐。如果乐在自己说的话而无人违背，就和亡国不远了。

在《群书治要·吴志》中记载，能使国家兴盛的君主和能够使国家混乱的君主，有什么不同呢？它说："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能够使国家兴盛的君主和领导，都是喜欢别人指正他的过失，而能够使国家混乱的君主，都是喜欢听别人对他的赞扬恭维。喜欢听过失的人他认识到自己的过失，他的过失一天一天地减少，福也就来到了；而喜欢听别人对他赞誉的人，他的声誉反而一天一天地减损而祸也就来到了。

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做领导的人，要能够有纳谏的心量，知道别人来说都是为我们好。而我们看到这里边的"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对现在的媒体也要特别地加以重视，因为现在的社会风气都是由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来倡导的，这些媒体应该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要隐恶扬善。如果相反"隐善扬恶"，这就是"一言以丧邦"了。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叶原来是一个小国，后来从属于楚，由叶公治理。叶公就是楚大夫沈诸梁，字子高。孔子要到叶，先有预备。《曲礼》上说："入国问禁，入境问俗，入门问忌。"将要到一个国家的时候，先问一下人家禁止什么；先到一个国境的时候，要问一下有什么风俗；到一个家去拜访的时候，要问一下他有什么忌讳。孔子早就知道叶国的政治，在竹添光鸿那里就说："是时楚国数度伐蔡，又与吴争陈，二国近楚苦兵。故夫子言：'楚欲为政于天下，自近始，讽以恤小爱邻之仁也。'"

孔子显然知道当时的楚国曾经几次出兵征伐蔡国，又和吴国争陈，这两个国家因为靠近楚国，苦于兵荒马乱。所以孔子的言语，就是建议讽喻，楚国想为政于天下，先从邻邦来做起。就是要体恤弱小，以仁爱之心对待邻邦。叶公问政，孔子答复为政之道"要使近者欢悦，远者来归"。

春秋的时候，列国以人民众多的国家为强盛。"近"就是指你近前的

人，比如本国的人、边疆的人，对你办的政治都高兴，才不会到别的国家去。“远者”就是指外国人，国家政治办得好，外国人也都来投奔。但是当时的楚国却并不如此，而是恰恰相反，“近者不悦，远者不来”。在《梁章巨〈论语〉旁证》引证说：“楚疲其民，以蚕食中国，夫子因叶公之问以止之。”楚经常征讨别的国家，所以使国民都很疲惫不堪，吞食别的国家。夫子正好趁着叶公的这个问话，希望能制止楚国的这种政治。办政治的人要想使“近者说，远者来”，必然要推行仁政，这样才能感召国内外人民，所以孔子是针对楚国的情况才这样回答的。

在《管子·版法解》上也说：“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要想使“近者悦，远者归”，对民众有仁爱之心，所制订的制度法规都能使人民获得真实的利益，人们自然就来了。又说，“爱施俱行，则悦君臣，悦朋友，悦兄弟，悦父子。”能够仁爱，又能够布施，能够给他们施加恩义，施加利益，这样的话，君臣、朋友、兄弟、父子都欢喜。还说，“爱施之德，虽行而无私。内行不修，则不能朝远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义，饰父子兄弟夫妇之义，饰男女之别，别疏数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如此则近者亲之，远者归之。”就是要把仁爱、布施的德行实行开来，而且实行起来没有私心。如果在内的德行不加修养，就不能够使远方之君来朝拜。中国在历史上之所以被誉为华夏之族，礼仪之邦，就是因为当时的国君，修身修得很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外国人来到中国做生意，朝拜，看到五伦关系非常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彬彬有礼，所以特别的羡慕。回去之后向自己的国君禀告，所以当时其他国家的国君，都把中国的皇帝尊称为“天可汗”，那就是天底下公认的领导者。这不是靠武力的强大，四处征讨别的国家，让别人给自己封号，而是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了，别人心甘情愿地愿意来学习，而给中国的皇帝这样的封号。

《大学》上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个君主的修身是根本。“是故正君臣上下之义，饰父子兄弟夫妇之义，饰男女之别，别疏数之差，使君德臣忠，

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也就是说，使这个五伦关系都能够处理好，礼义章明，这样才能使“近者亲之，远者归之”，在身边的人、在近处的人都亲爱他，在远处的人也愿意来归附他。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要想使“近者悦，远者来”，必须实行仁政，有爱施之德。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

子曰：“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莒父”的这个“父”，音是“阜”。在《春秋大事表》记载这是鲁国人的语言，如梁父、单父、莒父等等。郑康成注：“旧说莒父，鲁下邑。”就是属于鲁国的一个城，一个邑。子夏去当莒父的邑宰，向孔子请示政事，孔子告诉他“毋欲速”，不要求其速成，因为“欲速则不达”。“毋见小利”，不要着眼于小利益，因为见小利就不能够成就大事。现在我们社会，都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倾向，追求速成速效。其实这个迅速，都是有副作用的。

比如说现在的西药都讲速效，为什么有速效呢？如果感冒了，吃点儿速效感冒药，西药是好坏通杀，好的细菌、坏的细菌它不能够辨别，所以在杀死病菌的同时，把好的细菌也同样杀死了。实际上，人体是一个很好的免疫系统。当病菌侵入的时候，全身的免疫系统就会迅速地启动，对这些病菌来进行对抗，所以人为什么会发烧、流鼻涕，就是因为在和病菌对抗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就会发烧。鼻涕眼泪，就是双方作战留下的“尸体”。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把这个速效药、西药吃进去了，西药也不会辨别，把病菌杀死了，也把好的细菌杀死了。下一次再遇到感冒的时候，再有病毒入侵的时候，如果不吃感冒药你就扛不过去了。实际上人体是一个非常好的免疫系统，如果你感冒的时候多喝白开水，注意休息，多吃蔬菜水果，人体的免疫系统自然发挥作用，过上几天自然恢复正常了。

所以“速”看起来效果很好，实际都是从枝节上、末上解决问题。比如这儿有一堆的垃圾，招引了很多的苍蝇蚊子，速效的方法就是喷上一些杀虫剂，“啪啪啪”几下，苍蝇蚊子不见了。但是因为这个垃圾还在这

儿，过了没几天，苍蝇蚊子又飞来了。所以之所以速，都是在症状上、枝末上解决问题，而没有找到根本。我们观察自然界的现象，都有一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过程。如果我们的事业还处于春生的阶段，就不能指望它立刻就有收获，因为这不符合自然规律，“欲速则不达”。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农夫耕作的时候也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们一直都在做好事，做善事，在做善事的过程中还广结善缘，不和人发生冲突矛盾，助人为乐，成人之美，一有机会就帮助别人，成就别人，“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当我们遇到事需要帮助的时候，人家自然也会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个例子很明显就是贪污受贿。像现在做官的人，他就看到眼前的这些蝇头小利，给人家审批一个项目，把这一个项目批给某一个人了，就能收到回扣，一下子就有钱了。但是不知道因为做了这样违法乱纪的事，过不多久东窗事发，自己锒铛入狱，本来可以平步青云，但是却落得了一个深陷囹圄的下场。在《大学》上还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财货是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它一定会以不正当的方式败散掉。如果人们都深信这个道理，那就不会做这些“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事了。

我们看《群书治要》，看到古代很多的领导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比如说鲁国的宰相公仪休，他为官很清廉，要求属下不能够与民争利。他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吃鱼，结果有人投其所好送了他很多鱼，他就派人又把这些鱼给送回去了。这个人觉得奇怪，就问：“我知道您爱吃鱼，所以特意选了一些上好的鱼送给您，为什么您不接受又把它给送回来了呢？”公仪休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正是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我今天才不能接受您的鱼。我爱吃鱼，我是宰相，我自己去买不就好了。如果我今天接受了你的鱼，染上了爱贪便宜的心理，越贪越多，当我被抓进监狱的时候，请问我还能吃得到鱼吗，还有人再送给我鱼吗？所以正是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我才不能接受您的鱼。”所以我们多读一读这样的历史典

故，我们的理智就能够提起，不会“利令智昏，情令智迷”，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就不会昏头昏脑了。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你就不能够使事业爬上巅峰，半途而废了。这个就是讲“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例子。

因为错乱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就像得病如墙倒，快，也不是一天能够去除的。去病如抽丝，一副药就能把病医好的很少。所以治病需要慢，更何况还有“三分吃药，七分调养”，欲速则不能治愈。同样的道理，想一下子把政治办好，也办不到，而且还会出乱子。因为积累得已经很久，当时就改，百姓也不以为然。仁者为政，百年才可以胜残去杀。比如说如果治国计求霸业，那就不能够成就王道。这也是见小利，大事不成的例子。

樊迟问仁。

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恭敬”两个字，依照《说文解字》都当“肃”字讲，但是在这里稍稍有所区别。《尚书·无逸篇》疏引郑康成的注解说：“恭在貌，敬在心。”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引《汉书·五行志》的内容，“内曰恭，外曰敬。”在这里《五行志》的解释比较妥当。

“樊迟问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居”是安居的时候，在家不做事的时候，心里要保持恭肃。仁人都是“诚于中，形于外”，办事的时候才能形于外，所以安居无事时要存恭肃之心，即使一个人在家里闲坐着，也不能够懈怠。虽然屋里没有一个人，但是也要如“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在《弟子规》上也说“入虚室，如有人”，不能说别人看不到我，我就可以懒散懈怠。我们在人前人后不同，虽然没有害别人，但是却害了自己。因为日久天长，心中就没有恭敬，没有仁爱；到了社会上，一举一动就不会为别人着想。我们学传统文化，学了不照办，学一千年也没有用，因为这个树没有根基。

“居处恭”虽然表现的是内心，但是也可以从我们的环境来看到，因

为境随心转，环境的整齐与否，也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反映。因为我们自己粗心大意，很难观察到自己的心有多么乱，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到自己的心是乱还是敬？可以从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来看到，因为这个环境是我们内心的表现。所以很多人说《弟子规》上说的“房室清，墙壁净”、“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这些都是小节，为什么小节古人却如此的重视呢？这里边有学问。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心有没有秩序，心够不够清净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心，到底是清净还是脏乱，我们从自己所处的环境就可以看到了。所以有人说他要任用一个人，首先到他的办公室去看一看，看看他的文件整理得是不是整齐，他的物品是不是摆放得有规矩。如果他的物品摆放不整齐，文件夹都乱放，这样的人做事很难有条理。所以我们做事为什么会出差错呢？出差错那是一个结果，是一个表现，说明我们的心不定，心比较散漫。所以《弟子规》的教诲并不是小节。古人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把自己的环境变得清净整洁，你才能够对自己做事生起信心，做事才有条理。所以要改变自己，先从自己每一天的衣食住行起居等等方面做起。

《无量寿经》上也说：“做事仓猝，败悔在后。”把物品摆放整齐，把东西放置在固定的地方，都是让我们把心归于敬。“虽有急，卷束齐”，即使有急事，也要把这些东西摆放整齐，是把你的心时时安定在一个定的状态，让心时时不杂乱不着急。这是告诉我们学一定要从礼上来学，从这些外相上做好了，这个内心也会慢慢地调伏。

“执事敬”，办事笃实，毫不苟且，不问公事还是家事，大小事一律要敬。敬是表现于外的，但是并不是说没有内，而是先有内然后才有外，必须先存心诚，内外如一。“执事敬”还包括该办的事就办，不该办的事就不要办。何者该办，何者不该办呢？懂得了礼就明白了。那就是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是你该办的范围就少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如果他人托付给你可以办，否则那就是干涉。现在社会上往往是很多人自己的责任尽不到，专挑别人的事，这一点大家要避免，要学会把自己的事做好，不要去管别人的事。因为别人的事

做好不做好和我们没有关系。大家要做到不是你范围内的事就不要管，对于自己来说是浪费光阴。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自己做事不认真负责，久而久之就开始养成了习惯，什么事都很难做好。对公来说，就是虚废货款，多管他人事，还是扰乱社会。

“与人忠”，这里指的是与人相处。相处要“忠”，就是待人忠诚。“合则留，不合则去，”但是决对不能够欺骗人。这三者是为人之道，即使到了落后的蛮夷之地，也不可以舍弃。我们学了这一项教诲就要守住，不论别人给我们戴什么帽子，比如说我们落后，老古董等等，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圣贤人的教诲来做。这三条是做人的道理，大家回去要自省，有则加勉，三条做到就算“仁”。

前面颜渊问仁，孔子答“克己复礼为仁”。颜渊“请问其目”，为仁的条目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条目都很难实行。这一章樊迟问仁，讲“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比较容易学，这三条做到了就是“仁”。古人说“心净则土净”，如果“居处不恭，执事不敬，与人不忠”，这心怎么能够净呢？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

这章主要在说恒心的重要性。先是孔子举南方人的两句成语，并且加以称赞。然后就《周易》的恒卦九三爻辞，显示出无恒心的人一事无成，替他占卜也不灵，为什么呢？比如刚替他占卜某事，转眼之间他又改变主意了，这种心意不定的人，“占之无用”，所以孔子说不用为他占卜。

“巫医”皇侃《论语义疏》认为“巫”是接事鬼神的人，“医”是为人治病的医生。但是清朝的毛西河、俞曲园等认为应该根据《礼记·缁衣篇》，“巫医”应该作卜筮讲，这可与下文的“不占”的意思相一致。《礼记·缁衣篇》上说：“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在《礼记》和《论语》上也各有记录，这两种注解，雪庐老人认为毛西河的意见比较妥当。“人而无恒，

不可以作巫医。”恒心是什么，就是今天学什么明天还接着学什么，如果人们没有恒心的话，学什么都学不成，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

现在我们大学都用学分制，这个学分制就是“无恒”，就会不坚固，很难成功。现在的学校和古代的学校教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古人教学首先求定力，求“根本智”，是把心思定在一门之上，结果“一经通一切经通”。而现在的学校求的是广学多闻，要学这个科目得一个学分，学另一个科目又得一个学分，要修满学分才可以毕业，这就“无恒”，很难成就。特别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确实有很多的弊病。比如说我们的博士生，一共就有三年的时间，但是第一年还要学政治、英语等等的公共课；第二年不仅仅要学自己论文的专业课，还要学其他的专业课。到了第二年的时候确定了一个论文题目，结果只用一年多的时间去搜集资料，最后写了一篇论文，十万字的文章洋洋洒洒，看似很多，但是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有自己的研究深度的却寥寥无几，这个就是没有专一的结果。而古人读《论语》，在年轻的时候学《论语》，到老的时候仍然在学《论语》。

比如说我们要请一个人去讲《论语》，一个人花了十年的时间学了《论语》、《孟子》、《孔子家语》等等十部经典，还有一个人十年就学了《论语》一部经典，那我们要请一个讲《论语》的人当然是请这个十年都在专攻《论语》的人来讲，他所讲出来的深度当然和十年讲了十本经的人有所不同。而且十年定在一个事情上，十年都在一个经上用功，就能够把心定下来。把心定下来才会有智慧。这个就是和西方人不一样的地方，也是西方人不能够理解的地方。为什么“一经通一切经通”，因为所有的经典都是圣贤人心性的体悟，都是他心性的流露，如果你真正把一经能够学明白了，所有的经都是圣贤人心性的流露，怎么会不明白呢？所以这就是现在的学校，培养不出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恒”。

南方人说要是没有恒心不可以作巫医。无恒的人给他占卜也不灵，不可以给他占卜。“巫”就是为他祝祷，“卜”就是占卜他的未来，都没用处。这两句是古人的话，孔子赞叹说很有道理。宋儒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说，

无恒的人即使做“巫”做“医”这样的“贱职”都不会成功，这个说法不妥当。因为作医生何贱之有，在古代的时候有两种人最受尊敬，一种是老师，一种就是医生。因为医生治人的身病，老师教人慧命，这两种人对社会的付出是无私无求不讲条件的，所以最受尊重。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这一章的“君子小人”是以道德来分辨的，君子就是有道德学问的人，他与人相处和平忍让，但是见解卓越与众不同。君子崇尚和，但不是“流和”。比如说有人来请你去看电影、跳舞，不要以为不去便对不起对方，否则就是“流”和“小人”。在佛教中有一句话说“恒顺众生”，恒顺众生也是恒顺众生善的地方，不善的地方也不能够恒顺。“和”是一概不侵犯人，不妨害人，忍让尊重他人。比如说他人的公事、书信，包括我们现在说的短信、手机，都不要擅自观看。你擅自观看了，那也不是尊重他人的表现了。小人所见平庸，以同为和，譬如流水东流则东，西流则西，随波逐流，与众相同。但是小人有个特点，就是他争利的心特别强，因为这个争利的心做事就不能与人和，不能够与人和谐相处，但能扰乱他人而已。

在《群书治要·晏子》上，晏子就为齐景公辨别了“和”与“同”有什么不一样。《晏子》上记载梁丘据驾着六匹马拉的车从远处赶来，齐景公就说：“梁丘据是和我很和的人。”晏子听了说：“这只是气味相投，并不是和。所谓的和谐，用口味做一个比方，君主如果能够尝出甜味，臣子就应该尝出其中的酸；君主觉得味淡，臣子就应该尝出其中的味咸。但是就梁丘据而言，君子说是甜味儿，他就说是甜味儿，这称为气味相投，就称为‘同’。怎么能称为‘和’呢？”晏子作了几个比喻，非常的好。

比如我们做菜做汤，要用五味来调和，调和在一起烹饪出美味的汤，这个就叫“和”，但是所取的调料是不一样的，叫“和而不同”。再比如音乐，用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符，弹奏出一个美妙的音乐，但是这个音符是

不同的，共同配合弹奏出一个乐曲，这个就叫“和而不同”。再比如一个大花园，有五彩缤纷的花共同配合在一起，让我们觉得五彩缤纷，美不胜收，但是如果只有一个色的花，就显得很单调了，这就叫“同”。

所以中国人讲“和而不同”，这种理念运用到了各个地方。如说在中国历史上，文化就体现出这种包容性。比如说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不是本土的文化。但是他们要到中国来传教的时候，中国人看到他们的经典核心都是仁慈博爱，所以欢迎他们来传教。虽然他们的经典之中有一些和我们的传统文化不相吻合，那是因为地理环境、文化风俗不同所导致的。这种“和而不同”的理念，使中国在历史上成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统一的国家。即使是在当今的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能够融合得这样的完美，成为一家人，将五十六个民族融为一家。在美国我们都知道，黑人和白人之间泾渭分明，住的地方都不一样，没有把这个问题处理得很好。我们的成功就来自于“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

“乡人皆恶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孔子，假使有一个人，一乡的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呢？孔子说未必就可相信他是个好人。子贡又问一乡的人都厌恶他，这个人怎么样呢？孔子说未必就可相信他是坏人。后面孔子不待子路再问，就加以解释，与其跟随乡人而好之恶之，不如亲自观察。乡人之中的善人都喜好他，恶人都厌恶他，然后相信他是好人比较可靠。

这句话是对子贡说的，我们不是子贡，所看的好与坏更不足为凭。因为子贡道德学问都要比我们高出很多，他尚且看不出好坏，我们怎么就能够依照自己的见识，而判定人是好是坏呢？其实看一个人是好是坏，都是

根据自己的有色眼光去看的，很难达到客观公正。孟子就是学孔子这一点，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所以你左右的人都称叹，这个人是贤德之人，不能够就认定他是个贤德之人；诸大夫都认为他是贤德的人，也未可认定他就是个贤德的人；全国的人都认为这个人是贤德的人，你还是要认真的去观察，观察之后确实证明这个人很贤德，才可以任用。所以古人对于任用官员，非常的慎重。

孟子也说应该把有仁德心的人选拔在领导位置上，因为不仁的人居于领导的位置，就是把他的过恶播撒到广大的民众，所以做领导者的人非常的不容易。如果自己做得不好、做得不规范，下边的人都在效仿你。所以当一个领导者要严格要求自己，也要非常注重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和修养。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要任用一个人要这样的去观察；同样要罢黜惩罚一个人也是要谨慎。大家都认为他不好，你要去认真地观察，为什么大家说他不好。大家说他不好，可能大家都贪污受贿，以权谋私，但是这个人特立独行，不愿意同流合污，所以大家都排挤他，都说他不好。你要是听信了谗言，就罢黜了他，很可能这个贤善的人就受到了冤屈。这一句话在今天特别地值得学习，因为在今天这个社会网络非常的发达，网上的谣言、小道消息特别的多，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就信以为真，道听途说，很可能是非不明，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了。所以看到现在的资讯消息一定要谨慎。

《弟子规》上也告诉我们，"见未真，勿轻言；知未的，勿轻传。"不要去传播那些没有经过证实的谣言。如果有人说别人的坏话，我们没有辨别清楚也就跟着说，那我们就给这人作恶提供了增上缘，他作的恶我们也有一份，这就是"成人之恶"了。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这个“说”字，古注同喜悦的“悦”是相通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说话的“说”，当“说”字讲。君子容易事奉而难以取悦，因为取悦君子而不合道理，君子也会不悦。比如说你去给他送礼行贿，虽然是给他送礼，但是他也不高兴。至于君子用人，则量其能力而使他能够发挥特长，不求全责备，所以容易事奉。小人容易取悦而难以事奉，因为你取悦小人虽不合道理，小人也会喜悦，所以是易悦。至于小人用人的时候呢，则是求全责备，因此很难事奉。这就是当“悦”字讲。

在毛西河《论语·稽求篇》认为汉儒还有一种解法，这个“说”字当言说之义，他引证说：“君子厚重缄默，不轻说人长短。苟于义分不宜说。有相对终日不出一字者，似乎深沉不可测，而使人平易绝无苛求。小人相对喋喋然，议论鏦（fēng）发，非义分所当说亦说之，而一经使人便苛求不已。”这句话就是说君子厚重缄默，一般都很稳重，所以沉默寡言，不轻易说人的长短。“张家长李家短”，“不关己莫闲管”。

“苟于义分不宜说”，如果不是出于道义就不应该去说。“有相对终日不出一字者”，你和他相对坐了一日，他也没说一个字，似乎深沉不可测，而“使人平易，绝无苛求”，但是他在用人的时候却平易近人，没有苛刻的要求。小人与此相反，“小人相对喋喋然，议论鏦发，非义分所当说亦说之”，小人经常发很多的议论，不是属于他的道义、他的本分所应该说的，他仍然去说。“而一经使人便苛求不已”，一旦在用人的时候，就求全责备，非常苛刻。这个“说”当言说的意思。“君子易事而难说也”，就是与君子人办事容易，不琐碎。办好不用说，办不好也能原谅你。与君子说话难，为什么说话难？孔子说“谁毁谁誉”，因为你说的如果都是赞叹的恭维的巴结的话，这个都不可靠，君子也不爱听。但是可以就事说事，今天这事好，就是好事，这事坏就是坏事，不可一言定终生，不能随便说人。为什么呢？“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如果说人都是不符合道义的，都是零碎的小事，这就可以少谈。“及其使人也，器之”，用人的时候，这个人够做什么，给他做什么事就行了。若是他把自己的本分做好，不再做别的事，也不责备他。君子使用人的时候是量才使用，小人恰恰相反。

“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与小人共同办事很难，他必须找全才，但是哪里有全才可找呢？所以小人很难共事，但是小人易说，见面不是张家长就是李家短，都是说是非，不听也罢。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你经常喜欢听别人说是非，你就对人有成见了，把好人看成了坏人，把坏人看成了好人，这个就不行了。使用人不可以求全责备，只要他把本分职务做到了就算好，这一点是我们值得学习的。这章“说”字讲解，雪公建议可以两种意思并存，但是读的时候可读为“悦”。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泰”字何晏注解当“纵泰”讲，这个“纵”有舒缓放纵的意思，也就是没有拘束的意思；“骄”就是骄矜傲慢。何晏的注是这样说的：“君子自纵泰，似骄而不骄，小人拘忌，而实自骄矜。”君子心中没有拘束对人则不傲慢，小人却与君子相反，一切都拘束。“泰”与“骄”有什么差别？这个“泰”指一切绝不拘束，一切都会不拘束。在李塨（gōng）《论语传注》上说：“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何其舒泰而安得骄？小人矜己傲物，惟恐失尊，何其骄侈而安得泰？”君子不论人多人少，地位高下，年龄大小，都没有傲慢之心。“慢”也是五大烦恼之一，“贪，嗔，痴，慢，疑”这个傲慢也是与生俱来的烦恼。我们看这个乞丐，看到一个豪华车子从身边驶过，都会这样说：“哼！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所以即使沦落为乞丐的人，这种傲慢之心也掩饰不住，更何况有知识、有技能、有学位、有官位、有财富的人呢？傲慢有很多种，但是外表看起来很规矩，但是其实内心很傲慢。“无敢慢”就是舒泰，虽不敢慢，但是心里不紧张，有事怕错就会紧张，就不是“泰”，小心也必须舒泰，这不算骄。“小人骄而不泰”，小人就不是如此，矜己傲物，怕哪一条错了让别人看不起，总想比别人都好，这正是傲。

我们看《论语》中孔子的弟子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

耻。”孔子的弟子子路，很受孔子的赞叹，因为他穿着破棉袄和那些穿着裘皮大衣、貂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没有觉得什么不好意思的，没有觉得有什么羞耻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子路认为人一律平等，没有贫贱高下。如果惟恐失去尊严就是傲慢，这是骄奢，何泰之有？表现出来就不是纵泰了。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用没有受过教育训练的人民去作战，就是抛弃人民。马融的注解说：“言用不习之民，使之攻战，必破败，是谓弃之。”马融的注解中的“不习之民”，是专门指没有学习战斗技能的人民而言，但是实际上除了学习作战的技能之外，应该也包括平时的思想道德教育，因为没有思想道德做基础，人民没有战斗的意志，作战也必然失败。所以这个教，除了教战斗的技能之外，也包括了思想道德的教育。

宪问篇

子曰：“有德者未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有勇者不必有仁。”

竹添光鸿在《论语会笺》上说：“有言，谓有善言也。”“有德者必有言”，这个“德”是德行，“言”就是有益于人的言语。有德行的人他说话不会害人，也不会说错话，为什么？因为他的存心就在利益大众，只想对人有好处，所以必能说出有益之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但是有益之言的人，或者是言不由衷，或者是能说不能行，所以不一定有德。

在《论语》中有多篇章都有关于言语的阐述。比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人花言巧语，致力于言语的好听，伪装出和善的面目，这样的人一味地去取悦别人，很少能有仁德之心。正是因为一个人巧言令色，很少有仁德之心，所以“有言者不必有德”，所以君子不以言举人。君子在任用一个人的时候，不能够因为一个人说的好听，就对他委以重任。特别在《论语》上还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说一个君子在言语上应该迟钝、缓慢，但是在行为上要敏捷雷厉风行。比如说我们看在西方的总统竞选中，这个总统候选人都说了很多漂亮的承诺，但是后来事实证明都难以兑现。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弊端，古人特别强调在选人用人的时候，既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在《群书治要》上有很多关于言语的论述，告诉我们为什么选人，不仅仅要看他的言还要看他的德。比如在《中论》上就这样说：“夫利口者，心足以见小数，言足以尽巧辞，给足以应切问，难足以断俗疑，然而好说

不倦，谍谍如也。”这句话说能言善辩的人，他的心智足以洞察到细小的环节；他的言辞也非常地巧妙，很注意修饰；伶牙俐齿，足以应对急切的追问。“给”就是口齿伶俐的意思；这个“难”就是反驳的意思；他的反驳也足以让世俗人断定疑惑。但是他好说不倦，喋喋不休。这样的后果是什么？

“夫类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暗不达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但是在世间能够按类推理分辨事物的人是很少的，而愚钝的不通达的人是多数，谁知道他说的不正确，因为他说得头头是道，又有演讲的口才，结果一般世俗之人就会非常相信他的话。但是实际上他所说的东西很多都是有违大道的。“此其所以无用而不见废也，至贱而不见遗也。”这就是他之所以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却不被废弃，很低贱却不被遗弃的原因。

“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乱名改作，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者，杀之。为其疑众惑民，而浇乱至道也。”古圣先王都有这样一个法律，对于能言善辩、曲解法令的人，能够混乱礼法和名分，使其失去原意的人，行为邪僻却坚持不改，言语虚伪而能言善辩的人要处以死刑。比如说孔子当了大司寇，没有几天就诛杀了行僻而坚、言伪而辩的少正卯。因为这个少正卯口才很好，但是所说的都不符合道，但是就因为他口才好，能言善辩吸引了很多人，甚至孔子的很多弟子也被他吸引而去，对于这样蛊惑人心的人，只有把他杀掉。因为这一般民众很难辨别是非，他会使民众产生疑惑，而且使治道混乱，使社会风气变得不淳厚，让人分不清是非善恶。

关于古人不认人以言，在《群书治要·汉书》上也有这样一个故事，张释之和汉文帝一起出行，结果文帝就登上了虎圈，就是饲养虎的地方，并且向上林苑的主管来问关于禽兽簿的问题。但是他问了十几个问题，这个上林尉左顾右盼一个都答不上来，但是在旁边有一个官职很低的啬夫，他就主动来替上林尉回答这些问题。他对皇上所问的有关禽兽簿上的问题都非常熟悉，而且为了让皇上看到他的才能，他是有问必答，滔滔不绝，喋喋不休。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对禽兽簿的情况很熟悉，而且口才也很好。

文帝看了果然很欢喜，就说“当官吏的人，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于是他就下诏提拔这个啬夫为上林令。上林令就是负责主管上林苑的最高官职，他的位置还在上林尉之上。张释之看到之后，就赶忙上来劝谏。他说：“您觉得绛侯周勃是什么人？”这个周勃是西汉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西汉的功臣，因为被封在绛县所以被称为绛侯。汉文帝就说：“周勃当然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听了之后，张释之又问说：“东阳侯张相如是什么样的人？”张相如也是因为有战功才被封为侯，他是在西汉一百四十三位的功臣中，列居一百一十八位，汉文帝就回答说：“他当然也是长者。”张释之就说：“您看这绛侯、东阳侯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但这两个人在上书言事的时候，就好像说不出话来一样，就是没有什么口才。现在您越级提拔这个人当上林令，那不就是想让大家都仿效这个啬夫喋喋不休的口辩之才吗？秦国因为任用了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刀笔之吏，这些人争相以亟疾苛察相比试，结果是徒有官文的形式，但是却没有恻隐的实德，没有同情之心。秦始皇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才逐渐地衰败，到了秦二世时天下就土崩瓦解了。现在陛下因为这个啬夫能言善辩就越级提拔他，我恐怕天下会随风响应，争相去求能言善辩的人，而不求有真才实德的人。而且下级跟从上级其迅速就像响之应声，影之随形一样迅速，所以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不能够不审慎、明察。”汉文帝听了之后也受到了警醒。

因为这些皇帝其实从小也是熟读圣贤经典，他也能够知道“巧言令色，鲜矣仁”！于是就称他说的好，就废弃了提拔啬夫为上林令的诏书。我们从这里看到，古人评判一个人才，并不主要看他的口才如何，说得多么漂亮，而主要看他是不是有真才实德，做事能不能办好，有没有执行力。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担任总书记之后，带领着新任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去参观复兴之路之后就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一句话可以说是切中时弊，而且也有深刻的意义。

在《群书治要·傅子》也这样说“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饰辩”。如果在上位的君主喜欢德行，下级就会纷纷地去修养自己的品行；

如果上面的人喜欢言谈，下边的人就会争相修饰自己的言辞，向能言善辩方向发展。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地方竞争上岗，竞争上岗除了笔试之外，重要的是有口试。在口试的时候不仅仅看一个人的知识面、理论基础等，还要看他的表达能力。特别是现在选拔老师的过程中，把表达能力、演说能力、口才作为第一重要的因素，这样的结果就是这里所说的，大家都会向着能言善辩的方向去发展，而不重视自己德行的提升。后面他接着说，“修行则仁义兴焉，饰辩则大伪起焉。”人人都重视修养品行，天下的仁义之风就兴盛起来，但是人人都学着能言善辩，虚伪的社会风气就会兴起，这是必然的征兆。

“德者难成而难见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悦者也。”但是问题是德行的成就，修养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也很难成就，很难被发现被了解。但是言语却是很容易被撰写出来的，也很容易取悦于人。“先王知言之易，而悦之者众，故不尚焉。”古圣先贤都知道言语很容易，而且爱听好话的人很多，所以并不崇尚言谈。“不尊贤尚德，举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悦取人，则天下之弃德饰辩，以要其上者不勘（xiǎn）矣。”如果不崇尚贤能之人，重视道德，也就是引导人们向善来教化百姓，却只凭说话好听来选取人才。天下背弃道德，仅凭能言善辩而要求他们的君主给予其封赏的人就不会少了。因为“德难为而言易饰也”，正是因为德行、修养很难成功也很难成就，但是把口才锻炼得很好，却是一件相对很容易的事。所以古人强调，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言语能力很好，说得很好听就对他委以重任。

《傅子》上还说“闻言未审，而以定善恶，则是非有错，而饰辩巧言之流起矣”。如果领导者听了他人的言论，并没有审慎地去考查，没有调查研究就妄下结论，以此来确定是非善恶，就很容易导致错误的判断。由此还会导致喜欢说不实言论的风气越来越盛行。比如说某某人到领导面前来说一个同事的坏话，这个领导听了之后就信以为真，也没有去调查研究他所说的是不是事实，而就对这一个人产生了怀疑，或者是产生了误解。如果这个领导者总是这样的话，下边喜欢到他面前说别人坏话的人，说那些不实言论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听言不如观

事，观事不如观行，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观行必考其迹”。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观察一个人，听人的言语，不如观察这个人所做的事；观察人所做的事，不如观察这个人的行为；而且听一个人的言论，还一定要清楚他讲话的原因，也就是他讲话的根本目的、用心何在；观察一个人所做的事情，要核查它是不是符合事实、真实可靠；观察一个人的行为，也要观察他这样行为的原因，在选拔和任用人才的时候把这三者都综合起来参照考虑，才会避免仅仅凭一个人的言语，就委以重任这样的弊端。

在《群书治要·周书》上也说：“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如果我们凭一个人的言语取人，人就会想方设法地致事于言语的好听；如果我们以一个人的德行、行为来取人，人们就会竭尽全力地提高自己的德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饰言无庸”，就是装饰自己的言语，没有用，会很平庸，竭尽提高自己的行为、德行，才会有所成就。那么这句话其实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像我们在选人用人的过程中，要避免仅听一个人的言语，特别是演讲能力、演说能力，就判断他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这样经常会出现差误。

下面一句说“仁者必有勇”，这个“仁”源于德，德源于道，有道德的仁人，作道德之事，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为大家，必然有勇气。因为真心心存仁道的人，他看到别人有困难，就会勇敢地去救。他没有看到自己可能会有危险，他只见到所救的人在受苦。自古以来的忠臣孝子，比如说《正气歌》中的文天祥：不愿意投降，愿意牺牲，就是由仁字而来，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杀身成仁”。无勇不能成事，也成不了仁者。所以仁者必有勇，在当前社会志士仁人，最应该承担的事是什么，最应当去救的又是什么？

我们听国歌有一句话非常的感触，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为什么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因为我们的中华文化正面临着断层的危险，自五四运动和十年文革之后，传统文化没有人讲了，而且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误解也达到了顶端。结果很多人丧

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所以在生活中，看不到力行传统文化的样子了。五伦八德没有人讲了，伦理关系就紊乱了。文化的传承可以说是后继乏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志士仁人，最应该承担的事，就是勇于承担弘扬中华文化的责任。正如孔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个任务非常的重大。因为它关系到文化的承传，关系到民族的荣辱、祸福。所以就应该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号召的十三亿人每一份子都应该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我们也经常听说汤恩比先生，他研究了各个国家的文明历史，最后总结了一句话，“能够真正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孔孟儒学和大乘佛法”。他是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了各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史，得出这样的结论。儒家文化、大乘佛法都在中国，所以中国人如果不勇于承担这一个使命，这一个职责的话，那就等于见死不救，那既没有勇又没有仁。所以到目前我们最应该承担的就是要弘扬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代代相传，而且能够化解冲突使世界归向和平。

“有勇者不必有仁”，有勇的人虽然勇于去做事，但是如果不与道德相和，那不算是仁，即使奋不顾身，也只是无意义的匹夫之勇，所以勇者不一定有仁。自古以来勇将很多，但是打败仗就投降，因为没有“仁”做支撑，而文天祥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因为他有仁，这个才是大勇。所以我们看儒家的书，学孔子的仁，看他是不是积极地去担当，就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勇者。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不仁”就是指违仁而言。做一切事，都必得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由生处转熟。君子学仁，也应当求其成熟。正如《孟子·告子》上所说的：“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仁未成熟，不免违仁。”孔子说：“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弟子规》上也说：“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

每一个人都有成圣成贤的品质潜能，但是如果自己不奋发努力，不朝着成圣成贤的方向去争取，那也永远不能够成圣成贤。所以，如果人发心行仁，没有力不足的，都办得到，但是有不成熟的。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橘子，必须红了才成熟。但是这个熟是一个结果，其中必有原因，要经过长时间的浇水、施肥，绵绵不断，最后才有熟的结果。一天行仁可以说是一天有仁，但很难成熟。像孔子赞叹颜子“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在孔子的弟子之中，只有颜回他的心三个月不违仁，但是其余的弟子只不过是“日月至焉而已矣”，最多是一日或者一个月，偶尔来一回而已。

从这里我们看到学仁是很不容易学成功的。“仁道难成”。所以“君子而有不仁者有矣夫”。君子就是修学的人，不仁就是修学没有成熟的人。君子学仁尚未成熟这是有的。

我们看到在生活中有人学习《弟子规》或者立志做某一件事情时，在初始几天可能是兢兢业业，过了几天就松懈下来了。所以古人说，“有志者立志长，无志者常立志。”有志气的人他立志很长远，每一天按着《弟子规》来做，每一天都按着《弟子规》要求自己；无志者常立志，这个没有志向的人他立志，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自己的志向达不到，可能就懈怠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很后悔，又来重新立志，所以这个无志者“常立志”。所以学道要能够循序渐进，要能够坚持才体会到法喜，如果学道没有体会到法喜，就很容易退转。一旦一个人能够体会到学道的乐趣，古人所说的禅乐为食，世味哪有法味浓，这个才不容易被世间的五欲六尘所诱惑。因为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和这个法喜相比，那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比如说两个人卿卿我我，喜欢看这个电视，喜欢看热热闹闹的同学聚会，这些都是世味，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品尝到更高的法味，所以他觉得这个很有味道。但是学道的人，他体会到法味之后，再看世间的这些事就觉得太没意思了。

下面说“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至于“小人”就是未尝学仁，便谈不上仁。在《周易》的《系辞传》上说：“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

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小人认为这个善事太小，不屑于去做，没有什么益处，认为这个恶是小事，也无伤大雅，也不愿意去除。最后结果是恶积小成大，积少成多，越积越多，最后不可掩盖了；这个罪也是越来越重，最后也不可解脱不可解救了。所以说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因为小人他没有去学仁，便谈不上仁了。仁虽难成但是要肯学，谁都能够成就，不学便无能成之理。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不能沦为小人，甚至沦为禽兽，必须学为君子甚至成圣成贤。所以人生的意义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灵性，人不能够像禽兽一样，每一天吃了睡，睡了吃，不问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人生的价值是什么？这样就是使自己的灵性越来越堕落了。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

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也；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也。”

公叔文子根据《论语集解》孔安国的注解，说他是卫国大夫公孙拔，“文”是他的谥号。《礼记·檀弓》郑康成的注解说：“文子是卫献公之孙。”就是说公叔文子是卫献公的孙子。公明贾也是卫国人，姓公明，名贾。也有人说“这个公明古代时候读为公羊，贾读为高，公明贾也就是公羊高。孔子听说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就问公明贾这话是否可信。不言，就是不随便说话，现在的人到处演说，这个是向西方人学的。因为西方人总统选举，都要有晋职演说。“言多必失”，《易经》上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很多事都是坏在说话上。那么再者“不笑”，“胁肩谄笑”，“巧言令色，鲜矣仁”很轻薄。

我们应该学《论语》上所说的“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远远地望着他，看着他非常的有威仪，但是你接近了他，他也很温和。这个温和不是笑，不能见面就笑，看京戏不能白看。京剧里你看不只圣人不乱笑，演戏的正派角色也不乱笑，三花脸才笑。比如包拯的

笑比黄河清，所以权贵都惧惮他，不敢与他作政治交易，不敢和他权钱交易。而现在的人随便笑，嬉皮笑脸，这都是跟外国人学的。在中国的古礼上说，长者见幼者可以笑，但是幼者见长者笑，便是不恭敬。

“听其言也厉”，说起话来有规矩，绝不随便。“不取”就是不能随便取人家的东西。这个《论语》上也有“临财勿苟得”，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而且还不能够做到和。

“礼之用，和为贵，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所以孔子主张要把事情做好必须学礼。“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礼”关系着一切大事，所以孔子见老子，不问道只问礼。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取东西，取和不取也不能够违背礼。比如说别人给你送礼来了，应如何对待处理？人家表示尊重，如果一味地拒绝，对方也很难接受，也很不好意思，那怎么办？我们要知道人家送礼的用意是什么？是不是违背原则的，是不是有贿赂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不能够取。像鲁国的宰相公仪休拒鱼、拒贿，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可以去获取。但是如果别人是为了表示尊敬、表示感恩，或者是表示慰问，没有其他的企图，而所送的也只是一些土特产而已，这个时候你可以接受。可以加倍的还给别人礼物，“礼尚往来”。这个礼，也是表达人情的方式。如果不送礼不走动的话，人情也会越来越淡漠，所以这个礼要有和，就是“和为贵”。但是“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也不能够做到恰到好处。

孔子与公叔文子不是很熟悉，他听说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不大敢相信，所以就问公明贾。为什么问？为什么不敢相信？因为以上这三点都不容易做到，没有相当的修养功夫很难做到。公明贾怎么回答的，他说：“以告者过也。”是传说此话的人言过其实。说话的人说得太过分了、太严重了。“夫子”这里指公叔文子，因为他是大夫，也可以称为夫子。

“夫子，时然后言”，他的话说得恰得其时，恰到好处。到他该说的时候，应该说的时候才说，所以别人也不厌恶他说话。像在《弟子规》上有很多关于言语的教诲，说：“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见能。”在尊长面前不要表现自己很有能力，自己很有学问，因为这好像有点班门弄

斧。晚辈在长辈面前，要谦虚好学，而不能够炫耀自己的学识。

“乐然后笑”，这个“乐”有两个音，一个是悦，一个是乐。奏乐时欢乐心畅时就有笑容；再者就是有快乐的事，该笑的时候就笑。笑也有若干种，有苦笑、冷笑、皮笑肉不笑等等。在戏里的笑就有很多，唱戏的笑，错一点都不行，戏虽不是高级的艺术，但是却能够劝化人，所谓“说书唱戏劝人方”，都是劝化人的方法。这里的“乐然后笑”，采取的是快乐的“乐”这个读音，快乐时才笑没有虚情假意，所以别人也不讨厌他的笑。

“义然后取”，东西不是不取，义然后取，这个“义”就是合宜的意思，大家公认该取的就可以取，合义才取，取得正当，所以别人不讨厌他的取，文子并非是不言不笑不取，而是言笑取都恰如其分，所以别人不讨厌。

子谓卫灵公之无道也，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

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孔子谈到了卫灵公，说他无道。季康子就问了：“既然他无道为什么不亡国？”孔子就回答他不亡国的原因：卫灵公固然不好，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能用人，而且所用的人不一定都好，但是他能够知人善用、用其所长。

下面就举了几个例子。他有仲叔圉就是孔文子，办理外交；又有祝鮀，这个祝鮀就是卫国的大夫子鱼，他有办祭祀的特长，办祭祀不容易，必须井井有条，所以让他办理宗庙之事；又有王孙贾，他有军事特长，因此叫他办理军旅之事。他这样会用人，哪里会亡国？

“奚而不丧”这个“奚”就是为什么？“丧”朱熹的《四书集注》说：“丧，失位也。”祝鮀、王孙贾这些人在别人手上，可能别人用不上，但是卫灵公却能够用人。他虽然昏庸，但是他能用人所长，为什么会亡国？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办政治用人、用对人是非常重要的。在《群书治要》

中就讲到：用人最忌讳的就是能不当官。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的能力和他所担当的官位不相匹配。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能力低的人被授予高官，另一种就是他所担任的职位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

在《管子》上说："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这句话说得很好，说明智的君主选择贤人，这个人说自己很勇敢的，就让他去带军打仗；这个人说自己有智慧的，就让他担任一个官职。"试之以官"，并不是一下子就任用了他，要有一个试用期。如果让他去领军，他能够有战功，就来举用他；如果让他去试着做官，能够把事办的井井有条，再任用他。所以我们现在考察选拔一个官员，或者是选用一个员工都有一定的试用期，在试用期之中，看看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把事做好，是不是有真才实学。所以明智的君主选择贤人，"必临之以事而验其能"，这是避免不能称官的有效途径。

在《群书治要·典语》上，还讲要"料才核能"地去任用人才，它说："夫料才核能，治世之要也。""料"就是评估、估量。估量人才的才能，考核他的能力，这是治理国家的要务。接着说，"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达，自非圣人，谁兼资百行，备贯众理乎。"凡是人的才能，他的用处都是有一定的范围的，能力也有偏通之处，并非每个人都是圣人、都是完人，谁能够兼通百行百业，明白各种道理？故明君圣主"裁而用焉"，所以明智的君主都是衡量人的才能来委以重任。下面它还举了一些历史上的故事：

"昔舜命群司，随才守位。汉述功臣，三杰异称。"在历史上舜能够垂拱而治，因为他任命百官的时候，也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才能给以不同位置。比如说他任命皋陶来断狱；任命契作司徒掌管五伦的教化，任命禹来治水。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特长，所以他们擅长什么，就让他们去干什么，最后自己很轻松，就能够垂拱而治。汉朝表彰功臣的时候，萧何、张良、韩信被称为三杰，也是根据他们的功劳给以不同的封号。张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很善于谋划，很善于用兵运

筹帷幄；萧何是“振国家，抚百姓”，他治理国家，安抚百姓是最擅长的；韩信联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韩信最擅长的是率军打仗，是一个很好的带队的将军。他们的才能不同，所以给他们的封号也不一样。“况非此俦，而可备责乎？”更何况不是像他们这样的杰出人物？就是像张良、萧何、韩信，这样的杰出人物，他们的才能都是有一定的不同。有他最擅长的地方，也有他不擅长的地方，对于一般的人，更不应该求全责备。

下面又接着举例子，“造父善御、师旷知音，皆古之至奇也”。造父是善于驾车的人，师旷是一个盲人，但是他的听力特别好，辨音的能力很强，所以称为“师旷知音”，这些都是古代最神奇的人。但是假使他们彼此交换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和技艺，那会有什么结果？结果他们虽然竭尽全力了，但是还不知道怎样去胜任，因为人的才能是有偏通的，是有专长的。正是因为人的才能大概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不能够不估量人的才能去委以重任。如果你使用的是适当的人才，这个人能够担当他的职位，一定会得到好的治理结果。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来到团队的每个人都是有所擅长的。比如说有的人擅长治理事情，把事情管理的井井有条；有的人善于出谋划策，他可以对这个团体的长远发展有一个计划；有的人是善于做具体的事情；有的人喜欢做文字工作；有的人擅长人际交往；有的人擅长讲课，他们的才能不一样，要根据他们所擅长的不同，分配给不同的任务。这样才能够各尽其才，才堪其任。

后面他说的，“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尽其才，不核其能，故功难成而世不治也。”说有的君主，用了这些士人，但是却不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是什么原因？因为虽然任用了他，但是他的才能，却没有充分地发挥，也没有根据他的能力来给他一个适当的位置，所以“功难成而世不治”，很难获得功效，国家也得不到治理。

“马无辇重之任，牛无千里之迹，违其本性，责其效事，岂可得哉？”这句的意思是：马没有像牛那样去负辇耕地的任务，牛也没有奔跑千里的能力，如果违背了它们的本性去任用它们，还希望能够有成效，这怎么能

够做到。任用人才也是一样的。下面他做了几个比喻，也做得非常恰当，“使韩信下帷，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假使让韩信去对战争的规划运筹帷幄；让董仲舒去率军打仗；让断狱的于公到处游说当外交官；让陆贾判断案子，结果一定是获得不了他们以前所获得的功勋，也不会得到今日的显名。因为韩信不善于筹谋只善于打仗；董仲舒是一介书生，只擅于通古博今，但是你让他去率军打仗却不行；于公刚直不阿，能够断狱但是却不擅辞令；陆贾擅于辞令，但是却缺乏断案的魄力和决心，如果将他们都安插错位，结果自然不尽其意，不尽如人意。

这些道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大学毕业生，上大学的时候学了一个专业，但是毕业之后找工作，很多人都是才非其用，也就是说他所从事的工作和他所擅长的专业无法匹配。很多人这个大学四年的工夫，也都白白地浪费了。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各有所长，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如果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衡量人才，也很难把真正的人才选拔出来，特别是一些奇才，很可能就被一个统一的标准所遗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高考，高考所考的题目都是统一的，如果一个考生要进入一个一流的大学，那就是说他所有的功课，都必须是很均衡发展，如果他有偏科，那可能就和自己理想的大学失之交臂了，但是事实上往往有人在某一方面有特别突出的天分，但是在其他地方却不一定非常的完美。这样的话我们按照一个标准，一个分数去衡量选拔人才，国家可能会失去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而在找工作的时候很多的公司还有一个死规定，说不是211工程的学校，都不能够选他到这个公司来工作，这也会使很多奇才，被拒于门外。所以中国古人告诉我们选拔人才，要不拘一格，特别是对于那些奇才要有特殊的选拔标准。

这一章主要是论知人善任的重要性，也有启示季康子的意思。在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中，引《论语述何》说：“举三臣，以励康子也。”就说举出这三个臣子，实际上是勉励季康子，意思是说这三个臣子虽然不是完人，不足称道，但是他们是侍奉明公，比这个鲁国的三家大

夫，侍奉鲁君要好的多。

子路问事君。

子曰：“勿欺，而犯之。”

子路问事君的道理。这个“君”就是指在上位者，孔子答复说：“勿欺也，而犯之。”“欺”就是欺骗，“犯”就是犯颜，“之”指的是君主。《论语集解》孔安国曰：“事君之道亦不可欺，当能犯颜谏诤。”而犯之的“而”《孔注》作“能”字讲。孔安国注解的意思就是说：为臣应当谏君以阻止他的过失，假使他不高兴，甚至不惜犯颜而谏。但必须不欺君才能犯颜谏诤，这个“而”也可以作“然而”讲。这两句话也可以这样解释：事君之道不能欺君，然而君有不对的地方可以犯颜进谏。无论给谁帮忙都要实在办、真心办、不办假事，这个就是不欺君，然而君有不对的地方要劝谏指正，即使他不高兴也要犯颜直谏。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大家、为了大众的利益，劝谏之后他不听从才可以离去，否则就是没有做到做臣子的本分，劝谏之后对方不听，也不能跟随他去做错事，免得自己跟着倒霉。

做臣子属下的有劝谏的责任和本分。在这方面唐朝的魏征给我们做了良好的榜样，有一次唐太宗问长孙无忌：“魏征每次给我提出建议，我要是不采用他就不答应，这是为什么呢？”长孙无忌还没有回答，魏征就接过话头来说：“陛下，我之所以向您进谏，是因为陛下您做错了。如果我顺从您的意思，而没有坚持到底，就违背了我的初衷，您的错误也得不到纠正，所以我一定要坚持到底，直到您接受为止。”唐太宗听了之后就说：“那你就不能表面上顺从我，不在群臣面前忤逆我，给我一点面子，然后在私下里再劝谏我吗？”魏征说：“当年尧帝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表面上顺从我，但是在背地里却阳奉阴违，诋毁我的过失，这是一个忠臣所不应该做的事。’所以我还是应该要犯颜直谏。”结果唐太宗听了之后也非常佩服。所以魏征一生向唐太宗提出了二百多次的建议，唐太宗都非

常诚恳地接受。当然这也是和唐太宗手不释卷的，熟读《群书治要》有关系。

在《群书治要》上有很多关于要虚心纳谏以及臣子应该进谏的故事。比如说在《群书治要·新序》上就记载晋平公向叔向请教。问："国家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叔向怎么回答的呢？叔向回答说："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意思是说：国家最大的忧患就是大臣为了保住自己的俸禄，不敢犯颜直谏；身边的近臣因为怕被治罪，也不敢直言向君主禀报实情，结果下情不能够上达，这就是国家最大的祸患。大臣重禄不极谏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做君主的没有接受谏言的雅量，不能够诚心诚意地接受批评，这样的君主导致的就是大臣会投其所好，说他喜欢听的话，而不是说真正对他有帮助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好话，好话不一定是讨好自己的、谄媚巴结的、自己喜欢听的话，而是对自己的成长真正有帮助的话。所以在《弟子规》上就说"闻过怒，闻誉乐；损友来，益友却"，听到别人说我们过失我们就生气，听到别人赞叹我们就欢喜，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感召的是谄媚巴结的朋友都来到你面前，而对你真正有益的人却离你而去了。

所以中国古人自童蒙教育开始，就让我们知道要交什么样的朋友，要能够虚心接受批评建议，而不是喜欢听谄媚巴结的话。古代圣明的君主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也会引导属下去犯颜直谏。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赵简子，他在《吕氏春秋》上记载，他曾经把一个叫鸾徽的臣子沉到河里去了。为什么呢？赵简子说："我曾经喜欢声色（就是喜欢音乐、女色等等），鸾徽就把这些送到我的面前；我曾经喜欢宫室楼台，结果鸾徽就把这些给我建造好；我曾经喜欢良马和善于驾马的人，结果鸾徽也把这些给我送来了；但我已经喜欢贤士有六年了，但是鸾徽却没有给我举荐一个贤人，这是在助长我的过失而减损我的美德呀！"所以他就把鸾徽给沉到河里去了。《吕氏春秋》讲完这个故事就评论说：能够以礼义督查责罚臣子，这样君主就会和他们共同做善事，而不会和他们做错事。会和他们一起做正直的事，而不会跟他们一起做邪妄的事。也就是说臣子可以和这

样的君主共同做善事做好事，而不会和他一起做错事。

赵简子的这个故事也表明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善于引导臣子去做正当的事，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以理督责于其臣”。关于犯颜直谏的故事在《吕氏春秋》上还有记载，说楚文王得到了有名的茹黄狗、宛路箭，这都是在当时非常出名的狗和箭。带着它们到云梦泽去打猎，三个月都不回来，还从丹地得到了一个美女，每天和美女在一起。一年都没有去听政，不理朝政了。后来他的太保申就说：“先王曾经占卜，认为我作为太保是很吉祥的事，现在您的罪理应受到鞭刑。”楚文王就说：“能不能变换一个方法，不要用鞭刑责罚我呢？”太保申说：“我承继的是先王的法令，不敢废除，如果您不受鞭刑，那我就是废弃了先王的法令。我宁愿获罪于大王您，也不愿意获罪于先王！”楚王听了之后就说：“那好吧！”于是，太保申就把席子拉过来让楚王趴在上面，又把五十根细细的荆条绑在一起，跪着把它放在楚王的背上。如此做了两次，说：“大王您可以起来了。”楚文王就说：“既然都有鞭笞的名誉了，你就不如痛快淋漓地、名副其实地打我一顿好了。”太保申怎么说的呢？太保申就说：“我听说对于君子能让他感到羞耻就可以了，小人才要让他感到疼痛；如果让他感到羞耻，他都不改变自己的行为，让他感到疼痛又有什么帮助呢？”太保申说完之后就站起来走了出去，并且请求楚王把自己处死，楚文王被太保的忠诚感动了。

我们说这个太保为了楚王的前途、楚国的前程命运，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劝谏楚王，给他实行鞭刑。结果楚王却因为美女，还有狗、箭等等，不去处理朝政，不务正业。结果他就说：“这是我的过失，太保您有什么过失呢？”后来他就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把太保重新招了回来，并且杀了茹黄狗，折了宛路箭，把丹地的美女也放回去了。从此之后一心一意的治理楚国，最后他兼并了三十九个国家，使楚国的地盘扩大。而能达到这样的结果，都是太保申犯颜直谏的功劳啊！

《易经》上说“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做臣子的之所以能够忠厚老实、犯颜直谏，并不是为了自身的安危，而是想匡正君主的过失。如果君

主有过失，这就是危亡的征兆。见到君主有过失而不去劝谏，就是轻视君主陷于危亡的境地。轻视君主陷于危亡的境地对于忠臣而言，是不忍心这样做的。这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周围有能够犯颜直谏的臣子，冒着大不畏大不敬的后果，还能够劝谏你，这个人才是最衷心的人；而那些谄媚巴结的人，其实都是为了获得荣宠和信任，都是为了得到好处。《政要论》上讲到“贤人君子，不忍观上之危，而不爱身之殆”。贤人君子不忍心看到他们的君主处于危殆的境地，所以他不关心自己的危难。“故蒙危辱之灾，逆人主之鳞，及罪而弗避者，忠也！义也！”所以他蒙受危难、受辱的灾祸，揭开人主的龙鳞，即使有罪也都不愿意去避开，全是一片忠义之心呐！看到这里很多人就会说“我们身边要是有这样能够犯颜直谏的臣子，或者朋友那就好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都有像这个太保申这样的臣子，为什么呢？他能关心我们的成长、关心我们的前程、关心我们的荣辱、关心我们的祸福，看到我们有问题，就不惜厉声厉色的指正出来。这些人是什么人呢？那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和我们最亲近的人，但是我们听了这些人的话，是什么态度呢？我们觉得他们很唠叨、很烦，为什么这么挑剔我们呢？真是没完没了。我们嫌弃他，所以我们不能够像古代的这些圣君来面对别人给我们提的意见，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获得真正地成长。

以前有一位朋友和他的妻子经常吵架，他实在受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一点点小事，他的妻子就会把他骂三、四个小时，不依不饶，结果他要想和妻子离婚。正好学了传统文化，接触到一位很有智慧的老师。这个老师就提醒他“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妻子说了你这么多，有没有哪一句话是对的呢？”从此之后，他的妻子再说他，他就能静下心来反省，后来发现妻子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针对他最严重的毛病，如果他把这些毛病全都改过来，那真是一个完人了！结果他听了之后越听越欢喜。后来有一次，他们俩又因为小小的问题发生了一些争执，结果他的妻子说了他一、两个小时，他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还给她端了一杯水，说：“你看你，说了我一、两个小时，也很辛苦了，快喝一点水吧！”这时妻子听了之后就

大惑不解，因为她以前说他，他都很不高兴，甚至还和她争吵，现在他态度的转变让妻子也觉得很感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两个的关系越处越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丈夫发现，自己很多问题别人看到了也不会给他指正，只有自己的妻子，自己最亲近的人看到了愿意给他指正过来，还不惜让他生气、不惜和他争吵，所以我们要知道身边人的苦心。我们再冷静的分析一下周围人对我们所说的自己身上的问题，把这些一一改正过来，那我相信自然走到哪里都会广受欢迎。

当然，进谏也要讲究方式方法，才能更易于让人接受。像魏文侯和诸位大夫在一起坐着，他就问："你们看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啊？"群臣都说："您当然是仁德的君主啊！"但是轮到翟璜的时候，他回答得很直接，他说："您并不是仁君！"魏文侯就问："你为什么这么说呢？"翟璜说："您去征伐中山国，把中山国打下来之后，并没有把它封给您的弟弟，而把它封给了您的儿子。从这件事上我就知道您不是一位仁德的君主。"结果这一句话可把魏文侯给触怒了，就把他逐出了厅堂。到了任座的时候，魏文侯又问他："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啊？"任座就回答说："您是一位仁德的君主。"魏文侯问："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任座就回答得很巧妙，他说："我听说君主仁慈，他的臣子说话才会很直接，可以犯颜直谏，刚才翟璜的言语非常的直截了当，不惜触犯您。我从这一件事上就知道您是一位仁德的君主。"魏文侯听了之后说："嗯，说得好！"又把翟璜给召回来了。这个故事也说明魏文侯他也是能够接受谏言的人。确实，如果他不是一个愿意接受谏言的人，他的臣子也不会说话这样的直接，而且他知错就改，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有人提醒，马上能够改正过来，只要臣子说的有道理，他都会接纳。

《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上也讲到，"夫佞邪之言，柔顺而有文；忠正之言，简直而多逆。"这个就是说邪恶的、谄媚的言语，都是温柔和顺的，而且还很有文饰，让你听起来感觉很好，很愿意接受，但是忠正的言语却简单直接，甚至大都和你的心意相违逆。所以一般的人喜欢听的是谄媚、巴结的言语，而不愿意接受那些犯颜直谏的言语。

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上说，“子路侍季氏，夫子恐其为惧臣，又季氏伐颛臾，子路力未能谏止。”在这里就是告诉子路“勿欺”。子路在季氏那里做家臣，孔夫子怕他成为惧臣，“惧臣”就是惧畏、充数之臣，不敢犯颜谏诤，而且季氏出伐颛臾，他也没有能够极力的阻止他，所以孔子在这里告诉子路“以勿欺”，就是不要欺君。又怕他对这个意思不明了，于是又加了一句“而犯之”，要能够犯颜直谏。

在《礼记·檀弓》上也说，“侍君有犯而无隐。”这个隐就是欺的意思，事奉君主要能够犯颜直谏，但是不能够欺瞒君主。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做一个忠诚的臣子，做一个好的臣子，要有两个基本的职责。第一就是不欺君，像古代欺君之罪都是死罪，现在很多人欺上瞒下，领导不知道实情的有很多很多；第二个职责就是君主有过失的时候，要能够犯颜直谏。这是孔子认为当臣子必备的职责。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不逆诈”这个“逆”就是迎的意思。事情还没有来而前去迎接就是“逆”，这里就是逆料、预料的意思；“亿”就是臆度、揣测的意思；“抑亦”是转语词，有反之的意思。在《论语集解》孔安国注：“先觉人情者，是宁能为贤乎？或时反怨人。”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上说，“释文云：怨本或作冤”；《卢氏文抄考正》：古“怨”与“冤”同，也就是反怨人这个“怨”。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冤”，就是冤枉人的冤。孔安国的注解大意是说：“不可以预料他人会来欺诈，不可以揣测他人不能守信。”反过来说：“以预料揣测而事先发觉他人的诈欺，或者不信，这样的人岂能算是贤者呢？”为什么不能算是贤者呢？因为这样或恐有时反而冤枉人。《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也说：“君子不先人以恶，不疑人以不信。”君子不事先揣测别人有恶，或者怀着作恶的心，也不怀疑别人不诚信。那很多人听了之后就说了，中国古语不有一句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吗？这个“不逆诈，不亿不信”让我们不要事先揣测别人会来诈

欺，不要揣测他人不能守信，不是和“防人之心不可无”有所矛盾吗？我们学了圣贤教诲，了解了事实真相才能明白，为什么连防人之心都没有必要有。

古人曾经形容这个世间，叫“不断之无”。这一句话就是把事实真相给我们揭示出来了。万法是什么呢？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呢？那就是“不断之无”，不断就是相续，每一个相续都是无，都是空，这也就是经典上所说的万法皆空。“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但是你在这里头却起分别、执着、贪爱、怨恨，这不就叫冤枉吗？这叫干傻事，叫自作自受。真正能够体会到几分，人慢慢就醒悟过来了，就觉悟了。人只要一觉悟，眼前的生活就是幸福美满，就是和圣贤人一样的享受。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仁者无敌”，“敌”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仁者打遍天下无敌手，没有人打得过他。“敌”就是对立，仁者没有对立，跟任何人没有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也不跟他对立。换一句话说，仁者永远没有敌人，没有冤亲债主。

我们现在学了圣贤教诲之后就知道，如果起心动念还要防人，这个也是错误的，防他干什么呢？你把他看成是来成就你的就对了。防人之心很苦，我们何必要防人呢？我们把防人这个念头也放下，所以才能够得到快乐和安稳，如果还有防人之心，那你就没有安稳，也没有快乐。别人防不防我那是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至少我们不要去防人。善待我的人我感激他，陷害我的人我也感激他，他们都是我的善知识。他骂我、诽谤我、诋毁我、侮辱我，我们要自我反省，想一想我有没有这个过失，如果我有这个过失，要改过自新；我没有这个过失，那我也知道，过去曾经有过这个过失，所以我现在才受人诽谤，我也欢喜承受，一点儿怨恨心也没有，一点儿报复的念头也没有，所以我安稳、快乐。当然我们怎么和一般的人讲这些道理呢？他会不以为然，说哪有这种事情啊！他还会讥笑你懦弱，受人欺负不知道回报，这都是不了解因果，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害人之心是造孽，防人之心也是造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有这个“防”就是染污，就是不平，如果你的心真清净、真平等，哪来的防人之

心呢？没有必要！

财物放在这边，人家拿去了，很好。大家用、我用、他用不都是一样的吗？像在去年春节的时候，这个门外放了一些苹果，结果有一天就发现这个苹果少了两箱。“哎呀！”我母亲就会怀疑说：“这可能是门外那个扫卫生的人给偷去了！”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很早就看到人家的需要，很早就把这两箱苹果送给人家，还得让人家来偷。”你看我丢了苹果并没有得失之心，反而还感觉自己没有体会到别人的需要，但是换了一种心境，觉得别人为什么偷我的苹果呢？为了这两箱苹果就忿忿不平，可能好几天心情都不会好。所以人如果想得明白了，不仅仅没有害人之心，连防人之心也都没有了，这才是真正的心开意解，得大自在。每天还要防人，那心就会很苦，在《无量寿经》上讲“心劳身苦”。每天防这个防那个，这样的人活着很可怜。《金刚经》上讲的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既然都是梦幻泡影，你防他干什么呢？所以什么是人生的最高的享受？那就是心明白、身安乐，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心安、身乐。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在《六祖坛经》里就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这个“不见”并不是不知道、看不见，而是不放在心上。

这里孔子只是主张由“逆亿”而得的先觉是不对的，并不是反对不由“逆亿”而得的先觉。孔子主张不必逆料、不必揣测，对方的事都知道都明了，这样的先觉是可以的。怎样才能做到不由“逆亿”的先觉呢？那就是要“照见”。《中庸》上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以至诚之心待人可以先觉，什么是至诚之心呢？曾国藩曾经对“诚”下了一个定义，说：“一念不生，谓之诚。”心里一个念头都没有，这个时候才叫诚，说明什么呢？这个时候心如止水、心如明镜，没有任何的波澜，它映照万物的时候清清楚楚，这就是让我们通过修行达到心定，达到至诚，这个时候你映照外物的先觉才是可行的，也是孔子所支持的。

子路问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我们知道这个《群书治要》是魏征等，从这些经典之中节录而来。那我们看看这一句话，子路问君子，孔子答复修己以敬。“修”就是修治，一个人以敬来修治自己，使自己的身心言语统归于敬，这个“敬”也是礼的本质。所以你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处处合理，这就可以算是君子了。子路再问：“如斯而已乎？”“如斯”就是如此，子路认为做一个君子不止如此简单，但是到我们这里连修己以敬也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真正地恭敬到了一定的程度，对于家人、父母的需要都能够清清楚楚的感受到，结果我们还和家人不能相处，和朋友有很多的矛盾，这些矛盾从哪里来呢？就是因为自己的心不恭敬，看不到、体会不到对方的想法和需要，所以当你的心恭敬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知道对方想的是什么，他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怎么可能会和人家处不好关系，怎么还会有争执？所以心静到一定的程度就能做到像曾子那样，他的母亲在家里一咬手指头，他的心就一痛。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水平在哪里，修己以敬还没有达到。

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刘宝楠的《刘氏正义》说：“修己”就是修身；“安人”就是齐家；“安百姓”则是治国平天下。如果只求自己安，其实不安；如果不懂得敬，那更不会安，只有事事受障碍。因为子路已经知道修己以敬，所以孔子在进一步告诉他要修己以安人。孔子知道不仅使自己安，还要使大家都安。那怎么样才能使大家安呢？你只要守礼，不妨碍他人，人就安了。我们妨害人，回到自己的家也不得安，更不要说安人了。所以我们学《弟子规》是为什么呢？就是守起码的礼。这个礼就是处处能够为对方着想，不妨碍别人，这样走到哪里都受人欢迎。安百姓就不简单了，安百姓不是指齐家，也不仅仅是安邻居，而是治国。总之就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天下为公。

孔子说："博学于文，约止于礼。"若没有礼，人人随便，那就是扰乱天下之道。孔子的志愿是使百姓能安，那怎么办呢？只有通过办政治才能使国泰民安，才能够使百姓心安，所以他特别重视礼。

《论语》记载孔子和弟子子路、颜渊在一起的时候，说："盍各言尔志。"让他们都谈一谈自己的志向。孔子的志向是什么呢？孔子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个志愿看似很轻松，其实很难。所以孔子最后又补充说明："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孔安国的注解说，这个"病"犹难也，这个"诸"放在句末，就是之乎二字的合声。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修己以安百姓，别说是君子，纵然是像尧舜那样的圣君恐怕也难做得周到。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是使民众皆安，在这里就是说明安百姓，像尧舜犹难。这也是告诉子路，安民的工作没有止境。凡是安人、安百姓，他的基本功夫都是要修己以敬。故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什么原因呢？因为境随心转，要使自己的境缘，也就是我们的生存环境、生活环境、人际关系转得快，怎么转？那就是你的心要转得快。钝根和利根的区别在哪里？钝根是学了很长时间，慢慢地转自己的心，长时熏修，从不知道感恩变得感恩，从不知道孝敬变得孝敬；但是利根的人他转得快，一听到圣贤教诲马上知道自己错了，马上把自己的心转过来。结果他的心一转过来，环境、人际关系马上跟着转，所以我们希望自己的生存环境、人际关系转得好、转得快，快速的转好，怎么办呢？很简单，就是把自己的心快速地转好，这样境随心转，这个环境、人际关系马上就转变了。

卫灵公篇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孔子说能无为而治的人那就是舜吧，“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干，“无为”是不用亲身去干，“无为而治”的意思就是说舜自己不做什么事，而能平治天下。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任官得其人。这个《论语集解》何晏注：“任官得其人。”做什么事都得分配一定的职务，最高的领袖全在用人、选好人才。根据《尚书·舜典》记载：“舜命禹作司空，大禹治水平水土；命弃为后稷，播种百谷；命契作司徒，办教育；命皋陶作士，掌管法律；命益（伯益）作虞官，掌管山泽鸟兽。”这些都足以证明他能知人善任，所以才能够无为而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治国必先懂得知人善用，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本位做好，那就能够把国家治理好。

舜用了很多的人才，而他自己“何为哉”？究竟干什么呢？“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恭己”就是自己心存恭敬，对人、对事一切恭敬，人君的位置都是坐北朝南，“正南面”就是正坐在君位上。虽然无为，但不能不正坐于君位，坐镇在那里才能够无为而治。所以做领导的只要貌似恭敬大臣、体群臣，恭恭敬敬什么事也不问就行了。当领袖的人如果随便查随便问，那是乱天下之道。但是他不坐在那里也不行，国家也治理不好，他一不在事情就不像想象中的好了。舜能用人而不自用，所以孔子以无为而治来赞美他。

子张问行。

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子张书诸绅。

“子张问行”，这个“行”就是行为行不行的意思，凡事能不能行得通的意思。孔子解答：言语忠实守信，行为笃厚恭敬。“行”第一步要说话，“言忠信”，这个“忠”是对自己，“信”是对外；“行笃敬”，怎么样做才称得上是行笃敬呢？就是你做一切事情都当作是自己的事情办，恭恭敬敬、不能够马虎，一丝不苟；“虽蛮貊之邦，行矣”，“蛮”就是南蛮，“貊”就是北狄，“蛮貊”就通指不懂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这句话就是说一个人只要说话忠实守信，行为厚道有礼，虽到蛮貊之国，虽然到外国去也能够感化人，无往而不可行。

在《荀子·修身篇》中也说，“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也就是说，你要能做到“言忠信，行笃敬”走到哪里人家都尊重你，能体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四海之内皆兄弟是结果，原因就是“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走到哪里都对每一个人很恭敬。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没有什么过失，处处看到别人的需要；和每一个人相处的时候都彬彬有礼，这样的话才能够体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反过来说，假使言不忠信，行不笃敬，别说到外国，“虽州里行乎哉”？这个“州里”就是指自己的乡里，虽然在家乡也令人反感，处处行不通。

“子张书诸绅”，这个“绅”就是衣带。子张认为这一句话很重要，所以他对老师的话都很恭敬，于是把孔子的话书写在衣带之上。目的是能够随身记诵、依照执行，以便随时提醒自己。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这个“志士仁人”这个“志”，在古代的时候和智慧的“智”是相通用的。在俞樾《群经平义》引《礼记·缁衣篇》、《列子·汤问篇》，有关“志”

的各种注解，都当“知”，知识的“知”或者智慧的“智”讲。“志士”就是有智慧之士，“仁人”就是有仁德，讲术道的人。志士仁人不会因为求生而损害人，只会牺牲生命而成全人。生命虽然很可贵，但是志士仁人认为仁更可贵，所以不害人，但成人。我们学孔子就要学这一点，但是杀身并不一定是要牺牲生命。在焦循的《雕菰楼文集》上说“以死勤事，即是杀身成仁”。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管仲虽然未杀身，但是孔子也称许他“仁”，因为他将全部的生命时间牺牲在事业上，保住了中华文化。所以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没有管仲的话，可能现在都会穿着蛮夷的服饰呢！

那中华文化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竭尽全力的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呢？我们看西方的社会风气就可以知道了。西方社会因为在现代以来认为上帝死了，很多的年轻人不再相信宗教了。他们的政治制度，虽然是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进行制度安排的，但是因为缺少了伦理道德的教育，结果青少年倚强凌弱，吸毒酗酒卖淫，青少年犯罪的年龄越来越低，这样的现象层出不穷。所以我们如果西化的话，社会风气也就会逐渐变坏，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要成仁不必是被杀死，像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有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个都是杀身成仁。也就是我们竭尽全力的把自己的生命、一生投入到弘扬继承传统文化的事业上，这就是杀身成仁。圣贤死还是不死，关键点在于能否行仁，而不是说为了成仁就必须死，也不是说牺牲了生命就成仁了。

这个“害仁”在《唐石经》上作“害人”，这个“人”就是人民的人，如果作这个“人”字解也很有味道。志士仁人，志在“智慧”与“仁德”，这个“志仁”两个字就是道，除此二字之外就看得很轻。平常人都以生命为要紧，其实生命并不是最要紧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生必有死，自古以来没有不死的人，生命如何宝贵也必须死。像孔圣人死、佛也示现涅槃，有生有灭，自古都有死。但是人有人格，所以只要是人就要有人的样子，就要有人的良知。但是关键在内心，内里面还有心，知人知面不知心。所谓“人面兽心”。所以《礼记》上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

兽。”这些都是有口无心的禽兽。

相对于道而言，道重而生命轻，为什么呢？因为天不变，道亦不变，但是生命却不能够长久。所以有智慧、有仁术的人贵在保存人格；如果连人格都站不住，失去了做人的资格，谈不上是君子小人，那是禽兽。所以没有了人格，人身难得，所以保存人格很重要。忠臣孝子都不能失去人格，所以无“杀生以害人”，可是有“杀身以成仁”，可以牺牲生命但是不可以丧失人格。像历史上的孝子为父母、忠臣为国家，都是不惜牺牲性命。

讲到这里我们记得，在中央党校建校八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同志进行了一段讲话。他说：“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

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古人有这样的政治抱负、报国情怀、浩然正气和献身精神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文化的熏陶与我们不一样。他们从小读的是孔子的书，学的是《四书五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个都是他们经常看到的名言警句。所接触的文艺作品也是忠孝节义为主要内容，而我们现在的影视作品、网络小说都是受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大片的影响。主要是以娱乐至上，以享乐为荣，内容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暴力色情”。我们想一想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熏陶之下，所熏出来的人格怎么能够一样呢？所以，我们看到古人的这种浩然正气，我们就知道，他们所读的书和我们现在青年人所读的书是不一样的，所以所熏出来的人格也是不同的。

颜渊问为邦。

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

颜渊问为邦，就是问治国之道。孔子志在治国平天下，“人道敏政”。怎么样能治国平天下呢？那就是要办政治。有国才能够保家，有家才能够保身。到孔子时候已经是东周，与西周不同，在西周的时候，是周王做主，但是到了东周的时候，权力在诸侯。所以颜渊问办理邦家的政事，孔子答了以下几个要点：

“行夏之时”就是要采取夏朝的历法。在周书《周月解》上说：“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就是说夏历分一年，为春夏秋冬四时，每一时又分孟、仲、季三个月，孟春是戒淫之月，为四时之始。夏朝以此作为一年开始的正月，合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时序，也符合像孟子所说的“不违农时”。治国首先应该定天时，办事才方便，特别是在农业时代，夏历是最标准的，所以孔子答复颜渊第一个要点就是行夏之时。直到今天民间所用的农民历仍然是夏历，像我们日历的农历都是夏历。

“乘殷之辂”是讲使用的交通工具，就是夏朝的路，要用殷朝的路，殷路已经很难考证了。在《经典释文》上说，“辂，音路”，和大路的“路”是同音字，本译做路，本来也写作大路的路，“辂”和“路”都是车名。马融的注解说，“殷车曰大路”；《左传·桓公》二年曰，“大路越席，昭其俭也”。殷朝的车子是木头做的，也叫木路、大路，最朴素。“越席”就是蒲草编的席子，把它放在车里当垫子使用，这都有崇尚节俭的意思。

“服周之冕”，“冕”就是礼帽，这里代表衣冠，历代的衣冠制度都有所不同，孔子主张用周朝的冕。周朝的冕也很难考证了，依据包咸的注解以及刘宝楠《论语正意》的注解说：“周冕有垂旒。”就是古代的帽子上有垂下来的玉串，叫垂旒，用来遮眼。有黈纩塞耳，黈就是黄色的，纩就是丝绵絮。也就是用黄色的丝绵絮做成丸状，悬在冕的两边，挡住两耳，把眼耳遮塞起来。意思就是为人君者不听谗言，以及不需察为明，只要自己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就可以了，表示垂旒而治。只要能认识人，知人善用，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

“乐则韶舞”，在祭祀的时候都有典礼。祭礼很重要，比如说祭天祭地等等。得国者必须要祭天坛、祭地坛、祭太庙各种典礼，比如说祭祀以及对国民实施教化都需要音乐，但是音乐的五音不能错乱，否则就不吉祥了。所以孔子告诉颜渊，音乐要用韶舞。古代的注解，“韶舞”专指舜的音乐，俞樾《群经平议》说“舞”当读作“武”，就是周武王的“武”。舞、武二字，古人通用。“乐则”的“则”意思就是当作“法”字讲，也就是当取法舜乐和武王的乐，“舞”指武王的乐。也可以这样认为：舜帝的韶乐尽美尽善，当然可以用，那周武王的音乐，虽然没有尽善，但是也尽美，所以也可以用。

“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奏乐必须有音乐，必须有声音，声就是指高低远短；音就是指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这个就是八音。知声容易知音难，“放郑声”就是放逐郑国的乐声，为什么要放逐郑国的音乐，因为郑声淫。在《乐记》上记载子夏对魏文侯说：“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郑声淫”就是指郑国的音乐，音调滥无节制；宋音则过于安逸；魏音急促快速经常会烦劳抑制；齐音则有狂傲之音，听了让人骄逸，这四种音都不能在太庙中演奏。因为会败坏中正之气，这四种声都不能要。但是以郑声为首，所以说放郑声。

“远佞人”，“佞人”比如像少正卯，言伪而辨；又如像苏秦、张仪之流，无理辩三分，满口说的都是欺骗的话，不能忠信，所以不能用。治国的事情千头万绪，孔子告诉颜渊，以上几个要点，要博采历代的长处，来确定时令、车制、服制，选最好的音乐以及禁用“郑声、佞人”，自能树立宏规、治国平天下的章法，从中能够大概的领略。

我们现在的时令，就是农历，仍然选用的是夏历。车制最近以来，我们都提倡用国产汽车拉动内需，同时还降低公车的标准，这也有崇尚节俭之意。但是在礼服上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古代的服饰也都有教育的意义。古代的几品官穿什么样的服饰都是有标准的，这样便于行礼。大家一看你穿的服饰就知道你是什么位置的，他就知道怎么样给你行礼。像中山

服它也是有教育意义的，它有几个口袋（四个），告诉我们要有礼仪廉耻，讲的是四维。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治国要确定好时令、车制还有服制，还要选好的音乐，也就是所说的德音雅乐。

子曰："人而无远虑，必有近忧。"

在通行本上是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深远的思虑，必然随时遭遇不可预测的忧患。"远虑"的意思很广泛，就办事方面说，不论办大事办小事，目标要远大，办法要周详，还要预防流弊，就做人方面来说要励志，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要有生涯规划。知道我们这一生要做什么样的事，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仅仅要做一个成功人士，还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君子、做一个圣人。不但在人世间做一个好人就算了，还要学大道，明了人生的价值，明了生死的问题，知道人生从哪里来死到那里去，这个问题不明了，忧患就在眼前。就治国而言，古代人也非常有远虑。比如说在《礼记·王治篇》里就记载，"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你看古人治国也有远虑，如果这个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包括粮食等等的装备，这个叫不足；如果没有六年的积蓄为急，情况很紧急了；如果没有三年的积蓄，那就是国非其国也，国家都不称其为国家了。这个都是让我们居安思危，有备无患。一旦遇到水等等的自然灾害，这些粮食装备都可以用的上，不至于手忙脚乱。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臧文仲就是指鲁国的大夫臧孙辰，孔安国说："知贤而不举，是为窃位。"柳下惠是鲁国的贤人。依古代注解，说柳下惠姓展，名获，字禽，私谥为惠。《论语·微子篇》记载柳下惠曾为士师。臧文仲知道柳下惠是贤人，而不予立，所以孔子说他是窃位者，不予立。皇侃《论语义疏》说：

“不荐之于君，使与己同立宫朝。”就是不把他推荐给国君，使他和自己同在朝廷来侍奉君主。

刘宝楠《论语正译》说，“窃如盗窃之窃，言窃居其位，不让进贤能也”，为国为公都必须让贤，如果为己就是窃位，臧文仲不知道柳下惠有贤才还可以原谅，但是臧文仲知道柳下惠贤德，而且全国人都知道他贤德，他却不推荐给国君，这就是窃位。所以古人把为了自己的私利，不举荐贤才的人责备的很重。说这是偷窃职位的人，“窃居其位”，原因就是他不能够让进贤者。当然古人也知道，一个人如果举荐贤才，就等于把贤才放置在自己之上，如果没有什么好处，一般的人都不会这样做。古代的制度也安排的很合理，像古人一直都实行一个制度，那就是“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你为国家推荐了德才兼备的人才，这样的人对国家建功立业，举荐的人受到国家最高的赏赐，有连带的奖赏；相反如果像臧文仲这样，手下有贤才，但是因为他嫉贤妒能，没有把贤才举荐出来，反而把贤才埋没了，这样一旦被发现了，就会对他做出最高的惩罚。这样一来，人们都愿意把德才兼备的人举荐出来，这个国家的贤才都居于领导的位置，国家就很容易治理好了。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王引之《经义述闻》说：“躬自厚者，躬自责也。因下薄责于人而省责字。”意思是说“躬自厚”，对自己从重责备；“薄责于人”，对人从轻责备，这样做就可以远离他人的怨恨。“远”古代的读音也读“怨”。连孔子、佛陀也有人怨，没有不遭怨难的，这是社会的常情。全在个人学问，遇到被人埋怨、诽谤、诋毁的时候，需要多多包涵，能责自己深一点，责人薄一点，怨我的人就少了。在社会上我们看一个人是否有德怎么看呢？责备自己就是有德，责备别人便是无德。所以有德和无德，从这里就可以分辨出来了。

我们看到净空老法师，在弘法利生的过程中，虽然无私无求，但还是

招致了一些人的诽谤、误解、嫉妒，甚至别有用心的恶意中伤。那么这些诋毁、诽谤、中伤，并没有让他生起打击报复的心，或者退却了慈悲济世的心，反而令他写下了这样的词句：

感激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志；

感激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

感激鞭打你的人，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

感激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导了你应自立；

感激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

感激斥责你的人，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慧。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也是对我们人生的一种劝导，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他还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说，“处逆境、随恶缘、无嗔恚、业障尽消；处顺境、随善缘、无贪痴、福慧全现。”意思是当我们面临逆境的时候，我们要随顺恶的人际关系，但是没有嗔恨、抱怨、打击报复的心，这样我们所有的业障就消尽了；处顺境，当我们事事如意的时候，人对我也很好，处处帮助我、关心我、爱护我，随善缘，但是没有贪痴，不是因为环境很好，就生起了贪恋之心，这样就可以做到福慧全现。所以逆境是成全人，顺境也是成全人，当然你用的不好，逆境能够妨碍人，顺境也能妨碍人，重要的是看你怎么去运用。所以老法师用自己的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榜样”，确实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在《格言别录》上也有一句这样的话，“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以责备别人的心责备自己，因为我们挑剔别人，看别人的毛病缺点，都是一目了然、一清二楚，说起来也是头头是道。我们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挑剔自己，我们的过失就会很少了。而以宽恕自己的心去宽恕别人，这样就能把交情保全。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而不是相反。《论语》中句句都是格言，学会一句一生受用不尽，但是我们有很多人却是一句也做不到。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依据何宴的《论语集解》，“求”也作“责”字讲。君子凡事责之于自己，小人凡事责之于他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有很多，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君子遇到事情都是反求诸己，而小人相反。凡是自己没有错，都是别人的错，所以会怨天尤人。

在《孟子·离娄篇》上说了这样一句话，“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假设有个人，他以粗暴蛮横的态度对待我，君子会怎么做？他一定会反省自己，我对他一定还有不仁的地方，无礼的地方，要不这种态度怎么会冲着我来。自我反省之后，觉得自己做到仁了，反省之后也做到礼了，但是那个人的粗暴蛮横仍然如此，君子必定再反省，我待他一定还没有尽心竭力。经过反省，自己也做到了尽心竭力，那人的粗暴蛮横还是这样，君子就说，这不过是个狂人罢了，像他这样，同禽兽有什么区别，对于禽兽又有什么可计较的，因此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没有一朝之患。

君子一生所忧患的是：舜是人，我也是人，但是舜给天下的人树立了榜样，影响可以流传到后世，可是我却仍然免不了是个平庸的人，这是值得忧虑的。忧虑了之后像舜那样去做就可以了。至于说到君子一直所担心的那是没有的。君子不符合仁的事不干；不符合礼的事不做。即使有一时的担心，君子也认为不值得担心了。

从这里告诉我们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是他时时刻刻反省自己，反求诸己。所以凡是遇到不如意的事，不必怨天尤人。因为“一啄一饮，莫非前定”，都是有因果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样一想心自然也就平和了。《礼记·中庸》云：“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就说你把自己做好，端正自己而不要求别人这样就没有怨了。就像孔子可以做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的目标是追求道德学问，成就圣贤人格，只担心自己是个平庸的人，担心自己没有道德学问，而不担心别人对自己不好。其实所有来到我们身边的人，都是来成就自己的。君子也

不担心别人不知道自己，不担心自己的名声不够显扬，而是担心自己的修养不够。真正有修养的人，自然有人会来帮助他，也会有人来发现他，就是我们讲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举人”包括国家、机关、团体、单位、公司等等，都不是一人能办，必须有帮手。用一个人必须有推荐人，古人任人唯贤，荐人唯贤。那么如何举人呢？从前举荐人、推荐人，书信里首先必须有“品学兼优”的字眼，如果没有“品”字，别人是不会接受的。介绍人的时候，是“以德举人”。如果别人来要求我举荐，而我不愿意举荐他，在说了很多的好话之中，就是不提及“品”，不提及这个人的人品，人家就知道我不是诚心举荐。当然当推荐人也不容易，被推荐的人干不好，推荐人也负有连带的责任。无论是你给学校、给单位，还是给国家推荐，大小都同一道理。

在《管子·明法解》上这样说，“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战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见也。如白黑之分，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试，故妄言者得用。”《管子》上面这段话告诉我们，举人不能够以言举人。明智的君主，选举贤人，说他勇敢的，就要让他试着去带领军队；说他有智慧的，就要让他试着去担任一个官职；结果他率领军队能够立战功，就举荐他来做官；让他担任一个官职，他能够把这个事情治理的井井有条，把这些事都办好，那就要任用他。因此是以战功的多少，来确定一个人是勇敢还是怯懦；以所担任的官职执事，是不是能够办好，来确定这个人是愚钝的还是有智慧的。这样的话，一个人是勇敢怯懦，还是愚钝有智慧就像黑白那样的分明。但是乱主则不然，“乱主听言而不试，故妄言者得用。”他听到这个人说怎么能干，他也不让他去试着担任官职，试着去办事，就任用他。结果这个“妄言者得用”，喜欢说大话的人，做了很多承诺的人就被任用了。所以君子不以言举人就是这

个道理。

在《宪问篇》我们曾经学过孔子曾说，“有言者不必有德”，所以君子不会因为一个人说话好就举荐他，虽不以言举人，但也不以人废言。因为没有品德的人，有时也会说出有道理的话，只要言语可取，就不要因人而废言。比如说苏秦、张仪他们的言语，也并不是全不可取，不能因为人不好，所说的话好，而不听他的话。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终身行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一言”在这里当“一个字”讲。子贡问，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依之而行的？这句话必得是善于言语的子贡才问的出来，也必得孔子这样有智慧的人才能回答的出来。如果是换了别人，子贡可能也不这样问了。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有的人说给我说二句终身行之，但是子贡还嫌多，需要一个字。这一个字，也只有孔子能回答，孔子答复，说这个字就是“恕”。所谓的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所不欲的事情，不要加在别人身上，这个就是《弟子规》上所说的“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这一句话虽然很简单，但是你如果时时刻刻，每一件事都用这个话来要求自己，衡量自己的行为，就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了。当然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暗含着因果在其中的，为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你施于人，别人也会这样来对你。所以你不想让别人这样对你，你就不能这样去对别人，这是孔子给“恕”字最明确的注解。学仁学道，都应该依此而终身行之。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乱大谋。”

这二句也都是格言，第一句说对方。“巧言”有一种人能说话，能把无理说成有理，而且动听，这种言语足以扰乱人的德行。比如说少正卯的

言伪而辩，顺非而泽，不必犯罪，就该杀，这是巧言，为什么该杀？因为乱德也。这个德我们以前讲过是直心，巧言的人心不直，所以孔子反对“以言举人”。而我们现在却大兴演讲，如果演讲的好又违背道，那时蛊惑人心影响就更坏了。

“小不忍，乱大谋”，是说自己。无论对人对事，如果在小处不能忍耐，便会扰乱大计，中国古人说“一切法得成于忍”。在逆境的时候需要忍，要忍住能够安贫乐道，不是因为自己身处贫贱的地位，就去巴结谄媚富贵的人；到了富贵的时候，也要学会忍，忍住不去贪爱，不去骄奢淫逸，流连忘返于这些声色美景。所以顺境能够淘汰人，逆境也能淘汰人，甚至顺境淘汰人比逆境更厉害，这个都是修学的人要特别警惕的。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大众厌恶某一个人，某一个人不一定可恶，必须考察某人确实可恶，然后才厌恶他。同样，大众都喜欢某一个人，某一个人不一定就是好人，必须考察某人确实好，然后才喜好他。孟子也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这句话就是说：君主的左右人都说这个人好，不可听信；即使所有的大夫都说这个人贤德，也不一定可用可听；即使全国人都说好，也要考察，看他确实可用，然后才去举用他。依王肃的注解说：“或许某人特立不群，因而为众人所恶”，可能这个人见识独行，而且见识卓越，所以为一般的世俗之人所厌恶。我们看自古英雄不得意的时候，大家看不起他，比如说韩信，他虽然有将才，但是一般人看不出来；刘邦用兵十万，韩信则多多益善。这种卓立不群的人，必须靠慧眼识英雄，才不至于被埋没。当然或许某人结党营私，而为他的同党所喜好，所以众好众恶，都不可不察。

在《群书治要·史记》上，记载着这样一个历史故事：齐威王刚即位的时候，九年之间，诸侯都来征讨他，致使国家得不到治理。于是齐威王就把即墨的大夫，也就是负责治理即墨地方的官员给召来了。对他说自从

你到即墨去之后，毁谤你的言语，我每一天都能够听到。但是我派人去视察即墨，发现田野都得以开辟，人民都丰衣足食，官府也没有积压的公事，一方地区因此得以安宁。这是因为你不会讨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赞誉的缘故。于是封了一万的食邑，给这个即墨大夫。接着他又把阿地的大夫召来了，对他说自从派你去驻守阿城，每一天都能够听到赞誉你的声音。但是我派人去视察阿县，田野没有开辟，人民过着贫苦的生活；赵国攻打甄的时候，你不能出兵去救援；魏国获取薛陵的时候，你居然连这件事都不知道；这是因为你以重金，巴结我的左右，以求取声誉所导致的，所以他当天就杀了阿大夫。并且把他身边那些曾经赞誉，阿大夫的人一同都给杀掉了。后来齐威王起兵向西，去出击赵国、魏国，在浊泽这个地方打败了魏军。齐国上下都感觉到很恐惧，人人都不敢文过饰非，做事务求真实，尽自己的本分，最后齐国得到了大治，诸侯听到此事之后，再也不敢轻易地和齐国打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有很多人称赞一个人好，你也要考察这个人，是不是都受了他的贿赂，所以才帮他说好话。即使这个人受到很多人的毁谤，你也要考察一下，是不是这些人都贪污受贿，只有这个人廉洁自守，不愿意同流合污，才被他们所排挤。所以郑板桥写过一句话叫“难得糊涂”。为什么难得糊涂，因为“众人皆醉他独醒”，众人都贪污受贿，不尽职尽责，他不愿意同他们同流合污，又不愿意受到排挤，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不是他消极，而是他有这个气节，不愿意和他们同流合污，所以才写出这样的话。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皇侃《论语义疏》引蔡谟说，“道者，寂然不动，行之由人，人可适道，故曰人能弘道。道不适人，故曰非道弘人也。”蔡谟这句话，解释出自《周易·系辞传》，依他的这个说法，指道是寂静不动的本性，它无体无形，无时无地而不存在着。“道”其实也就是人的本性，无思无为，人

则能以感通，再用种种方法把道弘扬出来，所以人能弘道。但是道不能自说，就像孔子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个道它不会自己说话，必须由人去领悟、去实行，方能由体起用，所以非道弘人。孔子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人明白，道虽人人本具，人人本有，但是必须靠自己去领悟，方得受用。悟后又须弘扬光大，使人人都得其受用。这个就是大学上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把自己本性的性德开发出来、彰显出来。而且要帮助别人，把他的本性彰显出来，自觉觉他。这两件事都达到圆满的程度，这叫止于至善。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一个人有过而不改，这就叫做过了。刚才我们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人都有光明的性德，具备一切知能，但因一念之动，不觉失明，便为过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除了圣人无过以外，其余人都不免犯过。改过就像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什么是格物，汉儒注“格，来也”，来了事情，来了念头，这叫格物。致知就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一觉悟就消灭，使其发现本有的明德，叫做明明德。所以改过便能明明德，成就圣人。虽然格物致知的功夫，不是普通人所能着力，但是能够不起害人害物的念头，一起这样的念头就予以克制，便能日日改过。所以古人说“不怕念起，就怕觉迟”，不怕你不好的念头生起来，就怕你觉悟得太迟缓，把这个念头相继不断，甚至还付诸行动。有过不能觉不能改，是真有过。大家明白这句话的话就可以悟道，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就是开悟，把自己的过失改正过来，就是修行，能够改过就能够恢复本来面目。人的罪过虽然很多，但是“众罪如霜雪，慧日破诸暗”，智慧一现前，就像慧日一样，把霜雪都给融化了。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孔子说他自己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眠，独自寻思，但是没有收获，还不如读书求学的好。在《为政篇》孔子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主张"学与思并重"，这里边所说的"以思，无益"，就是指只思不学而言。这一章完全注重在"学"字。"人有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生而知之者，上也"，但是这样的人比较少，其余普通人都需要学，就连孔子也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比如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但是孔子说他自己，比一般的普通人好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他好学到以至"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一生好学，比如说孔子学周公，好几次在梦里梦见周公，孔子研究某一个道理，可以终日不食，晚上睡觉睡不着。

《史记·孔子世家》就记载，孔子向师襄子学琴，学了十天仍然没有学习新的曲子。师襄子说："可以增加学习内容了。"意思是你可以学习别的曲子了。孔子说："我已经熟悉乐曲的形式，但还没有掌握方法。"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又说："你已经会弹奏的技巧了，可以增加学习内容了。"但是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这个曲子的意境。"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已经领会了曲子的意境了"，可以增加学习内容了。孔子说："我还不了解曲子的作者。"又过了一段时间，孔子神情俨然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时而庄重穆然，若有所思，时而怡然高望志意深远。孔子说："我知道他是谁了，那人皮肤深黑，体形颀长，眼光明亮远大，像个统治四方诸侯的王者，若不是周文王，还有谁能撰作这样的音乐曲子？"师襄子听到后，赶紧起身再拜说，我的老师也这样认为这的确是《文王操》。

所以你看孔子也好学，学的也很专精，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不是浅尝辄止。颜回也很好学，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因为他乐在学道之中，所以能够做到"不迁怒、不贰过"。这个就是他好学的成果，好学的成果就表现在变化气质上，能够不迁怒、不贰过。有怒气马上能认识到，不使怒气连续延长，过失不会再

犯第二次。所以他乐在道中，有道无所不乐。“学”，学的是什么？此处的“不如学也”，应当就是“好古敏以求之”的意思。“古”是指古书所记载的古圣先王之道。所以孔子、颜子所好，所学都是圣贤之道。

像我们许多人也喜欢看书，知识面很广博，但是所看之书未必是经典，未必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而沉淀出来的智慧。我们读经典，学圣贤之道，这都是大浪淘沙，为历史所证明的成果，学这些圣贤之道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也不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特别是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对自己所阅读的书，所看的电视节目都要有所拣择，不能什么都看。如果什么都看的话，潜移默化的会受到它的影响，受到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完全取决于你看的内容。

在《贾子新书·修政语》上说：“汤曰‘学圣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静思而独居，譬其若火’，夫舍学圣之道而静居独思，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然可以小见，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贵尚学道，而贱下独思也。”这里他做了一个比喻，说学古圣先王之道的人，可以把他比作为太阳。一个人静思独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像火光一样，如果舍弃了学圣贤之道，而一个人冥思苦想，就像舍弃了外边的太阳光明，而去屋子里接近小的烛光。这个烛光可以让你有小小的见识，能够见到周围小的范围，但是开不了你的大智慧。所以明智的君主乃至与君子仁，都崇尚学圣贤之道，崇尚读经典，而不是一个人独自的冥思苦想。这句话能够作为这一句很好的注解，告诉我们要学就多学经典，学圣贤之道，这样才能学有所成，学习之后也能变化气质。

季氏篇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这一段话讲季氏将去攻伐颛臾，冉有、季路来见孔子说季氏将出兵攻伐颛臾。"季氏"，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说是鲁国的季康子。"颛臾"，根据《论语集解》孔安国注，颛臾是伏羲的后裔，风姓之国，本来为鲁国的附庸，当时臣属于鲁。为什么季氏要伐颛臾？因为此时的季氏有私心、不安分，等我们看完这一段之后，就知道他为什么要伐颛臾了。当时孔子的弟子冉有、季路都做季氏的家臣，所以来见孔子报告这件事。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孔子不说季路，只说冉求。孔子指明冉有说："求，无乃尔是过与？""无乃"就是一个疑问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恐怕这是你的过失吧，先责备冉有。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夫子"就是指季康子。冉有的意思是，季氏要这么办，他们两个做家臣的都不愿意、不支持，我们并不想攻伐颛臾。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马融注："周任，古之良史也。言当陈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则当止。"是说在古代有一个叫周任的史官，他是一位贤人，说了这样几句话。他说一个人出去做事、为人辅相的人，必须陈力。"陈力"就是度量自己的才能和力量是否能够担当这些职责和任务，如果这件事我能够担当办得好，那我就办；如果办不了，就停止、不去办。如果我度量自己的能力可以把事办好，那就必须去办，列居职位，如果你答应了但是却没有办好也办不了，那就得辞职。就是告诉我们，能做就做，不能做就告退。

"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否则见人危险而不能维持，见人跌倒而不能扶起，那何需你做他的辅相？

"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意思是冉有说"季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这就错了。这就是直接责备冉有，说不关自己的事儿，这实际上是推托之词。下面举了一个比喻"虎兕出于柙"，猛虎和兕牛从柙槛中逃出，"柙，槛也"，就是关兽的笼子，猛虎兕牛从关它们的笼子里跑出来了；"龟玉毁于椟中"，"椟"是木柜、木匣的意思，神龟宝玉毁在所藏的椟柜中。那不是看守者的过失，究竟是谁的过失？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冉有又说："现在的颛臾城郭完固，与季氏的费邑相近，如果现在不攻取，将来必定会成为季氏子孙的忧患。"他的意思是说，现在的颛臾和从前不同了，他把国家整顿得很坚固，而且接近费县（费县是季氏鲁军很重要的地方，它的西边就是鲁军），如果现在不伐，后来费地保不住，那么季氏

的子孙也会以此为忧。所以，冉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也是为季氏打算”，如果季氏的后人一软弱，季氏家就危险了。这是危而“先”持，并不是不尽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孔子说：“求，你说的道理，君子很厌恶。”为什么？因为明明是季氏想贪得颛臾的土地，但是你却舍之不说，还给他捏造一些言辞、为他找借口，说什么“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丘”我们读作mǒu，是为了避讳、表示尊敬。）“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春秋繁露》这样引用这句话，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所以这里面的“寡”作“贫”讲。在俞曲园的《古书疑义》上也举例认为“寡”、“贫”两字在传写的过程中互换了，可以根据《春秋繁露》订正为“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曾经听说，有国的诸侯、有家的卿大夫，不担心贫穷，而担忧不平均。”为什么不忧患国家贫？一切物质缺乏没有关系，因为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劲儿往一起使，也可以脱贫致富。

像我们古代的大家庭，是恩义、情义、道义的结合，每一个人为家族工作、付出，到老的时候由家族来养老，所以每一个人都很有安全感，即使自己的小家境遇不好，但是养老育幼的事情也不用操心，有大家族做后盾。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都身心安稳。到解放之后吃大锅饭为什么没有效率了？因为那个时候八年抗战，传统文化的教育被中断，人们不再有恩义、道义和情义，有的人看自己干多干少都一样，私心生起来了，就不愿意去努力工作了，所以大锅饭才行不通了。就像家庭，一家的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古代能够行得通，为什么到现代就行不通了？因为古代有兄友弟恭的教育，五伦关系都处得很好，大家互相谦让、互相关心、互相照顾都来不及，怎么还会因为一点点财产起争执？但是连续几代几乎没有人讲传统文化了，没有接受过伦理道德的熏陶，一家人在一起不知道兄友弟恭，所以家庭就出了很多问题。比如兄弟在一起妯娌不和，就过不下去

了。所以重要的并不是血缘纽带，而是有恩义、情义、道义的结合，有伦理道德的教育，这才是关键。所以要忧一切不平均。如果贫富差距很大，又没有好的措施和教育，就会导致不平。古代的时候也有贫富差距，为什么没有不平？因为古代有因果教育。富人知道自己富的原因是布施，他会更加欢喜地去布施，结果越施越多；穷人知道自己贫穷下贱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悭贪，所以他也懂得用自己的内财去布施，就是用自己的身体、精力、学识等等去帮助别人，而不是怨天尤人。但我们现在既没有好的措施，也没有这样的教育，如果贫富差距很大，就会导致不平，不平升级就是怨，怨气随即就产生了，怨再往上提升就是恨。所以政治上要讲究平等，经济上也不能不平均，贫富差距太大就会导致社会不安定。

“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担心人民数量少，而担心上下不安。后面说“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盖均无贫”，如果大家平均都一样就无所谓贫了；“和无寡”，如果一团和气，即使自己的国家人少，也能把远方的人招来，所以只要人与人之间相处和谐也就相安无事；“安无倾”，相安则不招外患，国家不至倾危，只要安稳，国家就能够保得住，如果内有苛政、外有外患，便不能安。当然并不是说内部安容易，外部安难，其实只要内部和谐、上下一体，就能安；如果上下不一心，打仗的时候枪往里打，便是倒戈；如果上下一心，宁死也要保国，即使是面对强大的国家也能够抵御。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懂得亲上事长、肯一心拼命，什么事都能办得成。内外皆安，国家也能保得住。

“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诚能做到以上这些，远方的人如果不来归顺，那我就要修养文化道德，使他来归；他既来了，还要能够安之。孔子说这话什么用意？季氏想伐颛臾，如果不伐，怕颛臾强大起来、费地保不住。什么样的人会来攻伐费地？其实不仅仅是颛臾，其他的国家也都会来费地找麻烦。所以“远人”就是指颛臾以外的国家。但是如果照我所说的方法“柔远人”，就是治理国家、办外交要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别的国家不但不来攻伐我，而且我做到了厚往薄来、待人加厚，即使别人待我很薄，我也要待他厚，讲信修睦、

不动干戈，要用文化的方法招来，国家自然就稳定了。这一安，内外统统都安。所以孔子这里先说安内、再说柔远安外。

“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但是如今，仲由和冉求辅相季氏，为季氏家做事，怕人来危害颛臾，继而危害费邑，那就是远人不服，又不能够修文德使远人来到自己的国家，也就是说，你不与他们办外交、搞联络，对外没有邦交，所以外人不来。不来的原因就是你内部没有治理好、内部混乱。就像别的国家的人想到这里来投资，但是你自己的政治不安定，经常搞内讧，别人看到这样的环境也不敢来投资了。

“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国内的人，人心分崩离析，自身已经不能保守了。孔子说的这话很含蓄。当时鲁军被三家把持，“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邦”就是指鲁军的邦国。什么是“分崩离析”？孔安国说：“民有异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会聚，曰离析。”民有异心、离心离德了叫“分”；民想离开、不愿在那里呆着了就叫“崩”；“离析”就是不可会聚，从前服役的是老百姓，有事要聚合时，老百姓不听调度，邦家到了这个地步，现在不必远人来，要保守你自己都保不住了。“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出兵伐国内的附庸，颛臾是在你的邦国内当附庸，你既保存不了自己，还要动干戈伐自己。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我恐怕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下边就说出问题的关键了。季氏要伐颛臾，其实他的目的并不是在小的国家，他有私心，私心何在？我们看看什么叫“萧墙”就能够明白了。“萧墙”，郑康成注：“萧之言肃也。墙谓屏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墙。”也就是说“萧”就是肃敬的意思，“萧墙”就是屏风，走到萧墙这里想见国君一面，一切都必须收敛。像我们看京剧、京戏中的屏风，表示人到这里要端、肃、静、适。国君的屏风在外，诸侯的屏风在内，大夫为帘，士为帷幔，君屏与外者为“墙”。“萧墙之内”这里边有两种解法，一种注解是指季氏家，当然，季氏于泰山以天子的礼乐来祭太庙，这里采取君屏萧墙也是僭越。

皇侃的《论语义疏》就说：“臣朝君之位在萧墙之内也，今云季氏犹

在萧墙之内，谓季氏之臣必作乱也。”比如说，阳货就是季氏的家臣，与季氏家也不和，阳货找季氏的麻烦，囚禁了季桓子，所以“萧墙之内”就是说季氏的家臣必然会作乱，别说要伐颛臾了，自己的家已经要保不住了。另一种解法，说萧墙是指鲁君。方观旭《论语偶记》说：“萧墙之内何人，鲁哀公尔。不敢斥君，故婉言之。”方观旭认为当时的鲁哀公欲去三桓、收三家的权，三家都不高兴，季孙就害怕颛臾世代都是鲁国的臣属，颛臾如果治理的好而且听从鲁侯的命令，自己的费在中间，颛臾在东，鲁军在西，就会和鲁形成掎角之势，这样就有可能把季氏灭掉，所以唯有谋伐颛臾才能阻止鲁哀公的企图。孔子指“季氏忧在萧墙之内”意思是说，季氏并不是担忧颛臾而去想攻伐颛臾，实际上是担忧鲁君，才去讨伐颛臾，所以季氏伐颛臾就是在抵抗鲁军，想灭去鲁军的一臂之助，他自己便得安稳不必为后世子孙担忧了。这是孔子谴责季氏的奸人之心，想要抑制他的邪逆之谋。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也赞同方观旭的这一观点。

对于这一段话，皇侃《论语义疏》引蔡谟说：“冉有、季路并以王佐之姿，处彼相之任，岂有不谏季孙，以成其恶？所以同其谋者，将有以也。量己揆势，不能制其悖心于外，顺其意以告夫子，实欲致大圣之言以救其弊。”皇侃《论语义疏》引蔡谟的说法，说冉有和季路作为王者的辅佐，处在宰相的位置，哪里有不劝谏季孙的道理！难道要助长他成就恶势？之所以和他同谋是出于迫不得已。因为他度量了自己的能力和势力，不能制止季孙的悖逆之心，于是就顺着他的意思把这件事禀告了夫子，实际上是想借着圣人的言语来挽救这一个弊病。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说：“春秋三传皆不载季氏伐颛臾事，则其闻夫子之言而止也必矣。”潘维城在《论语古注集笺》说春秋三传，即《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公羊传》，都没有记载季氏伐颛臾的事情，可见季孙听到了孔子的言语，所以停止了这一企图。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人在社会上就要和人交往、不离朋友。父子兄弟是天然而成的天伦，无法选择；夫妻是半天伦，虽然不是天然的，但是有了共同的子女之后，也就成了天然的天伦；朋友虽然不是天伦，但是在五伦之中也是重要的人伦关系。人在社会必须要交朋友，交朋友就不得不被“传染”，所以这一件事关系重大，交友必须有所选择。在这里，孔子讲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损的朋友也有三种。

“友直”，就是交正直的朋友。这个人心中没有弯弯绕绕、正直无私，不会害人、他也害不了你。但是你必须自己正直，才能够交到正直的朋友，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如果你自己不是一个正直的人，那么正直的人也不会来与你结交。“友谅”，就是交宽恕的朋友。一切事都能宽恕、不苛刻要求，不把别人的过恶总是记在心上，一翻出来就没完没了。很多注解都把“谅”字当“信”字讲，但是“信”字和前面的“直”字意义很相近，因为直者必信（如此便含义重复），所以在这里应该当恕字讲。“友多闻”，就是交博学多闻的朋友。因为多闻的人能够通达，遇到事情不会钻牛角尖，和这样的朋友交往，也可以帮助自己解决迷惑。交这三种朋友是有益的。

“友便辟”，就是交恭谨周旋的朋友。也就是说，他会说话、言语巧妙、决不得罪人，这种人善于奉承，善于顺承人。比如三国的时候诸葛亮的朋友司马德操，他对于任何事都称好，他的妻子不以为然，骂他，他也称好，人称他为“好好先生”，但是没有人说他的坏话。为什么？因为司马德操的行为很正直。这种人不算便辟的朋友。因为他会恭谨周旋，那么说出来的话他不愿意得罪人，说出的话也就很可能失去正直了。“友善柔”就是交善于面柔的朋友。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巧言令色”中“令色”。“友便佞”就是交善于言辞的朋友，这种人可以无理辩三分，交这三种朋友都有损失。在古代的注解中，有人把“便辟”解释为《公冶长篇》的“足恭”，把“善柔”解释为“吝啬”，把“便佞”解释为“巧言”，可以作参考。

我们每周一起学习《论语》的朋友虽是益友，但是大家在社会上和

其他人接触的时间更长。看我们一起在学论语，一周可能只有两个小时而已，但是其他时间都是和社会上的其他人交往，而且我们所讲的话到底听进去还是没有听进去。所以谁让自己成就？是自己让自己成就，别人帮不上太大的忙，别人所提供的只是缘分。如果自己不成器、不上进，即使是圣人来教，对你的帮助也不大。所以交友很重要，但是能不能成就，更重要的是自己求不求上进。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三乐"的"乐"字一种读音是yào，当"爱好"讲；一种读音是lè，当"喜乐"讲。"乐"在古代读音为luò。前章我们讲的是指人而言，指交友；这一章是指事而言，就事情上讲。社会上虽然有各种习染但是重要的还是在自己。习染好便好，不好也是在自己。"益者三乐"，就是有益的乐事有三种；"损者三乐"，对自己有损害的乐也有三种。

"乐节礼乐"，就是以礼乐节制为乐。讲礼乐有什么可喜欢的？其实我们都喜欢，在我们本性中就有。比如说，人都喜欢咚咚锵锵地唱一两句，禽兽也是如此，像狗叫马鸣都是唱歌。人有心事，散闷气，音乐就是七情发出来的言语、发出来的声音，人人都有只是不会选择。音乐是情感，圣人作乐为的是调整人的情感往好处走，与我们现在的流行歌曲有很大的不同。今日有所谓的纯音乐、纯文学，想做贼就唱贼歌，这是纯坏的情感。"礼"我们也懂得什么是礼，比如说有人无缘无故地打了你一个耳光，你会不会很高兴很快乐？如果你知道自己不高兴，你便是懂礼的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愿意接受的别人也不愿意接受，这就是礼尚往来。"礼"讲的是秩序。比如说，我们知道同街的狗之间比较亲近和善，它们会欺负外来的狗，群起而攻之，自然有远近厚薄；人对自己的儿女、自己的亲友就会比较关爱，爱自己的儿女当然要比爱别人的儿女要多一些，这也是人之常情，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很多人讲"等差"，

为什么？因为这是自然的秩序。“乐节礼乐”，礼讲秩序、乐讲和谐，人天长地久在礼乐之中，彼此恭敬、内心和谐，这就是人生最快乐的事。一个人以礼来节制自己的言行，以乐来调和自己的七情，以此为乐事，必得性情之正，自然有莫大的利益。

“乐道人之善”，“道”有的版本写作引导的“导”，这里不当道就是“说”字讲，而是当引导的“导”字讲，以导人向善为乐事。比如说自己喜欢学礼乐，也引导别人一起学礼乐，一同往善路上走，必得大益。我们如果能依《弟子规》、《常礼举要》来实行、落实，在外面做事的时候就会少受些讥讽。如果自己不懂礼，如何引导他人？自己不正，怎么能够导人正？所以能以礼乐引导人又是一件乐事。比如说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蘧伯玉羞耻单单自己是君子，为什么？因为环境都坏，你自己好，没有道理；若自己真好，你周围的朋友也都会受你的影响而变化，所以他们不好，就是你不好。俗语有一句话说：“观友而知其人。”我们学论语也必须悟。我们观察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引导自己周围的人都去做好人，这就是第二种乐趣。“乐多贤友”，以多得贤友为乐事。中国人有句话说，“多一个朋友多条路”。朋友是五伦之中一个重要的关系，人在社会上不能离开朋友，朋友越多越好。但是必须选择贤者为友，才对自己真正有益处。

“益矣”，在社会上走这一条路对你便有好处。《太上感应篇》开头就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因果都是自己招来的。在《易经·系辞》上也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些讲的都是因果。下面再说不好的事、对自己有伤害的事，不能干。“乐骄乐”，就是以骄为乐。不管是以富贵骄人，还是以学问骄人，都对自己有损害。一个人不知道骄傲有损害，反以为乐，而且以能够得到骄乐为乐，那么他所得的损害就可想而知了。“骄”，人人都有。比如富与贵、有学问的人都容易骄傲；有钱人见到没钱人便骄傲，因为他不如我；做大官的看不起做小官的。其实如果做小官的人一心为百姓，他就是君子；做大官的害百姓，以权谋私，他也是小人。今人说“值得骄傲”，就说

错了，说这句话的人就是小人。孔子说“富而无骄”，说“值得骄傲”的人就没念过这一句话，对人骄傲，并以此为乐。

在佛教的《成唯识论卷六》说：“云何为骄？”什么叫“骄”？后面下了个定义：“于自盛事，深生染着，醉傲为性，能障不骄，染依为业。”意思是：对于自己的长处、自己所擅长的，心生执着，从而陶醉骄傲，他能够障碍“不骄”（“不骄”就是谦卑），生长染污不净之法。这都是“骄”的作用。为什么会有骄傲的心态？佛法总结了八种让人产生骄傲的原因：

第一盛壮骄，因为自己的身体强壮、精力旺盛而骄傲。这在动物界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比如说我们看动物世界，对骄傲有深刻的了解。很多动物都是以体力、暴力称王称霸一方。

第二是因为种姓、人种、血缘、优越而骄傲。比如说有人出生就生在贵族种姓的家庭，这就有了骄傲的本钱。虽然现代社会比起古代社会文明进步了很多，但是因为种姓、肤色、性别所造成的等级在世界各国还是存在，并且也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存在。比如说同样都是美国的公民，但是白种人在黑人面前就显得高人一等；种姓在古印度是地位阶级的象征，古印度阶级非常的分明。

第三富骄，是因财物富裕而骄傲。古往今来，很多人不择手段地去掠取财富，就是为了实现富骄梦。孔子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富而不骄傲，修养本来就不容易了，但是比起贫而无怨来还更容易一些，所以说易。有许多人财富多了、地位高了，反而能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这就是富而无骄。然而这毕竟不容易。所以自古以来就有“贫戒怨，富戒骄”的古训。暴发户和贵族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这里。贵族，就是有财富、有地位，但是懂礼不骄慢的人；而暴发户却恰恰相反，因为自己有权位、有财富，就以此骄慢无礼。

第四聪明骄，就是因为自己聪明贤惠而骄傲。没有知识学问就迷惑颠倒，掌握了一些学问又骄傲自满，觉得自己了不起，这叫“聪明骄”。

第五色骄，就是因为容貌端正而骄傲。人长得漂亮、身材好，自然产生骄傲，这也难免。在《玉耶女经》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玉耶是王

舍城护弥长者的女儿，出生在豪贵长者家，而且端正无双，因为她长得姿容美丽、身材楚楚动人，加上从小就娇生惯养，因此就养成了骄慢的性格。后来她嫁给了舍卫国须达多长者的第七个儿子做妻子。须达多是波斯匿王的大臣，他的性格性情仁慈，也是佛著名的在家护法，他因为常常怜悯贫穷孤独的人，好行布施，所以被誉为“给孤独长者”。须达多长者的家庭非常的和谐，他的六个儿媳妇不仅仅温柔贤惠，而且都信奉佛法。但是玉耶女嫁到夫家之后，却仍然心高气傲，既对公婆没有孝顺服侍，对丈夫和亲友也缺乏应有的尊重。那么给孤独家就商议说：“这个妇人这样的骄慢，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教训教训她？”如果用杖捶，就是打她一顿，施以家法，那肯定不是好的办法；但是如果没有训教的话，她的罪过会与日俱增。

由于玉耶不能够善尽妇道，没有女子贤淑的德行，让须达多长者非常的悲伤失望。他想不到，本来是大家闺秀的玉耶，才嫁进夫家就这么目无尊长、我行我素。须达多也曾想让她去见佛希望佛能感化她，但是她拒绝不肯去。须达多长者知道教化玉耶，除了佛陀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玉耶又和家人媳妇儿们不同，从不愿意去祈园经舍听佛陀说法。不得已，须达多决定请佛陀上门应供（就是请佛陀到他们家去吃饭），以便趁着这个机会以佛法教育媳妇儿。

须达长者就到祈园经舍求见佛陀，对佛陀禀告说：“慈悲的佛陀，我今天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来请您相助。本来家丑不能外扬，但是佛陀是我们众生的慈父，唯有佛陀的威德才能调服刚强难化的众生。”他就接着说：“佛陀，弟子一生一共生了七个儿子，六个媳妇儿都孝顺贤惠，唯有第七个儿子的媳妇儿，叫玉耶，长得绝顶聪明美丽，但是她骄慢异常，时时出言不逊、轻慢尊长。我们本想带她来听佛陀开示，但是愚痴遮盖她的心灵，她非但不信，而且诽谤佛陀。她以为人生就是享乐第一、美貌第一、爱情第一，除此她什么都不愿关心。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能请求佛陀慈悲，为度化我刚强不化的儿媳妇儿想个办法。”

佛陀察知须达多长者的心意，当即说道：“玉耶既然不愿意前来，你

又对她这么爱护关心，那么明天我就到你的府上去访问一趟吧。”须达多长者一听佛陀要光临他的家里，惊喜得老泪纵横，当即奔向佛陀的座前顶礼佛足。

第二天佛陀带着弟子来到了长者的家中，长者夫妇以及他的七个儿子六个儿媳妇儿都出来绕佛三匝、以示欢迎，只有玉耶躲避佛陀，不肯出来。长者感到非常对不起佛陀，心想：娶了这样不贤惠的儿媳，而且辜负佛陀的慈悲，这是全家的耻辱。但是佛陀却不以为意，反而心生慈悯，身上发出了万道德光，照得所有的墙壁都透明如玻璃。大家这时都看到，其实玉耶就在门后的缝里偷望着佛陀，玉耶对佛陀虽然有抵触，但是一见到佛陀的相好光明，过去的反感一扫而光，而且衣毛为竖、战栗惶怖，她知道自己的身体隐藏不住，只好站出来，来到了佛陀的身边，低着头不敢仰望佛陀的慈颜。佛陀心平气和地说：“玉耶，女人光是容貌端正娇美，不名为美人，更不值得骄傲。而心行端正、有镇静悠闲的女德才受人尊敬，方可名为美人。姿容秀丽、身材动人虽然可以诱惑迷醉痴人，但不能够受人尊敬，并不能算作很好的人。而自视美貌、看不起他人、行为不检点，只会为自己的将来带来无穷的苦患。而身为女人之身，注定就具有三种缺陷和十种业障。”佛陀先说女身有三种缺陷和十种业障，导致的女人多苦，因而折服了玉耶骄慢之心；随后佛陀又为玉耶女说法，批评她自恃美貌、出身豪贵而骄慢夫主，指出外貌的美丽不足为美，心灵纯洁、行为端正方为真美，教导她如何做一个好的妻子。

玉耶女听闻佛陀的教诫之后，深深地忏悔自己过去的错误，向佛哀求忏悔。玉耶流泪走上前去，拜佛言：“我本愚疑不顺夫尊，自今以后当如婢妇，尽我命寿，不敢骄慢。”即前长跪，求授十戒、三自归命，玉耶也请求皈依佛门。佛就为她授了十戒，她发愿生生世世做一个学佛的居士。须达多长者的全家见了此情形也欢喜鼓舞，也都为她庆祝新生。从此以后玉耶就成了一个贤良的媳妇儿，为远近的人们所称道。这就是讲的因为自己的面容姣好而骄傲。

第六寿命骄，因为寿命长而骄傲。长寿也成了骄傲的资本。

第七行善骄，因为行善修德而骄傲。行善做好事、帮助他人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因此而骄傲，好事就变成坏事了。很多人还在做好事里边，不知不觉起了名利心，结果把好事变成了坏事，违背了初衷。

第八种自在骄，也就是因事情顺心、心情自在而骄傲。比如说学圣贤教诲的人都知道心想事成、事事顺遂，那么因为这个修行有一些感受也因此而骄慢、骄傲。

这里所说的八种骄只是概括而言。骄慢带来的实质是痛苦的，正如莎士比亚说："一个骄傲的人，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弟子规》也提醒我们"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如果只是学了一些圣贤的典章、名言警句，但是没有用在修身上，这就是大毛病了。

骄慢也妨碍人学道。印光大师曾经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我们看谦虚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成就的。在《了凡四训》上，了凡先生参加过好几次赶考，在每次赶考之前他判断哪一个人可以考取、哪一个人要落榜，最后的结果和他所预测的都一模一样。他通过看人的言行举止来判断，如果这个人表现得谦虚，即使年龄很小也会考中，他的标准就是看这个人是不是谦卑。

在春秋时代，齐国的宰相晏子有一位驾马车的属下。有一天，当他为晏子张开车盖的时候，驾车人的妻子正好从门缝里看过去，看见他的丈夫趾高气昂、很得意的样子。过了一会儿，驾车的人回来了，妻子就要和丈夫离婚。驾车的人觉得很奇怪，就问妻子，说："你为什么要和我离婚？"妻子很有智慧，她说："晏子身高不到六尺，可是在齐国做宰相，名誉传遍了天下的诸侯，但是我看他出门的时候，态度很谦和，常常好像自己不及他人的样子。而你，身子有八尺长，给人家驾车像奴仆一样，但是你出来的时候却表现一副高傲不可一世的神情，所以你只适合做一个卑贱的人。由于这一缘故我要离你而去。"从此以后那个驾车的人就很谦下了。晏子觉得他的行为突然改变觉得奇怪，就问他原因。驾车的人就把这件事的原委老老实实地禀告了晏子。晏子很赞叹他能够改过自新，就推荐他做了齐国的大夫。我们说"境随心转"，他骄慢的态度一变，自己的地位也

就变了。《左传》上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可见“乐骄乐”是一件不好的乐事，对自己会有损害。

君子有三乐，我们看到“乐骄乐”，下面我们看“乐佚游”，以佚游为乐。

佚游的含义很广泛，依王肃注：“佚游出入不知节也。”“佚”出入没有固定的时间。古代的时候在位者打猎都有一定的时节，如果不按时间也不行。如果出入没有节度，那么生活将无规律，工作将无秩序，一切都将陷于混乱。不论居家处事还是饮食起居，都不能没有次序，必须有规律。一个人的生活也必须列出时间表，作息有次序、工作有计划。人生短短数十春秋，每天二十四个小时如果安排不好，就很容易虚度。有一首偈子这样说：

二十四小时，八时床上眠，
三餐费三点，加刷牙洗脸：
冲凉大小便，需要一个钟，
午休小动作，又花一小时：
读报看电视，电话并聊天，
至少三小时，还有别事情。

你看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这些拉拉杂杂的吃睡等等，就剩下不多了。如果不珍惜的话，这一天很容易空过，所以修学要懂得精进的重要性。在《长阿含经》卷十三中说：“若不计寒暑，朝夕勤修务，事业无不成。”如果不计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早晚都勤修精进，修习做一些重要的事，事业没有不成就的。无论是做世间的事业，还是做修行的道业，都需要精进。

“乐宴乐”，就是以宴乐为乐，朋友酒食聚会不可久留，如果以此为乐，对于身心都有损害。在《左传》上记载：鲁庄公二十二年，陈国发生动乱，太子御寇被杀，公子陈完流亡到了齐国，齐桓公就想任命陈完做卿，他辞谢说我是流亡到齐国的人，您收留我就是很大的恩惠了，还怎么敢接受这么高的官位呢？最后齐桓公任命他做了工正，就是一个主管工匠

的官衔，陈完接受了，随后陈完请齐桓公喝酒两人喝的很高兴。不知不觉到了晚上，齐桓公就说，“以火济之”，意思是说：我们再点上灯接着再喝吧，因为喝的还没有尽兴，齐桓公喝的这么高兴，如果是普通的人一定会答应他的要求，可是陈完没有答应，他说：“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我只是选择了在白天来招待您，没有选择在夜晚招待您，所以不敢听从您的命令，这就等于直接把齐桓公给拒绝了。接着陈完还陈述了拒绝的理由，“酒以成礼，不继之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意思是说酒是帮助完成礼仪的，不能没有限度的喝下去，这才符合义，这才是适宜的。能让君主完成礼，同时又不饮酒过度，这才是对君主真正的爱护。话说到这种程度齐桓公当然不好意思继续喝酒，一场酒席也就到此结束了。

所以古代人面对国君的要求，如果觉得不符合礼仪也都会婉言拒绝。《朱伯庐家训》上说“宴客切勿流连”，《朱子家训》上说，朋友宴会不可留恋，半夜喝酒是不对的。

“损矣”，就是你做了这三条，犯三条，有损于自己的身心，这与自己的修身有关，而平天下以修身为本，所以犯了这三条也和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有关系，所以有人说什么是最高明的管理呢，把自己管明白了就是最高明的管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己身修不好，齐家治国平天下就谈不上了。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侍于君子有三愆”，这个“愆”当做过失讲，虽侍君子容易犯三种过失，像年少者侍奉年长的长辈，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怎么样才能做好呢？要“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要在学礼上入手，这个礼就是平常生活的规范，侍奉君子就是侍奉有德有位的人，与侍奉普通人不同。君子或有位或有德，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那么要从哪里做起呢？要从学习《弟子

规》做起。

中国自古上学先念“口而诵，心而惟”，口里念诵，心里研究，必须口里念熟，才能够在生活上随时提醒自己。所以为什么要把《弟子规》背诵下来，是因为在生活的每一种境界中都能够时时提醒自己。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就是话未到当说时而说，这个被称为躁。郑康成注：“躁，不安静也。”比如说君子还没有问你，你自己就先说，这就是犯了心浮气躁的过失。比如说在集会的时候，主席或者主人若与你说话你才可以说，如果在座的是你的晚辈，可以随意一些，如果在座的都是长辈，如果没人同你说话，你不问自说这就是心浮气躁。

“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就是话当说而不说，被称为隐。孔安国注：“隐”，不近情识也。比如说君子已经问你了，你就应该把话明白的说出来，如果不说这就是犯了隐匿之过。不论长辈晚辈若是问你问题，你都吞吞吐吐，这就是慢，骄慢很容易得罪人，便是过错。

“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没有观察君子的颜色就说话，“谓之瞽”。《论语集解》周先烈注：“未见君子颜色所趋向，而便逆先意谓者，犹瞽也。”这个颜色就是表示意向，与人说话要看君子的意向而说，否则等于是瞎子，大为失礼，所以也是过失。像卫灵公与孔子说话，卫灵公言：“胡之将至，孔子遂行。”孔子便离开了魏国。这三种过不单不能对君子，对任何人都不能犯，但是对于君子犯了这几个过失就更加严重了。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即衰，戒之在得。”

君子要有三戒，以人生少、壮、老三个时期戒三件事，这也是修身的方法。这里为什么没说小人有三戒呢？因为小人有什么戒啊！小人甘为小人，有戒就不是小人了，小人便无戒，所以这里必须讲君子。从这里我们可以分辨谁是现在的善知识，有戒者为君子，就是善知识，无戒者为小人，就不是善知识。凡是自爱的人，都爱自己的身体，人有三期：少、壮、

老三时。在《礼记·曲礼》上对于什么时候是少、壮、老，都有具体的界限。

“少年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少时这个是指身体，血属阴，气属阳。人的身体必须阴血阳气流行，始能维持生存，少年身体内的血气尚未充实，未充足的时候称为未定，要戒的是色情之欲，因为色欲最损血气，不戒则身体发育不全往往夭折，故须戒色。在古代的礼规定，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这就有戒色的用意，如果没有到年龄就婚配，有损身体都早亡，亏了血气活不到大年纪，所以要戒之在色，这一点要小心。到了壮年之后，就是三十岁以后，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这个时候血气正好刚强，因为生理的关系，自然好勇斗狠，难忍一朝之愤，而与人争斗必然会招凶惹祸，故须戒斗。戒斗的积极意义就是以饱满的体力精神，用于正当的事业。“三十而壮”，也就是说男子到了三十岁气血才充足，到这个时候不是正好用于做正当的事业，一年四季，夏历的四季是从东方开始，日出也是在东方，所以孔子说行夏之时，四五六月是最壮的时候。但是从夏至之后，太阳的直射赤道便开始回归，到了夏季还没完，过了夏至为小暑，大暑，到七月立秋以后，百草都不再发展，到时候结籽，植物结籽便不生长，小动物一交合就死，因为什么呢？因为到了饱和点，所以年壮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所谓好花开到半开时，做事就要趁这个时候，过了这个时候便不能再做事了。所以孔子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如果一个人到了四十岁五十岁，而没有做出什么大事，这个也就不足畏也已。

“血气即衰，戒之在得”，到了老年时，七十谓老，《内经》上说男子六十四岁以后就渐至老境。所以人生七十古来稀，血气即衰，人什么时候变白头发呢？“五十曰艾”，阳气冲不上来。“发”，头发是人全身阳气的总汇，所以五十岁之后头发开始变白了。“得”，孔安国注曰：贪得。老年血气已衰，体力不济如果贪求事功，希望有所得，不但身体不能适应而且事情也办不好，所以要戒得，不能够贪得无厌。《礼记·曲礼》说：“七十曰老而传。”七十岁被称为老，“而传”，就是要把事情都交代出去，这就有

戒得的意思。王凤仪老善人讲老人道，说了一句话："老人性如灰，家事一旁推。"七十岁以后的老人对于家事，儿女的事，儿孙的事，都不要管的太多，性如灰就说明他已经烧完了，剩下的那个灰，没有太多的余热了，就像蜡烛在风中，随时都有可能被吹灭的危险，所以我们从中体会到了什么叫风中的残烛，到这个时候要把自己的精力用于办生死之事上，而不能够把拉拉杂杂的小事放在心上。而且老人要明白一个道理，你贪的再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些东西老的时候、死的时候也都带不走，贪了那么多也没用，那么戒色、戒斗、戒得虽然是说养生，实际上也有养德的意思在其中。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君子有三畏"，君子就是指在位以及求过学的人，在位者与不在位者都包括在内，只要求学就称为君子。君子有三条恐惧的事，这个畏就是恐惧而不敢违背的意思。"畏天命"这个古代的注解，把天命都解释为善恶报应，比如何晏的《论语集解》就认为，"天命顺之则吉，逆之则凶，所以可畏"；皇侃《论语义疏》举《尚书·伊训》解释，"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刘宝楠《论语正义》也举的是《周易·坤·文言》的解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些解释都是以善恶报应为天命，这与董仲舒《春秋繁露》教语篇所讲的吉凶祸福大意是相同的。

"畏大人"，这个大人就是指在位的人。郑康成注："大人，谓天子诸侯为政教者。"为什么对在位的人要恐惧呢？有的注解以为：诸侯治国，天子治天下，各有权利维护朝野安定，不能干犯，所以可畏。也就是说在位的人有权威，得罪了他们便招致灾祸，这种说法不够圆满。有注解说："大人是有德有位之人，故须畏之。"这个说法就比较周全了。因为对有权威的大人，自然就令人畏惧，孔子也不必要再特意提畏戒了。

“畏圣人之言”，皇侃《论语义疏》“圣人之言谓五经典籍圣人遗文也，其理深远故君子畏之也”，“圣人之言”就是指在五经之中记载的圣人所遗留下来的文字，它所记载的，都是恒常不变的道理，这些道理记在经典中为的就是警示后世，违背了它就会有灾祸，所以君子畏之而不敢违背。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何晏的《论语集解》，依据老子的《道德经》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解释小人不知不畏的原因。国法如网，虽然严密，但是犯法的人尚有能够幸免者，但是天命如网，恢恢疏远，作恶之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天法，这个道理只有有道德学问的君子才能够明了。小人没有道德学问，不论在位不在位，对天命不懂得，所以不恐惧，也就可以胡作妄为。因为不知，所以无知无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知者无畏。“狎大人”这是指小人对在位者的态度。“狎”，就是一切不在乎，没有礼貌，很亲密、很随便。生活中像对总统、尊长都不能够显得亲密而随便。有德有学的君子能知天命，也能礼敬大人。小人恰恰相反，不知天命也不知礼，所以轻视大人。小人不懂天命，而懂天命是第一学问。若懂得天命，明了祸福的道理，那么其余的一切学问便都懂得了。一切学问不外“博之以文，约之以礼”，见大人有大人之礼。这个礼很重要，所以学习《常礼举要》同样重要。

“侮圣人之言”，“侮”就是侮慢看不起。小人无德无学，不知圣人所说的话都是真理，所以侮慢圣人之言。像民国以来很多的文人提倡废弃经书，这就是侮圣之言；文化大革命打倒孔家店，这也是侮圣人之言。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呢？五伦关系没有人讲了，伦理关系混乱了，社会不和谐。这个结果都值得后人借鉴，引以为戒。

这一章前后两段，前一段说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三句都各有一个畏字；后一段说小人，句法则有变化，仅说“不知天命而无畏”，然后就说“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这个变化，就是将天命、大人、圣人之言三者连在一起。三者为什么连在一起呢？三者有什么关系呢？古代的帝王都是圣人，一言而为天下法，大人与圣言都是出自于天命。古代

称在位者为天子，就是天老爷之子，是替天行道者，所以天子的诏书开头都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因为皇帝是天给他的地位，是要他来赏善罚恶，所以天子所制定的制度颁布的诏书都不能够违背天理。

中国古来多圣人，比如"天将以孔夫子为木铎"，众生有福的时候，圣人就会出来教化。"圣人一言而为万世法"，不听圣人之言，甚至取消圣人之言，就是侮。小人既对天命不知不畏，所以对于大人与圣人之言也不知不畏。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讲五伦，讲长幼有序，君臣有义，可是现在呢？对于国家元首也不知畏敬。打倒孔家店，便是侮圣人之言。对圣人的话更是不听，以为是废话，以为听了圣人的话，在这个社会行不通，更不必做官发财了，这都是短见，都是误解。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人不学不知义，人不学不知道，这一章主要强调的是学。孔子把人的资质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人是生而知之者，他生来就知道一些事理；次一等的人是学而知之者，他虽然不学不知，但是一学就会，这是聪明的人；又次一等的人是困而学之，什么是困呢？孔安国注："困，谓有所不通，不通就是心智不开，但是他能发奋求学，人家学一遍就会，他学一百遍才会，能够这样苦学也能成功，就如《中庸》上所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别人学一遍就会，自己要学一百遍才会，别人学十遍就会，自己得学上千遍才会，但是如果你能够坚持这个方法，即使很愚钝也会变得很明智；即使很柔弱也会变得很强大。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天资很愚钝，又不肯去求学的人，这是最下等不能成为学者。困而不学，只说民斯为下矣，不说天子或诸侯，为什么呢？因为古代的仁君自幼非学不可，凡是帝王不论多坏，都必须念书，因为有老人逼着他学，则百姓庶人相对而言比较自由，学与不学听其自愿，如果庶人困而不学，这种民就是下等

人。但是孔子说这句话，仍然是有激励这个人求学的意思。我们天天要修学，学为君子，学为圣贤，虽然学的时候受到一些困难，但是也不是下等人，否则的话就像《礼记》上所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不够人格了。"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这里边讲的九思，有一定的程序，不能够颠倒。我们依据雪公的列表来讲一下。他先说明动作次第，然后再讲九思的意义，这样很容易让人明白。孔子的用意是说人一办事，就要知道先如何办，再如何办，要依着次第而来不能够颠倒。

君子待人接物，开头就对象，这是第一步名为"对境"，怎么知道有这个对象呢？那就是由视听而知，眼看对方的形象，耳听对方的声音，都是"对境"。如果说话眼睛不看人，别人的意思你听也听不明白，这是第一步，儒佛都是如此。儒家讲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以眼耳为首。视以眼看，听以耳听，一律对外，视听确实。第二步就是"表态"，"态"是态度，色是颜色，貌是容貌，包括面部颜色与容貌而言，这个颜色有赤黄青白黑，比如说人羞耻的时候，面红；发怒的时候，面色发青；有病不高兴的时候，则脸色变白；不愉快的脸是黑色的。容貌则属于肌肉动态，比如说笑则解颐，怒则张目等等。表态就是表现自己的颜色，容貌等态度。第三步就是出动办事，"动"是动作，动作不过是言事二者，"言"是言语，"事"是行为。事情办完之后有没有过失，必须预防，所以最后是"防非"。这就是九思的最后三条，疑、忿、得。疑而不觉来自愚痴，愤恨来自嗔心，得来自贪心，这三条贪嗔痴，都是过失，必须防范。

君子是求学的人，不求学者不论有没有学问，不能够称为君子。君子从年轻到老，都要求学，就像孔子所说的"死而后已"。中国有一句谚语也说，"活到老，学到老。"有弟子问："什么时候可以不上学。"孔子指着

坟墓，意思是说：到死了才可不学。

学与不学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迷悟的不同。悟则处处都通，迷则处处障碍。所以九思的思，《说文解字》做“睿”字讲；引《尚书·洪范》“思，曰睿”；依《六书总要》则做“念、虑、绎理”讲。意思是依心念，经过考虑抽绎出合理的，这个就叫思。佛家《百法明文论》讲百法的五变形有“触，作意、受、想、思”。“作意”就是意念动，“受”就是接受外面的状况，一感受就会想，想了之后才是思。从这里可以看到，“思”在想之后。

在《礼记·中庸》篇上也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求学先是博学，先学，广博地学习。第二步是审问，就是学了之后有不明了的地方一定要问明白。“慎思”，谨慎的思考。然后再明辨之、笃行之，依着办事就不会有错。佛家也讲“闻思修”，上来必得先闻，其次思，这个“思”不是打妄想。依《百法明文论》解释：思之后才修。学问经过思辨，才能够正确的实行。没有经过思，那你修的是什么呢？修的功夫不到，那怎么成功？所以听懂一句按一句做就会成功。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思这个字很重要，为什么要经常听经呢？就是要慎思、明辨，这样行起来才没有错误，所以求学的君子必须有九思。

“视思明，听思聪”，君子面对外境的时候，要思虑自己的眼是否看的明白；耳是否听的清楚，视听都不能够错误。比如说孔子在卫国击磬，有人一听他击磬的声音，就知道孔子的心理，这就叫耳聪。中国人有句话说“听话要听音”，不仅仅要听人家说出来的话的意思，还要听他没有说出的话的意思，这个就叫耳聪。

“色思温，貌思恭”，君子与人相见面对着对方，要思虑自己的颜色，必须温和，容貌必须谦恭。《中庸》引《毛诗》说：“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这就是讲温和之道。“貌思恭”，这个“恭”是面对对方的时候，一切表示恭敬。朋友见面的时候可以有笑容，如果是去见长辈，则必须肃静，如果笑就失礼了。现在很多人提倡见人就笑，一见总统就笑，这就是不恭敬。依照古礼，长辈可以笑容接待晚辈，但是晚辈不可以笑容对长

辈；长辈见晚辈应该是低头看，这个是俯而亲之的意思；但是晚辈见长辈应该仰面看，这是仰而敬之的意思。

“言思忠，事思敬”，君子与人接洽事物应当思虑自己所说的话，必须忠实。“忠”就是忠信，诚实。能做到就说，说真话，不能做到便不说。在《群书治要》上记载：魏文侯与掌管山泽的官员，约定一个时间要去打猎，结果到这一天却碰上了刮大风，魏文侯左右的人就劝他不要去了，他不听，他说：“怎么能够因为忧惧大风的缘故而失信呢，我不能这样做”。于是他亲自驱车前往，顶着大风去告诉掌管山泽的人停止打猎。所以你看古代的君主，能够成就那都不是偶然的，是因为他有一定的德行。现在的人都喜欢说应酬语，这个不能学。比如我们去买菜，说过一会再来买，结果过一会没有来买，这就是不诚信。朋友见面、我们写文章都必须真实。“士贵乎器识，不在乎文学”，所以必须“言思忠”，这样自然少说话。

“事思敬”，就是办事必须认真，恭与敬不同，恭从心，恭的底下是心，这说明恭要出自于心，心中有恭在外表现出来，“诚于忠，则行于外”。“敬”，在这里讲的是办事一点都不许办错，毫不苟且，一丝不苟，应该办到十分，就必须办到十分，差一分都不算敬。比如说我们当老师的上课不准时，这个就是教学不敬；上课不备课，没有准备，这也是教学不敬。

“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三句话是“防非”，也就是事情办完之后，还要自己反省一下，往往有不少过失，“防非”就是防范过失。事有疑惑自己不能解决，必须问人，如果心中有疑问，仍然去办就错了；如果以问人为羞耻，以显示自己的学问，冒充知道而不去问，那便永远办不好事，那就是愚痴。这个叫“疑思问”。

“忿思难”，愤怒的时候必须忍耐，不能够对人发怒，否则对方怀恨在心，后来必有患难。皇侃的注解注的比较好，他说虽然不合理的事，加在你的身上，也不可以以不合理的态度对待他。但是已经愤怒了，色、貌、视、听、言语都会变，表现出来对方便怀恨在心，后来狭路相逢，有机会他一定会以恨相对，那个时候就有祸难了。所以每次发怒的时候，就会想

到后来可能会有患难，要想免去将来的祸患，就不能够表现愤怒。比如说我们看汉代的刘宽，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怒，确实像他的字所说的：宽恕待人。读书志在变化气质，所以读圣人书，学圣人事，不是学文章，为了演说而已，要改变自己的气质。

“见得思义”，无论财务、名位来归于我，这个都叫得。见得当思考一下是不是合乎义理，如果合义便可以接受；不应当得的，就不能够接受。思问、思难、思义，可以防治贪嗔痴。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一句。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见善如不及”就是见到善人就好像不如他，想要学他那样好，这样就有见贤思齐的意思。《弟子规》上也说，“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每一个人都有成圣成贤的本质本性，这个潜能发挥出来，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所以《孟子》上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也说，“途之人可以为禹”。我们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像禹那样的圣人。“见不善如探汤”，意思是说见到不善的事情就像以手去探热汤，而不敢接触，赶快远离。《了凡四训》上也说人对自己的过恶，就像毒蛇啮指一样，要赶快把这个指头砍下来，否则这个毒伤到全身，人的性命就难保了。人要去恶，避免不善的事情，就要有这样的决心，而且不能够耽误，要迅速。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齐景公有马千驷”，齐景公是一国的诸侯，而且齐国是个大国，兵车有千辆，一辆有四马，千乘就是有四千匹马，王及以外的附属还不论，可见他是很富贵的。齐景公为大国之君，有如此的势力，但是到他死的那一天，人们想不出他有什么善行可以称许，没有人会想他，称赞他。

古代的时候有伯夷、叔齐两个兄弟，饿于首阳山下，到了孔子的时代，人们还称赞他们。这个伯夷、叔齐是殷朝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是长子，但是孤竹君的意思是想让叔齐继位，伯夷看了出来，于是便借着事离开了孤竹国。叔齐也明白父亲的心意，以及长兄的意思，他觉得继位对不起他的大哥，于是也走了，去找伯夷。两个人离开故国，在山野里自己耕种，最后隐居在首阳山。“首阳山”马融注：在河东蒲坂县华山之北河曲之中，他认为首阳山在华山的北面。其他的各种注解和考据还有好几处，都很难确定了。周武王在伐周的时候伯夷、叔齐他们就叩武王之马而见，认为臣伐君是不对的。周武王的左右就想杀害他们，姜太公认为这两个人是贤人，为了让国而逃离自己的国家，隐居山林，就命令人把他们给放了。于是伯夷、叔齐离开了。周武王胜利之后，周得到了天下，伯夷、叔齐很有志气，不食周朝的粮食，于是在首阳山“采薇而食”。后来有人对伯夷、叔齐说，这个薇也是周家所有的，伯夷叔齐听到这句话之后，“薇亦不食，七日饿死”。伯夷、叔齐是否饿死在首阳山，尚有疑问，有人说没有饿死，这里的经文只说饿于首阳之下，也没有说饿死。

在《史记·伯夷传》对这一段历史也有记载，饿是穷的原因。和齐景公相比，伯夷、叔齐他们没有钱财，也没有地位了。子贡曾经问孔子：“伯夷、叔齐何如？”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是怎么样的人，孔子是怎么评价的呢？他说“古之贤人也”，是古代的贤者，很有德行的人。人们到了孔子的那个时候，还在称赞伯夷、叔齐，说他们兄弟让国，又孝又悌，能够长养社会好的风气。

人这一生如果争名夺利，就把人生空过了，辜负了难得的人身。因为你纵使得了全球首富，全球大总统也不能活两百年；纵使能活两百年，死后也像齐景公没有人称叹。因为他只顾自己享乐，而没有为天下的百姓做出任何有益的事。

这一章开头没有说某人说的，没有孔子曰。有的注解认为，并不是孔子说的话，如果是孔子说的，为什么没有孔子曰或者子曰呢？有的注解说是孔子说的，只不过是缺“孔子曰”三个字而已，这是周朝时代的事情，

须有考据才能够说的清楚。

最后一句话说“其斯之谓与”，王肃注“此所谓以德为称者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德才能为后世所称颂，没有德，有官位、有财富也不足以为后世所称叹。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认为，此句上面可能有被省略的文字。

阳货篇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很不好讲。

孔子说“性”，他的三千弟子能够理解的不多。“颜子闻一已知十”，对孔子所说的，“无所不悦，不违如愚”，当然他能够理解。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便明白是“忠恕而已矣”，所以曾子对孔子的“一以贯之”的道也能够理解，他当然也能够懂得孔子所说的“性”。子贡有自知之明，他自己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既然知道“性”不可得而闻也，这个“性”必须觉悟，这说明他对性了解一部分，他是登堂未入于室。

孔子为什么罕言性呢？就是因为懂得性的人很少，他说了也听不懂。孔子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古来有很多注解，但是都不符合孔子的本意。雪庐老人说，后来研究儒家的性的含义，一个是孟子，他在《孟子·告子篇》里边，发表了性善说，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仁义理智根于心。还有就是荀子，他在《性恶篇》里发表了性恶说，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再有就是扬雄，他在《法言·修身篇》里发表的是性善恶混之说，也就是说人性是善恶混杂的，有善也有恶。修其善就成为善人，修其恶就成为恶人。孔子所说的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呢？依经文孔子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并没有说性是善是恶。而关于这一章的历代注解，只有皇侃的《论语义疏》没有用善恶来解释。

雪庐老人认为，孔子讲的性，和佛家所讲的性是一样的，是一个意

思，无二无别。这个性就是宇宙的根源。一切万法都是从自性所生、所变现的。但是后人讲性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性没有两样，但是各人的学问不一样。所以清朝有大儒说“吾学佛而后知儒”，他学了佛之后，才读懂了儒家。像蕅益大师也是如此，他是通过佛教大彻大悟的，后来再重新读《论语》，读出了很多别人读不出的味道。他做的《论语点睛》，确实有很多的点睛之笔来提升后人对《论语》的理解。所以佛教传到中国之后，不仅仅是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大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儒家文化。

雪庐老人说：“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性，是分为体、相、用三个方面来解说的。”万事万物都有本体、现相和作用。这个体就是本体，本体是空无自性，是性空、是真空。佛经说的全是这个道理。比如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心经》上也说，“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里边有的是说性，有的是说相，本性是空无自性的，相是梦幻泡影。什么人看过性呢？一般人都没看过性，没有看过就没有吗？如果说没有那就是落入了顽空，本性确实有，但是看不到。中医有《药性赋》，比如说姜的性是热，虽然你手握着姜，这个手也不会发热，是不是说姜就无热性了呢？你把姜煮熟了之后，吃进去身体就会感觉到热。万法都有本性、都有体，只是看不见而已。但是体会现起各种形相，所以相就是现相。比如说姜的性热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但是姜所长的形象我们都看得清楚，这就叫体空相有。这个空不是没有，体也有，但是你看不到，是毕竟空寂，相也有。

孔子的书、佛经，都讲善讲恶，但是这个善和恶并不是就体相而言的。因为体是空的，善恶便安不上。相是善是恶呢？比如说刀是善是恶呢？子弹是善是恶呢？这个相，都没有善恶，体相都没有善恶，有这个相就有业用，这个用就是作用。等它起作用的时候，才生出了善恶。比如说刀子有作用，刀子可以削水果，可以切菜，也可以伤人，从作用上才分出是善是恶。所以性分为体、相、用三个方面，本体真空，但是随因缘现相。这个相是假有，是众缘和合而成，是因缘所生法。相是假有，但是一般的凡

夫，都误以为是真有，所以执着这个假象，在这个假象中起惑造业。有相则有业用，一有现相，它就会起作用，什么相起什么用。这个体和相都没有善恶，业有善业恶业，所以善恶是就业用而言的。而体相用三者，先有体，次有相，然后才有用。

孔子说的“性相近”的“近”字，是说其“前”，“前”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体相而言。“习相远”的“远”字，是说其“后”，这个“后”就是指的业用而言。所以孔子和释迦牟尼佛两位圣人所说的性，并没有不同的意义。以体相用来解释“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知道性是体空，寂然不动，动就会出现假相。体虽空而性实有，人实有此性，人生、宇宙、万有，一切万事万物都以这个本性为根源，这个本性也是遍及宇宙人生。而人以及万事万物，本性原来是一个，所以说“性相近也”。性虽相近，但各个人的习惯不同，依照各人习惯的发展，越到后来就互相差异越远，所以说“习相远”。性体真空固然没有善恶，但是由性所现的假相呢，也没有善恶可言，就像我们这个人身也一样，其实万事万法都是如此。我们这个人身，就是一个假相，在我们既不作善也不作恶的时候，这个人身谈不上是善身还是恶身。必须由人表现出的行为，是有利人还是损害人，才能说是善是恶。这些行为不是相，而是业用，这个“习相远”的“习”就是业用。善恶只是就业用而言的，既然性无善恶，要明性，就不能从善恶中求。所以有一句话说“善法不是佛法”，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认为学佛，就是做善事积功累德，如果你作善，执着这个作善的相，那并不是真正的佛法。佛法要求我们断恶修善，但是又不着断恶修善的相。

这一章各种注解，解说性善解说性恶，或者是说性善恶混，其实都是误解。佛与孔子所说的性是一个意思，这不是小器人，就是器识小的人所能理解的。因为小器人有门户之见，道不同不相为谋。像如今各个宗派之间斗争坚固，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有门户之见。一般的俗儒一看到体相用，便认为这是佛学的说法，实际上并非如此，儒教的经典也未尝不讲体相用，像《周易·系辞传》，纯粹是孔子之言。雪庐老人为了证明儒经，也讲体相用，特意引用了《系辞传》上的几条来证明。比如说“神无方而

易无体”。什么是神呢？古注以阴阳不测来解释神，阴阳不测非常微妙，所以无方。如何微妙法呢？就是你打一个比方吧，却比方不出来。这是说性体，真空拿什么比方呢？佛也没有说出来，只是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热性冷性，这个水是热是暖是冷，你自己喝下去便知道了。“而易无体”，易的本体在哪里呢？找不出本性。易是唯变所适，用佛教的术语来说就是“随缘现相”。所以没有一定之体。无方无体，这就是讲本体真空之义，这就是讲的体。

再比如，“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依照韩康伯的注解说：“道是寂然无体，不可为象，但阴阳都是由道而产生的。”孔颖达的《周易正义》说：“道是生物开通，善是顺理养物，故继道之功者唯善行也。”“生物开通”，道已经产生一切万物了；“善是顺理养物”，顺着天理而生养万物；“继道之功者唯善行也”，这都是由体起用的意思，这叫善，起作用之后才分善分恶。再比如“显诸仁，藏诸用”，这里边的“显”、“藏”都是就作用而言。所以仁义善恶，都是在作用上讲的。

还有“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这个“鼓万物”的“鼓”就是动的意思，性动就产生万物出现万物，这个动就是动作。万物就是指一切物。一切物都是由本性一动产生出来。本性之德盛大，业用也盛大，大到究竟处就是至矣、尽矣，这都是讲的用。“盛德大业至矣”，就是说这个功德太大了，本性的德能太大了，而这个业是由性出来的，这就是讲的用。

再还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里边讲成象成形都是讲的相。至于六十四卦里边的“象曰”、“彖曰”，以及“吉”、“凶”、“无咎”等等都是讲的相。圣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成相成形，这都是讲的相，“变化见矣”这个千变万化，就都出来了，这还没说善恶。

《易经》以下的文字接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到这里才说善恶。这个就是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是从体相用三个方面来讲，“性相近”是指体相而言，“习相远”是指作用、业用而言。

子张问仁于孔子。

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

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答复，“能行五事於天下”，便可以称为仁人。“请问之”，就是请问是哪五件事呢？孔子回答说：“恭宽信敏惠。”先说出这五事的名称，以下再分别进行解释。

“恭则不侮”，这个“不侮”，孔安国注“不见侮慢”，恭敬人则不被人侮慢。邢昺《论语注疏》说：“言己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己，故不见侮慢。”意思是说自己恭敬地来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恭敬地对待自己，所以不会被人侮慢。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敬人者人恒敬之”。这个“恭”是发自于内心，对人不可以心存侮慢，这一点我们必须学习。像孟子说“人必先自侮而后人侮之”，为什么人会侮辱自己呢？一定是自己先侮辱了自己，自己对别人先不恭敬了。

在《春秋左传》上记载，鲁宣公二年，郑国去攻打宋国，宋国的华元率兵迎战。将要开战的时候，华元宰羊犒赏将士，但是却没有给他的车夫羊斟吃，他可能觉得他是一个车夫，所以心里对他不恭敬了。等到作战的时候，一开始打仗了，这个车夫羊斟就说：“前日分发羊肉是由你做主，今天战车进退的情况这事由我做主。”于是羊斟就故意把华元乘的战车赶进了敌阵，结果宋军大败。这就是因为，没有恭敬别人，对人心存侮慢而招致的惨败。

这个“敬”，要对别人恭敬，首先要克服慢心，要做到自卑而尊人。所以《曲礼》曰：“毋不敬”。对人对事要一切恭敬。而不能够做到恭敬别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心存傲慢，所以首先必须克服慢心。在《成唯识论》中说：“云何为慢？恃己于他，高举为性。能障不慢，生苦为业。”什么是慢呢？原来，就是通过自己和他人比较之后，认为自己比别人强，于是

傲慢看不起他人。傲慢能障碍不傲慢，障碍对人的恭敬，同时还能产生痛苦，这就是讲它的作用。佛经上把慢细分为七个种类，上次在香港《群书治要》论坛上，周泳杉老师把这七种慢给我们做了细细的讲解。

“一者谓慢”，第一就叫慢，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认为自己胜过他人因而慢。这个是很自然的，谁叫我比你强呢，里边带着藐视的意思，对不如我的人我藐视他，这就是慢。另一种是因自己与他人条件相等而生傲慢，意思是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和我差不多而已，这就是不能恭敬和我同等之人，这就是慢。

“二谓过慢”，什么叫过慢呢？这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己与他人条件相等，而强说自己胜过他人，两个人条件相等，比如说甲和乙条件相等，但是甲还向大众鼓吹比乙强，这叫过慢。另外一种呢，是自己不如他人，我说那个人跟我差不多而已，这也叫过慢。过慢的程度，就比慢的程度还要超过，程度更加严重。你看这个慢，是说两个人条件相等而产生傲慢，而过慢呢？是两个人条件相差，而说我超过他人，或者自己还不如别人，还说我们两个差不多。所以这个过慢的程度，就比慢的程度，又要严重了。

第三种叫“慢过慢”。比过慢还要慢，这个人的傲慢程度就更强了。那就是自己完全不如他人，反说自己胜过他人，这近乎是厚颜无耻了，这叫“慢过慢”，就非常过分了。

第四种“四谓我慢”。什么叫我慢呢？就是执著“色受想行识”五蕴组合的这个身体为我，而产生傲慢。因为有我，就有他，有人我之别，有我就有我慢，这是慢的根本原因。换一句话说，只要我执没有断，只要我们还是一个凡夫，就一定会有我慢，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所以说四大烦恼常相随，只要有我，就有我见、我慢、我爱、我痴。这四大烦恼是跟着我一起来的。所以只要有我，就有我见、我慢、我爱、我痴。执着我，就会有我、我所；觉得我比你好、我比你高、我比你能、我比你强；也执着我的东西比你的东西更高贵，比你的东西更好，所以你都不能碰。这就是把我延伸到我所，延伸到物质上去了。无限地延伸、无限地扩充，那就会产生

冲突、产生竞争、产生斗争、产生战争，这就是我慢自高自大。

第五叫“增上慢”。什么叫增上慢呢？就是未证果，而说自己已经证果，或者说已证少份果，而说证得圆满菩提，这个叫增上慢。增上是强盛的意思，这个人在修道，但是我慢没有除掉，但是他带着我慢，在修学的过程中，很努力、很用功、很精进。在用功的过程中，得到了相似的境界，在这个相似的境界中，生起高举之心，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殊胜的圣果，这叫增上慢。换一句话说，增上慢是对谁说的呢？是对修学的人说的。如果没有修学的人，增上慢就谈不上了。

比如说我们学了《弟子规》，我们看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顺眼，还是越来越不顺眼呢？像蔡老师在讲课中说，有的人学了《弟子规》之后，变成警察了，看谁都不对，这就违背了《弟子规》。学了《弟子规》之后，就越来越不能够和人相处了，觉得自己学了圣贤教诲，自己要快成圣成贤了，而别人还是凡夫俗子。所以我们有增上慢的人，会经常怎么说话呢？说你不懂，说你是凡夫俗子。所以你看，我们学得越多，应该是越谦虚。但是学得越多，反而越认为世间人都很浊恶，都是我的冤亲债主，越来越不能和世间人相处了，这就叫增上慢，这就是学错了。学对的人是什么样的呢？学对的人是和光同尘，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都欢欢喜喜，都不会看人不顺眼，就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这才是学对的表现。

第六种叫“卑劣慢”，这也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自己同他人的差距相当大，却说自己比他人只差一点点，虽然骄慢但是还有一点谦卑，不好意思这叫卑慢。换一句话说，他承不承认自己没有别人高呢？承认不承认别人比他高呢？承认！但是他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不过是赢我一点点而已！这叫卑劣慢，也就是说自己真的很差，和人差距很大，但他却说我只差一点点。第二种情况，他是承认自己和他人的程度差距很大，但是却不肯向他人虚心学习，这也叫卑慢。也就是说我真的很差，可是看到那个人好，他的态度是什么呢？你好你的、你高你的，你走你的天堂路，我堕我的地狱，而且还不需要人家来救度他，这叫卑慢。

最后，“邪慢”。就是自己邪见，还以为正见，自己缺德，还以为修德；自己无德，还以为有德等等。譬如说现在进监狱的人，都在交流什么呢？一个人问对方，说“你第几次进监狱呀”？他说“我第一次”，很不好意思。结果对方说，“哦，你才第一次，我已经是第三次了”。你看，他认为三次比一次还值得傲慢，所以成就恶行，恃恶高举，这个是邪慢的一个特点。比如说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有的人就比试什么呢，比试每一天杀人数目的多少，以此为能，这个就叫以恶为能。像现在的竞奢斗富、互相攀比，也属于这一种类型。为什么呢？大家攀比谁浪费得更多，谁更奢侈，这也是邪慢。因为这些慢心，障碍了对人的恭敬心，还会为自己招致侮辱。所以要学恭敬，则必须首先克服傲慢，“恭则不侮”。

下面说“宽则得众”，宽厚待人，百姓就对你有感情，就会心悦诚服，就能得到众人的支持。在《群书治要》上记载，说梁国曾经有一件难以判别的案件，群臣之中有一半人认为有罪，另一半人认为无罪。梁王就说：“陶朱公虽然是一个普通的百姓，但是富可敌国，他的财富和国家相差无几，这个人一定是有不同凡人的智慧。”于是他就派人请陶朱公，来请教这件事。陶朱公怎么说的呢？陶朱公说，我是一个普通百姓，不懂得判决案件的事情。尽管如此，他做了一个比喻，说我的家中有两块白色的玉璧，色彩一样、尺寸一样、色泽也一样，但是两个玉璧的价格却相差悬殊，一块价值千金，另一块价值五百金。梁王听了就奇怪了，说既然两块玉璧尺寸色泽大小都一样，为什么一块值千金，而另外一块却只值五百金呢？朱公回答说：“从侧面来看，一块比另一块要厚一倍，所以价值千金。”梁王一听就明白了，他说：“说得好。”因此梁王判案，凡是罪证不足的，有疑问的，就免去处罚；凡是立功证据不足，行赏有疑的，他就仍然给予奖励。梁国的百姓大为高兴。“正如墙壁太薄了会容易毁坏，丝绸太薄了容易破裂，器物太薄了容易打碎，酒味太薄了，容易发酸一样。凡是刻薄却能旷日持久的，大概是没有的。所以国家要养活百姓，实施政教，我认为只要宽厚就可以了。”这是朱公断案给人的启示，告诉我们，宽厚就能够获得众人的支持，得到人心，任何事都是有因果的。

“信则人任焉”，言而有信，就能够得人信任。古人说“君无戏言”，虽然这是对领导者而言的，但是对于一般的百姓，也要学习信守承诺。《弟子规》上就说，“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在《群书治要》上也记载，唐叔虞他是周成王的弟弟，有一次成王跟叔虞开玩笑，把桐叶削成圭形给叔虞，说道“用这个来封赐你”，封赏给他。史佚因而请成王选个好日子，封叔虞为诸侯。成王说：“我那不过是同他开玩笑罢了。”史佚说：“天子没有玩笑的话，一旦说话，史官就会记录下来，还要用礼仪来完成它，用乐章来歌唱。”于是，周成王就把叔虞封为唐国之侯。所以，君无戏言，古代的皇帝每说一句话，都有史官在旁边认真的记录，所以不能说错话，要谨言慎行。

“敏则有功”，什么是敏呢？就是“应事疾，则多成功”。做事敏捷才能够有成就。做事不能拖拖拉拉，本来今天可以做好的事，就要今天把它做好，不要把它拖到明日。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今日事今日毕，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惠则足以使人”，给人恩惠，人必感恩图报，能够深得人心，所以足以使用人。像周文王的恩惠泽及枯骨，所以天下归心。反之，不能给人以恩惠，就谈不上使人。

在《韩诗外传》上记载，说宋燕在齐国做宰相，结果被驱逐了。回来之后，就招了门尉陈饶等二十六个人，说：“诸位大夫，你们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去投奔其他的诸侯国呢？”结果陈饶等人都趴在地上，没有人应答，宋燕就叹了一口气说：“哎，太可悲了，为什么士大夫容易获得，却难以使用呢？”陈饶回答说：“并不是士大夫容易获得而难以使用，是您不能够正确地安抚他们。”宋燕说：“请问您这话怎么讲？”陈饶说：“您给士人的薪俸，只有三斗的黍稷，结果他们养家糊口都不够，但是您家的野鸭大雁，却有吃不完的粮食，这是您的第一个过失；您家的果园种满了梨子、栗子，后宫妇女用这些果子互相投掷，但是士人却没有尝到过一颗，这是您的第二大过失；您家的绫罗绸缎，华丽地装饰在厅堂之上，随风而破败，但是士人们却不能够用它们做衣服的滚边，这是您的第三个过

失；钱财是君主您所轻视的，而生命是士人所重视的，您不能用自己所轻视的东西来付出，却希望士人们能够付出他们所重视的东西。这就好比您做的是铅刀，（铅质的刀，它的刀质非常柔软而且不锋利。）却希望它像名剑干将那样锋利，这不也是很难办到的吗？”宋燕一听，便知道自己错了。他不能够待人以仁惠，士人又怎么能够和他共进退、同甘苦呢？这就是告诉我们：“惠则足以使人。”因为一般的人都有知恩报恩之心。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他不知恩也不懂得报恩，这也是缺少教育的结果。缺少教育，主要是缺少孝道的教育，对父母的养育之恩都不感恩图报，对于别人给他的恩惠，他更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任何人的恩惠，都不会超过父母。所以现在人不知恩、不报恩，也是因为孝道教育缺失的结果。

子曰：“由！汝闻六言六蔽乎？”

对曰：“未。”

“居！吾语汝。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何晏注，“六言”就是“仁、智、信、直、勇、刚”六事；“蔽”就是障覆的意思。刘宝楠《论语正义》引《荀子·解蔽篇》注，说：“蔽者，言不能通明，滞于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在这里，他把这个“蔽”，解释为壅蔽的意思。这个“蔽”，作覆障讲还是作壅蔽讲，都可以，它的意思都是使人不能通明事理。

“六蔽”是针对六言而说的。这个六蔽，就是“蔽六言”。好学，就能够明理明事，解除六蔽。“由”，这个是孔子与子路谈话时，呼着子路的名说，孔子叫仲由，长辈叫下辈的名字，这是亲密的称呼，不像今天父亲叫儿子，儿子叫父亲，都是以同辈相称，这是颠倒错乱，这是向西方学的，这是不懂礼的结果。

“汝闻六言六蔽乎？”就是你听过六言六蔽吗？刘宝楠《论语正义》

说“六言六蔽”是古代成语，孔子以此来问子路。古代的人都是席地而坐，先以两膝着席，然后再坐在足跟上。长者问话的时候，按照礼的规定，要起身回答。不能长者问话，你还坐在那纹丝不动，没有那回事似的。起身就是直起腰身，成为长跪的姿势。依孔安国的注解，就是子路原来坐在那里，一听孔子问他，他便起身回答说：“未也”，没有听说过六言六蔽。

“居，吾语汝”。孔安国注，“居”当坐字讲，坐下安稳谈话不紧张。孔子命子路说：“坐下，我告诉你。”以下便是孔子告诉子路的话：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就是喜好，孔安国注，仁者爱物，不知所以裁之，则愚也。依照邢昺《论语注疏》说“好施与”，叫做仁。也就是说，好施舍，给予赠予，这个都叫仁。但是如果仅仅好仁而不好学，不知所以裁之，所施与的不恰当，就如同愚人。这个“裁之”，就是裁度适中的意思。“愚”就是愚昧，只好行仁，但是不能裁度，使其适中而行，他的行为是否恰当就不得而知了。这个仁是嘉惠对方，固然是好事，那一个人喜好仁爱，怎么还会有恶呢？善事与恶事都要随从中道，随从中道哪里有谁好谁坏。孔子是圣人，要人在无形之中改变心理，好仁也必须好学，才知道好的仁是否合乎中道。如果不求学，有些地方通达，有些地方不通达，不通达就是蔽，就是愚，就叫愚仁。

比如说宋襄公与楚军在泓水作战，宋军已经摆好了阵势，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水，这个时候司马对宋襄公说：“对方人多而我们人少，趁着他们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水，请您下令进攻他们。”结果宋襄公却说“不行”。等楚国的军队已经全部渡过泓水，还没有摆好阵势的时候，这个司马又建议宋襄公下令进攻，但是宋襄公还是回答说“不行”。等楚军摆好了阵势之后，宋军才去进攻楚军，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认为，仁义之师不去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结果自己在作战中大腿受了伤，护卫官也被杀死了，这就是妇人之仁，而自称仁义之师。这是好仁而不好学的弊端。

“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这个“智”，就是智慧的智的意思；“荡”是放荡。孔安国注，“荡”，无所适守。好智的人，如果不好学，只知展现自

己的才智，不顾道德的规范，就会放荡而没有操守。比如说，苏秦、张仪都有智，好事不做，只图私利，弄得天下大乱，这个都是好智不好学的结果。像今天的高科技、高智商犯罪，也都是好智不好学，只是学习了一些知识技能，但是没有道德的规范，所以才会放荡而没有操守。

“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这个“贼”，皇侃《论语义疏》作“害”字讲，认为不学而信守承诺，这个信不合时宜，以致贼害其身。像皇侃《论语义疏》引江熙说，古代有一个很守信的人，名尾生，与一个女子约会于桥下，结果时间到了，这个女子还没有来，却发洪水了。但是，这个尾生为了守信，就死死的抱着桥柱不肯离去，最后淹死在水中，这就是不学而信的弊端，就是他只信守承诺，但是不好学所导致的。

“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前面《泰伯篇》我们学过。“直而无礼则绞”。马融注，“绞，绞刺也”，皇侃《论语义疏》根据这个意思解释说，“绞犹刺也，好讥刺人之非，以成己之直也。”这个“直”，是一个美德，但是，也必须好学，才符合中道。否则，就像《子路篇》所记载的：叶公对孔子说：“我们乡党中有一个正直的人叫躬，他的父亲‘攘羊’”。这个“攘羊”，就是别人家的羊，到他们家里去了，他顺手牵羊，就没有把这个羊给人送回去。结果他的儿子就去证明他父亲偷了这个羊，“刺人之非”以至刺到自己的父亲之罪，这就是绞到了极处，这是好直不好学的弊端。

“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智、仁、勇都是好事，称为三达德。“知耻近乎勇”，但是如果不好学，“其蔽也乱”，他的蔽病就是乱。像在《论语》中还有一句话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邢昺《论语注疏》解释这一章的时候说：“勇，谓勇敢，当学以知义。若好勇而不好学，则是有勇而无义，则为贼乱”。这个“义”和适宜的“宜”是相通的。凡事不适宜，种种规矩都不讲，以至于好勇斗狠，这都是乱。比如说秦国的秦武王，他身高体壮有神力，喜好和别人比试力气，像大力士孟说等人都因此做了大官。公元前307年，秦武王与孟说比赛举龙文赤鼎，结果两眼出血胫骨折断，晚上便气绝而亡，年仅23岁。堂堂一个皇帝，居然与人比力气，而且被大鼎压死，这就是好勇而不能配合好学所导致的。

“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孔安国注：“狂，妄，抵触人也。”这个在《论语·公冶长篇》，孔子曾说“吾未见刚者”，邢昺《论语注疏》说“刚者，质直寡欲”，质直寡欲，这个人正直，又很少有欲望，当然是很好。但是如果只好刚而不好学，偏于刚强不得中和之道，也会导致他的言语行为抵触他人。

仁、智、信、直、勇、刚六者，各有表现的事实与所依据的道理。事实非常繁杂，道理非常精微。如果只好六言中的任何一言，而不好学其中的事与理，便不能中道而行，因而各有所蔽。所以“好仁”、“好智”、“好信”、“好直”、“好勇”、“好刚”，都不能不配合“好学”。“六言”说明，这个人都知道心要去向善，但是不好学，就不通事理。所以《荀子·劝学篇》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君子应该怎么样才能通达事理呢？就是要博学，学圣贤经典，学圣人之道，而且要多次的反省自己，这样就会智慧明了而行为没有过失了，这就是告诉我们学能去蔽。

我们学《论语》，也要学历史，学历史上的好事，我们要见贤思齐；坏事就要戒除，见不贤思则内自省也。看了这些历史的故事，就知道好学的重要性了。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这句是孔子用反问的语气说明，礼不仅指玉帛而言，乐并不仅指钟鼓而言。从前祭司、两国交往都有一定的礼，乃至普通之人的交往、送往迎来、婚丧嫁娶等等都有一定的规矩。比如说普通人之间送礼，要讲究送土特产，如果我们到广东送广东的物产，那就是不合礼；如果送一些自己家乡带来的土特产，虽然不值钱，但是情份重。古人送礼是献帛送玉，玉帛是礼物，钟鼓是乐器，赠礼物鸣钟鼓并不是礼乐之本，礼乐的本意在敬、在和。所以《曲礼》曰：“毋不敬。”就是教导人们要一切恭敬，人不能够敬、不能够和所以才用礼乐。

礼以敬为重，玉帛只是礼的文饰，只是用来表达敬意而已；乐主于和，钟鼓只是乐器而已。但是当时的君主只知道崇尚玉帛，而不能安上治民，重于礼物而减慢于恭敬；只知道崇尚钟鼓而不知道移风易俗，敲击钟鼓而不合雅颂。所以孔子加重其词的感叹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个就是强调："礼之所云，不在玉帛，不在礼物。"礼在于内心的恭敬，如果没有内心的恭敬，即使用金玉这样的盘子碗来招待客人也没用。反而感觉是炫耀，如果有恭敬心即使是四菜一汤，也可以招待贵客，贵在心诚。

郑康成对这句话这样注解："言礼非但从此玉帛而已，所贵者乃贵其安上治民也。"意思是说这个礼并不是崇尚玉帛等等的礼物，它所贵的是它能够安上治民。关于礼这个安上治民的作用，我们在《群书治要·晏子》上有这样一个故事可以看得出来。

在《晏子》上记载当时齐景公很喜欢饮酒，有一次他连饮了数日，酒酣之时他竟然脱衣摘帽，亲自敲击瓦缶奏乐，并且问身边的各位近臣说："仁德之人也以喜好以此为乐吗？"身边的一个愚臣叫梁丘据，他就回答说："仁德之人的耳朵眼睛同别人一样，他们怎么会偏偏不喜好以此为乐呢？"于是齐景公派人驾车去请晏子，晏子穿着庄重的朝服而来，齐景公说："我今天很高兴，愿与先生共同饮酒作乐，请你免去君臣之礼。"但是晏子却回答说："假如群臣都想免去礼节来侍奉您，我怕君主您就不愿意了，现在齐国的孩童凡是身高中等以上的，力气都超过我也超过您，然而却不敢作乱，那都是因为惧怕礼义啊。君主假如不讲礼义就无法役使下属，下属如果不讲礼义，就无法侍奉君主；人之所以比禽兽尊贵，就是因为有礼义啊！我听说君主如果不是因为礼义，就无法正常的治理国家；大夫如果不是因为礼义，底下的官吏就会不恭不敬；父子之间如果没有礼义，家庭就会有灾殃。《诗经》中说人如果不遵守礼义，为什么不赶快去死啊？可见礼义是不可免除啊。"

齐景公听了之后就说："我自己不够聪明又没有好的近臣，加之他们来引诱我、迷惑我，才导致了今天这个地步，请处死他们。"晏子说："身

边的近臣没有罪。如果君主不讲礼义，则讲究礼义之人就会悄然离去，不讲礼义之人就会蜂至沓来，君主如果讲究礼义，则讲究礼义之人就会蜂至沓来，不讲礼义之人就会悄然离去。”景公听了之后就说道：“先生说得太好了！”于是齐景公让人换了衣冠，令人洒扫庭院，更换坐席，然后重新请晏子，晏子进入宫门经过三次谦让才登上台阶，采用的三献之礼。随即晏子再行拜别之礼准备离去，景公以礼送别，然后命令下人撤掉酒席停止奏乐，并对身边的臣子说：“我这么做是为了显扬晏子的教诲。”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礼对于治理国家而言至关重要，如果都讲究礼治理国家就易如反掌，在《礼记》上也说古代的圣王治礼作乐，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教导人们培养出正确的好恶之心，返回到做人的正道上来。如果平时国家重视提倡礼乐的教化，就不用警察来维持秩序了。

关于这个乐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在这一句的注解中马融注：“乐之所贵者，移风易俗也，非为钟鼓而已也。”这就是告诉我们乐之所云不是在钟鼓，而在于和，能够移风易俗。关于音乐对心灵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古今中外的许多思想家都有所认识，比如与孔子同时代的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毕达哥拉斯，他提出的教育的目的：“就是灌输一种对和谐的爱。”我们可以通过欣赏音乐的美，而成为和谐的人。他认为音乐不仅仅是娱乐，在教育中音乐是被用来传授道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控制品格中欲望和富有侵略性的部分，所以他通过音乐教育来塑造弟子们的品格。毕达哥拉斯相信人的实际追求是通过对感官的反复灌输而形成的，也就是我们在生活中追求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接触什么，耳朵经常听什么，眼睛经常看什么，最后就成为我们的追求。这个也就像古人所重视的。太任怀孕的时候，“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其实他们也是有这个认识。

所以通过使人看美好的形式、形态和听美妙的韵律曲调，可以实现人对美的追求。因此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通过韵律和曲调的形式建立音乐教育的人，帮助人们改正坏的品格和达到对激情欲望的控制，以恢复

人心原初的和谐状态。从这些曲调中，他还设计了检查和治疗各种身心疾病的方法，其中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受神的启示而设计的曲调，很容易的改变并控制了弟子中出现的各种精神上的激情欲望。比如沉溺在痛苦和愤怒中的激情、遗憾和嫉妒、创伤的恐惧，各种形式的欲望和侵犯性，食欲不振以及松弛和懒惰引起的狂热等等。通过合适的音乐就像通过精心调制的草药，他把这些受困扰的人恢复为拥有和谐美德的人。

在史书中记载，毕达哥拉斯曾经通过对着一个醉汉吹奏不同曲调的方式制止了他的疯狂行为，恢复了他清醒的头脑。可见毕达哥拉斯不仅把音乐作为塑造人格的重要手段，也把音乐作为治疗精神疾病的重要途径。而在《理想国》的对话中，柏拉图也是借苏格拉底之口说，音乐教育之所以比其他教育重要得多。是因为节奏与乐调有着最强劲的力量，能够进入心灵的最深处。

一个孩童从小受到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在他的心灵深处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尔雅；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恰恰相反。他说一个真正受过音乐教育的人，在他的心里会有一种内在精神状态的美。表现在有形的体态举止上，也会有同一种与之相应的调和的美。他在社会交往中，用于心灵的统一作用，对于同道必然会气味相投一见如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是对于浑身不和谐的人他避之为恐不及，而正确的爱对于美是有秩序的，事物的一种有节制的和谐的爱，他与纵情任性泾渭分明。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就是在于，达到这种对美的爱，一个受过适当音乐教育的人，由于培养了和谐的美感，对于人品或者自然物的缺点，也最为敏感，因而对于丑陋的东西会非常反感。能够像嫌弃恶臭那样不自觉的加以谴责，而对于优美的东西则会非常赞赏，愿意感受并受到它的鼓舞从中汲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美且善。

古希腊的这些思想家都看到了音乐教育对于心性成长潜移默化的影响，孔子也强调了对音乐的学习。比如在《泰伯篇》中，他就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为什么“成于乐”呢？因为礼乐对于平衡人的内在

情感和外在行为，以达到社会和谐秩序的目的至关重要。而礼乐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功能，是因为在中国古人看来，礼乐缘于天地自然的和谐与秩序，真正伟大的音乐能够成功的模拟自然的和谐，只有这样的音乐才是有意义的、可取的。所以古人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礼的制定规定了明确的制度和规则，而音乐的普遍流行在人们中间建立了一种平和的气氛，音乐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和。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人也认为，音乐不仅能反应人的情绪、情感，也能塑造人的性格。这是因为以"和"为本质的音乐，能渗透到人的内心深处。这个和柏拉图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比如在《礼记·乐记》中，就有这样一段阐述"人性原本是平和安静的，但是由于受到外界的影响，就起了种种贪欲之心，当这些欲望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以及我们的内心被物质世界所扰乱的时候，我们就丧失了自我而被自己的欲望所淹没。从这里就滋生了叛乱、违抗、狡黠、欺骗以及普遍的不道德，因此才出现了以强凌弱、以众欺寡、弱肉强食、鳏寡孤独、老弱病残无所养的局面，这就是乱世的表现。"

由于音乐缘于心灵的内在运动，因此也就能够渗透到心灵的深处。好的音乐是那种能够引发人进行心灵内在反省的音乐。所以古人制礼作乐并不是为了享受，为了纵情于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为了使我们具有正确的鉴赏能力，培养出正确的好恶之心，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所以《乐记》上也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可以说和毕达哥拉斯一样，对孔子而言音乐教育是改变和培养人的道德品质，维持社会和谐有序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在我们的传统文化论坛上，有一位老师专门讲了一堂课叫《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从中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音乐的教化力量。

"云乎哉？"说的就是这个吗？礼说的就是玉帛吗？乐说的就是钟鼓吗？那这个又是什么呢？在人的内心培养起和敬的态度，这才是礼乐的根本，这种和敬的态度一旦养成，行为自然就会表现出仁义礼智信。所以柏拉图也曾认为真实的正义，是关乎人的内在的，是人心灵的理智、激情和

欲望三个部分形成的一个有节制的和谐的整体，凡保持和符合这种和谐状态的行为，是正义的好的行为；指导这种和谐状态的知识是智慧；而把只起破坏作用的行为，称为不正义的行为；把指导不和谐状态的意见，称为愚昧无知。一个人之所以不正义、不节制、怯懦或无知，正是缘于他心灵的混乱与迷失。这也就是为什么柏拉图如此的重视音乐的教育。

在《汉书·礼乐志》上也这样论述道："用音乐来调理内心而使情智相同，用礼制来整治于外，就是整治于人的行为，而使人尊卑有别，情智相同就会和睦亲爱，尊卑有别就会顺服恭敬。未尽的心意难以显现，就要通过飨、献、辞、授、登、降、跪、拜的礼节来张显，和睦亲爱的喜悦之情乃以名状，就要通过诗歌咏言、钟实管玄来显发，赞赏的是其中表达的敬意而不是财物，赞美的是其中的欢悦秩序，而不是留下的声音。"因此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才是礼乐的根本。

我们现在提倡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喊口号、贴标语不行，必须要干实事。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对于学者而言，实干表现在哪呢？就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礼乐精神有深入的理解，否则就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比如人家说这个礼乐，都是吃人的礼教，这个礼都是吃人的，都是和人性不相符合的。那你对它没有深入的了解，你也会人云亦云。大家认为流行歌曲都很好，但是你学了古代的乐对于人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就知道该去学习什么音乐，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一段。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鄙夫"这个"鄙"就是没有学问，无知识的人，所见不广又没有品行。换一句话说，这个"鄙夫"就是学问道德都没有的人，他贪图名利，行为卑鄙。孔子先提疑问"鄙夫可与事君也哉"？"可以事君"，这个事就是

指可以出来侍奉君主、侍奉元首做大官。“也哉”可以吗？可以出来替国家办事吗？读书是为了什么我们要明白，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为社会办事，只要念过书的人都懂这个道理。不会办事就是书呆子，读书明理志在办事，只会做文章有什么用？要走上社会的人都要问问自己：有德才吗？如果愿意为人民牺牲一切，又有才德，就可以出来接济天下，利益天下的苍生；若只是有钱或者出来做事只是为了钱、为了一己私利，那是误尽苍生。

孔子提出这个问题之后，然后解答这种人不可以侍君，“鄙夫可与事君也哉”？这个皇侃的《论语义疏》言：“凡鄙之人不可与之事君。”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可与鄙夫共同事君，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是王引之《经传释词》他把可与的“与”字解释为“已”，并且做了证明、做了引证。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品性的人确实不可以干政治。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何晏的注解，“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比如说韩昌黎的“敢将衰朽惜残年”，“敢”字就是不敢的意思。鄙夫为得到名位利禄，尚没有得到的时候唯恐得不到，不择手段以求能得到财色名利，“既得之，患失之”得到了名位利禄，他又恐怕失掉；“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郑康成注：“无所不至者，言其邪魅，无所不为，易得易失，终日是自私自利，为自己打算，这种人是鄙夫。”这种患得患失的鄙夫，可为贪图个人名利为得到名利的时候想尽方法一定要得到，只要有所得不论来路明与不明、不论手段合不合义，他一概不管。甚至杀人放火、奸盗邪淫，只要有利什么都可以干，既得又想尽方法保住不失。这种人可以为国家办事吗？有意要从政的人，读了这一章，可以好好反省一下。患得患失，起心动念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怎么可以利国利民呢？所以古人教导我们要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利益现前的时候，首先想它符不符合道义，如果不符合，那是万万不能得的。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孔子之厌恶紫色之夺朱色，厌恶郑声之乱雅乐，厌恶利口之人，倾覆邦家。孔安国注："朱，正色；紫，间色之好者。"朱色，就是五种正色，即青、黄、赤、白、黑中的赤色。以黑加赤而为紫，名为间色，紫色中有赤色的成分，所以能乱朱色，又能给人美好的感受，令人喜好，这就是夺朱。以紫夺朱，就是以邪夺正。郑声，就是郑国的音乐，包咸注说"郑声，淫声之哀者"。"雅"，是正也，宫商角徵羽五声，什么时候用什么乐，都有一定的规矩。雅乐，是先王的雅正之乐，中正和平，能调和性情。郑声淫哀，哀以思，容易感动人，不得性情之正，与雅乐相违。当时有很多人喜好郑声，不知雅乐，就是以淫乱雅。我有一位博士生写了一篇柏拉图论音乐对心灵影响的论文，在论文中，他就提出，音乐对于人的影响，在《傅雷谈音乐》中指出，"音乐，是刺激感官与情绪最剧烈的艺术，所以无论对于艺人还是观众，都应注意情感与理性的平衡，处处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节度，而不能流于狂抑。"

在中国古代的《吕氏春秋》上，也讲了这样一段关于音乐的论述，它说，"乱世之乐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乱世的音乐，当演奏木质，革质的乐器的时候，声音就像打雷；演奏铜质，石质乐器的声音就像霹雳；演奏丝竹之类歌舞音乐，就像大嚷大叫。用这样的噪响来惊骇人们的精神，振动人们的耳目，动摇放荡人们的性情，倒是可以办到的，以此作为音乐来演奏，绝对不可能给人带来快乐，所以音乐越是奢华放纵，民众就越是受到压抑，国家越是混乱，君主的地位也越是卑微，这样也就失去了音乐本来的意义了。

从这一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流行歌曲，很大一部分都不是德音雅乐，为什么呢？因为你听了这些音乐，没有让你心平气和，生起喜悦，反而听了就想大嚷大叫，雷霆震怒，伤害人的性情。本来一个人的心情很好，结果听了一段很忧伤的歌曲，心情就变得很忧伤，很糟糕。为什么这些音乐对人的性情有伤害，但是很多人却愿意创作，也愿意流行这

些音乐呢？为什么这些音乐还受到欢迎呢？柏拉图就解答了这个问题，柏拉图认为：人的心灵或灵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那就是理智、激情与欲望。理智的部分用以认识真理，应当起领导作用；激情部分，也就是人们藉以发怒的那个东西，它如果不被教育所败坏的话，本性上是理智的天然辅助者，它服从并协助理智；欲望部分，也就是心灵的无理性部分，用以感觉种种物欲的骚动，通过音乐等教育，可以培养和加强理智，又使激情变得温和平稳而文明，这两者联合起来就能领导欲望，以免它因为充满了所谓的肉体快乐，而变大变强，甚至不再恪守本分，并企图去控制那些，它本不该控制的部分，从而毁了人的整个生命。

但是，最便于各种各样艺术模仿的，就是人心中的无理性部分，而达观镇静的性格却不易模仿，纵然模仿出来，也不易欣赏，尤其是对那些拥到剧场里的嘈杂听众而言，为什么呢？因为所模仿的性情是他们所不熟悉的。从事模仿的诗人，这个诗人也包括音乐家，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就不会费心去模仿人心中理性的部分，而会看中容易激动情感的和容易变动的性格，因为它最便于模仿，最容易引起共鸣。

如果模仿诗人们、音乐家们创作时所依据的心理不是理智部分，模仿的对象不是真理，就不能保证他们所造就出来的作品，是以健康和真理为目的的，而为他们所打动的，往往是心灵的低劣部分。柏拉图认为，因为这个原因就可以得出，第一，诗人的作品就是音乐家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的价值；第二，它逢迎了人性中低劣的部分，世界逢迎人心的无理性部分产生快感，使心灵失去应有的秩序与和谐。因为这些理由，就应该拒绝诗人，也就是这些低劣的音乐家，进入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们挑动、培育和加强人性中低劣的部分，从而摧残了理性的部分。所以在柏拉图谈到音乐的教育时，这样说：“过度的快感，可以扰乱心志，它易与骄纵淫荡相融，倘若一种庸俗的漫无法纪的革新，弥漫于艺人的队伍之中，他们如醉如颠，听从毫无节制的狂欢支配，还狂妄无知地说音乐里没有真理，是好是坏，都只能凭听者的快感来判定。他们创造出一些淫靡的作品，又加上一些淫靡的歌词，这样结果就会在群众中养成

一种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习气，使他们自以为有能力，去评判乐曲和歌的好坏，而一旦对音乐普遍的妄想风行，自由就接踵而来，人们都自以为知道他们其实并不知道的东西，就不再会有什么恐惧，随着恐惧的消失，无耻也就跟着来了。”柏拉图的这番阐述，对于生活在所谓的现代的音乐世界中的我们，无疑是一种警醒，它告诫我们音乐教育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孔子走到一个地方，他不问这个地方的政事办得如何，只是听一听这流行什么音乐，就知道这个地方的民风如何了。所以我们应该特别注重通过音乐教育来移风易俗，教导人们能够欣赏德音雅乐。

“利口”，就是口才锐利，无理都能变为有理，而且能取悦于人。孔安国注：“利口之人，多言少实，苟能说媚时君，倾覆国家。”口才锐利的人，说话说了很多，但是很少是实话，如果他能够取媚于当时的国君，就有可能使当时的国家倾覆。从前说话必须是言忠信。

这几句话，就是“紫色夺朱色，郑声乱雅乐，利口覆邦家。”都是因为开始时不以规矩，不辨是非，最后导致以邪夺正，以淫乱雅，以利口覆邦家。圣人恶紫、恶郑声、恶利口，都是教导人要严守规矩，防微杜渐。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

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曰：“赐也，亦有恶乎？”

“恶徼以为智者，恶不逊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子贡问孔子，君子对人是否也有所厌恶？这个恶，就是憎恶、厌恶的意思。皇侃的《论语义疏》引江熙说：“君子是指称孔子。”孔子答复子贡，君子有恶，以下是孔子所憎恶之人。孔子厌恶什么人呢？“恶称人之恶者”，做人之道，要厚道，要隐恶扬善。“称人之恶者”，就是宣扬他人之恶的人，这与隐恶扬善相反，所以孔子恶之。

现在很多的电视节目，也没有做到隐恶扬善，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去

大肆宣扬，还认为自己很正义。其实中国人看问题，不仅仅看到它当时的影响，还要看到他的流弊。如果我们总是把过恶的事情到处去宣讲，流弊是什么呢？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电视，说有一个贪污上亿的人被抓了起来；明天看到有一个贪污上千万的人；后天看到一个上百万的人；那个贪污了两万的人会怎么想呢？他想，天下乌鸦一般黑，现在升官就是为了发财，我贪污了两万和这些人相比，我是小巫见大巫，我贪污的不够，他的廉耻心就没有提起来，还认为自己贪污的太少了；那个廉洁有守的人会怎么想呢？他想：现在当官的没有不贪不占的，像我们这样一文不取的人，在一般人看起来都不正常了，他也会随波逐流。所以隐恶扬善，别人的恶我们不去说，不去宣扬，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如果他的过恶被公开了，他会想，反正我已经臭名昭著了，那就“破罐子破摔”吧，他就没有想改过向上的心了；那别人做了小小的善事，我们到处去宣扬，这个人一听到了，就会受到鼓励，这个人就会想，你看我做了小小的善事，就到处被表扬，那我应该尽力去做大的好事，他的善心就受到鼓励。

“恶居下流而讪上者”，在阮元的《校勘记》上说“汉石经无流字”。在汉朝的石经上这句话没有“流”，也就是写的是“恶居下而讪上者”。“讪”，就是毁谤，“居下讪上”，就是下级毁谤上级。居在下位，看到上级有过失，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劝谏他改正，如果三次劝谏都没有效果，就可以离去；如果不去劝谏，而只在背后毁谤上级，这也是有失君子之风，所以君子恶之。

“恶勇而无礼者”，厌恶有勇而无礼的人。前面我们讲了，勇而无礼则乱，所以呢，君子也憎恶这样的人。

“恶果敢而窒者”，马融注：“窒，窒塞也。”果敢而不通事理，往往败事，而又损人，所以可恶。

曰：“赐也，亦有恶乎？”这里孔子反问子贡，说赐，你也有所恶吗？赐，是子贡的名，中国人特别的尊师，就是父母老师可以称他的名，除此之外，所有的人都要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恭敬。孔子反问子贡说“赐，你也有所憎恶的吗？”下面都是子贡对答孔子的话。

“恶徼以为智者”，智慧的“智”；孔安国注：“徼”做抄字讲，抄袭他人之意，以为已有。这种人可恶，所以我们写文章、讲课、引用别人的东西，都要讲明是引用谁的。又据刘宝楠《论语正义》，“徼”，郑本作绞，也就是郑康成的注解写作“绞”，绞急，于是自炫其能，以为有智，这种说法也可作参考。

“恶不逊以为勇者”，“逊”，是谦逊的逊。就是憎恶那种以不谦逊为勇的人。

“恶讦以为直者”，“讦”，包咸注：“讦，谓攻发人之阴私。”就是以揭发他人的阴私当作自己帅直，这个人可恶。这一章有前后两段，前段四种人为孔子所憎恶，后段三种人为子贡所憎恶。学君子的人可以以此作为修身之鉴，注意反省自己是不是在被憎恶之人的行列。

微子篇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

人曰："子未可以去乎？"

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说文解字》上解释"黜"，"贬下也。"柳下惠就是展禽，他做鲁国的典狱之官，无罪而三度被黜退。

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有人问柳下惠说"你还不离开鲁国吗？"

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依邢昺的《论语注疏》说，"焉"作何字讲，"枉"作曲字讲，当时世间皆邪，自己以直道事人，何往而不三黜？如果自己以正直之道来事奉人，到哪里不是会被三次黜退呢？这就是说，苟以直到事人，无论到那一国，都会再被三黜。若舍弃直道而以曲事人，以邪曲之道事人，则在楚国也不会被贬黜。何必离开父母所居的鲁国呢？"直道事人而不枉，三黜而不去父母之邦"，这是柳下惠坚定不移的德行，所以柳下惠的妻子，以"惠"作为他的谥号。

在《烈女传·柳下惠妻篇》上记载："柳下惠处鲁，三黜而不去，忧民救乱。"他的妻子劝他离开，他怎么说呢？他说："油油之民，将陷于害，吾能已乎？"广大的老百姓现在将要统统受到陷害，我难道可以不管吗？当他死的时候，门人要作一篇关于他生平事迹的诔文，表示哀祭。他的妻子认为最能了解他的德行，于是亲自写了这篇诔文，其中有这样几句："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也就是

说这个“惠”的谥号是他的妻子给他的。“惠”指柔质慈民曰惠；或者爱民好与曰惠。“好与”就是好施与。他之所以被称为惠，恰恰是因为他有这些特质。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这一章是周公训示他的儿子伯禽的话。

孔安国注：“鲁公，周公之子伯禽，封于鲁。”周公很注重对儿子伯禽的教育。在《群书治要·说苑》上就记载，周成王把周公的儿子伯禽封在鲁地，伯禽即将告辞离去，周公就告诫他这样几句话：“子无以鲁国骄士矣。吾，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尝一沐而三捉发，一饭而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意思是说：“你去了之后，不要仗恃自己是鲁国国君而对士人傲慢。我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当今成王的叔父，又辅佐天子。我的地位在天下来说也不算轻了，但是我还曾经在洗头的时候几次握着头发去见宾客，在吃饭的时候几次吐出口中的食物去见客。就是这样，还恐怕漏掉天下的贤士。”

吾闻之曰：“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道德品行宽广博大，却又坚持恭谨的人才会荣耀；土地广阔富饶，却又坚持节俭的人才会安乐；俸禄多、爵位高，却又坚持谦卑的人才会尊贵；兵源众多、武器精良，却保持戒慎的人才会获胜；聪明机智，却又保持愚拙姿态的人才会受益；博闻强记，却又保持浅陋态度的人才会更加广博。这六种操守都是谦虚的美德。

“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谦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纣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

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品德不谦逊的，会失去天下、败亡自身，桀纣就是这样的人。能不谨慎吗？所以《易经》上说：有一种处世之道，大能保住天下，中能保住国家，小能保住自身，说的就是谦逊。

“夫天道毁满而益谦，地道变满而流谦，鬼神害满而福谦，人道恶满而好谦。《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天道是减损自满者而增益谦逊者，地道是改变自满者而流向谦逊者，鬼神是伤害自满者而保佑谦逊者，人道是厌恶自满者而喜欢谦逊者。《易经》上说：谦卦亨通，君子有好结果，吉祥。你一定不能倚仗拥有鲁国就傲慢地对待士人。这就是伯禽要去鲁国之前，他的父亲周公给他的教诲。在这一章，周公也教育鲁公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君子不施其亲”，意思是说君子不疏远他的亲族。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说：“施”、“弛”二字古多通用。此文“不施”即“不弛”假借。郑注《坊记》云：“弛，弃忘也。以训此文最当。”意思是说“施”和“弛”是通假字，“施”是“弛”的意思，根据郑康成的注解“弛”就是“弃忘”的意思。也就是君子不遗弃、不忘记、不疏远他的亲族。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安国注：“以，用也，怨不见听用。”所以“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就是不使大臣抱怨不获所用、不被重用。

“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皇侃在《论语义疏》上说：“大故，谓恶逆也。朋友之道，若无大恶逆之事，则不得相遗弃也。”意思是老朋友如果没有大的恶逆、重大的罪过，就不要遗弃他。《论语》在前面也说：“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这个“偷”就是“薄”的意思。不遗忘老朋友，民风就不会薄，就会淳厚。

“无求备于一人”，不要对任何一个人求全责备。人的才能有限，用人办事要取其专长，不得要求他事事皆能。像在《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上说：“凡用人者，不求备于一人。桓公之于宁戚也，知之矣。”凡是君主用人、领导用人，对任何人都不能够求全责备。齐桓公和宁戚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宁戚想去侍奉齐桓公，但是他穷困潦倒，没有办法举荐自己。于是，他就为那些流动做生意的人驾车，到了齐国，晚上住在城门之

外。这时候，齐桓公到郊外迎接客人，晚上开了城门，让赶车的人回避，宁戚正好在牛车下喂牛，他看到了齐桓公，就赶紧敲击牛角，唱起了凄厉的商歌。齐桓公听到了歌声就说："这个唱歌的人可不是一个平凡之人。"于是就命令后面的车把宁戚载进城去。

齐桓公返回国内，宁戚就来求见，劝说他要统一整个国家。第二天宁戚又来求见，劝说他要称霸天下。齐桓公听了他的进谏非常高兴，就想任命他做官并委以重任。但是群臣有不同意见，有人说这个人是魏国人，魏国离齐国也不远，不如派人去打听一下，如果他确实是一个贤才，再任用也不迟。齐桓公说："你说得不对。如果你去打听他，恐怕他有一些小的过恶。因为他有小的过恶就忘记了他大的好处，这是君主所以失去天下贤才的原因，而且人本来就难以用尺度去衡量，他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只要用他最擅长的地方就可以了。"所以齐桓公没有派人去打听宁戚的为人，而是对他委以重任，授之为卿。正是因为他这一举动非常得当，得到了贤士，所以能够称霸天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是圣贤人，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小的过失、缺点或不足。如果希望人没有任何瑕疵，那也是不现实的。所以任何人不能够求全责备。

《群书治要·文子》上记载了这样一句话："今人君之论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贤之道也。"现在的君主评论臣子的时候，不在意他大的功劳和贡献，而在他细小的行为上做文章，挑剔他小的不善、小的错误，这是失去贤士的原因。

"故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人有大誉，无疵其小故"。一个人有很高尚的德行，就不要在他行为的小节上做文章；人有很大的声誉，就不要在小的不足上去挑剔。在这个世间上是很难找到一个十全十美、一点儿错误不犯的人。《文子》上又记载："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从历史上看，自古至今没有一个是十全十美、德行无可挑剔的人，所以君子不求全责备于任何一个人。后面还做了两个比喻："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秽；然而天下宝之者，不

以小恶妨大美也。”夏禹所佩戴的碧玉，也不是没有瑕疵的；夜明珠，也不是没有污点的；但是天下的人仍然认为它们是最宝贵的东西，是不以小小的瑕疵来妨碍它的大美。“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长，而欲求贤于天下，即难矣。”现在的人只记得别人的短处，而忘记他人的长处，还想在天下求得贤才，这是难上加难。所以，任人当求其大节不亏，而宽容他小小的瑕疵，这就是不求全责备。

子张篇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小人有过，必然文饰，就是以不实的言辞掩饰他的过失。相对的意思就是君子不文过，而勇于改过。

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并不在于君子不会犯过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他能够认识自己的过失、承认自己的过失、改正自己的过失；而小人却文过饰非，徒为自己的过失找借口而已。《群书治要·韩子》上说："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是荣是辱都在于自己，都是自作自受，而不在于别人。小人不知修身，成贤成圣都是自己之事，与他人无关，不懂得为自己负责，所以做错事之后，还想方设法地找借口为自己开脱。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子夏认为，君子使民、事君，都要以信为先。君子在位的时候，先要取得民众的信赖，然后才能劳役民众，如果没有取得民众的信赖，民众就会认为你在虐待他们；君子若是在臣的地位时，要先取得君主的信任，然后才能够去劝谏君主，如果没有得到君主的信任就去劝谏他，君主会以为你在毁谤他。这也都是人情世故。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的时候，父母可以责备儿女，老师可以责备学

生。为什么老师可以责怪学生、对学生很严厉呢？因为彼此有信任。所以即使老师对学生百般刁难，学生也知道老师是为了成就自己，而心存感恩。如果彼此没有信任，你就会认为他是在找茬、虐待，而心生怨恨。所以古人要得到一位善知识，不惜行脚万里。什么叫“行脚万里”？古代没有舟船，没有交通工具，人要去参访一个善知识就会赤脚走路，要走千里万里去参访这个善知识。什么是“善知识”呢？古代认为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呢？就是必须使学者克服习气、突破极限，然后能够面对一切境缘如如不动的人。所以他想方设法地凌辱、虐待，目的是使他忍人之所不能忍，才能成人之所不能成，这就是善知识。所以古人说：“严师出高徒。”孟子也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以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

要成才，哪有那么容易的事？要经过一番磨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以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人随随便便成功”。所以纵使老师想尽了方法，使用了各种使他感觉到屈辱虐待的手段，他都是心存感激；纵使对方真的是心存虐待，但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就这个修行的学生而言，无论老师的心是什么样的心，他都是以感恩之心来对待，就会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成就的是自己的道德学问，也会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而身心安定。所以古代的时候老师教导学生是不遗余力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因为学生对老师没有信任了，老师稍微严厉一点，他就心怀怨恨。所以现在的老师也不愿意和人结怨，学生做错了事，也不能够去严厉地指正了。

“厉己”的“己”字是民众自指，“谤己”的“己”字是君主自指。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包咸注：“阳肤，曾子弟子。士师，典狱官。”阳肤是曾子的弟子，士师就是典狱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负责司法，也就是今天的法官、监

狱长、警察之类。皇侃的《论语义疏》："孟氏，鲁下卿也。"孟氏是鲁国的一位下卿。孟氏使曾子的弟子阳肤为典狱官，阳肤请示曾子。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已失其为政之道，民心离散已久。你若获得人民犯罪的情实，则需为犯人哀伤、要怜悯犯人，不能因得实情而喜。"我们可以看出，曾子的这一番话出于一片仁心，最为可贵。古代的人认为，人我是一体的，所以他有同情心，确实是"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看到这个犯人犯罪，他也是发自内心地表示哀伤。

现在人受西方观念影响，认为人和他人是对立的。所以我们抓到了犯人，犯人和警察是对立的关系，会怎么样？是能得到实情，以破案立功为喜事，以能够受到嘉奖为荣誉，但是不能够对犯罪的人生起哀矜之心、同情之心和帮助、救助的心。如果从事司法事业的人都能够效仿曾子的这番存心，社会风气就会蔚为改变，社会和谐也可以达到了。

在《孔子家语》上就记载着，孔子在担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有一家父子两人互相控告，他就将两个人关进同一个牢房，三个月之后还是没有判决。后来，做父亲的请求撤诉，于是孔子就释放了这对父子。季孙听了这件事就很不高兴，对孔子说："司寇，你欺骗了我。你以前告诉过我，治理国家的人必须把'孝'放在第一位。现在斩杀一个不孝之子，用以教育百姓尽孝，不是很好吗？可是你却赦免了这个不孝之人，这是为什么？"孔夫子很感叹地说："身居上位，而不懂得教化和引导百姓，却要滥杀百姓，这是不合情理的。不用孝道去教育和引导百姓，却要用孝道的规范来判决官司，这是杀害无辜。全军大败，不可斩杀士卒；司法混乱，不能实施惩罚。为什么？因为在上位的没有进行教育，罪责不在百姓身上。法令松懈而诛杀甚严，这是残害；随意征收赋税，这是暴政；不教化百姓却苛求其守礼守法，这是虐害。政事如果没有了这三种情况，刑罚便可以施用了。要先宣讲道德规范并以身作则，如果还不行，就敬重贤者来鼓励众人；若还不行，就废弃、罢黜不能遵守道德规范的人，来使其惧怕；这些做了，百姓就会遵纪守法了。要是还有奸邪之徒顽固不化，就用刑罚来对待他们，于是民众就都知道这个人为什么犯罪受罚了，这样就不必用威严

来警告他们，刑法也可以搁置不用了。当今的社会却并不是这样，教化混乱、刑罚繁多，使民众感到迷惑而容易陷入犯罪，又从而受到制裁，所以刑罚越来越多而盗贼却屡除不尽，社会风气的衰败已经很久了。虽有刑法，百姓能不越轨犯法吗？”在这个案例中，孔子对父子两个人的处理，也就显出了他的仁德之心。他不希望父子相互争讼，而是希望父子有亲，使这个自然的亲情能够保持。

孔子的弟子季羔，在卫国做狱官的时候，有一次对一个罪犯实施了断脚的刑罚，古人称为“刖足”。不久卫国发生暴乱，季羔往城外逃跑，结果正好碰到那个被他砍断双脚的人在把守城门。那个人对季羔说：“城墙那里有个缺口。”季羔说：“君子不翻墙。”那个人又说：“那里有一个洞可以藏身。”季羔说：“君子不从洞里往外爬。”结果那个人又说：“这里有一个屋子可以躲避。”季羔就进到屋子里。等到追兵走了之后，季羔要离去时，对受了断脚刑罚的人说：“我不能破坏君王的法律，就亲自执行刑罚砍断了您的脚。今天我在灾难中，这正是您报仇的时候，可是您却帮助我躲避，这是为什么？”那位被砍断脚的人说：“砍断脚本来就是我犯了罪应该受的惩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先前先生按法律对我治罪时，是先处置别人而后处置我，是想免除对我的处罚，这我知道。法庭判定罪名，将要判处刑罚的时候，先生心里很不高兴，都显现在了表情上，这我也看出来了。先生难道是偏爱我吗？上天降生有德行的人，他们办事本来拥有这样的德行，这就是我之所以喜爱先生，并帮您逃脱的原因。”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就赞叹说：“太好了！作为官员，执法都是一样。但‘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心里想着仁爱、宽恕，就会树立美德；但是施予严酷残暴，就会招致仇恨。公正执法，心存仁爱，大概就是季羔这种人吧！”这里告诉我们，孔子和他的弟子在判处罪人刑罚的时候，其实都是心存仁爱之心，而不是因为得到了犯罪的情实而沾沾自喜，甚至去邀功请赏。

子贡曰：“纣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

恶皆归焉。”

殷纣王是殷王帝乙的儿子，名辛，字受。他暴虐无道，最后被周武王所讨伐，而丧失了天下。“纣”是他的谥号，邢昺《论语注疏》说：“谥法，残义损善曰纣。”他之所以被谥号为“纣”，就是因为他“残义损善”。

孔安国注：“纣为不善以丧天下，后世憎之甚，皆以天下之恶归之于纣。”子贡以为，纣王的罪恶不应该如此之甚。“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君子居于下流之后，就像纣王那样承受天下所归的罪恶，所以君子厌恶居于下流。根据皇侃和邢昺的《论语注疏》，“下流”就是有了恶行而处在人下之意。这就像地形卑下，则为众流所归。君子为善不为恶，就是因为恶居下流之故。子贡这句话的目的也是劝人，以纣为借鉴而不要去作恶，否则天下之恶皆归到自己的身上。

下面一句：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日月之食”就是日食、月食，皇侃《论语义疏》“食”作“蚀”，腐蚀的蚀、侵蚀的蚀，“食”和“蚀”通用。日食是日光被月球遮蔽的现象；月食是日光被地球遮蔽，使它的光不能反射到月球的现象。君子的过失犹如日月食。“过也人皆见之”，君子有过的时候，就像日月食那样，人人都看得见。“更也人皆仰之”，君子有过能改，改时像日食月食后重现光明那样，人人都仰望他。君子不掩饰过失，因为他勇于改过。所以子贡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

尧曰篇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敏则有功，公则悦。

《论语治要》都是从《论语》上节选出来关于治国平天下的精要，所以这一段也有部分的删节。这一句话可以分成三节。

第一节，“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是汤伐桀时的告天之辞。《尔雅·释诂》云：“朕，我也。”郭璞注：“古者贵贱皆自称朕，至秦世始为天子尊称。”意思是说，在古代的时候，无论是贵是贱都可以自称为“朕”，到了秦始皇的时候才成为天子的尊称。汤说：“我本身有罪，请天帝不要牵连万方之民；万方之民有罪，他们的罪责由我来承担。”这是汤王给我们做出了一个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表率。“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也是天下大治、世界和谐的根源，为什么？因为境随心转，我们所处的环境、人际关系，都是由我的心来转变的。所以作为国君，他能够有这样的态度，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上行而下效，整个社会才兴起了自责之风，人人都反省自己，结果就是“各自责，天清地宁”。如果大家遇到事情互相指责、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挑剔、互相抱怨，那就是“各相责，天翻地覆”。

第二节，“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这是周武王伐

纣时的誓众之辞。“虽有周亲，不如仁人”，这是《尚书·泰誓篇》中的两句话。大意是说，虽有周家最亲的人，但若不善，则被罪黜。就像孔安国注：“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虽然是自己的亲人，但是他不贤德、没有才能、还想叛逆，也会诛伐他，比如说管蔡就是这个例子。管叔、蔡叔，他们本来是武王的弟弟，但是两个人不贤不忠，后来还起来反叛。结果到了周成王的时候，周公平定了叛乱，结果管叔被诛杀、蔡叔被流放。虽然不是周家的亲属，但如果他是仁德之人，也一定要重用。

后边孔安国注：“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箕子、微子都是原来商朝的大臣、商纣王的臣子。箕子是纣王的叔父，后来看到纣王残暴无道就离开了，据说是逃到了朝鲜半岛的北部，被那里的人推举为国君，所以箕子可以说是朝鲜的始祖。后来周武王建立了周朝，他就把这块地封给了箕子，所以他是仁人，也任用他。微子是纣王的庶兄，即兄长，他看到纣王残暴无道也离开了。后来周武王平定天下之后，他绑着自己来投靠周武王。后来管蔡叛乱，周公平定叛乱之后，周武王的儿子成王就把微子封做宋国的国君，而且让他继承商朝的祭祀，因为他属于殷商的后代，这也是归附了周王而被任用。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邢昺的《论语注疏》认为，百姓是天下众民。武王说我若不教百姓，假使有罪过，当归罪在我一人。因为中国古代的圣主都认为自己应该承担君、亲、师的责任，不仅仅是管理、领导百姓，而且要向父母亲人那样关爱百姓。除此之外还不够，还要当他们的老师，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教导他们五伦八德。所以如果百姓因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而犯罪，这个罪过就在君主的身上。

第三节，也就是自“谨权量”至“公则悦”，这是总说二帝三王所行之政，二帝三王就是尧、舜、夏、殷、周，即尧舜禹汤，还有周文王。都认为这一节是孔子所说的话。雪公在《论语讲要》上就引《汉书·律历志》和《公羊传·昭公三十二年》何休的注解作为证明。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这个“权”就是“秤”的意思，“量”就是斗、斛。“秤”就是称物的器皿，以秤称物而知轻重；斗

与斛都是量物之器，以斗斛量物而知多少。“谨权量”，就是谨慎齐一度量衡之制，使民间贸易公平。“审法度”，就是审查车服旌旗的礼仪制度，使贵贱有别，各有秩序而不乱。“修废官”，是使事必有官、官必有人、人必尽职。能够做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则四方之政便能顺利地施行。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兴起已灭的诸侯之国（“国”是诸侯国），为已绝祀的贤卿大夫立后，举用隐居的才行超逸之民，如此天下的民心自然来归。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上解释，“灭”就是“绝”的意思。而《公羊传·僖公五年》说，“灭”就是“亡国之善辞也”，就是对灭亡的国家一个好的说法。“国”就是诸侯国，“士”就是指卿大夫。

“所重：民、食、丧、祭”，帝王所重视的是民、食、丧、祭这四者。孔安国注：“重民，国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丧，所以尽哀；重祭，所以致敬。”注解得很好。说，人民是帝王为政的根本，重视民食是为了养民，重视丧礼与祭祀是教民以德，都是以民为本。丧礼和祭祀都是教导人有恭敬之心、有知恩报恩之心，所以目的还是教民。

“宽则得众”，《论语》原文还有一句“信则民任焉”，在《群书治要》里把这一句给删掉了。“敏则有功，公则悦”，宽厚待人，则得众人归附；办事敏捷，则有事功。所以办事不能拖拖拉拉，这样会一事无成、没有效率。为政公平，则民心悦服。

孔安国注：“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传以示后世。”以上所记载的都是二帝三王之所以能够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因，所以记下来传给后世。“二帝”就是尧、舜，“三王”就是禹王、汤王和武王，他们的治国理念都是和盘托出，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这些理念来学习，也能够把国家或者企业单位治理好。

子张问政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

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子张曰："何谓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

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张曰："何谓四恶？"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子张问孔子怎样才可以从事政治。

孔子说："要尊崇五种美事、屏除四种恶事，这就可以从政了。"子张问："何谓五美？"孔子说："君子为政，要惠民而不耗费财力，劳民而不招民怨，有欲而非自私之贪，心中安泰而不骄傲，有威仪而不凶猛。"子张问："何谓惠而不费？"其实就是问何谓五美。

孔子就逐条解释五美。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王肃注："利民在政，无费于财。"为政者要以适当的政策来利民，民之所利不同，就要根据不同的利益，制定不同的政策付诸实施。比如，根据农民所利，就要有利于农民的政策；根据工商之民的利益，就要制定有利于工商之民的政策。以这些利民的政策来辅助各地各业人民，使他们都能够安居乐业，这就是"惠而不费"。

"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邢昺的《论语注疏》以《学而篇》上孔子的话来解释："使民以时，则又谁怨恨哉。"为政者要推行公共建设，比如说修治沟洫，或养护道路桥梁等，需用民闲劳力，要在农闲的时间，民闲

才可以出劳。这样劳动人民，又有谁会抱怨呢？

“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之欲是欲行仁政，他也有欲，但是欲和一般人的欲不一样，他是要推行仁政。想推行仁政，就能得仁，这个欲就不是贪。皇侃的《论语义疏》上说：“欲仁义者为廉，欲财色者为贪。言人君当欲于仁义，使仁义事显，不为欲财色之贪。故云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也。”这就是告诉我们，当君主的人，如果是以仁义为欲，这就被称为廉；欲财色，才被称为是贪。如果仁君欲于仁义而不欲财色之贪，这就是“欲仁得仁，又焉贪”。

“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孔安国注：“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君子待人接物虚心平等，所待之人无论多数少数，也不论是大人物小人物，都不敢怠慢，一律恭敬，这就是“泰而不骄”。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君子端正他的衣冠，自己对自己的瞻视、仪容非常重视，令人望之俨然而敬畏，这就是“威而不猛”。如果一个人出门都不洗漱，衣服脏兮兮的，帽子带着歪着，鞋带也不系，让人一看就觉得这个人连自己都管理不好，会对他生起轻视之心，也不会让人“望之俨然而敬畏”。所以想让别人尊重，必须首先自己尊重自己，自己把自己的衣冠都穿戴整齐，说话、办事进退都有度，这才会让人生起恭敬之心。

子张知道了五美是什么意思，再问：“何谓四恶？”

孔子为子张解释：“不教而杀，谓之虐。”为政不先教民，没有教导人们伦理、道德、因果，结果人们不知道自己在伦理关系中的责任和本分犯了罪，这样被杀掉，这叫虐政。“不戒视成，谓之暴。”马融注：“不宿戒而责，目前成为视成。”这个“宿戒”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为政不在事先一再地告戒，而立刻就要看到成果，这就是暴政。“慢令致期，谓之贼”，政令发布很慢，限期完成却是紧急而刻不容缓，这是贼害人民。“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孔安国注：“谓财物俱当与人，而吝啬于出纳惜难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财与物都是应当给予别人

的，但是却非常吝啬，给予的时候还非常悭吝不舍，这是有司的责任（有司就是小的官吏，比如说看管仓库的官员），有谁要拿什么东西，他要记得清清楚楚、很负责，这是他的责任所在；但是作为国君就不能够这样做了，做国君要很大气，不能像这样管理仓库的小官般吝啬，特别是对于贤才要非常珍惜，而且要给他们安定身心的资财，让他们能够安下心来做事。